

五千年 中外文化交流史

第三卷

李喜所 主编
张 静 等著

5000 YEARS'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OUTSIDE WORLD

世界知识出版社

5000 YEARS'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OUTSIDE WORLD

《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全五卷）是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沿革的大型专著。此书吸取了近二十年来我国文化研究热潮中的成果，阐明了许多有关文化的理论和历史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思考和开拓，是一部品位很高、价值很大的力作。

张 静 等著

五千年 中外文化交流史

第三卷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三卷/李喜所主编;张静
等著—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10

ISBN7-5012-1495-6

I.五... II.李... III.文化交流-中外关系-文化史
IV.K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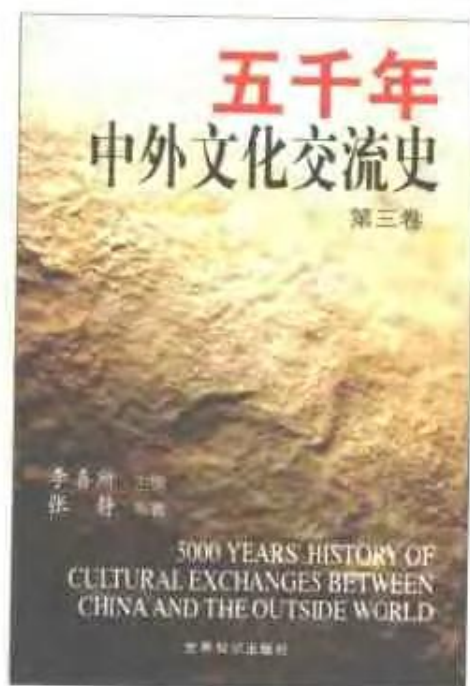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24883 号

责任编辑 任红岩
责任出版 刘林琦
责任校对 余 岚

书 名 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 第三卷
Wuqiannian Zhongwai Wenhua Jiaoliushi Disanjuan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book.com
排版印刷 世界知识出版社电脑科排版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850×1168 1/32 印张:18½ 字数:477 千字
版次印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声明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5000 YEARS'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OUTSIDE WORLD



内容提要

本卷内容主要包括1840—1911年晚清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晚清时期的文化交流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即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它承上启下，开启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局面。西学的大量输入，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也促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困苦中裂变和再生，同时使汉学进一步走向了世界。本书在总体把握这一文化交流的基本特征的基础上，从不同时期、不同国别、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多元角度再现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同时力所能及地叙达与亚、非、拉各国的文化交流。作者锐意开拓，志在创新，新史料、新观点、新方法随处可见。

李喜所 主编

5000 YEARS'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OUTSIDE WORLD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 1

一、“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文化结构的嬗变 / 1

1. 由“西学”到“新学” / 1
2. 文化内在结构的变化 / 5
3. 文化部门分类的变化 / 10

二、晚清文化交流的基本特点 / 14

1. “化西为中” / 14
2. 融通与整合 / 21
3. 舍本逐末 / 24

第二章 晚清时期的西学东渐 / 31

一、晚清时期西方文化传播的发端 / 31

1. 自西徂东的传教士 / 31
2. 西书的出版和西报的创刊 / 33
3. 教会学校的建立 / 39
4. 西医的着陆 / 39

二、晚清时期西方文化传播的渐进 / 42

1. 五口通商与西学传播的进展 / 42
2. 睁眼看世界 / 47
3. 引进自然科学的先驱 / 51
4. 晚清社会文化观念的变迁 / 56

三、晚清时期西方文化传播的发展 / 60

1. 调和中西文化的“中体西用”观 / 60

2. 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 66
3. 西学的广泛传播及影响 / 69

四、晚清时期西方文化传播的新阶段 / 75

1. 从日本转介西学 / 75
2. 民主共和思潮的兴起 / 80

第三章 “广西国之学于中国” / 86

一、广学会的成立 / 86

1. 一脉三会 / 86
2. 广学会的机构 / 89
3. 广学会的宗旨及经营方式 / 97
4. 总干事李提摩太 / 99

二、广学会与西方文化的传播 / 103

1. 西学书籍的翻译与出版 / 103
2. 《万国公报》及广学会出版的刊物 / 113
3. 广学会的赠书与售书 / 123
4. 广学会举办的有奖征文 / 126

三、广学会在晚清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与作用 / 128

1. 广西国之学，影响变法维新运动 / 128
2. 融合中西文化启示社会士人 / 135

第四章 晚清的西学东译与汉学西译 / 141

一、同文馆的建立与译书 / 141

1. 被迫的开明之举 / 141
2. 总教习丁韪良 / 146
3. 同文馆的学生 / 154
4. 同文馆的译书 / 157

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近代西方科技的引进 / 161

1.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设立 / 161

2. 译书与近代西方科技的引进/ 164
 3.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的影响/ 167
 - 三、严复的翻译活动及贡献/ 171
 1. 精通西方文化的启蒙者/ 171
 2. 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175
 3. 信、达、雅的严译风格/ 181
 4. 严译名著的社会影响/ 188
 - 四、林纾的翻译活动与贡献/ 192
 1. 译林奇才/ 192
 2. 风靡于世的林译名著/ 196
 3. 林译的价值/ 230
 - 五、汉学西传的先驱辜鸿铭/ 235
 1. 文化怪杰/ 235
 2. 汉学西传的先驱/ 241
 3. 与世界友人的文化交往/ 247
-
- ## 第五章 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 252
- 一、香港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特殊位置/ 252
 1. 西人东来的集散地/ 252
 2. 中西文化的交汇地/ 258
 - 二、香港的西式学校/ 260
 1. 西式学校的创建/ 260
 2. 西式学校的历史评价/ 272
 - 三、香港与西方文化的播洒/ 276
 1. 中英文报刊/ 276
 2. 传教士在港出版的中文图书/ 287
 3. 《遐迹贯珍》等出版物对西学的介绍/ 289
 4. 香港西方文化对晚清社会的影响/ 291
 - 四、《资政新篇》与香港/ 297

1. 洪仁玕与香港 / 297
2. 西方文化对《资政新篇》撰述的影响 / 302

第六章 中美文化交流 / 305

一、中美文化的接触 / 305

1. 第一部介绍美国史地的中文著作 / 305
2. 林鍼赴美“测海窥蠹” / 309

二、容闳与西学东渐 / 314

1. 赴美留学 / 314
2. 耶鲁大学的博士 / 317
3. 西学归来的报国之志 / 321
4. 容闳在晚清中美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 / 323

三、留学生与中美文化交流 / 327

1. 幼童留美与“美化” / 327
2. 留美幼童回国后的文化贡献 / 340
3. 赴美留学的热潮 / 344

四、传教士与西学的输入 / 346

1. 传教士带来的西学 / 346
2. 输入西学的林乐知 / 350
3. 李佳白与尚贤堂 / 356
4. 教会学校的兴起和发展 / 360

五、译书和报刊 / 366

1. 《中国丛报》与中国文化的西传 / 366
2. 华花圣经书房与美华书馆 / 370
3.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第一批中文藏书 / 374

第七章 中欧文化交流 / 382

一、中英文化交流 / 382

1. 英国的教会学校 / 382

2. 墨海书馆 / 384
3. 留英学生的派遣 / 388
4. 格致书院 / 390
5. 科普杂志《格致汇编》 / 394
6. 西医在中国的传播 / 398
7. 西学传播大师傅兰雅 / 401

二、中法文化交流 / 405

1. 中法在教育事业上的合作 / 405
2. 王韬的欧洲之行及对法国大革命的介绍 / 408
3. 张德彝的法国《述奇》 / 411
4. 法国文学的汉译 / 414
5. “达盖尔银版摄影法”的传入 / 417

三、中德文化交流 / 420

1. 李希霍芬的中国之行和文化介绍 / 420
2. 旅德的中国留学生 / 425
3. 德国在华世俗教育 / 427
4. 中德文化艺术的相互吸纳 / 432

四、中俄文化交流 / 435

1. 在华的东正教使团 / 435
2. 中俄互赠书籍 / 438
3. 托尔斯泰与中国 / 442
4. 普希金与中国 / 446

第八章 中日文化交流 / 451

一、中日文化交流与学习西方 / 451

1. 《海国图志》对日本的启蒙 / 451
2. 罗森的《日本游记》 / 454
3. 太平天国与明治维新 / 458
4.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 / 461

二、留学日本与清末新学大潮/ 464

1. 留日洪流/ 464
2. 留日学生之前的日书中译/ 468
3. 留日学生的译书活动/ 470
4. 新词汇的植根/ 474
5. 留日学生创办的杂志/ 478
6. 留日学生与中日科技交流/ 482

三、日本近代教育对晚清社会的影响/ 486

1. 教育方式的改变/ 486
2. 教科书新貌/ 488
3. 晚清的日本教习/ 491
4. 东文学社的创建/ 495

四、王韬与中日文化交流/ 499

1. 《普法战记》在日本的反响/ 499
2. 王韬与《扶桑游记》/ 501
3. 王韬与日本学者的情结/ 505

五、李叔同与中日艺术交流/ 508

1. 对引进西洋绘画艺术的贡献/ 508
2. 《音乐小杂志》与西洋音乐的介绍/ 510
3. 创办春柳社和推广现代戏剧/ 512

第九章 中国与亚、非、拉各国的文化交流/ 517

一、中国与朝鲜的文化交流/ 517

1. 共同反抗侵略斗争中的友好文化交流/ 517
2. 中朝两国文人的艺术交流/ 519

二、中国和西亚地区的文化交流/ 519

1. 王浩然伊斯兰各国之行与回教师范学堂的创立/ 520
2. 阿拉伯文献的翻译/ 522

三、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 525

1. 中国与印尼的语言、文学交流/	526
2. 中国文化对泰国文化的影响/	529
3. 华侨与马来西亚文化/	533
四、中非文化交流/	537
1. 近代中非关系的历史背景和特点/	537
2. 晚清中国人对非洲的了解和认识/	539
3. 华工进入非洲及中非文化交流/	540
五、中国与拉美的文化交流/	542
第十章 海外的汉学研究/	546
一、美国的汉学研究/	546
二、英国的汉学研究/	551
三、法国的汉学研究/	554
四、俄国的汉学研究/	556
五、德国的汉学研究/	559
六、日本的汉学研究/	562
附录一：晚清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大事年表/	565
附录二：主要参考文献/	575
后 记/	580
作者简介/	581

第一章 绪论

一、“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文化结构的嬗变

1. 由“西学”到“新学”

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思潮，是在不断吸纳西学的过程中完成由旧趋新的历史性变化的，正如梁启超所言，“大抵一社会之进步，必与他社会相接触，吸收其文明而与之固有文明相调和，于是新文明乃出焉”。因此，从鸦片战争时的“夷学”始，经过洋务运动时的“西学”，再到戊戌以后蜕壳而出的“新学”，这一包含着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认知程度和价值评判的“流行语”的演变，大体反映出晚清时期“西学东渐”的历史，同时也显现出国学界变革的大体进程。

鸦片战争对中外文化交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南京条约》、《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被迫割让香港给英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在这些口岸传教、开办医院和学堂。传教士们也随之将活动基地从南洋移到中国东南沿海，开始了晚清西学传播史上的新阶段。据统计，从1843年至1860年，上述6个城市共出版各种西学书籍434种，几乎与明末之际200年间译著的西书数目相等。其中纯宗教书籍329种，占75.8%，属于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历史、经济等方面的105种，占24.2%。这一时期，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逼迫下，中国知识分

子中出现了主动了解、吸收西学的趋向，林则徐、梁廷枏、魏源、徐继畲、李善兰等堪为代表人物。尽管当时他们所关心的主要还是国际常识、世界史知识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表层——劳动创造物（或物化劳动）的某些部分，但反映出中国人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由冷漠转变为关注；对国外舆地知识和事态变化，由消极被动的接受转变为积极主动的探索，毕竟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新的动向。

第二次鸦片战争对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西学向中国内地的渗透拓宽了道路。这些条约中规定：增开天津、牛庄、登州、台南、淡水、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 11 个通商口岸，外国人可以在这些地区居住、赁房、买屋、租地建造礼拜堂和医院等；传教自由，外国人可以到中国内地各处游历、通商，中国政府应提供方便；开放长江，等等。这样，就使外国人可以在南起广州、厦门，中经上海、烟台，北至天津、营口，东起上海、南京，沿江西上，直到中国内地的广阔领域里自由活动。结果自然是在加强了西方列强对中国政治侵略、经济掠夺的同时，便利了他们对中国的文化渗透。与此同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京师同文馆的创办，以及洋务运动的兴起，都对西学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时期西学传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西书译著大量出版。截至 1899 年，共出各种西书 555 种。其中哲学、历史、法学、文学、教育等哲学社会科学译著 123 种，占 22%；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光学、动植物学等自然科学译著 162 种，占 29%；工艺、矿务、船政等应用科学译著 225 种，占 41%；其他游记、杂著、议论等译著 45 种，占 8%，其总量是此前半个世纪所出科学书籍的 5 倍多。而《化学鉴原》、《化学分原》、《地学浅释》、《万国公法》、《佐治台言》、《泰西新

史摘要》、《民约通义》等，都是影响广泛、轰动一时的译作。^①与此相伴随的，是清政府开始创办译书机构，主要有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应该说，这是清政府在严峻形势下做出的顺乎时代潮流的反映，也是开始主动吸纳西学的标志。

西学传播机构多元化发展。有遍布各地、程度不同的新式学校，包括教会学校和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学校；有形形色色的报纸和杂志；有传播西医知识的教会医院；还有教会、清政府、民间创办的各种西书翻译和出版机构，其中最重要的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广学会。19世纪后期的几十年中，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所译的西书数量，已在各种译书机构中名列榜首。上海更是逐渐成为西学在中国传播的中心。

西学在社会基层的影响逐渐扩大。通过遍布各地的新式学校、种类繁多的西书和报纸杂志、传教士的西学讲解和演示，西学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的影响已经随处可见。例如：光绪皇帝研读西书；曾国藩不但自己倡导西学，儿子也成为能读外文、能讲外语的外交官；上海富庶人家竞相送子弟到中西书院等教会学校读书，竟至有开后门进新式学校的事例，等等。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以及战后出现的空前的严重危机，使更多的中国人将学习的视线转向西方。他们坚信“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梁启超在回顾他们用以变法维新的学理时即说，光绪年间，欲求知识于域外，则以此为枕中鸿秘。盖“学问饥饿”至是而极矣。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即生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苦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学派，而为时代所不容。“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觫，汲而易

^①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①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各种提倡“新学”的新式学会纷纷成立，“新学”也开始取代“西学”的概念，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词语而流行于世。

从晚清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近代新文化的形成确实得力于西方文化的推动。晚清社会文化，有分为“旧学”与“新学”；也有分为“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但是，“人们每每有一种误解，似乎新学与旧学之间有一个断层，二者相对立，‘传统的’即是封建的，‘近代文化’是从外国输入的，从外国移植的。导致这一认识的重要原因，是由于近代‘新学’在本世纪初产生，是与当时一般来势迅猛的学习西方、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潮相联系的”。^②大量地，甚至是无选择地译介传播西学，是那时进步人士改造中国文化的一种手段。应该说，近代“新学”既是在大批量的西学输入过程中不断统摄“新思想”而形成，同时又是在对旧学的猛烈批判中突出了自身的价值。然而，仓促出生的“新学”与“旧学”之间的联系和过渡却不甚明显，难怪有的人误认为“近代文化”是从外国移植的。但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在理论上也无法解释近代文化从西方输入的新观念为何能在我们民族中生根。

由“西学”到“新学”的发展，并非只是概念游戏，而是内涵的深刻变化。最主要的就是后者开始从深层次上对比中西两种异质文化的差异和对立，并在文化选择的总体设想下，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模式，代之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模式，这是近代中国文化选择上的一次飞跃。尤其是进化论世界观以及西方的民主思想、平等的伦理观念逐渐被人们所接受。正是在中西文化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三十四，第71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② 陈其泰：《晚清公羊学的发展轨迹》，《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

冲突与融合的基础上，开始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大历史变迁，并由此推进了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

2. 文化内在结构的变化

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一变化首先表现在文化的内在结构方面。据龚书铎的研究，文化结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文化构成的变化。鸦片战争前，中国文化是单一的封建文化。鸦片战争后，除去封建文化外，还有帝国主义文化，有新文化。中国的新文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文化，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是无产阶级文化。而封建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①

其次是文化内在结构的变化。文化的内在结构的变化体现着近代即晚清社会文化变革的时代特征。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学的伦理纲常为核心的文化体系，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变化，也只是纲常伦理的体系化和严密化。“纲常伦理作为这个文化体系的核心，支配或影响着传统文化的各个部门”。“传统的哲学、法学、政治理论、教育、史学、文艺、科学等具体文化部门，都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儒学的从属科目。纲常伦理贯穿在文化的各个领域，成为它们的指导思想”。^②

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因素的结合，近代中国社会已经开始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文化。近代新文化乃成为进步知识分子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其基本内核就是与传统文化内核“纲常伦理”针锋相对的“科学”与“民主”。因而，晚清以来发生的文化之争，无论是中西之争还是新旧之争，其实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概论》，第33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

质必然要表现为近代的“科学”、“民主”与封建“纲常伦理”之争。纵观晚清社会文化的发展历史，“以资产阶级的民主、平等观来反对封建的纲常伦理，正是当时新旧文化斗争的焦点。这种斗争一直延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晚清时期“民主”、“平等”思想的出现，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纲常伦理的文化统治权威，削弱了它支配意识形态一切领域的地位，使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核心发生了变化。“中国文化内在结构的这一变化，是近代文化不同于古代文化的一个根本点”。^①

以上是从阶级属性方面对于文化结构的总体把握。那么，从文化结构模式方面来看，晚清时期的文化与传统文化在结构上的区别也是十分明显的。这主要表现为不同时代文化“体用”结构的不同。

“在传统儒学思想，在朱熹哲学那里，体用是不可分的，不论是在实体与功能意义上还是本质与现象的意义上，皆具有体用同源、体用不二的特点”。^②将哲学意义上的“体用”论用于学术文化的指导原则与实行的方法、基本原理与其原理的应用方面的分辨，以“体用”来概括学术文化结构模式的特征，也是清代文化的一个传统。学问俱有体用，是清初“实学”思想家们主张学术经世的基本出发点。王国维总括说“清初之学大”的三个代表人物，为学均有“体用”，顾炎武是“以经世为体，以经史为用”；乾嘉的戴震和钱大昕是“以经史为体，而其所得，往往裨于经世”。尽管具体的“体用”内容不同，但学术本身由“体用”构成的基本模式却是相同的。在论及清代三百年间文化演变过程及其特点时，王国维说：“顺康之世，天造草昧，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后，志在经世，故多为致用之学，求之经史，得其本原，一扫明代苟且破碎之习，而实学以兴。雍乾以后，纪纲既

① 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概论》，第33页。

② 曹跃明：《梁漱溟思想研究》，第8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张，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复视为经世之具，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道咸以降，涂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①

文化既要“明体”，也要“致用”，是清初文化发展中具有方向性的起点。“有清一代学术，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次期为汉宋之争，末期为新旧之争”，^②所争的问题都离不开“体”与“用”。理学与实学，汉学与宋学，今文学与古文学，旧学与新学之间学术文化的兴衰涨落的指针，几乎总是摆动于“体”与“用”之间，不同的“体用”主张，也就体现了学术流派的不同。因而，从“体用”人手去对待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并以此建构近代文化的模式，就不仅是基于兼取中学与西学的现实需求，而且也是晚清文化传统发展的必然归宿。在“体”与“用”这个最基本的学理框架之外，似乎还没有其他范畴能够取而代之。本末、主辅的概念只能在中学与西学的相互关系上即主与次的地位上来表达意义，而无法从本体与功用、原则与方法、原理与应用意义上来引申意义。这大概也是甲午战争以后，在更高层次上力图整合中西而创造“新学”的过程中，“中体西用”之所以取代“中本西末”而成为“举国以为至言”的原因之一。

体用结构模式是相同的，但体用内容却因时势的变化和学术文化的演变而有所不同。在近代西学引入并与中学融会之前，文化上体用模式是“体用同源”和“体用不二”，即“中体中用”。无论是顾炎武的“经世为体，经史为用”，还是戴、钱等人的“经史为体”，“经世为用”，都体现了“本体存在与功用能力正是不可分的东西”的“体用不二”的本义。从文化结构和文化模式意义上看，这是中学自身的属性，即中体中用。

^① 《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王国维遗书》第4册，《观堂集林》卷203。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25—26页。

社会文化的属性不同，其体用模式及其内在要素的结构就不相同。中学有中学之体用，曾国藩说：“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① 在中学的四个主要门类中，曾国藩以义理为体，以词章、经济、考据为用的意思是明确的。

中法战争之前，张之洞也是一个典型的“中体中用”的旧学家，他于1874年完成的《輶轩语》和《书目答问》，主要内容是要求士子敦品励行，读经明理。在“语学篇”中，张之洞反复说明为学的次序和条理，阐明了中学的“体用”关系。他主张：治经贵通大义，读史须读正史、通考与表志，读诸子须知体要。张之洞深忌学术上的门户之争，主张汉宋调和，说：“圣人之道读书治心，宜无偏废、理取相资……要之，学以躬行实践为主，汉宋两门皆期于有品有用。”^② 由此体现了其以“通经为体”，以“史、子、汉、宋为用”的思想。

张之洞属于贯通汉学与宋学的经世学派，学术眼界比较宽阔，坚持通经致用的为学准则。对于中学而言，他主张“通经为体”，而通经的目的却在于“致用”，而“中学为用”的标准有三：“一可用以考古，二可用以经世，三可用以治身心。”“中学”自有体用，具体而言就是要以经学为根底（为体——笔者注），以小学为门径，次及史学、理学、天算、舆地、经济、词章及诸子者为用。^③

“体用”论的传统思维方式，构成了中国知识界认识西学的基本方式。他们认为，与中学的“中体中用”一样，西学也有着

① 《曾文正公全集·求阙斋日记》卷上，《问学》。

② 《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輶轩语》一，第609页。

③ 同②，第606—609页。

属于自己的体用结构模式。郑观应在《西学》中说：“以西学言之如格致制造等学，其本也，各国最重格致之学……，语言文字，其末也。”这与郭嵩焘的“西洋立国，俱有本末”的说法一样，认为作为另一种学术文化类型的西学本身既有本末，也应该自成体用。后来，郑观应在《南游日记》中更明确地指出了西学的“体用”内容：“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效其用，所以事扞格，难臻富强。”这与张树声“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所表达的意思相同，即西学自有其体用。

总之，从文化的体用结构上看，传统文化、近代文化、西方文化均各有自己的体用模式，因此它们属于虽互有关联，却完全不同的三种文化结构模式。

首先，传统中国文化的体用结构模式以“义理之学”为体，以“经世之学”、“掌故之学”、“考据之学”和“词章之学”为用；西方文化的体用结构模式以学堂、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为体，以算学、格致、工程、社会政治学为用。

其次，晚清时期的中国文化是在融会西方文化和传统中国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新文化，它的体用结构模式则是“中体西用”。因此，可以说在西学引入以前或者说在中学与西学发生实质性关系之前，中学与西学各有自己独立的体用结构，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模式。但是，随着中学与西学的交汇和融合，中、西原本不同源的两种文化在“中体西用”的形式上结合为一体，共同构成了既不同于旧的中学，也不同于西学的新的文化结构模式。

从体用结构发展的过程看，它的历史程序是：以“中体中用”（旧学）为基础，通过洋务运动的桥梁作用引入并接纳“西体西用”（西学），最终形成了兼具中西的“中体西用”（新学）模式。

当然，在具体的体用内容上，人们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张

之洞的“体用”与康、梁的“体用”内容完全不同，曾国藩的“体用”与冯桂芬的“体用”也有差别。但是，对于“中体”和“西用”内容认识的不同，并不影响近代文化“中体西用”的基本结构模式。

文化模式是文化诸要素稳定的结构方式，也就是一种特定的文化结构。结构就其一般的定义说，是事物系统的诸要素所固有的相对稳定的组织方式或联结方式。两个以上的要素按一定的方式结合组织起来，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其中诸要素之间确定的构成关系，就是结构。结构体现为要素的组合、总和、集合，诸多要素借助于结构形成系统。结构具有稳定性、有序性和形式特征。近代文化以其独特的体用结构，形成了一种既有别于传统中国文化，也有别于西方文化的新的文化模式。

3. 文化部门分类的变化

晚清时代的社会文化变迁，还体现为文化的部门分类的变化。这一变化趋向是由传统的旧学结构体系向近代学科体系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是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文化思想在这个基础上产生而又与之适应，文化部门分类较粗而简。旧文化，尤其是学术层面的文化通常称之为“旧学”，它的分类是相当粗疏的。

在清代，“旧学”当然也是一个与时俱变的相对概念。对于清代乾嘉汉学而言，理学则被视为旧学，梁启超谈到清代学术思潮变化时，就认为相对于勃盛一时的乾嘉汉学，理学即为“旧学”，他说：“……其犹为旧学（理学）坚守残垒，效死勿去者，则有孙奇逢、李中孚、陆世仪等，而其学风由明而渐返于宋。”作为宋明理学之反动的乾嘉考据学，“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佚等等；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故亦有‘汉学’之目”。因为

“当斯时也，学风殆统于一”，^① 汉学成为显学，着眼于学术流派演变的历史，相对而言，理学当然成为了不入时的旧学。其后，随着汉学发展日趋琐碎，重倡宋学的呼声又趋上升，由此构成清代学术文化史上的汉宋之争的学派兴落现象。但是，鸦片战争引发的社会生活的剧变和西学的输入，揭开了一个新时代的帷幕，传统意义上的汉学宋学均无法面对现实的社会实际问题，一同成为落伍于时代的旧学。

汉学和宋学是清代学术发展中的两个主要流派，也是清学学风演变演进的主要内容，但却不能代表清代旧学的全部。相对于近代“新学”而言，旧学是特指一切不能适应现实社会生活需求和发展趋向的学术文化。梁启超将旧学归纳为整个清代的“学问”，它的范围不仅包括清代的经学、小学、音韵学、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史学、方志学、地理学、谱牒学，还包括了清代的自然科学成就，如历算学及其他科学和乐曲学等。梁启超这一从学术史出发的看法，与社会上一般人对于旧学的认识有所不同。清代居于正统地位和影响士风的学术文化通常被划分为四个部分，当然，对于清学四部分的分类，人们的认识是各不相同的，如刘禹生在《世载堂杂忆》中所说：“按有清一代，经史、词章、训诂、考订各种有用之学，名家蔚起，冠绝前朝，皆从事学问，而不事举业。凡得科名者，未必有学问，而有学问者亦可得科名，或学优而仕，或仕优而学，学问不为举业所限制……”^② 这与曾国藩曾说的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类学问也不完全一致。有人将张之洞《劝学篇》所述中学也概括为四部分，即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认为“以上四端，中学粗具”。^③ 大体上由四个部分构成的清代文化，并非都属于“不适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4—5页。

② 《清代之教学》，《世载堂杂忆》，第13页。

③ 张鹤龄：《变法经纬例论》卷上，第64页。

时势”的旧学，其经世之学（或具体为经史、经济和掌故学）、义理之学，都在顺应时代的变化过程中，在吸纳西学的基础上通过学术文化整合，演变为近代文化的内容和结构部分，这在康、梁和张之洞的学术文化体系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作为旧学亦即旧文化的四个部分，虽然不能代表传统文化部门结构的全部内容，却也是其主要的內容。旧文化及其部门结构体系，是适应传统社会生活需求的产物。但在变动了的晚清社会，它却越来越不能适应近代社会生活的需求。“今日之世界，竞争剧烈之世界也，善争者存，不善争者亡，善争者生，不善争者死。争之道有之：兵战也、商战也、学战也。而兵战、商战，而事可本于学战。”^①与西学相比，旧学不能适应时代需求的原因有二：一是所学与所用不相符。“中国所学不与行事相符，而野蛮不通之教法，又不论学者性质之所近而强人以就己；惟教者为理学则强人理学，为考据词章则强人考据词章”，“西人有普通学，凡人之所日用者也；有专门学，就人性之所近以成其所长者也”。^②二是旧学“其知识皆从文字得来”，而“今之教育，专尚实验，其知识即从实验得来”。“古之学者事事索诸虚，今之学者事事征诸实，虚实之分，即学问优劣之所由判也”。所以，在晚清进步的新学家眼里，旧学非但没有西学中适应社会分工的专业技术知识内容，而且也完全失落了中学中传统的精神主旨，“不宁惟是，中国孔子之教，历数千载，……今试问缀学之子，能诵其文，言其义者，几何人也。何也？科举所不用也。然则堂堂大教，乃反藉此疲敝之科第以图存”。^③从学制层面上对比，张之洞将新学与旧学之优劣概括为：“科举文字每多剽窃，学堂功课

^① 《游学译编》第七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第389页。

^② 同^①。

^③ 梁启超：《学校总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484页。

务在实修；科举只凭一日之短长，学堂务必尽累年之研究；科举但取词章，其品谊无从考见，学堂兼重行检，其心术尤可灼知。”^①所以，清代旧学已经沦入“凡所谓儒者，皆奴隶之学也。……是则世俗之所谓中学者，固不可以谓之学，而特为倒孔孟之招牌者也”^②的地步。

随着西学的传播及其学科体系对晚清文化界的广泛影响，以新的学科分类为特征的近代文化开始形成。从而，文化的部门分类也出现了新变化，集中表现为原有学科内容、体系的变革；新领域、新学科的兴起和发展。分而言之，则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 哲学。从严译《天演论》系统介绍进化论开始，西方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引入，冲破了传统儒学的体系与方法，近代意义上的哲学由此形成。在吸纳西方哲学理论的基础上，由侯生编撰的《哲学概论》问世。书中的阐述在今天看来，难免会感到浮浅以至谬误，但在清末出现诸如认识论等概念以及探讨一些重要哲学原理还是很有意义的。

(2) 新的社会政治学科门类。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已经不能适应近代社会的需要，新式知识分子开始试图以西方文化体系为模式，重构中国近代文化。诸如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等新的学科门类开始出现，并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

(3) 自然科学学科门类。应用技术方面，中国古代虽然有过可以称道的历史辉煌，却并没有系统的自然科学知识体系，近代意义的科学技术，是鸦片战争后从西方输入并日渐传播的。声、光、电、化、医、算等科学技术的各个门类，几乎都有所介绍和研究。李善兰、徐寿、华衡芳、詹天佑等，是近代中国一批有成

① 《张文襄公全集》第2册，奏议61，第28页。

② 《游学译编》第6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第389页。

就的科学家。在科学技术的流传和发展过程中，分类也趋向专门化。

(4) 旧的学科内容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史学、语言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要部门，但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也发生了显著变化。除了对域外历史研究的重视外（如《海国图志》、《瀛环志略》），在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和体系上，也打破了传统旧学模式，试图建立符合时代需求的“新史学”。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是近代“史学革命”的开端。夏曾佑于1904年出版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为《中国古代史》）也是“新史学”的产物。语言学方面的发展，一方面是在“西语”启示下开始了语法学的建立，由马建忠编写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汉语语法的专著；另一方面是在19世纪末出现了切音、简字、注音、字母、白话文运动，形成了对传统语言学的改革高潮。

(5) 近代新式传播媒介和文化设施的设立。在近代社会结构变动需求的刺激下，在西方文化影响下，新式传播媒介如报纸、出版、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设施也相继建立，构成晚清社会新的文化部门。

在中西文化的交融过程中，晚清文化的部门结构的变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个旧文化时代的终结和新文化时代的开始。

二、晚清文化交流的基本特点

1. “化西为中”

近代西方文化之于晚清时期的中国封建文化，无疑处于“强势”状态，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主要表现为逆向性，因而，学习西方成为晚清进步思潮的基本态势。

大规模地引进西方文化并使之与中国社会生活相结合的实践活动，始于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将“采西学”付诸于“求强求富”的“自强”实践，使西学本身与中国新的生产方式、生产组织融为一体，从而改变了由传教士进行的那种与中国社会生活相脱节的单纯的输入西学的格局；同时，洋务运动又将“采西学”与中学的“经世”传统相结合，使“士大夫知格致为入圣门径，即报国之经纶”，^①从而也为西学的引入寻求到合理的文化依据。洋务运动一方面将自己的支点建立在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学的“致用”基础上，一方面将另一个支点搭架在西学强烈的“实用”价值上，从而发挥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作用。

1862年（同治元年），清政府设立京师同文馆，既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开始，也揭开了主动引入西学的序幕。从此，西学的引入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据统计，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从1872年开始正式出书，历年出版的西书种数情况：

年份	1872年	1873年	1874年	1875年	1876年	1877年	1879年
种数	11种	9种	12种	6种	9种	12种	14种

到1880年共出98种235册，其中译出未刊之书45种，124册。按《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②分类统计为160种，如下表：

类别	种类	卷	类别	种类	卷
史志	6	45	政治	10	73
交涉	7		兵制	12	73

① 郭嵩焘：《拟陈洋务疏》，葛士澐：《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01，洋务1。

② 《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宣统元年石印本。

类别	种类	卷	类别	种类	卷
兵学	21	109	船政	6	11
学务	2	2	工程	4	38
农学	9	45	矿学	10	72
工艺	18	106	商学	3	6
格致	3	9	算学	7	89
电学	4	17	化学	8	62
声学	1	8	光学	1	2
天学	2	22	地学	3	51
医学	11	74	图学	7	55
补遗	2	15	附刻	10	91
			总计		160

据统计,从1868年至1907年40年间,翻译馆译印西书达159种,1075卷。其中除历史、政治、兵制等30余种属于文科书籍外,其他均为适用知识和工程技术类,而法政等社会科学类译书则“译者寥寥”。傅兰雅1878年的《译书事略》所录书目最多的就是兵法工艺、造船、天文行船、汽机船、汽机等,占已刊成书的40%以上,占未刊成书的80%。

京师同文馆虽然也有译书机构,但它的译书主要用于教学需要,因而从译书的规模和数量上远不及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到1896年,同文馆共编译书籍29部。^①但同文馆的师生均受到系统的外语训练,能够直接翻译西学,取代了西人口译、华士笔述的落后译书形式,所译西书的质量较好,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从特点上看,上海广方言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书是从科技开始的,而同文馆则是从关于外国交涉条例、公法开其端,后渐及于科技类西书。奕忻奏称:“窃查中国语言文字,外国人无不留心学习,其中之尤为狡黠者,更于中国书籍,潜心探索,往往辩

^① 见李长莉:《先觉者的悲剧》,第183页,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

论事件，援据中国典制律例相难。臣等每欲借彼国事例以破其说，无如外国条例俱系洋字，苦不能识，而同文馆学生通晓尚须时日。”^①此外，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金陵机器局、开平矿务局等处，也都根据自己的需要翻译过西学书籍。由洋务机构和洋务知识分子个人所翻译、编著介绍西方科技文化的书籍达数百种，在同一时期社会上译著的西学书籍总数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据梁启超辑录的《西学书目表》统计，在非宗教西学书籍的432种中，由洋务机构和洋务知识分子个人翻译的西书就达206种，约占总数的一半（其中漏遗者不少，如京师同文馆已译29部，梁氏只辑录了20部，个人译书漏辑者则更多）。仅此也可概见洋务运动对于西学引进的推动作用。

从洋务运动开始，西学输人不仅如潮随风成为最具有时代特征的事业，而且西学输人的内容也逐步扩展和深化。在1878年傅兰雅的《译书事略》统计中，分为16类的书目主要体现为技术工程类，而在1896年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中，学科分类已增至28类，更多体现为自然科学科目的增设，如“格致”（自然科学总类）、重学、电学、声学、光学、全体学等。其次，社会科学方面增加了官制、学制、商政、议论等。如表：

分类	部数	分类	部数
兵政	53	游学	8
医政	39	动植物	7
工政	38	学制	7
史志	25	农政	7

^① 参见李喜所：《洋务运动时期的翻译》，《史学月刊》1987年第3期。

分类	部数	分类	部数
算学	22	天学	6
法律	13	图学	6
化学	11	报章	6
格致	11	光学	5
全体学	11	商政	4
西人议论	11	声学	3
地学	9	汽学	3
船学	9	电学	3
矿学	9	官学	1
重学	8	其他	18

到1899年的《东西学书录》的31种分类书目中，自然科学各门之书增至228部，占总数的40%，而以前占多数的“工艺”和“兵制”两类明显减少，只占总数的19.3%。

法政等社会科学类图书也有所增加，但增幅不大。值得注意的是，分类中首次出现了哲学分类——“理学”。这一时期的西学引入，已由前期的以技艺工程为主转向了以自然科学为主。到1904年，社会科学类西书明显增加，据《译书经眼录》统计，各类西书所占比例为：兵法工艺类，占6.2%；自然科学类，占23%；社会科学类，占61.5%。对此杨家禾曾评论说：“格致之道中国素所不讲，自洋务兴而西学尚矣。同文方言馆、船政制造之局以及武备水师学堂次第创设。……举凡天、算、医、化、矿、重、光、热、声、电诸学，悉延西人以为教习。入其中者，或肄西国之典籍，或效西人之技艺，人才济济，造就者多，故于

制造船只、造器械、设电报、开铁路诸务，先后兴办。”^①而且晚清西学大规模的引入，遵循着一条实用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逻辑顺序，并由此逐步扩展、深化，形成比较完整的西学知识结构体系。

洋务运动不仅把西学引入到社会生活中，而且还把西学引入到培育人才的洋务学堂之中，使同文馆、“求是学堂”、上海广方言馆和后来张之洞开办的新式学堂的课程体系，成为完全不同于传统旧学的另一类型。

冯桂芬提出的“采西学”措施，是洋务运动沟通中西学的第一步，而且“采西学”本身不是目的，只是改造“中学”虚而无用的手段，一个“采”字形象地揭示了引入西学的工具性意义。沟通中西的目的，是借西学改造中学，容闳对此充满了希望，力主“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文明之文化，必将使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之新中国”。郑观应将西学与中学的特征作了一番对比，认为西学是“崇新而强”，中学是“泥古而弱”，“中国之病，其根在学非所用”。所以中学走向强盛的出路就在于吸纳西学，然后在此基础上融会中西之学，贯通中西之理，生成新的学术文化类型。郑氏虽然给西学以极高评价，但他仍然冷静而睿智地认识到，单纯的输入并推崇西学和一味的固守中学一样，都是无补于中国“自强”之业的。

“化西为中”既是一个时代性的艰巨课题，同时也是一个民族性极强的课题。这个必然的历史进程，却由于洋务运动沟通中西学的桥梁作用，而开其端了。随着西学大规模的引入和适度的接纳，传统中学的知识结构体系和发展趋向就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

首先，西学知识广为传播，已经成为传统士人文化的构成部分。据傅兰雅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一书中的统计，

^① 杨家禾：《西学储材说》，《皇朝经世文新增时务洋务续编》卷25。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开办的11年中，已销售书籍31111部，共计83454本，另售出地图4774张。“夷书”、“夷学”一向被蔑视的风气，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逐步变成了读西书、求西学的新风气，《西学书目表序例》记述了当时风尚的转移：“……海禁既开，外侮日亟，曾文正开府江南，创制造局首以翻译西书为第一义，数年之间成者百种，而同时同文馆及西士设教会于中国者，相继译录，至今二十余年，可读之书略三百种。……故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①

在上海“格致书院”的课士命题中，西学和时务是主要的考试内容，显与传统的书院和八股课士内容大为异趣。“自丙戌之春，请于当轴命题，或询西学或问时务，一时肄业士子潜心致力，颇多斩获，不少特见”，^②“于是四方风动，群彦云起”。自1886年至1893年间，格致书院刻印的《格致书院课艺》，收录每次考课名列前茅者6人，优秀试卷296篇。这些试卷中共征引西学书籍约200种，大多数为新译西学著作，其中江南制造局译刻者就有70多种。在己丑春季超等第一名孙维新的试卷里，我们可了解到他所引录的西学书籍情况：算学13种，重学3种，天学4种，地学2种，地理8种，矿学4种，化学11种，总类5种。所引录的西学书籍科目十分齐全，几乎涉及到当时所输入西学的各个方面。在各次考题中，有些题目是直接就西学发问的，如关于西学源流问题，中西格致之学异同问题，光电测定问题。课卷说明，学子们对于西学知识体系已相当熟悉。

其次，西学的传播导致了传统中学“经世之学”结构模式的变化。“经世之学”是道咸年间中学学术文化的主潮，但自贺长龄、魏源创立以学术、政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

^① 《皇朝经世文统编》卷1，文教部，学术。

^② 《己丑格致书院课艺序》，《格致书院课艺》己丑上。

工政组成的结构体系后，继起者如《皇朝经世文编续编》、《皇朝经世文编三编》基本恪守贺编模式。由于西学和洋务新政的兴起，社会生活和学术文化的发展，均已经超出了中学传统“经世文编”模式，呼唤着中学知识结构体系的变革。随着西学知识的扩展和逐步“化西学为中学”的涵化过程，西学就渗入中学之内，并成为新的中学的一部分，从而引发了传统“经世之学”结构模式的变动。1898年以后的“经世文编”类的知识结构体系已是一种全新的模式。其总目分为：通论、君德、官制、法律、学校、国用、农政、矿政、工艺、商政、币制、税则、邮运、兵政、交涉、外史、会党、民政、教宗、学术、杂纂21类。“文编”的分类虽然未必全面和准确，但它却已经超越了旧学范畴，走入了近代“新学”的领域。

洋务运动以挽接中学与西学为起始，在“自强”的口号下通过“采西学”到“化西学”，使中国传统文化在接纳西学的条件下，走上一条新的不归路。

2. 融通与整合

在晚清中西文化的对比中，中西之间的强弱之势十分鲜明。即使如此，晚清社会文化发展的走向却也不能完全排斥传统文化在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化西为中”的文化发展道路，以及“中西”“体用”文化命题的反复提出并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提示人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晚清中西文化之间的融通与整合的历史特征。

在近代，中国传统文化尽管遭到西方文化的强劲冲击，但其顽强的生命力仍然在文化革新的历史过程中展示着。对此，梁启超做过一个鸟瞰性的评说。他指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知识界先后形成了三种趋势：一是在乾嘉朴学发展中孕生出来的今文经学在与古文经学经过“交绥”后，渐成气象，“是为第一种趋势”。二是经世致用之学经龚、魏之推动和曾、左之提挈诱掖，

“讲求实用，是为第二种趋势”。三是“坚信泰西之优胜，而有模仿之必要”，以薛福成及郭嵩焘为“此种运动之代表人物”，“效法泰西，是为第三种趋势”。以中学的今文经学、经世之学和泰西之学构成的三种学术文化发展趋向的潮流，到甲午之后被康有为汇为一体，别有创获地建构成新学体系。其结果当然是“在政治则促起‘维新’之自觉，在青年思想上，则促起‘新学’之自觉”。那么，将梁启超概括的新学形成的轨迹，即在晚清中学之今文经学、经世之学与西学三种发展趋向合流基础上的整合，与上述新学“体用”结构模式发展过程相印证，足以表明，近代新学的基本模式就是“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结构，突破了传统的文化观体用同源或体用不二结构模式，在兼取中西的双向选择中形成了体用二元模式。这种内在结构上的矛盾，体现着中国人既要面对攻势强劲的西学优势又要坚守中学民族本位的双重思虑。严复于1911年对此做过尖锐的批评，讥讽为“牛体马用”。但言辞的尖刻并不等于思想的深刻，他对中体西用的批评仍然没能跳出传统的“体用同源”论。因此，论辩过后是思想文化界的相对沉寂，中体西用或许已不再具有“举国以为至言”的地位，但能有建树的取而代之的文化模式仍了无讯息。

其实，早在中体西用形成过程中，一些更为激进的思想家就试图对这一文化模式有所突破。1895年，被誉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的严复，提出过一个全新的文化思路，即“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体用观念。严复认为，西洋之强在于“无法与法并用”。君不尊，民不贱，联若一体，自由平等，是无法之胜。法制之明，人守其职，是有法之胜。无法与法的实行，“皆本诸学术”。他的真正立意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提出体用观念，以补偏救弊，除旧布新，并非要全盘否定4000年积淀而成的文化传统。这与他一贯持有的基本立场没有冲突：即汲取西学，求中国所本无，而“中国所本无者，西学也，则西学为当务之急明矣”，但

“吾旧有之经籍典章未尝废也”。因此，“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表面之异，并没有形成对中体西用模式的本质否定。所以，将严复早期以宣传西学为主的思想活动与后期对西方科学精神和物质文明的批判联系起来看，可以发现，中体西用仍然构成了他文化观的主线。有人评论说：严复思想的前后变化，虽然是“原来以‘求中国所本无’的西学为急务的双向选择，转而确定为以孔孟为根本，并藉西学予以改造的‘中体西用’观，口号虽异，内容实同。……在严复思想中，中学西学虽然在不同时期有急缓侧重不同，但‘中体西用’的内涵，实在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路径”。^①

梁启超在 1897 年也提出一个“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的体用模式。这一模式源于康有为。梁启超曾说：“启超问治天下之道于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意立，虽治千万年天下可已。”“群体变用”是以社会进化论的历史观为依据，基于“变”的思想而提出的治国方略，而不是基于文化整合的文化观。而且关于“群”的概念，梁启超明确指出是“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或“民族意力者”。他们所强调的是绵延不尽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显然就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基于社会性而创造出来的观念态文化，也就是民族的传统。维新派“以群为体”，无疑也是以中国的传统为体，即“中学为体”，只不过他们更加注意代表群体意识的整个观念态文化罢了。再则梁启超也没有把这一思想引向深入，“他打算写一本大书来阐发他对‘群’问题的思想，同时也吸收谭嗣同和严复的思想”的“宏大计划从未见诸文字”。而且“梁对‘群’的语言表述通常是模糊和混乱

^① 天祥：《“中体西用”与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化》，《天津社会科学》1993 年第 3 期。

的”。^①事实上，“群体变用”论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关注，也没能突破“中体西用”的框架。

此后，人们相继提出过各种文化模式，如孔教会的“讲习学问为体，救济社会为用”，贺麟的“精神理性为体，古今中外文化为用”，以及熊十力的即心即体的本心本体的体用等。但各式花样的体用说，既不能与中体西用的实际作用相颉颃，也没有赢得社会的认同，从而流于形式。况且“体用”的模式依然存在，人们尽可以在具体的体用内容上别出心裁，但在文化更新发展的大趋势上还是归结为中西互补、兼取中西的历史方向。

3. 舍本逐末

近代西学的传播是伴随着军舰和大炮而来的。因此，先进与落后之间裹挟着民族侵略与民族生存的尖锐矛盾与冲突。在这种背景下“援西人中”，接受西学，无异是一个充满痛苦的历程。

面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中国社会做出的反应可谓相当机敏迅速。林则徐、魏源不只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且十分开明地力求从整体上全面认识西方资本主义这一“怪物”，于是乎有《四洲志》、《海国图志》的编纂。然而，在中西异质文化交流中，社会如何有选择地迈出走向近代的关键一步，确是决定一个民族和国家命运的重大举措。近代日本的历程是中国的镜子，借此，我们可以在对比中充分认识近代中国的发展道路。

同西方文化接触之始，中日大抵相同，最早来华的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也曾先到达日本（1518年）。在近代以前，中国对西方文化的输入运动所取得的成绩远大于日本，日本在相当程度

^①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第68—6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上是通过中国学习西方的。但在近代，中日同样面临异质文化的撞击，却形成了不同的前程命运。历史向力求主宰世界的人们昭示：谁真正把握了两种文化交接的真谛，谁就可以在复杂的历史抉择中应付裕如，走向成功的彼岸。由传统走向近代，中日路途不同，实是相映成趣的两个事例。维新人士徐勤颇有见识于此：“学术不改，学校不兴，科举不变，徒袭外国军兵枪械之末，语言文字之琐，岂云得西学之原本，振千年之积弱乎？日本之变法也，则异此。”^①

梁启超曾作《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以为洋务运动的总结，其中引述了德国宰相俾斯麦纵论中日学习西方文化的不同道路：“同治初年德相俾士麻克（俾斯麦）语人曰：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原，其在此乎？”^②

事实也确乎如此，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中国和日本曾经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在创立输入西学的设施上，日本建立的明伦馆、壮犹馆、洋学所并不比中国的同文馆早多少；日本的明治维新也不比中国的洋务运动晚多少，然而中日相较却途殊归异。中国的同文馆、广方言馆限于官办，日本则官民并举；中国的洋务运动既限于“以制器为先”，又局囿于“中体西用”；而日本维新则“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础”。“振基础”表明日本把学习西方作为了基本国策，“求知识”则体现了日本对西方文化的全面理解。

文化，在其本质上是一个整体。两种异质文化大规模冲突交锋时，并不纯然表现为某一文化层次的作用，而只能表现为整体文化的作用。洞开中国门户的“坚船利炮”固然有其明显的优

^① 《论日本自强之故》，《皇朝经世文新编》卷2。

^② 《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第8页。

势，但它的真正威力却蕴藏在西方整体文化之中，没有整体文化的深厚内力，“坚船利炮”本身并不十分可怕。对此，严复有过一番评论。他认为体用不可分割，一个国家的政教学术各个部分是完整的统一物，正如“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① 洋务所造的船不是不坚，炮也不是不利，但既不能阻止欧美汹涌东来之势，也不能稍挫日本进逼的锋芒，关键在于“以制器为先”的洋务道路的思想既割裂了文化的整体性，使“体用分开，科技与政教分开，科学与民主分开”，“不揣其本，而欲支节为之”，^② 又焉何不败？而日本“异此”，“求知识于世界”，开创了从技艺、政教、体用整体上学习西方文化的局面，从而走向了近代世界。

中西文化的冲突一开始就显示了文化的整体性质。随着西方商品、船炮俱来的还有宗教文化。据统计，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恰是洋务时期），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先后创办了近170种报刊，约占同期中国报刊的95%。^③ 这些报刊以文字布道的方式弘扬上帝福音，但又相当广泛地传播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

正是西方文化整体力量冲击的作用，使中国社会表现为多向性反应，不过这种反应因其阶级利益、社会地位不同而有所差别。林则徐首感西方“船坚炮利”，却力求全而了解西方；魏源提出“师夷长技”，却也赞许西方民主政治；曾国藩、李鸿章加倍感受到洋枪洋炮的作用，提出要“制器为先”；洪秀全则巧妙地汲取了《劝世良言》中西方教义的精神力量，锻造了“太平天国”的思想武器；中下层知识分子则集中赞美西方政治制度的美妙，认为西方总统“既不能据而不退，又不能举以自代，其举其

① 《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王株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558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② 同①，第560页。

③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第1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退，一公之民”，“是以创一开辟未有之局，而俨然无恙以迄于今也”。^①不同阶级和阶层对西方文化不同层面的反应（有物的层面，有心物结合层面，也有心的层面），恰是文化整体作用的顽强表现，某些人偏执于一方的认识，并不影响文化整体作用的客观存在。

思想是历史发展进程的指示器。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面对西方文化冲击做出的多向性反应，表明中国社会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有充分选择的可能，这些不同的思想认识，客观上也为决策者提供了选择余地。这种多向反应，透露了中国社会要求全面变革的社会信息，如果决策者能够在这一信息反馈中像日本那样把握机遇，洞悉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整体作用，捕捉到两种文化交接的真谛，而不斤斤于“体用”之辩，中国就不至于堕入“以制器为先”的歧途，而有可能像日本那样走上全面振兴资本主义的道路。

但是，偶然的歷史转机是历史必然的曲折表现，有时偶然起着异乎寻常的作用。鸦片战争后不久，中国社会还未来得及充分咀嚼和消化西方文化导致的巨变，洪秀全就借助于“基督”文化的教义，发动了太平天国革命。农民革命吸引和转移了整个社会的视线。

文化是整体，文化的物的层面是整体文化的基础，文化的心层面是整体文化的灵魂，作为活的、发展着的文化，“物”与“心”的层面必须借助于“心物结合”部分的联结才能成为有机的系统。近代中国的坎坷弯路，就是由于割裂了文化的整体，摒弃了文化的关键部分所致。“夫政法者，立国之本”。西方文化的强大力量虽然通过“物”得以表现，实质却蕴藏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之中，只有抓住这一根本，即联结“物”与“心”的关键层次，则下可以促进物质文化的振兴，上可以养成健康进取的“国

^① 梁廷枏：《合省同说》，《海国四说》道光年刊本，第1—2页。

民精神”，真正由封建传统文化而走向近代文化。近代日本率先抓住了这一根本：“日本变法，则先变其本，中国变法，则务其末，是以事虽同而效乃大异也。”^①

学习西方，走向近代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的重创，清代社会已面临千古未有之变局，想一味固守成法，囿于“攘夷”之见，已为时势所不容，何况在会剿农民革命的实践中，曾、李实力派已经开始效法西方使用“洋器”了。

中国社会如何应变，如何规划自己的进程，主要取决于国内各种矛盾斗争的发展状况和社会阶级力量的兴替变化状况。处于千古变局的中国不同于日本，除了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矛盾外，还有满汉矛盾和已经激化了的阶级矛盾。清政府视人民反抗为心腹大患，防民胜于防“夷”，这就决定了在步入近代的转折关头，以镇压农民革命一露峥嵘的曾、李处于绝对的决策地位。而满汉矛盾的历史阴影和现实，使清王朝既要借重曾、李来维持封建统治，又要设法加以掣肘，以防尾大不掉之势。颇称精明的曾、李既要巩固发展自己集团的势力，又不可以突破清王朝的藩篱。因此，在不得不变的必然规律制约下，决策者在如何变的问题上进行了精心选择。中、日歧路也就一缘于此。日本“先变其本”而筹全局；中国则“不变其本，不易其俗，不筹其全局”。^②曾、李在政教、人心、工商、制器的本末选择上，两害相较取其轻，选择了“以制器为先”的洋务道路，既符合清政府防范人民“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③的宗旨，又迎合了曾、李增强实力、巩固地位之初衷，一举两得，又何乐而不为？

从现象上看，近代中国由“制器”的洋务运动到变革的维

① 梁启超：《变法通译·论译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第64页。

②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275页。

③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4。

新运动、辛亥革命，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西学输入的程序（实用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相吻合，也符合人们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末至本的认识发展过程。但深入探究就会感到这个逻辑顺序不符合异质文化交流和输入的规律。文化交流、传播和文化的创造不同，吸收先进文化必然要避免文化创造中的歧路和大量的重复。中国由封建文化走向近代文化，完全可以避免西方近代文化的发展过程（由物质到政体，再到心理文化），选择最佳道路，从制度变革入手，带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全面发展，否则，就只能导向失败。日本不然。日本一开始就注意从整体上理解和认识西方文化，既吸收实用科学、自然科学，又输入社会政治学术和哲学，既注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又抓住了变革制度的根本，从而使日本抑制了在初期出现的盲目追求西方物质文明和工艺制造等实用知识的倾向，走上一条全面健康的发展道路。

颇具声势的洋务运动，无视文化的整体性质，舍本而逐末，使中国在走向近代时失足而入歧途。客观规律不可抗拒，它既体现为顺者成功，也表现为逆者失败。在明治维新的成功和洋务运动失败的强烈对照中，中国社会才又重新回过头来选择自己该走的路。然而，时光已过去了三十多年。

中国和日本对西方文化“本末”的认识相差30年。三十多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一瞬，而在科学带动社会以一日千里之势发展的近代，三十多年几乎占了近代中国的一半历程。曾经站在同一起点的中国和日本，经过三十多年的竞走，在甲午重逢时，已然“似曾相见不相识”了，一胜一败，一强一弱，一个跻身于西方文化之林，一个形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社会，其相差又何止万千？

近代中国从失败中走了过来。历史规律不仅表现为合理逻辑的展开、成功的道路。违背规律的失败历程更体现着历史必然的不可抗拒性。近代日本充分认识和把握了“必然”，最大限

度减少了历史偶然性的作用，顺利地由传统文化走向了近代文化。中国却囿于表面认识，强化了历史偶然性的作用，使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通过大量的偶然性得以表现，并以偶然作了补充。

第二章 晚清时期的西学东渐

一、晚清时期西方文化传播的发端

1. 自西徂东的传教士

明末清初由传教士启动的西学东渐运动，曾对中国文化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清朝雍正、乾隆开始实施的“闭关政策”，中断了“西学东渐”，中西方的差距迅速拉大。晚清时期，以西方传教士为先导的“西学东渐”又一次掀起高潮。但此次“西学东渐”实质上是一场“以自觉而带进攻性的西方向防御性的中国挑战为开端”^①的中西文化之争。

最早来华的新教传教士是伦敦会的英格兰人马礼逊（Morrison, Robert, 1782—1834），他从小受到基督教的熏陶，喜欢参加宗教活动，于1804年加入伦敦布道会，1807年毕业于英国高斯坡神学院，并被委任为牧师。同年，他被伦敦会选中，担任前往中国开辟新教区的惟一的传教士。当时中国海禁甚严，外国人不能进入中国内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轮船公司担心影响他们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不允许马礼逊乘坐他们的船。于是他绕道美国，乘船横越太平洋，历时三个多月，于9月4日抵达澳门，然后进入广州。

来中国之前，马礼逊不但认真学习和积累了大量神学、医学

^① 罗志田：《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再思》，《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

和天文学知识，而且在伦敦还跟一位中国青年杨喜德学过中文，为他以后的布道传教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来华后，因中国海禁未开，马礼逊不能公开以传教士身份活动，只得隐匿于广州的商馆，随人学习粤语及中国官话，了解中国风情民俗，以作传教准备。后来他暂赴澳门居住，并与东印度公司一位高级职员的女儿玛丽·摩登小姐相恋并结婚。之后，他被聘为东印度公司商馆中文翻译兼秘书，自此他一直以这一身份为掩护，一边在广州、澳门及南洋各地从事商务，一边传教著书。

马礼逊抵华六年后，即1813年，伦敦会派另一名传教士米怜（Milne, William, 1785—1822）来华与马礼逊一起活动。他们在马六甲创立了英华书院（The Angle—Chinese College）和印刷所，并在马六甲、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等地成立了传教士站，继而出版书刊，开设诊所，这些都使一大批欧美各国传教士深受鼓舞，接踵来华。1817年，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Medhurst, Walter Henry, 1796—1857）来华，1829年“美国海外宣教委员会”（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 for Foreign Missions）裨治文（Bridgman, Elijah Coleman, 1801—1861）和雅裨理（Abeel, David, 1804—1846）来华，1830年抵达广州。1831年底荷兰布道会德国传教士郭实腊（Gutzlaff, Charles, 1803—1851）来到澳门，美国传教士卫三畏（Williams, Samuel Wells, 1812—1884）和伯驾（Parker, Peter, 1804—1889）也于1833年和1834年先后来到广州。他们都受到马礼逊的接待和帮助。马礼逊为新教在中国的传播做了开山事业，被人誉为“耶稣之利玛窦也”。^①1834年，马礼逊在广州病逝，外侨在澳门为其立碑，称颂其为“万世不朽之人也”，“英人仰慕其学不厌，教不倦之心，悉颂为英国贤士”。

“为基督征服中国”是来华所有的传教士的共同目标，因此，

^① 《中国丛报》1846年2月，第105—106页。

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引导所谓“异教徒”皈依上帝，加入到教会中来。从马礼逊开始，他们从来就没有放弃吸收教徒的努力。1814年，澳门东印度公司印刷厂的雕版工人蔡高由马礼逊施洗入教，之后，他的兄弟蔡兴、蔡三也相随入教。梁发也是在马礼逊影响下最早入教的信徒。梁发（1789—1855年），广东高明人，15岁到广州，学习雕版术，1810年起为马礼逊汉译《圣经》雕版，受其影响，于1816年在马六甲由米怜施洗入教。1818年帮助马礼逊、米怜创办英华书院。他对传教事业至为热心，曾编《救世录撮要略解》小册子，以备布道之用。1823年由马礼逊封授圣职，成为第一个中国籍新教传教士。此后，他先后编撰传教小册子12种，随时分散宣传。他尤其注重在各县应考的上子中传教，常常长途跋涉亲赴考棚，派送“福音书”。洪秀全1836年在广州得到的《劝世良言》便是其中一种，日后对洪秀全思想产生重大影响。

据统计，1834年以前入教的信徒有14名。1840年“已接受洗礼的华人不到一百人”。^①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在南洋、广州、澳门一带除了布道传教、发展教徒之外，还积极进行文化活动，如出版西书，创办西报，兴办教会学校，开办医院诊所等，由此奠定了基督教新教在华出版事业、教育事业、医药事业之基础，西方科技知识与政治思想亦复东渐，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2. 西书的出版和西报的创刊

出版西书、西报是传教士辅助传教的重要手段之一。

马礼逊来华后，在著书传教过程中深感出版事业的重要。当时在广州和澳门，海外传教士还没有自己的出版机构，而设立这种机构将会冒极大风险。就在1810年前后，清廷又颁布了禁止

^① 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第270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外国人印书和传教的谕旨，严申：“如果有洋人秘密印刷书籍，或设立传教机关，希图惑众，及有满汉人等受洋人委派传扬其教，及改称名字，扰乱治者，应严为防范，为首者立斩。”^① 在这种情况下，马礼逊只得将书籍秘密出版。有鉴于此，米怜来华后，他们决定在南洋地区设立出版基地。根据米怜八个月考察的经验，他们选择马六甲为传教和出版基地。1815年，米怜偕妻子和梁发等人从广州出发到达马六甲，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他们经营的第一个出版基地——马六甲印刷所诞生了。不久，伦敦会派麦都斯来马六甲协助出版事宜。1821年，麦都思前往巴达维亚，创办了另一家印刷所，并异军突起，逐渐取代马六甲印刷所成为伦敦会在南洋的重要出版基地。另一个重要出版基地是新加坡印刷所，它是经传教士和英商组织的“中国益智会”倡议，由美国传教士崔理时于1835年创办的。此外还有槟榔屿、曼谷、澳门出版基地以及由广州美国海外传教委员出版社和广州中国益智学会（1834年11月）组成的广州出版基地。

马礼逊等一批传教士的东来，先后建立了七个出版基地，为我国带来了铅合金活字、机械化印刷技术，在中国土地上出现了第一个以铅合金活字排中文、机械化印刷的现代概念的出版社——澳门东印度公司印刷所。^② 不仅如此，传教士在各出版基地出版了一批书籍报刊，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按文字类型，传教士出版的书刊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中文书报，以中国人为读者对象，一般用来宣扬基督教义，鼓吹中外友好，化解中外隔阂，内容以宗教为主，其中也有一部分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容。另一类是西文书报，主要是向西

^① [美] 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卷，第58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 《概论马礼逊的中国语文字典，中国最早一家现代化出版社和中国近代出版史分期问题》，叶再生主编：《出版史研究》，第13、15页，中国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方介绍中国文化、历史和现状，让西方更多地了解中国，从而促进传教事业的顺利发展。对于西学传播来说，中文书刊的作用更大一些。中文书刊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种：

(1) 宗教类书籍。

马礼逊来华后，首先翻译了《圣经》新约全书，于1814年在广州印刷了2000部。此后，马礼逊和米怜又合译了《圣经》旧约全书，于1819年连同新约全书在马六甲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铅印中文书籍，也是最早的新旧约汉译本。马礼逊去世后，郭实腊、裨治文、麦都思等组成翻译代表会，在马礼逊译本的基础上，进行校订，于1840年全部改定出版，名为《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和《旧遗诏书》，后来太平天国所用的《圣经》就是这一修订过的译本。

除《圣经》外，马礼逊等人还编写了一大批宣传基督教义的通俗读物，如《问答浅论耶稣教法》、《救世者言行真史记》、《神天十条圣诫注释》等，其中最著名的是米怜的《张远两友相议》（1819年），此书直到20世纪初期仍被认为是有用的书籍。

(2) 科学类书籍。

早期传教士在南洋等地出版的西书中，有32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读物。其中有关于世界地理的书如《地理使童略传》（麦都思，1819年），《全地万国纪略》（米怜，1822年），《西游地球闻见略传》（马礼逊，1819年）等；有关于世界历史的书，如《古今万国纲鉴》（郭实腊，1835年），《东西史记和合》（麦都思，1820年），《大英国统志》（郭实腊，1834年）等；有关于政治经济的书，如《制国之用大略》、《贸易通志》等。这些书籍虽然只在广州、澳门、南洋一带发行，但在鸦片战争前后成为最早“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了解世界地理、历史等知识的一个重要窗口。有些书籍，出版后影响甚广，如米怜主编的《生意公平意法》，是最早的向中国介绍资本主义经济知识的书，曾两次再版。又如米怜主编的《幼学浅解问答》一书，曾先后于

1845年、1846年、1854年在上海、宁波、厦门等地三次重版。^①

(3) 报纸杂志类读物。

首批来华传教士在各出版基地陆续创办了一些以海外华人和中国人为读者对象的中文刊物。列表如下：

鸦片战争前西方传教士创办的中文刊物

刊 物 名	创刊时间	地点	创刊者	备 注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1815年	马六甲	米怜	1821年停刊。第一份中文刊物，共7卷。
《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	1823年	巴达维亚	麦都思	1826年停刊。共4卷，实为《察》的续刊。
《天下新闻》	1828年	马六甲	吉德	1829年停刊。第一份铅字中文刊物。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1833年	广州	郭实腊	1838年停刊。我国境内最早的中文期刊。
《澳门杂文篇》	1833年	澳门	马礼逊	月刊，共4卷。
《依泾杂说》	1837年	澳门		
《各国消息》	1838年	广州		中英文合刊。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传教士创办的第一份以华人为对象的汉文月刊，每期7张，初印500册，后增至1000册，最高发行量达2000册。除在南洋华侨中散发外，还秘密运进广州、澳门等地散发，该刊宣称其宗旨是“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惟一急务”，其内容以传教的论文为主，但它对“灌输智识”、“砥砺道德”^②

① 王杨宋、熊月之：《关于西学东渐的再讨论》，《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

②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也很重视，有近 20% 的篇幅登载一些政治新闻和西方的知识。它曾准确地向读者介绍了美国；用论疑解惑的文体，详细论证了日、月、地之间的关系；它将西方标点符号系统引入中文。李志刚评价它“实属中国近代报业之鼻祖，而中国近代报业之发展均由此延伸”。^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 年在广州创刊，翌年迁往新加坡。1834 年，广州成立以出版书籍启发华人思想对西方文艺和科学有所认识为宗旨的“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郭实腊便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转由该会主理，成为该会的主要刊物。此刊出版意图是“为维护广州认识我们的外国公众的利益”，“要使中国人认识我们的工艺、科学和道义，从而消除他们那种高傲和排外观念”，“让中国人确信，他们需要向我们学习的东西还是很多的”。该刊初印 600 份，不久加印 300 份，前后共出了四卷。内容结构由宗教、伦理道德和科学文化知识三部分组成，但宗教内容已退居次位，伦理道德的分量逐渐减弱，而科学文化知识成了刊物的主要内容。^②在出版业务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也有重大改进，如设有新闻专栏，每期都刊出一定数量的新闻，关注时事政治，贴近现实生活。在编辑方面每期在卷首都刊有本期内容目录，稿末有时加编者按语。这些“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近代报刊的基本特征了”。^③它在南洋华侨和广州、澳门一带有很大影响，此后定期发行的中文刊物，多少模仿该刊的格式和内容，如香港的《遐迹贯珍》、宁波的《中外新闻》、上海的《六合丛谈》等，均受此影响。^④

鸦片战争以前传教士出版的中文刊物，虽以传教为最根本目

① 李志刚：《百年烟云，沧海一粟——近代中国基督教掠影》，第 4 页，今日出版社 1997 年版。

②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 1 卷，第 266—267 页，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③ 同②，第 268 页。

④ 李志刚：《香港基督教会史研究》，第 73 页，道声出版社 1987 年版。

的，但为了宣扬中外友好，消解中国人的疑忌以促进传教事业顺利发展，这些刊物中大都刊有关于西方各国历史、地理、政治、文字、社会风俗、自然科学的内容，因而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了解西方，接触新知的又一个重要窗口。然而，此时的中文刊物种类不多，也只分布在广州、澳门等地，且出版时间较短，时间最长的为6年，有3种报刊只出1年左右，因而，这些刊物的中国读者人数甚少，其影响也是有限的。^①

传教士还以来华的西方人为读者对象，编辑出版了一批西文书报，向他们介绍中国的历史、地理、物产、风土及社会文化等等。鸦片战争以前，来华传教士编辑的有关中国文化的西文著作近30种，其中最重要的是马礼逊于1817—1823年陆续出版的《英华字典》。该字典共6卷，4595页，仅从《康熙字典》收人的汉字加以英译的就达4万余字，除单字外还有成语、句型，英汉对照；收录例句2500余条，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英汉字典。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境内西人创办的外文报刊的发展远远超过中文报刊，中文报刊连同同时期南洋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等在内，共7种，其中中国境内出版的只4种，外文报刊则达17种上下，且一般（主要指英文报刊）规模都较大，出版时间也较长，有的达十几年或二十年之久。^② 1817年5月，马六甲印刷所出版了《印支披闻》（Indo-Chinese Gleanes）季刊，为英文介绍中国文化及风俗习惯的一份重要刊物；1822年澳门创办了中国境内第一份外文报刊《蜜蜂华报》（葡文）；1827年在广州、澳门和香港等地发行了第一份英文报纸《广州纪录报》。最有影响的是1832年裨治文在广州创办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旧译《澳门月报》或《中国文库》，它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开端和早期中外关系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客观上，它对中西文化

①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第271页。

② 同①。

交流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外文报刊固然是供西人阅读，但教会学校的中国学生及关注外事的沿海少数华人，也时有购阅，其影响不可忽视。

3. 教会学校的建立

通过兴办学校而传播福音，是西方传教士普遍采用的传教手段。

马礼逊来华后就十分注意教育工作，拟建立一所教会学校以培养传教人员和刊印传教印刷品。1818年，经过周密筹划，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办了第一所中文书院，1843年，该书院迁往香港，采用西方的教学内容、方法和管理体制，形成了与中国传统书院、私塾教育完全不同的教学体系。

此后，南洋一带陆续出现一些中文学校。1823年，新加坡书院（Institute of Singapore）成立，亦收容中国学童，至1837年，特设一专门学部，教授中国儿童，当时中国学生已有95人。1825年，第一所中国女校设于新加坡，1835年郭实腊夫人在澳门设一学校，收容十余儿童。^①1839年，中国书院（The Chinese Seminary）设于巴达维亚。

鸦片战争以前，传教士在南洋、澳门等地设立的教会学校，规模不大，入校学生不多，不过是“初级班”，教学内容主要限于宗教书籍，而且其目的是吸引信徒和培养传教助手，因此影响不是特别大，但这毕竟是开先河之举，使一些中国士人接触到了一些与中国全然不同的新东西。

4. 西医的着陆

西医东传，由来已久，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中就有不少是精通医道的医生，他们常常运用自己的医学知识和技能为皇室及

^① Chinese Repository VI (1837), 231—232.

王公大臣看病，以为晋身之阶，同时，他们也译著了一些医学著作，如《西国记法》（利玛窦著）、《人身国说》（罗华民、罗雅若、邓玉函合译）、《人身说概》（邓玉函译）等。但它们仅反映了17世纪的西学知识，且不成体系，也不足以反映其对西医的大略，而且当时传教士很少为下层百姓施医看病，故西医影响甚微，人多不信。18世纪中叶清廷实行禁教以后，虽然洋医来华从来没有中断过，广州十三行内常年聘有洋医为外国公司职员看病，且经常为当地百姓治疾施医，但真正意义上的西医着陆要从首批新教传教士东来算起。诊所、医院是传教士们比较稳定的合法的公开活动场所，设立诊所、医院，施医行药是传教士在中国最容易立足的手段，因此藉医传教在传教士中非常流行。1820年，马礼逊与李文斯顿（Stone, T. Living）医生联合在澳门设立一家诊所，并聘请一名精通中医的华人做助手，几个月内，便为300名病人施诊。1827年，马礼逊又与李文斯顿、新近来华的洋医郭雷枢（Colledge, Thomas R., 1796—1879年）在澳门开设一所眼科医院，主要为穷人施诊，来诊者每天平均有40人之多，澳门附近也有人前往就诊。从1827年到1832年10月，五年之中共治愈四千余人。^①1833年，他们又在广州增设一所医馆，医治各种病症。但随着前来治病人数的日渐增多，现有的西医院馆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有鉴于此，郭雷枢建议英美教会界应派遣传教医师来华协助工作。1835年，美国传教医师伯驾来华从事西医救治工作，打开了西医东传的新局面。

伯驾，27岁毕业于耶鲁大学神学院，后又入医学院接受神学与医学的训练。1834年毕业取得医学文凭，应美教会召请受遣来华行医传道。他先在新加坡行医，并补习中文，之后进入广州。1835年在广州十三行内开设医局，名为“新豆栏医局”，次年医局扩建，改称“博济医院”。医局以治疗眼疾而见长，特别

^①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130页。

对当地百姓多患的白内障救治效甚佳，患者奉若神明，伯驾名声大噪。伯驾不但医术高超，而且医德高尚，颇得广州一带百姓信任，前来就诊者络绎不绝，开诊六星期内就有 450 人前往就诊。^① 据不完全统计的就诊情况如下：

第一季度，就医人数达 1195 人，其中男性 925 人，女性 270 人。

1836 年 11 月，医局开张一周年之际，前来看病的人已达 2152 人。

1837 年，求诊者更甚于前，平均每月赴诊者二三百人，有时多达六百余人。^②

如此众多的病人，伯驾独户难支，遂特邀当时在广州的其他几位西医郭雷枢、白拉福、柯克司、渣甸、安德逊等前来助治。同时，他在医局招收了三名中国青年，对其进行西医的培养和训练，使之成为医局的重要工作人员。

医局全部采用西方的管理制度，对前来就医者，进行诊断记录，并建立医务档案，对疾病进行分类管理，如眼病分为 47 种，其他疾病分为 23 种，等等。

医局实行免费治疗，这是中国百姓乐于前往就诊的主要原因，但同时也使医局的维持和发展出现经济上的困境。为此，伯驾、郭雷枢等人于 1838 年 12 月 21 日在广州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医药传道会——“中华医药传道会”，以配合医药传教工作。会议推举郭雷枢为会长，伯驾为副会长。该会还发表宣言，称其宗旨是：“鼓励在中国人中间行医，并赐予我们的科学、病例调查和不断鼓舞我们的发明等有益的知识提供一部分给他们分享。”他们还希望他们的努力能够推倒长期以来所抱的民族情绪和偏见的隔阂，并以此教育中国人，“他们所歧视的人们是有能力并愿

^① 李长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 1 卷，第 38 页，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②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 131 页。

成为他们的恩人的”。他们确信，这一定会推进传教事业，“有助于把我们同中国人的贸易及一切往来置于更想（向）望得到的地位上，也可为输入科学宗教打开通道”。^① 该会不但得到广州、澳门两地外商的支持及英美各传道会的纷纷响应，就连广州绅商都积极捐款资助医局的发展。本次会议募得九千三百余元，以应医局之急。“中华医药传道会”为传教士在中国进一步施医传道起了推动作用，同时，它对中国现代医学贡献良多。^②

1842年以前，来华行医的西方传教士还有波乃耶（美部会，1838年来华），戴华尔（美部会，1839年来华），雒魏林（伦敦会，1839年来华），合信（伦敦会，1839年来华），协帮（美长老会，1841年来华），高明（医药传道会，1842年来华），玛高温（美国浸礼会，1842年来华）等人，他们主要在澳门、香港及南洋一带行医施药，均属于在中国推行西医西药的先驱。

而伯驾设立的新豆栏医局，最早打开了西医东传的新局面，由此，西医的医治作用日渐得到广州人的普遍认可。最早将眼界投向西方的林则徐，也曾间接地要伯驾为他治疝气病，成为医局记录在案的第6565号病人。伯驾因其在华传播西医的努力被称为“西医输入中国的先锋”。

二、晚清时期西方文化传播的渐进

1. 五口通商与西学传播的进展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战败，1842年中英双方签订《南京条约》，清政府被迫开放五口：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并将香港割让给英国，随后美法两国效仿英国，强迫中国

① 《中国丛报》1835年5月。

② 史兰华等编：《中国传统医学史》，第303页，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与其分别签订《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这样外国人在五口及香港居住、通商、传播宗教、开设学堂、开办医院都被视为合法。从此，揭开了西学传播史上新的一页。

鸦片战争前，自西徂东的传教士，惮于清政府禁止传教的政策，只得秘密活动于广、澳及南洋一带。鸦片战争后，五口洞开，香港割让，欣喜若狂的外国人纷纷涌入。1843年，上海开埠时只有外国人26名，到1844年就已达50名；1845年，91名；1847年，134名；1850年，210名。香港被割让后，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来港西人更多，1851年来香港的外国人就已达到1520人。1861年，香港总人口119321人，比10年前净增8万多，增加了近3倍。除去人口自然增长的因素，外国移民是其增长的重要原因。如此众多的来华西人中，传教士占一定比例，仅1845年一年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就有30余名，1848年达67人，1855年增至75人（英国24名，美国46名，瑞士2名，德国3名）。^①传教士将活动基地从南洋迁到了东南沿海城市，西方文化的影响也由原来的港澳广一隅，开始扩大到这些通商口岸。

首先表现为文化出版事业有了进一步发展。鸦片战争后，马六甲印刷所随其英华书院迁至香港，并不断发展。1843年至1860年，仅中文书刊，传教士在香港就刊出60种，属于学校教科书、字典、年鉴、杂志，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的书刊有23种。此期香港成为外国人办报的重要基地，中英文报刊达20种，冠于全国，而且是全国其他各地的总和。^②此间传教士主办的中文报刊与鸦片战争前的明显不同即不再以宗教内容为主，而主要刊载一些实用性、商业性和文化性的内容，较有影响的《遐迩贯珍》（1853—1856年，香港，麦都思）几乎全以各国近事、商业信息和一般的新闻评论为主，很少刊载宗教内容。

^① 徐日彪：《近代香港人口试析（1841—1941）》，《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

^②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114页。

五口中出版业最为兴盛的要数宁波和上海两地。1845年，美国长老会原设在澳门的印刷所在传教士柯理的提议下迁至宁波，改为“华花圣经书房”（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Holy Class Book Establishment）。1860年，华花圣经书房迁沪后，易名为“美华书馆”，是为当地最为宏大的印刷机关。^①上海的墨海书馆，则是传教士在华的出版中心。王韬曾说：“西人设有印书局数处，墨海其最著者。”^②据统计，从1844年至1860年，墨海书馆所刊出各种中文书刊位居五口之首，而且此时期最重要的西学著作如《几何原本》（后九卷）、《重学》、《谈天》、《光论》等，差不多都是这里翻译出版的。

总体来说，自五口开埠以来，传教士在华的出版事业远比先前在广、澳、南洋一带兴盛。从1844年至1859年，共出版各种书刊434种，比鸦片战争以前的两倍还多，其中有关史地科技的译著约28种，虽数量不足观，但却涉及了包括天文、数学、力学、物理学、地理学、生物学、化学、光学、医学等广泛的科学领域，大致勾画出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近代世界科学正向专门化深入的态势。就28种译著所介绍的西学深度而言，或补明清耶稣会士的缺漏如《几何原本》（后九卷），或传西方科学的新成果如《重学浅说》、《植物学》等，有力削减了因人为阻断所造成的中西文化间的长久隔膜。所以，这一译著承先启后，是鸦片战争后沟通中西文化的津梁，虽嫌纤小，但无疑却是崭新的。

其次，西人创设的图书馆开始在通商口岸出现。它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发展的产物，主要集中在上海。1847年，传教士在徐家汇成立“天主堂藏书楼”，同时遍布于徐家汇一带的各种天主教组织，诸如“耶稣会”、“修士院”及徐汇公学和稍后的天文台、博物院、徐汇师范等都设有各自专门的图书馆。1851年，

^①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170页。

^② 王韬：《瀛壖杂志》卷6。

上海英租界成立墨海图书馆，藏书 1276 册，报纸 30 种。1857 年，伟烈亚力（Wylie, Alexander, 1815—1887 年）创立“上海文理学会”，次年改称“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其内设图书馆专门收藏东方图书，后即发展成为著名的东方图书馆。这些图书馆成了西人收藏中外图书的中心，为中西文化交流创造了便利的条件。

第三，西塾在各通商口岸迅速开设。五口洞开后，各通商口岸的教会学堂迅速增多。据史式微《江南传教史》统计，1860 年天主教在江南地区即拥有学堂 371 所，男女学生 5510 人。据卫三畏统计，1860 年以前基督教在五口及香港设立的学堂有 56 所，学生 1160 人。由此可知，洋学堂及其学生已达到一定数目。此期重要的教会学校有：

1842 年由浸礼会传教士叔未士（Shuck, John Lewis, 1812—1863 年）在香港创办的宏艺书塾，1843 年由马六甲迁至香港的英华书院，1844 年宁波的女塾，1849 年上海的徐汇公学，1850 年上海的裨文女塾，1853 年天津的法汉学堂，等等。

这些学堂规模都不大，多则几十，少则几人。如传教士 1850 年在广州开办的一所学堂，开学时只有三人，不久，又有两名退学。最早成立的马礼逊学堂，迁到香港后，经大力发展在校生才 40 人。上海徐汇公学规模稍大，至 1852 年也只有学生 44 人。究其原因只是因为科举入仕是长久以来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而西塾不习举业，则无以致显达，况且人西塾有人教的嫌疑，会受到正统舆论的鄙视。所以中上人家不屑于将子弟送往教会学校。这些学校只能靠免收学费，提供食宿等慈善性质的措施来吸引一些贫苦人家的孩子。此种学校的学生不读孔孟经书，所习课程与其时西方学校中所教授的，大致相仿。

值得一提的是，此期在香港和开放的五口，先后出现了十余所教会女子学堂。较有影响的有英人爱尔赛德创办的宁波女塾，裨治文夫妇创办的上海裨文女塾，美国传教士 1851 年创办的文

纪女塾（后改为圣马利亚女校），等等。这些女塾除开设宗教、文化课外，还设有一些女子手工等课。虽然学校规模都不大，入学人数很少，但它属于开天辟地的创举，无疑会对中国“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产生冲击，对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产生启示，为近代中国人自己开办女子学堂起一定的示范作用，同时有益于“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而所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对中国近代妇女思想启蒙起了推动作用。

第四，教会医局纷纷成立。鸦片战争前，只有广、澳两地有西人在华创办医院、诊所。战争后，传教士纷纷到新开口岸开展类似的活动。1848年五口全部建有教会医院，到1860年达十余所。较著名的列表如下：

传教士在五口建立的主要医院（1842—1860年）

名称	地点	时间	创办者	备注
博济医院	广州	1842	（美）伯驾	亦即新豆栏医局，1835年成立，战争期间停开。
华美医院	宁波	1843	（美）玛高温	
厦门医院	厦门	1844	（美）雅裨理	曾得到医药传道会资助。
仁济医院	上海	1844	（英）雒魏林	上海第一家西医院。
惠爱医院	广州	1848	（英）合信	

西医院成立，来此看病的中国人与日俱增，博济医院在1844年7月就接待了3万名求医者，1855年，约达5万余人。合信创办的惠爱医院开头一天就诊者仅4人，次日增至28人，后增至每日250人。据卫三畏统计，仅1855年，基督教医院就诊人数即达51555人。医院治病的同时即是向病人及周围群众宣传了西方医学。西医的影响当然会扩大到各通商口岸及周围地区。

此外，随着医院规模扩大，外国医生往往要招收少数中国青年到医院服务，如伯驾的博济医院、合信的惠爱医院。在此过程中，传教医生以中国传统的师带徒方式，向他们传授医学，使他们成为得力助手。这些中国青年逐渐掌握了西医知识，有的甚至独立行医，成为我国第一批西医人才。

总体说来，鸦片战争后，20年间西学传播，其主体是西方传教士，所传入的西学也以宗教为主，虽然也传播了一些科学知识，并且也对少数精通格致的中国学者以启示，但西学对整个中学的影响微乎其微，接受西学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超过总数的1%。

2. 睁眼看世界

鸦片战争弥漫的硝烟，夹杂着从南洋飘来的西学新风，使一部分世人猛然警醒，发现自己面临的对手完全是陌生的，来自西洋的“夷人”是历史上从未碰到过的族类；也使一部分有识之士惊愕地发现，除了子曰诗云以外，天底下还有那么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鲜知识，甚至用中文难以表达的学问。处于风云漩涡中心的林则徐在时代潮波的鼓荡下成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则徐在传统经世学风的影响下，出于对祖国的忧患意识，在广州禁烟期间，为了了解西人的情况，随时掌握其动向，就曾“日日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他命人将英人慕瑞撰著的《世界地理大全》（1836年伦敦出版）译出，名为《四洲志》。此书记载了五大洲十多个国家的历史和地理，是当时“了解夷情”的一部较为系统的世界地理著作。

在鸦片战争的刺激下，魏源受林则徐委托，怀着经世致用的目的，发奋著作，辛勤整理，终于在1842年编成一部当时内容最为丰富的有关世界知识和中国海防的百科全书——《海国图志》，后几经增补修订，扩为百卷本，约88万字，并雕有各种地

图和国艺图 100 多幅。此书全面介绍了世界各国地理、历史、政治、科技发展状况，总结了鸦片战争的教训，大大开扩了人们的眼界，其影响十分深远。

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一批有识之士充分感到认识中国以外的世界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纷纷著书立说以启示国人。陈逢衡著《崙咭利纪略》（1841 年）；汪文泰著《红毛蕃崙咭利考略》；姚莹根据英人颠林口供编写了《英吉利图志》、《英吉利纪略》，介绍英国历史地理情况。1846 年，姚莹利用出使西藏的机会，就藏人访西事，著《康輶纪行》，记载了不少有关英、法、俄、印度等国的历史、地理知识。另外，梁廷枬著《海国四说》，记述英美等国的社会、政治情况；福建巡抚徐继畲编著《瀛环志略》，成为继《海国图志》之后的又一部比较著名的世界地理、历史著作。据统计，这一时期，出现的此类书籍至少有 22 部。^①这些书的作者，之所以“喋血饮恨”，发奋著述，完全是为了“知彼虚实”，“师夷长技”。因为他们明白，如果不了解外界情势，就很难找到“制敌”、“筹远”的良策。这反映了一种新的眼光和动向，同时预示着早期“睁眼看世界”思想潮流的形成。这种思潮是晚清经世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并给经世思潮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它在某些方面开始突破封建文化体系的束缚，具有某种自发的、片面的向西方学习的势头。

“睁眼看世界”，首先就要正确地认识外部世界。有识之士通过阅读西书吸取了确证可信的地图地理知识，认识了地球的形状，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得知英、法等国并非围绕中国周边的“蛮夷”下国，而是远隔重洋，久被隔绝在地球另一端的文明强国。他们不再像明末清初那样固守于旧观念，而是以现实的理性态度接受了西方人对世界的解释。这种新的世界观念，打破了中国人千百年来来的中华为天下中心，自以为居“天下之中央”的华

^① [美] 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 172 页。

夏中心观念，传统的华夷观念趋于淡化。魏源虽仍称西方诸国为夷，但他却认为：“夫夷狄之名，专指残虐性情之名，未知王化者言之……非谓本国而外，凡有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也……诚如夫远客之中，有明礼义，上通天德，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古今者，是瀛寰奇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称之为夷乎？”^①林则徐在实践中，不断了解和积累关于外国的知识，毅然地抛弃了“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的“圣训”和“大黄……夷国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的谬见，主动对西方进行深入的了解，认识到所面临的对手不再是茹毛饮血的野蛮部落，而是具有发达文明的国家。

走出闭目塞听的先进士人们，还广泛地了解了西方各国的历史、政治社会、文化、风俗等情况，“旁咨风俗，广览地球”。^②从魏源、徐继畲、梁廷枏等人对西方世界的描述来看，他们的兴趣和赞赏态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西方总统制。魏源高度评述美国的民选总统制，认为：“二十七部酋分东西两路，面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而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主翕然，可不谓公平乎？”^③徐继畲则对开创民选制的美国总统华盛顿大加赞评，认为他“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梁廷枏认为西方民选总统是“其举其退，一公之民”，“未有统领，先有国法，法也者，民心之公也”。^④

其二，西方议院制。在魏源记述中的美国议院似乎只是一个梗概，但他由此生发出来的赞许态度却是十分鲜明的：“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

① 魏源：《海国图志》百卷本，卷76。

② 林则徐给英国的照会，收在梁廷枏《夷氛闻记》，《鸦片战争文献汇编》六，第14页。

③ 魏源：《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叙》，《海国图志》百卷本，卷59。

④ 徐继畲：《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瀛环志略》卷9。

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由公举，可不谓周乎？”^① 在《瀛环志略》中，徐继畲认为议院“此制欧罗巴诸国皆从同，不独英吉利也”。^②

其三，西方教育制度。对于西方教育制度的关注也体现在魏源的《海国图志》中，他描述英国的教育状况：“国中无论男女，皆习文艺，能诗画，兼工刺绣。”^③ 美国“国内遍设大小书院，不计其数。国之男女，无不能书算者”。^④ 徐继畲介绍巴黎教育情况说：“城内有大学院，藏印本书三十六万册，抄本书七万册。游学之士，许住院借读。”^⑤ 这种直观的描述，虽然缺乏认识的深度和比较价值的评判，但对于开启中国士人对于另一个文明特别是对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深入认识和学习借鉴，无疑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当然，早期“睁眼看世界”的士大夫对于西方世界的民主制度除了基于向所未闻的一种惊喜和赞叹外，并无立志引入和效法的想法。他们直接感受到震撼并立志效法的还是西方的“技艺”层面的内容。

鸦片战争前后，许多士人就着手研究明显高出中国的西方先进的船炮火器的制法和原理，1841年丁拱宸就完成了《演炮图说》，其中就有根据西人资料编写的“铸造洋炮图说”和“西洋火轮车火轮船图说”。此后，又有郑复光撰写成《镜镜冷痴》、汪仲洋编写的《仿铸洋炮说》、丁守存编写的《西洋自来火镜制法》及戴煦的《船机图说》等。这些书籍收录了当时所能辑集的西方“制器”资料，魏源也在《海国图志》中尽力辑录了当时流传的“制造”之术资料，予以详细解说。据统计，在鸦片战争及以后

① 《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叙》，《海国图志》卷59。

② 徐继畲：《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瀛环志略》卷9。

③ 《海国图志》卷51，第2页。

④ 同③，卷61，第1页。

⑤ 徐继畲：《瀛环志略》卷7，“佛郎西国”。

的一二十年间，中国人编写的有关西方轮船机器、武器制造方面的书籍，至少有二十多部。这既体现了早期进步士人们学习西方的关注点，也体现了西方文化最早冲击中国社会时的着力面及其特别情势。

正是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强劲攻势下，吃尽了“技艺不如人”苦头的中国人，迈开了学习西方“技巧”的第一步。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序曲由此开始了。

3. 引进自然科学的先驱

鸦片战争的震撼和战争实践中“师夷长技”的认识，推动着一批致力于在“技艺”上学习西方的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受明末清初西学影响较深、讲求新知氛围较浓的江浙皖地区，涌现出一批被西方近代科技深深吸引并进而研习传播的学者。

李善兰，（1811—1882年），浙江海宁人，字壬叔，号秋纫，10岁人家塾读书，偏偏喜好算学，而对儒家经书则日渐疏远。遭塾师训斥后，怒面辞学，表示终身不再求科举仕途，并潜心研习《九章算术》、《测圆海镜》、《勾股制圆记》等数学著作。15岁便通习《几何原本》前六卷，即利玛窦、徐光启所译的那部分。通过不断积累和探索，李善兰的数学知识逐步增加，年过三十，“所造渐深”。^①他35岁时，已是远近闻名的科学家，刻印《方圆阐幽》、《弧矢启秘》和《对数探源》三种数学著作。而且李善兰还独创了一种名为“尖锥术”的方法，并运用它求得了简单的定积分公式，同时李善兰还运用“尖锥术”来计算面积，并对三角函数和对数函数的展开式也进行了研究。

自鸦片战争五口通商以来，上海就逐渐成为全国对外交往及西学传播的前沿。1852年，李善兰来到上海，并结识了墨海书

^① 李俨：《李善兰年谱》，《中算史论》第4集，第338页，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馆译书的传教士伟烈亚力。伟烈亚力对李的学识极为赞赏，遂留他在馆中工作。1852—1860年，他一直在上海，与伟烈亚力、艾约瑟、韦廉臣合作，共同翻译西方科技著作8部：《几何原本》（后9卷）、《重学》（20卷）、《植物学》（8卷）、《代数学》（13卷）、《代微积拾级》（18卷）、《谈天》（18卷）、《圆锥曲线说》和《奈瑞数理》，共80余卷。他因此成为我国近代史上兼通中西天文历算、撰述译著并称于世的一代数学名家。

《几何原本》（后9卷），1857年版，原著为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所作，共15卷。明末，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从德文本译出前六卷，对我国数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但自万历以来，250年而无后九卷中文译本问世，“中国大算家愿见全书久矣”。因此，入墨海书馆后，李善兰首选《几何原本》，与伟烈亚力共同翻译。“日择一题，中间因应试，避兵诸役，屡作屡辍”，^①前后经历四年，于1855年完成。

《几何原本》后九卷是从英译本转译而来，由于英文刻本校勘未精，多有语讹字误，故翻译工作十分艰苦。为保证译书质量，李善兰“删芜正伪，反复详审，使其无有疵症”，^②倾注了大量心血。后来又由顾观光、张文虎校复，使其精益求精。1858年《几何原本》刊行，从此这本世界名著有了较为完整的中译本。王韬高度评价李善兰、伟烈亚力“不憚其难而续成之，功不在徐、利之下”。这部书社会影响很大，“异口同声欲求是书善本，当反访诸中国矣”。^③

《代数学》、《代微积拾级》是李善兰于1859年翻译出版的。前者原书为英国著名数学家棣么甘（Morgan, Augustus De, 1806—1871年）所著，主要记述初等代数，兼有函数、对数函数

① 李善兰：《几何原本·序》，见徐世昌编《清儒学案》卷176，《王叔学案》。

② 伟烈亚力：《几何原本·序》，转引钱宝琮主编《中国数学史》第324页。

③ 同①。

的幂级数展开式等，是为传入我国的第一部符号代数学读本。后者为美国罗密士（Loomis, Elias, 1811—1899年）所著，介绍了代数几何、微分、积分等西方近代数学知识，是第一部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有关西方近代解析几何、微积分的数学著作，在中国数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李善兰在翻译这些数学书籍时，首创使用许多数学名词和术语的中文名，如“代数”、“微积分”、“积分”等，还直接引进了 \times 、 \div 、 $=$ 、 $<$ 、 $>$ 等世界通用的数学符号，并一直沿用至今，其中的一些名词还传入了朝鲜和日本，也被运用至今。

李善兰在翻译数学著作时，也对其他学科的科学著作进行了翻译。

《重学》是李善兰与艾约瑟合译的一本力学著作。原书为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惠威尔（Whewell, William, 1794—1866年）所著。书中详细地介绍了力学的一般知识，其中牛顿力学三大定律还是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

《植物学》为我国最早一部介绍近代植物学的译著。原书为英国植物学家林德利（Lindley, John, 1799—1865年）所著，原名《植物学基础》，共八卷，附图200幅。前七卷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因伟烈亚力回国，后一卷由李和艾约瑟合译，1854年出版。该书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植物学知识，内容涉及植物与动物的异同、植物地理分布、植物体的组织结构、植物体各器官的构造及其生理功能、植物的分类法等。此书的译介对中国近代植物学形成、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学科专用词由此确立，如“植物学”、植物分类单位“科”等。此书被认为是了解西方植物学的最好入门书。

《谈天》是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在1859年翻译出版的另一部重要著作。该书原名《天文学纲要》（The Outline Of Astronomy, 1851年版），是英国著名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Heischel, John Frederick William, 1792—1871年）的一部优秀著作。《谈天》出

版后，甚受读者欢迎，1874年徐建寅又补充了至1871年为止的近代天文学的最新成果，出版了增订本《谈天》。书中详细介绍了万有引力定律、光差、太阳黑子理论、太阳系结构等天文学知识，几乎包括了到19世纪50年代初为止的西方近代天文学研究成果，而且还要言不烦地介绍了哥白尼、刻卜勒（开普勒）、牛顿等在天文学上的贡献，并有针对性地批评了一些中国士大夫对西方科学不加考究，妄加议论的态度，有力地冲击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陈腐观念，不仅为哥白尼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王韬称《谈天》“有大功于世”。

李善兰数十年如一日刻苦钻研，1867年在南京刻成的《则古昔斋算学》一书汇集了他已写就的大部分著作，集中国传统数学之大成，融中西数学为一体，代表了当时中国数学的最高水平。1868年，李被郭嵩焘举荐，应召入京，出任同文馆总教习。在同文馆期间，他对数学孜孜不倦，尽心尽力，“先后课徒数百人”，在这方面也为西学在华传播乃至我国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早期提倡学习西方，变法图强的先进知识分子王韬也是近代引进西方自然科学的一个先驱。1849年到上海人墨海书馆工作。此前，他曾至墨海书馆拜访过馆中麦都思、英魏荣、慕维廉（Muirhead, William, 1822—1900年）等人，颇受赏识。入馆之初，他只能做些编校工作，随着接触到的西学知识日渐增多，很快成为独当一面、能与西人合译书籍的学者。在墨海书馆期间王韬共译书五部：

《重学浅说》，王韬与伟烈亚力合译，是近代中国译介的第一部关于西方力学的专书，该书“意简词明，最省便览”。^①《中西通书》，《格致新学提纲》是王韬与艾约瑟合作介绍科学发明、天

^① 徐维则、顾燮光：《增版东西学书录》重学第十三。

文学知识的书。

《两国天学源流》，与伟烈亚力合译，是一部西方天文学史略。

《华英通商事略》，1875年与伟烈亚力合译而成，曾在《六合丛谈》连载，为一部从明万历到咸丰年间的通商史。

在与西人合作译书的同时，王韬细心考究有关知识，另编三书：《西学国说》、《西学原始考》、《泰西著述考》，并将此三种书与《西国天学源流》、《重学浅说》、《华英通商事略》合编为《西学辑存六种》，并于1890年修订出版。

王韬不但参与翻译介绍西方科学，还热心倡导学习西方科技，他曾毫不留情地批评“西学中源说”是“攘人之类，据为己有也”。^①

近代著名天文学家张福僖在引进西方科技方面也做出了一些贡献。1853年，经好友李善兰介绍，张福僖进入墨海书馆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与艾约瑟合作译成《光论》一书。该书的西文原本及作者均不详，但从其内容来看，底本似乎不止一种。全书正文共约6000字，附图17幅，详细而系统地介绍了当时西方几何光学知识。诸如光的直线传播、光的反射、光的照度、介质的疏密及其均匀与否对光传播的影响等。从定量关系上论证折射定律，临界角（“角限”）和反射现象，海市蜃楼幻影形成的原因等。张福僖还正确地画有光路图，引入“光线”、“光芒”等概念，书中述及的色散、光谱等光在传播过程中与物质发生相互作用时的部分现象，已经涉及到物理光学的知识。

南京人管嗣复，在引进西方科技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与传教医师合信共同翻译的《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和《妇婴新说》三种著作，风行一时，他则成为上海兼通中西医的第一人。1859年，他曾助裨治文修订《美理哥合省图志略》，于1861

^① 伟烈亚力、王韬：《西国天学源流》，第29页。

年以《联邦志略》之名重版。

需要指出的是，参与翻译或接触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并非只李、王、张、管四人，在墨海书馆译书的蒋效复、周双庚、陈萃亭，助林则徐翻译西书的袁德辉，在江浙与李善兰、张福僖等人讨论过西学、并对西方天文学有所研究的徐有壬、顾观光，与合信合译《全体新论》的中国青年陈修堂，留学美国、英国的容闳、黄胜等人都在吸收和传播西方科学知识方面做出过一定贡献。

4. 晚清社会文化观念的变迁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渗入及欧风美雨的阵阵袭来，中国社会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

当西方资本主义用坚船利炮轰开古老中国久已关闭的大门时，洋货，这一西方文明的物质载体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之势汹涌而来。他们在丰富和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使以往古板、单调、简陋的局面开始改变的同时，也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风俗习尚发生了变化。正如陈旭麓先生所说，商品可以改变人们的面貌，也可以“熔解中国的固有文化”。^①

随着五光十色的洋货走进城乡居民生活，原先那种被视为美德的朴厚俭约、因陋就简的生活观念开始失去原有的社会基础，人们不仅乐于使用较高一级的生活资料产品，而且出现了“喜新厌旧”、“竞为靡丽”之风。道咸以后，上海附近即流行此风，《真如县志》描写了前后变化的情况：“真如僻在邑之西南，自成市廛，士习诗书，民勤耕织，俗尚敦厚，少奢靡越礼之举。中外互市以来，洋货充斥，绚丽夺目，喜新厌故者流弃其已有，群相购置，不知漏卮之日甚。”

^① 参见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传统文化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与此同时，崇尚洋货之风也悄然兴起。衣着上，人们以穿洋布衣服为一种时尚。厦门在开市通商后不久，就出现了“民间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①的情况。很多居民虽然劳动时仍穿自制土布，“然其他或祭祀，或应酬，或往稠人广众之中，首穿洋布以外观美丽”。^②香港和广州在19世纪50年代就有人模仿洋人打扮。饮食上，以“洋”为排场，中国人对西洋饮食有一种新奇的感觉，视开“洋荤”为一种享受和时髦。价格奇昂的西餐馆则成为达官显贵、富商大贾显阔的地方，甚至出现“多朋座上无多少，红顶花翎日日来”^③的景象。一些上海文人竟家置洋酒，以饷朋友雅集。社会交往中，奇巧洋货成为最时兴的馈赠礼品。如王韬就经常以“晶（玻璃）杯、洋皂”赠送朋友。他携友访妓，也带着一卷洋布作为送妓女的礼物。

娱乐生活中，随着西式马车马路在通商城市的出现，乘车观赏街景成为有钱人消遣娱乐的一种方式。照相，这一新奇的科技产品，更是深受人们喜爱，无论是上层官绅还是下层商民，都把照张小相视为一种时髦，促使照相业很快在一些大城市流行开来，甚至有的人在订婚过八字时还要附上一张照片。崇洋之风如此兴盛，以至发展到一些中国人不论货之优劣，只要看到是洋招牌就满足了，“凡物之极贵重者，皆谓之‘洋’，重楼曰洋楼，彩轿曰洋轿，衣有洋绉，帽有洋筒，挂灯曰洋灯，火锅名为洋锅，细而至于酱油之佳者亦名洋秋油，颜料之鲜明者亦呼洋绿。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真是“洋乎，洋乎，盖洋洋乎”！^④

商品经济的冲击必然导致价值观念的变化。人们的贱商观念日益向重商、慕商方面转变。“言商”、“逐利”不再是“小人”

① 道光二十五年福州将军兼管闽海关敬参文奏，《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② 吾庐孺：《京华慷慨竹枝词六国饭店》，见《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

③ 同②。

④ 转引自严昌洪：《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

之事，而是很时髦的社会风尚。“今之富人无不起家于商者，于是人争驰骛奔走，竞习为商，而商日益众，亦日益饶。近者里党之间，宾朋之际，街谈巷议，无非权子母征贵贱矣”。^①传统的“贵义贱利”价值观受到强烈冲击。时人记载上海社会风尚变化说。“往来于洋泾者，大抵皆利徒者。贪、争、诈三者，无一不备，目中所见言端行信之人，卒未一遇。盖贤愚杂糅，品类不一，天资稍厚者，日变浇薄，利之所在，则不知有友谊矣。”^②

中国人深切感受到西方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对外国人的鄙夷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过去人们将西洋人的生活习俗视为“蛮貊之俗”而加以唾弃，现在随着与洋人交往的日渐频繁，人们不但热衷于使用洋货、吃西餐、住洋房，而且还模仿西洋人的生活方式。有些人甚至取一外国名字以示时髦，如19世纪50年代上海某洋行的买办阿福取名为“威廉”等。还有不少人热衷于跳舞、赛马等西方式的娱乐活动，如上海19世纪50年代时每届赛马，市民都蜂拥往观，热闹非凡，并由此形成上海租界的一大景观。西洋婚礼也开始在青年人中流行，王韬记述一位友人的西式婚礼情况说：“牧师衣冠北向立，其前设一几，几上置婚书、条约。新郎、新妇南向立，牧师将条约所载——举问，俊姐为之代答，然后望空而拜。继乃夫妇交揖，礼成即退，殊为简略。”^③

在西学东渐和西俗东传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礼法观念受到一定的冲击。

中国传统封建礼教极端歧视妇女，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男主外女主内是人们延续几千年的观念。妇女不但没有同男子一样的经济、政治地位，而且受教育的权利也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同

① 民国《衢县志》卷6，食货下，第644页。

② 《王韬日记》1858年12月29日，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③ 同②，1859年4月30日。

时，封建礼教还为妇女规定了许多规矩，让他们遵守“三从四德”，尚守贞节，从一而终。而男子却可以娶三妻四妾不受任何限制。

晚清西方教会士人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一些士人慕西方风俗，将纳妾之风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陋俗摒弃。基督教极力宣扬“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使一些在封建专制制度和家庭制度下久受压迫的人们得到启迪，产生诸如“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一类的争取平等的思想。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以及关于妇女政策的礼俗改革，就是这一思想的具体化。太平天国的政策规定男女可以一同赴礼拜堂进行宗教活动，女子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可以分得同男子一样多的田地等等。这些虽然没有完全彻底地在太平天国内执行下去，也没有完全摆脱封建社会的传统影响，但它毕竟对封建宗法、礼法观念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此外，传教士在各通商口岸设立女学，首开中国女学之先河，也不可避免地冲击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女子无学”、“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

物质生活的改进，导致人们日常生活习惯也有所改变。如钟表的使用，固然是起居、生活的需要，同时也促进了生产、生活的现代化，提高了人们的时间观念。再如煤油灯和电灯进入民众家庭，代替糖油蜡烛照明，在当时可谓家庭生活的一大改革。它提高了时间的利用率，人们可以充分利用晚上时间来工作、学习和娱乐。

随着欧风美雨的吹洒，晚清大众新闻传播媒介也在发生变化。中国原有的报刊只有《邸报》和《京报》两种，“邸报之制，但传朝廷之政事，不录闾里琐屑而已。故阅之者，学士大夫居多，而农工商贾不预焉”。^①《京报》也是如此，且传播范围更

^① 《申报》1872年7月13日。转引自涂林《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小，只有在京城官府和官吏中发送。晚清出现了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纸，时称“新报”。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人创办的报纸种类数量日渐增多。这些新报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都大不同于《邸报》和《京报》。它以新闻、评论、文艺作品（副刊）、广告为基本内容，“多见闻而便于民者也”，所以拥有广泛的读者。早期新报每期销数都在一千份左右，中文报的发行量更大一些，它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尤其在识字阶层产生一定影响。有些知识分子将其作为了解域外新知的一个窗口，并养成经常阅读报纸的习惯。林则徐为借新报了解西人情况，经常组织人翻译外文报刊，并选新闻和评论，编为《澳门月报》，每周或每月抄报一次，上呈道光帝。19世纪50年代就有人开始认识到近代报刊这种新型大众传播形式。1855年，中国人自己主办的第一份近代化的中文报纸《中外新报》在香港创刊，在港澳一带小有影响，受到中国人的欢迎，此后，中国人创办的近代报刊在大陆陆续出现，晚清士人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从总体来看，在通商后的20年间，西方文化的影响还仅限于香港及五个通商口岸。19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西方势力进入到中国广大地区，社会文化的变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其影响力从沿海到内地随着距离的延伸由强变弱。

被西方文化推离了原有轨道的中国社会，在晚清社会文化的变迁中，开始向着一个新的方向走去，尽管其运行的目标和过程尚不被时人所真正理解。

三、晚清时期西方文化传播的发展

1. 调和中西文化的“中体西用”观

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以来，所有提倡学习西方文

化的开明人士，不管自觉与否都无法避开西学与中学的相互关系这个问题。而且随着文化交流规模的扩大和层次的加深，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就愈加成了提倡西学的人不得不正面阐明的立论前提。调和中西文化的中体西用观便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孕育而生了。

“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发轫者是洋务运动时期就极力倡议“采西学”、“制洋器”，并已自觉到要把中学和西学的关系做出安排，拟制出一种“主辅”说的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明确提出：“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①这里的“诸国富强之术”就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历学之术”、“格致之理”、“制象之法”。所谓“伦常名教”，就是儒家传统的道德规范和伦理观念，是封建统治者所规定的不可侵犯的最高社会生活准则。冯氏这一论述被许多人看做“中体西用”文化观的雏形，它首创以“中体西用”的论式来提倡西学，开了学西学的一代新风。

同时期启蒙思想家薛福成、王韬、郑观应等人都用相同或类似的词语表达他们对西学的态度。薛福成在开《筹洋刍议》的《变法篇》中说：“取西人器术之说，以卫我尧、舜、汤、文、武、周公之道。”王韬在其《韬园文录外编》中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当自躬。”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的《西学》篇中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

领略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和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的洋务派官僚，也一厢情愿地期望以西方科技之用与中国文化之体两相结合，建构成一种新的文化结构。曾国藩提出欲中国渐自强必须“使西洋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清悉”。^②同时，他又以孔孟之道

^①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612辑，第151—152页，文海出版社。

^②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32。

的信徒自居，对于“正学”、“道统”，则视为万物不变之圭臬。李鸿章在派学生出洋的“应办事宜”中说：“老查中学西学，分别教导，将来出洋后，肄习西学，兼讲中学，课以考经、小学、五经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上之义，庶为囿于异学。”^①

虽然他们各自对西学的含义和内容理解不完全相同，但实质是一样的，即“中体西用”的理论。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体系可分论，其基本精神就是接受或采纳西方文化的某部分并整合进自己的文化中。“中体西用”论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信誓旦旦地确保“伦常名教”所代表的政治秩序和伦理信念不变的前提下，主张破除陈规习见，采用西方近代文化成果以为富强之术，形式上的重点是在强调中学为体，事实上的重点是在强调西学之需“用”。在洋务派与守旧派的文化论战中得以逐步定型的这一文化论式为支持办洋务的人们打破迂腐顽固的卫道士们的借口，为学习西学、输入西学冲开了一条新的河道。

最早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字不差地表述出来的是沈寿康（即沈毓桂），他在1895年4月第75期《万国公报》上发表的《匡时策》一文中说：“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次年8月，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摺》中说：“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② 将时人有关这项主张同神异词的话一起搬了进去。

最初的体用观中，所谓“体”，指的是中国传统“政教”，“用”指的是西洋之“艺”。19世纪后期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的

^①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19卷，第9页。

^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426页。

“中体西用”观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由极其狭隘的“体用”扩展成较为广泛的“体用”，即将西人之长技从“西艺”扩展到“西政”。1875年，在总理衙门任职的郭嵩焘于《条议海防事宜》中明确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强，又末中之一节也。”^①官至两广总督的张树声虽仍固守着传统文化的防线，但已经认识到西方除物质层面的科学技术以外，还有制度层面的学堂和议院，他在遗折中称：“西人立国，自有本有末，虽礼乐教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证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正因为“遗其体而求之用”，所以才“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②郑观应也开始认识到西人立国有体有用，“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③他不仅将“中体西用”观内涵扩大，而且看到“西政”之“体”与“西法”之“用”的趋同性和一致性。“新政”后期的激进思想家钟天纬极力提倡学习欧洲各国“通民情，参民政”那种“大本大原”，并高度评价西方格致之学的成就。^④

甲午一役，进步人士更清醒地认识到中西方之间的差距。战后，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热潮逐渐加温，而“中体西用”论也逐步成为包括守旧派在内的绝大多数人所能接受的时髦口号。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引进西学的重点应放在“西政”方面，“今日之学，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⑤他们不仅希望在维护君主

① 《福建按察使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洋务运动》（一），第142页。

② 何嗣焜编《张靖达公奏议》，卷8，第559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22辑。

③ 《郑观应集》上册，第223页。

④ 《格致之学中西异同论》，《刑足集·内篇》第71页。

⑤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9页。

政体的“中学”前提下，进行资产阶级政治改革，更有一些激进分子开始着重从“教”的内涵来检讨“中体”的地位。谭嗣同的《仁学》对“三纲”进行了空前的抨击，严复1895年3月发表于《直报》，1897年4月《时务报》又转载的《辟韩》一文，则公开批判了韩愈《原道》所维护的神圣君权。这充分说明他们所讲的西学已扩充达到“中体西用”理论难以容纳的地步。

为抵制激进分子的这些主张和言论，洋务派头面人物张之洞于1898年5月，刊布了他的《劝学篇》，对“中体西用”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发挥，这一文化论式终于成形了。

《劝学篇》分内外两篇，内篇讲中学，外篇讲西学。他界定了“中体西用”的内涵，“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①他认为向西方学习是一股不可阻挡的进步潮流，“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但必须以中学为根本，如“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烈于为通西学矣”。由此他指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于经文，而必无悖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②纵观全书他基本的主张在于明纲，认为三纲五常是立国之本，是“百行之原”，“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③所有的中国人都必须遵守，胆敢违反这种“千古不易之道”，则将“众恶而弃之”。

张之洞所指的西学包括西政、西艺、西史三类，“学校、地理、度支、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

① 《劝学篇下·设学第三》。

② 《劝学篇下·会通第十三》。

③ 《劝学篇上·明纲第三》。

医、声、光、仪、电，西艺也”。他所提倡的“政”不同于当时激进分子提出的议院、君主立宪制等政治体制，而是西方学校农工商制度。

《劝学篇》的“中体西用”文化观在客观效果上阻碍了虽支离破碎但毕竟令中国人耳目一新的外国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因而遭到时人和后来者的强烈反对。但张之洞的努力无疑挽救了传统文化的危机。平心而论，他的这些主张较龚、林、魏甚至早期改良派和洋务派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学习西方显然是前进了一大步。可以这样说，张之洞对中西文化自冲突以来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做了那个时代较为圆满的回答。

“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中兴起的一种旨在提倡西学，融合中西的独特的文化观念形态，也是当时先进人士为学习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而做出的一种重要的理论概括。这一文化观的问世在洋务运动时期对于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开阔人们的视野，引导人们追求新知，对于传播西方近代文明，对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起到了标新立异的积极作用。不过，随着危机的日益加深，随着人们对于中国贫弱症结认识的加深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富强成因认识的加深，“中体西用”这种论式的局限性便日益显露出来。洋务派中的激进人士所提倡的西学，范围日益扩大，层次逐渐加深，从而就把“中体西用”论的内容一步步扩大到了这种理论形式难以容纳的地步。当着要求全面地从“大本大原”处学习“体用兼备”的西学时，“中体西用”论式因其自身存在的矛盾和固有的局限，逐渐丧失了它原本的进步意义，并显现出以“西方的盔甲来保护中国封建主义躯体的意味”。^①

调和中西文化的“中体西用”文化观是中国文化史上处理中西文化关系这个重大问题的第一次尝试。事实证明，它在传播西方近代文明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虽然因自身的局限性和内在

^① 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第409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的矛盾，无法构成一种严整的新型的文化观念体系，但就文化观的传承和学理逻辑的衍化而言，本质上正确的“会通中西”文化观，恰好是由本质上错误的“中体西用”文化观启导出来的。

2. 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1895年，中日甲午一战，洋务派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这一残酷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仅从自然科学技术层面学习西方文化，根本不能使中国走向富强。

曾经游学英国的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受到甲午战争失败的强烈刺激，感到“国祸益深”，“腐心切齿，欲致力于译述以警世”。1895年间他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及《救亡决论》等重要论文，初步介绍了进化论观点和西方政治思想，在号召国人救亡图存的同时，从理论上揭示了洋务派学习西方失败的思想根源，在对比了中西政治、学术异同优劣的基础上，针对洋务派“中体西用”理论，创造性地提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①从而论证了变法维新的迫切意义。

严复以深邃的洞察力从理论上对洋务派“中体西用”文化观进行严厉的批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动不揣其本原，而徒欲仿行其末节”，^②并进而指出，体和用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二者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洋务派根本没有认识到中西两种文化体系有其独立性，不可支离割裂地移植；而要把三纲五常与西方的科学技术生硬地结合起来，这种“求用而不求体”的做法，当然是缘木求鱼。

严复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强盛并不在于“般坚炮利”之类“形下之粗迹”，也不在于“善会计”、“善机巧”之类的注意功利

^① 马勇：《严复语萃》，第80页，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

^② 王遽常：《严几道年谱》，第14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事务，真正的命脉所在正如他在《论世变之亟》中所说的，“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黜伪而崇真”就是崇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法，“屈私以为公”就是提倡民主政治制度，这是对科学与民主口号比较笼统的提法。严复认为，这两种价值观念跟中国的理道本来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由于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自由。这样一来，严复就将西方之所以富强，中国所以贫弱的根源最终归结于自由的有无。严复认为，自由是西方资本主义立国之本，是“体”，民主是自由的表现形式，是政治上的应用，是“用”。“是救中西二治，其相异在本源。治体之顺逆良桡，其因；而国势之强弱，民生之贫富，其果”。^①那么，为什么自由是中弱西强的分水岭呢？因为：

第一，自由与否带来了中西文明的巨大差异。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写道：“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重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福灾也，中国委犬数，而西人恃人力。”^②

严复从政治、伦理、经济、为学、民俗等方面对比了中西文化，言简意赅，显奥发微。他指出，正是由于思想基础不同，中国没有“自由”观念，才造成中西文化如此大的差异，在这里，褒贬是不言而喻的。严复的这种说法在理论上欠妥，它忽视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但严复把自由抬到天理的高度，认为“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这有一定的启蒙意义。

① 马勇：《严复语萃》，第72页。

② 王祿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3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第二，从“物竞天择之道”来看，自由可以释放民众的活力，提高国民素质，是国家富强的必要条件。

严复的逻辑是这样的：首先指出国家的强弱取决于国民素质。他认为：“天下之物，未有不本单之形法性情以为共聚之形法性情者，是故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①“盖生民之大要有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反是而观，夫苟其民契需恂督，各备其私，则其群将涣。”^②不难看出，严复将个体潜藏的德、智、体三方面的活力视做国家富强的保证。

其次，严复指出，只有在自由条件下，个人活力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严复以为西洋“一洲之民，散为七八，争驰并进，以相磨砢，始于相忌，终于相成，各殚智虑，此既日新，彼亦月异”，^③个人活力在这种自由、相互竞争的环境里得到充分发挥。从西洋人的事例中，严复发现：自由是个体质提高的产物。由此，严复通过缜密的分析认定，“夫所谓富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但当时中国人民民智未开，还不具备自治的能力，所以“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则乱”。^④从人民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人民和国家关系的角度，即从民为主还是君为主，为谁而战，为谁而斗的角度提出问题，指出，专制制度是民族危亡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严复站在时代发展的前列，以时代启蒙者的眼

① 王株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25页。

② 同①，第38页。

③ 同②。

④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第80页。

光，力求运用近代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提示西强中弱的原因，以探求中国社会结束腐朽落后的封建历史、实现救亡富民强国的道路。虽然限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以及严复本人阶级和认识的局限性，没能从生产方式上去看待中西文明的差异；没有能识破资本主义自由平等这些口号的虚伪实质，觉察不到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剥削的真相及其残酷性质；也观察不到资本主义的掠夺本性，无法认识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是近代中国一切灾难和祸害的总根源；严复没能在理论和实践上把民权思想贯彻到底，而是把当时尖锐的反封建专制斗争归结为一般的开明智、新民德、鼓民力的教育任务。但，严复有针对性地批判“体用主辅”之谈，创造性地提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口号，发前人所未发，把自由抬到“天理”和“人道”的高度，运用多层次的文化比较观，深入浅出、明晰快捷地道出了中国贫弱落后、西方富强先进的根本原因所在，这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开化人们的头脑、教育大批国人的作用。他还从进化论观点出发，强调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重要性，为引进西方文化，扫除了思想障碍，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无论从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深刻揭露和猛烈抨击来看，还是从对自由、平等、民主法则的热切探求和积极宣传来看，严复都不愧为那个时代“先进的中国人”^①的一个代表。

3. 西学的广泛传播及影响

19世纪60年代中国已有“西学”出现。然而当时留心于海外事物的中国知识分子毕竟是少数，而且西学传播者大多是西方传教士。因此，那时的西学往往只是零星、片段，甚至掺杂着一些宗教迷信成分，其影响范围也仅限于沿海地区。但是，第二次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75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鸦片战争结束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一部分领略到西方“船坚炮利”的封建官僚逐渐从统治者阶层分化出来，并以“中体西用”为宗旨，举办了一系列洋务事业，促进西学的引进和传播；1858年，《天津条约》规定了各国在华传教士的权力，于是传教士再度大批来华，从而使西学传播事业日趋活跃；民间也有一部分有识之士自发进行西学传播活动。由此形成以官方洋务派为主，教会次之，民间又次之的西学输入和传播结构，并以比较平稳的速度向前发展。

洋务派通过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翻译西书，沟通了西学传播的渠道。但是，洋务派的西学教育和传播机构，在甲午战争以前是凤毛麟角，而且洋务派只是从“器”的角度认识到引进西学，所学只是自然科学、外语、军事技术。因此，这时期洋务派的西学输入和传播，除了对中国近代工业和军队发生实际影响外，其他各方面的影响没有充分表现出来。但更重要的是，洋务派的所有工作，为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奠定了基础。

西方传教士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大批涌入中国，同时加紧进行以文化渗透和竞争为目的的侵略活动。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传教士在所到之处投入大量财力、物力、人力兴建教堂、学校和医院等机构。据一些资料估算，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各地开办的各类教会学校，已有一千多所，学生约二三万人。^①来华西人在出版书报方面成绩也很显著。从出版情况来看，到1890年外国传教士和教会在中国出版的报刊就有76家，比1860年增加了1倍。同时期以教会名义编印出版的中文书籍达1000多种。^②

以西方传教士为主体的西人文化活动，虽然主观上都是为了

① 李长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1卷，第654页。

②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第19页。

更好地推行他们的炮舰政策和文化侵略政策，但客观上在介绍和传播西方文化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对中国社会有较大影响。

甲午战争以前，民间已有部分有识之士自发进行西学传播活动，这构成当时社会西学传播的第三条子系统。

19世纪50年代起，在香港、广州、上海、汉口、福州等地已出现中国人自办的现代化报刊。到80年代末，中国人主办的报刊达12家之多，参加创办这些报刊的，多数是亦官亦商或亦绅亦商的人物。这些报刊中除了在香港出版的以外，在内地城市出版的一般寿命只一二年，最长也不过五六年。尽管如此，这毕竟是中国现代化报刊的萌芽，而且成为人们了解西方世界的一个窗口，对西学传播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时期也有一些中国人介绍西方状况的书籍问世，以容闳的《西学东渐记》、薛福成的《出使西国日记》最为著名。

在西学东渐之风的吹拂下，民间一些旧式书院开始教授西学的内容，甚至在一些通商城市，民间人士开办的规模较小的私塾式西式学堂也有出现。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附近的长兴里聚徒讲学，就是以他对古代典籍的熟识博学，结合从西学书籍中得到的西学知识，“与诸子曰夕讲业，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① 综上所述，甲午战前，在洋务派、西方传教士、民间有识之士这三股力量的推动下，西学传播取得一定成绩。社会上废科举、兴西学的呼声日益高涨，有的人提出，当今之世，西学已成为读书人所必备的基础知识，“既为读书之人，凡翻译浅近诸书不可不阅，各国地理全书不可不观”，^② 仅知中学而不通西学之人，已属不识时务的落伍者。在这种情况下，1887年清政府正式批准科举乡试增开算学，这标志着算学及其所代表的西学得到清政府在制度上的正式确认。这对于民间学习

^① 赵丰田：《康长素先生年谱稿》，见燕京大学《史学年报》第2卷，第1期。

^② 《申报》1888年7月4日，《识时务者为俊杰》。

算学及西学具有一定的鼓舞作用。于是，在民间，尤其是通商口岸地区形成一股兴西学的热潮，甚至这股西学之潮已经进入了清廷的深宫重闱之中。光绪帝曾索阅《万国公报》及其他西方科学书籍，而且社会上出现了综合性、普及性西学书籍——《西学大成》一书，它涉及数学、天文、地理、历史、军事、化学、矿业、物理等西方近代科学的各个领域。它的出现正是适合当时人们希望速成、综合地了解西方各科基本知识的需要。

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流传日广，促进了中国人吸收西方文化，并对中国文化进行新的创造和发展，出现了中西学相结合的汉语拼音、语法、数学及医学等书。如1892年卢戇章撰中国第一部汉语拼音方案《新字初阶》，该方案以闽南方言为语音标准，以拉丁字母为拼音字母，采用左起横写的书写方法。因此，这也是中国近代第一本横排书。马建忠参考拉丁文语法编写的《马氏文通》是我国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语法专著。邹立文撰《中西记通医经精义》，主张吸收西医解剖学和西药学的成果。这些书籍的出现反映了中西文化经过几十年的接触和融合，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已有越来越多的人用理性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并已在进行着融合西方文化来创新中国传统文化的事业。

洋务运动时期的西学传播虽取得一定成绩，但总体来看，发展缓慢，人们对西学的了解和介绍也不全面。这主要是因为一是传统文化的影响，一是科举制度的存在，再就是当时西学的主要输入者和传播者（洋务派和西方传教士）的特定因素。这种状况到19世纪90年代的最后几年，即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发生了变化。

甲午战争的惨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因而也就同时标志着由洋务派为主要推动力的西学输入阶段的结束。同时它也标志着中国民族危机的急剧恶化，从而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推上历史舞台。随着维新运动的兴起，资产阶级维新派通过办报刊、办学堂、开学堂、译西书，在思想界、文化界掀起大飓风，逐渐掌

握了传播西学的主动权，并推动着清末西学输入和传播在更高阶段上发展。

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以宣传变法，激发民智为目的兴办了一些新式学堂。据不完全统计，1895年至1899年的5年时间，新创办的学堂达到了107所，比甲午战争前有成倍的增长。战前只有7个省份有学堂，战后学堂已分布在包括云、贵、川、陕在内的17个省份，不少府州县内也办起了学堂。^①而且这个时期还出现了由维新派所创办的中国最早的女学堂。另外，一些学堂在教学内容上也有所突破，如在西学课程中增添政治伦理学方面的内容，在中学课程中废除了八股词章，增加了掌故史地、通鉴、律法等方面的内容。

维新派还通过办学会，办报刊组织、教育维新志士，宣传变法思想。据统计维新运动期间全国各地学会达六七十所，^②著名的有北京、上海的强学会，湖南的南学会等，不少地方还成立“不缠足会”和一些专门学会，如农学会等。与学会团体活动相辅相成的是办报活动。如北京强学会办有《中外纪闻》，上海强学会办有《强学报》，湖南南学会办有《湘报》和《湘学报》，等等。

其中由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影响最大，成为维新派的舆论核心，在《时务报》的带动下全国各地出现了办报高潮，上海除《时务报》，还有《指南报》、《苏报》、《华报》，江苏有《集成报》、《富强报》，广州有《博闻报》、《中外新报》等，天津有《直报》、《译报》、《国闻报》，澳门有《知新报》、《杭报》，总数达七十多种。

维新派在积极创办新学堂、学会、报刊的同时，将翻译西书

① 乐正：《从学堂看清末新学的兴起》，《中国近代文化问题》，《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编委会编，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② 张玉法：《戊戌时期的学会运动》，《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

视为“第一义”。^① 1895年成立的强学会，既是改良派的第一个政治组织，也是第一个译书机构，故又称为强学书局。此后，大批译书机构相继出现于各地。如译书公会、大同译书局、东亚译书局、新民译书局等。大同译书局是维新派的主要编译出版机构，曾印《大帝彼得变法考》、《经世文新编》、《日本书日志》、《孔子改制考》等书。但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各书局并未出多少书，像严复的《天演论》，章太炎、曾广铨的《斯宾塞尔文集》一类有价值的译书，可谓寥若晨星。溯其缘由，乃因译才甚缺，通才绝少，直到1902年后游学日本的青年学生成长起来时，才有所改变。而在此期间，社会上出现了十几部综合性、普及性的西学丛书，如《西学富强丛书》（1896年，富强斋主人辑）、《西政丛书》（1897年，梁启超辑）、《质学丛书》（1897年汤寿潜编）等。这些丛书基本上按西学学科分类，收录或剪辑了当时或在此以前的报刊文章或译籍，新译不多，但适合当时人们希望综合了解西学基础知识的需要，因而这对西学的普及也是有重要作用的。

综观此期的西学输入和传播情况，西学自然科学在这个时期仍为输入的主流，法政等社会科学译书有所增加，西方哲学方始东渐，最大的特点就是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其主要的推动者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按照自己的政治需要把接触到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社会学说，介绍到中国来和中国的封建主义文化思想展开激烈的斗争，使后者遭到了空前的挑战，从而使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得到了一次很大的解放。

^① 梁启超：《读日本书日志书店》、《饮冰室合集》，第1册，第50页。

四、晚清时期西方文化传播的新阶段

1. 从日本转介西学

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全面学习西方，并卓有成效，已引起了中国人的注意。从日本转介西学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心声。

在民族危机的强烈刺激下和维新派以及洋务派张之洞等人的鼓吹下，清政府被迫选派大量官费留学生，并鼓励青年学生自费出国留学。从1896年清政府选派唐宝锷、朱忠光等13名青年学生留学日本起，留日学生人数逐年增多。据李喜所统计，1901年有274人，1902年608人，1903年达13000人，1904年2400人，1905年达到8000人，1906年达12000人，后来略有减少，但到1909年仍不下3000人。^①留日之风几成一种社会风尚。“沿海苏浙粤东诸省，留学之盛，至于父遣其子，兄勉其弟，航东负笈，络绎不绝”。^②这些留日人员则成为从日本转介西学的主体。

这一时期从日本转介西学的主要载体是译书。早在1897年罗振玉等人在上海农学社时，就以其机关刊物《农学报》为阵地，组织人才翻译了一批日本出版的农业科技书籍，揭开了中国人翻译日本书的序幕。随着大量中国学生东渡求学，在留学生中出现了译书热潮，各种形式的加入日本特色的西学知识，以译书为载体，向中国滚滚涌来，诚如梁启超所言：“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日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而日本以接壤故，赴者尤众。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则数十家，新思想之

^① 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第127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 《游学译编》，第6期。

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同，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①

从译书出版机构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沿海城市与留日人员中，雨后春笋般冒出许多出版机构，很多是集翻译、出版为一体。先前业已存在的出版机构，亦竞相翻译、出版日文书籍。据熊月之统计，从1896到1911年，中国和留日人员中翻译、出版日文书籍的机构至少95个。^②其中57所设在上海，杭州、武昌等地也有一些，留日人员所办的译书机构主要设在东京。这一时期较为著名的翻译出版日文书籍的机构有以下几家：

商务印书馆，1897年2月夏瑞芳等人在上海创办，是中国最著名的出版机构。所出译自日文的书籍，有各种教科书如吉田彦六郎编、杜亚泉译的《化学教科书》，大幸勇吉编、王季烈译的《改正近世科学教科书》，杉荣三郎的《经济学讲义》，等等，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科学书籍和政法文史类著作。

湖南编译社，1902年黄兴等人创办，这家译书社前后译书不下50种，另外还办有杂志《游学译编》。

此外，还有曾出版由留日学生范迪吉等翻译的《普通百科全书》的会文学社和由福建留日学生创办的闽学会等。

从译书数量来看，自1897年以来日书中译数量急剧上升，据不完全统计，从1896年至1911年，15年间中国翻译日文书籍至少1014种。^③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此前半个世纪中国翻译西文书籍数字的总和。以1902年到1904年为例，所译日本书321种，占全部译书的60.2%，^④即使译自西洋诸国者，也主要是留学生从日本重译过来的。由此观之，从日本翻译过来的东西委实

① 《清代学术概论》，第71页。

②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641页。

③ 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第202页。

④ 同②，第640页。

不少。

从译书种类上来看，这一时期译自日文的书籍种类繁多，内容十分丰富。^①

哲学方面，井上圆了著、蔡元培译的《奴怪学讲义录》，德国科培尔原著、下田次郎译、蔡元培重译的《哲学要领》等，第一次较为完整地将西方哲学体系介绍到中国。

伦理学方面，中岛力造著、麦鼎华译的《中等教育伦理学》，木村鹰太郎著、范迪吉译的《东西洋伦理学史》，法贵庆次郎著、胡庸浩译的《伦理学》，乙竹岩造著、赵必振译的《新世界伦理学》等书将西方伦理学系统地介绍进中国。

法学、政治学方面，译作最多，成效最大。比较著名的译作有高田早苗著、稽镜译的《国家学原理》，市岛谦吉著、麦曼荪译的《政治原论》，孟德斯鸠著、何礼之译、张相文重译的《万法精理》等。这些译作将西方国家观念、国际观念、法制观念、天赋人权观念、权利义务观念、自由平等观念，集中而具体地介绍进中国，对中国政治、思想和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历史学方面，除一般通史和各种专门史以外，出现了许多变法史、革命史、独立史、亡国史、文明史、外交史等方面的译著。如高山林次郎编、商务印书馆译的《万国通史》，北村三郎编、程树德译的《印度史》，斋藤阿具编、林长民译的《西力东侵史》等。

社会学和一般社会科学方面，出现了介绍社会进化论、社会主义、帝国主义等学说的译著。其中幸德秋水著、赵必振译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是中国第一部批评帝国主义的专门译作。岸本能武太著、章太炎译的《社会深究》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社会学的译作，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的《近世社会

^① 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41页，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

主义》是中国系统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一部译作。

自然科学方面亦有不少佳作，如稻垣乙丙著、范迪吉译的《植物营养论》，泽田吾一著、赵繅译的《微分积分学纲要》，朱宗莱校著、陈晃译的《物理易解》等都曾被重版翻印。

总体来看，这些译书以政法和人文科学书籍为主，应用科学、自然科学分量减少。据《译书经眼录》统计，1901—1904年国内共译书533种，其中社会科学和文学类的就占到3/4。^①这是因为在甲午战争以及戊戌变法之后，人们逐步认识到西方不仅在“器物”方面优于中国，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制度上比中国先进。于是中国的知识界和学术界就把兴奋点放在西方的思想和文化方面，留日生“所学者，政治也，法律也，经济也，武备也，此其最著者也”。^②所译书籍当然也以文科为主。

除译书外，名目繁多的报纸、杂志也是转介西学的载体。自1900年《译书汇编》创刊始，留学生纷纷结社发行刊物，如《游学译编》（1902年）、《大陆》（1902年）等。与此同时，流亡日本各党派集团的新型杂志以及大陆的新型杂志也开始出现。如《新民丛报》、《民报》、《新世界学报》（1902年）、《大陆报》（1903年）等。据容应萸统计，1898—1911年间，仅留日学生创办的杂志就达70种之多。^③由于杂志出版周期较短，又较书籍易于销行，能尽快地将各种译著送到读者面前，因此这一时期的杂志以其丰富的内容，较强的辐射力，有力地推动了西学的输入。

虽然留日人员对西学转口输入所做的贡献是主要的，但日本学者在此方面的作用和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① 梁启超：《敬告留学生诸君》，《饮冰室文集》卷17。

②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第100页，中华书局1957年版。

③ 容应萸：《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华书局1994年版。

为了向日本学习，在大批留学生东渡的同时，很多日本学者也应聘来到中国。一些学者持“开通中国人风气”的信念，在中国亲自开办了一些学校。其中重要者如杭州的日文学堂（1898年），泉州的彰化学堂（1899年），天津的东文学堂（1899年），厦门的东亚学院（1900年），南京的同文书院（1900年），南京的本愿寺东文学堂（1901年左右），北京的东文学社（1901年）和上海的留学高等预备学堂（1905年）等。这些学校除了教授日语外，亦开通普通学科，而且分普通科和速成科，修业年限也大致与日本专为留学生而设的学校相同。^①

日本人在中国所办的学校，成为一种示范和仿效的典型，因此，中国人招聘“日本教习”在庚子事变后，渐成一种风尚。几乎全国各地每所学堂都有一两名日本教习，最多时全国约五六百人。^② 这些教习之中，不乏知名人士，如东京大学教授服部宇之吉和冈田朝太郎，京都大学教授岩谷孙藏等。所有的日本教习一般通过翻译进行教学，传播了当时被认为先进的西学。

此外，日本学者在汉译日文书籍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897年以前，在中国流行的日本书主要是由日本学者翻译过来的。1896年《时务报》的日文汉译就是由古城贞吉负责的，此后，亦不断有日本人的汉译书籍出现。如《实业教育》（上冈市大郎等汉译）、《爱美耳钞》（〔法〕卢梭著，中鸟端汉译）、《费尔巴尔图派之教育》（中鸟端汉译）等。1902年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从日文编译出版了各种教科书，其编辑长就是日本原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长尾植太郎。

总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以日本为跳板和模板向西方学习。以东渡留学和聘请日籍教师为途径，以译书、报纸、杂志为载体，从日本引进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和科学技

① 周一良：《中日文化关系史论》，第138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②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70页，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

术。这些转口输入的西学，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的政治变革和思想变革，也使中国文化在一些方面受到了日本的影响，诚如郭沫若在《中日文化的交流》一文中所说：“中国就是这样地倾力向日本学习，又通过日本学习西洋的文化。由于当时受到某种客观的条件限制，中国的资本主义阶段的革命并未成功。但向日本学习的结果，却有巨大的收获。这个收获，既有助于打破中国古代的封建的因素，同时又促进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作用。换言之，近代中国的文化，是在很多方面受到了日本的影响的。”

2. 民主共和思潮的兴起

19世纪末，与政治斗争的形势完全一致，当时充当思想舞台主角的，是与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作斗争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君主立宪思想。此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共和思想已初露端倪。他们主张通过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推翻清王朝，建立一个纯粹的民主共和国。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在《兴中会章程》所附的秘密誓词中，孙中山明确写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合众政府”就是以美国为模式的民主共和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推翻封建专制，实现民主政治的口号。但是，由于当时孙中山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少数华侨当中，更由于当时的中国还缺乏接受这一思想的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那时以及整个戊戌变法时期，民主共和的革命思想较君主立宪的改良思想而言，仅作为支流存在于思想界，没有很大的号召力。

留日风潮兴起以后，以西方民主政治学说和各国民主革命历史为主流的西学从东方蜂拥而来，对中国知识界产生很大影响。庚子年间的社会大动乱，以及随之而来的八国联军的大侵略，使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本质，坚决抛弃了对清政府或地方官僚的幻想，开始倾向于革命。1901年，《开智录》、《国民报》等刊物就曾著文指出，清政府既然甘心充

当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那么，“待今日之政府官吏以图存”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欲立新国乎？则必自亡旧始”^① 惟一的出路在于革命。随后，《游学译编》、《大陆》、《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童子世界》、《江苏》等倾向革命的刊物陆续出版，上海一家原来偏于保守的《苏报》也转而宣传革命。到1903年拒俄运动发生后，许多人意识到中国专制政体的清廷是中国复兴的障碍，于是“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至此萌发矣”。又有一批新的革命报刊如《国民日月报》、《党民》、《中国白话报》、《女子世界》等相继问世，同时，一批宣传革命的书籍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样革命派的民主共和思想迅速传播开来。

革命派以孙中山“创立民国”的民权主义为旗帜，从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武库里搬来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等思想武器，严厉批判封建的专制制度，反复论述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首先，革命派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的原则出发，利用报纸杂志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和道德观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他们驳斥了君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反动说教，宣称国家的主人不是皇帝，而是“国民”，封建专制政体是“侵略国民之公益，剥削国民之权利之利斧也”，皇帝专权就是把中国弄到亡国灭种边缘的主要因素。他们抨击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礼教，认为礼教并不是人类“固有之物”，而是“圣人”制定出来的，历代的“独夫民贼”加以利用，作为奴役人民精神枷锁。他们控诉说：“礼之耗人血，消人气，不致死亡不止。”谴责那满口仁义道德的封建卫道士是一群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因此，他们呼吁人们奋起推倒皇权制度，建立所谓“公天下”的资产阶级共和制

^①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67、92页。

度，只有这样，国才昌，民才强。“故人生当文明之世，公理既明，权利之观念既强，未有不求去专制政体者也”。这就是说，推翻封建专制政体，争取人生的合法权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天赋的正义的使命，这就为他们的革命举动披上了一层五光十色的令人神往的面纱，吸引了亿万向往美好生活的民众。

其次，革命派为民主共和国描述了一个美好的蓝图，“一国主权平民操之，万般政务舆论决之，政治之主人则属一国之平民，政治之目的则在平民大多数之幸福，政治之策略则取平民之公意。国中有国民面无臣民，有主人面无奴隶，一国大多数之平民莫不享有公权，法律之外无论何人均不得面剥夺之，面人之天赋权能得以保存不失”。这种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歌颂，虽然有很大的空想性，但反映了爱国青年对民主要求的渴望。

当时在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方面影响最大的是邹容和章太炎。1903年，留日学生邹容从日本回到上海后发表了脍炙人口的《革命军》，以洋洋两万言的篇幅，深刻揭露了清政府的腐败，并以满腔的热情歌颂革命，歌颂民主，大力赞扬和鼓吹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主张用革命手段“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恢复人民应当享有的民主权利，详细提出了建立“中华共和国”的方案。《革命军》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风行海内外，各地翻印时或改名为《革命先锋》，或改名《国存篇》，或改名《救世真言》，销售逾百万册，占清末革命书刊销数的第一位，对民主共和思想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邹容发表《革命军》的同时，章太炎在上海《苏报》上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猛烈抨击了康有为宣扬的“中国只可立宪，不可革命”的论调，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他歌颂革命为“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认为现在提倡革命，必然要提倡“合众共和”，“在今之世，则合众共和为不可已……以合众共和结人心者，事成之

后，必为民主”，相信在革命之后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建立民主共和制度。

孙中山从1903年起对民主共和思想的宣传极为重视，几乎是每会必讲。1903年，他在对华侨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们必要倾覆满洲政府，建立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①更加清楚地描绘了未来国家的民主色彩和政体形式。

在革命派广泛宣传和孙中山一再倡导下，民主共和思想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蓬勃兴起。“出保皇党人革命党者，不可以千数计”。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最高理想的革命团体纷纷出现，如1904年黄兴、陈天华等人在长沙成立的华兴会，蔡元培等人在上海成立的光复会等。为适应国内革命形势的需要，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联络会党在1905年8月合并组成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这是第一个全国性的具有政党性质的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同盟会以“尤在废除专制，创造共和”^②为最终目的，仿西方民主国家三权分立的形式，分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评议部是议会的性质，确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政治纲领。至此，“建立民国”即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正式被确立为全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共同奋斗的宏伟目标。同年底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创刊，公开宣布以“倾覆现今之恶劣政府”，“建立共和政体”和“土地国有”^③为主义，并以此来充实资产阶级共和方案，孙中山还宣布要将三民主义“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

而真正将民主共和观念广泛传播，使之深入人心的是以孙中

^① 孙中山：《在檀香山埠荷梯厘街戏院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6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② 《中国国民党党史稿》第1册，第47页。

^③ 《民报之六大主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383页。

山为首的革命派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在政治思想领域的论战。这次思想交锋自1900年出现，1905年《民报》创刊后形成高潮。论战双方以《民报》和改良派的喉舌《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进行论争。中国向何处去？是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还是以改良的、和平渐进的方式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改造，使之完成向君主立宪政体的转化？这是革命派和改良派进行这场大辩论的焦点。

革命派首先系统地驳斥了改良派的满汉早已平等之说，认为：革命必然杀人盈野，血流成河；革命困难，立宪容易；革命必生内乱，必遭瓜分，必然亡国等一系列谬说，全国揭露了清朝政府残民卖国的罪行，旗帜鲜明地认为革命有百利而无一害，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

其次，革命派用“取法乎上”批判改良派的“循序渐进”，声称自由、平等是人的本性，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决不会没有实行民主共和的能力，国民的政治程度虽低，但和“不辨菽麦”的皇帝及“蝇营狗苟”的大臣相比，“固已优之万万”，所以政治改革不能期望政府，而应“专望之国民”。他们认为，通过革命实践，国民的政治程度可望迅速提高，在推翻清朝统治之后，一定能够建立世界上最完善的“共和政体”。

这场激动人心的大辩论以革命派的胜利告终。通过这场辩论，民族觉醒的意识、民主共和观念开始逐渐深入人心，反满——革命——建立共和国，在人们心目中成为同一链条上紧密相连的几个环节。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受到当时进步人士的普遍拥护。这一思想成为日益扩大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共同奋斗的目标。1907年，《新民丛报》一篇文章中说：“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中国，今则得法理论、政治论以为之羽翼，其旗帜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败夫走

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①很显然，革命派的民主共和思想在思想舞台上居主导地位。

在借鉴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总结前人特别是近代以来的经验基础上产生的民主共和思想把民主和革命有机地结合起来，第一次举起民主和革命的大旗，为在黑暗中彷徨、求索的爱国志士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鼓舞了斗志，也为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奠定了一定思想基础。

^① 《辛亥革命前十年同时论选集》第2卷，第607页。

第三章 “广西国之学于中国”

一、广学会的成立

1. 一脉三会

晚清中外文化交流中，翻译、出版西学书刊的机构最有影响的主要有三大大家，即 1862 年成立于北京的同文馆、1867 年冬设于上海江南制造局内的翻译馆、1887 年在上海成立的广学会。其中广学会以其出版的神道、哲理、法律、政治、历史、时事、教育、实业、天文、地理、博物、理化等十几方面两千多种图书，对中国知识界和社会各阶层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名列三大大家之首。而广学会的成立与益智书会（The 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直译为“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苏格兰同文书会（The Chinese Book and Tract Society，直译为“中文书刊协会”）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

益智书会是 1877 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决议成立的，是为了适应教会教育的发展和洋务运动对西式人才的需求。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教会教育进入大规模发展时期，到 90 年代末，教会学校由 800 多所增至 2000 多所，学生由 2 万人增至 4 万人以上。教会大学也在逐渐形成，如著名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原上海约翰书院）、东吴大学（原上海中西书院）、岭南大学（广州格致书院）都在这时开办。70 年代后，洋务运动开始了兴办民用工业的热潮，新兴的企、事业急需大批西式人才。由于传授西方科

学知识是教会学校的课程之一，有相当一部分出自教会学校的西式人才应需而人。这不仅推动了教会教育的发展，也促使基督教各差会对以往的办学模式进行了总结。当时估计，从1810年到1875年传教士在中国编写了1036种书刊，几乎全部属于圣经、圣诗、祷文、教义之类，这就难以适应当时需要。在传教士大会上，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提出编辑世俗教科书的建议，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也提交了一份关于教会世俗出版物的报告，号召传教士撰写有关世俗知识的教科书。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韦廉臣建议建立一个组织常设上海，专门处理教科书出版事宜。大会文字工作委员会就此提议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准备一套初级教材，以适合目前教会学校的需要”。大会通过这个提议，由基督教在华各教派联合组成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产生了。狄考文、丁韪良、韦廉臣、傅兰雅、林乐知（Allen, Young John, 1836—1907年，美国监理会传教士）、黎力基（Lechler, Rudolf, 1824—1908年，德国巴色会传教士），被推荐为委员，负责编写、组稿、出版事宜。韦廉臣任干事。

益智书会成立后，对教科书的编辑方针做了明确规定：

(1) 教材分初、高级两套。一套供初级学校使用，由傅兰雅负责；一套供高级学校使用，由林乐知负责。

(2) 用浅显的文言文撰写。

(3) 不要直接翻译，而应选择最好的著作，结合中国的风俗习惯和文字特点进行编译。

(4) 书籍不仅可以作为学生的课本，而且还可以作为教学参考书。

(5) 鉴于这些书籍将来可能为教外人士采用，“因此，最主要的是，课本不仅要有严格的科学性，而且应利用每个机会引导读者注意有关上帝、原罪和拯救的伟大事实”。

(6) 书中的科学名词和专业术语与过去出版的著作或益智书会统一的译法一致。

(7) 选题范围应包括数学、天文、测量、动植物学、地学、化学、医学、历史、地理、哲学、语言学、教学法以及各种教学图表。

益智书会自成立至 1890 年的 13 年中，共出版教科书、教学图表等共 50 余种，3 万多册，详见表格：^①

类别	种数	类别	种数	类别	种数
地理地质	5	医学	3	法律	1
哲学	3	历史	4	物理学	5
神学	4	植物学	2	矿业	1
数学	1	机械学	2	其他	9
化学	2	水力学	1		
动物学	6	绘图	1	合计	52
天文气象学	1	音乐	1		

益智书会开办时其经费主要来自上海租界外商和清政府一些官僚的捐款以及出版教科书收回的利润，前者约占 46%，后者约占 54%。为了争取更多的经费，益智书会干事韦廉臣于 1884 年回到他的故乡苏格兰格拉斯哥，进行募捐。

韦廉臣，苏格兰人，1855 年由英国伦敦教会派来中国，在上海传教，两年后因病返回苏格兰。1863 年作为“苏格兰圣经会”的代表，再度来华，在烟台并深入内地传教。1877 年被任命为益智书会干事后，尽职尽责。他回到苏格兰后，在格拉斯哥城成立了苏格兰同文书会，英文直译为“中文书刊协会”，用募捐的钱购置印刷机器，在上海设厂印刷书籍。他还代表益智书会

^① 《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记录，1890 年》，第 712—719 页。

同格拉斯哥圣教书会联系，获得一笔赞助。同时圣教书会向韦廉臣指出，益智书会的性质和作用太狭窄。于是韦廉臣接受其建议，决定发起成立一个出版机构，其业务由单一的教科书扩大到包括基督教一般知识在内的各种科技知识。韦廉臣先派遣金多士 (McIntosh, Gilbert, 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 在华筹备。

1887年11月，韦廉臣亲自到上海成立了同文书会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直译为“在华人中传播基督教与一般知识协会”)，自任督办 (即总干事)。韦廉臣本想使苏格兰同文书会在经济上成为上海同文书会的“母会”，不料苏格兰同文书会因故解散，所余钱款、资产、印刷机器均转赠上海同文书会。1892年，上海同文书会在苏格兰的资助者开始用英文称它为广学会，1896年上海同文书会正式启用“广学会”名称，当年的年报也由“同文书会年报”改为“广学会年报”，1905年其英文名称改为“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直译为“中国基督教文学协会”。可见，广学会的成立是从编著学校教科书开始的，它与益智书会、苏格兰同文书会在创办宗旨、业务方针以及经济来源等方面一脉相承，不可分割。

2. 广学会的机构

广学会的成立应当说首倡者是韦廉臣，发起者是一些寓沪西人。其中商人16人，海关官员和外交官11人，传教士9人，其他3人。他们中英美国籍的最多，德国次之。参加广学会的传教士也分属于不同国家、不同宗派，是广学会的实际工作者，每个人的费用由各自的“差会”直接负责，广学会的工作属于无偿“奉献”。

广学会从创办时起，设有董事会，由经年会选举产生的主席、副主席、司库、总干事以及至少六位驻在中国的董事组成。所有董事是清一色的外国人，包括英美驻华公使、英美驻上海总领事、上海管

理租界的工部局最高官员。还有许多大洋行的经理(如怡和洋行、江丰银行、麦加利银行等)以及当时一些传教士的头目。当时比较闻名的传教士丁韪良、^① 李佳白、^② 花之安、^③ 艾约瑟、^④ 潘慎

① 丁韪良(Martin,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1827—1916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1850年来华,在宁波传教。1863年由宁波调往北京传教,1869年经赫德推荐,任同文馆总教习,兼授国际公法,在职25年。1898—1900年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1908年以后在北京从事传教及著述,1916年12月死于北京。除译著《万国公法》之外,主要著作还有《花甲记忆》、《北京之围》、《中国的觉醒》。宗教书籍中,以《天道溯源》最为著名。

② 李佳白(Reid, Gilbert, 1857—1927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1882年来华,在山东传教。1892年返美休假,向长老会董事部建议在中国传教应以士大夫阶级为对象,不要致力于下层。因建议未被采纳,遂与长老会脱离关系。1894年以独立教士身份回华,通过赫德、李提摩太结识了李鸿章、翁同龢等,次年加入强学会。1897年在北京发起组织尚贤堂以拉拢中国上层分子,1903年尚贤堂在上海正式成立,李佳白自任院长(后称总理),并先后主编《尚贤堂纪事》、《国际公报》等刊物,1927年死于上海。

③ 花之安(Faber, Ernst, 1839—1899年),德国传教士、汉学家。1865年到达香港和广东内地传教,1886年赴上海活动,1898年移居青岛,次年逝世。花之安被誉为“19世纪最高深的汉学家”,著有许多宗教和哲学著作,如《儒学汇纂》、《中国宗教学导论》、《孟子思想》、《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中国古代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哲学家孟子的学说》、《孟子的思想——基于道德哲学的政治经济学说》、《自西徂东》、《西国学校》、《德国学校论略》、《教化议》、《人心论》、《性海渊源》等。他对中国的植物学也有较深的研究,协助俄国著名植物学家贝勒编写《中国植物》一书,并写有《中国经书中的植物学》一章。

④ 艾约瑟(Edkins, Joseph, 1823—1905年),英传教士、汉学家。1848年来华任伦敦会驻上海代理人。1863年到北京传教,1880年被聘为海关翻译,初在北京,后到上海任职。艾约瑟对中国文学和历史学有广泛的知识,其著作对中国知识界有一定影响。如译著《西腊罗马史》,著作《中国的宗教》、《中国语言学方面的地位》。

文、^①狄考文、^②杨格非、^③福开森、^④卜舫济、^⑤傅兰雅^⑥等都在不同时期任过董事。

直至1921年广学会的章程才做了修改,准许中国人担任董事,

^① 潘慎文(Parker, Alvin Pierson, 1850—1924年),美国监理公会传教士。1875年来华,初在苏州传教,1896年调任上海中西书院院长,1906年辞职。他曾主办《兴华报》,用苏州、上海方言翻译圣经,翻译了代数和机械学教科书。晚年为广学会编写中文书。死于美国,其家属遵其遗嘱,将骨灰葬于上海。

^② 狄考文(Mateer, Calvin Wilson, 1836—1908年),美北长老会传教士。1863年来华,在山东传教,次年设登州文会馆。著有《笔算数学》、《代数备旨》等,为中国初办学校时所用的数学教科书。他所著的《官话课本》,为当时外国人学习汉语必备之书。

^③ 杨格非(John, Griffith, 1831—1912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1855年来华,在上海传教。1861年从上海出发,遍历华中各省,为第一个深入华中的基督教传教士。后卜居汉口,在两湖传教,有“街头传教士”之名。1899年在汉口花楼创办博学书院,培养华籍传教士。著有汉文书《对中国的期望》、《中国的呼声》等。

^④ 福开森(Ferguson, John Calvin, 1866—1945年),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1886年来华传教。1888年在南京创办汇文书院,任监督。1897年被盛宣怀聘为上海南洋公学哲学。1899年接办上海《新闻报》。1917—1928年任北洋政府总统府顾问,1936—1938年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顾问。他研究中国美术,收藏中国古董,并写有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如《中国绘画》、《历朝瓷器》等。

^⑤ 卜舫济(Patt, Francis Lister Hawks, 1864—1947年),美国圣公会牧师,1887—1930年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1945年后为名誉校长,著有《中国史纲要》、《中国的紧急关头》和《上海租界略史》等书。

^⑥ 傅兰雅(Fryer, John, 1839—1928年),英国圣公会传教士,1861年东来,任香港圣保罗书院院长。1863年被清政府聘为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1865年任英华学堂校长,1868年受聘为上海江南制造局编译,任此职28年,先后翻译英文原著近150种,同时还兼任格致书院监督、《格致汇编》编辑。晚年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学教授。编著《中国教育名录》、《中国留美学生获准入学记》。

但不得超过半数,故余日章、^① 郭秉文、^② 邝富灼、张伯苓、^③ 刘廷

① 余日章(1882—1936年),中国近代宗教上层人物。湖北人。1895年入武昌文华书院学习。1905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书院,1908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教育科留学。1910年12月回国,任武昌文华大学附中校长。辛亥革命后,任红十字会总干事,黎元洪的军政府外交部交涉局局长。1912年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演讲部主任干事。1917年任该会总干事。1923年至1928年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成为中国基督教界重要的头面人物,1936年11月故于上海。

② 郭秉文(1880—1969年),中国近代教育家。江苏人。1896年毕业于上海清心书院。1908年赴美留学,获学士、博士学位。1914年回国,1915年起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校长和东南大学校长。1925年赴美国担任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基金学院讲座,任中华教育促进会会长。次年发起组织华美协进社,任社长。自1923年起连续三届当选为世界教育会议副会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副署长。晚年创立中美文化协会,从事中美文化交流活动。

③ 张伯苓(1876—1951年),中国近代教育家。天津人。1891年考入北洋水师学堂。以国事日蹙,认为“自强之道端在教育”。曾受严修之聘,教授家馆;后又兼任天津富商王奎章家馆教师。1904年随严修到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仿日本教育制度,将严、王两家塾合并,创办敬业中学堂,并附设师范班,自任监督。1907年学生人数骤增,在南开洼扩建新校舍,改名为南开中学堂。1917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1919年创办南开大学,设文、理、商三科。1923年创设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南开小学成立。从此组成了包括小学、中学、女中、大学一个比较完整的南开学校教育体系。1936年又在重庆开办南渝中学(后改名重庆南开中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南开大学迁长沙,继迁昆明,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他任校务委员会常委。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1948年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重庆解放前夕,婉言拒绝随蒋去台,留在大陆,1951年病逝。

④ 刘廷芳(1891—1947年),中国近代教育家。浙江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赴美留学,获博士学位。1916年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创汉字学习的心理学实验研究。继而入耶鲁大学神学院深造。1920年回国,任燕京大学神学院院长,兼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23年夏,与美国教育测量专家麦柯尔博士在北京举办教育心理测验讲习会,促进教育心理测验在中国的推广。1925年曾为孙中山先生的追悼会主持宗教仪礼。抗战胜利后应邀赴英国剑桥、牛津大学讲学。

芳、^④李登辉^①等都曾先后担任过广学会的董事。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张群^②曾被请做广学会名誉会长,朱经农^③为副会长。

广学会第一任会长(当时称“总理”)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他从1888年成立董事会起,就担任会长,直至1912年死去为止,连任25年。其后继任会长的有英国驻华公使、美国驻华公使、英美驻沪总领事、上海工部局总董事等。直至1947年底经朱经农安排,才请当时在上海一些大学执教的胡祖荫为首任华籍总干事。

广学会董事会在人事、财政和业务方面具有相应的权力。广学会组织章程对此明确规定:“董事会有权增加董事人数,填补

① 李登辉(1873—1949年),中国近代教育家。福建人。少年就学新加坡,1891年赴美留学,189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900年任新加坡英华书院英文部主任,次年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创办英文学校。1905年返回祖国,1906年受聘为复旦公学总教习,主持教务,并讲授英文、法文、德文、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科目,另兼课中法公学。1907年清政府招收江南留学生,被派为主试。1911年兼任英文《共和西报》主笔,1912年兼任中华书局英文部主任,编写教科书。1913年任复旦公学校长。1917年改复旦公学为私立复旦大学,设文、理、商三科。次年赴南洋募捐,在江湾建立新校舍。抗战爆发后,学校内迁,召集留沪师生于租界内开办复旦大学补习部,声明决不向敌伪妥协。先后任复旦大学校长二十余年,毕生从事教育。

② 张群(1899—1974年),四川华阳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26—1927年北伐战争时期,积极追随和帮助蒋介石建立反革命政权。1929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曾任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四川省政府主席、外交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行政院院长。1949年逃往台湾。为国民党政学系首领之一,后死于台湾。

③ 朱经农(1887—1951年),中国近代教育家。上海市人。1904年赴日留学,入弘文书院,1905年冬返沪参与创办中国公学。1910年任教湖南高等实业学堂。1916年赴美入华盛顿大学学习,1920年入哥伦比亚师范学院研究院攻读教育学,获硕士学位。1921年任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1923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辑。1924年兼沪江大学国文系主任,1925年主持光华大学校务。1927年任上海特别市教育局局长,旋因大学院改组,留任教育部普教司司长。1930年春兼代常务次长,不久辞职。1931年任齐鲁大学校长,1932年任湖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后相继任中央大学教育长、教育部政务次长、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光华大学校长。1948年任中国出席联合国文教会议首席代表,1950年在哈特福德神学院从事教学与研究。

缺额；有权选举它的主要职员，决定它自己要召开的会议，指定受托本会一切财产的受托人（不论他们是否为本会会员）；如认为必要时，授与专门委员会、分支机构或个人（不论他们是否为本会会员）以担负本会某种具体任务的责任。董事会也有权召开本会特别会议，采取妥善步骤散发本会会议记录，获取现金捐款，从本会款项中支付工作上的一切费用，采取任何符合本会章程而又有利于实现本会宗旨的各种措施。”

董事实行退休制度，每年有 1/3 的董事被宣布退休，但可以连选连任。同时补充数额不等的新董事。

广学会的日常事务是由董事会指定的执行委员会负责的。执行委员会每月开会一次，它有权编制自己的工作附则，并负有监督广学会所负债务不得超过其不动产一半的特殊责任。每年年会时公布下年执行委员会名单，大约在 10 人左右，赫德、^① 李提摩太、林乐知、艾约瑟、慕维廉^② 等都长期任执行委员会委员。详情可参见 1888 年至 1900 年执行委员会名单表。执行委员会的负责人称为“总干事”，广学会从成立起，总干事由韦廉臣担任，1890 年其病逝后，由李提摩太接任，在任长达 25 年，成为广学会的主要人物。

^① 赫德 (Hart, Sir Robert, 1835—1911 年)，英国人。1854 年到香港，在英国商务监督公署任职。次年任驻宁波副领事助理，1858 年调任广州领事馆助理，1859 年任粤海关副税务司，1861 年代理总税务司，1863 年继李国泰为总税务司。赫德在位达半个世纪，制定并执行一套由外国人管理的半殖民地海关制度，控制中国的财政收入，干涉中国内政外交，扩展列强特别是英国的侵略势力。1908 年请假回国，至死始卸职，是英国侵华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著有《中国论集》等。

^② 慕维廉 (Muirhead, William, 1822—1900 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1847 年来华，1848 年 3 月与另外两名英国传教士闯闯人江苏青浦进行非法活动，挑起青浦教案。1861 年 2 月抵天京会晤洪仁轩，商议在太平天国境内传教问题，并在天京考察、活动。1894 年获爱丁堡大学神学博士学位。慕维廉在上海传教 53 年，死于上海。著有《中国与福音》、《中国的太平起义者》等。

1888—1900年广学会执行委员会名单表

年份	人数	姓名(职务)	备注
1888/ 1890	7人	赫德(会长) 福凯(副会长) 毕晓 林乐知 慕维廉 索恩 韦廉臣	
1890/ 1891	8人	赫德(会长) 麦格雷戈(副会长) 毕晓(司库) 慕维廉(名誉总干事) 林乐知 艾约瑟 艾迪斯 索恩	
1891/ 1892	8人	赫德(会长) 包登(副会长) 鲍特(名誉 司库) 李提摩太(总干事) 林乐知 艾 约瑟 慕维廉 索恩	1892— 1893年 连任
1893/ 1894	11人	赫德(会长) 巴克南(司库) 哲美森 (副会长) 林乐知 摩仑道夫 李提摩太 (总干事) 艾约瑟 慕维廉 李佳白(总干事) 克朗兹 汤恩	
1894/ 1895	12人	赫德(会长) 巴克南(司库) 艾约瑟 哲美森(副会长) 林乐知 慕维廉 李提摩太(总干事) 克朗兹 哈里斯 李 佳白(总干事) 莫林多夫 桑先生	
1895/ 1896	13人	赫德(会长) 巴克南(司库) 艾约瑟 威廉姆士 哲美森(副会长) 艾迪斯 哈里斯 李提摩太(总干事) 林乐知 桑先生 安保罗(总干事) 慕维廉 希皮斯利	
1896/ 1897	13人	赫德(会长) 巴克南(司库) 艾约瑟 威廉姆士 哲美森(副会长) 艾迪斯 哈里斯 李提摩太(总干事) 林乐知 桑先生 安保罗(总干事) 慕维廉 希皮斯利	
1897/ 1898 1899/ 1900		查 缺	

广学会每年召开一次年会，其组织章程规定：本会年会于每年12月份的第二周在董事们所指定的地点举行，届时收支状况表将与年度工作报告一道交付讨论。从广学会年报来看，这个年会实际上是工作例会或工作情况通报会。

年会召开前，租界的英文报刊总要做一番舆论宣传，而广学会总干事也要在年会前草拟好英文年报，提前发给董事们，并寄往国外有关机构和人员。年报的内容非常丰富，除广学会一年来开展业务的有关情况外，还有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分析，附一些重要的文件，如1898年的年报附有维新派领导人物的介绍，光绪皇帝采购的书目，维新变法的上谕。年报后还有会议附录，记载了年会的议程、内容及主要的发言等。从广学会前十届年会召开的情况看，年会召开的时间固定，但地点随时变动，主持人也常变换，但大都是官员、洋商和知名的传教士。

广学会前十届年会召开情况一览

届次	日期	地点	主持人
第一届	1888年12月13日	E·坎麦伦家	福凯副会长
第二届	1889年12月18日	麦加利银行 “大班”毕晓家	福凯副会长
第三届	1890年12月15日	怡和洋行	约翰·麦格雷戈
第四、五、六、 七、八届	1891—1895年	工部局	工部局J·G·包登等
第九届	1896年12月10日	工部局董事室	桑先生驻沪官员
第十届	1897年12月9日	皇家五州文会	桑先生
	1909年以后	北四川路广学会 会办公楼	英驻沪总领事或 高级官员

广学会会员的条件并不严格，只要是自愿捐款，经过会内人

员提议，有附议者，并在任何一次定期召开的会议上为多数人通过后，就可成为会员。以后又规定，以订阅广学会刊物的形式也可加入，成为会员，会员人数历年不等，初创之时 31 人，两年后增至 39 人。随着广学会业务的开展，影响不断扩大，会员人数有较大幅度增加，如 1896 年会员 66 人，1899 年有 80 余人，最多时是 1905 年，有 254 人。

广学会初创时规模很小，经费所限，不得不租房办公。上海西华德路（今长治路）25 号、江西路 41 号、蓬路（今塘沽路）44 号都曾是其租赁的办公地点。直到 1908 年在上海的英国地产商人汉璧理（Hanbury, Thomas）出银两万两（约 3000 英镑）在北四川路 143 号（今多伦路口）建成一栋三层楼的办公用房。1932 年又在博物路（今虎丘路）128 号盖了九层大厦，耗银 35 万两，建筑材料和室内设备几乎全部进口。大厦建成后设有专门的房屋管理委员会，并特向英国驻沪领事馆注册备案。

广学会初期，自有印刷厂，至 1890 年，由于开支增加，收入减少，经费拮据，遂于 10 月 31 日关闭了印刷厂，所有的印刷都由美华书馆（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来承担。当时执行委员会决定将印刷机器和设备按照能立刻全部开工的办法存放起来，以期能有赞助经费，使印刷厂随时复工。但未能如愿。不久，整套的印刷设备就售给了设在汉口的苏格兰圣经会，而广学会本身只搞编译与发行业务了。

3. 广学会的宗旨及经营方式

广学会于 1887 年创办，1956 年底与青年协会书局、中华浸会书局和中国主日学联合会合并组成“中国基督教联合书局”。70 年间，其工作宗旨是：“在中国，中国藩属以及一切有中国人的地方，继续出版和发行根据基督教原则所编写的各种书籍——特别是为本会能力所许可而又适合于各个阶层阅读的期刊。”为了实现上述宗旨，在其组织章程中，还明确地规定了经营方式：

“首要的特别是组织和发行一些具有基督教目标，但又具有中国人的观点，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同时还可以教育人和提高人的新的书籍、论文与小册子；其次是一种适合于中国知识阶层、水平较高的期刊；第三是给妇女、儿童阅读的期刊；第四是给小学生的；第五，重印一些为董事会所赞赏的大小著作；第六，在上海设立一个发行中心，并在十八省省会和主要城市，以及其他商业中心，如香港、横滨、星加坡、槟榔屿、巴达维亚等地，尽量设立一些代销机构。”从广学会的宗旨和经营方式可以看出，广学会的主要工作是编译、出版、发行书刊，介绍基督教在内的西方文化，以“启迪”所谓中国人的“心智”。韦廉臣曾在《同文书会实录》中说：“将泰西之道，择其有益于中国者，潜心翻译，缮成篇帙，散布四方，使人了然于心日。倘一旦国家有所举行，不必家喻户晓，而其为弊为利，为损为益，士庶早洞悉于未告之先，而自公召之，自公令之，有不欢乐从事者乎？则于执事者亦当不无小补云。”^①

在这一宗旨的指导下，广学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翻译出版书籍和发行刊物上。

广学会出版的书籍绝大部分是从英美翻译过来的，刊物的稿件也是列出选题，约传教士撰稿，而传教士所著的书籍也都是借助中国助手完成的。林乐知是广学会中著书最多的，他的中国助手是古文功底深厚的前清贡生蔡尔康，林氏著书即是“林君之口，蔡君之手”，林乐知口述后，蔡尔康加工润色，西学的内容，中国士绅的文采，再加上文言文，线装本，很被接受。

广学会的传教士都纷纷效法，他们利用各差会拨给的专款，聘用中国助手，这对于很少真正懂得中国话的传教士来说是非常方便的，但那些中国助手，在笔录时就需要细心分辨那夹杂着中国各省不同方言的口述，当传教士不知用何辞句来表达或助手们

^① 韦廉臣：《同文书会实录》，《万国公报》第14册，第5页，1890年3月。

弄不清传教士所说的意思时，还需翻阅查考字典。

广学会出版物的种类繁多，从其年报反映的分类看，有书籍、期刊，也有图片，布道的传单，还有美术月份牌，家庭用的宗教宣传挂图等。据估计，广学会自创办，总共出版过两千多种书刊和图片。

广学会设有“出版委员会”，但它并不负责出版计划，因为书刊出版的费用一般都是来自国外的专款，只要有来款，就可以出版发行。这也就使广学会的出版发行并不完全从经济效益考虑。因此，早期的经营方式完全是分发派送，送给各地的达官贵人，发给各地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广学会也曾将出版物“专递”各新设立的学校和地方官员。广学会介绍西学，影响不断扩大，书籍、刊物渐受士人欢迎，经营方式也就增加了邮购、销售等业务。

4. 总干事李提摩太

1891年10月，李提摩太担任广学会总干事，在他卓有成效的经营下，广学会开始了对中国历史最有影响、政绩最辉煌的时期。

李提摩太（Richard, Timothy, 1845—1919年）是英国人。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869年从神学院毕业后，受英国浸礼会牧师职。在他25岁的那一年，终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成为赴海外布道的传教士。他来到山东烟台，作为一个普通的传教士也曾游街串巷，讲教布道，送发《圣经》，并刻苦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社会、风俗文化。1876年至1879年，华北地区遇特大旱灾，李提摩太与其他传教士募得巨款在山西等地发放赈灾。洋教士的“慈善”，使中国百姓接受了他，感激他，并尊称其为“鬼子大人”。但是，这些实际的工作很难使传教有实质性的进展，教徒大多是为了“上帝”的慈善才信奉它，其中却没有一位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教会在中国社会中仍是一种孤独的处境。

李提摩太对此深有感触，他觉得自己应对中国社会的主要骨干知识分子做些研究，要赢得他们的信任，改变他们的观念。于是他找到了借助西学传教的途径。从1880年起，李提摩太用一千多英镑从英国购买了科技书和仪器设备，他在太原府每月举行一次科学报告会，演示科学实验，邀请地方官员和知识分子参加。通过举办专题科学知识讲座，他与一些上层官员和知识分子建立了比较广泛的联系，洋务派李鸿章、张之洞，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他都与之密切交往。

李提摩太认识到文字工作对传教事业有很大推动作用。1890年，直隶总督李鸿章邀请其到天津，担任《时报》主笔，他欣然接受，以为这是“天赐良机”，是最好的工作途径。从此，他结束了在底层社会默默传教的经历，以实力走向中国社会上层并施以影响。李提摩太任《时报》主笔仅一年，却写了二百余篇社论，1895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时事新论》就是其中一部分，分为“国政篇”、“外国篇”、“新学篇”、“教务篇”四部分，12卷。

1891年，李提摩太到上海担任广学会总干事，这一年他刚过45岁。在此之前，事业成功所需具备的基础他都打下了，而广学会总干事的职位，又给了他一个施展的天地。李提摩太进入广学会后，全力投入工作，并用全部时间搞编译。在此之前，来自各差会的执行委员会成员，所需经费由各差会支付，他们也只是以部分时间从事广学会的编译工作，同时兼负各差会的事情。在李提摩太的影响下，到1916年时（李退休），广学会已有专职传教士8人，部分参加工作的传教士5人。李提摩太在广学会编写的大小书籍约七十余种，在当时颇具影响，李提摩太是“广学会的实际创办人”、“李提摩太就是广学会”的说法在传教士中广为相传。

李提摩太为何对“办书报”的文字工作如此重视呢？他认为：设教堂布道花费时间太长，且接受的信徒数目也少，四亿人

的中国只有千余左右的传教士，依靠布道施加影响微乎其微；办学校的方法太慢，且不说在比整个欧洲还大的中国国土上，不可能尽设学校，就是培养一个学生也要好几年才能在社会上起一些作用；开医院收效不大，因为医院所接触的都是非正常状态的病人，不能希望通过对非正常状态的人而去影响正常人的思想；除此之外，最有影响和效果的就是文字出版。李提摩太认为“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则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可以消除中国人的“愚昧无知”，“拯救”中国。

任职后的李提摩太坚决主张广学会应当走出宗教的窄小圈子，宗教宣传与世俗知识当并重推广，并以中国当时急需的世俗知识为要。通过传播西学去影响中国知识界的发展，去影响中国政治的进程。他在1891年的同文书会年会上发表了他的“施政”演说：“我们不能梦想在这个帝国的全国范围到处设立现代化的学校；我们也不打算接触帝国中所有的发展，更谈不上能接触在中国政府中发生重大作用的每一个文人。但是，主要官吏连带高级考试官员，教育方面的府视学，大学堂教习和比例小的一部分文人，还有他们家里的妇女儿童，是可以接触到的。”^①李提摩太分析“中国大众对学者特别尊重”，并对官员惟命是从。因此，教育了中国的上层人士和知识阶层，就等子影响了中国3.5亿人口。他对这些人做了一个较为详细的数字测算：

文官自县长以上者 2289 人；

武官自营官以上者 1987 人；

学官自府视学以上者 1760 人；

大学堂教习 2000 人；

派驻各省的高级候补官员 2000 人；

科举出身的文人（按其中 5% 计算）：

（1）在北京考取进士的；

^① 同文书会年报，第4号，载《出版史料》1988年3、4期合刊。

- (2) 在 20 行省考取举人的；
- (3) 在 253 个府考中秀才的；

以上三种合计约 50 万—100 万人，姑以 60 万人计算，约 3 万人；

经过挑选的官吏与文人家的妇女儿童（按 10% 计算）4000 人。

以上人员合计 44036 人，李提摩太建议把这些人作为他们的“小学生”，进行系统的教育，从而确定了广学会工作的主要对象。

李提摩太还提出“施政”的具体办法：

- (1) 举办高级期刊。在这些刊物中，对某些专题进行系统的论述。

- (2) 也出版一系列的书籍和小册子。

- (3) 对中国人以论述国家开化和进步为题所写出的作品，给予奖金。

- (4) 利用演讲会、博物馆、阅览室等实施宣传、教育。

- (5) 在每一个考试中心设立一个代销处，出售出版物。

- (6) 在进行这些工作中，希望能取得中国人的合作，由他们去组织提倡学术的书会。

- (7) 要有供每次举行考试时散发的有关本会的目标与宗旨的宣传品。既然许多遥远村庄的教师都来参加这种考试，我们希望用这种办法把我们的影响扩大到（清）帝国的每一个角落。^①

由此可知，广学会在李提摩太的主持下，其工作主要是：(1) 办期刊，(2) 编译出版、发行书籍，(3) 有奖征文，(4) 无偿赠书。这些活动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由于它的形式多样，适应性广，无论是在“达官贵人”，还是在普通民众中都具有一定影响，尤其是戊戌变法时期，同文书会年报曾称：“被

^① 同文书会年报，第 4 号，载《出版史料》1988 年 3、4 期合刊。

人称为中国现代圣人的康有为，写了一份非常有力的要求维新的请愿书，有一千三百位举人在上面签了名，在这份请愿书里他吸取了我们很多出版物的精华。”光绪皇帝立意变法，购买有关书籍 1298 种，其中 89 种都是广学会出版的，光绪皇帝还存有全套的《万国公报》。戊戌以后，随着西学传播渠道的增加，新式人才的大量涌现，广学会的社会影响才逐渐式微。可见，李提摩太的主张在整整 1/4 世纪中指导着广学会的工作，也确实对中国的知识界和政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却终不能左右其发展。

李提摩太最辉煌的时代是与广学会相伴始终的，随着广学会影响的式微，李提摩太的辉煌也在暗淡，但他并没有放弃。1907 年，他又经手筹办山西大学堂，继续他未能如愿的企图。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李提摩太索取地方赔款 50 万两，创办山西大学堂，这是利用“庚子赔款”设立最早的学校之一。学堂分中、西两斋，讲授中西学问，李提摩太首任两斋总理。此后他既负责广学会，又兼管山西大学堂，直至 1916 年退休，返回英国，1919 年去世。

李提摩太在华 45 年，常自诩自己的成就可以三件大事而概之，一是“办赈”，二是“办书报”，三是“办大学”。然而中国的历史决不会按照他所设计和期望的那样去发展。

二、广学会与西方文化的传播

1. 西学书籍的翻译与出版

翻译、编撰、出版书籍是广学会的主要工作，许多史学家力求准确地梳理出广学会在这方面的成就，但限于史料的不完整，一时难以如愿。现将广学会年报以及有关广学会的书目综合整理，其情况大致如下：

出版时间	年出版总数(种)	译著者	译著数	书名
1888年	5	花之安	1	《自西徂东》
		慕维廉	1	《格致新机》
		韦廉臣	1	《格物探源》
		不详	2	《女儿经》、《耶稣纪要》
1889年	5	李提摩太	2	《西铎》、《七国新学备要》
		不详	2	《正道启蒙》、《基督实录》
		各政治家、学者	1	《经世文续编》
1890年	3	韦廉臣	1	《治国要务》
		李提摩太	2	《救世教益》、《传教定例》
1891年	1	韦廉臣	1	《二约释义丛书》
1892年	13	李提摩太	8	《中西四大政考》、《养民有法》、 《五大洲各国统属全图》、 《女学论》、《八星之一总论》、 《五洲各大国志要》、《大国次第》、 《五洲教务》
		哲美森	1	《华英谏案定章考》
		纳尔森	1	《圣经故事插图》
		不详	3	《花图篇》、《中西各教人数图》、 《地球供养人类的能力》
1893年	10	花之安	1	《性海渊源》
		李提摩太	3	《农学新法》、《整顿学校》、 《养民有法说》
		艾约瑟	1	《富国养民策》
		不详	5	《日课》、《开矿富国说》、

出版时间	年出版总数 (种)	译著者	译著数	书 名
				《国贵通商说》、《传道会训》、 《辨明技艺工作说》
1894 年	17	林乐知 慕维廉 慕维廉夫人 本特利 富翟氏 李鸿章 曾纪泽 戈贝尔 李提摩太	2 1 1 1 3 1 1 7	《宗教故事》、《中西互论》 《人心交与上帝》 《破船救人记》 《修命说》 《为道受难记》、《圣经释义》、 《太平洋岛受道记》 《名公三序》 《利水口以利通商》 《喻道要旨》、《百年一觉》、 《生利分利之别》、 《列国变通兴盛记》、 《欧洲八大帝王传》、 《保护基督教的上谕》、 《中西年表图》
1895 年	14	李提摩太 林乐知	7 4	《泰西新史揽要》、 《近代教士列传》、 《时事新论》、《救世有道》、 《保家经》、《问天图》、 《新政策》 《自历明让》(1—7集)、 《辩志篇》、《教堂买产公牒》、

出版时间	年出版总数(种)	译著者	译著数	书名
		哲美森 卜舫济 琼斯	1 1 1	《麻笛论道探源》 《英国颁行公司定例》 《税敛要例》 《山东贫窶考》
1896年	16	林乐知 卜舫济 波特 李斯 不详	6 1 1 1 7	《中东战纪本末》、《文学兴国策》、 《印度隶英十二益说》、 《崇一论》、 《兴华新火》、 《自历明让》(8—11集) 《基督本纪》 《电学总览》 《教化阶梯衍义》 《机器之益》、《兴国略言》、 《西学有益于中华说》、 《条陈改政急务》、 《强华溯源论》、 《崇实黜浮说》
1897年	15	林乐和 林乐知 杨格非	7 1	《家用祷告文》、《变新策》、 《中西教化论衡》、 《试场小册子》、 《中国度支考》、 《中东战争梗概》、 《李傅相游欧美记》 《耶稣圣教入华的目的》

出版时间	年出版总数 (种)	译著者	译著数	书 名
		艾约瑟 山雅各 李提摩太 仲均安 不详	1 1 1 1 3	《论机器之益》 《圣人说》 《醒华博议》 《字学新法》 《经学不厌精》、《教华危言》、 《医方汇编》
1898 年	4	林乐知 李提摩太	2 2	《英兴记》、《新学汇编》 《帝王初学》、 《地球一百名人传》
1899 年	22	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夫人 林乐知 李思 丁懋良 卫里 安保罗 高葆真 (Cornaby, William Arthur) 不详	1 1 1 1 2 1 1 1 13	《大同学》 《教士列传》 《保华全书》 《万国通史前编》 《性学举隅》、《富国策》 《英国人民史》 《救世教成全儒教》 《舌如火焰》 《弥赛亚》、《古史探原》、 《使徒纪略》、《动物浅说》 《富国真理》、《说教雪》、 《基斯扫登》、《大清一统图》、 《足民策》、《电学纪要》、

出版时间	年出版总数(种)	译著者	译著数	书名
				《英国议事章程》、 《太平洋传道录》、 《路得政教纪略》
1900— 1901年	8	不详		《万国原始志》、 《英国历代大臣列传》、 《印度历代大臣列传》、 《欧洲历代大臣列传》、 《美国历代大臣列传》、 《东亚历代大臣列传》、 《邦交格致之义》、 《近时格致之义》
1902年	5	不详		《天地奇异志》、 《印度史撷要》、 《列国地说》、《广学类编》、 《增税裁厘议》

以上是广学会从创办到1902年所出书籍的粗略统计，其每年所出的宗教挂图，宣传性的日历以及单张的出版物，都未统计在内。大致算来，广学会在十几年间出版约140余种，其中50%左右是西学书籍。其中有些书籍之所以能够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响，原因就在于，它宣传介绍的自然科学是那些大众性的普及知识，易为一般人士所接受；它所介绍的时事政论则与中国的现实紧密相关，是人们普遍注视的焦点。当然最主要的还在于经营者有明确的工作宗旨，宣传对象和多形式的宣传渠道。

西学书籍中影响最大的是李提摩太所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和林乐知编撰的《中东战纪本末》。这两部书出版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际，战争的结果是泱泱大国败给了蕞尔小国，举国为之震惊激愤。《泰西新史揽要》恰在这时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也给欲求变法自强的中国人带来了新的思想。

《泰西新史揽要》原名《十九世纪史》，1889年在伦敦出版，其著者是英国人麦肯西。他在书中详尽地描述了19世纪欧美各国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历史，对于仍处在封建专制之下的人们来说，是一种全新的知识。这是李提摩太要将其翻译出来的原因之一。此外还由于李提摩太在当时的地位，他集传教士、学者、政客于一身，以他的学识和极大的宗教热情、毅力，赢得了声望，由此他与中国社会的上层人物交往密切，影响至深，从洋务派到维新派头面人物，从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到革命党领袖孙中山，他都有过接触，他甚至还应维新派之聘赴北京拟就光绪皇帝顾问之职，只因慈禧发动政变，维新运动失败，未能成行。李提摩太没有实权性的官职，但他穿行于官场、官员之间，对中国积弱积贫的症结能略晓几分，这是促使他将《十九世纪史》翻译出来的原因之二。李提摩太在译书序言中写道：“夫西国之广兴，多在近百年中，……欲考近事，无有出其右者，欲治近世，亦无有出其右者”，“此书为暗室之孤灯，迷津之片筏，洋面译之，质而言之，实救民之良药，保国之坚壁，家贫之宝玉，面中华新世界之初桃也，非精兵亿万、战舰什百所可比尔拟也”。这正是他想以此“感化”中国人，影响中国政局发展的内心写照。

既然有如此明确的译书目的，李提摩太对译著的体例做了很有针对性的安排。全书共24卷，8册，主线是叙述19世纪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发展，辅之以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以及社会生活各个具体方面。书中对于西方各国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过程中所实行的兴利除弊、变法图强的历史，分门别类，专题叙述。如“英国部分，有四卷是专门介绍革故鼎新和各项新政内容的。第

六卷的《英除积弊》的各节标题便有改制度情形、准百工设立公所、整顿学校、改立城市新章、救贫新章、报馆免税、整顿邮政、删改刑律、预防疾疫、删除教会苛律、推广公举之法、广兴学校等。第九章《邠治之隆》，则列举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各种新政策、新发明、新创造，举凡蒸汽机、织布机、火轮船、火轮车，采取金银、电报初行、报馆初行，新出机器，医家新学，善待痲疾，一应俱全”。^① 它展现在中国人面前的是“近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② 即西方各国由野蛮、无知、专制走向科学、启蒙、民主的历史，这正是中国人欲变法自强所要效仿的。所以它使中国人看到了世界发展的大势，启迪了变法自强的思路。难怪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给皇帝的上书中引用其精华，而且还亲自拜访李提摩太，连光绪皇帝也在仔细阅读此书。

《泰西新史揽要》1895年出版后即成畅销书，一版再版，甚至出现盗版。其中原因，最主要的还应该说是其对于中国社会的强烈现实性。

与《泰西新史揽要》同具影响共齐名的另一部著作，是林乐知编撰的《中东战纪本末》。因在本书有关章节专述，故此不再赘复。

花之安编撰的《自西徂东》是广学会出版的又一部颇具影响的著作。1888年出版，以后多次再版，直至1921年，是广学会发行数量最大的书籍，如果说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对中国社会有强烈的现实感，那么花之安的《自西徂东》则更适合中国知识阶层的文化心理需要，花之安被称为是“19世纪最高深的汉学家”，把“西学”、“儒化”，既免去了仍沉湎于中华文化优越感之中的知识分子的尴尬，又使“西学”不再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而成为普通人士乐于接受、渴求的知识，这正是此书成

①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600页。

② 梁启超：《读西学书法》、《戊戌变法》（一），第455页。

功的原因之一。

花之安在《自西徂东》书例中这样写道：“发明泰西之事，将此比较中国，欲令人明晓中外之人事、政教，或是或非，可以得去取之益。”这就非常明确地道出了此书的主要内容及写作目的。《自西徂东》是一个很儒雅的书名，花之安又将泰西之事分为五类，冠之以儒家历代所崇尚的道德信条“仁”、“义”、“礼”、“智”、“信”为名，每集所述与这五常自然融合，并无牵强附会之嫌。全书五集，72章。仁集，共13章，“仁”亲也，仁者，兼爱。花之安对儒家文化的内涵理解准确无误，其所述内容即为仁爱、仁政方面，如：周济穷民，善治疾病，赡养老人，抚教孤子，优待颠狂，无忘宾旅，省刑罚，体恤狱囚，解息战争，怀柔远人，爱邻仇敌，仁及禽兽等。义集，16章，所述主要为国家理财以及人的基本权利等内容，如：慎理国财，保护善民，绥靖地方，修治道途，整饬关税，利贵相通，惩戒奢侈，劝禁赌博，清除鸦片流弊，严禁买卖奴婢，禁溺女儿，广行恕道，臣道总论，万国公法本旨等。礼集，15章，主要介绍了西方社会的礼仪风俗，包括吉礼、凶礼，嘉礼，宾礼，军礼以及假礼指谬，辩论风水，修身齐家，孝本爱敬，劝戒轻生，心防伪诈等，对中国礼仪中，花之安认为伪饰、奢侈、不合时宜的部分提出了批评。智集，17章，为学术、智慧方面的内容。对西方文化、教育、新闻、语言、科学技术等，花之安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如：学贵精通，经学体要，史学琐谈，子学探原，同文要学，教化要言，博学有方，新闻纸论，农政善法，机器利用，技艺工作，国贵通商，武备发明，精究医术，格物功用等。信集，11章，主要介绍了西方的社会团体，包括宗教团体与各种社会方面的组织，诸如传道会、圣经会、善书会、戒酒会、少壮会、女红倡善会、合众善会，特别是国人从花之安的介绍中，第一次了解到西

方工人工会组织的情况。^①

总起来说，花之安是针对中国社会的弊端，对西方文化加以系统的介绍，相比之下，显示了西方文化的优越性，目的在于“欲有以警醒中国之人也”。花之安直言中国学习西学多“失其要，徒得西学之皮毛，而不得西学精深之理，虽学亦无甚益耳”。他认为“中国在上之人，亦有令兵丁学西国之炮火洋枪者，亦有学西国之轮船电报等项者，亦有用轮船航海为生理者，开矿用西国之法者，然此非不美，而究未能得西国至善之道也”。^② 中国学西学，办洋务已经几十载，然而只学表层皮毛而已，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并未在中华大地显现。花之安认为欧美各国至善至美的真谛在于基督教，因此中国应当用此“道”去革除弊端，改造社会。然而这只能成为花之安永远的期望而已，文化交流的内在规律决定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文化交流是建立在双方既有的自我文化积累上的，尽管中国文化需要摒弃自我文化中妨碍民族生存的部分，但决不可能超越已有的文化积累而用西方文化置换中国文化。但花之安的书中所言，无疑极大地拓宽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视野，才知西人所以强者不在兵。

广学会出版的西学书籍中，还有很多受到广泛欢迎的，如：韦廉臣的《格物探源》、《治国要务》，慕维廉的《格致新机》，林乐知的《中西互论》，丁韪良的《富国策》，李提摩太的《中西四大政》、《五洲各大国志要》、《七国新学备要》、《时事新论》、《西铎》等。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关心时务、谋求变法的士人、大小官员“因地大十倍之中国，不能敌一蕞尔之日本也，莫不欲究其所以致此之故，求新之意，因此而起，而又惜讲求外事之书，寥寥无几”。而广学会所出西学书籍恰恰弥补了这一缺憾。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向中国人介绍了世界发展大势，欧美各国富强之

^① 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有关章节。

^② 花之安：《自西徂东·序》。

道，指出中国社会的弊端。士人欲求，书中详尽介绍；士人所想，书中透彻阐发，阅后使人耳目一新。所以这些书远销各省及至海外，到处风行。

2. 《万国公报》及广学会出版的刊物

中国是世界上最先有报纸的国家，然而近代化的报刊都是外国人首先在中国创办的。早在19世纪初，闯入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深深感到，庞大的满清帝国虽已是强弩之末，但建立在千年传统文化积累上的社会结构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却难以撼撼，不能适应他们传教、殖民扩张的需要。为此，应以武力做后盾，进行思想征服为良策，可以说，近代中国报刊是伴随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国而来。最早的一份中文报刊是1815年在马六甲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随后是1833年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到鸦片战争以前中文报刊已有六种。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报刊的创办进入发展时期，首先表现在数量的增加。据史和等人编的《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统计，从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问世，到1911年，海内外累计出版中文报刊1753种。^①其次是办报内容的变化。19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值洋务运动兴盛时期，由于办军工、民用企业，人们更加渴求西学、西艺。对此，传教士清楚地看到这是扩大传教的有利契机，他们明确提出：必须利用布道、课堂、报刊这三种媒介启迪不信教的人们，特别是在中国，“人的头脑不是空白的，在他们的头脑中存在各种对于宇宙和上帝的错误观念。这些有害的杂草必须拔除。只有这样，神灵的种子才可能生根、发芽”。他们还认为：宗教必须与科学结伴而行方能取得成功。如果不把科学纳入宗教的轨道，科学将战胜宗教。^②所以由传教士在中国人最

^① 转引自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392页。

^② 《基督教传教士大会记录，1877年》。

需要西学、西艺的时候来介绍西学知识，对于传教无疑是事半功倍。基于这样的认识，传教士们所办的宗教刊物此后都采取了“以介绍西学辅助传教”的方式，当然广学会所创办的刊物也不例外地带有这样的特点。

广学会先后出版的刊物共有 11 种，见下表：

刊物名称	主 编	刊出时间
《成童画报》	默里 (D.S. Murray)	1889—1891 年
《万国公报》	林乐知	1889—1907 年，月刊
《中西教会报》	高葆真	1891—1917 年，1912 年后称 《教会公报》
《大同报》	高葆真	1904—1917 年，周刊，1915 年后为月刊
《女 铎》	亮乐月 (Laura white)、 李冠芳、刘美丽	1911—1951 年
《福幼报》	季理斐夫人 (M. H. Brown)、薄玉珍	1915—1951 年
《明 灯》	李路德、谢颂羔	1921—1941 年，双周刊
《道 声》		1930—1949 年
《女 星》		1932—1941 年
《平民家庭》		1933—1937 年
《民 星》		1948—1951 年

广学会出版的这些刊物一般都是由传教士任主编，中国人做助手，也有些是中国人在后期接替做主编的。这些刊物从稿件到封面、插图，大都采用英美的。这些刊物具有各种类型，适合不同层次的读者，体现了广学会的工作宗旨，既有“适合较高知识阶层的刊物”，又有“为妇女及儿童的期刊”和“为学童的杂志”，因此，在广学会 50 周年纪念刊中它自称：“凡识字的中国

人，都有可能阅读广学会的刊物。”

《万国公报》在广学会众多刊物中办得最有声色，颇具影响。其前身是由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于1868年9月在上海创刊的周刊《中国教会新报》，这是一份宗教性的刊物。在报刊的第一期，就开宗明义：“俾中国十八省教会中人，同气连枝，共相亲爱，每礼拜发给新闻一次，使共见共识，虽隔万里之远，如在咫尺之间。”由此可见，《中国教会新报》的宗旨是宣传宗教，联络教徒教友，沟通传教活动的信息。

本着办报的宗旨，《中国教会新报》在创办的最初几年里，其内容的绝大部分是宣传基督教义，报道宗教事务，刊登教徒、教友来信等，同时也介绍一些声光电化、医学等知识。办报的传教士对工作极为认真，无论组稿还是发行，都力求不断扩大其影响。办报五年，发行数由百余份增至两千多份。

1874年9月，《中国教会新报》出至第301期时，改名为《万国公报》，这首先是因为传教士考虑到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需求。如前所述，时值洋务运动兴盛，中国人对西学西艺的渴求使传教士调整了办报指导思想，虽是想把科学纳入宗教的轨道，但在实际施行中，毕竟还要从传播西学开始。其次，《中国教会新报》在发行的几年间，虽是宗教性刊物，略有西学知识的介绍，但总的看是有关西学的介绍逐渐增多，读者也就随之由最初只是传教士和基督信徒而扩展到社会各阶层人士。

《万国公报》刊出后，对其内容自做说明：“本刊是为推广与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刊物。”为此对版面做了明显的调整，增加了一些新的栏目，扩大了西学知识的介绍。大体分为五类：(1) 政事类，摘录京报上的谕旨和奏折等；(2) 教事类，专载圣经和宗教消息；(3) 中外新闻；(4) 杂事；(5) 科学知识。它更加注重时事性的报道，如“各国近事”一栏，较多地介绍的是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近况，诸如采矿、办厂、采用新技术

的经济、科技方面的信息，这对于正在办洋务的人们来说，可谓大有裨益。此外，对介绍西学、西艺的文章也大量地刊登，如韦廉臣写的《格物探源》，共分43次连载完毕，历时两年之久。对其他刊物的有关文章，《万国公报》也都转载，如艾约瑟写的《光热电吸新学考》就是由《中西闻见录》转载而来。这一时期经常为《万国公报》撰稿的有韦廉臣、李提摩太、慕维廉、丁韪良、狄考文、艾约瑟、李佳白、潘慎文、花之安等传教士。

1883年8月，《万国公报》面临人力、物力的困难，当时主编林乐知忙于中西书院事务，实际编辑出版工作只有一两个传教士来做，所需出版等费用要由传教士各自的差会拨给以及销售报刊所得，故此不得不停刊。直到广学会成立后，《万国公报》作为其机关报刊，才于1889年2月复刊。主编仍为林乐知，周刊改为月刊，每期36张（双页），平均每期出版3300份，直至1907年终刊。

复刊后的《万国公报》，在广学会办会宗旨的指导下，成为一个以时事报道、科技介绍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刊物，这在其登载的《兴复万国公报序》一文中已明确道出：“首登中西互有裨益之事，敦政本也，略译各国琐事，志异闻也，其他至理名言兼收博取，端学术也，算学格致，各务撮其精蕴，测其源流，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皆在所不当遗也。”该报“广译西字各报兼辑中国邸钞，五州之大，六合之遥，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异辞者，荟萃于一册之内。阅是编者不出户庭面周知中外之事变，得以筹划于机先，弥缝于事后。事虽为中国创古今所未有而实合于上世乘风问俗之陈规”。^①为此，它大量地介绍西学科技，有些重要的文章连年刊载，并发行单册，中日甲午战争至戊戌变法期间，它也大量地刊载有关中国现实的政论文章，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正如广学会自己所言：“我们的《万国公报》

^① 沈毓桂：《兴复万国公报序》，《万国公报》第1册，1889年2月。

特别致力于政治和工业方面问题的论述，而《中西教会报》则比较侧重于宗教方面的问题。它们给中国人思想的影响，可以从这里列出的两本杂志的目录内容看出来。”^①

《万国公报》1896年4月刊			《中西教会报》1896年11月刊		
第八卷	目录	第87期	第二卷	目录	第11期
1. 一项维新计划		李提摩太牧师	论文		
2. 维新的要素		编者	传福音之捷径 V		E. Z. 西蒙斯牧师
3. 呈皇上陈情书		传教士委员会	传道要法 XX		潘慎文牧师
4. 富国养民策		艾约瑟牧师	印度女代信道纪 I		林乐知博士
5. 性海渊源		花之安牧师	伊利亚来历 XI		山雅各牧师
6. 陕西西学学习情况		陕西通讯员	大梦初觉 I		鹿完天
7. 外国人对远东的看法		编者	消教除弊慎宜说		李斯牧师
8. 华官宜通西情况		山雅各牧师	闽省西教士致华教友书		
9. 大清事务		编者	学塾要则		
10. 中俄密约之疑		编者	教导须知 III		编者
11. 外国来信综述		编者	学英语有法		编者
12. 电讯		编者	学贵有用论		华北月报
13. 中日甲午之战		编者	浅说类附		
一索引			马撒拉事略 III		富翟氏
14. 告白			伦敦会百年传道之功效 VII		文书田牧师
			慈母遗言		富翟氏
			初学类考 VIII		长召堂
			主笔记言		
			人心交与上帝		
			采择要论		
			自行车在军队之用途		时务报
			英人论俄		时务报

^① 《广学会年报》第9次，《出版史料》1990年第3期。

英儒论日	时务报
电讯近音	时务报
逢凶化吉	九江会报
重整福州船政	闽省会报
教会新闻	
(下略, 引者)	

甲午战争以前,《万国公报》比较重视的是自然科学的介绍,每期都不定篇的登载专门介绍西学的文章,种类多达十几种,从物理、医学、农学到天文、地理、经济几乎无所不包,如:

物理方面:《电报节略》、《电气考》、《声学刍言》等。

天文学方面:《天文地理》、《彗星论》、《彗星略论》、《论日蚀》、《星学举隅》、《天文图说》、《土星考略》、《论古时地动仪》等。

地理学方面:《万国地图说略》、《八星之一总论》以及哥伦布的介绍。

医学方面:《西医举隅》、《西医汇抄》、《医理杂说》、《论饮食消化之理》、《脉理论》、《生命大律》以及一些新药介绍。

农学方面:《农学新法》。

政治学、经济学方面:《国政要论》、《富国养民策》、《论生利分利之别》、《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论泰西国政》。

教育学方面:《泰西诸国校塾》、《振兴学校论》以及对美国芝加哥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介绍。

历史学方面:《三十一国志要》、《泰西新史概要》。

哲学方面:《性海渊源》、《大同学》。

人物传记:《亚里斯多得里传》、《泰西格致诸名家传》、《华盛顿肇立美国》、《瓦稚各格致志略》、《多尔敦化学志略》、《法拉特志略》等。

《万国公报》还在“各国要闻”和“智能丛话”栏内做专论报道，介绍一些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和新的发明创造，如林乐知的《格致源流说》对科学实验的方法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①《论二十周之前途》一文，介绍了20世纪内科技的发展将会出现电光灯、无线电报、电气火车以及水底船（潜水艇）、飞行器（飞机）等。^②“智能丛话”栏目对镭的新发明做了最先介绍：“近日新得之一种原质曰雷铎恩者，研究之人甚多，而其价甚贵，故得者颇少，闻每两值三百万金元，而发明雷铎恩之古利氏（即居里）夫妇，生平所得，亦不及半两云。”^③

甲午战争以后，评论时政的文章在《万国公报》上屡见不鲜，如：

林乐知：《中美关系略论》、《滇事危言》、《俄国新筑西北里亚铁路说》、《各国机务汇志》、《中日朝兵祸穷本推源说》、《中日两国禁止互歧论》、《以宽恕视仇怨说》、《操纵离合论》、《险语对》、《泰西新政备考》、《防俄杂说》、《论真实为兴国之本》、《俄荣示险于天下尤险于华英论》、《让台记》、《广学兴国说》。

李提摩太：《泰西新史揽要译本后序》、《新政策》。

李佳白：《上中朝政府书》、《创设学校议》、《推本穷源论》、《改政急便条陈》、《新命论》、《理财篇》。

艾约瑟：《富国养民策》。

狄考文：《拟请京师创设学堂议》。

卫道生：《论中国保民主要之法》。

李修善：《崇实黜浮说》。

甘霖：《中国变新策》。

① 《万国公报》第106册，第1—3页，1897年11月。

② 同①，第161册，第10—11页，1902年6月。

③ 同①，第28页，1905年11月。

华立熙：《为政以德论》等。

为了支持变法维新，《万国公报》还比较多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各种经济学派的理论，以为维新提供“富国策”。如约翰·穆勒劳资关系的论点，亚当·斯密对资本构成的论述，李嘉图有关看法等在《万国公报》上都做过介绍。除了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以外，对当时流行于欧美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也做了介绍。对法国巴黎公社起义、德国工人大罢工以及欧美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和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情况都有报道和介绍。至于连载李提摩太所编译的美国人员拉米（Bellamy, E.）的小说《回顾》，更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形象介绍和描述。

1894年12月《万国公报》登载了加拿大传教士马林（Macklin, W. E.）的《以地租征税论》一文，这是他对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George, Henry）的《进步与贫困》一书部分内容的译介，其中对乔治土地国有的主张做了介绍，即：土地应当国有，人人都享有土地权利，如同享有空气和水一样；土地被私人占有是社会贫富不均的主要根源，因此就要征收地价税归公共所有，废除一切其他税收，从而使社会财富趋于平均，达到大同。后来，马林对乔治有关土地、劳力、资本和地价税归公等观点做了译介，并阐发了自己的见解，直言：中国“当今之患，不在不足而在不均”，“富者占地太多”，因此“只收按地之租，悉免他途之税”，把交给地主的租钱“归之于公用”，便可“公私两便，即上下皆优矣”。^①马林意图敦促清政府通过土地单税的办法来革新图强，富国养民。

1899年，《万国公报》还最早把马克思以及他的《资本论》介绍到中国来。在李提摩太节译英国进化论者颌德（Kidd, B.）的《社会进化论》中，有如下记述：“其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

^① 马林：《富民策序》，《万国公报》第114册，第9页。1898年7月。

突过于君相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① 还说：“今世之急，恐将有更甚于古者，此非凭空揣测之词也。试稽近世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德（即马克思），主于资本者也；美国之爵而治（即亨利·乔治）主于救贫者也；美洲又有柏辣弥（即贝拉米）主于均富者也……”^②

《万国公报》对各种流派的介绍大都很零散、浅显，但对于当时的国人来说，却仍是很新奇的，对维新派变法理论的形成，提供了西方的素材，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这一时期，《万国公报》更加引起上层社会文人、官吏的重视，从而成为全国瞩目的报刊。广学会也自称：“《万国公报》包含很广泛的内容，而且由于撰稿人包括外国人和中国人，他们大多数都是在中国最有能力和最富有经验的作家，所载文章差不多都很适合时代，有力，令人发生兴趣，因此也为广大读者所欢迎。”^③ 其发行量之广，最高峰时达 38400 份，广学会在第 10 号年报中有一组《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和其他书籍销售额的统计，虽然没有单独列出《万国公报》的销售额，但总额是在逐年增加：

1893 年	817.97 元
1894 年	2286.56 元
1895 年	2119.22 元
1896 年	5899.92 元
1897 年	12146.91 元

① 李提摩太：《大同学》、《万国公报》第 121 册，第 11—13 页，1899 年 2 月。

② 同①，第 123 册，第 16 页，1899 年 4 月。

③ 《广学会年报》第 4 号，《出版史料》1988 年 3、4 合刊。

1898年 18457.36元

广学会对这组数字的说明是：“从1895年起我们的营业额是成倍地在增加，中国人真正开始在珍惜我们的书刊。如果以后几年都能以同样速度递增的话，在下个世纪我们的营业额每年将会增加到十万银元，我们的书籍将居中国各家思想中最有影响之首。”

《万国公报》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多大？我们可以先列举几个事例：一是《万国公报》复刊后，广学会收到的信息反馈说：帝国中的高级官吏都已看到它，并均有好评。也有许多人直接写信表示赞许。广学会收到广州领事的来信说：从张之洞总督的一位秘书的谈话中获悉，这位秘书和他的许多朋友都是这个杂志的订户，他们认为这是中文中从未见过的好杂志，总督自己也在阅读它。二是原本很闭塞保守的湖南省，其主考官写信称，他阅读了很多广学会的书籍和《万国公报》，将其中很多西方政治学、历史和应用科学介绍给学生并作为必修课目和论文题目。然而这些方面的知识他毕竟知之不多。他们阅读《万国公报》，同意其中所讲的道理，但又提出许多自己解答不了的问题，故邀请编辑能够亲赴湖南指导。三是李提摩太在北京发现维新派也创办了一个与广学会相仿的文学会，还办了一份杂志，取名为《万国公报》，双日刊，其内容完全是转载广学会《万国公报》的文章，广学会以为这是对他们的称赞，“称赞莫过于模仿”，在帝国的首脑和心脏地区——北京出现这种情况，足以显示广学会的影响。四是八国联军入侵时，有一名传教士进入皇宫，看到了光绪皇帝存放的全套《万国公报》，而广学会也收到过许多普通订户的信，要求补订没有买到的过期的《万国公报》。

这些足以说明《万国公报》的影响及至皇帝、政府要员、文人学者、普通订户，地区辐射上海、广州这些最早开埠的大都市以及帝国中心北京和偏远闭塞的省份。

应当指出，从《万国公报》所宣传介绍的内容来看，它已不

再是单一的宗教性宣传，而是科学纳入宗教、宗教渗透科学、基督教义、西方文化、中外时政溶于一体，无论是介绍西学，还是支持变法，都冠以基督教教义，这也正是19世纪西方传教士在殖民扩张中的历史地位所决定的。

晚清时期西学东渐已成大势，所有的舆论宣传都在或多或少地介绍西学，《万国公报》在传播西学中突出的特点是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应用性和普及性，从而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3. 广学会的赠书与售书

赠书与售书是广学会的主要业务工作，而赠书则是其发行工作中的一大特点。传教士赠书并非自广学会始，早期来华传教士为传教布道，常常随手散发宗教传单及有关的小册子。那时散发的都是宗教性宣传品，目的也仅是为配合传教而已，洪秀全当初所得《劝世良言》即属此类。

广学会的赠书与此有同有异，所谓同是因为广学会创办的目的是想通过宣传来“感化”中国人。对这样一种精神使命，基督教各差会都拨给专款，并无眼前经济效益的顾虑，赠书并不吝啬。所谓异是广学会的赠书有明确的目的，他们说：“我们的目的是教导中国的上层人士和知识阶层的男女人士，让他们知道中国的贫困可以被拯救，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可以得到新生。为取代最终将使个人和国家都将毁灭的自私，我们要把基督的爱和慈悲普施于一切人。直接促进中国的利益就是间接地促进其他国家的利益，这样的宗旨是永远有利的。为了实行这个宗旨，我们认为应利用中国政府和知识界中的领袖人物来发展我们的工作。”也就是说广学会赠书的对象非常明确，是中国的上层人士和知识阶层。由于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度，注重文化，“中国大众对学者特别尊重”，“教育了这些人实际上就是教育了三亿五千万中国人。我们对他们施加影响，实际上就是影响了其余的四分之三”。通过这样的工作就可以扩大广学会的影响，最终使

西方各国获利。

中国是一个地广人多的大国，每一个省就相当于一个欧洲国家的大小，广学会欲施以影响的中国上层人士和知识阶层的文人学者就分散在各个省份，如何实施？广学会的传教士分析：中国有一套严密的教育制度。考秀才（相当于西方的文学士）的考生三年考试两次，举人（相当于硕士学位）三年考一次，这样，每年都有一次大规模的考试举行。这正是广学会赠书的极好时机。所以乡试、省试、会试时赠书成为广学会赠书的主要途径。1905年科举考试废除以后，则改为向各地新设立的学校与地方官员送发，如1909年，广学会曾将38种书籍装箱发往全国8个总督与18个巡抚，1916年以后发展为会员交纳会费免费赠送年内各种书刊。至于那些政府官员赠书则主要是通过各种关系私人赠送。

广学会赠书方便、适时，深受主考官和考生的欢迎。如江苏南京考场，赠书的传教士在考前几天雇佣了20个帮工，把要赠的书分包装好，考试那天，在考场外，秩序井然地把书赠送给每位从考场出来的考生们。负责赠书的传教士给广学会写信报告说，南京的官员们非常客气，给了他们种种方便，那些分发书刊的人还被请到考官们的临时办公室去休息，官吏们还嘱咐所有守卫在考场出口的官兵们对传教士和他们的助手们要特别照顾。他们甚至被请进入考场的外门，而站在门外的成千上万的人却被禁止入内。广学会的赠书多是小册子或单张，便于随时浏览，有的包装好，携带方便。更主要的是这些书籍的内容多与考试有关。西学东渐使科学的内容也逐渐渗入科举，考试科目中除传统的四书五经内容外，也有关于时务策论的，这些就使应考的文人、学者视广学会所赠的西学书籍为“必读”之书，广学会所出书刊影响从此日益扩大。

广学会赠书数量相当大，1900年以前，据不完全统计，7年中共赠书约226640余本，最多的一年是1897年，这一年正是乡试，共赠书121950本，赠书地区涉及之广有：成都、西安、太

原、北京、沈阳、济南、开封、南京、武昌、杭州、福州、云南等。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内地城市。这说明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西学西艺知识的介绍也已扩展到内地。所赠书籍绝大部分是西学之书，宗教性的宣传书仅是少数，粗略统计，约占 22%。广学会所赠确实使中国的文人学者增长了不少西学知识。山东曲阜孔子的后裔孔令伟曾给广学会写信表示，在他们那里，闭塞无知，对外界的事极不了解，读了《万国公报》，情况才有所改变，并要邮购广学会的其他书籍。浙江杭州有一儒生，也在信中写道：“我住在一个乡村里，但我读过你会出版的一些书，它们确实有助于提高中国的水平。”在广学会搞的有奖征文活动中，负责阅卷的慕维廉也认为答卷的文人学者具有不少科学方面的知识，所达到的水平比他们预期的要高得多，涉及的面也要广得多。客观地说，这些与西学书籍的广泛散发，西学知识由此得以传播是分不开的。

广学会还有一套售书的渠道，在上海设有专门的书店，主要负责各地的邮购业务。这项业务在当时较为繁重，各地的传教士经常大量地邮购图书，不必汇款，只需由各差会设在上海的“教会联合会计处”转账。各差会也有购书的专款，如美国北长老会差会总部就曾拨出专款给长老会传教者每人订一年的《道声》杂志，为每位女传道者订一份《女铎》。广学会在全国各地设有专卖点 35 处，当时全国分为 18 个省，这些专卖点除一处设在朝鲜，其余分布在全国 14 个省，可见经销范围之广。每处有专门负责人，多是传教士。

从广学会所统计的历年售书额（前文已引）来看，销售情况非常好，年年增加，仅是 1898 年一年的销售额就比 1895 年的 2119.22 元增长了近九倍，这与广学会出书的内容、广告宣传和当时中国的变法维新形势分不开，文人学者关心时务，学习西方已不再是少数，广学会的赠书售书起到了促进作用。

4. 广学会举办的有奖征文

广学会为了更广泛地扩大社会影响，吸引士人，经常举办有奖征文。论文的题目由广学会拟定，登在《万国公报》上公开征文，参赛者将参赛论文按要求投送。参赛论文由专门组成的评委会来审阅，判出获奖名次。有时广学会也将有奖征文启事专门拟定印发，或在规定的征文对象内散发。

广学会首次有奖征文是1889年，论文题目有二：（1）中外科学之差异；（2）西方数学及其优点何在。这次参赛的论文共20篇，经审阅后有4篇获奖，奖金分别是10元、7元、3元、2元。慕维廉牧师负责阅文，他认为这些论文达到一定的水平，参赛者也具有广泛的科学知识。

广学会作为有奖征文活动的举办者是以此作为扩大影响的手段，但作为社会人士和参赛人员却通过征文题目对西学西艺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进一步的探求，正如参赛者在参赛论文中所表示的：接触外国科学感到惊异和满足，并深深体会到它对中国的影响。^①

有奖征文的题目绝大部分都是关于西学西艺的，其中原委，广学会称：“科学没有宗教会导致人的自私和道德的败坏；而宗教没有科学也常常会导致人的心胸狭窄和迷信。真正的宗教和真正的科学是互不排斥的，他们像一对孪生子——从天堂来的两个天使，充满光明、生命和欢乐来祝福人类。我会就是宗教和科学这两者的代表，用我们的出版物来向中国人宣扬，两者互不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两者互相结合，才是使这个国家获得有效和彻底改革的惟一基础。”^② 1893年广学会拟定有奖征文题目30个：（1）铁路之益；（2）邮政之益；（3）游历各国之益；（4）公司、轮船行于各国之益；（5）钢厂铁厂之益；（6）农学；

① 《同文书会年报》第2号，《出版史料》1988年2期。

② 《广学会年报》第10次，《出版史料》1991年2期。

(7) 机器学；(8) 化学；(9) 电学；(10) 格物学；(11) 报馆之益；(12) 公家书院之益；(13) 博物院之益；(14) 寄居他（它）洲之益；(15) 两国违言，凭局外公断弭兵之益；(16) 集股贸易之益；(17) 五洲自主商品之益；(18) 银行汇通五洲之益；(19) 官录终年清摺之益；(20) 生利分利之益；(21) 万国关税均齐之益；(22) 列国征收钱粮之法；(23) 列国地方官酌征公费之法；(24) 列国养民之法；(25) 列国教民之法；(26) 列国新民之法；(27) 列国安民之法；(28) 列国变通之法；(29) 列国行善之法；(30) 列国盛衰之故。^① 这些题目涉及了西学的很多学科，它对于国人了解西方、学习西方、接受西学是非常有益的。有一位在重庆偏远山区的外国人曾向广学会谈起，在他住的地方，李提摩太、林乐知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他与那里的知识分子交谈时，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向他要有有关外事、科学和数学方面的书籍，人们对西学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894年的有奖征文是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次，这一年苏州、广州等地将要乡试，英国在沪的地产富商汉璧理捐资600两，并提出有奖征文的建议题目。广学会接受汉璧理的建议，由李提摩太拟定五个征文题目，每题后附有该题内容要求提示，在《万国公报》上登出，还印出一万张征文启示在苏州、北京、广州、福州、杭州五地参加乡试的考生中散发。李提摩太所出的五题是：

- (1) 开筑铁路、鼓铸银钱、整顿邮政为振兴中国之大纲论。
- (2) 维持丝茶议。
- (3) 江海新关考。
- (4) 禁烟檄。
- (5) 中西敦睦策。

征文启示1894年8月在《万国公报》上登出，收稿截止于1895年1月5日，应征的论文要在半年内做完，投至设在上海虹

^① 《万国公报》，华文书局影印本，第21册，第13417页。

11昆山路中西书院的收稿处，王韬、沈毓桂、蔡尔康为评审人。此次征文共收到 172 篇，经过评审，最终有 70 篇获奖，分为六个等级：一等奖 5 名，各得奖金 16 两；二等奖 5 名，各得奖金 12 两；三等奖 10 名，各得奖金 10 两；四等奖 10 名，各得奖金 8 两；五等奖 10 名，各得奖金 6 两；六等奖 30 名，各得奖金 4 两。

获奖者中除有 8 人曾参加过上海格致书院的学习之外，其他人应当是各地普通士人学者，他们正是通过广学会所提供的西学书籍和有奖征文之类的传播西学的活动，更多地了解了西方社会，思考中国社会的现实，康有为这位维新运动的领袖当初就是参加征文比赛、获取末奖的普通士人“康长素”。

三、广学会在晚清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与作用

1. 广西国之学，影响变法维新运动

对晚清三大家翻译、出版机构，史学界多有研究评论。顾长声先生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中谈到：江南制造局出版了一些科技书；北京同文馆出版了一些有关洋务知识的书；而“广学会的规模和出版数量远远超过前两家，在当时中国极端缺乏西学书刊的情况下，广学会出版物中的西学部分，对中国知识界是有一定启蒙作用的”，“特别是在维新运动期间，确实出了不少书刊，对中国有一定的影响”。熊月之先生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一书中认为：“江南制造局所出书籍偏重于应用科学、自然科学基础知识方面；广学会所出书籍则偏重于批评弊端、鼓吹变法方面……从思想文化发展角度看，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属于洋务时代，广学会则属于戊戌时代。”叶晓青在《近代西方科技的引进及其影响》一文中指出：“同文馆三十年间译著近二百部，内容侧重于外交、世界史、时事方面；广学会的翻译工作开始得较晚，侧重于宗教、外国史、医学等方面……就科学译著而言，无

论是以广学会为代表的教会，还是当时其他机构，都不能与江南制造局相比。近代新学科的引进工作大部分是江南制造局完成的。”这些高见对三家所编译、出版的西学书籍内容和所处的地位、影响给予了清晰的界定。

前文对广学会 1888 年至 1902 年编译、出版的书籍数做了粗略统计，这些书有三分之一是甲午战争以前出版，其余均在 1895 年以后。就内容而言，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广学会所编译、出版的西学书籍以及《万国公报》所宣传的西学西艺，有很多是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声、光、化、电知识。比如韦廉臣所写的《天文图说》一文自《万国公报》第 10 册（1889 年 11 月）起连载，至 1890 年 8 月韦廉臣去世时的第 19 册仍在连载，至 1890 年 9 月第 20 册起由慕维廉续写，直至这年年底的第 23 册才连载完毕。《万国公报》还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连载慕维廉所译著的《天文地理》、《生命大律》两篇长文。此外，韦廉臣的《格致有益于国》、艾约瑟的《西学略述自识》、李佳白的《西国治河成法》、李提摩太的《八星之一总论》等关于自然科学的主要文章都是在这时介绍的。

甲午战败以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已不再满足于以前的西方自然科学和制造技艺方面的知识，他们想更多地了解西方的社会科学知识。广学会宣传的重点便是围绕维新变法，除介绍西方各国的有关情况外，也有很多是直接针对中国内政外交现实的。如林乐知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中美关系略论》、《滇事危言》、《俄国新筑西北里亚铁路说》、《各国机务汇志》、《中日朝兵祸穷本推源说》、《中日两国进止互歧论》、《以宽恕释仇怨说》、《操纵离合论》、《险语对》、《泰西新政备考》、《防俄杂说》、《论真实为兴国之本》、《俄荣示险于天下尤险于华英论》、《让台记》、《广学兴国说》；李提摩太发表的《泰西新史揽要译本后序》、《新政策》；李佳白发表的时政文章《上中朝政府书》、《创设学校议》、《推本穷源论》、《改政急便条陈》、《新命论》、《理财篇》

等；艾约瑟的《富国养民策》；狄考文的《拟请京师创设学堂议》；卫道生的《论中国保民主要之法》；李修善的《崇实黜浮说》；甘霖的《中国变新策》；华立熙的《为政以德论》，等等。

总起来看，广学会从创办到1900年以前这十多年间，是其编译、出版、宣传最活跃的阶段，也是它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时期。以中日甲午战争为界，其编译、出版以及宣传内容的这种明显的导向，是由中国社会现实和中西两种异质文化接触中所产生的特定规律决定的。广学会是由传教士所创办的编译、出版机构，在创办之初，它的宗旨就非常明确，是要通过它的宣传来“感化”中国人，但是在宣传宗教过程中，传教士们已深深感到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并没有随着清王朝的衰微而减弱，时代虽已跨入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大门也被西方入侵者用大炮打开，但是要想用西方文化取代中国文化决非易事。要使更多的中国人接受他们的宣传，成为基督虔诚的信徒，就必须改变以往的策略，一方面，在传教的同时也宣传一些自然科学的知识，所谓的“宗教与科学是一对孪兄弟”，利用当时中国人对西学的渴求，进行它的“感化”宣传。另一方面，传教士必须根据近代中国民族文化心理接受程度和需要，结合中国社会现实，有选择地宣传介绍西方文化。19世纪七八十年代洋务派兴办的洋务运动在“寓强于富”的口号下，正在筹办民用工业，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科学技术，开矿、办厂、筑路、通航，广学会的宣传在这时带有自然科学的内容。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维新和改良运动酝酿、兴起，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要求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社会改革，广学会在这时便主要是介绍欧美各国的西政、西法。由此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说，广学会宣传活动的时、空，是由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决定的。

变法维新前后，广学会有针对性地介绍了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理论以及欧美各国的有关情况。

政治方面：早在 70 年代，西方社会政治理论就由林乐知比较完整地介绍到了中国。他在《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中介绍了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学说。19 世纪末，西方各种思想流派迭出，基督教内兴起现代派，主张传教与社会现实相联系，反对社会贫富悬殊和堕落。来华传教士们在众多的思想流派中有选择地加以介绍宣传。美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被传教士介绍进来，这就是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所翻译的、美国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爱德华·贝拉米的著作《回顾》(Looking Backward)，译名为《百年一觉》。1891 年 12 月至 1892 年 4 月《万国公报》连载，1894 年又出版了单行本。

《百年一觉》按照原著的体裁，以幻想小说的形式向人们描述了公元 2000 年的社会主义社会。大意是说，一位青年男子因病昏睡百年之久，一觉醒来，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社会人人平等从事劳动，物质产品极其充足，按需取用，精神文明，道德高尚，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作者以此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暴露出来的弊端，宣扬未来的大同之世。

经济方面：西方经济学理论被从多方面加以介绍，如艾约瑟编译的《富国养民策》，李提摩太的《生利分利之别论》。艾约瑟介绍了西方生产经济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对分工、资本、工资、地租、利息、股份等都做了较详细的介绍，他用按劳分配的原则对工人工资做了表述，对生产的三大要素——生产力、生产资料、生产工具从“增利之法”、“生财之源”的经济角度分析，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中崇尚“蓄财”、抑制消费是保守的维持生产，无助于增利、生财、扩大再生产。

李提摩太则提出了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花之安介绍了英国的财政预算制度；林乐知介绍了西方各国财政收支和财政状况；卜舛济在《税敛要则》中列举了西方八种税收法，即地租、累进所得税、财产继承税、资产税、人口税、关税、特别营业税及邮政税。

教育方面：新教传教士，从东来第一人马礼逊始就非常注意教育，以此作为传教的重要手段之一。随着传教士进入中国，教会学校陆续建立，西方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在中国传播开来。戊戌前后提倡从教育改革入手富民强国，把教育提到首位的论著当属林乐知所翻译的《文学兴国策》。

《文学兴国策》原编者是一位叫森有礼的日本人，他是明治维新后著名的外交家，日本第一任驻美国大使，在任期间，他考察后认为美国的富强之道在于教育。他以大使身份向美国文化教育机构、官员、著名学者发出公函，进行专题问卷调查，得到的反馈极为热烈，资料丰富。森有礼将此收编成册，定名《文学兴国策》。日本政府据此大力加强教育，国势日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蕞尔小国”一举战败久以为师的“天朝大国”。

《文学兴国策》所辑的复函，从多角度论述了教育的重要性，如：教育与富国；教育与商务；教育与农务、制造；教育与伦常德行身家；教育与律例国政。所有的复函都一致认为教育是富民强国的根本。这些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启示是十分深刻的。

19世纪70年代始，中国社会出现了早期改良主义思潮，至世纪末促成维新变法运动。就客体而言，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就主体来说，从早期改良派到戊戌维新派，他们改良、变法的思想主要来源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国家政令法律以及科技文化。甲午战争前的十年间，康有为聚徒讲学，常常尽情地发挥所学到的西学新知识，讲到进化论，必然联系社会改革，讲自然变迁，就讲人类社会，他还常把《万国公报》上的文章作为讲义给学生们释解，逐步形成了以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在中国进行资产阶级改良的维新变法为核心的政治思想体系，他的基本主张处处渗透着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影响。

政治上：君主立宪的强国之制。康有为指出，“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即实行“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而中国仍实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

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为此，中国“图强之计”在于“变行新法”，“采法俄日”，实行“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即“行宪法”、“开国会”，君主“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只要“君民共治”就能“合四万万人心以为心，天下莫强焉”。^①

康有为认为实行君主立宪的具体办法是：选“议郎，设议院”。“议郎”可“轮班入直，以备顾问，并准其随时清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辞”。“议院”则遵照皇帝的旨意，依法对于“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开会讨论，并本着“三占从二”的原则来决定其废立禁行，以达到“政皆出于一堂，故德意无不下达；事皆本于众议，故权奸无所容其私；动皆溢于众听，故中饱无所容其弊”。^② 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君主“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③ 设立制度局与十二局，制度局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负责审议通过各种法律制度，十二局为具体推行新政的各专门办事机构。

经济上：发展工商业乃“立国之本”。康有为指出，应当彻底改变“农本”思想，“以商立国”，制定“惠商劝工”政策，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他还提出一套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的具体方案，如采用机器、奖励发明、开矿筑路、办工厂、造船、设商会农会等。这样才能“立国新世，有恃无恐”。^④ 康有为还强调：要发展工商业就必须既要彻底废除“内之穷农工之源，外之损富商之实”的封建厘金制度，又要打破洋务派对新式企业的垄断，无论民用企业或军用企业，均宜“纵民

① 康有为：《清定立宪开国会折》，《戊戌变法》第2册，第236、237页。

② 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176页。

③ 同①，第237页。

④ 康有为：《请厉工艺创新折》，《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88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为之，并加保护”。

教育上：废科举，倡新学，“养有用之才”。康有为认为“诸学并立，大学岿然，人才不可胜用”，是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强盛的重要原因。资本主义的文化教育可使人以“最有用之年华，最有用之精力”“从事科学，讲求政艺，^①而封建主义的教育却“不立学校，但设科举，是徒因其生而有之，非有以作而致之，故人才鲜少，不周于用也”，^②所以康有为主张，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试论；创办京师大学堂，各地书院改为学堂，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设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奖励新著作、新发明，创办报刊，允许自由组织学会。

对康有为提出的这些维新变法的主张，李提摩太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我惊奇地发现，几乎我以前所作的种种建议，全都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体而微的计划中了。无怪乎他来访问我时，我们有那么多共同之处。^③李提摩太说得不错，康有为就曾自称：“美国人所著《百年一觉》书，是大同影子。”^④

《大同书》是康有为变法维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百年一觉》有许多相似之处，除了在写作方法上与《百年一觉》一样采用对比外，更主要地还是吸收了它所宣传的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大同书》共十部分，除第一部分谈论“人道之苦”以外，其余九部分是探讨产生人世间诸苦的九重障碍，提出要打破这九重障碍，就可达到大同，即：去国界合大地，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去形界保独立，去家界为天民，去产界公生业，去乱界治太平，去类界爱众生，去苦界至极乐。也就是要打破国家的界限，铲除阶级的束缚，沟通种族的感情，去掉男女的

① 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法试士改用策论折》，《戊戌变法》第2册，第210页。

② 康有为：《请开学校折》，《戊戌变法》第2册，第217页。

③ 转引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80页。

④ 《康南海先生口说》，吴熙钊点校，第31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界限，消灭家庭的痛苦，消除生产的不均，取消地方的界限，实现人已同权，万物一体，没有痛苦，人类大同。书中对未来社会的描写，明显地受到《百年一觉》的启发，康有为设想大同社会里“尚文”“以开人智为主，最重学校”，“其学人之进化过今不止千万倍”，“重工”“所尊高者工之创新器而已”，到那时，“机器日新，足以代人之劳”，“劳动苦役，依之机器，用及驯兽，而人惟司其机关焉”。就连农业生产亦是“凡举百动皆有机器，无须沾手涂足之勤”，“其速率比于今者，或千百倍”。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一人作工之日力，仅三四时或一二时而已足，自此外皆游乐读书之时矣”。物质和精神生活都达到了“愿欲皆获”的程度，人们犹如“极乐天中之仙人也”。他进一步想像，在大同社会里，人们穿的是“裙履踟蹰，王采朵沓”，“裹身适体，得寒暑之宜，藏热反光，得养身之要”；吃的是“饮食日精，渐取精华而弃糟粕，……故食日多而体日健”；住的是“贝阙珠宫，玉楼瑶殿”；乘的是“飞屋飞船”，且“大小舟船皆电运，不假水火，一人司之，破浪千里”。这与他所指陈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悲惨的处境形成鲜明的对比。

可见，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戊戌维新派，无论是变法维新的理论来源，还是其变法的基本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启发，而在这一时期，广学会是传播介绍西学的主要角色，它对变法维新运动乃至整个晚清思想界的影响应予以历史的评价。

2. 融合中西文化启示社会士人

早在中国的国门被强行打开之前，西方近代文明便随传教士扩张而至，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传教士们深深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阻力。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它始终是以接受儒家文化观念的征服者民族居于主导地位，先后不同民族的征服者无论建立何代王朝，都不可能中断儒家文化，这就为民

族文化心理因素的积淀提供了前提条件。中国民族文化因中国的地理位置又决定它具有自身的独立性，中华疆域东濒茫茫无际的太平洋，北临漫漫戈壁和浩瀚的原始针叶林，西面则万里黄沙与高山雪峰相间，西南壁立着世界上最庞大而高峻的青藏高原。这样一种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对于中华文化特质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深刻而久远。其独立性是说在它萌发成熟期不曾与其他古代异质文化彼此渗透、相互影响；在其发展期内它始终保持自身的风格和系统，以其特有的惯性和稳定性历朝数代地前后递进，陈陈相因。当然并不否认中华文化与中亚、西亚文化曾进行过卓有成效的交流，但那时中华文化没有受到任何外来文化的根本性挑战，而且中华文化明显高于周边地区。千年文化的积淀便形成了妄自尊大的心理态势，再加上长期的闭关锁国，到了晚清，强烈的中国文化中心意识和优越感并没有改变。传教士遇到的阻力主要来自士大夫阶层，而士大夫的精神支柱就是儒家思想，要想扩展教会势力，完成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扩张，就必须对儒家文化做出某些妥协和利用。鉴于此，19世纪70年代，基督教传教士做出了战略上的转变，这就是由早期传教士“要么孔子，要么耶稣，两者必居其一的孔子或耶稣”政策改变为“孔子加耶稣”，融儒教与基督教一体或救世教成全儒教。

广学会正是在基督教完成了上述战略转移后确定了自己创办的宗旨，它是基督教对儒家文化做出某些妥协和利用的具体实践。士大夫是儒家文化的承载者，要想突破他们，就要研究儒家文化，寻找突破点，这是从对比中西两种异质文化开始的。

早在19世纪70年代，林乐知、李佳白就对中国士大夫的妄自尊大和尊祖法古的心理进行过分析。林乐知认为，妄自尊大的产生是由于“中国千百年前之邻国，东则如朝鲜、倭、日本、琉球之属，南则如牂柯、夜朗、缅甸、安南、暹罗、吕宋之类，西则如氐羌、吐蕃、楼兰、龟兹、于阗、乌孙、波斯诸邦，北则如匈奴、突厥、契丹、回纥各部落，声明文物实皆逊中国远甚，譬

之良骥，永无蹶其后尘者，纵具追风逐电之材，遂不觉自安于弩劣矣”。^① 李佳白认为：“中国自张骞凿空而后，甘英临海以还，开边垂为切戒，輶车从未远出，彼夫李唐求经，僧徒远迈，然即色即空之妙悟，非以人治心之盛心也。……即前明三宝太监下西洋，传为盛事，实不过游历南洋各岛。红海以东诸地，意在搜求珍异献诸内府以给耳目之玩，即招致远人以示柔服之情，亦不甚专，故其役旋罢。此华人所以不悉外情，因而故见自封也。”^② 林乐知和李佳白的分析是从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处的优势及中国采取闭关锁国政策得出的，应该说，这些认识是比较中肯的。

对于儒家文化中尊祖法古的历史观，林乐知、李佳白是从对比中西差异中提出的：“西人事事翻新，华人事事袭旧”，^③ “外国视古昔如孩提，视今时如成人；中国以古初为无知，以今时为不及”。^④ 他们还较为深刻地指出，尊祖法古必然总是以祖先、古制为评判标准，“凡新法新意与古不合者，皆以为伪造而深恶之矣”，因此，因循守旧成为中国人一种思维定势，“不知盼望前程，但知遵循旧辙耳，如有生今之世，复古之道者，则必视为名教之罪人矣，或有违悖昔圣贤之遗训者，亦必斥为不赦之罪人矣”，^⑤ 其结果是“西国万事争先，不甘落后，中国墨守成规，不知善变，此弱与贫所由来也”，“西国有盛而无衰，中国每颓而不振”。^⑥ 这些分析有它内在的合理性，也已为有经世之志的一批知识分子如王韬、郑观应等人所认识。在今天看来，这种儒家

① 林乐知：《中东战纪本末》初编，卷6第16页，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图书集成局铸铅代印。

② 李佳白：“中国能化旧为新乃能以新存旧论”，《万国公报》，华文书局影印本，1897年2月，第26册，第16644页。

③ 李佳白：“中国以广新学以辅旧学说”，《万国公报》第102册，1897年7月。

④ 林乐知：《中西关系论》，1882年申报馆代印，卷1，第9页。

⑤ 林乐知：《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第10集，下卷，第54—55页。

⑥ 林乐知：《中西关系论》，1882年申报馆代印，卷1，第9页。

文化中的保守性是古代文明的基本特征，仅从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中寻找是不够的，应该透过它们去分析更深刻的原因。

19世纪八九十年代，广学会出版了一批由传教士编撰的论著，对中国文化价值进行了更直接的讨论。林乐知在《中东战纪本末》中批评中国社会有八大积习，即骄傲、愚蠢、怯、欺诳、暴虐、贪私、因循、游惰。

“骄傲”，“中国恒以为惟我独尊，且蔑视四邻，曰之为蛮夷戎狄”。当西方诸国“相逼而来”之时，“中国仍泥闭关自守之故智，视俄、英、普、法、美诸雄直若不逮肘腋间之暹、缅、越、朝诸小国也者。其视来华之欧美等人更与野人无异”。

“愚蠢”，“愚国民间有大量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的残余”，表现在万物有灵论和精灵崇拜上，即视自然物皆附有精灵生命而加以膜拜。这种低级的宗教意识正是愚昧文化的表现。

“欺诳”，“泰西教法戒打诳语，……华人则习以为常，任意铺张，凭空待撰……支离掩饰。……故遇有战争之际，军书旁午尽成官样文章，直至莫可弥缝，犹欲无中生有，于实事求是之道，不啻相去天渊。且己即以欺诳之心待人矣，又乐受人之欺诳而不疑。是以拜佛烧香，冀饶冥福；缔婚安葬，必卜祥征”。

“暴虐”，官府“于寻常刑讯之外别创非法诸刑具，甚至草菅人命，罔知顾忌，……何论问民间疾苦，保民如赤子之仁人哉？”“文吏若此，武弁可知，是故将帅之待部曲，犹草芥也”。

“贪私”，“督抚自顾封疆，于邻境之安危置之不顾”，即使“京师有警亦各越趋退缩，徘徊审慎”；“无论事之大小，经手先欲自肥”；“将校之待士卒……以扣饷为治生”。

“因循”，“无论士农工商，悉皆古法之是循，不知新法之是效。为士者既泥于八股文章，不识致识之义，复泥于一篇诗赋，不知格物之端；为农者既泥于桔槔之用，不解植树以防旱灾，复泥于耒耜之负，不解机器与耕畎田；为工者既泥于前人制作，不知巧妙之翻新，又泥于依样葫芦，不知扁机之捷用；为商者既泥

于往来市肆，不欲抵外国以通商，又泥于买卖己邦，不欲涉海洋以贸易”。

“游惰”，“京官有逐日藉词请假者，外吏有出衙清严之地、军务倥偬之日而演戏举觞以为乐者”。

林乐知还对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生活习俗等方面的陈腐、弊端做了批评。此外，花之安在《自西徂东》中也指陈了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中的种种弊病和陋习，李提摩太在《生利分利之别论》中也批评了中国的“重农抑商”政策和传统的重义轻利观念。这些传教士从西方文化的角度，分析中西文化的差异，批评中国社会的弊端。他们所言有些过于夸大，有些也难免流露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但他们对晚清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与最初的出发点是完全相悖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与中国社会的进程是一致的，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程度地对传统文化有过“反思”，表示出某些怀疑和不满，力争进行新的文化选择，也力图从西方文化中得到裨益。但是，这些都不具有整体意义，尽管他们对后来者给予了多方面的启蒙，却没有形成新的文化选择的社会浪潮。

19世纪末，传教士对中国文化价值的讨论，毫不掩饰地深刻地批评了中国文化，这对于晚清这一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刻骨铭心的触动，为此才有了变法维新运动，并赋予它全面的社会启蒙性质。首先，他们从西学中获得了文化选择的崭新的参照系，并开始反省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深层次的中西文化对比，中国传统文化不再是尽善尽美、不可更改的真理，西方文化中也有先进的东西可以借鉴。他们得出了中国的三纲五常不如西方的平等；中国的亲亲不如西方的尚贤；中国的以孝治天下不如西方的以公治天下的结论。其次，他们以“物竞天择”的进化论观点否定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在文化选择的总体设想下，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模式。中学与西学，中国文

化与西方文化，不仅仅是文化在区域、文化在类型上的差异，而是两种不同层次的异质文化，那么必然是中学有中学的体用，西学有西学的体用。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固守“中学为体”就要落后时代，采取“西学为用”只是一种补救，因此向西方学习代之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从而构成戊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吸收西方文化的合理成分，进行文化选择的指向。

戊戌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的这种态度，冲破了民族文化本位论的束缚，使之有了时代的意义，这与他们从西学中获得反思的理论和动力是分不开的。

第四章 晚清的西学东译与汉学西译

一、同文馆的建立与译书

1. 被迫的开明之举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政府闭关政策的彻底失败。此后五口通商，外国商人、传教士等纷纷涌入中国沿海城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其中规定从此英、法的外交文件皆以其本国文字为正文，也就是说，与英、法两国交涉的文件要使用英文、法文，如对文词含义有异议，都要以外文为准。而偌大的满清帝国竟无一真正通晓洋语、悉知西情之人。面对华夷混杂、外交繁乱、人才匮乏的情况，筹办夷务的恭亲王奕訢和文祥、桂良联合具名于1861年1月奏请咸丰帝：“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今日久视为具文，未能通晓，似宜量为鼓舞，以资观感。闻广东、上海商人，有专习英、佛、米三国文字语言之人，请敕各该省督抚，挑选诚实可靠者，每省各派二人，共派四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并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资学习。其派来之人，仿照俄罗斯馆教习之例，厚其薪水，两年后，分别勤惰，具有成效者，给以奖叙。俟八旗学习之人，于文

字言语悉能通晓，即行停止。”^① 奏折中还援引了乾隆年间开设的俄罗斯文馆为可循的成例。^② 从恭亲王等人的奏折中可以看出，他们提议设立外文学馆，并无长远打算，实为形势所迫。国门已开，与各国的交涉日渐繁多，而不懂外语就要受制于人。为此，这个提议只是为了培养自己的外语人才，应外交之急需。尽管如此，在当时西学未得到承认，更耻于师事洋人的文化氛围中，它不失为明智之举。

奕訢等人的奏折很快获清廷批准，但所拟从广东、上海选派通外语的商人来京做教习的事却没有着落，广东称无人可派，上海虽有其人而艺不甚精，价则过巨。没有合适的外语教师，文馆迟迟未开。总理衙门“不得不于外国中延访”。后经英国公使参赞威妥玛(Thomas, Wade)推荐，总理衙门面试，该国通晓汉文的传教士包尔腾(Burdon John Shaw, 1826—1907年)被聘为教习。为防止包尔腾趁机传教，总理衙门明言在先，只准讲授语言文字，“不准传教”，此外还聘请了汉人徐树琳教习汉文。1862年夏(同治元年)，10名满族学生入馆学习英文，第一个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学堂正式开学，命名为“同文馆”。

1863年，同文馆创办的第二年，俄文馆并入。同年，法文馆也开办。英、俄、法三馆各有学生10人，同文馆的这种规模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第2679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② 俄文馆创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直隶内阁，职在为清政府造就俄文译员。学生人数，额定24名，全由八旗挑选。五年大考一次，成绩优异者，给予功名、官职，其余的留馆学习。有教习2人，提调1人；提调由内阁充派，管理馆内课程。此外还由理藩院派往官员1人，管理一般馆务。教习先以来华俄商，后从毕业生中派充。

学生考试成绩出众者，可以尽先分发理藩院，或边地须用俄文的衙署。俄文馆初创之时，对于训练学生读、解俄文，尚有成效，但到嘉庆年间(19世纪初)便渐失其培养俄语人才之功能。文馆考试，教习中仅一人懂俄文，学生中竟无一人能懂。理藩院与俄国往来文书，俄文馆更无人能翻译。至1863年，俄文馆归并同文馆，重新整顿复学。

一直至 1866 年。1872 年添设德文馆，1896 年添设东文馆。

同文馆创办之初是为应外交急需，专门培养外语人才。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和洋务派们对西学的不断认识，1866 年恭亲王又上奏折请专设一馆，讲习天文、算学，招收满汉科甲正途人员入馆学习。恭亲王的奏折说：“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而来。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工夫，即学皮毛，仍无裨于实用。”因此，他以为添设专馆，延聘西人，讲习天文算学，招收科甲正途的士大夫们来学习，使其对天文算学也能“洞澈根源”，“数年之后，必有成效”，“必有奇技异能之士出乎其中。华人之智巧聪明不在西人之下，举凡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① 同年，恭亲王又上一折，坚持前议，并针对朝中异议奏道：“……此次招考天文算学之议，并非矜奇好异，震于西人术数之学也。盖以西人制器之法，无不由度数而生，今中国议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苟不借西士为先导，俾讲明机巧之原，制作之本，窃恐师心自用，枉费钱粮，仍无裨于实际。……论者不察，必有以此举为不急之务者，必有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者；甚且有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此皆不识时务也。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② 恭亲王的再奏，得到同治皇帝的批准，但随即招来朝廷内外士大夫一片攻击。

先是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上折反对，理由有三：其一，“设立专馆，只宜责成钦天监衙门考取年少颖悟之天文生、算学生，送馆学习，俾西法与中法互相考验。至轮船、洋枪，则宜工部遴选精巧工匠或军营武弁之有心计者，令其专心演习，传受其

^① 《洋务运动》(二)，第 22 页。

^② 同①，第 22—23 页。

法”；其二，“科甲正途者”是朝廷命官的人才储备，他们只须“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伪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其三，“若以自强而论，则朝廷之强莫如整纪纲，明政刑，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诸大端。臣民之强则惟气节一端耳。朝廷能养臣民之气节，是以遇灾患之来，天下臣民莫不同仇敌忾，赴汤蹈火而不辞，以之御灾而灾可平，以之御寇而寇可灭，皆数百年深仁厚泽以尧、舜、孔、孟之道为教育以培养之也。若令正途科甲人员习为机巧之事，又籍升途、银两以诱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①

从张盛藻的奏折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设立算学馆选拔年少颖悟者、精巧工匠者、军营武弁有心计者去学天文算学他并不反对，而坚决反对的是让科甲正途的上大夫去学。身为朝廷命官之人，朝服在身，象征满清帝国、儒家文化最高水准，让他们去师事洋人，学习西法，无异于承认西学与中学同等重要，科学与科举并列存在，其内涵的深刻在于对西学文化价值的估价。西学虽已东渐，却还未形成滚滚洪流，对此，仍自认为居于世界文化中心的儒家士大夫是决不能接受的。张盛藻正是代表了他们的心声。

随后是理学大师、内阁大学士倭仁上折，对恭亲王奕訢的提议全面否定，他认为：“……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可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譎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往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术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① 《洋务运动》（二），第28页，《同治六年正月廿九日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折》。

“且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称兵犯顺，凭临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来未有之辱，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恨至今，朝廷亦不得已而与之和耳，能一日忘此仇耻哉？”

“议和以来，耶稣之教盛行，无识愚民半为煽惑，所持读书之士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闻夷人传教，常以读书人不肯教为恨，今令正途从学，恐所学未必能精，而读书人已为所惑，适堕其术中耳。”^①

倭仁所言，即立国之本在礼义人心；天文算学俱属末技，不值一学，即使学也不能“师事夷人”；更不能师事仇人；尤恐正途从学，误堕术中。他的奏折比张盛藻要激烈得多。

倭仁的奏折被批转给总理衙门“知道”，此后奕訢和倭仁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各自据理力争，上折两个回合，这场争论终因皇帝意向恭亲王，而使其取胜。

紧接着是1867年5月，候选直隶州知州杨廷熙趁朝廷因久旱无雨，诏求“直言极谏”之机，“应诏直陈”“天象之变，必因时政之失”，久旱不雨，是由同文馆之设“师敌忘仇，御夷失策”，只有“撤销同文馆”才能“以弭天变”。他还把奕訢等人有关设馆的种种提议归为十条一一加以批驳，其实是倭仁所奏的翻版。杨廷熙所奏遭上谕严厉斥责：“痛诋在京王大臣，是何居心？……肆口诋诬，情尤可恶。”

至此，这场明为设置算学馆而引发的激烈争论方告结束，其实质可以说是中西两种文化正而接触时所产生的文化冲突。倭仁等守旧派所要维护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完美无缺、不容置疑的文化价值，要保持儒家文化代表者至高无上、不容动摇的社会地位。

^① 《洋务运动》（二），第30页，《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大学士倭仁折》。

他们所代表的正是中国士大夫在传统文化下所形成的文化心理定势。那么，对恭亲王等开明之士适时顺势之举的拒绝和抵抗则是必然的，这也为后来的结果所证实。

1867年算学馆终于设立，半年内，报考者98名，而其中竟无一人是科甲正途出身。至临考前，已有26名弃考，勉强录取30名，其中多为图优饷而无才，翌年经淘汰只余10名，^①它反馈了朝外的人士也不肯接纳西学的态度。西学要融入中学，科学要渗入科举，这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是一个漫长的历程。

自此后，同文馆业绩一直平平，直至1869年才重振旗鼓，大有改观。这一年，中国著名学者李善兰被任为算学教习；总税务司赫德推荐丁韪良就任总教习；同文馆的生源可从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方言馆优秀者中选送；赫德还应允每年由海关支付整款，维持文馆。丁韪良任职以后，改组馆务，扩大课程，学生和教习人数也都有所增加。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京城，同文馆一度解散，至1902年合并到京师大学堂内，40年历史就此终结。

2. 总教习丁韪良

同文馆初创时仅为一所培养急需人才的初级外语学校，几经发展，它第一个把西学引进学校，并施以西方先进的教学、管理方法，成为近代中国新式教育的肇端，其中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同文馆的发展与当年的总教习丁韪良是密切相关的。

丁韪良，美国印第安纳州人，字冠西。他生长在一个宗教世家中，父亲和兄弟都是牧师。1846年，丁韪良毕业于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又入新阿尔巴尔神学院攻读神学三年，但他极富自然科学才能，所以，他得过两个学位，这也成为他后来翻译自然科学书籍的基础。神学院毕业后，他于1850年受美国北长老会派

^① 毕乃德：《中国最早的新式官立学校》，《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第119页。

遣，偕妻抵达香港，在沿海一带，如广州、澳门、宁波、舟山、杭州等处游历。他在宁波生活了近十年，其间他不仅学会了中国官话和宁波方言，而且读完了四书、五经等中文典籍，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相当的了解，这使他后来的事业受益匪浅。1858年，他作为美国公使的翻译，参与了中美《天津条约》的起草和谈判。1860年，丁韪良回美休假，1862年返回中国，在上海、北京等地办学、传教，这时他正在翻译国际公法(Wheaton's International Law)，并致函驻北京的美国公使蒲安臣(Burlingame, Anson)，说他想把这本国际公法译成中文，以为中国政府参考。蒲安臣很赞成他的意见，允许他把这本书介绍给总理衙门。1865年，同文馆第二任英文教习傅兰雅辞职赴沪，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和英国使馆参赞威妥玛推荐丁韪良接任。据他回忆说，同文馆的名气很大，总教习的官衔也不小，但初期学生只有十个人，都是满族大臣的子弟，像几只调皮贪玩的小猫，外国教习真有点不想教下去，不过是混混日子，捞一笔可观的俸银（首任英文教习包尔腾第一年薪金白银300两，第二年增至1000两，而首任汉文教习徐树琳每月薪金白银仅8两）。所以，没干几个月，丁韪良就向总理衙门提出辞呈，总理衙门连忙派户部大臣董恂、刑部大臣谭廷襄来挽留，丁韪良这样记述：

他们问我：“你为什么要求辞职呢？是嫌薪水不够吗？”

“不是，”我说。

“是什么人侮慢了你吗？”

“绝不是的。学生们以及别人对我都很和蔼有礼。”

“然则是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要求辞职呢？”

“老实说，”我答道，“十个学生，仅仅学点英文，这宗事业在我看来太没出息了。我的光阴等于白费了。”

“假如是这个缘故，”他们说，“那你便想错了。学生并不一定永远只有十个，而且即是这十个学生的前程也未可限

量。我们一天天的老了。他们十人之中，说不定还有可以继承我们的位置的。将来皇上也许要学习外国语言，难道你的学生便不会被召去教他吗？”这倒是一句大可注意的预言。^①

听罢此话，丁韪良深受启发，他收回辞呈，要安心在同文馆长久地干下去。他回顾说：“我之所以留任，是认为同文馆的影响要远比北京街头上的教堂的力量大得多。”^② 1868年，丁韪良受聘讲习万国公法，为了能够胜任，他又专赴耶鲁大学进修国际法。1869年9月，丁韪良再次回到中国，经总税务司赫德推荐，他被总理衙门聘为总教习，11月26日，这位首任总教习就职，此后在任长达25年，1894年因健康原因回国。英国人欧礼斐（Oliver, Charles Henry）代理总教习，翌年实任。

同文馆总教习相当于一校之长，要总管学校的一切工作，其职责包括：制定课程计划，督查教习，编译教材，检查教学，筹建教学设施以及每三年向总理衙门汇报工作即主持编定《同文馆题名录》。同文馆虽隶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馆中所开课程多为西学，清廷大臣多不熟悉，加上负责拨付同文馆经费的总税务司赫德暗中扶植，丁韪良拥有同文馆的各项实际权力。

丁韪良虽为传教士，但对办学有着一定的实际经验。当年他在宁波传教时，就曾办过两所男塾，每所各招学生二十余名，后在上海、北京等地也办过学。任总教习后，他在1881—1882年间又赴欧美各国以及日本考察教育，熟知西方教育教学体系。这些再加上丁韪良自身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良好的自然科学功底，都使他在任总教习的25年中，能对同文馆施以重要的影响。

第一，实行新的课程计划。

^①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171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版。

^② 丁韪良：《花甲记忆》，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2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同文馆在自身发展中，为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在课程内容上不断扩充，先后有：1866年化学，1868年算学，1869年万国公法，1871年医学生理，1877年天文，1879年物理。丁韪良上任后，于1876年制定了八年制和五年制课程计划。^①八年制课程计划供那些“汉文熟谙、资质聪慧”、年纪较小的学生使用。即：

首年 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二年 讲解浅书，练习文法，翻译条子。

三年 讲各国地理，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四年 数学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五年 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六年 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七年 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八年 天文测算，地理精石，《富国策》，练习译书。

在八年课程计划中，前三年主要是专习外文，并要求“功课以洋文、洋语为要，洋文、洋语已通，方许兼习别艺”，即使开始西学课程，外语也当“始终勤习，无或间断”。

五年课程计划供那些“年齿稍长，无暇肄及洋文，仅藉译本而求诸学者”使用，即：

首年 数理启蒙，九章算法，代数学。

二年 学四元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

三年 格物入门，兼讲化学，重学测算。

四年 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算，讲求机器。

五年 万国公法，富国策，天文测算，地理金石。

五年课程计划除外语与译书外，其余西学课程和八年课程计划大致相同。至于“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所以两表中都未列入。实际上，学生“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至于医学

^①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71—73页。

未列课程者，盖非诸生必由之径，或随时涉于体骨等论，以广学识，或俟堂宪谕令而走习之皆可”。^①

丁韪良所制定的课程计划，其内容包括了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如数学、化学、物理、天文学、地质学、机械学、航海学，等等，也含有一些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学、万国公法等，构成了“西学”的课程体系。它采用西方教育制度中的分年课程、班级授课的形式，并建有一整套考试制度，即月课，每月初一日举行；季考，每季度中间月份（二、五、八、十一月）初一日举行；岁试，每年十月，定期面试，岁试时，该月月课起初仍然举行，1865年（同治四年）起规定，季考时停止该月月课，以免重复；大考，每三年一考，由总理衙门执行，保证了教学效果。

但是八年与五年课程计划并没有硬性规定，也无严格的学年制度。三年一大考，是沿用科举制度的办法，成绩优异者授予七、八、九品等官职；月课、季考、岁试，成绩优异者奖予银钱，不含任何升级考试的意义。总理衙门对此有明确的思想：“学问之道，日进有功，亦难示以年限。”^②

第二，聘任各教习。

同文馆课程的扩充，使各任课教习不断被聘至馆中，同文馆先后共聘过54位洋教习，教授外文和所设西学课程，32位中国学者，教授中文和算学。各科还设副教习共25人，他们都是在学的优秀生，职责分为副教习、副教习上行走、记名副教习三种。此外，总理衙门还挑选满汉各一人，到馆中任提调、帮提调二人，“常日轮班住馆，朝夕稽察馆事。治其文书，督其训习，制其膏奖，纪其勤能，纠其游惰，典其侵籍”。^③ 总税务司赫德任监察官，实际操纵馆务。

①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73页。

② 同①，第592页。

③ 《清会典》，《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31页。

教习到馆任教，一般是洋教习由驻华使馆推荐，或总税务司赫德代聘，中国教习则由各省督府举荐。各馆第一任教习是：英文司包尔腾，英国传教士。1853年来华，为英国使馆参赞威妥玛推荐到馆做英文教习，后为英驻华使馆牧师，香港区圣公会维多利亚主教。法文司默灵（1827—1900年）是荷兰传教士，1854年来华，由法国驻华公使推荐到馆任教，后到蒙古传教，任蒙古教区主教。俄文司柏林，俄国人。1863年由俄国公使推荐，时正任俄使馆翻译的柏林到俄文馆兼任教习。德文馆添设以后，由俄文教习韦贝兼任。韦贝是俄国外交官，1871年到同文馆任俄、德文教习，后任驻天津领事，两任俄国驻华代办，一度调任驻朝鲜公使。德文教习1873年起由第图晋专任。化学教习毕利干（1837—1894年）是法国人，1866年来华，1871年由赫德聘至同文馆任化学教习兼天文教习，曾编写了第一本中文的化学教科书。格致教习欧礼斐，英国传教士，1879年进中国海关，后到同文馆任英文教习，1888年改任格致教习。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后，又回海关。医学德贞（1837—1901年）是英国传教医师，1860年来华，任英国驻华使馆医师，1871年到馆任教，1895年告退。东文馆初设时，第一任教习由翻译官唐家桢兼任，1898年由日本人杉几太郎专任。此外，还有算学第一任教习为中国著名数学家李善兰，汉学教习为徐树琳。

在这些传教士中，有的为晚清外语人才的培养和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传播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如英文教习傅兰雅，他除任教同文馆外，还做过上海广方言馆的教习。他主要从事翻译工作，译书范围极广，几乎涉及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各个方面及社会科学某些方面，包括：物理、数学、化学、天文、地理、地质、生物、生理解剖、医药卫生、航海、农业、军工、法律、政治、经济、历史等，积极推进了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这些本书将在其他章节分述。但是有的教习是赫德一手包办聘用的传教士，他们对西学并无专长，只是“惟利是

图”，对同文馆洋教习丰厚的薪水生歆羡之心，因此所授课程，不但内容肤浅、空泛，而且往往用神学观点歪曲科学知识，有的则敷衍塞责。梁启超对此曾尖锐指出，充任教习的传教士“半属无赖之工匠，不学之教士”，训练出来的学生“未尝有非常之才出乎其间以效用于天下”，至多“仅为洋人广蓄买办之才”而已。^① 这种情形到同文馆晚期更甚，正如1896年清御史陈其璋写的《请整顿同文馆疏》：“计自开馆以来，已历三十余年，问有造诣精纯洞悉时务，卓为有用之材乎？所请之洋教师，果确知其教法精通，名望出众，为西国上等人乎？教授之法固不甚精，而近年情弊之多，尤非初设馆时可比。向章有月考、有季考，今则洋教师视为具文。……学生等在馆亦多任意酣嬉，年少气浮，从不潜心学习。问有聪颖异人者，亦只剽窃皮毛，资为谈剧。及至三年大考，则又于洋教习处先行馈赠，故作殷勤，交通名条，希图优等。”^②

但总起来说，丁韪良在任总教习期间，能够使各科都有专任教习，这对于同文馆的发展是有利的。

第三，教学方法的改进。

同文馆实行新式教育，较为出色之处是理论与实际相联系。除在译书中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外，还非常注重让学生到实际中去考察，运用和丰富学过的知识。同文馆曾几次派学生出国留学或随使团考察游历，以为这样做“较京外同文馆当有实获”，可增广见闻，裨裨学业，为外语学习提供良好的语言环境，大大促进学习。张德彝是同文馆首批学生之一，祖籍福建，后迁居辽东，清初被编入汉军旗，入关后即世居北京。旗丁虽然有一份定额钱粮，但因不事生产，又不为官，家境清贫，到张德彝出生时，张家仅有两间房而已。其祖父常到庙里帮和尚做事，他“早

① 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244页。

② 《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载《学衡》第18期。

岁入塾，家贫，学费每给于舅氏”。家境迫使张德彝入馆学习。三年后，他被保奏为八品官，又因学习成绩优秀，入选出洋学生之一。在欧洲游历学习时，他同时使用五国语言，直接与不同国籍的人交谈，也曾因习西洋手谈哑文，以指代字，与外籍哑人交谈甚得，从而使他能够深入了解西方社会，写下了二百多万字的海外游记。

在一些自然科学课程中，同文馆多采用实验、实习的方法。学生们可以常常做一些化学、物理实验来巩固理论知识，医学教习德贞也常“让学生到医院实习”。与中国传统的教育教学方法相比，同文馆在教学方法上的改进无疑具有进步性。

同文馆开洋务教育之端，尽管它在很多方面仍带有浓重的封建性，但它毕竟也带有近代欧美新式教育的特点，已不完全是一所封建的旧书院，它对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改革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丁韪良在做总教习期间，还进行了大量的西书翻译，除了前面提到的《万国公法》外，还有涉及国际法学类的西方著作，如《公法便鉴》、《公法会通》、《陆地战役新选》、《星轺指南》，出版了《中国古代万国公法》。这些著作对洋务大臣们的外交活动是极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丁韪良也因熟知有关知识而曾担任清政府关于国际法方面的顾问。

作为教学需要，丁韪良还带领同文馆学生翻译了英国人法德斯的《政治经济学提要》一书，即八年课表中所列出的《富国策》，这是西方政治经济学著作首次被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时为1880年。关于西方科技文化知识的译介，丁韪良的译作中较有价值的当是《格致入门》，其中含力学、水学、电学、化学等内容，而“化学”一词，在中国是首次被介绍。

丁韪良自1869年任同文馆总教习至其离任，整整25年，对同文馆的管理可称得上是洋务运动兴起的新式学堂的表率，所培养的学生也都是正规训练的外语人才。当然，无论丁韪良用尽怎

样苦心做好他的总教习，目的都是为教会的事业开辟未来，而客观实际自然不会使他如愿。清政府鉴于丁韪良的工作成绩显著，1885年授予他三品官衔，1898年又任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并授二品顶戴。其时年逾古稀的他和其所谓的事业有如日薄西山，1902年，他的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职务被解聘。此后，他主要从事翻译、著书等活动，直至1916年12月在北京去世。

3. 同文馆的学生

1862年（同治元年）同文馆设立之时，由八旗咨取年在十三四岁以下，天资聪明者十人入馆学习。添设法文、俄文、德文馆后，每馆也只有学生十名。从八旗中挑选子弟作为同文馆的生源，如果说是从经济方面考虑不无道理，丁韪良说：“凡是旗人无论满汉都是生来就有饷的，所以叫他们入学可以省些费用。”但是，更主要的则是同文馆的设立是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才，八旗子弟入馆学习既是一种特权又可使“利权不致外溢”。^①

1867年（同治六年），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奏明：“上海、广东两处所设学馆已届三年，其中子弟所学即或未能深粹，而通其语言文字者谅不乏人。……若于该学生中择其已有成效者咨送来京考试，与臣衙门本年所考各员共为讲解，必可得力。应请旨飭下上海通商大臣、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将各该处所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内择其已有成效者，每省酌送数名来京考试，以便群相研究……”^②

上海广方言馆和广东同文馆分别设立于1863年（同治二年）和1864年（同治三年）。上海、广东地处沿海，是最早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城市，是洋人总汇之地，中外交涉事件总汇之所，为了避免那些“资性蠢愚，心术卑鄙，货利声色之外不知其他，且

^①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160页；第45页。

^② 同^①。

其仅通洋语者十之八九，兼习洋字者十之一二。所识洋字，亦不过货名价目，与俚浅文理，不特于彼中兵刑食货，张弛治忽之大懵焉无知，即遇有交涉事宜，词气轻重缓急往往失其本旨。惟知藉洋人势力播弄挑唆以遂其利欲，藐视官长，欺压平民，无所忌憚”的通事之害。^① 上海、广东两馆设立的目的十分明确：培养急需的外语人才，加之两地较早受西学熏染，学生又年少聪颖，外语学习颇有成就。同治六年以后，两馆便开始向京师同文馆保送优秀学生，从 1867 年（同治六年）至 1899 年（光绪二十五年），共保送 71 名优秀生。

年 代	上海广方言馆	广东同文馆
同治六年（1867 年）		蔡锡勇等 6 名
同治七年（1868 年）	严良勋等 5 名	
同治十年（1871 年）	朱格仁等 7 名	博勒洪武等 11 名
光绪五年（1879 年）	吴宗濂等 2 名	
光绪十六年（1890 年）	朱敬彝等 7 名	茂连等 12 名
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	周传经等 7 名	多兴等 8 名
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		李殿章等 6 名
小 计	28 名	43 名

1885 年（光绪十一年），奕劻等在给皇帝的奏折中直言：“同文馆自同治元年设立以来，迄今二十余年，向由八旗咨取十三、四岁以下的幼丁、分馆学习，于洋文洋语尚能识认通解。惟

①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3，第 11—13 页。

② 《京师同文馆学友会第一次报告书》，《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1 辑上册，第 54 页。

年幼学浅，于汉文义理本未贯串，若令其以洋文翻译汉文，功夫分用，速效难期；若再令讲求天文、算学，更恐博而不专，迄无成就。臣等公同商酌，现拟推广招取满汉年在十五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文理业已通顺者，取其本旗图片及同乡官印结，递呈投考，仍由臣等试以策论，择其文理可观者录取，挨次传补，庶可事半功倍，有裨实用也。”^①至此，招考成为同文馆生源的又一途径。出示招考后，报名者不乏其人，共有394人参加应试，经过初试、复试，最终录取了108名。这些人入馆学习时有的已经有了科名，在馆学习继续取得更高科名的也有，如汪凤藻就得了翰林院翰林的荣誉。他们已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又努力学习外文，一批外交、翻译方面的人才脱颖而出。这在士大夫中间引起很大反响，一些高贵人家的子弟也都想入馆学习，这与同文馆初创之时，欲招科甲正途人员入馆学习所引发的论争已截然不同。

同文馆在其存在的40年中，为当时的外交、教育、洋务培养了一批急需人才。在外交界很多学生占有重要的位置。粗略统计，1911年以前，同文馆学生中出任外国公使的就有21位：

- | | |
|-----|------------------|
| 汪凤藻 | 出使日本公使 |
| 庆常 | 出使法国公使 |
| 杨枢 | 出使日本、比利时公使 |
| 杨兆璜 | 出使比利时公使 |
| 庚音泰 | 署理驻德公使 |
| 萨荫图 | 出使俄国公使 |
| 张德彝 | 出使英国、比利时、意大利公使 |
| 杨晟 | 出使奥地利、法国、荷兰公使 |
| 刘式训 | 出使法国、西班牙、巴西、秘鲁公使 |
| 崩冒 | 出使德国公使 |
| 郭家骥 | 代理葡萄牙公使 |

^①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47页。

- 戴陈霖 出使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挪威、丹麦公使
 唐在复 出使荷兰、意大利
 王广圻 出使意大利、比利时、荷兰
 翟青松 代理丹麦公使
 吴宗濂 出使意大利公使
 刘镜人 出使荷兰、俄国
 胡惟德 出使日本、俄国公使
 刘玉麟 出使英国公使
 颜惠庆 出使德国、丹麦公使
 陆徵祥 出使俄国公使^①

此外，还有更多的学生任出使外国使节议员、驻外使馆秘书、参赞、领事或外交方面的某些职务。也有一些成为总理衙门的专设译员，做接见外交使节的翻译，汇集国外新闻，翻译电码等。有的学生也被调任各省督抚衙门服务。

同文馆的学生有的也成为教育和洋务方面的人才。学生从馆毕业后，优者被择留在馆中充任教习，更多的是充任那些随着洋务运动发展而相继建立的外语学堂、专业技术学堂和军事技术学堂的教习。他们的成就虽非令世人瞩目，但却是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对介绍西方科技知识，培养优秀人才起了重要作用。

4. 同文馆的译书

同文馆是近代最早出现且具有较强翻译实力的官方翻译机构。其译书源于教学、教材的需要。

同文馆创办之初紧密围绕着培养目标进行教学，外语作为最主要的教学内容，并随着洋务派对西学认识的深化成为学习西学的基础和工具备受重视。在同文馆的“八年课程表”和“五年课程表”中已经非常明确，“馆中功课以洋文、洋语为要，洋文、

^①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63页。

洋语已通，方许兼习别艺……有不学洋文、洋语，反习别艺，殊失当日立馆之本意”。^① 这样一种教学指导思想更透彻地反映在同文馆的考试中。同文馆学生的考试有月课、季考、岁试和三年一大考，在三年大考中可见其外语考试的严格性。“初次考试，将各国配送洋字照会令其译成汉文；复试将各国条约摘出一段，令其翻成洋文，特飭总税务司赫德与各馆外国教习会同阅看，分别名次高下。复恐各学生于外国文字虽能通晓，而语言未必娴熟，因再行复试，密出汉话条字，按名交该学生等令其翻成外国言语，隔座向外国教习侍讲，再令外国教习将学生言语译汉，写明两相核对”。初试、复试、汉洋互译，反复多次，连考九月。最后将三次试卷合并比较，“优者分别为八、九品官，咨部注册，仍留馆学习；其余尚堪造就者，分别记优、记过、留馆学习；至劣者，应行咨回本旗”。^② 这种严格的考试制度不仅有力地保证了教学效果，而且使学生的外语水平，特别是读、译能力大大提高，为以后的翻译打下了坚实的功底。

同文馆作为新教育的开端，不仅把外语作为主要的学科，而且也安排学生学习其他西学课程。如学生入馆第三年即要开始读各国史略，第四年开数学，第五年开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等课程逐年增加。这些西学课程的教材，除原版和已有的译本外，相当部分是由同文馆各教习训课之余，勤奋翻译而成。“同文馆最初的目的是在养成翻译人才；但是由口语的译述上进一步，转而翻译别国的文献，以为己用，原是一个极自然的，极需有的步骤”。^③ 翻译本是同文馆学生的一门必修课，逐步发展成一项工作，这是十分有益的。后经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呈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以为“各馆洋教习教授功课是其专责，若令兼理译

①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23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7，第30—33页。

③ 同①，第183页。

书，未免事属分外，似应量予奖励”，^① 并批准在同文馆内组织了一班译员，里面有教习，也有优秀学生。凡用力勤、成绩好的，都有奖励。《同文馆题名录》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刊出同文馆自设立以来历年所译书目共26种。

译书名	原书名	译者	鉴定
万国公法	Wheaton's International Law	丁韪良	
格物入门	Natural Philosophy	丁韪良	
化学指南	Chemistry for Beginners	毕利干	
法国律例	Code Napoleon	毕利干	
星绍指掌	Guide Diplomatique	联芳、庆常	丁韪良
公法便览	Woolsey's Int Law	汪凤藻、凤仪	丁韪良
英文举隅	English Grammar	汪凤藻	丁韪良
富国策	Fawcett's Polit Economy	汪凤藻	丁韪良
各国史略	Outlines of the World's History	杨枢、长秀	
俄国史略	History of Russia	俄文馆学生	
化学阐原	Advanced Chemistry	毕利干、承霖、王钟祥	
格物测算	Mathematical Physics	丁韪良(口授)、席淦、贵荣、胡玉麟等(笔述)	
全体通考	Physiology	德贞	
中西合历一八七七	Astronomical Almanac, 1877	海录顿、熙璋	
中西合历一八七八	Astronomical Almanac, 1878	海录顿、费理飏、熙璋等	

^①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152页。

译书名	原书名	译者	鉴定
中西合历一八七九	Astronomical Almanac, 1879	骆三畏、熙璋	
公法会通	Bluntschli's Int law	丁韪良、联芳、庆常	
算学课艺	Mathematical Exercises	席淦、贾荣	李善兰
中国古世公法论略	International Law in Ancient China	丁韪良、汪凤藻	
星学发轫	Elements of Astronomy	熙璋、左庚等	骆三畏
新加坡刑律	Penal code of straits Settlements	汪凤藻	丁韪良
同文津梁			丁韪良
汉法字汇	Franco-Chinese Dictionary	毕利干	
电理测微		欧礼斐著	
坤象究原		文祐	欧礼斐
药材通考		德贞著	
弧三角阐微		欧礼斐著	
分化津梁		施德明(口译) 王钟祥(笔述)	

这些译著的内容包括算学、化学、格致、天文等自然科学，也包括各国历史、法律以及外语工具书。它们既满足了教学需要，提高、锻炼了学生的实际能力，又传播了西方科技文化知识，成为中西文化交汇的一个重要支流，对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世纪60年代起，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西方科技著作被大量地引进、翻译、出版，在当时几家主要的翻译、出版机构中，同文馆所译世界历史、外交、时事等著作颇受世人瞩目。学贯中西的大师梁启超就曾多次评介同文馆所译之书。

19世纪下半叶，西学在中国走过了漫长而艰难的历程，得

以逐步传播开来，科学终于有了它的一席之地。更为可喜的是，晚清一代知识分子不再仅仅固守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乐于接受广为流传的西学译著，从中汲取有益成分，形成自己的理论，推动中国社会深刻变革的到来。试看戊戌变法中知识分子群体的领袖们，从康有为、梁启超到谭嗣同、唐才常无不从西学中寻求他们政治主张的理论依据。应当说，这些与同文馆的翻译成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近代西方科技的引进

1.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设立

晚清众多的翻译机构中，首屈一指的当属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这不仅是因为它由中国政府创办、历史久，出书多，影响大，更主要的还在于它所译刊的西书中，科技著作占绝大比重。质言之，近代西方科技的引进，其大部分是由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完成的。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隶属于江南制造局，1868年6月正式设立开馆。此时，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以富国强兵为中心不断兴起，且洋务派的官僚们逐步认识到富国强兵的根本在于科学技术的先进，“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著实功夫，即学习皮毛，仍无裨于实用”。^①于是，洋务派官僚更加注重学习西方坚船利炮，引进西方科学技术。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虹口购得美商旗记铁工厂，并入清政府原有的上海洋炮局和苏州洋炮局，安装了由容闳从美国购来的机器，建成江南制造总局，以制造枪炮、弹药、修造轮船为主。1867年，江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6，第3页。

南制造局由虹口迁至高昌庙，不断扩充，成为清政府规模最大的军事企业。当时江南制造局机器设备、原材料由外国提供，技术大权也在洋人之手。“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培养自己的人才，真正掌握近代科技，已经成为最迫切的现实问题，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正为适应这种需要而设立。以后，出于同样的目的，江南制造局还设立了操炮学堂、工艺学堂等。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设立是经过酝酿和准备的，特别是以徐寿、华蘅芳为代表的通晓西学的新型知识分子以他们努力学习、刻苦钻研西方科学技术的精神和实践，以及他们的译著成果为翻译馆的设立奠定了重要的前期准备基础。徐寿、华蘅芳均是江苏无锡人，19世纪60年代初期，他们对西方自然科学皆有深邃研究，1862年曾国藩在安庆、江宁创设机器局时，他们参与其事，合力试造木质轮船“黄鹄”号。徐寿还在没有图纸、没有模型、更没有技术指导的情况下，借助一部译著，反复研究，终于在1863年造出蒸汽轮船。江南制造局创设以后，他们到此工作，一方面继续精研西方自然科学，另一方面与正在从事译书的传教士艾约瑟、慕维廉等深有交往，探究译书理法。在这过程中他们对翻译西书，增长独到见解，直接学习、引进西方科技深有感悟。1867年就在江南制造局移址扩大后，徐寿便提出“设一便考西学之法，至能中西艺术共相颉颃”。并认为，“将西国要书译出，不独自增识见，并可刊印播传，以便国人今知”。^①此议得到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同意后，江南制造局聘请了居住在上海的英美学者傅兰雅、伟烈亚力、玛高温（MacGowan, Daniel Jerome），中国学者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翻译西书，筹措建馆。

从1867年下半年到1868年上半年，傅兰雅、徐寿等人共译出西书四种，均由傅兰雅、玛高温等人口译，徐寿、华蘅芳等笔

^① 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载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12页，群联出版社1953年版。

述。这些译著都选与机器制造密切相关的，即《汽机发轫》、《汽机问答》、《运规约指》和《泰西采煤图说》。这些“初译之书，均呈总督赏鉴，甚为许可”，即正式奏请开办翻译馆。奏折曰：“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造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捍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拟俟学馆建成，即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妥立课程，先从图说人手，切实研究，庶几物理融贯，不必假手洋人，亦可引伸其说，另勒成书。”^①

1868年6月，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设立开馆，聘徐寿、华蘅芳、徐建寅任笔述，英人伟烈亚力、美人傅兰雅、玛高温任口译，翻译格致、化学、制造等西方科学书籍。其组织设提调1人，口译2人，笔述3人，校对、画图4人。以后又聘英国人秀耀春（James, F. Huberty），美国人金楷理（Kreyer, Carl T.）、林乐知、卫理（Williams, Edward Thomas），日本人藤田丰人等到翻译馆任职。徐寿便担任化学、汽机方面的翻译，华蘅芳担任算学、地质方面的翻译。^②据熊月之先生统计^③，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员，可考的共有59人，其中外国学者9人，中国学者50人。翻译馆“自开办以来，其所罗致之人才，充各科之主任者，颇极一时之选，而要皆为邃于汉学之西方学者”。^④

1869年，江南制造局在城南扩建，“创建重楼，层构厥高，宏规大启”，是年冬，上海广方言馆迁入。竣工后的建筑计有平房74间，楼上24间为翻译馆，平房及楼下50间为广方言馆，另有庖室3间，小屋2间。以后随着翻译馆的发展又迁人在馆南新建的五幢房内。上海广方言馆迁入江南制造局后，与翻译馆在

① 江南制造局编《江南制造局记》，卷2，公牍，文室书局1905年石印本。

② 毕乃德：《中国近代早期官办学校》，第173—176页。

③ 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526页。

④ 甘作霖：《江南制造局之简史》下，载《东方杂志》第11卷，第6号，第21—24页。

人员兼职、授课译书等方面都关系密切。有些译员身兼二任，既是译员，又做教习，“上半日任广方言馆教习，下半日任翻译处译员”。学生在馆学习，翻译西书必不可少，优秀译作可由翻译馆刊印出版。翻译馆的译书也常作为广方言馆的教材。更有广方言馆的高才生毕业后留在翻译馆充任译员的。

2. 译书与近代西方科技的引进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书主要是在 19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在这二十余年间，翻译馆所译西书 160 种，按《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分类如下：

类别	种数	类别	种数
史志	6	政治	3
交涉	7	兵制	12
兵学	21	船政	6
学务	2	工程	4
农学	9	矿学	10
工艺	18	商学	3
格致	3	算学	7
电学	4	化学	8
声学	1	光学	1
天学	2	地学	3
医学	11	图学	7
补遗	2	附刻	10
		总计	160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设立是应洋务急需，这时，中国近代化的运动虽由单一的军事工业逐步向民用工业发展。但晚清社会的长时期停滞和闭塞，使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具体认识仍很肤浅，对西方近代科技的连锁、系统性无所考虑。如梁启超所言：“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

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①在这样一种观念之下，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原则自然是急功近利，翻译馆所译西书多是制造局急用，关于工业制造或与之直接关联的实用学科，对自然科学的纯理论著作的意义并无认识，更不用说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了。“西士究心，惟在实学，既不同世之自矜独得者驰骛元虚，而我中国之亟当讲求者，又在乎确有实济，立见施行。现既因制造而译书，无论枪炮轮船，实切中国之用，固宜因端竞委，实事研求，即如通舟运以杜居奇，练兵伍以裁虚藉，浚河道以备旱潦，采煤铁以尽地力，权货物以酌盈虚，易银钱以防虚伪”。^②这种指导思想显而易见地反映在翻译馆早期所译西书中，主要内容集中在制造、军事、测量、机械方面。如《制火药法》（1868年）、《防海新论》（1873年）、《水师操练》、《轮船布阵》、《克虏伯炮图说》、《行军测绘》（1874年）、《水师章程》、《爆药纪要》（1879年）、《水雷秘要》（1880年）等。还有一些应用技术方面的西书也因急用而译，如1879年傅兰雅、赵元益合译的美国阿发满的有关铸造工艺的著作《冶金录》，1884年傅兰雅与徐寿合译的英国人费尔奢撰写的《宝藏兴焉》，对金、铂、银、铜、锡、铁、钢、铅、锌、镍、锑、铋、汞等多种金属矿的熔炼法做了详细介绍。

随着实用技术的引进和发展，一些新型的知识分子深深地感到要“自强”、“求富”，就需深究推动实用技术发展的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徐寿言：“进求其船坚炮利、工艺精良之原因，悉本于专门之学。”^③自然科学的许多基础理论便被陆续译出引进。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分类统计看，有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矿物学、医学等。其中有许多是较有影响的译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71页。

^②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229页。

^③ 《清史稿·徐寿传》。

作，如数学方面有《代数术》、《算式集要》、《微积溯源》、《三角数理》、《数学理》、《代数难题》、《算式解法》和《合数术》等。这些译作不仅首次将数学知识介绍过来，而且一些数学术语、符号也在译作中产生，有些仍沿用至今。物理学方面有《电学》、《通物电光》、《无线电报》、《声学》、《光学》、《物理学》等，这些译作将近代“物理学”概念和基本知识作了介绍。化学方面有《化学鉴原》、《化学考质》、《化学求数》、《化学分原》等，一些现今仍在使用的元素符号即是当时编译书时所形成，如钠、锰、镍、镁等，定量、定性化学分析也是那时才被介绍到中国。矿物、地质、天文学方面有《金石识别》、《地学浅释》、《谈天》、《测候丛谈》，这些都是近代有关学科专业引进之始。医学方面主要有《儒门医学》、《西药大成》、《内科理法》、《法律医学》、《保全生命论》等，这些译作学术性和实用性都很强，成为重要的医学专著和众多医院必备书籍。

从翻译馆所译西书的总体情况看，译书缺乏计划性和系统性，一切服从急需实用，便不考虑自然科学的连贯性、相关性。某一学科所译内容的水平、层次并不衔接，有些是当时其学科较为先进的成果，有些则仅仅是一些学科初级入门的常识。这些，一方面是由当时社会发展水平所决定，尽管有些学科知识在国外已经被新的科研成果所替代，但在中国却仍让人耳目一新。即使如此，译书引进仍属十分必要，中国的近代化运动需要补上差距。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社会发展制约着人们对西学的深入了解和正确地学习引进。梁启超对此曾评论说：“中国译出各西书，半皆彼中二十年前之著作，西人政学日出月新，新者出而旧者废，然则当时所译虽有善本，至今亦率为彼所吐弃矣。”^① 尽管如此，翻译馆所译西书中有些在当时还是很有影响的，为当时学术界所称赞。如翻译馆所译数学方面著作，颇得好评，时人评论傅兰

^① 梁启超：《谈西书法》。

雅、华蘅芳所译的《代数术》“编辑既精，译笔尤善，为算学家必读之书”。^①《代数难题》“其解题之法整齐简易，最便初学，又有微妙之法，为初学人所思索不到者”。^②《算式解法》解法新奇，类非寻常算书中所见者”。^③这类较高水平的译著，主要是古代数学在中国具雄厚的基础，翻译者华蘅芳精研数学，是优秀的数学家，他还旁及地质、矿物等学。在翻译馆中他的译著多为数学和地质学方面。他还先后主讲上海格致书院、湖北自强学堂和两湖书院，造就了众多的数学人才。正是他杰出的数学才能使他较完整准确地接受了近代数学，翻译介绍给国人。

中国的古代科学是世界最发达者之一，历算、中医、地理学是古代科技成就较多的三大科学。中国古代科技三大技术——陶瓷、建筑和纺织以及造纸、指南针、火药与印刷术四大发明都居世界之首。但是中国的科技并没继续向前发展，除了小农生产的社会经济基础制约以外，在思想领域里，儒学的独家统治造成了哲学的贫困、理论思维的缺乏，科学技术难以从哲学那里取得科学方法的有力武器，这种束缚就使中国科技长期停滞徘徊。近代西方科技的引进恰如引来了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它推动了中国科技向近代化的发展。

3.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的影响

19世纪后期，一代通晓西学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在晚清社会出现，并带来士林风气的新变化。他们或出于新式学堂，或远涉重洋留学有成，或从洋务运动创办的近代工业中脱颖而出，或虽受封建正统文化培育，但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受西学影响，感召于时代，从封建士大夫中分离出来。他们接受西学，拥有近代新

① 《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卷2，第30页。

② 同①，第31—37页。

③ 同②。

型的知识结构，形成这一代人特有的文化素质。他们能够深刻理解、把握近代西方文化，具有较强的时代意识和匹夫之责。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知识分子在近代西方文化以高势能态势传入中国这一新的文化背景下，深感国家内忧外患，民族挣扎于生死存亡，向来受儒家思想支配的上林风气在他们这一代发生了变化。就群体而言，他们抛弃了“学而优则仕”，“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的传统观念，转而接受西学，潜心精研，崇实致用，重视科技，求民主自由，以卓越的才能和成就服务于社会。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为这样一代新型知识分子带来了数量可观的应用技术和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西书。翻译馆 1868 年初试译成西书 4 种，到 1875 年已译出有关算学、化学、汽机、火药、炮法、行船、防海、开矿等 40 余种，刊印了 24 种。傅兰雅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中统计：从 1871 年到 1880 年间，已出版的译书 98 种，235 本，到 1879 年已售出的书达 31111 部，共计 83454 本。1885 年傅兰雅在上海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家科技书店——格致书室，发售江南制造局的译书。转年书室售书目录列举中外书籍、地图、挂图等 371 种，到 1888 年时目录已增至西学书籍 650 种。不久，格致书室在北京、烟台、奉天、天津、杭州、汕头、福州、厦门、香港等地先后开设分店，销售书籍多达 15 万册。晚清戊戌变法的倡导者康有为也曾购江南制造局译书“以赠友及自读者，达 3000 余册”。^①如果说晚清这一代新型知识分子与传统的知识分子具有明显的区别，那么其主要原因在于广泛传播的译书带给了他们全新的近代科技文化知识，从而也为他们观念的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量译著不仅广泛地传播了科学知识，而且对近代中国思想

^① 参见邹振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近代科技的引进》，载《出版史料》1986 年第 6 期。

界也产生了有利的影响，许多政治思想家在接受西学时更敏于思辩，新的科学文化知识成为他们政治主张的理论渊源。康有为这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维新派的政治代表，自幼接受严格的正统儒家教育。晚清社会的动荡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他对空泛无为的封建理论深感厌倦。后来他读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所出刊物《西国近事汇编》，并游历了香港，“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①他由此得到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和自然科学知识，顿觉“日新大进”。这些新知识便成为他政治思想的重要成分。

在康有为的政治主张中，他曾极力推崇西方社会的君主立宪和三权分立制度，并加以详细的描述和分析：他主张“以工立国”，“讲求物质”，“成大工厂以兴实业”，采用机器、奖励发明、开矿筑路、办厂造船；他提出要富国强兵，就必须废除封建科举，广泛设立各级各类新式学校，大力培养各行各业的专门技术人才。《大同书》是一部展示康有为政治思想的重要著作，在书中，他接受并运用进化论的观点，阐述了社会的进化和发展，提出他最高的社会理想。他对未来人类社会生活美妙的幻想以及他的政治主张与西学译著中所介绍的西方社会种种是分不开的，这些在当时具有进步的启蒙作用。

谭嗣同是戊戌变法的又一伟人，他出身宦门，自幼受封建儒家理论的教育，但由于他幼年丧母，“不得父欢”，“为父妾所虐”，“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忍受”。^②从而激起他对封建纲常名教的憎恶，并能够受新思想影响和启发，追求平等、自由与个性解放。甲午战败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深深地触动谭嗣同，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此“长与旧

^①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第115页。

^② 谭嗣同：《仁学·自叙》，第2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学辞矣”，“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①受当时知识界新风气的影响，他“自致于当世有用之学”，广读西书，接受西学，开阔了眼界，相信新学比旧学更有用。他涉猎了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留下不少文字。《地学浅释》是英国著名地质学家所著，1873年出版，书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西方近代地质学知识，包括地质结构、成因、生物衍化等。书中还述及勒·马克、达尔文和生物进化论。它由翻译馆译出首次介绍进来，成为19世纪末在中国影响深广的一部著作。谭嗣同阅罢此书完全接受了生物与地球环境的关系，生物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观点，他说：“今有所谓地学者，考察僵石，得其生物，因知洪荒以上寒暑燥温之异候，山海水陆之改形，百昌万汇，亲上亲下，蛸飞蠕动之殊状，冰期火期之变，石刀铜刀之奇，可得而据者，仅乃地面之四十里之深，则已不胜，其时代之渺远，而罄竹千亩，不足书其纪矣。即其所及知，以究天地生物之序，盖莫先螺蛤之属，而鱼属次之，蛇龟之属又次之，鸟兽又次之，而人其最后焉者也。”^②他对自然与人类的进化感慨万千，进而引发了他对社会变革的思考：“天地以日新，生物无一瞬不新也。今日之神奇，明日即已腐臭，奈何自以为有得，而不思猛进乎？”^③

西方近代科技随着翻译介绍引进中国，但它带来的决非仅限于此。人们通过西学对自然科学的认识越发深刻，科学的观念也就越发深入人心。在民族危机的形势下，近代科技引进后，在政治思想方面发生的作用远远超出其他方面，科学便成为晚清社会改革的强劲推动力。

翻译馆所译大量西书，使西方文化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在中西文化交汇这个特定的文化场内，虽然西学是以高势能的态势

① 《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4期，湖南人民出版社。

② 《谭嗣同全集》上册，第131页；下册，第458页。

③ 同②。

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但低势能文化一方对于外来西方文化决不简单地等同于物理热能由高向低传导的现象，它不是机械地、被动地、完全接纳传导过来的文化。就质而言，当时较为先进的西方文化在主动“出嫁”的过程中，也受到对方的筛选和鉴别，那些真正的人类文化精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质部分相结合，促进了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建立。中国传统文化贯以儒学孔教为冠，在西学传人以后，三纲五常为自由、平等、民权、维新、共和的新学所否定；声、光、电、化之说取代了炼丹术和阴阳五行说；自然学科物理、化学、生物、西医、地质学，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纷纷出现；中国已有的哲学、数学、天文学也从西学中吸纳新鲜养分。更为重要的是近代科学方法论也随之应用于各个学科。近代科学体系在翻译西书、传播西学的过程中建立起来。

三、严复的翻译活动及贡献

1. 精通西方文化的启蒙者

严复是近代中国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也是闻名于世的翻译家，他将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著作大量地翻译介绍到中国，成为我国“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他为传播西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854年1月（咸丰三年十二月），严复诞生在福建侯官（今闽侯）县阳崎乡一位中医家庭。他的父亲严振先医术高明，被誉为“严半仙”。他的祖父中过举人，并在县里做过训导（学官）。在这样一个儒医家庭中，严复7岁开始求师受业，11岁受学于福建宿儒黄少岩。“其为学汉宋并重”，“课径之余”好与严复“讲述明代东林掌故”，而严复“早慧，嗜为文”，“夙闻宋元明儒先学行”，为科学人仕打下了国学基础。严复13岁那年，他的父

亲病故，家境的贫苦断了严复的科举正途，他不得已而辍学。

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自富”、“求强”，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兴办新式学堂。福州船政学堂（求是堂艺局）创办于1866年，隶属于福州船政局，它创办的目的，一为加强海防，“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①二为造就人才，“习造轮船，非为造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展转接受，传习无穷耳”，使中国“督造有人，驾驶有人，不患无才”。^②三是自立求强，“设学堂教习英、法语言文字，俾通船主之学，庶造就更众……”，“方不至授人以柄”，福州船政学堂的设立“不重在造而重在学”。^③因此，学堂在招生制度上采取了公开招生，广揽人才，不限出身，自愿报名的办法，在福州城内各显眼的地方张贴招示。报名者按规定的时问、地点考试，合格者办理应有的手续，即为学堂正式学生。正是这样一个机遇，使严复得以第一名被录取入学。福州船政学堂是近代第一所海军学校，也是中国海军院校的始祖。在学堂中，严复除继续接受中学教育，“凡《圣谕广训》、《孝经》必须诵读，兼习策论，以明义理而正趋向”外，主要是大量接触、学习西方科技，从他所在的后堂课程看，有英文、数学、水重学、光学、天文学、航海学等。严复在学堂学习五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又先后到“建威号”、“扬武号”军舰上实习。福州船政学堂的学习生活为严复以后的发展奠定了西学知识基础。

1877年，福州船政学堂向欧洲派遣第一批留学生，因为海军“为西国专门之学，非躬亲其事者不能尽悉”，^④派遣留学生，

①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330页。

② 《沈文肃公政书》卷4，第59页。

③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8，第53—56页。

④ 《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卷1，第1页。

对于培养海军人才，加强海防必能事半功倍。这一年，24岁的严复作为优秀者被派赴英国，他先入抱士穆德大学院，学习高等数学、化学、物理、海军公法、海军战术和海军炮堡建筑学。后又进格林尼茨海军大学深造，常到军舰、工厂、学校、部队实习考察。出国留学以前，严复就已有较好的西学基础和在舰队实习的实践经验，通过留学深造，他的理论、实践经验都更为出色，成为留欧学生中的佼佼者。当时，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与严复多有来往，严复常向郭嵩焘介绍西洋学术，为其演示摩擦生电的物理现象，讲解对数原理，并利用《亚维林修路汽机图说》阐述西方筑路原理。还为郭嵩焘抄录格林里治学馆考问课目，译示蒲日耳游历日记和报纸评论。郭嵩焘虽已是花甲之人，但对西学仍然如饥似渴地汲取，他特别赏识严复的才学，也从严复那里学了不少自然科学知识。

严复留学期间，正值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到全盛的维多利亚时代，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发展日新月异，严复眼界大开，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也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一面学习西方自然科学，一面研读西方社会科学著作，考察西方社会。他饱览了著名的资产阶级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思想家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达尔文、赫胥黎等人的著作。对古代欧洲的思想理论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德谟克里特等也有一定的了解。当时欧洲流行的生物科学溶化论、达尔文进化论、资产阶级的实证论和不可知论、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理论等，他都有所涉猎。严复还深入到英国社会考察监狱，旁听议会，了解民情。严复这种锲而不舍的钻研态度，使郭嵩焘与之成为忘年之交，二人“论析中西学术异同，穷日夕弗休”。严复晚年曾回忆说：“犹忆不佞初游欧时，尝入法庭，观其监狱，归邸数日，如有所失，尝语湘阴郭先生，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郭嵩焘对严复的见解“深以为然，以为卓识”，并对严复

说：“吾观英吉利之除黑奴，知其国享强之未艾也。”^① 后来，郭嵩焘曾致函清廷一大臣说：“出使兹邦惟严君能胜其任，如某者不识西文，不知世界大势，何足以当此！”^② 可见，严复对当时的西方社会及其思想文化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与研究了。

就严复的个人性格来看，曾纪泽曾在《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中评说：“宗光才智甚美，颖悟好学，论事有识。然以郭筠丈（嵩焘）褒奖太过，颇长其狂傲矜张之气。”可以想像，才学俱佳的严复，思维敏捷，善发议论，语言犀利。两年多的留学生活，他直接接触西方国家政治、社会、文化、经济，认识远非其他留学生可比，也大大超过了他的同时代人。他从更深刻的视角评析中西差异，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多加指责，正如严复自己所言：“什当少年，极喜议论时事，酒酣耳热，一座尽倾，快意当前，不能自制。尤好批评当路有气力人，以标风概。闻者吐舌，名亦随之。”^③ 严复这种敢于抨击时政、不阿谀捧场的性格特点使得他官运不畅。1879年，严复学成回国，在他的母校——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一年。第二年，被直隶总督李鸿章调往天津，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十年之后才被提升为学堂总办（校长）。胸怀抱负的严复并没受到重用，和他一同留学的同窗个个身居要职，林永升、方伯谦、林泰曾身为管带（舰长），刘步蟾官任北洋水师右翼总兵（分舰队司令）。他们凭借任职，各尽所学，施展抱负。而才学非一般留学生可及的严复却怀才不遇，他已深有感悟，曾说：“文忠大治海军，以君总办学堂，不予机要，奉职而已。”初到天津的严复，远离故乡、家眷，目睹官场炎凉，深感孤寂，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他在给堂弟的家信中说：“弟自

① 严复：《法意》卷11，第8页；卷10，第5页，按语。

② 王蘅常：《严几道年谱》，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7页。

③ 王拭：《严复与严译名著》载《论严复与严译名著》，第3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笑到家时忽忽过日，足履津地，便思乡不置。天下茫茫，到处皆是无形之乱，饥驱贫役，何时休息，兴言至此，黯然神伤；拟二三年后，堂功告成，便当沥求上宪，许我还乡，虽饘粥食苦，亦较他乡为乐也。”^① 国家贫弱受辱，个人报国无门，此时严复苦闷的心情已跃然纸上。

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又做了 10 年的校长，1900 年义和团运动席卷津京大地，他才离津避沪，自此彻底脱离海军教务。这 20 年间，严复的个人前途并未出现转机，这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他个人性格所致外，还因为严复不以海军技术自限，一心主张效法西方，崇尚西方社会政治，这与清廷对他的“厚望”相距甚远，深为李鸿章所忌。更为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当时社会虽学西方办洋务，但封建传统体制并未受到触动，科举士子们才是“正途出身”，才是国家的栋梁之材。顽固的社会压力，使严复深为自卑，自愧“当年误习旁行书”，才落得今日“举世相视如髦蛮”的窘境。为此，每见到得了功名的“贵人”，不由得“慑然之下，肩耸足自矍”，以致于严复不得不转向科举仕途以求侧身政治舞台来施展宏图。他曾花钱捐了个监生，也被迫应科举考试，从 1885 年到 1894 年，九年中四次参加考试，但秋闱四度报罢，次次名落孙山。

对一个有志之士来说，严复个人的经历太不顺畅了。家庭的不幸，社会的变迁成为种种偶然的因素，而这又成为严复举世闻名的块块基石，或者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晚清时代造就了这位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

2. 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如惊雷使严复从苦闷中清醒。战前，严复因远离官场，淡然仕途，“得有时日多看西书”，加之他

^① 《严复集》第 3 册，第 730 页。

对西方政治、文化的体察，他强烈地感到，中国要改变贫弱，就要从根本上学习西方，变法图强。他觉得“胸中有物，格格欲吐”，激荡的爱国热情，紧迫的匹夫之责，使他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原强》、《救亡决论》等著作，深刻地揭示了西强中弱的原因，提出著名的启蒙主义救国思想。这在当时社会如同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严复决心以西学振兴中国，挽救民族危机，这首先就要传播西学，启蒙民智。严复惊“觉世间惟有此种是真实事业，必通之而后有以知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化育，而治国明民之道，皆舍之莫由”。^① 基于这样的认识，甲午战后的十余年间，严复以他所有的西学基础，大量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名著，译著 11 部，170 多万字。中国人第一次从深层次了解认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自严复始，西学才在真正意义上向中国传播，并进入了系统化和理论化阶段。

晚清社会西学东渐是在西强中弱的悬殊文化差异下进行的，中国人认识中西文化的差异，由表层到深层的深化，即认识到中华民族深重危机的根源不仅在于声光电化、船坚利炮不如西方，更在于中国腐朽的政治制度，从而醒悟到中国当自强向上，奋发争存方能摆脱危机。这与严复深入传播西学的功绩分不开，对此无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是不能与之相比的，他是“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严复的译书情况大致统计如表所示。

严复译著之精，影响之大为世人所公认，而最负盛名的当首推其最早所译的《天演论》。《天演论》是严复根据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Huxley, Thomas Henry, 1825—1895 年）1893 年的一次学术讲座稿《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和 1894 年该讲稿付印前所添写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导言》而编译的。赫胥黎是达尔文的朋友以及达尔文学说的忠实捍卫者，其基本观点是

^① 《严复集》，第 3 册，第 780 页。

书名	作者	原书出版年份	译述时间	译文(最初)出版时间	出版情况	字数	附录内容	备注
天演论 (Evolution and Ethics)	赫胥黎 (T.H.Huxley, 1825—1895 英国博物学家)	1893年 (正文) 1894年 (导言) (英国)	1894(?)— 1896年	1897年 12月	1897年12月—1898年2月以《天演论悬疏》为名(署侯官严复达旨)在《国闻汇编》第2、4、6册刊载。 1898年4月题名《天演论》，由湖北沔阳卢氏慎始斋木刻出版。 1898年10月，《天演论》由侯官嗜奇精舍石印出版。 1905年，《天演论》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1921年20版。	近6万字(其中案语30条,约1.7万字)。	书前有吴汝纶序、自序和《译例言》。	各种翻刻本在30种以上。
原富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亚当·斯密 (Adam Smith, 1723—1790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1776年 (英国)	1897— 1900年	1901— 1902年	分八册,由上海南洋公学院(交通大学前身)译书院陆续出版。	约55万字(其中案语300余条,约88万字)。	书前有吴汝纶序、斯密·亚当·亚传、译事例言及中西年表。	

书名	作者	原书出版年份	译述时间	译文(最初)出版时间	出版情况	字数	附录内容	备注
群学肄言 (Study of Sociology)	斯宾塞 (H. Spencer, 1820—1903 英国著名 庸俗进化 论者)	1873年 (英国)	1897— 1903年	1897年 12月	1897年12月—1898年1月题名《劝学篇》,载《国闻汇编》第1、3—4册。1901年,《劝学篇》第一篇由南昌读有用书之斋作为“侯官严氏丛刻本”木刻出版。 1902年,《群学》(即《劝学篇》)由杭州史学斋铅印出版。 1903年4月,以《群学肄言》为书名,分4册由上海文明译书局出版。 同年《订正群学肄言》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19年10版。		书前有高凤谦序、译余赘序、译余赘语。	
群己权界论 (On Liberty)	穆勒 (J. S. Mill, 1806—1872 英国著名 资产阶级 思想家)	1859年 (英国)	1899年	1903年9月	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20年7版。	约8万字	书前有自序及译凡例。	原名《自由论》

书名	作者	原书出版年份	译述时间	译文(最初)出版时间	出版情况	字数	附录内容	备注
社会通途 (History of Politics)	甄克思 (E. Jenks, 1861—1939 英国资产阶级学者)	1900年 (英国)	1903年	1904年1月	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915年7版。	约11万字(其中 案语18 条,约 4000字)。	书前有夏普 佑序及译者 序。	
穆勒名学 (A System of Logic)	穆勒 (J. S. Mill)	1843年 (英国)	1900— 1902年	1905年	由金陵蒯氏金粟斋木刻出版。 1912年,由商务印书馆分三册字 铅印出版。 1959年,三联书店出了新的标 点本。	约29万 字		只译出 全书的 前半部, 即演绎 法部分。
孟德斯鸠 法意(De L'esprit des Loix)	孟德斯鸠 (Baron de Montesqui- eu, 1686— 1755 法国 资产阶级 思想家)	1748年 (法国)	1900(?)— 1909年	1904—1909 年	分七册,由上海商务印书馆 陆续出版。1913年4版。	约52万 字		

书名	作者	原书出版年份	译述时间	译文(最初)出版时间	出版情况	字数	附录内容	备注
名学浅说 (Primer of Logic)	耶方斯 (W.S. Jevons, 1835—1882 英国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	1870 (英 国)	1908年	1909年	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959年,三联书店出了新的 标点本。1921年11版。		书前有译者 自序。	
中国教育议	卫西琴 (A. Westharp)			1914年	载《清言报》第2卷,第3、4期。 同年,先后由天津庸言报馆和 上海文明书局出版。		书前有译者 按	
欧战缘起	根据外国报 刊的消息和 社论编译		1915年		载于送呈袁世凯阅览的资料集 《居仁日览》,非卖品			
英文汉诂	据英人马孙 摩栗思等著 作编译			1904年	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书前有自 序。	
支那教案论	必克	1892年		1899年4月	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			

在达尔文进化论学说基础上进一步阐发的。他认为：生物是进化的而非自古不变，进化的规律是“物竞”“天择”，“物竞”就是“生存竞争”，“物争自存”；“天择”就是自然选择，“以一物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愈益发展，文明发达、伦理优秀的民族将永是适于生存者。

赫胥黎以简洁生动的语言阐述了达尔文主义的主要原理，他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进行了生动形象的描述，尤其是他的演讲包容了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气势恢宏，展示了对人类文化发展的美好追求。这些促使严复结合中国的现状，编译此书，藉以警示人们，不奋斗，就要亡国灭种，只有努力，才会自强不息。

《天演论》于1898年正式出版发行，立即引起社会的震动，康有为、梁启超这对变法维新运动的帅将，从中受到深刻启发，得到了思想武器；青年鲁迅对此爱不释手，竟能脱口背诵好几篇；一时间“物竞”、“争存”、“优胜劣败”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自强”、“自立”、“自存”、“自治”、“自主”，以及“竞存”、“适存”、“演存”、“进化”之类的新词汇盛行，并被用做人名。“杨天择”、“宋竞存”、“胡适之”……物竞天择的新观念在思想界广泛传播开来，它使那个时代的有识之士有了强大的思想动力，恰如日本学者稻叶君山在其《清朝全史》一书中所言：“《天演论》发挥适种生存，弱肉强食之说，四方读书之子，争购此新著。却当1896年中日战争之后，人人胸中，抱一眇者不忘视，跛者不忘履之观念。若以近代之革新，为起端于1895年之候，则《天演论》者，正溯此思潮之源头，而注以活水者也。”严译著作，系统全面地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理论，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3. 信、达、雅的严译风格

严复是一位非凡的翻译家，他以娴熟的外文、明确的译述目

的和独特的译文标准，力求准确地译出西学原著的本质内容，并赋予其鲜明的现实性和文学价值，从而使晚清的西学东译推进了我国的翻译事业。

早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时，严复就已经具有优秀的外文功底，英国的留学生活又使他对外文更加精通。加之他对西方文化的深刻了解和研究，这是当时一般翻译者所无法相比的优势，也成为他日后翻译西学著作的重要基础。严复以此有利工具，实现他传播西学、开启民智、拯救民族的伟大抱负。

严复译书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即译书是为介绍“西学”，但绝非西学之末，而是让国人更深入地了解西学的精髓，知道西方强势之所在，从而开阔人们的眼界，思考中国何以弱？如何才能强？严复在给张元济的信中谈到译书时说：“复自客秋（指1898年秋）以来，仰观天时，俯察人事，但觉一无可为。然终为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逐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羸靡，亦得有复苏之一日也。所以屏弃万缘，唯以译书自课。”^① 译书目的明确，所译著作便经过严格选择，主要是反映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社会科学著作，严复最有影响的八部译著就涉及哲学、经济、法律、伦理、社会学等方面。为了达到译书的目的，严复在译书中还融入了自己深刻的见解，撰写了大量的按语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些按语与译著内容融会贯通，既介绍了西学，又切中清廷时弊。据统计，严译著作中，他所加的按语几乎占译文总字数的十分之一，仅就《天演论》的译述看，所加按语数量如下：^②

^① 严复：《与张元济书》，载《严复集》第3册，第525页。

^② 转引高惠群、乌传：《翻译家严复传论》，1992年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严译《天演论》各节本文与按语数量小计

篇目		字数		篇目		字数	
		本文	按语			本文	按语
导言一	察变	1160	676	论一	能实	1015	260
导言二	广义	812	1040	论二	忧患	1247	
导言三	趋异	754	1118	论三	教源	1218	986
导言四	人为	870	702	论四	严意	1247	
导言五	互争	580	494	论五	天刑	1044	130
导言六	人择	841	286	论六	佛释	899	
导言七	善败	580	312	论七	种业	957	312
导言八	乌托邦	1044	520	论八	冥往	870	
导言九	汰蕃	899	104	论九	真幻	1044	1430
导言十	择难	754		论十	佛法	957	1222
导言十一	蜂群	841		论十一	学派	1305	1846
导言十二	人群	754	286	论十二	天难	1131	156
导言十三	制私	841	338	论十三	论性	870	234
导言十四	恕败	638	260	论十四	矫性	870	390
导言十五	最旨	812	1690	论十五	演恶	986	728
导言十六	进微	1189	598	论十六	群治	986	468
导言十七	善群	1044	390	论十七	进化	1740	
导言十八	新反	1015	728	合计		33814	17704

对于严译著作中的按语，学者多有不同看法，但它至少反映了严复对西方社会的深刻认识和原著精神的准确把握，既有博学精深的学识，又有个人卓越的思想见解，这决非轻而易举之事。这些按语也是严复阐发自己政治主张的一种形式，在民族危

机口深之时，严复曾为自己人微言轻难以实现远大的抱负而沮丧。但在他认识到译书、传播西学对于唤起民智的重大作用后，便一直笔耕不辍，将自己的政治主张淋漓尽致地发挥其中。人们从译著中不仅看到了西方社会的强大，也看到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更懂得要“自由”，靠“竞争”才能“求存”，国家才能自立、富强。这正是严复作为一位翻译家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非凡之处。

严复作为一名翻译家有其独特的翻译标准和风格。他在前人翻译经验的基础上，将我国历史上零散的翻译观点从理论上作了简洁、鲜明的概括，提出“信、达、雅”的标准，这不仅为后世从事翻译的人提出了明确、具体的标准，也使翻译理论和水平都有了新的提高，在我国翻译史上具有积极的意义。而这些正是由严复自身所具备的多种条件所决定，他有精深的中、西文功底，有对中、西社会的亲身考察和入木三分的透析，对原著的精髓有融会贯通的理解。严复正是以他独特的自身因素形成了他翻译西书的独特风格，“信、达、雅”的标准正是他风格的体现。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第一句便言明：“译事三难：信、达、雅。”依严复的才华，如仍觉做到‘信、达、雅’难，其他翻译家自不待言。这种“难”来自于雕琢文义，“鄙人于译书一道，虽自负于并世诸公未遑多让，然每逢义理精深，文句奥衍，辄徘徊踟躕，有急与之搏力不敢暇之慨”，来自于耐得住寂寞、清苦，“不能与人竞进热场，乃为冷淡生活”，来自于“不独为时贤所窃笑，家人所怨咨，而掷笔自顾，亦自觉其无谓”。尽管这样，严复仍矢志不渝，凭着自己对中、西文字的娴熟理解，对原著深刻的认识，采用了自己独特的办法，“颠倒附益”，“前后引衬，以显其意”，达到“为述即所以为信”的目的，使“信、达”有机结合。在此基础上，严复在翻译西书中还“刻意求雅”，在文字上着实下了一番功夫，把翻译当做艺术创作，追求尽善尽美的境界。

严复少时就已经有了扎实的国学基础，后来在古文词上又求教于桐城派大家吴汝纶。晚清时期的桐城派虽已如强弩之末，在文学理论上并无新的建树，但吴汝纶却是享有很高的文名声望，并居于桐城派作家坛主之位。桐城派文风家法“精通、质实、雅驯”以及吴汝纶的指点，与严复以后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当有密切的联系。加之吴汝纶极赞许严复以古文来传播西学，所以严复首译的《天演论》“桐城气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地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①当然，鲁迅先生也揭示了严复以古文翻译西文，刻意求雅的更深刻社会原因：“那时的留学生没有现在这么阔气，社会上大抵以为西洋人只会做机器——尤其是自鸣钟——留学生只会讲鬼子话，所以算不了‘士’的。因此他便来铿锵一下子，铿锵得吴汝纶也肯给他作序。”^②也就是说，当时社会的人们瞧不起留学生，视他们如只会说洋话，没有多大本领的洋鬼子。严复在这样的氛围中，坚持“信、达”之上求“雅”，也有他以此证实自己虽“出身不由科第”却也博通国学的良苦用心。尽管如此，今天我们重读严译名著仍能感到他是以清新流畅的语言和桐城派古文的风格来自然地表达译文内容，重点突出，又富于逻辑。我们不妨来朗读《天演论》开头的一段译文，这种感受会更加深刻。这段译文的原文是：

It may be safely assumed that, two thousand years ago, before Caesar set foot in southern Britain, the whole country-side visible from the windows of the room in which I write, was in what is called 'the state of nature'. Except, it may be, by raising a few sepulchral mounds, such as those which still, here and there, break the flowing contours of the downs, man's hands had made no mark upon it; and the thin veil of

① 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二心集》。

② 同①。

vegetation which overspread the broad-backed heights and the shelving sides of the coombs was unaffected by his industry. The native grasses and weeds, the scattered patches of gorse, contended with one another for the possession of the scanty surface soil; they fought against the droughts of summer, the frosts of winter, and the furious gales which swept, with unbroken force, now from the Atlantic, and now from the North Sea, at all times of the year; they filled up, as they best might, the gaps made in their ranks by all sorts of underground and overground animal ravagers. One year with another, an average Population, the floating balance of the unceasing struggle for existence among the indigenous plants, maintained itself. It is as little to be doubted, that an essentially similar state of nature prevailed, in this region, for many thousand years before the coming of Caesar; and there is no assignable reason for denying that it might continue to exist through an equally prolonged futurity, except for the intervention of man.

用现代汉语逐字逐句地表达（借用1971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的现成译文），可以译为：

可以有把握地想象，两千年前，在凯撒到达不列颠南部之前，从我正在写作的这间屋子的窗口，可以看到整个原野是处在一种所谓“自然状态”之中。也许除了就像现在还在这里或那里破坏着连绵丘陵轮廓的为数不多的一些垒起的坟堆以外，人的双手还没有在它上面打上烙印。笼罩着广阔高地和峡谷斜坡的薄薄的植被，还没有受到人的劳动的影响。本地的牧草和杂草，分散在一小块一小块土地上的金雀花，为了占据贫乏的表面土壤而互相竞争着；它们同夏季的干旱斗争，同冬季的严霜斗争，同一年四季时而从大西洋时而从北海不断吹来的狂风斗争；它们竭尽全力来填补各种地面上和地下的动物破坏者在它们行列中间所造成的空隙。年复一

年，它们总维持着一种平均的类群数量，也就是本地植物在不断的生存斗争中维持着一种流动的平衡。无可怀疑，在凯撒到来之前的几千年中，这个地区就已存在着一种基本上类似的自然状态；除非人类进行干预，否则就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来否定它能够在同样长久的未未岁月中继续存在下去。

严复的翻译与此不大相同，他的译文是：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各据一杯壤土，夏与畏日争，冬与严霜争，四时之内，颿风怒吹，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旁午交扇，无时而息。上有鸟兽之践啄，下有蚁蜂之啮伤，憔悴孤虚，旋生旋灭，菟枯顷刻，莫可究详。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种族而已。数亩之内，战争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年年岁岁，偏有留遗。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于何代。苟人事不施于其间，则莽莽榛榛，长此互相吞并，混逐蔓延而已，而诘之者谁耶！”

两段译文相对照，自然会觉得严译之篇读之朗朗上口，情景自在其中。所要阐发的中心、重点在文中鲜明、突出。

很久以来，各家对严译风格的评判莫衷一是。但是从文化交流和资产阶级思想启蒙的视角来看，严复在传播西学、开启民智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与严复同时代的留美生颜惠庆曾说：严复“对于西方科学，与政术的精义，有彻底的了解，又博通中国旧学，所译各书，融贯中西，典雅信达，较之往昔教会人士，俗

俚无文的译著，相去何啻天渊！盖不仅在学术思想方面，灌输正确的知识，即在纯文艺方面，亦属上乘，可资轨范，有其崇高的价值和地位”。^①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赞扬的那样，严复“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

4. 严译名著的社会影响

严复因其译书面享有盛名，他的翻译事业使晚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向新的阶段发展，也给当时寻求救国之道的人们以有力的思想武器，从而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用枪炮轰开了满清帝国的大门，中国人才较多地接触西方文化，但是真正比较全面地了解西方文化是从19世纪90年代严译名著问世以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炮火首先惊醒了那些先进的中国人，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超出其同时代、同营垒中之人，开眼看西方世界以求新知。他们曾编译西方国域、国情之书，了解西方社会，但最终的目的是“制夷”。这种急功近利的目的决定了他们对西方文化仅仅是表明了一种开放的文化态度，而不是真心地学习和接受西文化的本质内容。19世纪6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学习西方成为洋务派官僚的实际行动，西方的物质文化被较多地介绍和仿效，但对于西方文化的内涵和精髓，即社会科学却没能引进传播，洋务派的著作仍未开启中华民族思想解放的闸门。甲午战败，亡国灭种的危机促使康有为、梁启超推动变法维新。执思想界牛耳的康有为与其弟子、门生著书立说，鼓吹学习西方，变法自强。而他们所备加赞赏、推崇的西方文化完全是来自于偶然所得和书本所见，不完全的西学加上他们既有的传统文化的根基，使他们所宣传的维新理论和西方文化难免“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虽然它也给人们以思想震动，推进了变法的发生，但终不能给人们以全新的理

^① 《颜惠庆自传》第35页。

论武器。将西方文化全面系统地介绍给中国人的正是堪称一代启蒙大师的严复，他是“19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他对中西文化有着深刻的比较和认识，敏锐地察觉到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危机根源不仅在于缺少近代西方的声光电化、坚船利炮之“末”，更在于封建制度腐朽没落之“本”。他决心以自己学习的西学来振兴中华民族，“富国”“自强”，用先进的资产阶级理论来开启民智，唤起民族精神的觉醒。严复以他的译作和著述广泛深入地传播西方文化，成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影响着戊戌变法的一代志士，启发、教育着跨越19、20世纪的一代人。当康有为看到严译《天演论》后，赞不绝口，称其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鲁迅先生也曾是“一有闲空，就照例吃俸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①毛泽东也曾说：“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习的也是这些东西”。^②“我正像黄牛闯进了菜园，初尝菜味，只顾着了吃”！“这是我学习历史上最有价值的半年”！^③胡适曾回忆道：“《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本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战屡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

①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

② 《毛泽东选集》，第1358—1359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③ 转引《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原》，第52、5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儿女的名字。陈炯明不是号‘竞存’吗？我有两个同学，一个叫做孙竞存，一个叫做杨天择。我自己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下的纪念品”。^①“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② 这些足以说明深受民族危机压抑的人们，对于严译著作所传播的那种新思想、新文化的积极渴求。梁启超先生对这一时期的情况也做过公正的评论：

自明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前清学术，颇蒙其影响，而范围亦限于天算。“鸦片战役”以后，渐怵于外患，洪杨之役，借外力以平内难，益震于西人之“船坚炮利”。于是上海有制造局之设，附以广方言馆，京师亦设同文馆，又有派学生留美之举，而目的专在养成通译人才。其学生之志量，亦莫或逾此。故数十年中，思想界亦无丝毫变化。惟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而教会之在中国者，亦颇有译书。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欲求知识于域外，则以此为枕中鸿秘。盖“学问饥饿”至是而极矣。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等，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盖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即生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

^① 胡适，《四十自述》，《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第852页。

^② 《民报》第2号，《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

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盖国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狭，汲而易竭，其支绌天裂，固宜然矣。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易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盖如久处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颐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而亦实无卫生食品足以为代。时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穆勒约翰《名学》、《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尔《群学肆言》等数种，皆名著也。^①

可见，严复在当时译书、传播西学的巨大作用已寓在其中。

严复的译著也为文化史的发展掀开了新的一页，中国学者脱离教会影响，独立地翻译西文原著自严复始。洋务运动兴起首先是创办外语学堂，以求培养外语人才，翻译西书，引进所急需的科技知识。但直至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译书事业中起主导作用的并不是中国知识分子而仍然是传教士。在晚清主要的翻译机构中，多数是教会机构，即使较有影响的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虽为官办，也仍是由传教士主持翻译工作。而翻译的方法始终没有超出西译中述的模式，“将所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②当然，也有个别独立译书的中国学者，如上海留美归国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饮冰室合集》（8）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② 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第2章。

学者、圣约翰书院院长颜永京译过美国海文著的《心灵学》(心理学),浙江留美归国学者、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员舒高等也译过很多医学书籍。他们都精通英文,独立译著,但因他们都与教会有联系,译书内容较单一专业,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

严复的译书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鲜明特点。他所译内容在那个“学问饥荒”的年代无疑是人们渴求的新知,给人们以启示,唤醒了民族精神,催人奋进竞争。在译著形式上,由于他中西学功底都很深厚,译文的风格为中国知识分子所熟悉并乐于接受。加上那洋洋洒洒的按语,又使人们在陌生的新知里得到了引路的导读。严复是一位官派留学生,回国后虽未委以大任,毕竟身居官位,这些就更使一般士大夫接受他的译著。严复在翻译风格和方法上的许多独创也给后来翻译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林纾的翻译活动与贡献

1. 译林奇才

在中外翻译史上,林纾堪称译林奇才。林纾(1852—1924年)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晚称蠡翁、践卓叟,福建闽县(今福州)人。称之为奇才乃因他涉笔译界的方式奇。1897年,与林纾相伴近三十年的结发爱妻刘琼姿病逝,林纾终日郁郁寡欢。从法国归来的好友王寿昌(字子仁,又名晓,字晓斋)便邀林纾一起翻译法国小说,并介绍说巴黎小说均出自名手,其中仲马父子的文字最为知名,《巴黎茶花女遗事》尤为小仲马极笔。王寿昌再三劝慰:“吾请与予译一书,子可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绍一名著于中国,不胜于蹙额对坐耶?”^①林纾担心不能胜任而婉拒,但在好友魏瀚(留学法国,任职马江船政局工

^① 杨荫深:《中国文学家列传·林纾》,1939年中华书局版,第486页。

程处)的再三怂恿下,林纾才打趣地说:“须请我游石鼓山乃可。”^①于是,在游览福州著名的风景区石鼓山的路上,林纾以他奇特的方式开始走上翻译之路,此亦为中国系统翻译外国文学名著之始。^②

林纾中译中述的翻译方法亦奇。林纾是一位诗、文、画、译皆优的大家,但使他成名于世的是翻译欧美小说。他不懂外文,却翻译了众多作品,创造了中译中述的独特翻译方法。在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时,王寿昌阅读原文,口述小说内容,林纾笔述,他思维敏捷,文字雅畅,“耳受手追,声已笔止”,日译四小时,成文六千言。陈希彭在林译《十字军英雄记·序》中曾说林纾“运笔如风落霓转,……所难者,不加窜点,脱手成篇”。陈衍先生在《续闽川文士传》中对林纾译书情景曾做描述:“口述者未毕其词,而纾已书在纸,能限一时许就千言,不窜一字。”^③林纾以其惊人的译速,笔译不辍,每年都有新译作出版,最多的是1908年,竟有15部译作问世。据统计,至其去世之时,他共翻译了英、美、法、俄、德、日、比利时、瑞士、希腊、西班牙、挪威等11个国家、98位作家的159种作品(不含未刊印的23种)。

林译的神速令人惊叹,以至时人对其多有质疑和讥讽,“正因为译得快,所以字迹异常潦草,且常出现误字”。^④而有些则是林纾“‘信笔行之’,不加思索,没体味出原话里的机锋”。钱钟书先生例举林译《滑稽外史》十四章(原书十五章)里番尼的信,林译:“先生足下:吾父命我以书与君。医生言吾父股必中断,腕不能书,故命我书之。”而迭更斯的原文是:“... the doctors considering it doubt-

① 黄潜:《花随人圣龛摭忆》,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版,第238页。

② 关于《巴黎茶花女遗事》的译书时间说法有二:阿英在《关于〈巴黎茶花女遗事〉》一文中,认定译于1898年;杨荫深在《中国文学家列传·林纾》中认为译于1897年;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的有关注释中认为,译书“事在光绪丙申、丁酉间”。

③ 《福建通志·文苑传》,民国27年印行,卷9。

④ 郑朝宗:《林纾评传》(序),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ful whether he will ever recover the use of his legs which prevents his holding a pen.”显然，林译画蛇添足，多加了一个“腕”字，倘若林纾从容推敲，或许会译为“股必中断，不能作书”或“足胫难复原，不复能执笔”。林纾在后来也坦言：“纾本不能西文，均取朋友所口述者而译，此海内所知。至于谬误之处，咸纾粗心浮意，信笔行之，咎均在己，与朋友无涉也。”^①当然，林纾的那些合作者们的口译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的。

尽管如此，在翻译作品时林纾也显示出高深的文学修养和丰厚的国学底蕴，他“可像辨别家人的脚步声那样，区别外国文学的流派。而且他古文娴熟，长于叙事抒情，人所莫言、言而莫尽者，都能言而尽之，有无微不达之妙”。^②有些作品保持了原文的风格情调、幽默风味和巧妙用语，有些作品经过林译增加了不少的光彩，有些作品则融入了林纾的真情实感。林纾在翻译小说《露漱格兰小传》的序言中曾回忆道：“余既译《茶花女遗事》，掷笔哭者三数，以为天下女子性情，坚于士夫。而士夫中必若龙逢、比干之挚忠极义，百死不可挠折，方足与马克竞。”^③胡孟玺在《林琴南事略》中也有相同回忆：“林纾与王寿昌合译此书时，因适逢夫人刘氏之丧，每于译到缠绵凄恻处，情不自禁，两人恒相对哭。”^④本来就已凄恻哀惋、悲怆动人的爱情悲剧经林译后，不胫而走，一时洛阳纸贵，风行海内。严复为此写诗赞扬：“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郑振铎先生也称赞道：“译笔清腴圆润，有如宋人小词。”就连康有为也留下“译才并世数严林”的极高评价。林纾以他独特的翻译方式和源源不断的大量作品将外国文学引入中国，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著名的小说翻译家，“林译小说”也成为近代中国翻译文

①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载《林纾研究资料》，第30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 曾宪辉：《林纾传》，载《林纾研究资料》，第3页。

③ 《晚清文学丛抄·小说戏曲研究卷》，第198页。

④ 《福建文史资料》，第5辑，第103页。

学时代的开始。

称林纾为译林奇才,自然让人们想起在现实生活中,他还是一个有许多与众不同之处的人。林纾为人很倔,他说自己:“家贫而貌寝,且木强多怒。”“他性质之刚强善怒,差不多稍亲近他的人都知道的。有许多人,颇因此与他疏离”。^① 陈衍老先生在与钱钟书先生的一次谈话时,忆道:“琴南最恼人恭维他的翻译和画。我送他一副寿联,称赞他的画,碰了他一个钉子。康长素送他一首诗,捧他的翻译,也惹他发脾气。”康有为赋谢林纾所画万本草堂图,曾赠诗一首:“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喜剩录光经历劫,谁伤正则日行吟。唐人顽艳多哀感,欧俗风流所入深。多谢郑虔三绝笔,草堂风雨日披寻。”不料,林纾非但不感谢且很不快意。“诗里既然不紧扣图画,都是题外的衬托,那么第一该讲自己的‘古文’,为什么倒去讲翻译小说?舍本逐末,这是第一。在这首诗里,严复只是个陪客,难道非用‘十二侵’韵不可,不能用‘十四盐’韵,来一句‘译才并世数林、严’么?……喧宾夺主,这是二”。^② 这虽是个文人好名争名的笑话,却略见林纾的倔劲。

林纾的倔还表现在他是一个很清高的人。1882年,他中了举人之后,便弃绝制举之业,专力于古文,以后在学堂教书。自从与王寿昌合译《茶花女遗事》受人赞颂后,译书兴趣大增,以至他后来的生活费用完全靠译书售稿供给。到了晚年,除了译书之外,也靠卖画为生。在他70岁高龄之时,还是每天站立在画桌前作画六七个小时,无一日间断,“茶几书架上常常堆满了纸绢,直到病榻上难以握管还在纸上摸索,他死后还欠了许多画债”。^③ 他的朋友及后辈中有许多显贵者,但他从未要过不劳而获的钱财。

倔的另一面是林纾有一副古道热肠。“他虽时时怒责别人,常

① 郑振铎:《林琴南先生》,《林纾研究资料》,第150页。

②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林纾研究资料》第320页。

③ 王芝青:《我的绘画老师林琴南》,《林纾研究资料》,第123页。

使受者难堪,而当他们有危急、有需求时,他却不惜奔走营求以救其困难”。^① 林纾有一位叫王灼三的好友病故后,“其妻因家贫关门自缢。林纾闻讯,破窗救出,筹措了‘四百金’供其使用。又把王灼三之子王元龙领到自己家,一直抚养到娶妻成家,前后共十二年之久。王灼三之女出嫁,又是林纾全力资助”。^② 他的这种热情,也是其自涉笔译界,常年不辍的精神所在。林纾自己曾说:“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我同胞警醒,于小说序中,摭其胸臆。”^③

林纾还奇在“天性挚厚,侍太夫人极孝,笃于家人骨肉的情谊”,“每年春来以寒食,秋来以重九”,从未间断地坚持为其外祖母扫墓几十年。对于清王朝,则表现了亡朝遗老的愚忠,他曾十余次谒德宗崇陵,每次至陵前,“必伏地哭失声,引得守陵的侍卫们眙愕相顾。他在学校授课时总勉励学生做一个爱国志士,说到恳切之际,每每声泪俱下。他以卫道者自居,五四运动起时,干了许多堂吉诃德先生的可笑的举动”。^④

对于林纾的译书才能、翻译方法以及其为人处事,世人从不同的角度多有评论。无论是褒是贬,都可见林纾的奇。正是这些奇特之处,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才留下了他自己的痕迹。

2. 风靡于世的林译名著

林纾从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开始,终生所译外国作品众多,见《林纾译著一览表》。^⑤

①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林纾研究资料》第320页。

② 张俊才:《林纾年谱简编》,《林纾研究资料》,第19页。

③ 郑振铎:《林琴南先生》,《林纾研究资料》,第150页。

④ 苏雪林:《林琴南》,载《文人画象》第3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1月版。

⑤ 郑振铎先生《林琴南先生》一文提到,林译成书156种,其中132种已出版,10种见于小说月报,14种未付印。钱钟书先生《林纾的翻译》一文提到林纾共译作品170余种。

林纾译著一览表

序号	书名	作者	口译者	原著出版	译著出版	国别	出版情况	备注
1.	《雷差得纪》 Richard II①	1. 莎士比亚 (1564—1616) William Shakespeare	陈家麟	1597年	1916年1月	英	《小说月报》第7卷第1号	现译为《查理二世》
2.	《亨利第四纪》 Henry IV②	莎士比亚	陈家麟	1598—1600年	1916年2—4月	英	《小说月报》第7卷第2—4号	现译为《亨利四世》
3.	《亨利第六遗事》 Henry VI③	莎士比亚	陈家麟	1594—1623年	1916年4月	英	商务印书馆	现译为《亨利六世》
4.	《凯彻遗事》 Julius Caesar④	莎士比亚	陈家麟	1623年	1916年5—7月	英	《小说月报》第7卷,第5—7号	现译为《裘利斯·凯撒》
5.	《亨利第五记》 Henry V⑤	莎士比亚	未详	1600年	1925年11—12月	英	《小说世界》周刊第12卷,第9—10期	现译为《亨利五世》林琴南遗稿
6.	《鲁滨逊漂流记》 Life and strange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 Son Cru- soe ①	2. 笛福 (1660? 1731) Daniel Defoe	曾宗巩	1719年	1905年12月	英	商务印书馆	达孚现译为笛福

序号	书名	作者	口译者	原著出版	译著出版	国别	出版情况	备注
7.	《鲁滨逊漂流续记》 Foster Adventures of Robin Sun Crusoe②	笛福	曾宗汎	1719年	1906年度	英	商务印书馆	
8.	《海外轩渠录》 Gulliver's Travels	3. 斯威夫特 (1667—1745) Jonathan Swift	魏易或 曾宗汎	1726年	1906年4月	英	商务印书馆	现译为《格列佛 游记》
9.	《洞冥记》 A Journey from This World to the Next	4. 菲尔丁 (1707—1754) Henry Fielding	陈家麟	1743年	1921年5月	英	商务印书馆	
10.	《吟边燕语》 Tales from Shakespeare	5. 兰姆和玛丽兰姆 Charles Lamb Mary Lamb	魏易	1807年	1904年10月	英	商务印书馆	原作者林译误为 莎十比亚
11.	《撒克逊劫后英雄略》 I. vanhoe ①	6. 司各特 (1771—1832) Walter Scott	魏易	1820年	1905年10月	英	商务印书馆	现译为《艾凡赫》
12.	《十字军英雄记》 The Talisman ②	司各特	魏易	1825年	1907年3月	英	商务印书馆	
13.	《剑底鸳鸯》 The Betrothed ③	司各特	魏易	1825年	1907年11月	英	商务印书馆	也译作《未婚妻》

序号	书名	作者	口译者	原着出版	译著出版	国别	出版情况	备注
14.	《乔叟故事集》 Tales from Chaucer in Prose	7. 查理·克拉克 (1787—1877) Charles Couden Clarke	陈家麟	1870年	1916年12月	英	《小说月报》第7卷,第12号	林译是克拉克将乔叟的诗体故事《坎特伯雷故事》改写成的散文。
15.	《拿破仑本记》 History of Napoleon. Buona- parte	8. 洛加德 (1794—1854) John Gibson Lockhart	魏易	1829年	1905年7月	英	京师学务处官书局	
16.	《厉鬼犯辟记》 Windsor Castle	9. 安司倭司 (1805—1882) William Ainsworth Herrison	毛文钟	1843年	1921年5月	英	商务印书馆	现译为安斯沃思,可译作《温莎城堡》
17.	《奇女格露枝小传》 The Thane's Daughter	10. 玛丽·克拉克 (1809—1898) Mary Cowden Clarke	陈家麟	1850	1916年5月	英	商务印书馆	
18.	《孝女耐儿传》 The Old Cuislity Shop ^①	11. 却而可迭更斯 (1812—1870) Charles Dickens	魏易	1841年	1907年12月	英	商务印书馆	现译为查理·狄更斯《老古玩店》

序号	书名	作者	口译者	原著出版	译著出版	国别	出版情况	备注
19.	《滑稽外史》 Nicholas Nickleby ②	狄更斯	魏易	1839年	1907年7月	英	商务印书馆	
20.	《块肉余生述》《续编》 David Copperfield ③	狄更斯	魏易	1850年	1908年2月、3月、 3月	英	1908年2月、3月 商务印书馆出版 前编、续编	现译为《大卫·考 伯菲尔》
21.	《贼史》 Oliver Twist ④	狄更斯	魏易	1838年	1908年5月	英	商务印书馆	现译为《奥立佛 ·托斯特》或《雾都 孤儿》
22.	《冰雪因缘》 Dombey and Son ⑤	狄更斯	魏易	1848年	1909年2月	英	商务印书馆	现译为《董贝父 子》
23.	《鹰梯小豪杰》 The Dove in the Eagle's Nest ①	12. 杨文 (1823—1901) Charlotte Mary Yonge	陈家麟	1866年	1916年5月	英	商务印书馆	现译作夏洛蒂· 玛丽·杨

序号	书名	作者	口译者	原著出版	译著出版	国别	出版情况	备注
24.	《戎马书生》 The Lances of Lynwood ②	杨文	陈家麟	1855年	1920年4月	英	商务印书馆	
25.	《双孝子喂血酬恩记》 The Martyred Fool	13. 大隈克力司蒂穆雷 David Christie Murray (1847—1907)	魏易	1895年	1907年9月	英	商务印书馆	现译作戴维·克里斯蒂·默里
26.	《新天方夜谭》 New Arabian Nights	14. 路易司地文 (1850—1894) Robert Louis Stevenson 佛尼司地文 (1840—1914) Fanny Vande Graft Stevenson	曾宗巩	1885年	1908年6月	英	商务印书馆	现译作罗伯特·路易·史蒂文生·芬尼·史蒂文生
27.	《贝克福探谈》及《续编》 The Quests of Paul Beck	15. 马克丹诺保德庆 M. Mc Donnell Bodkin (1850—1933)	陈家麟	1908年	1909年	英	商务印书馆	现译作麦克唐余·博德金

序号	书名	作者	口译者	原著出版	译著出版	国别	出版情况	备注
28.	《西伯利亚郡主别传》 For Love or Crown ①	16. 马支孟德 Arthur W. Marchmont (1852—1923)	魏易	1901年	1908年8月	英	商务印书馆	现译作马奇蒙特
29	《黑楼情孽》 The Man Who Was Dead②	马支孟德	陈家麟	1907年	1914年4—7月	英	《小说月报》第5卷,第1—4号	
30	《埃司兰情侠传》 Eric Brighteyes ①	17. 哈葛德 Henry Rider Haggard (1856—1925)	魏易	1891年	1904年秋	英	以严复题署之木刻本印行(此即上海广智书局之小说集新本)	
31	《迦茵小传》 Joan Haste②	哈葛德	魏易	1895年	1905年2月	英	商务印书馆	
32	《埃及金塔剖尸记》 Cleopatra③	哈葛德	曾宗巩	1889年	1905年3月	英	商务印书馆	可译为《克莉奥佩特拉》,即古埃及女王的名字
33	《英孝子大山报仇录》 Montezuma's Daughter④	哈葛德	魏易	1893年	1905年6月	英	商务印书馆	可译作《蒙特祖马的女儿》

序号	书名	作者	口译者	原著出版年	译著出版月	国别	出版情况	备注
34	《鬼山狼侠传》 Nada the Lily ⑤	哈葛德	曾宗巩	1892年	1905年7月	英	商务印书馆	可译作《百合姑娘娜达》
35	《斐洲烟水愁城录》 Allan Quatermain ⑥	哈葛德	曾宗巩	1887年	1905年10月	英	商务印书馆	
36	《玉雪留痕》 Mr. Meeson's Well ⑦	哈葛德	魏易	1888年	1905年12月	英	商务印书馆	可译作《米森先生的遗嘱》
37	《洪罕女郎传》 Colonel Quaritch V. C. ⑧	哈葛德	魏易	1888年	1906年1月	英	商务印书馆	可译作《陆军上校夸里奇》
38	《蛮荒志异》 Black Heart and White Heart, and Other Stories ⑨	哈葛德	曾宗巩	1900年	1906年2月	英	商务印书馆	可译作《黑心和白心及其它故事》
39	《红礁画桨录》 Beatrice ⑩	哈葛德	魏易	1890年	1906年4月	英	商务印书馆	可译作《比阿特丽丝》
40	《橡湖仙影》 Dawn ⑪	哈葛德	魏易	1888年	1906年10月	英	商务印书馆	可译作《黎明》

序号	书名	作者	口译者	原著出版	译著出版	国别	出版情况	备注
41	《雾中人》 People of the Mist ⑫	哈葛德	曾宗巩	1894年	1906年11月	英	商务印书馆	
42	《钟乳洞骸》 King Solomon's Mines ⑬	哈葛德	曾宗巩	1885年	1908年9月	英	商务印书馆	可译作《所罗门王的宝藏》
43	《玃司刺虎记》 Jess ⑭	哈葛德	陈家麟	1887年	1909年4月	英	商务印书馆	
44	《双雄较剑录》 Fair Margaret ⑮	哈葛德	陈家麟	1907年	1910年7—11月	英	《小说月报》第1卷,第1—5号	可译作《美丽的玛格丽特》
45	《二千年艳尸记》 She ⑯	哈葛德	曾宗巩	1886年	1910年9月	英	商务印书馆	
46	《古道遗金记》 Benita ⑰	哈葛德	陈家麟	1906年	1912年12月至1913年5月	英	天津《庸言》半月刊,第1卷,第1—11号	

序号	书名	作者	口译者	原著出版	译著出版	国别	出版情况	备注
47	《天女离魂记》 The Ghost Kings ⑬	哈葛德	陈家麟	1908年	1917年4月	英	商务印书馆	可译作《鬼王》
48	《烟火马》 The Brethren ⑭	哈葛德	陈家麟	1904年	1917年5月	英	商务印书馆	
49	《铁匠头颅》又《续编》 The Witch's Head ⑮	哈葛德	陈家麟	1887年	1919年8—10月	英	商务印书馆分别出版前编和续编	可译作《女巫的头》
50	《蒙士述猎》 Maiwa's Revenge ⑯	哈葛德	陈家麟	1888年	1919年11—12月	英	《小说月报》第10卷,第11—12号	可译作《梅娃的复仇》
51	《金陵神女再生缘》 The World's Desire ⑰	哈葛德与安德鲁·朗 Andrew Lang (1844—1912)合著	陈家麟	1890年	1920年3月	英	商务印书馆	
52	《炸鬼记》 Queen Sheba's Ring ⑱	哈葛德	陈家麟	1910年	1921年5月	英	商务印书馆	可译作《示巴女王的戒指》

序号	书名	作者	口译者	原著出版	译著出版	国别	出版情况	备注
53	《金风铁雨录》 Micah Clarke ①	18. 科南达利 Arthur Conan Doyle (1859--1930)	魏易或 曾宗巩	1889年	1907年6月	英	商务印书馆	现译为柯南道尔
54	《歇洛克奇案开场》 A Study in Scarlet ②	科南达利	魏易	1887年	1908年3月	英	商务印书馆	现译为《血字的研究》
55	《髯刺客传》 Uncle Bernac ③	科南达利	魏易	1893年	1908年5月	英	商务印书馆	
56	《恨绮愁罗记》 The Refugees ④	科南达利	魏易	1893年	1908年5月	英	商务印书馆	可译作《逃亡者》
57	《电影楼名》 The Doings of Raffles Hour ⑤	科南达利	魏易	1892年	1908年9月	英	商务印书馆	

序号	书名	作者	口译者	原着出版	译着出版	国别	出版情况	备注
58	《蛇女士传》 Beyond the City ⑥	科南达利	魏易	1892年	1908年9月	英	商务印书馆	
59	《黑太子南征录》 The White Company ⑦	科南达利	魏易	1891年	1909年4月	英	商务印书馆	
60	《芦花余孽》 From One Generation to An- other	19. 色东麦里曼 Henry Seton Merriman (1862—1903)	魏易	1892年	1909年10月	英	商务印书馆	现译为梅里曼
61	《玫瑰花》及《续编》 The Rosary	20. 巴克雷 Florence L. Barclay (1862—1921)	陈家麟	1909年	1918年11月 1919年7月	英	商务印书馆分别 出版前编、续编	现译为巴克利
62	《略史》 The Phantom Torpedo—boats	21. 亚波彼得 Allan Upward (1863—1926)	陈家麟	1905年	1919年1—9 月	英	《东方杂志》第16 卷,第1—9号	现译为厄普沃 德,林译误其为 法国人

序号	书名	作者	译者	原著出版	译著出版	图别	出版情况	备注
63	《神枢鬼藏录》 Chronicles of Martin Heweit	22. 阿瑟毛利森 Arthur Morrison (1863—1945)	魏易	1895年	1907年5月	英	商务印书馆	可译作《马丁·海威特记事》
64	《西奴林娜小传》 A Man of Mark	23. 安东尼贺迪 Anthony Hope (1863—1933)	魏易	1890年	1909年7月	英	商务印书馆	现译作安东尼·霍普
65	《大侠红紫露传》 The Scarlet Pimpernel	24. 阿克西男爵夫人 Baroness Emma Orcy (1865—1947)	魏易	1905年	1908年9月	英	商务印书馆	现译作奥克西·林译误其为法国人
66	《沙利沙女王小记》 The Island Mystery	25. 伯明罕 George A. Birmingham (1865—1950)	毛文钟	1918年	1921年11月	英	商务印书馆	可译为《神秘岛》
67	《麟孔避兵录》 The Secret	26. 蜚立伯倭本翰 E. Phillips Oppenheim (1866—1946)	魏易	1907年	1909年1月	英	商务印书馆	现译作菲利浦·斯·奥本海姆
68	《布匿第二次战犯》 The Second Punic War	27. 阿纳乐德 Thomas Arnold	魏易	1886年	1903年9月	英	京师大学堂官办局出版	

序号	书名	作者	口译者	原著出版	译著出版	国别	出版情况	备注
69	《花因》	28. 几拉德	魏易		1907年7月	英	中外日报馆	
70	《荒唐言》 Tales from Spenser Chosen from the Faerie Queene	29. 伊门斯宾塞尔 Edmund Spenser	曾宗巩	1890年	1908年7—9月	英	《东方杂志》第5卷,第7—9期	
71	《天囚忏悔录》	30. 约翰沃克森罕	魏易		1908年9月	英	商务印书馆	
72	《慧星夺婿录》	31. 却洛得·倭康, 诺 埃克尔司	魏易		1909年1月	英	商务印书馆	
73	《脂粉议员》	32. 司丢阿忒	魏易		1909年10月	英	商务印书馆	
74	《残蝉曳声录》	33. 测次希洛	陈家麟		1912年7—11月	英	《小说月报》第3卷,第7—11期	
75	《情禽》	34. 威利孙	力树萱		1912年11—1913年9月	英	《本报》(仍未载完)	1916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
76	《罗刹雌风》	35. 希洛	力树萱		1913年4—8月	英	《小说月报》第4卷,第1—4号	

序号	书名	作者	口译者	原著出版	译著出版	国别	出版情况	备注
77	《深谷美人》	36. 倭尔吞	陈器		1914年8月	英	北京宣元阁	
78	《石麟移月记》	37. 马格内	陈家麟		1915年1—6月	英	《大中华》月刊第1卷,第1—6号	
79	《云破月未缘》	38. 鹤刚伟	胡朝梁		1915年5—9月	英	《小说月报》第6卷,第5—9号	
80	《红菱记》 Beatrice	39. 希登希洛	陈家麟		1916年3—10月	英	《小说月报》第7卷,第8—10号 第8卷,第1号	
81	《诗人解颐洛》	40. 倩伯司 Chambers	陈家麟		1916年12月	英	商务印书馆	现译作钱伯司
82	《拿云手》	41. 大威森	陈家麟		1917年1—8月	英	《小说海》月刊第3卷,第1—8期	
83	《柔乡达险》	42. 利华奴	陈家麟		1917年1—6月	英	《小说月报》第8卷,第1—6号	
84	《女师饮剑记》 A Brighton Tragedy	43. 布司白 Guy Boothby (1867—1905)	陈家麟	1905年	1917年7月	英	商务印书馆	现译为布恩比

序号	书名	作者	口译者	原著出版	译著出版	国别	出版情况	备注
85	《北贼情丝记》	44. 陈施利	陈家麟		1917年7月	英	商务印书馆	
86	《桃大王因果录》	45. 参恩女士	陈家麟		1917年7月—1918年9月	英	《东方杂志》第14卷,第7号,第15卷,第9号	
87	《痴郎幻影》	46. 赖其铿女士	陈器		1918年10月	英	商务印书馆	
88	《泰西古剧》 Stories from the Opera	47. 达威生 Gladys Davidson	陈家麟	1914年	1919年1—2月	英	《小说月报》第10卷,第1—2号	原著54篇,林译31篇。现译为戴维森。
89	《妄言妄听》	48. 美森	陈家麟		1919年3—12月	英	《小说月报》第10卷,第3—12号	
90	《鬼窟藏娇》	49. 武英尼	陈家麟		1919年6月	英	商务印书馆	
91	《西楼鬼话》	50. 约克魁送斯	陈家麟		1919年6月	英	商务印书馆	
92	《欧战春宵梦》又《续编》	51. 高桑斯	陈家麟		1920年3—5月	英	商务印书馆分别出版前编、续编	

序号	书名	作者	译者	原著出版	译著出版	国别	出版情况	备注
93	《怪莲》	52. 伯鲁大因义	陈家麟		1921年5月	英	商务印书馆	
94	《马妒》	53. 高尔忒	毛文钟		1921年7月	英	商务印书馆	
95	《沧波海谍记》	54. 卡义	毛文钟		1921年10月	英	商务印书馆	
96	《情海疑波》	55. 道因	林凯		1921年11月	英	商务印书馆	
97	《埃及异闻录》	56. 路易	毛文钟		1921年11月	英	商务印书馆	
98	《曜日英雄》	57. 泊因	毛文钟		1922年3月	英	商务印书馆	
99	《妖孃首记》 Carnival of Florence	58. 巴文 Marjorie Bowen	毛文钟	1915年	1923年5—9月	英	《小说世界》周刊 第2卷, 8, 10—13 期, 第3卷, 1—9 期	现译作鲍恩
100	《鬼悟》	59. 威而司 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1946)	毛文钟		1921年6月	英	商务印书馆	现译作威尔斯

序号	书名	作者	口译者	原著出版	译著出版	国别	出版情况	备注
1	《巴黎茶花女遗事》 La Dame aux Camélias ①	1. 小仲马 Alexandre Dumas fils (1824—1895)	王寿昌	1848年	1898年1月	法	在福州以“畏庐藏板”本印行	现译为《茶花女》
2	《香钩情眼》 Antoine ②	小仲马	王庆通	1849年	1916年5月	法	商务印书馆	可译作《安京妮》
3	《血华鸳鸯枕》 L'Affaire Clemenceau ③	小仲马	王庆通	1866年	1916年8—12月	法	《小说月报》第7卷,第8—12号	可译作《克列孟梭的事业》
4	《鸚鵡缘》及《续编》《三编》 ④ Avenures de quatre femmes et d'un perroquet	小仲马	王庆通	1846年—1847年	1918年2月	法	商务印书馆出版 前编、续编,5月 出版三编	
5	《九原可作》	小仲马	王庆通		1919年1—12月	法	《妇女杂志》第5卷,第1—12期	
6	《伊罗埋的记》 La boîte d'argent ⑥	小仲马	王庆通	1855年	1920年1—2月	法	《小说月报》第11卷,第1—2号	

序号	书名	作者	口译者	原著出版	译著出版	国别	出版情况	备注
7	《利俾瑟战血余腥记》 Histoires d'un conscrit ^①	2. 阿猛查登 Ereckmann-Chatrian	曾宗巩	1864年	1904年4月	法	上海文明书局	现译作埃克芒—夏特里安,是其两人合作用笔名。原作者据英译本转译。
8	《滑铁卢战血余腥记》 ^② Waterloo; suite de conscrit	阿猛查登	曾宗巩	1865年	1904年5月	法	上海文明书局	原作者据英译本转译
9	《爱国二童子传》 Le tour de la France par deux enfants	3. 沛那 G. Bruno (1833—1923)	李世中	1877年	1907年9月	法	商务印书馆	现译为布律诺
10	《玉楼花劫》及《续编》 Le Chevalier de Maison-Rouge ^①	4. 大仲马 Alexandre Dumas's père (1802—1870)	李世中	1846年	1908年10月	法	商务印书馆	现译为《红屋骑士》
11	《蟹莲郡主传》 Une fille du régent ^②	大仲马	王庆通	1845年	1915年2月	法	商务印书馆	可译作《摄政王的女儿》

序号	书名	作者	口译者	原著出版	译著出版	国别	出版情况	备注
12	《离恨天》 Paul et Virginie	5. 森彼得 Bernardin de Saint- Pierre (1737—1814)	王庆骥	1787年	1913年6月	法	商务印书馆	现译为贝纳丹· 德·圣比埃尔《保 尔和薇吉妮》
13	《义黑》	6. 德罗尼	廖琇琨		1913年9— 10月	法	《小说月报》第4 卷,第5—6号	
14	《情铁》	7. 老昔倭尼	王庆通		1914年1—5 月	法	《中华小说界》第 1卷,第1—5期	
15	《哀吹录》	8. 巴鲁萨 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	陈家麟		1914年10— 12月	法	《小说月报》第5 卷,第7—10号	现译为巴尔扎克
16	《鱼海汨波录》 Pêcheur d' Island	9. 辟厄略坻 Pierre Loti (1850—1923)	王庆通	1886年	1915年8月	法	商务印书馆	现译为彼尔·洛 蒂《冰岛渔夫》

序号	书名	作者	口译者	原著出版	译著出版	国别	出版情况	备注
17	《鱼雁扶微》 Les letters Persanes	10. 孟德斯鸠 Montes quieu (1689—1755)	王庆通	1721年	1915年9月— 1917年8月	法	《东方杂志》第12卷,第9—10号;第13卷,第1—4号,6—7号;第14卷,1—8号	现译为《波斯人信札》
18	《酒中花》 Le coupable	11. 爽梭阿过伯 Francois Coppée (1842—1908)	王庆通	1879年	1915年10月	法	商务印书馆	现译为科佩
19	《白夫人感旧录》 Monsieur Destrémeaux	12. 海斯班 Jean Richepin (1849—1926)	王庆通	1882年	1917年11— 12月	法	《小说月报》第8卷,第11—12号	现译为里什藩
20	《金台春梦录》	13. 丹米尔(法)、华 伊尔(俄)合写	王庆通		1918年8月	法	商务印书馆	
21	《情天异彩》	14. 周鲁倭	陈家麟		1919年9月	法	商务印书馆	
22	《膜外风光》 Le voile du bonheur	15. 克里孟梭 Georges Clemenceau (1841—1929)	叶于沅	1901年	1920年	法	在北京以陆徵祥 家刻本印行	

序号	书名	作者	口译者	原著出版	译著出版	国别	出版情况	备注
23	《双雄义死录》 Quatrevingt-treize	16. 预勾 Victor Hugo (1802—1885)	毛文钟	1874	1921年10月	法	商务印书馆	现译为雨果《九三年》
24	《德大将兴登堡欧战成败》 Hindenburg	17. 蒲哈德 Edmond Buat (1868—1923)	林驺	1921	1922年9月	法	商务印书馆	
1	《黑奴吁天录》 Uncle Tom's Cabin	1. 斯土活 Harriet Beecher Stowe (1811—1896)	魏易	1852年	1901年	美	以武林魏氏刻本 印行	现译为斯托夫人 《汤姆叔叔的小屋》
2	《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 Jimmy Brown Trying to Find Europe	2. 阿丁 William L. Alden (1837—1908)	曾宗巩	1889年	1904年10月	美	商务印书馆	现译作奥尔登， 林误其为英国人
3.	《拊掌录》 The Sketch Book ①	3. 华盛顿·欧文 Washington Irving (1783—1859)	魏易	1820年	1907年2月	美	商务印书馆	现译为《见闻杂 记》原著34篇， 林译10篇
4	《大食故宫余载》 The Alhambra	华盛顿·欧文	魏易	1832年	1907年6月	美	商务印书馆	现译为《阿尔罕 伯拉》

序号	书名	作者	口译者	原著出版	译著出版	国别	出版情况	备注
5	《旅行异述》 Tales of a Traveller	华盛顿·欧文	魏易	1824年	1907年6月	美	商务印书馆	
6	《薄倖郎》 The Changed Brides	4. 锁司倭司女士 Emma South Worth (1819—1899)	陈家麟	1869年	1911年1—12月	美	《小说月报》第2卷,第1—12号	现译作索思沃丝,林误译其为英国人
7	《以德报怨》 The Bride of Leewellyn	锁司倭司女士	毛文钟	1864年	1922年1月	美	商务印书馆	
8	《秋灯谈屑》 Thirty More Famous Stories Retold	5. 包鲁乌因 James Baldwin (1841—1925)	陈家麟	1905年	1916年4月	美	商务印书馆	现译为鲍德温,另有译本《泰西三十轶事》
9	《橄榄仙》	6. 巴苏瑾	陈家麟		1916年11月	美	商务印书馆	
10	《焦头烂额》	7. 尼可拉司 Nicholas Carter	陈家麟		1919年1—10月	美	《小说月报》第10卷,1—10号	现译作尼古拉斯·卡特,是5个作家共用的一个笔名
11	《莲心藕缕缘》 When Knighthood Was in Flower	8. 卡扣登 Edwin Caskoden (1836—1913)	陈家麟	1898年	1919年8月	美	商务印书馆	原作者又署名 Charles Major, 译为查理·梅杰

序号	书名	作者	口译者	原著出版	译著出版	国别	出版情况	备注
12	《还珠艳史》	9. 堪伯路	陈家麟		1920年2月	美	商务印书馆	
13	《想夫怜》①	10. 克雷夫人 Bertha M. Clay (1836—1884)	毛文钟		1920年9— 12月	美	《小说月报》第11卷,第9—12号	现译为克莱夫人
14	《僵桃记》②	克雷夫人	毛文钟		1921年5月	美	商务印书馆	
15	《情翳》	11. 鲁兰司	毛文钟		1922年5月	美	商务印书馆	
16	《情天外恨录》	12. 克林登女士	毛文钟		1923年1—4 月	美	《小说世界》周刊第1卷,第1—3,5—7,9,11,13期;第2卷,第1,3期	
17	《善良的骗子》 The Gentle Crafter	13. 亨利 O. Henry (1862—1910)		1904年	1925年1—3 月	美	《小说月报》周刊第9卷,第1—13号	林译译其为英国人

序号	书名	作者	口译者	原著出版	译著出版	国别	出版情况	备注
1	《罗刹因果录》 ^①	1. 托尔斯泰 (1828—1910)	陈家麟		1914年7— 12月	俄	《东方杂志》第11 卷,第1—6号	
2	《社会声影录》 A Morning of A Landed Pro- prietor ^②	托尔斯泰	陈家麟		1917年5月	俄	商务印书馆	
3	《路西恩》 Lucerne ^③	托尔斯泰	陈家麟	1857年	1917年5月	俄	《小说月报》第8 卷,第5号	现译为《琉森》
4	《人鬼关头》 The Death of Ivan Ilyitch ^④	托尔斯泰	陈家麟	1886年	1917年7— 10月	俄	《小说月报》第8 卷,第7—10号	现译为《伊凡·伊 里奇之死》
5	《恨缕情丝》 ^⑤	托尔斯泰	陈家麟		1918年1— 11月	俄	《小说月报》第9 卷,第1—11号	
6	《现身说法》 Childhood, Boyhood, Youth ^⑥	托尔斯泰	陈家麟	1852年 1854年 1857年	1918年11月	俄	商务印书馆	现译为《幼年、少 年、青年》
7	《球房纪事》 Memories of A Marker ^⑦	托尔斯泰	陈家麟	1855年	1920年4月	俄	《小说月报》第11 卷,第3号	

序号	书名	作者	口译者	原著出版	译著出版	国别	出版情况	备注
8	《乐师雅路自忒遗事》 Albert ^⑧	托尔斯泰	陈家麟	1857年	1920年4月	俄	《小说月报》第11卷,第4号	
9	《高加索之囚》 A Prisoner of the Caucasus ^⑨	托尔斯泰	陈家麟	1872年	1920年5月	俄	《小说月报》第11卷,第5号	
10	《三种死法》 Three Deaths ^⑩	托尔斯泰	陈家麟	1858年	1924年1月	俄	《小说月报》周刊,第5卷,第1期	
11	《俄宫秘史》	2. 丹考夫	陈家麟		1921年5月	俄	商务印书馆	据法国魁特的英译本口译
	《伊索寓言》	伊索 Aesop	严培南 严璩		1903年5月	希腊	商务印书馆	
	《民种学》 Volkerkunde	哈伯兰 Michael Haberlandt (1860—1940)	魏易	1898年	1903年5月	德	京师大学堂官书魏易据英译本《Ethology》口述	

序号	书名	作者	口译者	原著出版	译著出版	国别	出版情况	备注
	《不如归》	德富健次郎 (1868—1927)	魏易	1900年	1908年10月	日	商务印书馆	魏易据英译本 《Nami-ko》口述
	《孝友镜》 De arme edelman	恩海贡斯翁士 Hendrick Conscience (1812—1883)	王庆通	1851年	1918年8月	比利时	商务印书馆	现译作贡西昂 斯,王庆通似据 法译本转译
	《颠巢记》又《续编》 Der Schweizerische Robinson	大卫威司 Johann David Wyss (1743—1818)	陈家麟	1813年	1919年1— 12月	瑞士	《学生杂志》第6 卷,第1—12期, 1920年6月商务 印书馆同时出版 前编、续编	疑陈家麟据英译 本转译英译名 《Swiss Family Robinson》
	《梅孽》 Gengangere	伊卜森 Henrik Ibsen (1828—1906)	毛文钟	1881年	1921年11 月	挪威	商务印书馆	现译作易卜生 《群鬼》,疑毛文 钟据英译本转译
	《魔侠传》 Don Quixote de la Mancha I	西万提斯 Miguel de Cervantes Seavedra (1547—1616)	陈家麟	1605年	1922年2月	西班牙	商务印书馆	陈家麟似据英译 本转译,现译作 塞万提斯《堂吉 诃德》

佚名作品 5 种：

1. 《英女士意色儿离鸾小记》
2. 《巴黎四义人录》
3. 《土耳其乱事始末》
4. 《冰洋鬼啸》
5. 《十万元》

未刊作品 18 种：

1. 菲尔丁〔英〕《洞冥续记》
2. 斐尔格女士〔英〕《情桥恨水录》
3. 哈格德〔英〕《复马城炸鬼》
4. 哈格德〔英〕书名未定
5. 奥克西〔英?〕《眇郎喋血记》
6. 克莱夫人〔美〕《孝女履霜记》
7. 克莱夫人〔美〕《黄金铸美录》
8. 克莱夫人〔美〕《金缕衣》
9. 克莱夫人〔美〕《凤藻皇后小记》
10. 汤沐林森〔美〕《雨血风毛录》
11. 惠而东夫人〔美〕《神寓》
12. 大仲马〔法〕《学生风月鉴》
13. 文鲁倭〔法〕《五丁开山记》
14. 洛沙子〔法〕《奴星叙情》
15. 马路亚〔法〕《军步琐语》
16. 托尔斯泰〔俄〕《情幻记》
17. 佚名《欧西通史》
18. 佚名《保种英雄传》

已刊作品中：

英国作家 59 名，作品 100 种。

法国作家 17 名，作品 24 种。

美国作家 13 名，作品 17 种。

俄国作家 2 名，作品 11 种。

希腊作家 1 名，作品 1 种。

德国作家 1 名，作品 1 种。

日本作家1名，作品1种。

比利时作家1名，作品1种。

瑞士作家1名，作品1种。

挪威作家1名，作品1种。

西班牙作家1名，作品1种。

共11国98位作家，159种作品。

注：所列表格书名前序号和作者名前数字号是按国别排序；书名下数字号是每位作者作品数排序，

与林纾合作翻译的口授者共19位：

王寿昌，字子仁，别号晓斋主人，福建闽侯人。毕业于马尾船政学堂，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学习法律。归国后，历任天津洋务局翻译、湖北交涉使、汉阳兵工厂总办。工诗能文，是林纾法文作品口述者，与其合作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

魏易，字冲叔，或聪叔、春叔，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曾与林纾同在京师译书局任职，是林纾英文作品口述者，与之合作翻译《黑奴吁天录》、《孝女耐儿传》、《块肉余生述》、《贼史》、《不如归》、《冰雪因缘》等书。

曾宗巩，字义固，或幼固，福建长乐人。与魏易、林纾同在京师译书局任职，职名“口述”，是林纾友辈中较好的英文作品翻译合作者，口述《海外轩渠录》、《战血余腥记》、《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鲁滨逊漂流记》、《新天方夜谭》等。

毛文钟，字观庆，江苏吴县人。英文作品口述者，与林纾合译《埃及异闻录》、《沙利沙女王小记》、《情天补恨录》、《以德报怨》等书。

严培南，字君潜；严璩，字伯玉。二严均为严复之子，福建侯官人。林纾英文或法文作品翻译的合作者，口述《伊索寓言》。

廖琇崐，福建闽侯人。为林纾口授法国小说《义黑》。

胡朝梁，字梓方，号诗庐，江西铅山人。初治西学，晚而好诗。口述英文作品《云破月来缘》。

魏瀚，字秀渚，福建闽侯人。与林纾合译《保种英雄传》。

除以上几位好友之外，还有几位合作者是林纾的学生，他们是：

陈家麟，字献卿，直隶静海人。为林纾口述英文作品最多，有《现身说法》、《恨缕情丝》、《魔侠传》、《哀吹录》，等等。

王庆骥，字石荪，福建闽侯人。在巴黎久居八载，法语精深而纯熟，对法国文学更为精通。林纾曾称其学识不让乃叔寿昌。与林纾合译法文作品《离恨天》、《鱼雁抉微》。

王庆通，字秀中，福建闽侯人。王寿昌之侄，精通法国文学，口述法文作品《孝友镜》、《金台春梦录》、《蟹莲君主传》等书。

李世中，福建闽侯人。口述法文作品《玉楼花劫》、《爱国二童子传》。

陈器，字献琛，或献丁，福建闽侯人。为林纾口述英文作品《痴郎幻影》。

力树萱，字次东，福建永福人。林纾英文译作《罗刹雌风》、《情窝》等书的口述者。

林驹，字秀璋，福建闽侯人。为林纾口述法文作品《兴登堡成败鉴》。

林凯，字奏丹，福建闽侯人。为林纾口述英文作品《情海疑波》。

叶于沅，字可立，福建闽侯人。口授法国剧本《膜外风光》。

蔡璐，字端如，浙江桐乡人。与林纾合译《欧西通史》。

从这些合作者的情况来看，有几位是从海外留学归来，精通外国语言，但却极少是专习西洋文学的。对于欧美文学的流派、演变及现状都不甚了解，只是凭个人的文学修养水平和喜好，向林纾推荐外国作品，难免有许多平庸之作被选在其中。“因此，由于合作人大都缺乏文学鉴赏的眼光，致使林纾用在翻译上的心血，不得不虚耗了三分之二。假使他们都具有文学鉴赏的眼光，或者对欧美文学比较熟悉，能把一家屡译的减去，代以各家各派

的著作，把毫无价值的作品，代以各大家的名作，那么，林译小说即使意译过甚，成绩也比现在好得多”。^①

林译作品谬误甚多，也与某些口述合作者有关。林纾不懂外文，便无从准确把握原作的精神，完全听凭口译者，加之翻译速度很快和林纾笔译的独特风格，译文谬误，常所不免。他自己坦言：“急就之章，难保不无外谬。近有海内知交投书举鄙人谬误之处见箴，心甚感之。惟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述，即有讹错，均出不知。”^②

无论何种原因，林纾的译作中有许多令世人遗憾之处，然而其译数之巨又让人羡慕不止。在林译作品中，“称得较完美者已有四十余种。在中国，恐怕译了四十余种的世界名著的人，除林先生外，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人。”^③ 在这些译作中，有很多作家的作品是经他首先介绍到中国来的，有些则是世界文坛巨匠之作，这是林纾为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一大贡献。

林纾所介绍的英国作家中，比较著名的有斯宾塞尔（Edmund spenser，今译斯宾塞）、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达孚（Daniel Depore，今译笛福）、斯威佛特（Jonathan Swift，今译斯威夫特）、斐鲁丁（Henry Fielding，今译菲尔丁）、兰姆（Charles Lamb）、司各德（Sir Walter Scott，今译司各特）、迭更斯（Charles Dickens，今译狄更斯）、史蒂文生（R. L. Stevenson，今译斯蒂文森）、威而斯（H. G. Wells，今译威尔斯）等。

斯宾塞尔是与莎士比亚同时的英国著名诗人，有“诗人的诗人”之称。《荒唐言》（The Faerie Queene）是其代表作，在英国文学史上是有数的巨作之一。原著是长篇寓言诗。林纾在翻译时，采用散文小说体，使原诗的精神面貌消失殆尽。

① 曾锦璋：《林译的原本》，《林纾研究资料》，第324页。

② 林纾：《西伯利亚郡主别传·序》

③ 郑振铎：《林琴南先生》，《林纾研究资料》，第161页。

莎士比亚这位驰名世界的大文豪，其作品多是诗剧形式，如林纾所译的《凯彻遗事》(Julius Caesar)、《雷差得纪》(Richard II)、《亨利第四纪》(Henry IV)、《亨利第六纪》(Henry VI)等。林纾在翻译这些诗剧时，也采用散文小说形式，使莎翁巨作的原貌以及文学价值大打折扣。尽管如此，这两位16世纪英国著名诗人，是通过林纾的介绍得以首次走进中国读者的视线。

达孚的不朽之作《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由林纾翻译介绍到中国，流传已近一个世纪，至今仍是孩子们最喜爱的读物之一。达孚采用写实的手法，把主人公鲁滨逊独自一人在荒岛上，运用智慧和勇敢在大自然中搏斗的故事逼真、细致地刻画出来。林纾的翻译，也使读者犹如身临其境，过目难忘。

斯威佛特的《海外轩渠录》(Gulliver's Travels)是英国18世纪四大小说之一，在世界文坛上也被推崇备至，有几十种语言的译本。它是一部杰出的讽刺小说，全书共分四部分，通过书中主人公的奇遇，揭示了18世纪初英国统治阶层的腐败，嘲讽了人们的一般弱点。林纾所译，是这部分小说的前两部分。

18世纪的英国文坛正是戏剧衰落、小说新兴的过渡时期，斐鲁丁便是其代表人物，他既是剧作家，又是小说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小说用嘲笑与事实来暴露罪恶，以唤起人们从资本主义那个堕落时代的虚伪与罪恶中觉醒，深深地影响了英国小说百多年的发展，《洞冥记》(A Journey from This world to The Next)是林纾所译其作品之一。

司各德是19世纪初期的英国小说家。他始创历史小说，善用方言对话将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在欧洲甚为流行，法国许多著名作家都深受其作品影响。他的音乐、绘画也与文学齐名。林纾翻译了他的小说三种：《撒克逊劫后英雄略》(Ivanhoe)、《剑底鸳鸯》(The Betrothed)和《十字军英雄》(The Talisman)，而《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是中国最受欢迎的流行小说之一。

迭更斯是中国人熟知的英国文坛的一颗巨星，他因亲身经

历，而用温和的讽刺与滑稽，使伦敦的贫民窟和小市民悲惨的命运跃然纸上。林纾所译的《贼史》（*Oliver Twist*）、《滑稽外史》（*Nicholas Nickleby*）、《孝女耐儿传》（*The old Curiosity shop*）、《冰雪因缘》（*Domby and son*）和《块肉余生述》（*David Copperfield*）在中国几代人中流传不息，对世界文坛也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史蒂文生是19世纪后期的英国小说家，是文艺创作回复浪漫主义倾向的代表。他的作品形式有多种，兼有趣味性和艺术性，深得当时一些二流作家的追崇。林纾所译介的《新天方夜谈》（*The New Arabian Nights*）只是他一般的作品之一。

威而斯是受近代科学影响的小说家，他最有代表性的是科幻小说，林纾翻译了他的《鬼悟》一部。

这些作家中有不少是英国的一流作家，遗憾的是他们中有些成名之作并没有被林纾译介过来。除此之外，林纾也还翻译介绍了一些英国的二流作家的作品，如哈葛德（*H. R. Haggard*）、柯南达利（*Conan Doyle*）、杨支（*Charlotte M. Yonge*）、贺迫（*Anthony Hope*）、克拉克（*Mrs Craik*）、毛利森（*Arthur Morrison*）和麦里曼（*Henry Seton Merriman*）等。

林纾介绍的美国作家中，较为重要的有先驱者欧文（*Washington Irving*）以及南北战争时期的斯土活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

欧文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家，其散文笔调流畅，风格高雅。林纾翻译了他的三种作品，《拊掌录》（*The Sketch Book*）、《旅行述异》（*Tales of a Travellers*）和《大食故宫余载》（*The Alhambra*）。《拊掌录》是一本文集，也有的译为《见闻杂记》或《见闻札记》，里面有短篇小说，人物素描、随笔和游记、读书心得和生活体验以及童年的回忆，其中《李迫大梦》（*Rip Van Winkle*）和《睡洞》（*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是深受人们喜爱的两个短篇。

斯土活夫人的《黑奴吁天录》是一部描写美国农场主虐待黑

奴的小说，意在揭露奴隶制度的罪恶。林纾深深地被小说所感动，一面翻译，一面流泪，仅用66天便译完，出版以后，获得巨大反响，激发了各界的爱国热情。20世纪初，我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将小说改编成剧本公演，获得成功。直到60年代，北京上演的话剧《黑奴恨》就是以该小说为原本的。

法国作家中，林纾介绍了仲马父子。他最早翻译了小仲马(Alexandre Dumas fils)的《茶花女遗事》，后又译介了大仲马(Alexandre Dumas pere)的《玉楼花劫》(Le Chevalier de Maison-rouge)、《蟹莲郡主传》(La Comtesse de Charny)以及小仲马的《香钩情眼》(Antonine)等。大仲马原以戏剧享有盛名，后改写小说，而小仲马先是写小说，不久转搞戏剧，且多以社会问题为题材，采用写实手法。作品受人瞩目。《茶花女遗事》就由于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道德造成的一场爱情悲剧，揭露了法国的上层社会而一举成为其成名作和代表作。

雷俄(Victor Hugo，现译为雨果)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健将，他在诗歌、戏剧、小说方面都获得很大成就。其在法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代表作品有《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 de Paris)、《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和《九十三》(Quatre-vingt-treize)。林纾只翻译他的《九十三》，即《双雄义死录》。

巴鲁萨(Honore de Balzac，现译为巴尔扎克)是法国写实主义大师，其小说以当时社会生活及人物各种类型为题材，包罗极广，长、中、短篇多种，林纾仅译介了其一部短篇小说集《哀吹录》，收有短篇小说《猎者斐里朴》(Adieu)、《耶稣显灵》(Jesus christ en Flandre)、《红楼冤狱》(L'Auberge Rouge)和《上将夫人》(Le requisitionnaire)四篇。

林纾还翻译了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鱼雁抉微》(Lettres Persanes)和森彼得(Bernardin de Saint-Pierre)的《离恨天》(Paul et virginie)，这是两位作家较著名的作品之一。前者是假托波斯人的通讯，讥讽当时的社会风俗，其内容正迎合了当时正在

进行的旧的社会制度的改革运动。后者是一个纯洁的爱情故事，一时轰动大革命前后的法国文坛。

俄国作家，林纾介绍了世界文坛巨匠托尔斯泰（Leo Tolstoy）的《现身说法》（Childhood, Boyhood and Youth）、《人鬼关头》（The Death of Ivan Ilyich）、《高加索之囚》（A Prisoner of the Caucasus）《社会声影录》（Russian Proprietor and Other Stories）和《恨缕情丝》等 10 种作品，但对其流传百世的名作《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安那一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和《复活》（Resurrection）等，林纾却没有翻译。

除英、美、法、俄几国著名作家之外。林纾还翻译介绍了日本德富健次郎的《不如归》，西班牙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的《魔侠传》（Don Quixote，即《唐·吉珂德》）、瑞士威斯（I·R·Wyss）的《颤巢记》（The Swiss Family Robinson）、挪威伊卜森（Ibsen）的《梅孽》（Ghosts）和希腊的《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

这些作家和作品在其国内尽人皆知，有些在欧洲文坛也已名声显赫，林纾的翻译，使近代中国对于世界文坛的流派风格以及众多名家有了初步的了解。

3. 林译的价值

林纾口述中译的译书方法和他数以百计的译著，无论对我国的翻译或是文学发展史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如果从文化交流角度来看，林译也仍不失其价值。

第一，首开全面介绍西洋文学之端。伴随洋务运动的需要，中国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大量介绍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当时的三大译介机构，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附设译书馆和上海广学会在这方面有着较为突出的贡献。甲午战后，严复以其精通的外语和对西方社会深刻的体察，先后向国人翻译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哲学等名著，一种全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被介

绍过来，中国人第一次比较深刻地了解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林纾的第一部译著《巴黎茶花女遗事》开始了全面介绍西洋文学的历史。此后，大量的西洋小说被译出，西方文学作品风行民初文坛，国人对此津津乐道，对西方社会生活和文学艺术有了了解。可以说，华蘅芳译《代数术》、严复译《天演论》、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代表着近代以来的一个全面翻译、介绍西学的文化潮流。

第二，开始了从社会学的角度认识西方社会。中国人对西方社会的最初认识是从人种学意义上的差异开始的，比如说西方人“隆鼻赤发，面粉眼绿”，“身長高鼻，猫眼鹰嘴”，“足长二寸，颧伟倍长”，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那时，中国人的心目中，西方社会只有坏人心术的奇技淫巧，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东西。鸦片战争后，在师夷制夷的过程中，中国人对西方社会的认识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把着眼点和注意力从人种学的差异转向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然而，对于西方世界的“国民性及社会组织也不十分明了……对于他们的社会内部的情形也是如此，总以为‘他们’与‘我们’是什么都不相同的，‘中’与‘西’之间，是有一道深沟相隔的。到了林先生辛勤的继续的介绍了一百五十余部的欧美小说进来，于是一部分的知识阶级，才知道‘他们’原与‘我们’是同样的‘人’，同时，并了然的明白了他们的家庭的情形，他们的社会的内部情形，以及他们的国民性。且明白了‘中’与‘西’原不是两个截然相异的名词。这是林先生大功绩与影响之一”。^①

第三，开始了对西方文学的新认识。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屡次败于欧美，中国人最直接的反映是器物不如人。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挑战，第一个积极的回应便是大张旗鼓地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声光化电，这就为西方自然科学的引进、运用和发展提

^① 郑振铎：《林琴南先生》，《林纾研究资料》，第162—163页。

供了条件。然而，文化一经交流，便会按照其自身的规律运行发展，物质的引进必然带来制度的、文化的交流。人们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深深感悟到，中国的落后不止在于物质文明的落后，只学人技艺犹如只习皮毛，不务根本。西方除了物质文明先进，其社会政治制度也有许多可学之处，于是“君主立宪”、“议会政治”等沸扬模仿起来。“然而大多数的知识阶级，在这个时候，还以为中国的不及人处，不过是腐败的政治组织而已，至于中国文学却是世界上最高的最美丽的，绝没有什么西洋的作品，可以及得我们的太史公，李白，杜甫的；到了林先生介绍了不少的西洋文学作品进来，且以为史各德的文字不下于太史公，于是大家才知道欧美亦有所谓文学，亦有可谓与我国的太史公相比肩的作家。这也是林先生的功绩与影响之一”。^① 林纾自己也曾感叹：“西人文体，何乃甚类我史迁也。”^②

第四，改变了小说在传统文学观念中的地位。晚清以前，中国的小说一向被认为是市井人的读物，属“小道”、“末技”，不登大雅之堂，不入著作之林。“林先生则完全打破了这个传统的见解。他以一个‘古文家’动手去译欧洲小说，且称他们的小说家为可以与太史公比肩，这确是很有勇敢的很大胆的举动。自他之后，中国文人，才有以小说家自命的；自他之后才开始了翻译世界的文学作品的风气。中国近二十年译作小说者之多，差不多可以说大多是受林先生的感化与影响的”。^③ 随着林译小说的不断完成出版，小说的地位与作用也得到充分认可。人们得知，小说体裁在外国文学中是一种主要的类型，其内容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联，从而一改“中土小说，虽列之九流，然自虞初以来，佳制益鲜，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红楼》，综其大较，

① 郑振铎：《林琴南先生》，载《林纾研究资料》第163页。

② 林纾：《斐洲烟水愁城录》序。

③ 同①。

不出海盗海淫两端”。^① 学外国用小说反映现实，推动社会进步，带来新道德、新政治、新风俗，新人心、新人格、新一国之民，“小说的旧体裁，由林先生而打破，欧洲作家史各德、狄更斯、华盛顿、欧文、大仲马、小仲马诸人的姓名也因林先生始而为中国人所认识。这可说，是林先生的最大功绩”。^②

第五，对中国文坛产生了久远的影响。林译小说出版后，由于上述原因，在文坛反响热烈，中国文坛作家无不受其影响。“对于鲁迅有很大的影响的第三个人，不得不举出林琴南来了。鲁迅还在南京学堂的时候，林琴南已经用了冷红生的笔名，译出了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很有名，鲁迅买了这书……《茶花女》固然也译得不差，但是使得我们佩服的，其实还是那部司各得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原本既是名著，译文相当用力，而且说撒克逊遗氏和诺曼人对抗的情形，那时看了含有暗示的意味，所以特别的被看重了……我们对于林译小说那么热心，只要他印出一部来，到东京，便一定跑到神田的中国书林去把它买来，看过之后，鲁迅还拿到订书店去改装硬纸板封面，背脊用的是青灰洋布”。^③

郭沫若诗中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有些也来自林译小说的影响。他曾回忆说：“林译小说对于我后来的文学倾向上有决定影响的是 scott 的《Ivanhoe》（《艾凡赫》），他译成《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这书我后来读过英文，他的误译和省略处虽很不少，但那种浪漫主义的精神他是具体地提示给我了。我受 scott 的影响很深，这差不多是我的一个秘密。我的朋友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④

①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

② 郑振铎：《林琴南先生》，载《林纾研究资料》。

③ 周启明：《鲁迅与清末文坛》，载《林纾研究资料》，第 239 页。

④ 郭沫若：《我的童年》，载人民文学出版社《少年时代》1979 年版。

周作人也称是林译小说“引我到西洋文学里去了”，“他介绍外国文学，虽然用了班、马的古文，其努力与成绩绝不在任何人之下……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我个人还曾经很模仿过他的译文”。^①

后来的一些文学家如茅盾、郑振铎、朱自清、钱钟书、冰心等都是林译作品的热情读者。钱钟书先生说：“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他对若于读者也一定有过歌德所说的‘媒’的影响，引导他们去跟原作发生直接关系。我自己就是读了他的翻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里哈葛德，欧文、司各特、迭更斯的作品津津有味地阅览。”^②

林纾的名气引来国内外许多人慕名想拜他为师，众多的不曾谋面的文学爱好者，在林译的引领下走上了文学之路。苏雪林在《林琴南》一文中就说：“当林琴南先生在世时，我从不曾当面领过他的教，不曾写过一封问候他起居的信，他的道貌虽曾瞻过一次，也只好像古人所说的‘半面之识’……不过，在文字上我和琴南先生的关系却很深。读他的作品我因之而了解文义，而能提笔写文章，他是我15年前最佩服的一个文士，又是我最初的国文导师。”^③

林纾的翻译小说对五四时期大批文学作家的影响，直接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实为中国新文学的不祧之祖。

① 周作人：《林琴南与罗振玉》，《语丝》周刊第3期，1924年12月。

②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载《林纾研究资料》等296页。

③ 苏雪林：《林琴南》，载《文人画像》，第1页，三联书店1996年1月版。

五、汉学西传的先驱辜鸿铭

1. 文化怪杰

清末民初，有一位以怪诞见称，名满海内外的文化怪杰，他就是辜鸿铭先生。辜鸿铭（1856—1928年）身材高挑，脸庞清瘦，鼻梁高耸，大而深蓝的眼睛，花白的长须使他更像一个宿儒。那条彩色的、灰黑泛黄夹用红丝线编就起来的长辫子招人眼目地挂在脑后，一顶油光可鉴的平顶红结瓜皮小帽，一袭油光闪亮的枣红宁绸长袍，外罩一件樟缎大袖马褂，或天青大袖马褂，袖子上而斑斑点点，尽是鼻涕和唾液的痕迹，一身光亮，闪烁照人。脚下常是一双双梁平底布鞋。在幽雅的北大校园里，常见他神采奕奕，大摇大摆地上汉花园北大文学院的红楼，泰然自若地登台授课，颇是北大一景。他的车夫同样一条发辫，拖在脑后，拉着辜鸿铭大街小巷，招摇过市。两条辫子相映成趣，在剪辫洪流已过的北京街头，又为一景。人们不禁连称：怪哉！怪哉！而他却不以为怪。

1920年，“辫帅”张勋67大寿，辜鸿铭特意挥毫赠送寿联：“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半自鸣得意地问胡适，是否理解其意。胡适道：“‘傲霜枝’自然是你们两位的辫子啦，‘擎雨盖’……？”辜氏答道：“自然是满清的官帽顶戴啦。”

1921年，英国大文豪毛姆专程拜访辜鸿铭，交谈中，他突然神气十足地拿起小辫子，丝毫没有了当年被围骂“支那人的猪尾巴”那种尴尬，对毛姆自豪地说：我留的发辫，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末了一个代表。

在日本讲学期间，一些好奇的人若问起辜鸿铭的发辫，他会摇头晃脑地告之：这是我的护照。

辜鸿铭身上的怪太多了，就其经历，他自称：“生在南洋，

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辜鸿铭出生在一个东西合璧的家庭里，这个小家位于马来半岛西北侧的海岛——槟榔屿上，曾祖父和祖父都在岛上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地方政府中供职，地位显赫，薪金丰厚。他的父亲虽然没有继续这一职业，却任英国人布朗先生的尼蒙橡胶园总管。由于辜氏家族的血脉中蕴含着中国人特有的机敏、开拓、忠诚、勤恳的品格，他以自己的真实才干深得布朗夫妇的信任，友谊甚深，辜鸿铭便成为膝下无嗣的布朗夫妇的义子。

辜鸿铭的母亲是一位葡萄牙人，金发碧眼，一口流利的葡萄牙语、英语，有着良好的教养和学识。她常常给辜鸿铭描述西方的一切，解答他充满好奇的一连串问题。

少年时代的辜鸿铭，常听父亲讲起古老的有着千年悠久文化历史的祖国，“我们的祖国在遥远的地方，不论我们身在何处，千万别忘了那里是我们祖先的家园”。在这个被英国殖民主义者统治的小岛上，一座完全中国式的寺院就是祖国的象征，她庄严、博大、精深，祖国是多么的遥远。从那时起，东方的神秘、西洋的富丽都深深地留在了辜鸿铭的心里。

1867年，布朗夫妇将产业托给辜鸿铭的父亲照管，带着年方10岁、天资聪颖的辜鸿铭启程返回英国。临行前，父亲庄重地在祖先牌位前告诫辜鸿铭：“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并且要求他不可信耶稣教，不可剪辫子。也许少年辜鸿铭并不真正理解这番教诲的深刻含义，但是留辫子的中国人与祖国的联系却那么直接，这在他的心灵上是深刻的。日后，在辜鸿铭身上体现出的东西方文化碰撞是从这时就注定了的。

当辜鸿铭踏上大英帝国时，立即感受到了它的繁荣昌盛。那里工厂林立，楼房高耸，汽车奔驰，货物充足……辜鸿铭随布朗夫妇居住的苏格兰故都爱丁堡，被称为“欧洲最美丽的花园”，坐落在丘陵环绕之中，中心是一座有城堡的山岩，周围的山岗分

布着点点湖沼，各式各样的建筑依山岗而起伏，自然与人工合成的美妙景象，幽雅宜人。这里孕育了世界著名的哲学家休谟、小说家司各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小说家柯南道尔……对于这一切，辜鸿铭钦慕不已。

布朗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极有修养的正直英国老人。他安排义子先学文学和语言，再学科学知识，然后赴德国学习科学，到法国学习优雅的法语和世故人情。布朗先生是辜鸿铭西学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在他的指导下，辜鸿铭认真刻苦地读完了弥尔顿的《失乐园》、莎士比亚的戏剧、歌德的《浮士德》、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等等。直到他能够运用自己的思想、语言去谈感受、去分析，布朗先生才露出满意的笑容，安排他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并注意培养他实际动手的能力。

几年之后，辜鸿铭以他深厚的功底考取了爱丁堡大学文学院。这座著名的学府以浓厚的思索之风为传统，辜鸿铭在这欧洲文化的殿堂中，尽情地吸纳着西洋文明的精华。1877年，辜鸿铭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奋，以优异成绩通过了拉丁和希腊两门古语、数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和修辞学等众多科目的学习考试，获得文学硕士，这一年辜鸿铭刚刚21岁。带着丰厚的学习成果，年轻的辜鸿铭满怀激情来到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土木工程专业。由于他精通语言，基础扎实和勤奋刻苦，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获得土木工程师的文凭。在德国，他得以深入了解社会状况，潜心研读德国的文学、哲学典籍，成为他后来在德国学界产生巨大影响的基础。

十多年的苦读后，辜鸿铭已是文史哲颇具造诣，语言功夫非同凡响，自然科学功底丰厚。但是这些并不能抚平他那受过伤害的心灵，每当他拖着那条长辫走在街头时，周围人投来鄙夷的目光，一群小孩像是围看奇异之物，尾随在后叫喊着：“支那人的猪尾巴！支那人的猪尾巴！”他那做人的民族自尊受到强烈的羞辱，以至于他这一生都没有忘记：他们看不起我们！

莱比锡大学学业完成后，辜鸿铭按照布朗先生的计划和安排，到达了灯红酒绿、豪华入时的世界大都市巴黎。在这里，他看到了巴黎的繁华，也透过各个阶层看到了繁华背后的阴暗。他学会了优雅的法语，练就了一副伶牙俐齿，也练就一双犀利的眼睛，看透西方社会的本质。而最大的收获是巴黎大学老教授的见解：中国的《易经》是世界最有价值的经典，与日月星辰同在，无与伦比。

1878年，辜鸿铭结束了在西洋的学习回到槟榔屿，被英国殖民政府委以公职，派往新加坡。以他的一身本领和精通的西学，公职事务轻而易举，每天过得轻松自在。然而他的脑子里总是闪现出那鄙夷的目光、厌恶的喊叫和老教授的教诲。在新加坡，他遇到精通西学、又有深厚国学功底的马建忠，一席交谈之后，辜鸿铭被马建忠那不凡的气宇、肃穆的神态及对中国文化的精辟见解所震撼。“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仿佛是一股强大的吸引力，终于使他放弃了优越的生活、供职条件，回到了魂牵梦绕的祖国。

1885年，辜鸿铭应聘入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府任职，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在这二十多年中，他完成了自己的婚姻大事，娶了一位小足、柳腰、细眉、文静、贤良、坐不动膝、立不摇裙、笑不露齿、怒不伤人的中国标准的大家闺秀，凭着自己的亲身感受，完成了对女子小足的怪论，并作有得意的金莲诗：

春云重裹避金灯，自缚如蚕感不胜。

只为琼钩郎喜瘦，几翻缣约小于菱。

他还了却了自己一向主张的纳妾心愿，娶了日本女子吉田贞子做东洋太太，两位太太犹如大乔小乔侍奉左右，辜鸿铭喜不待言，称之为兴奋剂和安眠药日夜陪伴，使其一生多有建树。他还阐发了一套“纳妾并非不道德”的怪论，称纳妾是中国妇女无私奉献的体现，妇人为丈夫而活，也要为丈夫而牺牲奉献。男人的牺牲，则是为妇人或所有他带进家的女人，连同为他所生的孩子

们提供一切生活保障。这种纳妾制既可以使正室在家庭中高居首领的宝座，又可使男人不到外面去拈花惹草，滥施恋爱。纳妾制是中国社会祥和、家庭保全幸福的压底绝技，是中国文化中妇人的“无我之教”（Religion of Selflessness）和男人的“忠诚之教”（Religion of Loyalty）的体现。

辜鸿铭还有一怪，让人难以理解，即是从一个精通西学者一变而为中华文化的完全保守主义者。回国以后，他怀着虔诚、崇敬的心情完成了对中国文化的补习，随着对儒家传统文化的日益了解，他越来越被中华传统文化那广博深厚的内涵所折服。他把文明理解为完全精神的，所以他宣称中国的文明最优越。他说：西方国家的物质发达并不代表文明的发达，而中国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他不仅首先公认一种道德责任感，将它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而且还使人们能够完满地获得这种道德责任感。在中国，教育方式、统治方式和所有的社会制度都为这一目标服务，即致力于培养人们具有道德责任感；所有的风气、个人生活的追求等无不被鼓励和设计以服务于使人们容易服从这种道德责任感。因此，中国文明是较高层次的或是博大的、成熟的、基础牢固的文明，而西方的文明仅仅是初建未成形的，基础并不牢靠的文明。

他认定，中国的儒教最高超。首先从起源看，中国的儒教是由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丰富学识和修养的孔子所创，他是真正中国人的代表，是完美无瑕的人性楷模。他赢得的崇拜，完全出自信徒的平静而理智的信仰。西方宗教则不然，创始人都是超凡脱俗的“神”，他们所讲述的都是平民百姓喜闻乐见、朴素明了、可望而不可求的理想，以此唤起大众的迷信。其次，从内容上看，由于创始人的境界的差别，儒教启迪人们积极人世、善待人生，而西方宗教则把美好的理想放到未来的天国世界。

他称道“真正的中国人”之美妙，即中华民族的精神：善良，温文尔雅。他说：“在真正的中国人性类型中，你能发现一

种温和平静、庄重老成的神态，正好像你在一块冶炼适度的金属品中所能看到的那样。尽管真正的中国人物质和精神上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其不足都受到了温良之性的削弱和补救。真正的中国人或不免于粗鲁，但不致于粗俗下流；或不免于难看，但不致于丑陋骇人；或不免于粗率鄙陋，但不致于放肆狂妄；或不免于迟钝，但不致于愚蠢可笑；或不免于圆滑乖巧，但不致于邪恶害人。实际上，我想要说的是，就其身心品行的缺点和瑕疵而言，真正的中国人没有使你感到厌恶的东西。在中国旧式学校里，你很难找到一个完全令人讨厌的人，即使在社会最下层亦然。”^①

辜鸿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醉心痴迷到了顽固、保守的程度。时至清末民初，中西文化交融，一些早为世人目之的陋习，诸如小脚、纳妾、太监、廷杖、八股等，仍被辜鸿铭视为中国“独有的宝贝”，大加辩护。甚至对“随地吐痰”也冠以中国人注重精神、不重外表的体现。

辜鸿铭身上的诸多怪诞，使我们想到，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只不过因其自身的特征，使这一文化现象又呈现出其独特性。辜鸿铭赴欧留学多年，西学知识丰厚，而长于浪漫主义文学。特别是英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Kallell, 1795—1881年)一生著作等身，对资本主义世界作了大量的批评，以一个刻薄的批评现代化的学者知名于世。美国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爱默生对中国儒家文化由衷赞赏。这些都对辜鸿铭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他以一个深受鄙视、备受压抑的外国人的冷静眼光，透彻地看到物质文明发达的西方各国的阴暗。而他所学的浪漫主义文学的最根本的价值取向，是与西方近代文明背道而驰的思想道德文化。在他饱读中国儒家文化经典以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自然成为他批判的武器，这样他就

^① 转引自黄兴涛：《闲话辜鸿铭》，第133页，海南出版社1997年5月版。

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以中国文化去淋漓尽致地抨击西方文化的弊端。只是其放荡不羁的性格使他妙语连珠，幽默中带着刻薄和偏激、保守，这也是那曾经被洋人侮辱过的中国人的自尊心使然。

早在 20 年代，德国著名教授奈尔逊（Nilson）对辜鸿铭就有这样的评价：“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极不平常的现象，一个远远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现象，即，这个人他广泛地集西方文化于一身并加以消化吸收；这个人他熟悉歌德就像一名德国人，熟悉卡莱尔、爱默生和别的盎格鲁—撒克逊作家就像一名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个人他通晓圣经就像一位最好的基督徒，然而他的独立的明确的精神却拥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他不仅自己保持其固有的特征，而且他还认识到这一点对东方人民的自我保存也是非常必要的，即踏实地立足于自身古老的文化土地，而绝不削足适履地生搬完全是另外一种社会状况的西方文化，这对于东方居民的自我生存是极为必要的。”^①且不论奈尔逊教授概括得是否严谨，至少说明辜鸿铭身上的文化现象早已为中外所关注。

2. 汉学西传的先驱

20 世纪初年，辜鸿铭首以英译儒经《论语》（*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 of Confucius*）问世，完全打破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儒家经典只由外国传教士和西方汉学家翻译介绍的局面，以中国人独立而杰出的翻译加入这一行列，成为儒经英译、汉学西传的先驱。

辜鸿铭堪称外语天才，据说除那位学贯中西的一代大师陈寅恪先生通晓 17 门语言文字外，至今无人能与之相比拟。辜鸿铭除母语汉语和马来语外，还通晓英、德、法、意、日语和拉丁、希腊两门古语，略通俄语。

^① 1920 年版德文本《呐喊》译序。

他的英文最为精湛绝伦，中外许多大家都曾有此评论。精通英文的林语堂先生曾感慨地说：“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用英文写作，他挑战性的观念，目空一切的风格，那种令人想起马太·安诺德的泰然自若及有条有理地展现他的观念和重复申说某些话的风格，再加汤玛斯·喀莱尔（托马斯·卡莱尔）戏剧性的大言及海涅的隽妙。”这些，还是林先生于“少时在约翰大学图书馆，读到辜鸿铭著 *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见其文字犀利，好作惊人语，已深喜其矫健”而留下的深刻印象，更有“英人读之而喜，而惊，而敬，故其名亦大”。^①

一位名叫鄂方智的西方主教，曾声言：辜鸿铭用英文所写的文章，在英国人看来，可以和维多利亚时代任何大文豪的作品相比。而现代西方著名汉学家史华兹·艾恺则认为，辜鸿铭的散文优美；他的拉丁文、希腊文、德、法、意语颇具造诣，英文更是无懈可击。

辜鸿铭文风如人，诙谐幽默，运用其娴熟英文维妙维肖地表述自己的思想。他因厌恶西方民主，便把 *democracy*（民主）写成“*demo-crazy*”，“*crazy*”疯狂之意，意为“民主”即“民狂”。当几位同行的外国人问其中国卖淫妇何以众多？辜鸿铭当即对曰：*Prostitute Destitute*（卖淫者，卖穷也）。答之得体，寓意深刻。凡是读过辜鸿铭英文著作或与之交谈的人都有同感：其英文具有维多利亚风格，典雅、风趣、流畅而美妙。

辜鸿铭精通外语是他翻译儒经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是他翻译儒经的重要因素。他不满洋汉学家在翻译中既牵强生硬，又误译甚多的文字；更不满西方所谓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经典一知半解便以“宿儒”自居，自吹自擂；只得一鳞半爪便以为把握精华。从

^① 林语堂：《辜鸿铭》，载《中国文化名人画名家》，第3页。

德庇时 (Davis, 1795—1890 年)、^① 郭实腊到波迪埃、梅辉立 (Mayers, 1831—1878 年)、^② 伟烈亚力、卫三畏、巴尔福 (Balfour, 1846—1909 年)、^③ 以至对西方汉学发展做过重要贡献的威妥玛、理雅各, 他都敢于小觑。在英译《论语》序中, 他直言: “自从理雅各博士开始发表关于‘中国经典’翻译的最初部分, 迄今已 40 年了。现在, 任何人, 哪怕是对中国语言一窍不通的人, 只要反复耐心地翻阅理雅各博士的论文, 都将禁不住感到它多么令人不满意。因为理雅各博士开始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 他的文学训练还很不足, 完全缺乏评判能力和文学感知力。他自始至终都表明他只不过是个大汉学家, 也就是说, 只是一个对中国经书具有死知识的博学的权威而已。……必须指出, 尽管他的工作尽了力所能及的努力, 是完全严谨的, 但他却没能克服其极其僵硬和狭隘的头脑之限制, 这是他的性情气质造成的结果。”他

① 德庇时, 英国外交官, 汉学家。著有: 《中国诗歌论》(Poeseos Sinensis Com-montarii, On the Poetry of Chinese) (1829); 《中国人: 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The Chines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 (两卷, 1836); 《中国见闻录》(Sketches of china Partly during an Inland Journey of Four Months between Peking, Nanking and Canton with Notices and observations Relative to the Present war) (两卷 1841); 《中国杂记》(Chinese Miscellanies A Conection of Essays and Notes) (1865) 等书。此外还译有几部中国戏剧和小说。

② 梅辉立, 英国外交官, 1859 年来华。梅氏写有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 编著有: 《棉花传入中国记》(Introduction of Cotton into China) (1868); 《中国辞汇》(Chinese Reader's Manual) (1874); 《中国政府名目手册》(The Chinese Government: A Manual of Chinese Titles, Categorically Arranged and Explained) (1878); 《中外条约集》(Treaties between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Foreign Powers) (1877) 等书。与他人合著《中日商埠志》(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A Complete Guide to the open ports of those Countries, together with Peking, Yedo, Hong Kong and Macao) (1867)。

③ 巴尔福, 英国人。1870 年来华经营丝茶, 后从事文学和新闻工作, 先后担任《通闻西报》、《华洋通闻》主笔, 《字林西报》总主笔。写过许多关于中国和日本的文章, 并把《道德经》和《南华经》译成英文。著有: 《远东浪游》(Waifs and Strays from the Far East) (1876); 《中国拾零》(Leaves from My chinese Scrapbook) (1887) 等书。

认为西方汉学家们割裂中国文化，不能把握儒经大义，文字僵硬呆板，难以从深刻的内涵和总体思想上揭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除此之外，辜鸿铭投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从事翻译儒经的文化活动，其根本目的，即展示中国文化的真实及其价值。他以为西方汉学家蹩脚的翻译，歪曲了中华文化，导致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而他有责任和义务向西方社会宣传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优秀文化，以此来沟通中西文化间的相互理解、承认、尊重；劝诫一心效仿西方文明，主张变法维新的志士能恪守儒家思想，弘扬中华文化；希望西方各国以儒家文化来弥补他所认为的，在西方物质发达中所缺少的文明。正如他在英译《论语》和《中庸》序中所希望的那样：“受过教育的有头脑的英国人，但愿在耐心地读过我们这本译书后，能引起对中国人现有成见的反思，不仅修正谬见，而且改变对于中国无论是个人，还是国际交往的态度。”他又说：“我希望说的是，如果这本出自中国古代智慧的小书能有助于欧美人民，尤其是那些正在中国的欧美人更好地理解‘道’，形成一种更明白更深刻的道德责任感，以便能使他们在对待中国和中国人时，抛弃那种欧洲‘枪炮’和‘暴力’文明的精神和态度，而代之以道，无论是以个人的方式，还是作为一个民族同中国人交往的过程中，都遵从道德责任感——那么，我将感到我多年理解和翻译这本书所花费的劳动没有白费。”^①

关于辜鸿铭儒经译著的篇目，莫衷一是。熟识他的金梁认为他尝译《中庸》、《周易》等书；与他论交最久的赵凤昌则认为他译有《论语》、《中庸》、《孝经》和《孟子》；了解他的林语堂在40年代称辜译过《中庸》和《大学》；更多人则笼统地说他译过儒经诸书；近来年轻学者黄兴涛著书认为，辜鸿铭一生完整翻译

^① 《辜鸿铭文集》下，第346页，513页。海南出版社1996年8月版。

儒经三部，即《论语》、《中庸》和《大学》，而正式出版、公开发行的却只有前两部。^①实际上，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就仅是英译《论语》、《中庸》而已。《诗经》、《尚书》、《易经》、《孟子》、《孝经》、《礼记》等儒家经典中的一些段落和句子，辜鸿铭确曾零星译过，有的出现在论著文章中，有的曾在英文报刊发表过。至于《大学》一书，目前只是根据各种资料推断辜鸿铭曾经译出此书，即他在英译《中庸》序中说：“这本书（即《中庸》——引者）连同另一本理雅各博士译作‘伟大的学说’（Great Learning）或者准确地应译为‘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的书（即《大学》——引者）可以被称为儒教的教义问答手册。我原打算将它们放在一起出版，但是按照我的翻译标准，另一本译著还未臻至圆满的境地。”并且他曾将《中庸》、《大学》两本译著赠与托尔斯泰，1908年10月托氏日记中对此有所文字，并记有《大学》的译名“The Great Learning of Higher Education”，等等。故黄兴涛作结论：“辜鸿铭的确翻译过此书，并且还有过抄本或复制件……辜氏寄给托尔斯泰的《大学》，是一种抄本或打印件之类的东西。”

长期以来，对辜鸿铭翻译儒经的活动，多从翻译本身去评价其长短、优劣，褒贬不一。最具代表性的是林语堂、王国维两位大师完全相左的意见。林先生认为辜鸿铭的翻译“卓越聪明”、“明白正确”，其风格特点为现代西方人所熟悉、接受。而王先生则认为辜鸿铭的翻译弊病甚多，几无是处。在此，本文从中西文化交流和汉学西传的历史发展角度分析，认为辜鸿铭以他精湛的英语，译出《论语》、《中庸》等儒经，成为国人中儒经英译的先驱，对汉学西传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首先，是在西方社会中较过去更为广泛地传播了中华文化，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辜鸿铭的翻译无论是意义的准

^① 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第77页。

确、完整、还是其文字风格，都远胜其他译本，他以中国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深刻理解和英国人才有的地道语言，再加之翻译技巧的灵活运用，特别是引用一些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如歌德、卡莱尔、爱默生、阿诺德和莎士比亚寓意深刻的哲理和语句，使西方人能自然汲取儒经的精华，全然没有接受外来文化的陌生，赢得了较多的西方各界读者。据说，辜鸿铭“用英文译《论语》，泰西购者近百万部”。庄士敦也说，他那本“极有特色的孔子《论语》译本，流传很广”。另有人称，辜氏英译各书，“当年销路之佳，罕有其匹”。英译《中庸》更深受西方各界欢迎，早在1908年、1912年和1913年分别由英国《东方智慧丛书》重版印行过三次，50年代又与《论语》一同重印过一次。^①而《东方智慧丛书》旨在“成为东西方一古老的思想世界和新兴的行动世界之间友好和理解的使者”，传播沟通东西文化，辜鸿铭英译儒经的人选，可见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其次，对后来西方汉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辜鸿铭英译儒经出版后，引起西方汉学家们的极大关注，他们不得不承认以往一向被认为西方汉学之冠的理雅各，其译本中也多有不当之处，例如，《孟子·离娄章句下》中“君子有终生之忧，无一朝之患”，该句的“一朝之患”指突发的、意外的祸患。理雅各译作“*One morning's Calamity*”，肤浅可见。又如《中庸》中的“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中的“知微之显”，理雅各译为“他知道隐微的东西会变成显著”，而实际上是知道隐微的东西本身的显著（性）。我们通常所说的“以小见大”，“于细微之处见……”都是这一哲理的运用，这是儒家“慎独”的重要理念之一。辜鸿铭将《中庸》中“莫观乎隐，莫显乎微”译作“*He knows the evidence and reality of we can not perceived by the senses*”，

^① 参见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第104—105页。

足以显示对其内涵的深刻理解。而此后，辜氏所译儒经，就成为西方研究中国儒家文化的重要参考书和依据，被视为儒经翻译的范本。这对于西方社会正确了解中国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及丰富哲理，无疑是极有意义的，从而也推动了汉学研究的发展。

3. 与世界友人的文化交往

在辜鸿铭生活的那个年代，被西方人崇拜的东方人没有几个。辜鸿铭却是其中一个。西洋人声称：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必须要看辜鸿铭，不是因为他那奇特的装束，诸多的奇谈和多彩的个人经历，而是其自身中西文化结合的内涵吸引着世界各国友人。

在辜鸿铭的一生中，曾与世界各国学者、名人往来，辜鸿铭的深厚学问和独到见解令他们大为折服，他们留下的诸多文字再现了当时这些名人交往的情景。如果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哪个国家、什么学者，辜鸿铭都能与之侃侃而谈，思如泉涌，这无疑是一种文化的交流和对中国文化的宣扬。

辜鸿铭与俄国著名作家、世界大文豪托尔斯泰的书信往来，成为中俄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1906年，在中国国土上开战的日俄战争结束，辜鸿铭将他在横滨《日本邮报》上连载的《当今，皇上们，请深思！日俄战争的道德原因》长篇文章的单行本和小册子《尊五篇》及一封信，委托俄国驻上海总领事带给托尔斯泰。辜鸿铭此为完全是因为托尔斯泰是辜鸿铭文化保守主义的共鸣者。早在日俄战起之时，托尔斯泰就痛斥战争挑起者的无耻，对战争中的各国无辜百姓深表同情，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注，并表示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托尔斯泰在其一生的创作中，都在极力宣扬理想主义的道德观念，呼吁人们弘扬人类的善良本性。这些使辜鸿铭有理由相信，托尔斯泰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友人。这一年的秋季，辜鸿铭收到托尔斯泰回赠的英译本著作和一封长信，从信中可以看到托尔斯泰与辜鸿铭的文字之交，他高度

赞扬中国“道德”文化，并希望以中华文化来拯救世界。

1920年，英国著名作家毛姆专程来到北京拜见名震西洋的辜鸿铭。毛姆在回忆这次专访时说：“在这里住着一个声高望重的哲学家，去拜见他的愿望是我这次跋涉的一个诱因。他是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据说他英文德文都讲得很流利。他担任过慈禧皇太后的一个最大的大臣的秘书许多年，可是他现在退休了。不过在整年里每星期中的某日，他欢迎寻求智识的学子去找他，同他谈论孔子的学说。他有一群门徒，可是数目很小，因为大半的学生比较喜欢外国大学的华丽宿舍以及夷狄之邦的有用的科学，而不很赞成他那质朴的住宅和严峻的训导：关于这夷狄之邦的有用的科学，他只嗤之以鼻了之。从一切我所听到的关于他的话，我断定他是一个有骨气的人。”^①

在交谈中，辜滔滔不绝，他自豪地坦言，对西欧哲学研究的最后结果是“智慧只能在孔子圣典范围内找到”，而而对这位著名的英国作家，他却以犀利的语言说道：“你们凭什么理由说你们比我们好呢？你们的艺术或文字比我们的优美吗？我们的思想家不及你们的深奥吗？我们的文化不及你们的精巧，不及你们的繁复，不及你们的细微吗？噢，当你们穴居野外、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进化的人类了。你可晓得我们试过一个在世界的历史上是惟我独尊的实验？我们企图不以武力管理世界，而用智慧。许多世纪以来，我们都成功了。那么为什么白种人会轻视黄种人呢？可要我来告诉你？因为白种人发明了机关枪。那是你们的优点。我们是赤手空拳的群众，你们能够把我们完全毁灭。你们打破了我们的哲学家的梦，你们说世界可以用法律和命令的权力来统治，现在你们在以你们的秘密教导我们的青年了。你们用你们那可恶的发明来压迫我们了。你们不晓得我们有机械方面的天才吗？你们不晓得在这国度里有四万万世界上最务实际最勤恳

^① 《辜鸿铭文集》下，第549页。

的百姓吗？你们以为我们要花了很长久的时间才学得上吗？当黄种人会造和白种人所造的一样好的枪支，而且也会射得一样直的时候，你们的优点便要怎样了呢？你们喜欢机关枪，你们也将被机关枪判决。”^① 足见辜鸿铭对中西文化的直言褒贬无所不在。

1924年，印度著名作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泰戈尔应邀来华讲学，这位曾与辜鸿铭同时提名而最终获得诺贝尔奖的印度文化泰斗终于与中国文化的怪杰会面了。他们的相见，被世人看成是世界两大文明古国的文化在沟通，是东方两种文化在交汇，是亚洲文化的杰出代表。且看两个伟大哲人的对话。泰戈尔说：“如果真理从西方来，我们应该接受它，毫不迟疑地赞扬它。如果我们不接受它，我们的文明将是片面的，停滞的。科学给我们理智力量，它使我们具有能够获得自身思想价值的积极意识的力量。为了从垂死的传统习惯的黑暗中走出来，我们十分需要这种探索。我们应当怀着感激的心情转向西方活生生的心灵，而不应该煽起反对它的仇恨倾向。此外，西方人也需要我们的帮助，今天我们彼此的命运应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应该努力，不通过我们低劣的东西，而通过我们优秀的东西，战胜西方心灵；不用仇恨和复仇态度对待他们，而用友善和相互尊敬的感情去对待他们。”

辜鸿铭特别强调：“西方科学给我们的理智力量不会有那么高，中国孔子的教义也许是拯救西方机械的惟一道路。”

泰戈尔应道：“是的，不仅是孔子的教义，最终是道德的价值充实着每一种文化，如果丧失了这一点，那么，那种文化将无以自主。”^②

由此可见，两位哲人思想交融的核心仍是维护东方的民族主义，宣扬东方文化的精义。

^① 《辜鸿铭文集》下，第598页。

^② 参见严光辉：《辜鸿铭传》，第289页，海南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辜鸿铭晚年应邀赴日本讲学，当时陪同左右的萨摩雄次先生著有《追忆辜鸿铭先生》一文，讲述了辜鸿铭在日本不辞辛苦地宣传东方文化的情景。“先生来到东京，时年六十八岁，瘦削如鹤，发辫长垂，穿了件漂亮的绀红长衫，始终用英文与迎接他的人交谈问候。十月十日初访东京，直至十一月十六日去探望现今名震台湾的实业家辜显荣氏（辜鸿铭先生的亲戚，后被选为贵族院议员），在此期间，先生席不暇暖，不知疲倦地在东京、京都、大阪、神户、滨松等地巡回演讲……

“当时，东京《日日新闻》的事业部长小野贤一郎氏提议，与大东文化协会联合主办，请辜先生前往东北五县的主要城市进行巡回演讲亦可借此为本协会作宣传。协会欣然允诺，于是先生便开始了东北演讲之旅。五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先生每天下午和晚上演讲两次，当时担任翻译的是圆地与四松氏。由于先生年事已高，牙齿也多有脱落，圆地氏翻起来颇为辛苦。先生每晚都要将次日的讲稿写好，圆地氏与我则在旁边将之译成日文。先生独特的英文和深邃的文意，直到今天仍然记忆犹新。勿庸置言，演讲会场总是爆满。

“那年夏天，由大东文化协会教化部主办了夏季讲习会，先生执教一科进行演讲。此后，协会又新设比较研究部，先生作为成员之一，完成了诸多有关东洋文化精髓的研究。

“随后，先生出任大东文化学院教授，讲授东洋文化及语言学，先生特异的风格和敏锐的洞察力，深得青年学子的爱戴。

“先生很是健谈，谈笑风生一词用来形容先生再合适不过了。且兴致上来唾沫四溅，时而是警世之言，时而是词语激烈的攻击性言论，经常令人替他捏把汗。

“先生是中国人中少见的无欲恬淡的人，不求地位，亦无意于金钱，飘飘然享受着高尚的人生乐趣，即使月月阮囊羞涩，先

生都平静地说：‘我的妻子擅长理财。’从无丝毫怨言……”^①

1927年秋，辜鸿铭从日本讲学归国，转年4月因病逝世于北京寓所，这位中华文化的代言人最终把人生的脚步停留在弘扬东方文化的奔波中。

^① 《辜鸿铭文集》下，第336—342页。

第五章 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

一、香港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特殊位置

1. 西人东来的集散地

位于我国南部边陲的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三部分，面积为1074平方公里，地处北纬22°，东经113°—114°之间，属亚热带气候，但有近半年的时间气候与温带地区相似。鸦片战争以前香港仅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渔村，但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其疯狂向外拓展世界市场的过程中，香港这个最早受到冲击的中国地区，便成为连接中西文化的桥梁，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具有特殊的位置。

香港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从秦始皇统一中国起，它曾先后隶属于南海郡番禺县、东莞郡宝安县、广州府宝安县、广州府东莞县、增城县及广州府新安县管辖，直至1841年，被英国割占为止。

香港作为边陲地区，各朝代都对其加强统治，建立郡县、设置军事设施，唐朝已开始派兵驻守。明朝中期，为防止外敌和倭寇的侵扰在广东建立了水师，并先后击退了葡萄牙、荷兰的人侵者。到了清朝，为进一步防范外寇入侵，又在佛堂门及大屿山等地增建炮台。

香港地区早期已有一些本地居民及少量从外地迁人的入口。北宋时期，中原长期战乱，大量人口移民至此。据说，宋朝末代

皇帝赵昺南逃时，曾在九龙停留，并受到当地人民的支持，留有许多古迹与传说至今。现今新界的锦田邓族、新田文族、上水廖族、河上乡侯族及粉岭鼓族五大族都是先后在宋、元时期迁徙至新界定居立业的。

香港地区盛产海盐、莞香及珍珠。五代时，香港大埔一带已成为中国采珠业中心之一，与合浦县（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齐名。明末清初之际，香港地区以产香出名，所产香料多由陆路运往尖沙咀，再用小船运至香港岛西南部的石排湾，然后装大船北上运至苏杭一带贩卖。船只因装卸香料聚集在港口，久之，就有了“香港”之称。这里，地理位置优越，从唐朝时起已成为广州对外交通的重要外港，凡西方来华商船，皆在此地停留，补充淡水，然后北上广州、京杭一带。

1840年6月，英国侵略者发动对华战争，清政府被迫于1842年8月与英国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这一条约是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其中规定：“因英国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它使中国的领土主权遭到破坏。1860年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清政府又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以及《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大清两广总督劳崇光，将粤东九龙司地方一区，交与大英驻扎粤省暂充英、法总局正使功赐三等宝星巴夏礼，代国立批永租在案。兹大清大皇帝定即将该地界，付与大英大君主并历后嗣，并归英属香港界内，以期该港埠面管辖所及，庶保无事……”按照这一规定，九龙地区又被英国强行割占。它也说明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加快了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演变。

九龙半岛位于新安县大陆部分的南端。半岛以北狮子山、笔架山等横开列嶂，高峰耸立，是高山地带的外缘。半岛境内一些孤立的小丘散落在洼地之间，半岛沿岸平地较多。

九龙半岛的岬角尖沙咀隔着宽约 1.5 公里的海面，与香港岛的中环和湾仔相望。九龙半岛和香港岛之间是世界少有的天然深水良港，宽 1.5—9.6 公里，深 2—14.5 米，面积 5200 公顷。可供巨轮自由往来停泊，海港四周群山拱卫，东面入口鲤鱼门地势狭窄，可阻挡波浪；西面入口急水门有大屿山及一些星罗棋布的小岛减缓风浪，使整个海港成为巨大的袋式避风港。就是这样—一个优良的海港，被英国强行割占，而清政府无力做出任何反应，所做的只是依照会的要求，将兵炮远远撤走，以致军事要地尖沙咀—带成为不设防地区。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惨败，西方列强乘机掀起瓜分中国的浪潮。英国港督威廉·罗使臣（William Robinson）首先向英国殖民地大臣里彭提出占领香港新界的问题，在给里彭的密函中，他建议，“从防御的观点看，”香港界址应拓展至大鹏湾到深圳湾—线，并包括加普礁、横澜岛、薄寮洲以及距香港 3 海里以内的所有岛屿在内。“应当在中国未来得及从失败中恢复过来以前，向它强行提出这些要求”。1898 年 6 月 9 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签订，其中规定：“溯查多年以来，素悉香港—处非展拓界址不足以资保卫。今中、英两国政府议定大略，按照粘附地图，展拓英界，作为新租之地。其所定详细界线，应俟两国派员勘明后，再行画定以九十九年为限期。又议定：所有现在九龙城内驻扎之中国官员，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其余新租之地，专归英国管辖。至九龙向通新安陆路，中国官民照常行走。又议定：仍留附近九龙城原旧码头—区，以便中国兵、商各船、渡艇任便来往停泊，且便城内官民任便行走。将来中国建造铁路至九龙英国管辖之界，临时商办。又议定：在所展界内，不可将居民迫令迁移、产业入官，若因修建衙署、筑造炮台等官工需用地段，皆应从公给价。自开办后，遇有两国交犯之事，仍照中英原约、香港章程办理。查按照粘附地图所租与英国之地内有

大鹏湾、深圳湾水面，惟议定，该两湾中国兵船，无论在局内或局外，仍可享用。”^①正是由于这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英国将沙头角海到深圳湾之间最短距离直线以南、英国九龙割占地界限街以北的广大地区以及附近岛屿和大鹏、深圳两湾水域强行租借九十九年。租借地陆地面积 376 平方英里（975.1 平方公里），其中大陆 286 平方英里，岛屿 90 平方英里（包括大屿山等大小岛屿 235 个），较原来香港行政区陆地面积扩大约 11 倍，租借地水域较前扩大四五十倍。面条约中有关九龙城内驻扎之中国官员，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保留九龙城原旧码头，以使中国船只停泊及官员往来；九龙城通向新安的陆路，中国官民照常行走的条款，也在 1899 年后，由英国单方面取消，并派兵占领城寨，码头与道路。

英国殖民主义者自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后，即已拥有所谓占有香港岛及其海域的“领土”权，于 1843 年 4 月 5 日宣布香港为其殖民地，并成立了香港殖民政府，任命了港英总督，按照对英属殖民地的统治方式建立了一整套香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而其所实行的香港自由港政策，对形成香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位置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香港为自由港，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方面，香港政府开始着手建设海港城市、仓库、码头等设施，以适应日益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吸引了澳门、英国及其他各国的商人、传教士纷纷来港择址建屋。仅是 1841 年 7 月首次标售地皮，就有 25 家商行共买了 35 块地皮，预示港城建设的起步。随着自由港政策的实施，香港地处国际交通要道，适于转口贸易的优势日显，从 1842—1848 年停泊香港港口船舶和吨位统计^② 可以看

^① 转引自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第 124 页中华书局，1994 年版。

^② 同^①，第 246 页。

1842—1848年停泊香港港口船舶和吨位统计

国家和地区	1842		1843		1844		1845		1846		1847		1848	
	船只	吨位	船只	吨位	船只	吨位	船只	吨位	船只	吨位	船只	吨位	船只	吨位
英国	336	124357	439	163206	463	168187	513	173540	523	177114	499	164920	457	146681
美国	22	6759	34	11073	47	13681	103	35789	73	25022	92	30697	118	45910
西班牙	11	2718	10	2454	12	3007	19	4946	23	7582	22	5569	23	4810
荷兰	6	782	5	1364	3	664	8	2325	9	2538	7	2038	9	3305
丹麦	2	700	-	-	5	1308	4	1245	1	305	3	1070	2	309
法国	-	-	4	1357	2	638	1	321	1	300	4	1150	6	1630
汉堡	1	266	1	86	-	-	4	1118	4	1214	3	776	5	1077
普鲁士	1	379	-	-	-	-	-	-	-	-	3	1105	-	-
墨西哥	1	125	-	-	-	-	-	-	-	-	-	-	-	-
葡萄牙	1	250	-	-	-	-	-	-	-	-	2	226	8	900
瑞典	-	-	4	1032	5	1612	7	2384	5	1563	1	400	1	243

国家和地区	1842		1843		1844		1845		1846		1847		1848	
	船只	吨位	船只	吨位	船只	吨位	船只	吨位	船只	吨位	船只	吨位	船只	吨位
不来梅	-	-	-	-	1	160	2	480	2	304	1	300	4	1330
比利时	-	-	-	-	-	-	1	300	-	-	-	-	2	750
秘鲁	-	-	-	-	-	-	1	100	-	-	1	400	2	317
巴利	-	-	-	-	-	-	4	900	8	1554	7	1036	2	400
俄国	-	-	-	-	-	-	-	-	1	680	-	-	-	-
夏威夷	-	-	-	-	-	-	-	-	-	-	4	720	3	363
智利	-	-	-	-	-	-	-	-	-	-	2	194	2	280
暹罗	-	-	-	-	-	-	-	-	-	-	1	400	-	-
撒丁	-	-	-	-	-	-	-	-	-	-	-	-	2	842
印度	-	-	-	-	-	-	5	3550	12	8700	12	11510	12	11985
珠江	-	-	-	-	-	-	-	-	13	2379	30	6954	42	7686
总数	381	136336	497	180572	538	189257	672	226998	675	229255	694	229465	700	228818

出，香港的转口贸易日益发展，成为中外交通的重要枢纽。从这时起，西方人来华也多是先到香港，由此集散。特别是英、美传教士，纷纷进入香港，成立各种传教团体，利用香港到东南沿海城市的便利条件，实施他们的活动计划。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来华活动的经历即是典型代表。

据《中国丛报》统计，自马礼逊来华至1842年鸦片战争前，基督教来华传教士共计61人，其中主要为英、美两国教会所派遣，这自然与其国内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相关。这些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大都在香港落脚，或久居，或暂留，然后转赴各地。

2. 中西文化的交汇地

从19世纪中叶起，作为自由港的香港，转口贸易日益发展，中外交通的重要枢纽作用已经确立。经济、交通的发展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香港又成为中外文化的交汇之地。

香港被迫割让后，英国在香港实行了殖民统治。这在客观上也从经济、政治、法律、教育等各方面带来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很快就使得香港成为与内地城市迥然不同、相当欧化的城市。这就为西方文化在香港地区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1849年，湖南学者何绍基由澳门过香港，对香港的欧化甚为新奇，他在诗中道出了留给他的深刻印象：“一日澳门住，一日香港息。澳门半华夷，香港真外国。一层坡岭一层屋，街石磨平莹如玉。初更月出门尽闭，止许夷车奔驰逐。层楼叠阁金碧丽，服饰全非中土制。止为人人习重学，室宇车船等仪器。其人丑陋肩骯修，深目凸鼻鬓眉乱。言语伴离文字异，所嗜酒果兼羊牛。渐染中华仓圣学，同文福音资考据。”^①

西方文化在香港地区传播的途径，一是兴办教育，二是新闻出版。《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和澳门的马

^① 《历代名人人粤诗选》，第45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礼逊学堂先后迁至香港，继续开办。除此之外，在香港由传教士所创办的教会学校还有多所，美国浸信会、伦敦传道会、美国公理会、英国圣公会、罗马天主教会等均在香港兴办教育。至19世纪60年代，在香港首屈一指的是由香港政府资助的皇家书院，学生近千人。

传教士在港创办的这些学校，之所以能够招收华人子弟入学，一方面是传教士们的精心尽力，如马礼逊学堂的校长布朗所称：“孩子们和我家庭混在一起，我们勉力待他们如亲生儿子，鼓励他们对我们具有亲密无间的信任，做他们的最好朋友。他们可以自由地参加我们家庭的早晚礼拜。简言之，我们是在努力使他们感到是同在家里一样，给他们以一个基督徒家庭的教育。”^①而更主要的方面则是由于教会学校的慈善性措施，免收学费，提供食宿，对那些贫困的华人子弟来说无疑具有吸引力。正因为如此，马礼逊学堂迁至香港后，其规模在不断扩展，至1845年时，已有学生40余人，分为3个班。^②这些学堂为了传教，不得不借助于西学，这也就为学生们学习外语和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提供了机会。

新闻出版是香港地区西方文化广泛传播的又一途径，源于英国殖民主义者对香港实行的自由港政策，使得香港地区中西文化的存在、交汇和发展具有一定的自由度。这主要表现在已有的传教士出版业迁移至港，如著名的《中国丛报》，1832年5月在广州创刊为 *Chinese Repository*，旧译《中国文库》、《澳门月报》，通常称《中国丛报》，1884年时曾一度迁至香港。又如1815年，马礼逊、梁发迫于嘉庆皇帝“禁止西人传教，查出论死，人教者发极边”的禁令在南洋华人聚居的马六甲创办的印刷所，二十多年后，也随英华书院迁到香港继续发展。其次，香港割让后，原囿

^① 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41页。

^② 同①。

于清廷传教禁令在东南亚一带活动的传教士纷纷汇集香港，为了传教，他们采取用印刷品传播的方式，遵照“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来愈显天主的光荣，拯救人们的灵魂”的宗旨，借助西学，传播宗教，在客观上使得各种西方书籍报刊被译介传播。据熊月之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一书中的统计，1843—1860年间，传教士在香港共出版中文书刊60种，其中宗教宣传刊物37种，占出版物总数的61.7%，属于学校教科书、字典、年鉴、杂志、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的书刊23种，占出版物总数的38.3%。尽管这些出版物还只是初浅的，偏重于自然科技知识，且经过传教士宗教思想的滤化，但它毕竟是近代西学东渐的第一次潮头，并首先在香港与中华文化交汇。

二、香港的西式学校

1. 西式学校的创建

香港早期的西式学校都是由教会创办的。英国伦敦传道会牧师罗伯特·马礼逊和威廉·米怜于1818年11月在东南亚的南洋群岛中最大的马六甲城开办了英华书院，该院当是西方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创办西式学校之嚆矢。

英华书院是马礼逊提议创办的，作为第一位来华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如他自己所言：“冒着个人危险和痛苦，忠心耿耿地服务。”在来华十余个年头之后，马礼逊鉴于当时根本不能公开建立教会布道，决定先在华人聚居而又临近中国的南洋群岛上设立传教基地，开办学校，出版刊物。1813年，马礼逊向伦敦会提出“恒河外方布道计划”：

(1) 由于中国的现状不允许传教事业举办印刷和其他几种事业，甚至个人居留亦不能确定，故必须在信奉基督教的欧洲政府治下的地域，另觅一处临近中国的基地，成立中国传教事业总

部；(2) 一俟米怜到马六甲，立即购置地产；(3) 尽快开办免收学费的中文书院；(4) 拟在马六甲发行中国期刊；(5) 总部将以中国事业为对象，但也包括其他；(6) 联合中国、马来亚及印度的其他传道会；(7) 举办中文、马来文及英文的印刷事业；(8) 拟编一份英文期刊，促进教会之间的联合；(9) 总部常以中国语言礼拜，等等。^① 这一计划立即得到伦敦会的支持。初创时，马礼逊个人捐款 1000 英镑，并认捐每年常费 100 英镑，伦敦会拨款 500 英镑，东印度公司、英国政府也先后捐款。

马礼逊和米怜为书院的创办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从《马六甲筹组英华书院计划书》中可知有关书院的办学宗旨、教学内容、师资、招生对象以及书院的设置、管理都有明确规定，为便于完整和真实了解，将其全引如下：^②

(1) 名称。本机构定名为英华书院，该名称于原始创设之计划，尤涵盖中学、小学及其他称谓之意义。

(2) 宗旨。本院之设立，以交互教育中西文学，及传播基督教理为宗旨。一则造就欧人学习中国语言及中国文字；二则举凡恒河外方各族，即中国、印支及中国东南诸藩属之琉球高丽、日本等民族，其就读于中文科者，皆能以英语接受西欧文学及科学之造就。本院各项课程之设计，均本以和平传播基督教及东方一般文化之原则，冀以达致有效影响为目的。

(3) 书院。①书院开设一所广阔之中文图书馆，以及一所西欧文库，专集有关以上各民族之语言、历史、风俗之西书论著。②聘任欧籍教习以中文教授欧洲学术，以及聘任本地华人教师。欧籍教习以基督教徒为限。③书院供给部分学生之膳宿，其名额日后始行公布。惟自愿寄宿于市区，一如欧洲之情况者，则务须

① 转引自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第 100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② 转引自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 123 页。

有自我照顾之能力。④设有基金，以供本土清贫学生维持生活之需。⑤欧籍学生必须授予中国语文，惟各生得按其意愿在宗教、文字、经济诸科上有所选择。⑥本土学生必须以英国语文授以地理、历史、数学，以及有关学术与科学之各项科目。如属时间许可，亦将授以伦理哲学、基督教神学及马来文等。⑦本教会总部设有英文及中文之印刷所，学习文科之学生，应多为利用。

(4) 入学资格。凡属欧洲、美洲各族而属教会教友者，携具得力荐函，保证其道德习惯及有关意见，均得申请入学。凡属欧洲大学允予游历奖助者、传教士、商行人员或附有领事介绍者，均得申请入学。凡属本土青年，或自费，或传道会资助，或私人资助，旨在接受英语教育者，此等青年则无须强制接受基督教之信仰，及强制对基督教之礼拜。惟校方举行各项公开性之演讲，则必须出席。

(5) 书院之续办。书院之续办时间，其后依实际情况处理。

(6) 经费。本院经费乃来自欧籍及本土学生之自费，或来自各方友好对学生之赞助，以及志愿者之捐献。

(7) 管理。本院行政及基金之管理，则由赞助人及受托人处理之。凡为英华书院之一般目的，或某部分计划捐赠两元以上者，均表谢意，并可径交马六甲米怜牧师、中国马礼逊牧师。

按照书院计划书的规定，所设课程有英文、中文、数学、天文、历史、地理、伦理哲学、基督教神学等。教科书多是马六甲印刷所出版。欧籍和华人学生分别为华人和欧籍教习授课，以便中、英文交互学习。在这所西式学校的教学中，西方教育中注重理解，启发思考，提倡学生独到见解，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被引入。

英华书院首任院长为米怜，任职时间为1818—1822年。威廉·米怜英国伦敦会传教士，与马礼逊曾是神学院同学，1813年奉命到澳门协助马礼逊，后被马礼逊派赴马六甲开辟新教区，办学布道。他协助马礼逊翻译《圣经》，在槟榔屿开办印刷所，在

马六甲筹办英华书院时，负责具体事务和捐款，后首任院长，将其晚年主要精力投入书院。1822年6月去世，有中英文著作24种。

继任的其他六位院长也都是英国伦敦会的传教士，他们依次为：宏富礼，1821年受派东来，1822年至1824年任英华书院第二任院长，1825年被委任为马六甲官方牧师，1829年返回英国。继任的院长是柯大卫，1824—1828年在任；第四任院长吉德，任职时间为1828—1832年；汤雅各为第五任院长，1832—1834年在任，期间对学院制度进行改革，取消了学生领取薪给制度；伊万斯，第六任院长，任职时间1834—1840年；最后一位院长是著名汉学家理雅各。他1839年被派赴马六甲任英华书院第七任院长，1843年书院迁至香港后，继续担任院长。在香港期间，他主要进行中国儒家经典的英译工作，此时，避居香港的王韬帮助理雅各完成了四书、五经的英译，于1861—1886年间出版。他关于中国的著作有《中国人关于神鬼的概念》（1852）、《孟子的生平和学说》（1875）、《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评述及其同基督教的比较》（1880）。理雅各是早期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主要人物，并对西方汉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于1873年回国，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

英华书院从1818年创办至1843年迁往香港的25年间，学生不断增加，规模也有所扩大，还增设了华人女童学校和妇女成人校，在马六甲开展教育的大致情况如统计表所示。

英华书院 1818—1843 年发展情况

年 份	学 生 数	中 学 程 度	年 份	学 校 / 生 数	小 学 程 度
1818年		7人	1818年		3所华文
1821年		11人	1831年		8所华文

年 份	学 生 数	中 学 程 度	年 份	学 校 / 生 数	小 学 程 度
1823 年		17 人			200 人
1827 年		30 人			4 所马来文
1835 年		70 人			

1843 年书院迁至香港，在士丹顿街与荷李活道交界处建立校舍。1844 年，英华书院更名为英华神学院，成为培养香港本地传教士的专门学院，并附设一所预备学校。由此使得一些当地的华人居民不愿送子女前往读书，将其前程定于基督传教事业。而入校读书的华人子弟也只是为了学习英语，他们“一旦较好地掌握了英语，就不愿最终成为月薪 20 至 25 元的本地牧师。他们知道（外国）商行不断需要许多中国职员，月薪可达 25 至 100 元，而且前途无量”。^① 因为书院的办学目的难以实现，不得不于 1856 年底停办。

早在 1843 年马六甲英华书院迁港前，马礼逊学堂已于 1842 年 11 月由澳门迁往香港，这是最早出现在香港岛的西式学校。它是为纪念马礼逊而于 1839 年 11 月正式在澳门开办的。

1834 年，马礼逊病逝，澳门的传教士提议建立马礼逊教育协会，得到澳门、广州西人的响应，1836 年 9 月 28 日在广州成立，英国鸦片商颠地任会长，查顿任司库，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任通讯秘书，马礼逊之子马儒翰任文书，并设有董事会。教育协会成立时还通过了《马礼逊教育协会章程》，其宗旨为“在中国开办和资助学校，教中国少年读中文和英文，并通过这个媒介，把西方的各种知识送到他们手中”。“以学校或其他方法促进或改善在中国之教育为目的”。至于其真正的主观动机，我们可以从裨

^① 转引自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第 304 页。

治文在成立大会上的演说看得更清楚，他说：“教育肯定可以在社会、道德、国民性方面，比在同一时期内任何陆海军力量，比最繁荣的商业刺激，比任何其他一切手段的联合行动，产生更为巨大的变化。”^① 协会章程还对董事会的产生以及经费的来源和管理等问题做了规定。与马礼逊学堂相关的附则三款规定：

第一款学生。(1) 不分年龄、性别，在中国内地或海外之青年，并获协会赞助人接受者，得申请人学，惟仍须由董事会核准。(2) 凡六岁、八岁或十岁之儿童，随时均表欢迎接受人学。(3) 凡属马六甲海峡、印度、欧洲、美洲为达成学习目的之儿童，如获协会董事核准，及家长、监护人之保证，乃得申请入学。(4) 如有需要，学生得从协会获得膳食、衣服、书籍、学费之供给，但不设赏金及奖金。倘捐款人另有书明或经协会通过者，则属例外。

第二款教师。(1) 校长及教师从欧洲、美国征聘，如属协会同意，得为长期聘任。(2) 如有需要及有良好品格之教师，亦得聘任。

第三款课本。(1) 本校课本旨在教导学生学习阅读、写作、数学、地理及其他科学，并以英语及华语教授，以期获得最佳效果。(2) 一如基督教国家之优良学校，籍教师之教导及帮助，各学生必须完成《圣经》课程，惟其接受之教义信仰，实非作为学生资格认可之证明。(3) 凡属教育协会之书籍，乃为建立一公共图书馆，其名称为“马礼逊教育协会图书馆”。(4) 该图书馆由董事会直接管理，对于外籍居民及来宾，于使用尤有限制，为使图书获得良好保管。故图书馆实非绝对公开。在使用图书馆之外籍居民，亦应承担部分经费。(5) 图书馆之管理规则，乃由董事会制定，其后出版图书目录，凡准予使用协会图书馆者，即获手

^① 转引自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第104页。

抄副本一份。^①

1839年11月4日马礼逊学堂在一切筹备就绪后正式开学。应马礼逊教育协会的邀请，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生布朗（1810—1880年）被推荐任学堂校长。学校初创之时，第一批学生有容闳、黄胜、黄宽、李刚、周文和唐杰六人。布朗一上任，就按照章程的规定实施教学和管理，以他卓越的才识和责任心投入了这一工作。如他所言：“根据马礼逊教育会章程的规定，我做好了一切准备。这不仅是教学，而且是一个教育团体，目标是训练整个的人，包括德、智、体。遵照这个目标，我安排学生们半天读中文，半天读英文。早晨六点钟开始，到晚上九点钟结束，其中读书八小时；其余三四小时在户外场地上运动和娱乐。”^②对此，马礼逊学校第一批学生容闳曾写道：“马礼逊学校于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一日开课。主持校务者为勃朗先生（REV. S. R. BROWN）。先生是美国人。一八三二年由耶路大学（YALE UNIVERSITY）毕业，旋复得名誉博士学位。乃于是年（一八三九年）二月十九日偕夫人莅澳以其平生经验，从事教育，实为中国创办西学之第一人。予人是校，在一八四一年，先我一年而人者，已有五人。校中教科，为初等之算术、地文及英文。英文教课列在上午，国文教课则在下午。予惟英文一科，与其余五人同时受课，读音颇正确，进步亦速。予等六人，为开校之创始班。迨后一八四六年之十二月，勃朗先生因病归国，六人中竟半数得附骥尾，亦难得之时会也。”^③

英国割占香港后，马礼逊教育协会理事们于1842年2月举行会议，一致认为：香港为英国殖民地后，最适于教育协会的发

^① 《马礼逊教育协会章程》原载《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第5卷第377页，译文见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第217页。

^② 转引自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96页。

^③ 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3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展，并提供了特别合适的机会，只有在香港，才可以使协会的目的得以实现。随后港英总督璞鼎查应马礼逊教育协会的请求，在港岛东区黄泥涌与快活谷交界处的一座小山上，即后来称为摩理臣山的地方划拨一块土地，供他们修筑校舍。这一年的11月，马礼逊学堂由澳门迁至香港，璞鼎查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身份，答应每年发给马礼逊教育协会1200元。马礼逊学校得以顺利发展，至1843年时学生由来港时的11人增至24人，1844年学生32人，教师也有所增加。但是当德庇时接任第二届总督后，以马礼逊学堂处于美国传教士影响之下为由，拒绝继续给予支持，加之1847年布朗返回美国，裨治文离港赴沪，马礼逊学堂终因校务薄弱，基金不足而于1850年停办，马礼逊教育协会也随之不复存在。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写道：“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起，其后结果，即以香港让于英人。玛礼逊学校遂于一八四二年迁于香港某山之巔，高出海平线几六百英尺。山在维多利亚殖民地之东端，登山眺望，自东至西，港口全境毕现，即此一处，已足见香港为中国南部形胜，无怪外人垂涎。且港口深阔，足为英国海军根据地，有此特点，故此岛终不我属，卒为英国有也。玛礼逊学校既设于山顶，其后此山，遂亦以玛礼逊得名。

“一八四五年三月十二日，威廉麦克 William Macy 先生来港，为玛礼逊学校之助教。是校自澳门徙此以来，大加扩张，学生之数已达四十余人，新增三班教授，一人之力，不能兼顾，故须延聘教习，相助为理。麦先生之来校适当其会。勃朗先生则仍专心校务，毫无间断，直至次年秋间回美，乃以麦先生继之，盖其时麦先生已有一年之经验矣。

“一八五〇年，玛礼逊学校解散。”

香港早期的西式学校除英华书院、马礼逊学堂外，还有一些学校为欧美传教士所办。其办学条件、规模和维持时间各异。（具体情况见表）

香港早期的西式学校

创办时间	创办者	学 校	大致情况
1842 年	浸信会叔未士 (J. L. Shuck) 叔未士夫人	宏艺书塾	
1843 年		浸信会女校	
1843 年	美部会	公理学校	
1843 年	圣公会丹顿 (V. J. Stanton)	圣保罗书院	主要为培训本地牧师。学生除接受基督教教育外，还学习英文和中文
1843 年	罗马天主教	中文学校	
1845 年	罗马天主教	女童学校	
1862 年	高神父 (Father T. Raimandi)	教主书院	讲授英文、算术、地理、代数、几何、音乐、绘画。有欧籍、菲律宾、中国学生。中国学生开设中、英文各一班
1844 年	浸信会	英华学校	
1844 年	迪恩 (W. Dean)	中文学校	
1846 年	伦敦会	英华女学	
1851 年	巴陵会	巴陵会书馆	
1853 年	美部会	公理会女校	
1859 年	首任维多利亚会 督 (主教) 司蔑 (George Smith)	拔萃书室	1860 年改称拔萃女子训练学校，1869 年改为拔萃孤儿院，附设男书室一所。

除上述那些由传教士创办的西式学校以外，港英政府对香港原有的一些华人民办学校实行了统一管辖。1845 年，香港已有华人开办的私塾 9 所，学生 145 人，其中 3 所分布在维多利亚城

的上湾、西营盘，6所分布在香港仔、小香港、赤柱、大潭笃、扫杆埔、黄泥涌等村庄。1847年，第二任港英总督德庇时接受了其中文秘书郭士立关于用经济补助的方法控制华人民办学校的建议，并任命了专门委员会，调查维多利亚城、赤柱及香港仔中文学校的状况，最后选定了三所学校作为政府补助的学校，各校每月得到10元补助，政府提供学校所需的教室和教师的薪水，学生免收学费，但每月要交25文铜钱，以给教师“作茶资之用”。这三所学校规模有限，至1848年总共有学生95名，其中维多利亚城40名，赤柱24名，香港仔31名，以后受港英政府补助的学校逐步增加。

受港英政府资助的学校被称为官立学校（Government School，当时称“皇家书馆”），这是香港分立教育制度的开端。香港政府的这种做法是希望“这些学校最终归属新教传教士培养的本地基督教徒教员掌管，将会使港岛本地居民皈依基督教一事，出现最合乎情理的前景”。^①而在将港岛华人学校纳入其殖民体系的同时，这些学校在教育、管理方面也实行了西式学校的教育体系，成为香港早期西式学校的一部分。这一点，我们可从19世纪50年代官立学校的课程设置有所了解。^②官立学校的学生除照旧学习中文部分外，同时还接受了历史、地理、英语以及自然科学常识的教育，这与华人所办私塾的教育内容是根本不同的。

类别	官立学校课本
本地课本	幼学 千字文 五经 三字经 四书 古文
外国课本	新约 《圣经》中记载的历史 十诫 慕维廉地理 慕维廉英国史 基督教三字经
英文课本	日课（板书） 常识（理雅各讲授） 马礼逊汉英语法 地理（地图）

① 转引自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第305页。

② 刘蜀永：《19世纪香港西式学校历史评价》，《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

1862年2月由香港四所官立学校合并建成的中央书院（Central School）正式开学，阿伯丁英王学院毕业生、24岁的史钊域任校长。中央书院的建立是香港教育世俗化的重要实施步骤，它改变了教会为传教而办教育的状况，港英政府通过办教育，培养更多的亲英力量，服务于英国。

学院创办时，只招收中国学生，那些未并入学院的官立学校为中文小学，向学校输送生源。1864年，学院已有学生120名。1865年学院改收学费，但学生仍踊跃就读，其中有不少商人富家子弟和已婚青年。这与书院的世俗教育不无关系，许多学生仅是为了学好英语，以便寻求较好的工作职位。书院校长史钊域在1865年官立学校年度报告中说得明了至极：中央书院相当成功，是因为英语可以变为港元。从1867年起，学院开始招收外国学生入学，但生源仍以中国学生为多数。

书院建立之初分为中文部和英语部，所学课程除典籍《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古文》、《文章》、《史记》外，还有算术、历史、地理等，以后又开设了化学、几何，并建有实验室供教学之用。

中央书院自1862年开办一直未辍，1889年更名为维多利亚书院（Victoria College），1894年改称皇仁书院（Queen's College）一直沿用至今。

香港西医书院（The Hong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是香港著名华人何启于1887年创办的香港第一所大学专科学校。何启为中央书院学生，1872年赴英留学，获阿伯丁大学内科学士和外科硕士学位，并获大律师资格。1882年何启偕英籍夫人雅丽氏（Alice Walkden）回到香港做大律师。两年后，雅丽氏不幸病逝。为纪念亡妻，何启捐资，兴建了以雅丽氏命名的一所医院，1887年2月正式开业。为了培养华人医生、护士，何启与孟生（P. Manson）、康德黎（J. Cantlie）等一批外籍医生发起在

雅丽氏医院内开设香港西医书院，得到香港政府的支持，并于当年10月1日宣告成立。

西医书院较之内地两所医科学校（一为1866年美国开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校，一为1881年李鸿章在天津开办的医学馆）起步晚，但它是香港的第一所大专医科学校，特点明显：

第一，课程设置严格正规。西医书院为五年制学院，课程设置与国外正规医学院相似。

年 限	各 年 课 程
第一年	植物学、化学、解剖学、生理学、药理学、物理学、临床诊察
第二年	解剖学、生理学、医学、妇产科、病理学、外科学
第三年	实习为主
第四年	法医学、公共卫生、实用初级外科等
第五年	医学、外科、产科的深入学习

第二，师资力量较强。西医书院的教师大部分是外籍医生。学院创办的发起人孟生、康德黎都是经过医学深造的博士，何启本人也在学院兼课，讲授生理学与法医学。

第三，教学严谨，注重实践。书院教师讲授认真，并尽力结合实践，注意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讲植物学，组织学生们去植物园参观；讲化学，教师演示，学生到实验室亲自动手操作。

严谨严格的教学和管理，培养了书院学生勤奋刻苦的学习态度和良好的医德。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当年在西医书院“专心致意于学业，勤恳非常”，“日间习读医学，夜则研究中文”。1894年，香港鼠疫流行，书院的许多学生不顾被染的危险，踊跃到雅丽氏医院管辖下的鼠疫医院值班，充当办事员、敷裹员或护士。对此，康德黎博士称赞地说：“我们目睹瘟疫流行

时期从事工作的中国学生，甘愿给予他们更多的赞誉，比从前威名震撼亚欧大陆的成吉思汗战士得到的还胜一筹的赞誉。”^①

在此，我们引用刘蜀永所做的有关数字统计，“1848年，香港仅有3所官立学校和为数不多的几所教会学校。1873年发展为30所官立学校，6所接受政府补助的学校，合计36所。1900年则有13所官立学校，97所接受政府补助的学校，合计110所”。^②这当是香港西式学校在近代的大致情况。

2. 西式学校的历史评价

香港西式学校的出现是在新的背景下，中西文化交流西学东渐的产物。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的凝聚体，中华文化是具有包容性的文化。中国历史上的对外往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与外来文化有过三次大交流。第一次大交流是发源于南亚的佛教传入中国。在华传播过程中，佛教文化与中华文化经历了几百年的冲突与容受过程，最终佛教逐渐适应中华文化，而中华文化也吸收了佛教文化，从而丰富了本土文化。可以说，周秦汉唐文化，就是一个不断融合各族、各家文化成果的时代。隋唐时期，佛教文化进入中华文化圈，儒释道并重，乃有唐代文化万国衣冠拜冕旒的那种空前气势，宋明理学则是更细致地吸收、融合儒释道而形成的文化成果。

明末，与中国文化截然不同的基督教传入中国之时，中国的国力还足以维护国家的主权，但是，鉴于当时外国侵略的威胁，当朝政府对外国人来华控制颇严，百姓对异质基督教文化有着一种维护中华文化，对其进行抵御的本能。因此，当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向中国传播天主教时，是以平等的文化交流者身份，使其所传播的基督教文化尽量去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在传

^① 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第314、315页。

^② 同^①。

播的方法上也超出宗教的狭隘方式和范围。利玛窦等传教士“为了使一种新宗教的出现在中国人中间不致引起怀疑，神甫们开始在群众中出现时，并不公开谈论宗教的事。在表示敬意和问候并殷勤地接待访问者之余，他们把时间用于研习中国语言、书法和当地的风俗习惯”。^① 他们向中国民众展示西洋的三棱镜、日晷、自鸣钟及宗教图画，在人们赞不绝口之时，借机宣传一些教义。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利玛窦也与士大夫阶层广泛接触，徐光启、李贽等即是其中的代表。在与中国知识分子交往中，利玛窦向他们介绍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如广东韶州翟汝夔在与利玛窦的交往中，先后从他那里学习了《同文算法》、《浑盖图说》和《欧几里得几何》，并将《欧几里得几何》第一卷首次译成中文。他还向利玛窦学习日晷的制作技术。利玛窦向国人介绍的《万国舆图》第一次向中国人传统的舆地观提出挑战，他所介绍的近代科学文化，又使中国人眼界开阔。这种传播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西方文化的做法，远远超出了单纯传播宗教的实效，它在客观上促进了西学东渐和中西文化的交流，而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结束了这一次交流的历程。

清末，随着世界局势发生的巨大变化，中西文化开始了再一次的交流。16世纪以后，以英国首创其端的许多西方国家陆续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使生产力获得空前未有的解放。而18世纪开始的产业革命，是人类将手工技术发展到了机械技术的伟大社会变革，是人类历史上生产力发展的一次巨大飞跃。它与普遍繁荣的近代科学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带给西方各国以不断的变革和迅猛的发展。工业生产成倍增长，农业经济空前繁荣，交通运输巨大改观。“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经济实力迅速膨胀的资本主义国家，遵循“掠夺是一切资

^① 转引自许明龙：《中西文化交流先驱》，第5页，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产阶级的生存原则”，为寻找日益增长的工业市场和工业原料，以新航路的开辟为前导，将贪婪的手伸向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强迫落后国家缔结不平等条约，甚至武装掠夺他国领土、拓展殖民地。基督教正是依恃西方列强的坚甲利兵再次来到中国，它已远非囿于单纯的宗教传入，而是先进的西方工业社会向落后的东方农业社会的全面挑战，这是一次失衡的中西文化交流。

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一方面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地反抗西方列强侵略，捍卫民族独立，使基督教传布异常困难。“中国人因败在帝国主义列强手下而深感耻辱和悲愤，反抗的烈火自然也会燃烧到与洋人同来的‘洋教’（基督教）身上”。^①而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又要反对封建专制，争取社会进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又为晚清基督教在华传播，采用明末利玛窦借助西学传教的方法提供了可能。就是在这种新的背景之下，西方文化作为传播基督教的借用工具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产生深远影响，西式学校正是西学东渐的必然产物。

传教士是香港多数西式学校的创办者，但西式学校的教学内容却由不得创办者来决定。它必须适应中华文化的特点，适应一般平民百姓的心理，适应中国向近代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只有这样，西式学校才能有它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性。19世纪香港西式学校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远已超出宗教的范围，也是中国传统私塾所无法相比的。其所设课程中、英兼备，涉及文、史、哲、理，大致有英文、拉丁文、阅读、作文、听写、翻译、算术、代数、欧几里得几何、三角、测量、常识、历史、地理、伦理等，这些课程内容丰富，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其考试方法灵活，鼓励、启发学生们独立思考。如皇仁书院1896年年终考试，作文试题为论“对外贸易的好处”，历史试题是论述“詹姆士二世为何丧失王位”，地理试题则是“比较俄法两国政体的差异”。

^① 卓新民：《宗教与文化》，第252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所有这些都使学生思想潜移默化地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马礼逊学堂的一位学生这样评论清政府：“中国不能说有一个好的政府，它与英、美或任何其他基督教国家相差很远。中国当权者有成千上万，据说，从最高层到最基层，只有极少数人在履行官职时诚实忠心，想到人民的利益，并公正地对待百姓……公认的意见是：从最高级到最低级的官员，全都是敲诈者，对他们能抓到的每一个人，都进行勒索。如不给他们行贿，几乎无一人能挣脱他的手指头而滑走。”^① 这种见识，恐怕只有胆量直言是不够的，与西学的思想文化影响密不可分。

香港西式学校的创办是为了传教，培养各类奴化了的人才。事实上，在香港西式学校的学生中，为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使中国向近代化迈进而做出贡献的人不为少数，孙中山先生便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1866年11月，孙中山先生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孙德成租种别人的田地，兼做村中更夫糊口。胞兄孙眉曾在地主家里当长工，后随亲友出国到檀香山谋生。童年孙中山在家乡参加农业劳动，备尝艰辛，且目睹封建统治下农村社会的黑暗与腐败，这使他对中国农民怀有深深的同情，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期这样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② 他10岁时，入村塾读书。两年后赴檀香山靠孙眉生活，在孙眉的资助下，他先后在英国和美国教会办的两所中学读书五年。1883年，孙中山先生回国，先后在中央书院和香港西医书院读书，孙中山先生曾回忆说：“予在广州学医甫一年，闻香港有英文医校开设，予以其学课较优，而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学校肄业。”^③ 在那里，孙中山较为广泛地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他在西医书

①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98页。

② 宋庆龄：《为新中国而奋斗》，第5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③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9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院的同学回忆说：“总理（孙中山）在院习医科五年，专心致意于学业，勤恳非常。彼于日间习读医学，夜则研究中文，时见其中夜起床燃灯诵读。但最爱读之书乃法国革命史（蓝皮译本）及达尔文之进化论，后乃知其思想受此二书之影响为不少也。”^①孙中山先生最终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其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形成与在西式学校所接受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不无关系。而受西式教育启发后走上资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不乏其人，据刘蜀永在《19世纪西式学校评价》一文中介绍，孙中山先生任临时大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中，以及1921年非常国会组织中华民国正式政府，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任非常大总统时，他的助手中不乏香港西式学校的毕业生，如：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伍廷芳、财政总长陈锦涛、外交总长王宠惠；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长伍廷芳、财政部长陈锦涛、海关总监梁瀚勋、外交司长陆敬科。

这些受过西式学校教育的人才，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兴力量，在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推动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中起到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综上所述，香港西式学校创办时受到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定限制，因而在其施教过程中，不得不广泛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思想文化，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这是西式学校创办者所未能始料的，但却是今天应当历史、客观地予以肯定的。

三、香港与西方文化的播洒

1. 中英文报刊

香港的报刊是伴随着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人侵应运而生的。早

^① 转引刘蜀永：《19世纪香港西式学校历史评价》，见《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

在19世纪初，资本主义在西方各国兴起，作为其内在的精神动力的基督新教也依势扩展。英国是当时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正锐意向东方进行殖民扩张，其国内基督教向海外传教事业也随之大兴，东来的传教士以办报、办学为重要形式，在中国周边地区进行文化扩张活动。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等在马六甲出版了第一份以中国人为对象的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其内容除浓重的宗教色彩以外，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的普及性知识也加以介绍，如论述蒸汽机、世界地理、英美政治以及华盛顿生平等。这一时期的中、英文报纸大部分是在南洋、香港、澳门和广州等地由传教士创办的，主要有：

《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1823—1826年），中文，巴达维亚（今雅加达）。

《天下新闻》（1828—1829年），中文，马六甲。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1838年），中文，广州，新加坡。

《各国消息》（1838—？），中文，广州。

《蜜蜂华报》（1822—？），葡文，澳门。

《澳门钞报》（1834—1838年），葡文，澳门。

《广州记录报》（1827—1845年），英文，广州，澳门，香港。

《中国丛报》（1832—1853年），英文，广州，澳门。

这些早期的报刊，尽管作为传教士传教的主要形式，以宗教宣传为主，但仍不失为近代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鸦片战争以后，西人办报大量增加，香港作为英国在中国首先拓展的殖民地，显示着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实力，是英国对华进行殖民掠夺和文化扩张的基地。无论是港英政府，还是商人、传教士都非常看重报刊在影响舆论、传播商业信息、扩大宗教宣传方面的作用，香港的中英文报刊陆续发行。主要有：

(1) 《香港公报》(Hong Kong Gazette, 又译为《香港钞报》)，

1841年5月1日创刊，创办人是时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代理秘书兼司库的著名传教士马礼逊之子——秧马礼逊。《香港公报》是由港英政府授权创办的，因此报刊主要刊载港英当局和英军的告示，也有一些关于广州和澳门的消息，正如其发刊词所称该报刊创办的“目的在于使英国政府官员和英国军官不时颁布的一般命令众所周知。需要时将出版增刊，刊载有价值或有意义的统计表格和其他公文”。^① 该刊半月一期，每期四页，1842年3月停止出版。

(2) 《中国之友与香港公报》(Friend of china and Hong Kong Gazette)，1842年3月《中国之友》报创刊，创刊号标明该报每周四出报。随后即与《香港公报》合并，改称为《中国之友与香港公报》，但人们仍然简称之为《中国之友》报。该报在创办初期承接了《香港公报》的办报宗旨，以刊载官方文件为主，这一点《香港公报》的创办人秧马礼逊在《中国之友》与《香港公报》合并的通告中已做了明确说明，即两报合并后，发表在《中国之友与香港公报》上所有由港英政府负责官员签署的命令和公告，都是正式文告。因此，报刊的显要位置经常刊登璞鼎查担任英国驻华全权代表、商务监督和香港总督期间的许多重要公告、法例和其他文件。至卡尔(John Carr)和塔兰特(William Tarrant)先后接办该报后，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谴责官员贪污、抨击政府腐败的文章常见于报端，为此遭到港英政府的贬斥。1860年《中国之友》报迁往广州，1863年迁往上海，1869年停刊。

(3) 《香港记录报》(Hong Kong Register)，这家报纸的前身是早于1827年11月8日在广州创刊的《广东记录报》(Canton Register，曾被译为《澳门杂录》)，这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家英文报纸，1839年迁往澳门出版，1843年迁往香港后，改称《香港记录报》，直至1863年停刊。

^① 刘蜀水：《19世纪香港主要英文报刊》，《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7期。

该报业主是怡和洋行股东、大鸦片商马地臣，继任业主斯特罗恩（Robert Strachan）也是一名大商人，由此决定了这家报纸的商业性是其突出的特点，正如该报自己所宣布的是为英商服务的报纸，且斯特罗恩自己也发誓要把该报办成一家“商业报纸”。

该报的另一特色，是刊登大量译自中文的作品，如全文翻译并连载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对于中西方文化间的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4)《德臣西报》(China Mail)，1845年2月20日创刊，最初为每周出刊一次。该报的最早业主兼主编是肖特里德（Andrew Shontrede），报纸创办初期得到过颠地洋行的支持。1856年，德臣（Andrew Dixson）成为经营该报的肖特里德公司的股东，并出任主编。1858年肖特里德去世后，德臣一度成为该公司惟一的业主，《德臣西报》即是根据德臣的名字中译而来，并沿用了一百多年，直至1967年才依据其英文原义改译为《中国邮报》，后于1974年8月停刊。

根据《德臣西报》支持港英政府的办报方针，可知该报属于追随政府一类，早期报刊内容多反映英国资产阶级对外侵略扩张的强烈欲望和殖民主义偏见。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资产阶级不满足英国政府在华侵略扩张的成果，该报发言人严厉批评英国公使的对华政策，认为参加中英谈判的英方代表放弃了英国的“权利”。19世纪末，《德臣西报》又激烈攻击香港第八任总督轩尼诗关于对华人囚犯采取人道主义的主张，甚至派记者混入监狱摸情况，指责轩尼诗对待犯人政策过于温和。该报虽曾有过激烈的反政府态度，皆因香港政府在1853—1855年时，一度把印刷《香港政府宪报》的特许权交给《香港记录报》而使《德臣西报》的经济利益受损。

早期《德臣西报》主要刊登广告、香港政府声明和公告，此外还约请一些专家和传教士撰写专稿，例如1846年7月9日刊登了《中国矿业》，1846年8月20日刊登了《三合会》，1847年

1月21日刊登了《中国财政》等。

5. 《孖刺报》(Daily Dress), 于1857年10月1日创刊, 是香港第一家重要的英文日报。该报第一个业主赖德(George M. Ryder)是美国商人, 但对该报影响最大的是创刊时任该报主编的英国商人孖刺(Yorick Jones Murrow)。

孖刺作为一名商人, 1838年来华, 在广州开设过孖刺洋行, 后来与美国斯蒂芬森洋行合伙从事苦力贩卖和大米生意, 以后又单独经营轮船队, 航行于港、澳、穗航线。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 这条航线生意萧条, 他又改行从事新闻工作, 1858年便完全拥有了对《孖刺报》的所有权, 直至其去世, 该报仍属其家属所有。

孖刺的个人经历丰富, 反映出随着英国殖民主义的扩张, 早期来华商人的性格特点。正如英国学者景复朗等在《晚清西文报纸导要》一书中所评论的: “《孖刺报》是作为一名侵华商人个人的传播媒介创办的, 孖刺是19世纪早期人们在远东遇到的个人主义的、富于侵略性的、有知识的英国人的典型。”^①为此, 《孖刺报》的特点是对香港政府腐败现象的揭露相当尖锐, 其中虽有个人恩怨的原因, 但与孖刺本人的典型性也是分不开的。

(6) 《士蔑新闻》(Hong Kong Telegraph, 又译为《士蔑西报》或《香港电讯报》)。该报创刊于1881年6月15日, 报纸译名因第一位业主兼主编士蔑(Robert Fraser Smith)而得。该报的办报方针是亲香港总督轩尼诗, 而反对其继任者宝云。相比较而言, 该报属比较同情华人一类。

(7) 各种广告报。这是应香港商人对各类经济、贸易、航运等消息的需要而产生的。香港商业繁荣, 中转贸易发达, 这类报纸所传递的信息具有重要作用。随着广告报纸的不断发展, 除各

^① 景复朗等: 《晚清西文报纸导要(1822—1911)》, 转引自余绳武、刘永宽《十九世纪的香港》, 第323页。

类商贸经济信息外，新闻专栏在各广告报纸上设立，这对其他正规的英文报纸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纷纷模仿设立。香港的广告报纸主要有：《东方世界与商业广告报》（*Eastern Globe and commercial Advertiser*, 1843年6—12月），《香港德臣杂项记录》（*Dixson's Hong Kong Recorder*, 1850—1859年），《香港记录广告报》（*The Register Advertiser*, 大约1853—1854年），《香港航运录》（*Hong Kong shipping List*, 1855—1857年）等。

(8)《香港政府宪报》（*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是香港政府的官方刊物，曾有过《国家新闻纸》、《香港辕门报》等中译名，1853年9月24日出版了第一号。在此之前，香港英国当局的文告最先刊登在秧马礼逊主编的《香港公报》上。1842年起，香港政府先后与《中国之友与香港公报》、《香港记录报》、《德臣西报》等英文报纸签订合同，授予其刊登官方文告的特许权，直至香港政府决定单独出版此报刊。

《香港政府宪报》为周刊，必要时出版增刊。宪报的主要内容有英国女王命令，香港政府公告和法例，香港立法局会议程序及表决情况，有关香港财政、海运、教育、卫生的年度报告，陪审团名单，邮局公告，气象资料等。《香港政府宪报》曾出过周末中文版（*Chinese edition*），另外还有每周单日版的《中文公告》。

此外还有：

《中国之外友》（*The overland Friend of China*），发刊于1845年8月。

《狄兴氏香港纪载》（*Dixions Hong Kong Recorder*），1850年6月至1859年1月发行。

《华人杂志》（*The Chinese Magazine*），发刊于1868年3月。

《中国滑稽报》（*China Punch*），发刊于1872年8月。

《远东》（*The Far East*），发刊于1876年7月。

《南华晨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发刊于1881年。

《香港电报》(Hong Kong Telegraph), 发刊于1881年。

综上所述, 香港早期的大多数英文报刊具有的特点之一是敢于评论时政, 抨击香港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对此, 刘蜀永在《19世纪香港主要英文报刊》中介绍说: “《中国之友与香港公报》主编塔兰特是一个有正义感的报界人士。他出身低微, 1837年来华时的身份是轮船服务员。1844年, 他在工务司负责契约注册工作时, 曾因指控总巡理府威廉·坚纵容其买办敲诈中国商人, 被解除职务。1858年夏, 律政司安士迪指责华民政务司高和尔行为不端、营私舞弊, 不宜担任高级官员职务。塔兰特在报纸上披露了调查委员会为高和尔开脱罪责的内幕, 并且评论说: 高和尔得以脱身, 是由于‘政府玩弄卑鄙可耻、糟糕透顶的阴谋诡计’。结果他以‘诽谤政府罪’被起诉, 幸亏有业已离职的安士迪代他辩护, 法庭才撤销控案。1859年8月24日, 《中国之友与香港公报》转载了卸任归国的安士迪在英国的演说词, 揭露当时香港政治腐败、官吏贪污的现象, 对威廉·坚的抨击尤其厉害。见报第二天, 威廉·坚即提出起诉。最后法院审断塔兰特罪名成立, 认为他诋毁官吏, 屡犯妨碍他人名誉罪, 应予重罚, 遂判处徒刑12个月, 罚款50英镑。塔兰特因此吃了不少苦头。他在要犯监狱坐了6个月牢, 受到特别残暴的对待。后因英国国内舆论质询, 他被提前释放。由于无力支付审讯费用, 他又被投进债务监狱关押4个多月, 直至支持他的公众捐款交纳审讯费用后才获自由。”

特点之二是十分关注中国国内形势, 编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行有关时事的报道。例如对曾经席卷中国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 有些报纸在报道中, 称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为“发逆”、“贼党”、“红头贼”。但《中国之友与香港公报》则截然相反地肯定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是有意义的, 只有推翻清王朝, 中国才能实行彻底变革。太平军攻占南京的消息, 是《中国之友与香港公报》第一个报道的。而《德臣西报》在翻译研究了

太平军的大量文件后，认为其并非以基督教为基础，因而对太平军持观望甚至抵触态度，对其攻占南京表示惊讶。至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及国防等方面，也都做了不同的宣传报道。

特点之三是作为殖民地的宣传媒介，为满足经济掠夺，殖民扩张的需要，介绍一些经常性的经济、贸易、商业、航运等信息，与此同时也能介绍一些非常普及性的西方文化知识。

鸦片战争后，香港的中文报刊相继出现，较有影响的是：

(1) 《遐迩贯珍》(Chinese Serial)，创刊于1853年，是近代中国创刊较早的中文报之一。该报“月出一册……主其事者，初为麦都思，次年复由奚礼尔(C. B. Hiuiier)所主编。一八五六年，又改由理雅各(Jame's Legge)负责。内容以阐扬教义为主，附有‘近事杂报栏’，由香港英华书院刊行。每册约一二十页”。^① 每期印数3000册，在香港及广州、厦门、福建、宁波、上海等通商口岸销售。

该报的宗旨在其《新年叩贺》中做了如下表述：“列邦之善端，可以述之于中土，而中国之美行，亦可以达之于别邦，俾各日臻于广见，中外均得其裨也。”^② 在发行报刊的三年多时间里，这一宗旨得到了较好的体现，为介绍西学和宣传中国文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麦思源在《七十年之香港报业》一文中就评价说：“理雅各通华文，译有尚书及四子书行世，每于遐迩贯珍中论及经学，孔、郑、程、朱之说粗有征引，以西方学者而能解此，亦可谓不妄自非薄者矣……而其持论雅有断制，不以放言高论为能事，则又过之也。”^③

《遐迩贯珍》发行三年，于1856年6月停刊，其中原因，有

① 廖萃：《1853年至1932年之香港报业》，引自《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第186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

② 转引自余绳武、刘存宽：《十九世纪的香港》，第328页。

③ 《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下)，第788页，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

的说是因主办人事务纷繁而停刊，有的说是当时香港“居民人口、教育程度、交通状况均未发达，尚无培育新闻事业使之发达之条件”。而更值得人们关注的是理雅各在《遐迩贯珍告止序》中所写到的：“《遐迩贯珍》一书自刊行以来，将及三载，每月刊刷三千本，远行各省。故上自督抚以及文武员弁，下递工商士庶，靡不乐于披览。然刊之者，原非为名利起见，不过欲使读是书者，虽不出户庭，而于天地之故、万物之情，皆得显然呈露于心目。刊传以来，读者开卷获益谅不乏人矣。”^①这是理雅各对《遐迩贯珍》所起作用的估价，对此本文将在后专述。

(2)《中外新报》(Hung Ngoisonpo)是第一份由中国人自己主办的，并用活体铅字排印的中文报纸，创刊于1858年。对其创办情形，有文记载：“先是香港有伦敦传道会牧师英人罗傅烈者，按照《康熙字典》译成英文，颜曰：‘汉英字典’，清《孖刺西报》(Hong Kong Daily Press)排印，书中文字为汉英合璧。书成所存汉字即等于腐物，时适伍廷芳先生由香港圣保罗书院首届毕业而出，就《孖刺西报》翻译之职，见而惜之，乃就商于该报之总理人，组织《中外新报》，所有排字派纸等事，由承批人经理。印刷及纸墨则由《孖刺西报》支出。而承批人每月纳费若干，生意盈亏承批人负责。议定，逐(遂)由伍廷芳先生承批，时在一八五七年间事也。”^②

《中外新报》始为两日刊，旋改为日刊，是我国日报最早之一种。“初办时，篇幅极狭，每日出纸一小张，约容四号字一万五千字，除广告外，新闻仅占面积三分之一，不过五千余字，另以土纸印载货价船期一页，名曰行情纸随报派送，年收报费三元。其时侨商甚鲜读报，大抵多订阅行情纸，主报事者乃收半价

^① 转引自余绳武、刘存宽：《十九世纪的香港》，第330页。

^② 廖萃：《1853年至1932年之香港报业》，引自《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第191页。

以便阅者焉。至光绪中，如扩充篇幅为两页，分类记事，有曰‘京报全录’，则清廷谕旨暨各省奏章属之；有曰‘羊城新闻’则督抚辕门抄，暨各衙署批示属之，闲附以民间琐事；有曰‘中外新闻’，则事之不能列入京报与羊城新闻者属之。各类新闻之标题甚简略，大都如火警、盗窃、物妖、诙谐等。主笔政者每有论著，不直指时事，一托以寓言，劝惩之旨，往往而见”。^①

该报不仅内容丰富，且于商贾、庶民非常实用，销售方法灵活，适于阅者需要。该报还“特辟谈瀛、粤声”等专栏，因此，除在香港地区外，还“大为粤人所欢迎”，销路也略增。该报出版发行61年，至1919年停版，实为中国近代报纸之元祖。

(3) 《华字日报》创刊于1864年，为《德臣西报》的中文版，创办者为《德臣西报》译员陈葛廷。“陈氏邃于国学，因鉴香港割让于英以后，华人以得为买办通事为荣，不特西学仅得皮毛，且将祖国文化视若陈腐，思借报纸以开通民智，乃辗转向教会西人购得旧铅字一副，编辑陈氏自任之，印刷发行由德臣报任之。初创时，篇幅甚小，仅及今日该报四分之一。其取材亦不外翻译西报及转载京报而已”。^②

甲午战后，《华字日报》承办人几经交易至潘兰史时，“常著论助政社会，主持清议，于港官拟设夜纸、及晨早查屋等事，著论力争。旅港十余年，倡立戒烟会、不缠足会、及仁智书栈等，以觉世变俗为己任”。^③

《华字日报》在报馆失火之后，便另立门户，不再作为《德臣西报》附属的中文版，且继续出版，成为港报之最久者。

(4) 《循环日报》是第一家由华人出资主办的报纸，创刊于1874年2月。有文记载其创办情形云：1873年，王韬等人“筹

① 《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下)，第789页。

② 同①，(上)，第20页。

③ 《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第193页。

资二万一千元，承买英华书院印务傢私，计十六度平板印机二事，英文字颗一套，创设中华印务总局，雇工自制钢字模，铸制各种字颗花边等工具，以营印刷业。旋创行日报，号曰‘循环’。延王氏总司厥事，由洪干甫君及五代之婿吴兴茂才钱征（字昕伯）者辅之。钱氏盖奉《申报》主人美查（西人）之命，赴港调查报务，以资借镜者也，溯循环报之出也”。^①

王韬创设《循环日报》之时，已游历欧洲、短居日本，且置身香港，透析西方报纸社会功用：“西国日报之设所关甚巨。主笔者得持清议于朝纲国政，颇得参以政权。阅之，足以知民情之向背，习尚之好恶，风俗之浇醇，国计之盈虚，时局之盛衰，兵力之强弱。”^② 并且主张办报当“凡时势之利弊，中外之机宜，皆得纵谈，无所拘制”。^③ 因此，《循环日报》“区为三栏，首栏曰‘选录京报’择刊各省重要奏章及清廷命令，字约千余；次栏为‘羊城新闻’，除择录督抚辕门抄，及各署批示外，尚有街谈巷议数则，字数约六千余；又次为‘中外新闻’栏，首冠以论说一篇，字数约一千，继以翻译及各埠时事”。^④ 这些栏目所载内容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尤其是该报按日出版，冠首一篇论文，成为其一大特色。这些论文多出自王韬之手，评议国内外之事，介绍西方各国状况，“取西制合于我者，讽清廷以改革”。这些政论文大多是对内提出变法自强，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在海内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王韬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报刊政论家。

《循环日报》在王韬的主持下，一改柏城派古文风格，以“辞能达意为主”。如王韬所言：“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

① 《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第193页。

② 转引自余绳武、刘存宽：《十九世纪的香港》，第333页。

③ 同②。

④ 同①，第194页。

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言，斯即佳文。至其工拙末也。鄙人作文，穹秉私旨、往往下笔不能自休。若于古文辞之门径，则茫然未有所知……”^① 王韬所主张的文风，最适于报道文学，真实，直率，王韬又因此被称为中国报道文学的先驱。

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在港所办的中文报纸与战前有着明显的不同，报刊内容已不再仅仅是宗教方面，大多增加了类似科普知识，商业信息和文化类的内容，“各国近事”、“商业”、“科学”、“天文地理格致之学”等成为必备的栏目。这些内容使中国人更多地了解各国情况，从封闭中走出来，起了积极的作用。这种内容的变化，除了中国人对异教顽强抵抗的社会心理迫使传教士不得不改变其文化扩张的策略以外，还在于东西文化的交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除此之外，中国人自办的中文报纸的内容和形式为日益增多的中国人所接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

2. 传教士在港出版的中文图书

鸦片战争后，随着近代报刊的发展，图书出版在 19 世纪 60 年代以前是以传教士为主。根据熊月之的统计，传教士们 1843 年至 1860 年间出版的中文图书，纯属宗教类的 37 种，占出版物总数的 61.7%，属学校教科书，字典、年鉴等类的有 23 种，占总数的 38.3%。在非宗教类图书中，年鉴 10 种，教科书 4 种，数学 2 种，字典 1 种，地理 1 种，语言 1 种，年历 1 种，杂志 1 种，日用书 1 种。其中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的书籍不多见，但有一些初级性知识读物。

^① 谢无量：《王韬——清末变法论之首创者及中国报道文学之先驱者》，见《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上），第 320 页。

年鉴类中的《华番和合通书》，为美国传教士波乃耶（Dyer Ball）所编，每年一册，从1843年至1853年，连续出版，后迁至广州、澳门出版，至1865年停刊。创刊时名为《华英和合通书》，第二年改称《华番和合通书》。年鉴所含内容有中西历对照、中西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方面的大事，中国与英、美、法等国所订条约也刊载其中。每册含量不一，多则近百页，少则一二十页，通常在书后附一些地图。此书较早地出刊于鸦片战争后，对于还不知晓国外情势的国人来说，是较为重要的参考书。

教科书类中有理雅各于1856年出版的《智环启蒙塾课初步》、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英国传教士）于1857年和1860年出版的《千字文》、《幼学诗释句》、《四书俚语启蒙》。其中，理雅各出版的《智环启蒙塾课初步》是其执教英华书院时所编的教科书，内容分为人类、国政、贸易、居住、饮食等24类，英汉对照，上书英文，下译中文。1859年删掉英文后在广州重版，1864年经理雅各修改后于香港再版。此书深受欢迎，被许多学校应用，也曾流传至日本。

数学类有蒙克利（Edward T. R. Moncriff，英国传教士）于1852年出版的《算法全书》，洪约翰（英国伦敦会传教士）于1855年出版的《设数求真》。其中蒙克利出版的《算法全书》是其任教于圣保罗书院时所编的教科书，基本内容为数的概念，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分数、小数、比和比例等，书末附练习题答案。此书使用西方数学体系编写而成并出版，在当时颇有影响。

《地理新志》也是英国传教士罗存德编著的，1855年出版，全书19页，与他在序言中所述的理论严谨、内容丰富有所差距。此书只简单地论述了一些地球理论，如地转动、地昼夜等，还较为详细地叙述了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情况，并附带地图。虽然如此，它对于转变传统的舆地观是有积极作用的。

《英粤字典》，洪约翰编，1859年出版。是在原《初学粤音

切要》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以广东话与英语相对照，用罗马字注音。后来又经重印改名为《粤语袖珍手册》。

从以上情况看，鸦片战争后到 19 世纪 60 年代间，西方图书在香港的传播，主体是传教士。这主要是因为西方的文化扩张并没有像军事侵略那么卓有成效。悠久的中华文化，有着几千年始终不曾中断的文化传统，对于伴着枪炮和耻辱而来的西方文化表示了极大的抗争。在香港和五口通商城市，人们最初也多是以民族的感情去看待西方文化，极少主动关注西方，传教士们只得一厢情愿地进行图书的出版与传播。

从图书的主要内容看，绝大部分是宗教方面的，这是其文化扩张的必然。然而掌握着传播内容的传教士们，不得不正视中华文化巨大的抵制力，于是调整对华文化扩张政策，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翻译西书，开启民智，结交上层成为传教借助的途径。因此，涉及天文、医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方面知识的图书随之介绍进来。

3. 《遐迩贯珍》等出版物对西学的介绍

《遐迩贯珍》以它丰富的内容介绍成为 19 世纪香港影响较大的中文刊物，它所刊登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文章内容广泛，由以下篇目可见。

内 容	篇 目
政治学	《英国政治制度》《花旗国政治制度》
文 学	《伊娑菩喻言》（《伊索寓言》）米里顿的《乐园之失》 （弥尔顿的《失乐园》）
历史学	《英伦国史总略》《马礼逊传》《佛国烈女若晏记略》（圣女贞德传）
地质地理学	《地形论》《地质略论》《地质论》《磐石方位载物论》 《彗星说》《西程述概》《地理撮要》、《地理全志》

内 容	篇 目
天文学	《彗星说》《地球转而成昼夜论》
工 业	《火船机制述略》《玻璃论》
医 学	《身体略论》《全身骨体论》《肌肉功用论》《脑全体之主论》《泰西种痘奇法》
物理学	《热气理论（论冷热表）》 《热气理论（论热长物）》
生物学	《生物总论》
灾害学	《补灾救患普行良法》

《英国政治制度》一文，扼要地介绍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阐述了英国君主、公侯院（上院）、绅士院（下院）和宰辅的权限及相互关系。文中指出：英国制定法律，“必归君及公侯、绅士二院，三者皆允合，始能创立”。英国君主决定国家大事，“须听宰辅佐论参评”，“不能任意独行”，“不能逾乎法之外”。“国中政治，悉统持于内阁”，但公侯院有权“议处宰辅”。文章结尾说：“虽此政制，或未能得美备万全，然屡欲更求逾于此者，竟不可多得。”并希望“中土人能同由斯道，而共沾斯益”。^①

《花旗国政治制度》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美国国主（总统）和选举院（众议院）、辅赞院（参议院）的产生办法及权限。并将英、美两国政治制度加以比较，指出：两国“政制大略相同。两国权柄，皆由庶民所出，所秉权者，俱为国例所钳来。无论官民，悉为例范围。但两国亦有区别之处。一则合郡，国主为民庶推举践位，在位限以四年为期；而英国嗣裔继绳，绍传递及，践阼则终身在位。两法各有其善。合郡国法终乃能得长材绝诣之

^① 《遐迩贯珍》1853年10月第3号，第6-9页，转引自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第329页。

人，英国法似较妥静，免每期推选之时，纷纭更张，人心摇动，改变常度，停搁生计也。次所区别，则英国凡有所才能出众，能勤劳有裨益国家者，国主封赐以爵，而合郡国不然。在彼国想以此制为尽善，在英国则以无此制为欠缺也。合郡国人每云，毋论何人，皆属平等，不应偏有超越，庶类众生，均如一体”。^①

《火船机制述略》论述了轮船运输之便捷，绘图说明了蒸汽机工作原理。《地形论》以实例论证了地圆说，纠正了中国人传统的舆地观“天圆地方”说。《彗星说》介绍了有关彗星的科学知识，批驳了彗星为“灾氛预兆”的说法。

这些文章所介绍的内容，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是全新的。其中所介绍的国家权柄皆由庶民所出的思想，在中国宣传了几十年，直到19世纪末才由资产阶级改良派明确提出来。可见其大大地开阔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眼界，促进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形成。那些有关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介绍，无疑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4. 香港西方文化对晚清社会的影响

香港不仅经济繁荣，贸易发达，而且是西学东来的必经之地。在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统治下的香港，逐渐形成了以商业资产阶级为主体的近代资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变法维新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良好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香港西方文化的影响，又使得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此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王韬这位改良主义的思想家，不仅看到了香港的繁荣和飞速发展，更透过这些深刻地看到：“地之盛衰何常，在人为之耳。故观其地之兴，即知其政治之善，因其政治之善，即想见其地官吏之贤。”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为曾游历香港，这对他的影响，可以说深远至促其向西

^① 《遐迩贯珍》1854年1月第2号，第2—5页，转引自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146页。

方学习，变法维新思想的形成。如他所说：“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孙中山先生在介绍他“于何时及如何而得革命思想及新思想”时说：“我之此等思想发源地即为香港，至于如何得之，则我于三十年前在香港读书，假时则闲步市街，见其秩序整齐，建筑闳美，工作进步不断，脑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我每年回故里二次，两地相较，情形迥异香港整齐而安稳，香山反是。我在里中时竟须自作警察以自卫，时时留意防身之器完好否。我恒默念：香山、香港相距仅五十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间在一荒岛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乃无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①正是这些深刻的感受使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比较、选择，在思考中肯定了比封建专制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

香港不仅影响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而且也是他们变革社会、进行革命实践的重要基地。众所周知，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自兴中会成立后就连续发动武装起义，至武昌起义前的16年中，孙中山直接策划的10次南方武装起义，有6次是以香港为基地筹备的。这6次武装起义（1895年广州之役、1900年惠州之役、1907年潮州黄冈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1910年广州新军之役和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中，香港的作用在黄花岗起义中最为显著。黄花岗起义爆发于1911年4月27日（夏历三月二十九日），又称“三二九”之役。因死难烈士葬于黄花岗，故又有黄花岗起义之称。是役，同盟会依托香港远离清王朝统治和多方而的便利条件，完成了起义的重

^① 转引自刘蜀永：《从香港史看西方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史学集刊》1991年第2期。

大决策；在该地设立了统筹部，使香港成为武装起义的指挥中心；革命党人将各地筹款集中，分配经费，购买武器，制造弹药，继而又将武器由香港运发广州，使香港成为武装起义各项筹备工作的中心；多方招募、组织、联络武装力量，使香港成为武装起义的组织中心；起义失败后，香港则是革命党人躲避清廷搜捕、保存革命实力的后方基地。由此可见，香港与黄花岗起义乃至整个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武装起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辛亥革命的历程是坎坷的。1910年，新军起义又遭败绩后，是年11月13日，在黄兴的建议下，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导人和同盟会南洋代表在槟榔屿召开会议，布置起义的具体工作。决定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之下再次起义。会议鉴于以往起义的经验，选定香港为筹备起义的基地。这主要是由于在此一方面可以躲开清军的查探，使筹备工作安全、保密，以免事发导致起义计划的破产；另一方面，香港的地理环境非常有利，便于与广州联系；同时也利于在海外募捐，购买武器，筹集物资，一旦举事，进退都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槟榔屿会议以后，除孙中山继续在海外活动外，其他革命党人陆续向香港集结。“十一月，赵声即还香港”。“及十二月中旬，黄兴自南洋归”，来年“正月中旬，胡汉民亦至香港。其时长江各省及闽、桂、日本各同志多到”，^① 起义工作进入了紧张的筹备阶段。

第一，设立指挥中心。黄花岗起义是集同盟会全党力量的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革命党人抱着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的坚定信念，把建立一个掌握全局，指挥有力的核心机构作为关乎成败的重大任务。1911年1月18日，黄兴抵达香港。月底，同盟会在香港跑马地鹅井35号设置了起义领导机构——统筹部，统揽一切计划。

^① 邹鲁：《广州三月二十九日起义经过》，《革命文献》第67辑，第215页。

第二，设立实行部，专门制造起义时所用的炸弹，并准备暗杀用具。炸弹杀伤力大，造价低，为了减少开支，革命党人以炸弹为主要武器，并在统筹部八课之外另设实行部，专门制造。实行部设在香港百花街，由方声洞等人负责，其中有徐宗汉等女同志参加。他们购买弹壳，自制炸药，并在九龙海边荒滩地进行试验。

第三，募捐筹款。槟榔屿会议后，黄兴、胡汉民、邓泽如等亲赴南洋各岛，日夜兼程，四处募捐。旬日内黄兴往返东海两岸、南洋诸岛。初时募捐工作十分困难。黄兴每到一地，演说鼓动，泣血陈情，众多华侨为之所动，毁家纾难。据蒋永敬《辛亥革命十次起义经费研究》，一文统计，辛亥革命前十次起义经费约为六十余万元（多为港币），其中广州起义所募费用约占四分之一多。其“百分之百来自华侨的资助”。香港的众多华侨更是慷慨解囊，“富商李纪堂曾捐献数万元”，“一些店员和工人，捐出一两个月的薪水，视为常事。尤以三十岁左右的华侨青年，不仅踊跃捐助，且最努力奔走劝募”。至起义前夕，经费所需尚欠2万元。香港同盟会员李海云时任文咸街同源汇兑业商店经理，获悉起义计划遭遇困难后，毅然将店内之存款2万元全部提出，作为购置军械之急需。^① 经过艰苦努力，革命党人在安南及暹罗、加拿大、荷属南洋、檀香山、旧金山、缅甸、纽约、芝加哥、波士顿、日本、南美、澳洲、菲律宾等地募捐的经费共计超过18万港元，由各地陆续汇至香港。

第四，购买转送武器。黄花岗起义经费主要用于购买枪支弹药，按计划在香港购30余支，从日本和西贡等地购得枪支780余支。除在香港者外，其他各地购得的枪支、弹药皆先运至香港，然后再通过各种渠道运进广州。

这是一项非常艰巨和危险的工作，革命党人为此想尽各种办

^① 冯自山：《革命逸史》，初集，第216-217页。

法。他们在香港鹅头桥设立一家头发公司，在广州又设立两家分公司，用小包饰为头发运送子弹，由少续多，几次运送都顺利成功。也有一些枪支被藏在铁床装台及花盆内运进广州。还有的由伪装成巨商的革命党人杨光汉乘广大、金山轮船，智过海关，安全运进广州。据曾亲自参加购送枪支的黄兴之子黄一欧回忆：“辛亥年春，我仍在东京东斌学校读书，寄居宫崎寅藏家里，也参与了购运军火的活动。约在农历正月底，通过宫崎寅藏的内弟前田九二四郎的介绍，向日本人仓地铃吉买到一批枪弹；买到之后又要我负责运往香港。我冒充宫崎龙介（宫崎寅藏长子），穿着和服，讲一口日语，同住在宫崎家里的日本浪人龟井一郎一道，将几十支手枪和万余发子弹装在四口皮箱内，搭一艘外国邮船运到香港，交给统筹部。”^①

第五，组织起义队伍。按照槟榔屿会议确定的起义方针，运动新军作为起义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并由调度课负责运动及联络。起义之前，就队伍的组织问题，黄兴等人甚为重视，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除新军之外，也加紧对巡防营、民军等的工作，以期三军联合，一举成功。同时“鉴于历次军队、民军发难时生困难，若非有一部义勇之士，发难领导，实无以奏圆满之效”，决定到各省选拔英勇善战之士组成先锋队。初定选拔500人，后增至800人。为在起义前避开清军耳目，保证起义如期进行，这些先锋队队员“先集香港，临期进省”，^②在香港整装待命。

正是伴随着在香港各项筹备工作的紧张进行，黄花岗起义进入了实施的阶段。

1911年4月初，起义的各项筹备工作大体就绪。4月8日，统筹部在香港召开“发难会议”。会议决定以4月13日为期，分十路进攻，赵声为总司令，黄兴副之。发难会之后，到港集中的

^① 黄一欧：《黄花岗起义亲历记》，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藏稿。

^② 邹鲁：《广州三月二十九日起义经过》，《革命文献》第67辑，第227页。

起义力量分批潜入广州，届时举事。

由此可见，香港作为武装起义的后方基地，在黄花岗起义中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兵力储存方面更为显著。进，可以迅速增派力量；退，可以在港整装待命。起义失败后，香港又使遗留下来的革命党人有了蛰伏之地，为今后的革命保存了火种。

在香港较好的医疗条件和环境中，受伤的志士得到及时治疗。黄兴住进雅丽氏医院后，根据医疗规定，手术需家属签字，革命党人徐宗汉以其妻子名义签字，手伤顺利医治，此后引来他们美好的姻缘。

到港的起义志士也由庶务部酌发川资分别遣散。在广州，一些前来参加起义的外省外乡革命党人，他们操异乡口音，多无发辩。为了减少其处境的危险，香港派入到广州对他们进行妥善安置，及时遣散。香港同盟会还支付专用经费抚恤烈士遗属。

对其他善后事宜，香港也派人专门处理，转移、隐藏那些未被发现的武器，对原来没有暴露的机关迅速迁移。所有这些，都是为“遮港探之耳目……可留为后图”。^①

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但革命党人的意志并未消弥，他们聚集香港，对起义得失进行翔实分析。黄兴住院治疗手伤之际，坚持用左手执笔写了《致海外同志书》。在书中，他分析了起义失败的原因，并表示“今手足虽疮疾，大约两礼拜即可就痊，报吾良友之仇迹近”。随后，黄兴、胡汉民联名书写《广州三月二十九之役报告书》，对起义全过程以及善后事宜和失败原因等一一汇报，并抄寄海外各支部。革命党人在香港反思黄花岗起义得失的同时，又在酝酿着更为猛烈的武装起义。及数月之后，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的反动统治终于倾覆了。

^①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编，第343页。

四、《资政新篇》与香港

1. 洪仁玕与香港

《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后期的重要文献，它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的经验，提出革新政治、变革文化，发展资本主义的施政纲领，鲜明地反映出在晚清西学东渐的大势之下，西方文化对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影响。它的撰写者是太平天国著名领袖洪仁玕。

洪仁玕（1822—1864年），字益谦，广东花县人。太平天国将领洪秀全的族弟，早年科场落第。“自幼读书，至二十八九岁，经考五科不售”，^①常指斥社会时弊。他是最早接受洪秀全拜上帝宗教宣传，只拜上帝，不拜孔子的。但他却仍执教私塾，没有参加洪秀全早期的宣传、组织活动。1851年，洪秀全率众金田起义，洪仁玕几次投奔未成，为躲避清政府的抓捕，不得不四处流亡。1852年4月，他随一位远亲逃到香港，接受了瑞典巴色会传教士韩山文（R. T. Hamberg）的洗礼，数周后到广东东莞教书为生。1853年11月，洪仁玕再次来到香港，一面教外国传教士学中文，一面研究基督教圣经。1854年春，他离港赴上海，准备前往南京投奔洪秀全，未获成功，只得滞留上海跟外国传教士学习天文历数。当年秋天他又返回香港，认识了英国伦敦传道会的理雅各。1855—1858年，他受聘为伦敦会传道士和辅导教师。这一次他在香港连续居留达四年之久，直至1858年秋才离开香港，几经风险于翌年4月到达天京。洪仁玕的到来使洪秀全“格外欢喜”，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异常信任，并委以重任，先后封为干天福、干天义、加九门主将衔。不到一个月，又晋封为

^① 《戊戌变法》，第2册，第18页。

“大国开朝精忠军事顶天扶朝纲干王”，总理全国政事。洪仁玕临危受任，励精图治，根据太平天国面临的局势和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大势，特别是他在香港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认识，提出了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政治纲领《资政新篇》。当时，清廷大军重重包围天京，太平天国政权也因其自身的性质而无法摆脱小生产者的局限，这些使《资政新篇》的主张没能、也不可能付诸实施。1864年7月天京城破，洪仁玕保护幼天王出走江西，不幸被俘，11月在南昌慷慨就义。但是《资政新篇》代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农民阶级对封建专制的批判和否定，标志着中国农民阶级向西方学习、探索救亡图存的最高水平。它的产生是因为洪仁玕在香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从而奠定了其文化基础和思想基础。而香港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洪仁玕政治方案中思想酝酿的必要经济条件。可以说，《资政新篇》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香港酝酿成熟，而后移植中国内地的思想之花。

在洪秀全带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浴血奋战、建都天京、苦战清军重重围击、又经天京内讧的巨大苦楚的艰难历程中，洪仁玕几度投奔天京未成，最终留居香港，但在他的内心里信念和斗志没有泯灭，他总是想着“学了本事，将来辅佐他（洪秀全），就回广东，到香港洋人馆内教书，学天文地理历数医道，尽皆通晓。洋人知道是老天王之弟，另眼相待。住香港四年，故与各头目多半相识，其国中体制情伪，我亦尽知”。^①因此，他能够潜心钻研西方文化，通过香港来认知世界的发展。

洪仁玕在香港与外国人士的密切交往是他学习西方文化的重要途径。据洪仁玕在《资政新篇·法法类》中提到的与之交往密切的英、美、德国人士，就有二十余位，他们是：“理雅各、洪孖士、米士威大人、俾士、合信、觉士、滨先生、慕维廉、艾约

^① 萧一山：《清代通史》（三），第285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瑟、韦律、罗孝全、裨治文、花兰芷、高先生、晏先生、赞臣先生、寡先生、黎力居、韦牧司、叶纳清、韩士伯”等。他们中传教士居多，其中不乏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例如，理雅各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人们早已熟知的主要人物。合信（1816—1873年）是英国伦敦会传教医师，早年就读于伦敦大学医科，获学士学位，1839年来华。曾在广州、上海等地开设诊所、医院，将西医学介绍至中国，编有中、英文著作21种。其中《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博物新编》、《妇婴新说》被后人合编出版，他是与伯驾、嘉约翰齐名的著名医生。又如裨治文（1801—1861年）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1830年第一批被派赴中国。1830年到达广州随马礼逊学习中文，1832年，在广州创办第一家英文报刊《中国丛报》（《澳门月报》），自任总主笔，直至1847年。裨治文在华主要进行组织、教学和翻译工作，曾与他人合作完成了圣经的汉译。

在香港期间，洪仁玕被长期聘为伦敦传道会的辅导教师，“Catechist”英文注释词意为“taught by the question - and - answer method”，意为“问答式教学者”。这就是说，他在伦敦会做辅导教师时，经常可以与人交谈，这无疑会为他向外国人士了解西方社会、学习西方文化提供便利的条件。为此，洪仁玕在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方面，深得外国人士的赞扬，亲身参加太平天国革命的英国人吟俐称赞他对西方的科学与文明“无不通晓”。理雅各在《传道杂志》（Missionary Magazine）上对洪仁玕作如下评价：“他的文学造诣令人钦佩。他性情和蔼亲切，思想豁达，为中国人所少有。”^①英国翻译富礼赐在拜会洪仁玕后说道：“我不能不承认，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开通的中国人。他精通地理，对机械学有所了解，又承认西方文明之优越性。”^②

① 转引自刘蜀永：《〈资政新篇〉与香港》，《浙江学刊》，1991年2期。

② 同①。

阅读书刊是洪仁玕在香港学习西方文化的间接途径。洪仁玕在香港居留的几年里，香港已有数十所西式学校，传教士在香港出版的一些知识性读物也占出版物总数的40%，这些无疑是洪仁玕拓宽视野的最好资料。如前文已经提到的中文月刊《遐迩贯珍》，经常刊登介绍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文章，内容广泛，如政治学方面的有《英国政治制度》、《花旗国政治制度》；历史学方面的有《英伦国史总略》、《佛国烈女若晏记略》（即圣女贞德传）、《粤省公司原始》；文学方面的有《伊索寓言》和弥尔顿《失乐园》。此外还登载过有关地质、地理、天文、生物、医学、物理、工艺方面的许多文章。《遐迩贯珍》在香港出版期间，正值洪仁玕在港长期居住，作为该刊主编理雅各的朋友，特别是作为学习西方文化、了解西方情况的有心人，这样一份介绍西方文化、国情的百科之窗，无疑是洪仁玕最喜爱的书刊，也是他汲取西方文化知识的又一来源。

洪仁玕在香港生活的年代，香港已置于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之下，按照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迅速形成为繁荣的商业港口城市，这主要表现在：

轮船运输业迅速发展。香港地区的轮船业出现于19世纪40年代，主要是英、美洋商的轮船往来运输。1853年香港建造的第一艘轮船“皇后”号试航，至1854年下半年，由于响应太平军的红巾军到达广州附近，往来于穗港的帆船业几陷停顿，香港的轮船业值此更加快速发展。1854年有“安尼”号，1855年有“河雀”号、“威拉麦特”号、“伊格尔特”号，1856年有“飞马”号，此外还有“云雀”号、“百合花”号、“蓟花”号、“鞑靼”号、“浆草”号、“玫瑰”号等新轮船加入省港航线，使省港的运输业达到鼎盛时期，并为香港对外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必备的运输条件。

金融业初步发展。1845年，丽如银行（Oriental Bank）在香港、广州成立了支行，并在香港开始发行纸币。随后，有利银行（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 London and China）、麦加利银

行 (Charter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and China) 先后于 1857 年和 1858 年在香港设立分行。银行的出现, 为对外贸易及商业融通资金提供了便利。

邮政畅达。1842 年, 香港已经有了邮局。1849—1859 年, 大英轮船公司已有邮轮在省港间装运邮件、货, 并在香港和汕头、厦门、福州间试航。1853 年, 香港和欧洲间也有了两周一次的邮船。有关领取邮件的公告也经常刊登在《香港政府宪报》上。邮政的畅达, 使通邮地区间的联络、信息沟通变得快捷。

商业繁荣。英国殖民主义割占香港后, 在港的华人开山辟路, 为香港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港督德庇时谈到此时, 也不得不承认: “过去 18 个月 (1844 年 10 月至 1846 年 4 月), 公私建设及翻修进展的速度确实惊人, 但若无有技巧, 价廉的中国工人可供雇用是难以实现的。”^① 到 19 世纪 40 年代末期, 香港城市建设已初具规模, 座座楼房竖起, 新建商店林立, 中外商贾云集。到 1858 年时, 香港已无空地可售, 致使来港中外人士无处安置, 为此港英政府提出填海造地计划。

市政建设迅速。从 1851 年至 1860 年的几年时间内, 市政建设快速, 先后建成东面自雅宾利货仓至湾仔的道路; 安装了市街的油灯; 建成上环、中环、下环、太平山四个商场; 建成太平山、东街、中街、西街、西营盘、山顶道等街道; 南面扩建了至香港仔的道路。同时这些新设施的供水、管道等都配套安装完整。

洪仁玕置身于繁荣发达的香港, 耳闻目睹, 感觉到香港与仍处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下, 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之下的内地形成强大反差。这段经历应当是他受西方文化影响, 思想转变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资政新篇》的主要内容正是他细心观察, 融合中西文化而形成的, 而其中所体现的新的社会

^① 转引自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 第 241 页。

理想和新的价值取向也正是他在中西文化对比中思考与选择后而铸成的。

2. 西方文化对《资政新篇》撰述的影响

《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后期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它提出的发展方案，具有鲜明的西方近代化色彩。应当说，这个方案的提出，与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本身没有直接的内在联系，而是西方文化对洪仁玕撰写《资政新篇》产生了直接影响。至于洪秀全能够旨准颁刻《资政新篇》，并不表明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主导思想的转化和让位，它表明的是，中国农民革命运动并不拒绝东渐而来的西方文化，因为文化是超社会结构的，是人类群体谋生存求发展的经验总结，是人类共同财富。文化交融只会促进人类群体的亲和与共同发展。同时也表明人类社会向近代化方向发展是历史的必然。

《资政新篇》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它超越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局限，追求的理想社会不再是“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平均主义农业社会，而是充满生机活力、飞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理想追求，是洪仁玕将他熟知的中国社会与西方各国的情况做了鲜明的比较而得出的。他在《资政新篇》中以很大的篇幅介绍了欧美以及波斯、埃及、日本、印度等国盛衰荣辱的概况，他举例说俄国虽比中国广大，但也曾屡遭英、法、德诸国压迫，后来其年青的沙皇彼得装扮成平民，到西欧留学，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回到俄国后大兴政教，声威日著。由此，他深刻地认识到，历史发展的大势不可逆转地向着资本主义的方向，只有顺应时代潮流和历史发展的趋势，才能“太平一统江山万万年”。由此《资政新篇》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方案，通篇提出 28 条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的建议，内容包括兴建近代工业、农业、商业、科技、文教等诸方面，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

政治上，提出禁朋党之弊，反对结党营私，拥兵自重，主张革新政治，广开言路，沟通上下。主张发行报纸，设立选举箱，使“上下情通，中无雍塞弄弊”，“不致上下梗塞，君民不通”；主张“设新闻馆以收民心公议及各省郡县货价低昂、事态常变”，“兴各省新闻官，其官有职无权，性品诚实不阿者，官职不受众官节制，亦不节制众官，即赏罚亦不准众官褒贬。专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篇有招牌图记者”；甚至对至高无上的天王提出“自今而后，可断则断，不宜断者付小弟掌率六部等议定再献，不致自负其咎，皆所以重尊严之圣体也。或更立一无情面之谏议在侧，从辅圣聪不违”。^① 这些主张与洪仁玕在香港有过亲身经历密切相关。

洪仁玕在港期间，英文报刊已有数家，其言论公开，虽有港英政府不断施加压力，但仍时常发文揭露政府官员劣迹。这些都使在港的洪仁玕认识到新闻事业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新闻报纸来监督官吏。

经济上，洪仁玕提出仿效西方国家“准富者请人雇工”，准许私人投资，主张大力兴办近代工矿交通事业，设立邮局，兴办银行，开办保险事业，并奖励发明创造。例如对交通运输业，《资政新篇》里规定：“兴舟楫之利，以坚固轻便捷巧为妙。或用火用气用力用风，任乎智者自创。首创至巧者，赏以自专其利，限满准他人仿做。若愿公于世，亦禀明发行。兹有火船气船，一日夜能行二千余里者，大商则搭客运货，国家则战守缉捕，皆不数日而成功，甚有裨于国焉。若天国兴此技，黄河可疏通其沙而流入于海，江淮可通有无而缓急相济，要隘可以防患，凶旱水溢可以救荒，国内可保无虞，外国可通和好，利莫大焉。”洪仁玕置身于交通运输发达、商业贸易繁荣的香港社会之中，亲身感受其盛况之后描绘了他理想社会的经济发展的宏大规模，这种经济的发展是与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社会鼓励竞争、奖励发明创造、

^① 《资政新篇》，《太平天国》第2册，中国史学会主编。

提倡对外开放紧密相联的。

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提出办学校，建医院，主张发展救济事业，禁食鸦片，改革社会陋俗。特别奖励慈善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以拯困扶危，救济疾苦。他指出：“兴医院以济疾苦。系富贵好善，仰体天父、天兄圣心者，题缘而成其举。立医师，必考取数场然后聘用，不受谢金，公义者司其事”。“外国有兴保人物之例，凡屋宇人命货物船等有防于水火者，先与保人议定，每年纳银若干，有失则保人赔其所值，无失则赢其所奉。苦失命，则父母妻子有赖，失物则已不致尽亏”。

对外关系方面，提出与外国通商，开展文化交流，欢迎外国人前来传授工艺技术和传教，但坚决不许干涉中国内政，对于“技术精巧、邦法宏深”的外国人，“准其为国献策，不得毁谤国法”。

《资政新篇》提出的各项措施，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按照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提出的。尽管它还很不完备，还存在重大的局限，但它毕竟是近代中国最早提出的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系统著作和大胆设计，顺应了世界发展的潮流，也符合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洪仁玕学习西方思想的形成与魏源等人基本是处于同一时代，但《资政新篇》提出的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魏源等“师夷长技”的主张所无法比拟的。《资政新篇》的许多内容和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张相差无几，但在时间上，却比维新派早了二三十年。更重要的是，《资政新篇》是在否定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反侵略反封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革故鼎新”思想指导下提出来的，与魏源的“气化变”“势变”而“道不变”、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都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它糅合了中西文化，在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第六章 中美文化交流

一、中美文化的接触

1. 第一部介绍美国史地的中文著作

中美两国人民的交往始于美国独立之后，以 1784 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来华通商贸易为其标志。1783 年，英国签订《巴黎和约》，正式承认北美 13 个殖民地脱离英国独立，美国成为美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然而，独立后的美国，因战争的耗费，经济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对外关系也因各国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惧怕和抵制而难以开展。新兴的资产阶级通过战争和走私活动聚敛了大量财富，但并不甘心囿于欧美市场内，中国便成为他们经济扩张的目标。

1784 年 2 月 22 日，由费城大商人罗伯特·摩理斯出面联合纽约几位商人共同投资购置的“中国皇后”号，由纽约港出发，航行 6 个月后，于 8 月 24 日抵澳门，28 日到达广州。当年 12 月 28 日自黄埔港起航返美，历时近半年，于 1875 年 5 月 11 日到达纽约。这是美国首次来华贸易，从商业的角度看，这也是一次成功的贸易。商船满载美国的土特产品而来，人参、毛皮、香料、精纺细纱棉布在广州很快就销售罄尽，并装着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漆器、精美的象牙雕扇等满载而归。富有头脑的贸易商，在商船抵达之前，已打出了诱人的广告，从中可见漂洋西去的中国物产何等丰盛。有“整箱装、半箱装和四分之一箱装的上等新

红茶；各种瓷器；各种不同质地、颜色，适合做夏季男衬衣的缎织品、丝织品、波斯绸和波纹绸；南京土布；绣金像和有珠扣的精美缎鞋；最优质的羊羔皮；象牙雕刻和漆器；茶叶罐；各种漆茶盘、托盘和瓶架，丝绸手帕、束发缎带、桂皮和肉桂、黑胡椒、二百箱上等糖等”，这次远航贸易，美国商人获得高达投资额 25% 的利润。如纽约《独立报》所称这是“一次远见卓识的、杰出的和成果丰硕的航行”。^① 应当说，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这次航行贸易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其本身的经济价值。

如果说 18 世纪中美人民交往的使者是美国商人，那么 19 世纪中美文化交流的桥梁则是东来的传教士。19 世纪 30 年代，步英国伦敦会后尘，美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尽管大清王朝的衰落伴随嘉道朝早已显现，但对外来传教却仍是严厉禁止，不改初衷。1830 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到达广州，不得不边学汉语，边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为了传教，他与其他传教士一样，不得不从事一些教育和出版等文化活动。借助文化活动以期达到传教目的的状况，使传教士们普遍感到，中国的落后保守、孤陋寡闻、盲目自大是传教的最大障碍，要传教首先就要使中国人了解西方历史、熟悉西方文化，接受西方各种知识。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动机的驱使，裨治文于 1838 年写出了《美理哥国志略》一书，在新加坡印行，署名高理文。裨治文在该书序言中论及其来华缘由并坦言写作此书的目的：“予生于美理哥之马沙诸些部中，以地球格之，则与中华上下相对焉，可谓一天一渊也。今年（指 1838 年）三十有七，竟得渡海绕地而及中华，历见英吉利、法兰西、荷兰、西班牙、利未加、暹罗、日本、中华等国之士，与各国之文艺，岂不奇哉！回忆少年在本国，舍农业，儒登大学之堂者三年，始进会城书院而肄业，于各国古今文史地理天文律例

^① 纽约《独立报》1785 年 5 月 12 日，转引自齐文颖：《关于“中国皇后”号来华问题》，载《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 1 辑，第 71 页，重庆出版社 1985 年版。

规条四时土产急欲博览研求，以应每岁掌院临场汇考，毋得逾等。在内四年文凭给领，由是出而进于大院，习古圣经文，亦幸上等三年，别换文凭。时年二十有八。家无内顾，遂欲游览异乡之风俗，兼以予国所见闻传播异土，幸于葛留巴新埠麻六甲、新嘉坡得逢唐人，领略华书七八载，叹华人不好远游，至我西国之光采规模杳无闻见，毫不知海外更有九州或者上帝之君，予心乎将使宣布播之，联四海为一家也。不揣固陋创为汉字地球图及美理哥合省国全图，又将事迹风俗分类略书。百年而后流人中土，或有不耻下观者，其将击节叹喜乎？抑拉杂摧烧之乎？虽然，驰观域外之土，必不方隅之封而笑我矣。”^①

《美理哥国志略》是第一部分介绍美国史地的中文著作，从上述写作目的出发，裨治文详尽地介绍了美国各方面的情况。该书的第一部分介绍了美洲的发现；第二部分叙述了美国的地理位置、邻国、英法荷等国在北美的殖民活动，英法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掠夺、独立宣言、费城制宪会议、华盛顿至范布伦历任总统的任期；第三部分介绍了当时已正式加入联邦的 18 个州，包括最初 13 州和后加入联邦的建大基（肯塔基）、亚喇巴麻（亚拉巴马）、美士细比（密西西比）、罗斯安地（路易斯安娜）、典尼西（田纳西）的建立经过、地理位置、气候、主要城市、人口、物产商业、官制等情况以及西部印第安人的生活和风俗；第四部分介绍了美国的人口增长、山脉、河流、气候、物产、机器、对外贸易、政治与司法制度、慈善事业、教育、军事、婚嫁、风俗习惯、衣饰、饮食等。

鸦片战争以后，该书在广州等通商口岸颇受欢迎，影响日增，书中的内容使具有经世致用思想的开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第一次较为详尽准确地了解到美国的情况，并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一

^① 转引自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 297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

定的影响，在近代中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林则徐、魏源等人即是其代表。

林则徐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非常注意了解西方国家的动态，提出“谙夷情”，“知其虚实，始可定控制之方”。尽管实施这一主张的困难很大，但林则徐还是通过各种办法，广集资料，最终编译了《四洲志》，对世界五大洲三十余国之地理、历史、政情进行了介绍，是当时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世界地理志。《四洲志》便是参照裨治文的《美理哥国志略》对美国的地理位置、建国历史、政治制度和中央、地方的行政、司法、财政、军事、邮政、交通、运输、工农业和进出口贸易以及人口、语言、文化风俗、物产等做了介绍，这也是中国第一次较为系统、完整地对美国介绍，并对美国了解、介绍之端。

继林则徐之后，魏源更多地吸收了裨治文《美理哥国志略》中有关美国的资料，写成《海国图志》。他说：“近惟得布路国人玛吉士之《地理备考》与美理哥国人高理文之《合省国志》，皆彼国文人留心丘索，纲举目张之书。”因此他一改编志的体例，“当先原本（即《四洲志》美国部分），次重辑（即增补的材料），惟《美理哥志》出其本国，实较原志尤提纲挈领，故先之”，把吸收裨治文所著的《美理哥国志略》的内容，放到“原志”前面。^①这时，魏源的《海国图志》已不是仅仅介绍美国的情况，而是开始探究美国的政治制度，并对裨治文所介绍的美国的选举制、国会制等给予了直接充分的肯定。在《海国图志》中，他以赞扬的语气写道，美国“共推华盛顿为首，身后公举贤者更代，不世及，不久任”。“设勃列西领（即 president 总统）一人，综理全国兵刑赋税、官吏黜陟。然军国重事，关系外邦和战者，必与西业（即 senate 参议院）会议而后行，设所见不同，则三占从二、升调文武大夫，更定律例，必询谋佥同。定例勃列西领以四

^① 魏源：《海国图志》50卷本，卷38；100卷本《海国图志后叙》。

年为一任，期满更代。如综理允协，通国悦服，亦有再留一任者。总无世袭终身之事”。总统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各项条例，“所有条例，统领必先自遵行，如例所禁，统领亦断不敢犯之。无异于庶民而后能为庶民所服”。在美国地方“有都城之官，有各部落之官。各部落内，一首领，一副领，议拟人员无定数，公选议事者或十余人，或数十人无定。各省设一公堂，为首领、副首领及士人议事之所。事无大小，必须各官合议，然后准行。即不咸允，亦须十人中有六人合意，然后可行。本省之官，由本省之民选择公举”。^①对此，魏源连连赞叹：“可不谓公乎？可不谓周乎？”

由此可见，魏源对美国的介绍和认识是受裨治文《美理哥国志略》等传教士著作的影响，是鸦片战争以后一批开眼看世界的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的最初了解。尽管浅显，但却打破了“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传统观念，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虽然师夷的目的仅仅是制夷，但毕竟承认了夷人还是有可师的长处，从而成为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潮头。稍后出版的徐继畲的《瀛环志略》，虽然没有直接借引裨治文的《美理哥国志略》，但与当时对中国开明知识分子产生影响的林则徐、魏源的有关美国的介绍、认识不无内在联系。

2. 林鍼赴美“测海窥蠹”

回首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的历史，鸦片战争前，封闭于天朝大国的人们对美国的认识，只是隔着窗纱看晓雾，朦胧不清。当时虽然已有根据海员、广东嘉应人谢清高口述整理而成的《海录》，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记略》等关于美国的介绍，但这些介绍一般比较简略，有些也不确切，更主要的是这些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以致与美国早就有商业往来的广东人，也只知道有

^① 魏源：《海国图志》卷59，卷60。

“花旗人”，对其他则一无所知。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对美国的初步了解来源于传教士。传教士本是为文化扩张而来，实际却成为西学输入的媒介和桥梁。久闭的中国门户被迫打开后，中国人还不具有主动迈出国门的意识，知识分子对远隔重洋的西方社会，除了战败带来的屈辱与震惊外，一切还都是陌生的，传教士的书本便成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主要渠道。著名美国学者丹涅特说过：“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美国人是通过传教士的眼睛来观察亚洲的。”中国人最初看美国又何尝不是通过传教士？能够用中国人的眼睛直接看美国者寥寥无几。据罗荣渠先生记述，1848年以前的近30年间，从旧金山海关记录登岸的中国人仅14名，直至1849年旧金山发现金矿后，华人才大量涌入美国。然而这些人的社会构成和文化层次决定了他们都不可能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使者。^① 鸦片战争以后，让人们通过中国人的亲历记述来了解美国的第一人是赴美“测海窥蠡”的林鍼。

林鍼（字景周，号留轩，1824—？）原籍福州，曾祖父曾有“候选州”的头衔。其祖父中年早逝，家境中落，“所有产业尽被族入侵占”，一家生活全靠其祖母为他人做些女红，常常“日不再食”地熬度日月。直至其伯父年龄稍长，到厦门谋生，全家才移居厦门。这样的家境使林鍼难有读书为仕的可能，加之他“少时颇不好学”，便早早涉足社会。在厦门这个鸦片战争以后第一批被迫开放的五口通商地，商人众多，华洋混杂，林鍼就以他所学的外语，为洋商担任翻译、教授中文，赚些薪水谋生。1847年春，林鍼“受外国花旗聘舌耕海外”，2月由粤东（潮州）起程，历经航行四个月，于6月到达美国，工作一年有余，在1849年2月返回福建。《西海纪游诗》和《西海纪游自序》正是他此行的实录。林鍼自美国返回后，当年4月写成《西海纪游

^① 罗荣渠：《美国与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输入中国》，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第63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草》一书。书成之后，稿本曾在厦门、福州等地流传，并为洋务派闽浙总督左宗棠等人注目存阅。《西海纪游草》一书正式付梓刊刻是在同治六年（1867年），除五言律诗《西海纪游诗》一首，骈体长文《西海纪游自序》一篇外，林鍼亲笔还有《救回被诱潮人记》、《附记先祖妣节孝事略》。

林鍼在当时能够舍弃老母、妻子远渡重洋固然为生活所迫，同时也由于他具有当地人民的那种特有性格，不惧颠沛流离、背乡离井。他在《西海纪游诗》中写出了这种心境：“足迹半天下，闻观景颇奇。因贫思远客，觅侣往花旗。初发闽南棹，长教徼外驰。星霜帆作帐，冻馁饼充饥……”在《西海纪游自序》中对行途的艰辛劳苦，林鍼更详尽地道来：“岁维丁未，月届仲春，爰借东风，远游西极。……腹如悬磬，晨夕不计饔餐；身似簸箕，日夜飘流风雨。千金一饭，王孙容易豪雄；百结愁肠，绝域难堪腥臭……”^①林鍼历尽千辛万苦到达美国，他虽无刻意观察美国社会，但其游历的有关记录却是真实的、客观的，并且较快地流传开来，这是首次由中国亲历者向中国人介绍美国的情况，因此成为近代中国人了解美国最早最直接的珍贵资料，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在《西海纪游草》中，林鍼以其亲身经历，生动地介绍了美国的社会概貌。对当时的纽约，他描述说：“百丈之楼台重叠，铁石参差（以石为瓦，各家兼竖铁支，自地至屋顶，以防电患）。万家之亭榭嵯峨，桅墙错杂（学校、行店以及舟车，浩瀚而齐整）。舳舻出洋入口，引水掀轮（货物出口无餉，而人税甚重，以火烟舟引水，时行百里）。街衢运货行装，拖车馭马（无肩挑背负之役）。浑浑则老少安怀；嬉嬉而男女混杂（男女出入，携手同行）。田园为重，农夫乐岁兴歌；山海之珍，商贾应墟载市（每七日为安息，期则官民罢业）……沿开百里河源，四民资益

^① 钟叔河：《走向世界》，第53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地名纽约克，为花旗之大码头，番人毕集。初患无水，故沿开至百里外，用大铁管为水筒，藏于地中，以承河溜。兼筑石室以蓄水，高与楼齐，且积水可供四亿人民四月之需。各家楼台暗藏铜管于壁上，以承放清浊之水，极工尽巧。而平地喷水，高出数丈，如天花乱坠)。”

除了交通、市貌之外，对美国的历史政治，林鍼介绍说：“其地原属英吉利管辖，因征税繁扰，故华盛顿出而拒之，隧自为国，争霸西洋。”独立后的美国，实行总统制，“众见华盛顿有功于国，隧立彼为统领，四年复留一任，今率成例”。而“大小官吏，命士民保举多人，荐拔者得售”。对美国法律废止死刑的规定，他也做了如下介绍：“准原告各携状师，并廿四耆老，当堂论驳，负者金作赎刑，滥作罪行。”

对美国的科学技术发明及文化教育情况，林鍼悉心了解，对当时美国首先发明的电报通讯技术，他自称“予知其法之详”，并详细介绍说：“功驿传密事急邮，支联脉络。暗用廿六文字，隔省俄通（每百步竖两木，木上横架铁线，以胆矾、磁石、水银等物，兼用活轨，将廿六字母为暗号，首尾各有人以任其职。如首一动，尾即知之，不论政务商情，顷刻可通万里)。”他羡慕美国“集板印书以及舟车、春织、锤铸等工，均用火烟轮，运以机器，神速而不费力”，并断定“余独有志于舟车之学，可以济公私，惟独力不支，苟吾人有志共成，不期年可以奏效也”。^①

他称赞美国的医术、医院“医精剖割，验伤特地停棺（每省有一医馆，传方济世，凡贫民人其中就医，虽免谢金，或病致死，即剖尸验病。有不从者，即停棺细验”。他感慨美国的“博古院明灯幻影，彩焕云霄（有一院集天下珍奇，任人游玩，楼上悬灯，运用机括，变幻可观)”。之后，他即着迷于一种“神镜”（银版照相机），自己买了一架，真心实意地学起来。当26名华

^① 杨国桢：《我国早期的一篇美国游历记》，见《文物》1980年11期。

人同胞被英商骗至纽约，惨遭虐待之事被林鍼得知后，他毅然充任翻译，在法庭上申明事实，使同胞获得自由，重返祖国。为此，英人记恨在心，诬陷林鍼的照相器材为盗窃物，害得他被拘问讯，幸得美国友人相助，有惊无险。

林鍼的《西海纪游草》真实生动，是较之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海国图志》的一大特点，稿本流传后，阅者耳目一新，印象深刻。有的说：“其中往来之跋涉，遭际之奇异，以及人情土俗、物产天时，无不一一详记，使人了然于目，了然于心。”有的说：“所著自序一篇，风上夷情，探访翻译，既详且确；复为韵语五百言，托寄深矣。”还有的说：“令阅者惆怅迷离，恍如置身绝域。”还有更多的人通过阅读《西海纪游草》而对远在异地的“夷人”有了较之此前大为进步的认识。如一位叫王广业的有识之士在其序文中说：“夫人跼踏于一室之中，老死于户牖之下，几不知天地之大，九州之外更有何物。一二儒生矫其失，则又搜奇钓异，张皇幽渺，诧为耳目之殊观。不知天玄地黄，一诚之积也；诚之所至，异类可通。况在含形负气之伦，宁有异性哉？”

另有两首题诗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人们不仅改变了传统的舆地观，而且有了一些新的世界地理知识，并视林鍼远涉重洋、游历异城的经历为壮举。其题诗云：

西极舟航古未通，壮游似子有谁同。
足心相对一球地，海面长乘万里风。
留意所收皆药石，搜奇多识到鱼虫。
此行不负平生学，历尽波涛悟化工。

另一首是署名“闽湖女史李婵仙”所题：

蛮貊能将语意通，可知忠信此心同。

针程九万夸游迹，笔纪千言备采风。
 教客免为衔石鸟，思乡不美寄居虫。
 归来又得诗盈篋，袖里烟云画更工。^①

林鍼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国人开眼看世界中较早迈出国门者，他少有传统士大夫那种盲目自大，能够看到并乐于学习美国较为先进之处。他的《西海纪游草》不仅丰富了当时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而且一改“西洋人介绍西洋，借助洋人看西洋”的对外了解认识的方式，成为19世纪中国人眼中的美国缩影，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尤其对中美文化的早期交流具有特殊的意义。

二、容闳与西学东渐

1. 赴美留学

容闳（1828—1912），字达萌，号纯甫，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县）南屏镇人，祖上世代为农。南屏镇本是南海一个富庶的岛村，气候湿润，物产丰富。容闳一家六口，父亲容丙炎是一个忠厚朴实、勤劳能干的庄稼汉，母亲纯朴娴惠，任劳任怨。然而鸦片战争前的晚清社会，政治腐败，经济衰退，军事废弛，思想文化窒息，阶级矛盾尖锐，已是衰微破败，风雨飘摇。西方列强则海盗般猖狂而来，用鸦片进行掠夺贸易，清廷的白银日渐外流。清政府内外危机重重，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容闳一家虽祖居南海之滨的鱼米之乡，世代辛劳耕作，在这样一种民族危机和清朝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下，依然是饥寒交迫，难以维生。

容闳的父亲和广大农民一样，把改变生活穷困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一方面，封建文化、政治的育人择人传统，使他希望

^① 钟叔河：《走向世界》，第59页。

儿子能够读书做官，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另一方面，在西方列强势力日渐深侵的东南沿海，为洋商、洋人做事的地位和收入，又极大地吸引着他，似乎这是一条很现实的变穷致富的路。按照他的计划，容闳的哥哥进了私塾读书。容闳7岁那年，适逢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夫人在离南屏镇不远的澳门开办的女子教会小学增招男生，并作为马礼逊学校预备班。学校免收学费，无偿供给食宿，经济拮据的容丙炎便通过朋友的介绍，把容闳送去。容闳后来回忆：“是时中国为纯粹之旧世界，仕进显达，赖八股为敲门砖，予兄方在旧塾读书，而父母独命予入西塾，此则百思不得其故。”对于一个7岁顽童，初入西塾的惊异印象“事隔数十年，犹能记忆”，“古夫人躯干修长，体态合度，貌秀而有威，眼碧色，深陷眶中，唇薄颐方，眉浓发厚，望而知为果毅明决之女丈夫。时方盛夏，衣裳全白，飘飘若仙，两袖圆博如球，为当年时制。夫人御此服饰，乃益形其修伟。予睹状，殊惊愕，依吾父肘下，逡巡不前。虽夫人和颜悦色，终惴惴也。我生之初，足迹不出里巷，骤易处境，自非童稚所堪”。^①

教会小学的郭实腊夫人管理严格，容闳每天念圣经，背英文，枯燥难耐，他曾作为“主谋”串联其他孩子企图逃离学校，被郭实腊夫人施以戴高帽，挂逃徒胸牌，在校园内游街的惩罚，容闳自觉羞愧难堪，但仍不服气。此后，容闳再没敢逃学，而郭实腊夫人则更加喜欢容闳的聪明、倔强。1838年，学校因经费不足而停办，郭夫人叮嘱留在澳门行医的传教士，待马礼逊学校正式开学时，定招容闳入学。此后，容闳便辍学回家，度过了他一生中最为辛酸的一段时光。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在战争的硝烟中他的父亲于这一年的9月逝世后，“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兄弟姐妹四人便担起维持生活的担子。容闳每日早出晚归来往于本乡及邻镇之间贩卖糖

^① 容闳：《西学东渐》，第42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

果，所得无儿，如数交给其母，小补生计。

1841年，容闳在马礼逊学校正式兴办两年后入学，主持校务的是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博士、美国传教士布朗。一位外国人记述了当时容闳入学的情形：“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家伙，人们把他送到学校来。布朗先生认为他是一名有前途的学生，把他收下。这位小孩的母亲很贫穷，靠着上山打柴过日子。她的意思是让这孩子在学校里多待些时候，学点英文的知识，将来好在英国人的家庭里当仆人。”^①

1842年，鸦片战争后，英国通过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割占香港，马礼逊学校随即迁至香港，容闳一直在这所学校里学习。布朗先生渊博的知识，谦和的为人和认真的工作态度使容闳非常敬重。他评价布朗：“布先生一望而知为自立之人，性情态度，沉静自若，遇事调处，秩序井然，其为人和蔼可亲，温然有礼，日常操乐观主义，不厌不倦，故与学生之感情甚佳。其讲授教课，殆别具天才，不须远证，而自能使学生明白了解。”几年的学习，容闳不仅掌握了英文，而且学到了许多新知识，对西方社会充满了新奇和探知的欲望。1846年冬，当布朗因身体不佳，准备带几名中国学生返回美国时，容闳是第一个愿意同行的。容闳这样记述：“一八四六年冬，布朗先生回国。去之前四月，先生以此意布告生徒，略谓己与家属均身体羸弱，拟暂时离华，庶几迁地为良。并谓对于本校，感情甚深，此次归国，极愿携三五旧徒，同赴新大陆，俾受完全之教育；诸生中如有愿意同行者，可即起立。全堂学生聆其言，爽然如有所失，默不发声。其后数日间，课余之暇，聚谈及此，每为之愀然不乐。其欣欣然有喜色者，惟愿与赴美之数人耳，即黄胜、黄宽与予是也。当布先生布告游美方针时，予首先起立，次黄胜，次黄宽。第余等虽有此意，然年幼无能自主。归白诸母，母意颇不乐。予再四请行，乃

^① 容闳：《西学东渐》，第14页。

勉强曰：‘诺’然已凄然泪下矣。予见状，意良不忍，竭力劝慰之曰：‘儿虽远去，尚有兄弟与姐三人，且长兄行将娶妇，得有兄嫂承欢膝下，不致寂寞。母其善自珍摄，弗念儿也！’母闻予言，为之首肯。由今思之，殆望予成器勉强忍痛也。呜呼！

“予等均贫苦，若自备资斧，则无米安能为炊。幸布先生未宣言前，已与校董妥筹办法。故予等留美期内，不特经费有着，即父母等亦至少得二年之养贍……

“一八四七年一月四日，予等由黄浦（当作黄埔）首途，船名‘亨特利思’，帆船也。……船过好望角时，小有风浪，自船后来，势乃至猛，恍若恶魔之逐人。入夜天则黑暗，浓云如幕，不漏星斗，于此茫茫黑夜中，仰望桅上电灯星星，摇荡空际，飘忽不定，有若墟墓间之磷火，此种愁惨景象，印人脑际，迄今犹历历在目。惟彼时予年尚幼，不自知其危险，故虽扁舟颠簸于惊涛骇浪中，不特无恐怖之念，且转以为乐；竟若此波涛汹涌，人予目中，皆成为不世之奇观者。”^①

容闳的记述，反映了受西方文化教育的三位青年不惧赴美生活学习的艰难和旅途的辛苦危险，告别家乡亲人的依依不舍和担忧，怀着热切的向往到大洋彼岸那个全新的国家的过 程。这不仅对他的一生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后来对中国社会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2. 耶鲁大学的博士

经过三个多月的海上颠簸，4月12日容闳与布朗夫妇一行抵达繁华的纽约。随后三人乘船赴纽黑文（New Haven），然后到达布朗先生家，在布朗家略作停留，一周后即前往马萨诸塞州的芒松学校（Monson Academy）学习。芒松学校是一所初级中学，在美国尚无高中学校之时，这类学校成为上大学前的必读学校。

^① 容闳：《西学东渐》，第49—51页。

学校设有数学、文法、生理、心理、哲学等课。芒松学校校长海门（Rew Charles Hammond）毕业于耶鲁大学，对英国文学，尤其是莎翁的作品颇有研究。他还是一位教育家，注重教学法，善于演讲，教学和管理经验丰富，把芒松学校办得有声有色，成为其所在的麻省最有名望的一所中学。在这里，容闳三人受到海门校长热情耐心的教导，在海门的影响下，容闳对英国文学产生浓厚兴趣，大量阅读英国作家文集，并学习一些哲学、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的课程。课余时间他们还须做些小工，挣点小钱，弥补生活费用。

紧张而艰苦的学习生活中，黄胜因病，无法坚持学习，只得返回香港。时光流逝，一转眼，传教士资助他们学习的两年时间期满，容闳和黄宽的留学经费成了问题。在布朗和海门先生的帮助下，香港的几位英国商人愿资助他们赴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专科，黄宽欣喜前往。容闳却仍想留在美国学习农业化学，特别期望进入耶鲁大学深造，但香港商人不予资助。容闳并不气馁，以他坚强的意志，一边复习功课，一边四处联系，寻求资助，直至1850年情况仍无转机。好心的海门校长告诉容闳，只要他将来毕业后做传教士，芒松学校可以资助，但须先填写志愿书。这虽是比较容易的资助来源，但与容闳的远大报国理想相距甚远，他婉言谢绝了。对此，他这样认为：“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纵政府不录用，不必遂大有为，要亦不难造一新时势，以竟吾素志……传道固佳，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志愿书一经签字，即动受拘束；将来虽有良好机会可为中国谋利者，亦必形格势禁，坐视失之乎？……盖人类有应尽之天职，决不能以食贫故，遽变宗旨也！”^① 1850年夏，经布朗先生的多方努力，乔治亚州的萨伐那妇女会（The Ladies Assowation in Sauannah, ca）

^① 容闳：《西学东渐》，第23页。

同意资助容闳。在经过严格的考试之后，容闳终于如愿以偿，进入耶鲁大学。

耶鲁大学创建于1701年，设备完善，藏书丰富，师资力量雄厚，课程安排系统。容闳进入大学时，一则缺少各方面专门训练，二来资助经费有限，因此是在困难的条件下拼命苦学，每天“读书恒至夜半，日间亦无馀晷为游戏运动”。生活极为俭朴，一切都是自己动手，即使“雪深三尺，亦必徒步”，处处节省开支。他的身体明显虚弱，曾被迫休息一周。

耶鲁大学的计分法以平均“2”为及格，“3”为荣誉级，容闳的数学成绩一直不佳，但文学、哲学成绩弥补了这个不足，特别是他的英文，连续两次获得首奖，“校中师生异常器重，即校外人亦以青眼相向”。容闳十分爱好体育，他在足球场上“异服异俗，颇受人笑”，但是“其年容两得班中英文第一奖品，其后无敢揶揄之者矣”。^①容闳以他顽强的毅力和卓越的才能赢得了威望。

在耶鲁大学学习的几年里，容闳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所有的新知识，逐渐成熟的他，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命运，渴望人民摆脱贫困，国家富强，他深深地懂得，出国留学是为报效祖国，否则“充乎其极，不过使学生成一能行之百科全书，或一具有灵性之鸚鵡耳，曷足贵哉”！他的爱国之心和精神在他毕业择业时更加得到展示，他的内心所思至今读来感人至深：

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转愿不受此良教育之为愈。盖既受教育，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转不之觉也。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予无时不耿耿予

^① 《胡适留学日记》，1914年5月15日。

心……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①

容闳在耶鲁大学的表现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使人们看到了中国一批热爱自己的国家、勇于奋斗进取的青年。美国牧师特韦契耳（Joseph H. Twi Cheu）在耶鲁的一次演说中说道：“……容闳终于闯了过来。他蓄着辮子、穿着中国长袍进入大学，但不到一年，就把两者都割弃了。

“1854年容闳的毕业是那年毕业典礼上的大事件，至少许多人是这么看的，而有些人来参加毕业典礼主要就是为了看一看这位中国毕业生……”

容闳毕业时“受到莫大的劝诱，让他改变终生的打算。他居留美国已久，具备彻底归化的资格……而且，由于他的毕业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机会向他开放了：只要他乐意，他可以留在美国并找到职业。另一方面，对他来说，中国反倒像异乡。他连本国语言也几乎忘光了。在中国，没有什么需要他去做的事。那里除了卑微的亲属外，他没有朋友，不会得到任何地位和照顾，可以说没有他立足之地。不仅如此，由于考虑到他在哪里待过，成了什么人和想要干什么，他在本国人当中不可能不受到歧视、猜疑和敌视。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派阴郁险恶的前景”。^②

然而，容闳没有丝毫的犹豫，在1854年获得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后，毅然返回祖国。1876年耶鲁大学又授予他法学博士。由于他的刻苦努力，成为中国受过美国系统高等教育的第一人。

^① 容闳：《西学东渐》，第61页。

^② 转引自钟叔河：《走向世界》，第128页。

3. 西学归来的报国之志

整整八年的留美学习生活使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容闳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他回到阔别了八年的祖国之时，国家已是内忧外患，满目疮痍。东南沿海最主要的五大城市被迫开门揖盗。西方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将其工业产品大量倾销中国，“松太所产，为天下甲”的棉纺织品，被排挤得“布市销减，商贾不行，生计路绝，以至能工巧匠无纱可纺”。一些农业地区由于西方列强大量收购某些农产品而畸形发展，虚假繁荣，开始沦为外国资本主义原料供应地。成千上万的农民被强行卷入他们根本不了解的国际商品市场的漩涡，尽管他们辛苦劳作，却所得无几，一贫如洗，白花花的银元装满了中外大小商人的口袋。

西方列强不仅掠夺中国的财富，还进行罪恶的人口掠夺，“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只要人们离开自己的任宅，哪怕是走到通衢大街，谁也免不了有被人假借债务纠纷或私人嫌隙推架而去的危险。这些人被绑匪带去，就成为囚徒，按每头若干价钱被卖给苦力承包人，运出海面以后，就再也听不到他们的消息了。广州城和邻近各地的全体人民中，已经掀起一种滔天大难的感觉”。^①

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转嫁战争赔款，对百姓豪取强夺日甚一日，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揭竿而起的大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已席卷半壁河山。

这些都更加坚定了容闳的远大报国之志：“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为少年新中国”。

他主张用“西化”实现救国。早在美国留学时，他就计划“将来要学习农业化学，我也许去学习内科和外科医学。有那么

^① 转引自《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195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

多东西，而且每一种都对想为祖国谋福利的人那样地具有价值，以致要想知道应该选择哪一种实在太困难了”。回国后实现抱负谈何容易，但他仍坚定地认为：“予之生于斯世，既非为哺饷而来，予之受此教育，尤非易易，则含辛茹苦所得者，又安能不望其实行于中国耶。一旦遇有机会，能多用我一分学问，即多获一分效果，此岂为一人利益计，抑欲谋全中国之幸福也。”^①他曾亲临太平天国中心南京，满怀热情地向洪仁玕提出建设现代化的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的方针大计：

“一、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五、创立银行制度及厘定度量衡标准；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七、设立各科实业学校。——此其大略，至若何实行，自非立谈所能罄。倘不以遇缓而采纳予言，愿为马前走卒。”

但是农民革命的局限性注定了容闳救国计划的落空，这位受西方文明教育的耶鲁大学毕业生深思熟虑的救国设想，换来的竟是干王“赠予一小包袱。拆而视之，则中裹一小印，长四英寸，宽一英寸，上镌予名。又有黄缎一幅，钤印十三，上书予官阶，曰“义”字。按太平军官制，王一等爵，‘义’字四等爵”。^②今人视之仍甚觉可笑！

他主张用美国的模式改造中国。容闳受美国文化浸淫多年，以美国为模式的西方文化标准植根于头脑。他以美国为标准，看到中国要摆脱贫困，就要独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要改变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就要变革社会。他提出，在政治上，建立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新型政府；在经济上，引进美国的科学技术，修铁路，建银行，组建轮船公司，呼吁开发长江，大力推广兴建厂

^① 容闳：《西学东渐》，第58页。

^② 同①，第67页。

矿，鼓励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文化教育上，筹建新式学堂，办报纸，译西书；在军事上，建立近代化的海军、陆军，兴办海军学校，加强国防。他还身体力行支持戊戌变法，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密切往来，组织中国第一个国会，自任会长。可以说，容闳从一踏上祖国的土地，就一直在想着、忙着将美国那些先进的东西在中国传播、实践，他是从思想到行动积极传播美国文化的第一人。

他主张以留学教育培养人才。选拔优秀的青年赴美留学，造就使国家富强之才，是容闳为之奋斗终身的一项报国计划。他认为自己是赴美受到高等教育之人，可以将美国文化输入中国，救亡图存；别人也能按同样的方法，到美国留学，成为用美国文化改造中国的新人；如此下去，赴美留学的人越多，资产阶级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越广，中国的“美国化”程度就越高，中国就会逐步像美国那样繁荣富强起来。容闳就是这样，把争取更多的留学生赴美看做是国家富强的最佳途径，看成是“中国复兴希望之所系，亦即予苦心孤诣以从事者也”，终其一生，为之奋斗。这在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亡图存之方的历程中，具有开创性意义，对中美文化的交流无疑也是一个创举性的开端。

4. 容闳在晚清中美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

容闳在中美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不仅仅因为他是“第一中国留学生毕业于美国第一等大学者”，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为实现派遣留学生赴美的强国计划而竭诚奋斗一生，从而架起中美文化交流的桥梁。

1855年的夏末，容闳怀着热切的希望来到广州，企望通过达官显贵的支持与资助，实现他的留学生赴美计划。他苦苦思索着结识达官的途径，这对于他这样多年留学在外、世代耕种的农家子弟来说，实在是难于上青天。无奈之中，容闳通过美国传教士的关系，到了美国代理公司，在伯驾的手下做书记员。他以

为，或许能借助伯驾美国驻中国专使的身份结交清政府中的官吏。他不计较每月很少的薪金，渴望机遇的出现。然而，伯驾这个中国通对他的计划不以为然。几个月过去了，毫无进展，容闳只得辞职而去。

容闳并没有灰心，这一年的冬天，他到了香港，仍然没有任何结果。容闳为他的留学生赴美计划奔波了一年，又执着地来到了上海。这时的上海已是洋商洋行遍布，富贾小贩云集的商业中心，容闳希望在这里找到显贵的资助。凭着对西方社会的了解和无别于母语的英文，他在上海海关谋得了职位，并有着不菲的收入。容闳也曾不无天真地想过，如果有一天能做到海关的总税务司，定要革除一切弊端，彻底革新，留学生赴美也一定能实现。然而，中国的主权完整已不复存在，洋人把持的中国海关不会容许中国人来做税务司。容闳在上海漫无目标地寻找，却一次次失败。

1861年容闳在九江做起了茶叶商，想通过自己经商致富资助留学生赴美，三年的商海实践，他既无权贵做后台，又无洋人当靠山，在资金不足、税卡林立、尔虞我诈中，换得的还是失败。容闳的留学生赴美计划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让人看不到丝毫的希望。但是，转机在绝望中出现了。1863年初夏，洋务运动地方实力派曾国藩的幕僚致书容闳，传达了曾国藩邀请容闳抵安庆之意。曾国藩要见容闳是因洋务所需，当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席卷了东南半壁河山之时，清朝统治面临内忧外患，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中，认识到洋枪洋炮的威力。1862年他首先在安庆创办了军械所制造枪支弹药，并准备再建一个大兵工厂。一向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的曾国藩，对“有一技一长者……断不可轻视”，当他听到幕僚们对容闳情况的介绍后，他赏识容闳有在美国的留学经历，见多识广，朋友众多，便认定这是一个难得的帮助他兴办工厂的人才，特别是如果让容闳出国采购机器是再合适不过了。于是在曾国藩的催促下，那些

曾为容闳故友的幕僚们再三邀请容闳，而容闳在弄清曾意之后，也应允欣然前往，为的是能有机会实现他的留学生赴美计划。容闳接受任务后，不辞劳苦，花了近两年时间从美国买回机器，这批机器在江南制造局中是最好的，深得曾国藩的欢心，曾对容闳自然也是信任有加。容闳对此并不热恋，他心里时刻想的还是留学生赴美的计划。1867年，曾国藩接受了容闳的建议，在江南制造局内附设兵工学校，既培养了科学技术人才，又翻译西方的科技书籍。这对容闳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他后来兴奋地说：“于江南制造局内附设兵工学校，向所怀教育计划，可谓小试其锋。”随后，容闳便积极寻找机会推进他的留学生赴美计划。

容闳因购买机器有功，经曾国藩上奏，被清廷批准授以江苏候补同知，在江苏省巡抚行署内做译员。丁日昌是容闳的广东同乡，时任江苏巡抚，对洋务运动兴趣颇深，自然与熟知西洋的同乡志趣相投，交情深厚。容闳便通过丁日昌向清廷上了一个条陈，其中心是派遣留学生的建议：“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以选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国膳食人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项留学经费，可于上海总税项下，提拨数成以充之。”^①

尽管容闳对派留学生一事考虑得详细、周全，也较为实际可行，但丁日昌所递条陈的时机不好，本想通过协办大学士、户部左侍郎文祥转奏，岂料文祥丁忧回籍，只好另寻机会。1870年，

^① 转引自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第2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曾国藩赴天津处理教案，容闳作为随行翻译，紧紧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再三鼓励同往的丁日昌说服曾国藩派留学生出国。容闳多年的心愿终于有了回音，曾国藩不仅同意了容闳的主张，而且答应与李鸿章联名上奏。19世纪70年代，洋务运动已由军事工业转入民用工业，各类技术人才的急需是促成容闳留学生赴美计划实现的客观条件，清廷很快在这一年冬天，正式旨准曾国藩、李鸿章关于派留学生的奏折。随后，曾李又联合上奏，强调派遣留学生的意义和具体操作的困难以及克服的办法，并拟定了具体的留学生赴美章程，内容如下：

(1) 照会美国政府，说明中国派遣留学生的缘由，求其批准。关于留学生的费用由中国负责；关于留学生的学习升学问题照美国章程办理。

(2) 在上海设一局，负责办理挑选赴美的幼童、考试、写合同、训练和送幼童赴美。幼童年齡以十三四岁至20岁为宜，读中国书数年、家中情愿送出、姿性聪慧。不合格者不选。

(3) 选送幼童每年以30名为额，4年120名。15年后，每年回华30名，视各人所长，听候派用。此系官生，不准在外洋人籍逗留，或私自先回，谋别职业。

(4) 赴美幼童如水土不服或性情顽劣，可随时撤回。

(5) 幼童在美所学专业 and 成绩要列册登记，四月考试一次，年终注明等第，详载细册，送上海道转报。

(6) 驻美派正副二委员，每员每月薪水450两银；翻译一员，每月薪水银250两；教习二员，每员每月薪水银160两。

(7) 每年驻洋公费银约600两。

(8) 正副委员、翻译、教习来回川费，每员银750两。

(9) 幼童来回川费及衣物等件银790两。

(10) 幼童生活用品每人每年银400两。

(11) 每年开支要结算汇报，结余归公，实在不足，写明情况补给。

(12) 每年留学费用合起来为库平银 6 万两，以 20 年算，需库平银 120 万两。

赴美前的准备工作经清廷旨准，陈兰彬任出洋局委员，容闳为副委员，曾恒忠为翻译，叶源濬为出洋中文教习，刘翰清负责幼童出洋前的培训。至此，容闳奔走呼号了十几年的留学生赴美计划有了实现的第一步。这关键的一步，不仅仅在于留学生赴美的本身，而在于它是近代真正意义的中美文化交流的开端，从而也使容闳在晚清中美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得到确立。

三、留学生与中美文化交流

1. 幼童留美与“美化”

1872 年 8 月 11 日（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八），第一批中国幼童 30 名在上海港登船，横渡重洋，前往美国。其后连续三年（1873—1875 年）第二、三、四批幼童各 30 名按计划赴美，这是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的结果。

招收留美幼童的工作主要是在最先接触西方的东南沿海进行，但当时中国整个社会仍很闭塞，尤其是传统文化的保守观念阻碍，即使此地区的人们也不敢轻做决定把幼子送往陌生而遥远的异国他乡，招收幼童非常困难。有留美幼童这样回忆：“那时的中国闭关自守，对世界事务一无所知。高级官吏认为西方教育会对其社会起破坏作用，所以根本提不到议程上来。此外通过几万里的海洋将遇到各种各样的危险，最后将没有人能安全到达。尤其在农村，对外界了解很少，没有学生敢出国”。“当我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天，一位官员来到村里，拜访各住户，看哪一家父母愿意把他们的儿子送到国外接受西方教育，由政府负责一切费用。有的人申请了，可是后来当地人散布流言，说西方野蛮人会把他们的儿子活活地剥皮，再把狗皮接种到他们身上，当

怪物展览赚钱，故此报名的人又撤消”。^① 招生未足额，容闳只得亲往家乡广东和香港新式学堂招收幼童，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服动员家乡亲友，并将幼童年龄放宽，才总算招足了30人，其中有的还是因亲属劝说，才下决心送幼子前往。如李恩富得以报名，完全是因其在上海经营茶叶的堂兄回乡劝说其寡母而后同意的。他回忆说：“报考出洋的人中以沿海省份最多。事实上，父母很不希望让儿子出去离开他们那么长时间，并且去到他们并不了解的而且他们听说又是野蛮人居住的地方。我的兄长那时在上海经商，他的想法不同，他没有被这种思想所吓倒。他带着这种闪光的思想回到家里，说服了母亲，使我报考出洋有了金色的希望。我那时十二岁，我父亲三年前已去世，我母亲还负担三个孩子，但不管她内心是否真舍得我离去，她并没有阻拦我，而对这件事做出了决定。我或许是一种冒险，想见世面是我惟一的愿望。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那聪明的母亲可能还有顾虑，但她已像勇敢的妇女一样，她要把好事留给孩子，她已为我往上海而做好了。整整一个月为我赶制新衣服，朋友和亲戚为我准备了干粮，主要是甜肉。最后，在向我的叔叔、兄弟亲属告别后，我按惯例向我尊敬的母亲辞行。我们没有拥抱，不，这种礼俗在中国不流行，而且不庄重。我十分留恋地多次回头环顾家的四周。母亲隐约出现，但我可以看到她眼里含着泪花……我一生中这是第一次离家，寂寞、凄凉、悲哀充满了我的脑海。”^②

幼童们出国前在上海留美预备学堂（又称出洋局）集中培训半年左右，主要是英文、中文和一些基本知识。培训极严格，幼童们“读书时间多，而游戏时间少。学校监督，是一位‘暴君’，他力主体罚，而且严格执行。但多少年后，幼童们仍然怀念他，

^① 转引自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第28页。

^② The Senior Returned Students, A Brief Account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Commission Under Dr. Yung Wing, 1872—1881, 1932年天津出版，第4—5页。

而且恐惧他手上的竹板，但是他强迫大家读写中文，在幼童回国后，都能致用不误”。^① 在培训结束的考试中，30名幼童全部合格。这种严格的训练，也为他们在国外刻苦读书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第一批幼童按计划经过长途远航，如期抵达美国东部的“麻州春田城”住地。此后，第二批幼童30名于1873年6月12日启程赴美；第三批幼童30名于1874年9月19日启程赴美；第四批幼童30名于1875年10月14日启程赴美；总共四批120名留美幼童都按预定计划派往太平洋彼岸。这120名幼童中，年龄最大者16岁，最小者10岁，均在第一批幼童中，其他均在12—14岁之间，可以反映出招收首批幼童时，为克服招收不足，不得不放宽原定年限。从籍贯上看，以广东人为最多，共有84人，占70%；江苏21人，占17.5%；浙江8人，占6.7%；安徽4人，占3.3%；福建2人，占1.7%；山东1人，占0.8%。广东人中，来自容闳家乡香山县的有40人，占33.3%。留美幼童主要来源于广东和江浙地区，可以说是与这些地区较早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有直接关系。（留美幼童情况见附表^②）

留美幼童情况统计表

第一批 30 名 (1872 年 8 月陈兰彬率领赴美)			
姓名	赴美年龄	籍贯	返国后任职及简要情况
蔡绍基	13	广东香山	上海大北电报公司翻译，清政府驻朝鲜外交代表，袁世凯的幕僚，天津外事局局长，北洋大学校长，天津海关监督和海关道台。1933年去世。

① 高宗鲁编译：《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第6，《传记文学》37卷、第3期。

② 参见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第34页。

钟文耀	13	广东香山	先后任职上海水利管理局、驻外使馆翻译秘书、临时代办、总领事、上海—南京—宁波铁路总办、铁道部顾问。晚年寓居上海。
吴仰曾	12	广东四会	又赴英学采矿工程，后在南京、浙江、直隶工作，1905—1906年任欧美归国留学生副主考，后被清廷授予科学博士，任学部顾问，晚年任职开滦煤矿。退休后寓居北平。
罗国瑞	12	广东博罗	先在上海水利管理局，后勘测并帮助修造大冶至青山铁路、津浦铁路南段工程，勘测贵州云南铁路及汉口广东铁路。退休后居上海。
欧阳庚	14	广东香山	再学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任中国驻外领事、代办直至退休。晚年居北平。
容尚谦	10	广东香山	回国后入福州船政学堂继续学习，毕业后参加过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后任航运公司经理，晚年寓居上海。
黄仲良	15	广东番禺	分至天津东局子兵工厂，后任中国驻旧金山领事、汉冶萍冶铁公司秘书，粤汉铁路广州段、津浦铁路总办。逝世于天津。
邝荣光	10	广东新宁	被分至唐山开平煤矿，后任直隶省林西、临清煤矿采矿工程师。退職后居天津。
蔡锦章	14	广东香山	先入商界，后往沪宁铁路任职，故于上海。
张仁康	13	广东香山	再次赴美学习。后在檀香山、旧金山做律师。曾任中国驻西雅图领事。逝世于美国。
梁敦彦	15	广东顺德	先于天津电报学堂充任教习，后跟随张之洞。此后历任汉口汉阳、天津海关道台，外交部长，交行董事长，驻欧美公使等职。故于北平。
牛尚周	11	江苏嘉定	先服务于电报局，后任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帮办。故于上海。
潘铭钟	11	广东南海	留学生中最聪慧者，15岁入纽约州特洛耶专科学校，16岁病逝。
刘家照	12	广东香山	天津外事局工作，逝于广东。

詹天佑	12	安徽徽州	再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奉调任广东黄埔水师学堂教习、京沈铁路工程技术员、清政府铁路顾问工程师，主持京张铁路工程，逝世于汉口。
黄锡宝	13	福建同安	早夭。
黄开甲	13	广东镇平	先后任盛宣怀秘书、轮船招商局经理、国家电报局总办。1894年任美国圣路易博览会中国特派员助理。故于日本。
何廷梁	13	广东顺德	再学于天津医学堂，毕业后为海军医生。
陈巨溶	13	广东新会	再学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在轮船上实习，在游泳跳水训练中受伤而亡。
曹吉福	13	江苏川沙	在上海经营私人法律事务所。
谭耀勋	11	广东香山	1883年在美国病逝。
程大器	14	广东香山	在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兵工学校教授工程技术。
陆永泉	14	广东香山	于福州船政学堂未及毕业，再赴美学习，后任驻纽约领事，被刺死在办公室。
石锦堂	14	山东济宁	早夭。
邓士聪	14	广东香山	又入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在北洋舰队实习。后在广东经商，故于香港。
陈荣贵	14	广东新会	分往中国机械采矿公司服务多年。
钟进成	14	广东香山	先后在美国驻广东、香港、厦门等领事馆服务，故于上海。
钱文魁	14	江苏上海	中国驻法使馆官员，故于巴黎。
史锦鏞	15	广东香山	私人经商，故于上海。
曾笃恭	16	广东海阳	上海北华每日新闻编辑，南京政府外事局任职，津浦铁路秘书。故于天津。
第二批 30 名 (1873 年 6 月黄胜率领赴美)			

蔡廷干	13	广东香山	大沽炮台鱼雷队就职, 甲午中日战争中指挥威海卫鱼雷艇队。后任袁世凯随从参谋、北京海关总办等职。故于北京。
吴应科	14	广东四会	福州船政学堂再学, 毕业调至北洋舰队, 参加中日黄海大战。后任北京电报局总办、上海江南船舶修造厂总办、黎元洪总统顾问、巡洋舰队司令、海军副司令等职。晚年居北京。
吴仲贤	14	广东四会	外交官员, 曾任驻朝鲜领事、驻日本横滨总领事、驻墨西哥代办、汉口海关监督等职。晚年居上海。
容 揆	14	广东新宁	外交官员, 曾任中国驻华盛顿使馆代办。
苏锐利	14	广东南海	福州船政学堂再学毕业后, 任教于广东黄埔水师学堂。后主要从事外交工作, 任驻数国总领事和北京外交部顾问。晚年退居上海。
温秉忠	12	广东新宁	主要从事外交和海关工作。曾在美国驻新疆领事馆做事, 后在南京、天津外事局工作。后为北京海关总局负责人, 苏州海关监督。
丁崇吉	14	浙江定海	先后供职在大沽炮台鱼雷队, 上海信使晚报、上海海关, 不久辞职充任帮办, 开办公司。
陆锡贵	13	江苏上海	先后在唐山采矿公司、京沈铁路总工程师处工作。
梁金荣	14	广东香山	一直从事电报工作, 曾任江西电报局局长。
李恩富	13	广东香山	再赴美国深造, 毕业于耶鲁大学, 后办报并经商。回国后在广州用中、英文出版报纸。
黄有章	13	广东香山	居家士绅。
方伯梁	13	广东开平	一直在电报局工作, 曾任张家口铁路电报局主任、粤汉铁路电报局主任。
张祥和	11	江苏吴县	主要从事外交工作, 曾任职于驻西班牙和秘鲁使领馆。后在北京经商。
陈乾生	14	浙江宁波	在天津被义和团误杀。
王凤喈	14	浙江慈溪	外交官员, 任中国驻伦敦使馆官员, 故于伦敦。
曾 溥	不详	广东朝阳	毕业于耶鲁谢菲尔德学院, 后赴德国弗赖堡留学, 曾任煤矿工程师。

容尚勤	不详	广东香山	归国后任教员。
李桂攀	14	广东香山	归国后复往美国留学，后在纽约经营茶叶。
唐国安	14	广东香山	被派往唐山机械采煤公司任煤矿工程师，后参加修建京沈铁路，协办清华学堂。
宋文翔	13	广东香山	分至福州船政学堂，后调北洋舰队。参加 1894 年黄海战役，后任长江舰队炮舰舰长。
张有恭	12	广东新会	早年溺死于上海黄埔江。
邓桂庭	13	广东香山	分往福州船政学堂，后赴日经商，早逝。
唐元湛	13	广东香山	分至上海电报局工作，后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理。
陈佩瑚	11	广东南海	任美驻中国上海、香港领事馆翻译。
邝景垣	13	广东南海	早逝于南海。
邝咏钟	13	广东南海	分至福州船政学堂，牺牲于 1884 年中法战争。
梁普时	11	广东番禺	分至天津大沽炮台鱼雷艇队，后参加京沈铁路的修建。
梁普照	13	广东番禺	任唐山采矿工程公司帮办，后服务于外商轮船公司任代办。
卓仁志	12	广东香山	分至上海电报公司工作，早年溺水而亡。
王良登	13	浙江定海	先后在天津大沽炮台、威海卫鱼雷艇队任职，参加 1894 年中日战争，后任职京沈铁路、天津制币厂。曾任中国驻纽约和哈瓦那总领事。
第三批 30 名 (1874 年 9 月 祁兆熙 率领赴美)			
唐绍仪	12	广东香山	分至海关，后任袁世凯秘书、天津海关道台、驻西藏代表、奉天巡抚、北洋政府总理、广东中山县模范县长、国民政府高级顾问等职。1938 年死于暗杀。
梁如浩	12	广东香山	分至海关，先后任京沈铁路董事、营口、上海海关道台等职。

周长龄	14	广东新安	分至海关，先后任天津轮船局经理、京沈铁路董事、营口海关道台、香港立法委员会委员等职。曾被英政府授予爵士。
邝景扬	13	广东南海	分至唐山采矿工程公司，参加京沈铁路采矿工程队，曾任粤汉铁路广东段和京张铁路总工程师。
牛宝奎	13	江苏常州	曾任盛宣怀秘书，中国轮船电报公司经理，后为上海电报局局长，交通局帮办，外交部次长。
容耀垣	10	广东香山	分至天津水师学堂，毕业后经商，后曾充任孙中山总统顾问。
曹家祥	11	广东顺德	分至天津水师学堂，参加1894年黄海战役。曾任天津警察局局长。晚年经商。
吴敬荣	11	安徽休宁	分至天津水师学堂，后任广甲舰舰长，参加1894年黄海战役。曾任黎元洪总统顾问。
周万鹏	11	江苏宝山	一直在电报局工作至退休。
卢祖华	11	广东新会	分至天津大沽炮台，后就职于唐山采矿工程公司。曾参加修建京沈铁路。
林沛泉	12	广东番禺	被派驻朝鲜海关代表。参加修建京沈铁路。此后经商。
徐振鹏	11	广东香山	分至福州船政学堂，后调至北洋海军，参加1894年黄海战役。历任长江舰队司令、海军部次长等职。
唐致尧	13	广东香山	归国后经商，后参加修建京沈铁路。
程大业	12	安徽黟县	主要从事电报工作，任过满洲里电报局局长。
薛有福	12	福建漳浦	分至福州船政学堂，牺牲于1884年中法战争。
徐之煊	12	广东南海	死于大沽炮台。
曹家爵	12	广东顺德	留学期间病逝于美国。
曹茂祥	10	江苏上海	分至天津医学堂，毕业后任海军医生，早逝。
朱锡绶	10	江苏上海	分至电报局，早逝。
宦维城	10	江苏丹徒	一生在津经商。

袁长坤	12	浙江绍兴	分至电报局。曾任电报局局长兼教育部副主考。
祁祖彝	12	江苏上海	就职于四川民事局，后任安东道台。
邝贤俦	12	广东南海	分至唐山采矿工程公司，早逝。
康康龄	12	江苏上海	煤矿工程师，早逝。
杨兆楠	12	广东南海	分至福州船政学堂，牺牲于中法战争。
黄季良	13	广东番禺	分至福州船政学堂，牺牲于中法战争。
杨昌龄	12	广东顺德	分至天津大沽炮台，后主要从事铁路工作，先后任京沈铁路监工、交通局经理和京张铁路指挥。
郑廷襄	13	广东香山	先分至天津大沽炮台鱼雷舰队，后辞职赴美留学。曾发明火车车箱挂钩，任过纽约某干电池公司经理和自来水公司顾问工程师。
孙广明	14	浙江钱塘	一生从事电报工作。
沈嘉树	11	江苏宝山	分至江南制造总局，后参加修建京沈铁路，曾任出纳员、总监察员。
第四批 30 名 (1875 年 10 月邝其昭带领赴美)			
刘玉麟	13	广东香山	从事外交工作，曾在欧美诸国任领事。
邝国光	13	广东新宁	分往天津水师学堂，后调至北洋舰队。曾任湖北省政府外交秘书，上海江南船厂经理。
邝炳光	13	广东新宁	分至大沽炮台鱼雷舰队，后调北洋舰队。先后参加兴建汉阳铁厂、京沈铁路，主持直隶、山东、湖北多项工程事业。
黄耀昌	13	广东香山	先后在上海棉纺织厂、湖北汉口太古洋行轮船公司任职。参加修建上海至南京铁路。任上海铁路段经理，兼任北京至汉口铁路北京段经理。
吴焕荣	13	江苏武进	分往电报局，曾任江西电报局局长。参加修建京沈铁路，充任汉冶萍铁厂驻沪代办。

周传谏	11	江苏嘉定	参建京沈铁路, 后在直隶、山西、山东、河南、江西、湖北、贵州等地铁路、矿山、商业部门工作。
潘斯焯	11	广东南海	分至上海官办棉纺织厂, 后任南京造币厂经理。曾赴京考察政府工作。
陆德彰	13	江苏川沙	一生在上海从事电报工作。
陶廷庚	12	广东南海	分至电报局, 任过吴淞学校教员, 湖北电报局局长。
吴其藻	12	广东香山	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任职海军, 参加了中法、中日战争成员。曾任开济巡洋舰舰长、驻朝鲜领事、盐务局及上海南京铁路官员。
林联盛	14	广东南海	分至电报局, 先后在京沈铁路和盐税局工作。
谭耀芳	10	广东香山	早逝于广东。
盛文扬	12	广东香山	先后在电报局、民事局供职, 曾任福州候补巡抚。
唐荣浩	13	广东香山	曾任山东外事局局长、山东省候补道台。
唐荣俊	14	广东香山	经商。
陈绍昌	13	广东香山	早逝。
梁金鳌	11	广东南海	早逝。
陈福增	14	广东南海	早逝。
林联辉	15	广东南海	分至北洋医学堂, 曾任北洋医院院长。
陈金揆	12	广东宝山	分至天津水师学堂, 后为“致远”舰舰长, 1894年黄海战役中牺牲。
金大廷	13	江苏宝山	分至北洋医学堂从医。
沈德耀	14	浙江慈溪	经商。
沈德辉	12	浙江慈溪	早逝。
沈寿昌	11	江苏上海	分至天津水师学堂, 后为“济远”舰舰长, 1894年黄海战役中牺牲。
朱汝淦	11	江苏华亭	分至北洋医学堂, 后从医。

王仁彬	12	江苏吴县	早逝。
冯炳忠	12	广东鹤山	从事电报工作。
梁丕旭	12	广东番禺	主要从事外交工作，先后任中国外交部驻德、美、西班牙、秘鲁外交代表。
周传澍	13	江苏嘉定	早逝。
黄祖莲	13	安徽怀远	分至天津水师学堂，后任“广丙”舰舰长。1894年黄海战役中牺牲。

幼童到达美国后，以二三人为一组散居在美国居民家中，这样既可以尽快过外语关，及早进入正规学校接受教育，又可以在生活上得到关照。美国人民对中国幼童热情接待，幼童们在美国也自尊自重，学习努力，待人大方，处事得当。这方面的文字材料是极其丰富的，当年留美幼童李恩富曾回忆说：“我非常幸运，被安置在春田一位慈祥的妇女身边。她在马车上跟着我们，当我朝向她时，她拥抱我，向我亲嘴，使得其他的孩子都哄然大笑，连我自己也满脸通红。我可以这样说，没有任何事情，像这事一样，使我侷促不安了，这是我生平以来第一次的接吻。”^① 在幼童的日记里也常常可见他们对美国人民给予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充满感激之情。美国人对这些幼小留学生的赞誉更是有加，亲自教授幼童的巴脱拉（Louise Bartlett）小姐说：“他们富有青春活力，非常聪明能干，一般来说，只要我教会他们一种游戏，他们就会赢我。他们学英语非常快，初次见面时我们交谈有困难，以后一点困难都没有了。等到他们进入学校，同学们都很喜欢他们，他们读书进步很快，老师也为他们的成绩而骄傲。”^② 美国报纸则评论这些幼童“都有君子之风，他们不但谦虚而且有礼貌，我们都很喜欢他们，我们都以他们做我们的榜样。这是他们国家的荣

① 刘真主编：《留美教育》第1册，第31页，台湾国立编译馆1980年版。

② 同①，第89—90页。

誉。他们对于美国人的友谊衷心感谢，对于美国家庭生活，他们很快地适应，他们还送给他们的监护人可爱的礼物，而且时时存有感恩图报之心”。^① 幼童们在美国生活、学习，与美国人民友好相处，有了更多的机会去接触西方文化及文明，感受美国人民生活中的民主、自由方式，这些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留美幼童，他们从生活到学习到思想都在逐步地“美化”着。

幼童们的起居、饮食、服饰都在变，仅仅半个月的时间幼童们就已习惯了美式黄油西式面包，刀叉在手，每餐吃得津津有味。生活在注重体育活动和强壮体魄的美国家庭中，篮球、棒球是男孩子不可缺少的体育活动，幼童们很快成为各项体育活动的主力，在校园的操场上、家庭花园的草坪上，到处可见他们的身影。他们剪掉了拖在脑后的那根长辫，脱掉臃肿的长袍高靴代之美式轻便服装。他们不再是只读圣贤书，迈着四方步的小书生，而是充满朝气的学子。幼童詹天佑、梁敦彦、蔡绍基、黄开甲、陈钜谔、钟俊成、吴仲贤、李桂攀、邝咏钟几人组成了小棒球队，与美国孩子组成的球队比赛，常常是胜多负少，即使进入大学后，他们仍是各项体育竞赛和活动的强手，以致引起美国人的嫉妒。耶鲁大学一位教授在自传中曾坦言：“这许多孩子，不仅在运动方面比我们美国人卓越，在其他方面也要比我们强。由于这种原因，往往引起我们内心的激愤，当他们参加任何社交场合，我们许多美国人即失去所有的机会。他们对于女孩子那种彬彬有礼的风度，是我们万万不及的。女孩子们老是喜欢与东方人士跳舞，是否他们的风度与谈吐具有正直的魔力，我不敢确定，不过，任何舞会和招待会上，最美丽与动人的女孩子们总是对东方人特别恩宠有加，这是事实。当他们从我们的前面通过，或者接受中国学生们注意的那种温柔，以及使美国男孩子感到痛苦的

^① 刘真主编：《留美教育》第1册，第89—90页。台湾国立编译馆1980年版。

那种表情，使我永远不能忘怀。”^①

在学习上，按照派遣规定，赴美留学生主要是学习一些军事工业技术，如机械、开矿、造船、邮电、土木工程等，这些科目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大相径庭，幼童们充满了新奇和兴趣。当他们认真钻研自然科学的时候，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也必然地吸引着他们，哲学、经济、法律、文学都使他们津津乐道，亲身的经历和书籍的介绍，使赴美留学生对西方文化和社会制度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迅速接受了美国的观念及理想，并对其终生影响深远。

容闳在《西学东渐记》里用这样一段文字具体描述了赴美留学生的变化。他说：“此多数青年之学生，既至新英国者，日受新英国教育之陶镒，且习与美以交际，故学识乃随年龄而俱长。其一切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其故态……况彼等既离去故国而来此，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日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好为种种健身之运动，跳踯驰骋，不复安行矩步。”耶鲁大学校长卜德等在联名致函总理衙门时，评价留美幼童：“……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即文学、品性、技术以及平日与美人往来一切之交际，亦咸能令人满意，无闲言。论其道德，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其礼貌之周至，持躬之谦抑，尤为外人所乐道。职是之故，贵国学生无论在校内肄业，或赴乡村游历，所至之处，咸受美人之欢迎，而引为良友……”^②随着生活、学习内容变化，留学幼童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越来越接受认同，不再安于封建等级伦理的束缚，他们着西装，留分头，不再如以往那样跪拜孔子牌位和清廷官员，代之以往那种封建读书人所有的拘谨、稳

^① 刘真主编：《留美教育》第1册，第33页，台湾国立编译馆1980年版。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42页。

重和循规蹈矩的是生动活泼的学习、生活和社会活动，包括参加家庭礼拜、主日学校及主日礼拜。

留美幼童在美国文化影响下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是对中国封建传统观念的背离，在清廷顽固派看来事关重大，难以容忍。当时负责留学事务的陈兰彬和后任吴子登更是不满，吴多次奏陈李鸿章：“学生在美国，专好学美国人为运动游戏之事，读书时少而游戏时多；或且效尤美人，入各种秘密社会，此种社会有为宗教者、有为政治者、要皆有不正当之行为；坐是之故，学生绝无敬师之礼，对于新监督之训言，若东风之过耳；又因习耶教科学，或入星期学校，故学生已多半人耶稣教；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其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欲为中国国家谋幸福计，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① 1881年6月，时任驻美公使的陈兰彬奏陈：“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极应将局裁撤。”^② 一时间，清廷内外保守士人纷纷指责赴美留学生“数典忘祖”、“丧失德性”、“违背圣贤之道”。期间，容闳为此向李鸿章写信陈辩，并情真、意切、据实、公正地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员们报告留学生的情况，希望能使他们继续学业。然而容闳个人的力量终难与封建保守势力相抗衡，东西方文化融合过程中的碰撞、摩擦、较量也是必然的。1881年7月清政府最终决定将赴美留学幼童全部撤回。

2. 留美幼童回国后的文化贡献

1881年8月留学生被迫辍学，分三批共计94名回国（其余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38页。

^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第165—166页。

26名因病故或留美未归),他们与祖国和家乡亲人阔别多年,归来时,“曾幻想有热烈的欢迎等待着我们,也有熟悉的人潮,和祖国伸出温暖的手臂来拥抱我们。可是天呀!全成泡影……没有微笑来迎接我们这失望的一群”。在往海关道台衙门的路上,“行程迟缓,使我们再度暴露在惊异的嘲笑的人群中。他们跟随着我们,取笑我们不合时尚的衣服”。“……为防我们脱逃,一队中国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如用西方人的想像,是不能形容这被称为学校的地方……”“经过四天的抱怨和不满,我们终于见到上海之最高官吏。三个人一列,由兵勇围绕着,我们又步行经过那些看热闹和奚落我们的人群”。

幼童们不仅受到如此冷漠,对他们的学业和前途也不能公正对待,“完全不按个人志趣及在美所学,幼童去向全由官员决定”。第一批21名幼童均被送往上海电报局,第二、三批幼童由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留用23名,其余50名分至天津水师、机器、鱼雷、电报、医学馆等处。但是留学幼童自强不息,用所学专长服务祖国,逐步改变自己的地位,成为我国自己的近代工业和技术方面的第一批专家骨干。他们中从事铁路工作的16人,有5人是铁路局长;从事矿务的10人;从事外交和行政的有21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的外交官12人,公使2人,外交总长1人,内阁总理1人;从事海军者20人,其中海军将领14人;从事教育、新闻和法律工作者5人,其中大学校长2人;从事电报工作者17人,其中3人任过电信局长;从事商业者7人;从医者3人。概括地说,这些受到西方文化教育的留美学生,具有鲜明的特点:

一是他们具有一定的近代科技文化知识,能够在其岗位上成为重要的技术骨干,在实践中运用、传播西方的先进技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邝炳光的《金银冶金学》一书,是他在河北、山东、湖北从事各项工程建设中运用所学知识技术,总结研究实际经验而写成,在当时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邝荣光是著名的采矿

工程师，在参与众多煤矿的勘测中，由于其技术精良，曾首先发现湘潭煤矿。他还根据实践经验和大量的一手资料，绘制了《直隶省地质图》和《直隶省矿产图》，这是我国最早的有一定水平的地质图。

从事电报事业的留美学生不仅是中国通讯事业的奠基者，而且是中国自办电报系统的主力。他们筹建了许多城市的电报通讯系统，并且为之奋斗终生。留美生梁敦彦曾任教于天津电报学堂，亲自传授电报技术知识，依靠自己的力量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留学生娴熟精湛的近代先进科学技术，得到洋务大员李鸿章的认可，他还上奏朝廷肯定留学生“深明窥要”，即使是那些聘来的洋教习，也都赞扬留美学生“造诣有得，足供任使”。^①

二是具有强烈的报国之心。留学生被迫中途撤回国后，并未因所处环境的冷漠和不公正而放弃学习和事业，强烈的爱国之心始终激励着他们。早在1876年，海关职员李圭赴美参加博览会与留美学生相遇，当问及“想家否”？曰：“想也无益，惟有一意攻书……”1881年，幼童分批被撤回国，途中，美国记者在旧金山采访了幼童，“问其在美与在中国孰佳？答：吾辈万里远游，久离家乡，自以急回本国为佳。又问中美两国服用孰美？答曰：中国服用亦自胜于美国者”。对于记者考问的书目，幼童“均能一一应对”。上海《万国公报》曾就此评论说：“远涉重洋，不忘本国，亦佳子弟也。”^②正因如此，他们回国后，为国家的强盛，克服重重困难，贡献了他们所学的一切。京张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即是最杰出的代表。

詹天佑自1881年在美国耶鲁大学学习工程毕业回国后，曾任教于福州船政局、广东博学馆、广东海图水陆师学堂，又先后任潮汕铁路工程师等。1894年，詹天佑因设计施工建造了中国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第168页。

^② 上海《万国公报》第660卷，1881年10月15日。

第一座近代化桥梁——滦河大桥而被英国工程师学会选举为该会会员。滦河大桥施工地形十分复杂，困难极大，先后由英、德、日等国工程师施工修建，多次失败。无奈之中，负责项目的英籍总工程师请到了詹天佑。詹天佑硬是在当时各方条件均优越于自己，却又都遭失败的外国工程师面前，依靠所学到的知识，凭着中国留美学生的爱国之心和志气，独立设计，独立施工，终于使大桥横跨水流湍急的滦河之上。

1904年，詹天佑担任了修建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他不顾外国舆论的蔑视和嘲讽，带领施工技术人员奔波于铁路工地上。京张铁路并不算长，仅有200多公里，然而，途中山峦叠嶂，地势险峻，还要打通隧道，翻越八达岭山坡。这在当时来说是极大的技术难关，打通隧道必须解决塌方、渗水、通风问题，翻越八达岭必须解决山陡坡度大和机车牵引力不足的问题。詹天佑在一无抽水机，二无抽风机等最基本的施工机械的情况下，不畏艰难，往返勘测，查阅资料，实地研究，克服了一道道难关，终于在1909年8月使京张铁路正式开通。京张铁路的施工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了两年，修建经费较之外国人修建预算节约了4/5，约计白银28万两。京张铁路全线施工达到了詹天佑提出的“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的目标，他所著的《京张工程纪略及图名》不仅是建造该线的实际经验总结，而且也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专著。京张铁路的建成向世人展示了留美归来学子报效祖国的一片赤诚之心。詹天佑所言“勿屈己以徇人，勿沽名面钓誉”，“发扬国人技术，增进国家利益”，“天下一人，中国一人”正是其内心的真实写照。

三是具有不畏列强，勇于为国捐躯的民族感。留美学生归国后，加入海军者20人，其中海军将领14人，其中大部分都参加了1884年的中法战争和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他们以精湛的技术，勇猛善战的斗志在战斗中坚守岗位，履行职责，直至以身殉国，表现了留美学生强烈的民族感。在中法战争中，留美学生

杨兆楠、黄季良、薛有福、邝咏钟顽强拼杀，壮烈牺牲。甲午中日黄海大战中，留美生陈金揆任北洋舰队“致远”号大副，他与管带邓世昌密切合作，在舰身已受重伤的情况下，仍奋勇作战，指挥舰艇直向日舰“吉野”号冲去，不幸为敌雷所中，随即沉没，全舰将士壮烈殉国。李鸿章在上奏折中称陈金揆“争先猛进，死事最烈”，在战斗中牺牲的留美学生沈寿昌、黄祖莲等也都受到嘉奖。

留美学生在各自的岗位上就是这样自强不息，艰苦奋斗，逐步为社会各界所肯定，他们成为社会各界的知名人物，成为各行业的业务技术骨干力量，他们的业绩改变了其回国之初社会舆论的过激指责，而代之以羡慕议论。“有人艳羨之曰：某也之子习机器制造之学，某也之弟善量天测地之功，拔天津某局，拔福建某所，荣以顶戴，而给以俸糈，不及一二年，行见任大事，食大禄矣”。^①人们从留学生的业绩中认可了西方教育的先进，在观念上有了较大的转变，把出国留学看做是一种优遇和光荣，视做学习先进科学知识和技术的佳境，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为中国走向现代化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3. 赴美留学的热潮

从1881年留美幼童中途被撤回国至甲午战争前，赴美留学生仅有十儿人，几近中断。1895年中日战争后，蕞尔小国使国人再次认识到，要国家富强，具有实力，皆在学习西方。于是在赴日留学间接学习西方热潮兴起的同时，漂洋过海，到西方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再掀热潮。据统计，1895—1908年已有近三百余人抵达美国留学，且人数仍在不断增加。这时的赴美留学生，一是自费生，他们来自经济实力雄厚的家庭，不但家庭经济收入不菲，且与外国人有着较多的联系，多通过传教士将子女带到美国

^① 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

留学。如1901年，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由上海带陈锦涛、王宠惠、张煜全9人赴美留学，其中多为自费生；1904年直隶普通中学堂朱文衡、朱淑范、朱文贞3人自费留学；1907年江西葆灵书院女生李马利由传教士云雅达带领赴美留学。二是官派公费留学生，他们是由三部分组成。其一是由清政府直接选拔优秀学生派送出国；其二是一些王公贵族子弟虽够不上优秀学生，但根据清政府有关规定，给予特殊照顾，自然也在官派之列；其三是个别官吏到美国游历考察，成为公费“官员留学生”。上述构成以第一部分人居多数，如1903年湖北选派10名青年赴美；1905年两广和上海分别选派10余人；1906年天津北洋大学选派22人，山西选派了30余人。三是奖学金资助赴美留学生。这种情况可谓凤毛麟角。据查，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赴美考察，几经协商，耶鲁大学每年资助11名中国留学生，干尼路大学每年资助6名留学生，威尔士利每年资助3名女留学生。是年，江苏举行考试，选取10名男生赴耶鲁和干尼路大学留学，3名女生赴威尔士利女学，是为奖学金资助留学生之始。

这时的赴美留学生较之1872年清政府派出的留美幼童情形已大不相同。就社会文化背景看，迫在眉睫的民族存亡促使国人大大转变了观念，他们已普遍承认：“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人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① 出国留学犹如今日成为一种时尚和荣耀，留学生赴美已不再充满生离死别的悲切之心，而是充满激情，亲朋家人对留学生也是鼓励多于挂念。这些都更增加了他们的责任，坚定了他们的志向，加之留学生的年龄一般较留美幼童稍长，生活无虑，学习内容也较之丰富，不再因洋务派急功近利的派遣目的而局限于窄小的学习科目，学科涉及数学、物理、化学、工程、开矿、法律、经济、社

^① 陈学恂、田正平：《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21—322页。

会学、政治学、教育学、哲学、新闻、出版、商业、医学、纺织、印刷、幼儿教育等几十种。留学生以极大的学习兴趣和刻苦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学业。民国时期，活跃于外交界的国际知名人物顾维钧曾回忆说：“在第一年学习过程中，我对很多课外的事情感兴趣。我参加了语言社，并参加演讲比赛。我以《旁观者》杂志编辑部候补编辑的身份写报道。各俱乐部和社团时常邀请我去演讲。我演讲的题目是听众和我所感兴趣的。这些题目都是有关中国的，比如中国的形势、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前途等。这样，我的兴趣就逐渐倾向政治。由于哥伦比亚大学是致力于研究人文学科的，所以我的兴趣越来越集中于人文学科而不是工科。”^①

20世纪初年，美国退还庚款，在华“兴学”，更直接促成了中国派遣留美学生的新高潮。

四、传教士与西学的输入

1. 传教士带来的西学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大清朝的百年禁教和种种严密的限教政策随着门户的全面洞开而难以实行，传教士纷纷涌入。据统计，从1830年至1905年美国基督教新教来华差会共有35个，至1912年来华传教士共2038人。^②其原因有下列几种：

一是中国封建制度政治权力结构关系和自然经济结构关系的局限，使晚清社会衰微破败，腐朽的清政府处在半殖民地的屈辱地位，在西方列强的威逼之下已无外交可言。对于外来的西方文

^①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31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 参见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119—12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化基督教，出于维护本朝道统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心理需要，虽有意严禁，却无抵制之力。无奈之中所规定的有关政策形同虚设，不足以遏制基督教的扩张。

二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使富有历史责任感的开明知识分子深深感到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咄咄逼人的压力，急切地渴求富国强兵之术。无论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及魏源、徐继畲，还是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从事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他们从不同的深度和层次上，提出学习西方、富国强兵的改革方案，反映了他们怀着时代的紧迫感对西学由不断认识到不懈追求的过程，在客观上则展示了中国社会向现代化发展的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这就使得西学在中国社会有着强烈的内在需求。

三是经过宗教改革后建立的基督教新教，极力反对罗马教皇的控制，建立了适合君主专制和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教会，并确立了新的教义。在资产阶级理性主义和近代科学的影响下，基督教新教与近代科学和社会哲学相调和，积极进行一些社会文化活动，并作为其神圣职责的一部分。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士正是带着这种新的特点来到中国，在布道传教的同时，也从事一些西方文化、教育的传播。

四是洋务派对传教士采取区别对待政策，肯定那些在客观上传播西学的传教活动，并聘用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传教士作为新式学堂的教习，并明令规定其“只准授业，不得传教”，这就在客观上发挥了西学载体的强大作用。

正是在上述诸多因素影响之下，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布道时，承袭了明末利玛窦来华传教时所采取的“文化适应”方略。

首先，谨慎地处理了作为外来西方文化的基督教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极力地糅合基督教与儒家学说，力图使“耶儒合流”，具体提出“孔子加耶稣”、“中学西源说”、“救世教成全儒教说”、“中西并重说”，等等。有些传教士也积极主张对儒家思

想应取宽容的态度，并对中国传统的祭祖习俗给以尊重。这就使得基督教得以被容纳。

其次，在传教的方法上，在华传教士除坚持传播上帝福音，“拯救世人摆脱罪恶，为基督征服中国”这一根本使命外，在西方兴起的现代派神学思想影响下，试图以西方文化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以建立一个有利于传播基督福音的社会文化环境。与此同时，采取了顺应中国社会内在需求的“间接布道”的方式，如创办报刊，开办学堂、医院，翻译出版西书，倡立学会，开展社会福利事业等。

由此可见，传教士为基督征服中国而来，但限于在华传教遇到的中国传统文化抵制，不得不借助西学为传教的载体，而传教士在客观上也就成为西学东渐的媒介和桥梁。正如现代学者王尔敏所言：“……西洋教士来华传教，对中国最大贡献，实在于知识之传播，思想之启发，两者表现于兴办教育与译印书籍，发行报刊。自19世纪以来，凡承西洋教士之直接熏陶与文字启示之中国官绅，多能感悟领会而酝酿醒觉思想。同时举凡世界地理、万国史志、科学发明、工艺技术，亦多因西洋教士的介绍而在中国推广。”^①

概览美国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布道的同时所传播的西学，主要是文字、教育、医学。鸦片战争以前，美国传教士步英国传教士来华之后尘，主要依附于英国传教组织。教育方面，只是在沿海如马六甲、新加坡、澳门、广州等地开办小学校，藉此进行传教。近代西学东渐第一人容闳的老师，美国传教士布朗夫妇就曾任教于马礼逊学堂。为了吸引更多的人信教皈依基督，开办医院，进行慈善医疗，这是进行传教的又一途径。1835年，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开设了眼科医院，不仅医治普通民众的眼疾，

^① 王尔敏：《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序言，转引自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第2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连林则徐也曾在此就医。这一时期，美国传教士在文字出版方面，比较有影响的是一些介绍西方的书籍和刊物，如由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创办，后与裨治文共同负责兼撰稿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以及裨治文撰写的《美理哥国志略》，其出版的目的是如郭实腊所说“是通过让中国人了解我们的人文、科学和准则来消除他们的盲目自傲与排外思想。本刊不讨论政治问题，也不倾向于用尖刻的语言激怒中国人的神经。有更好的方式来证明我们实际上并非‘蛮夷’，本刊编辑更重于摆事实的方法来向中国人证明他们不知道的东西还很多”。^①事实上，这些出版物对地主阶级“开眼看世界”确实有着很大的启蒙作用。

鸦片战争以后至19世纪后期，美国在华传教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文字和教育方面传播的西学更为广泛，已居西方各国之首。在教育方面，由于教会与国家的利益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华政策更加明确。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中国人对西学已日益表现出接受的态度，通过办教育便能向更多的人灌输西方文化，最终置换中国文化。从19世纪70年代起，教会大学逐步建立，80年代以后有了较大规模的发展，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达鼎盛。

传教士的文字出版，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洋务运动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主要集中于翻译介绍西书。在当时中国三大翻译机构中都有美国传教士的参与，如传教士丁韪良不仅任同文馆教习，其所译《万国公法》等著作也深受恭亲王肯定；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林乐知等一批美国传教士对翻译馆翻译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籍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广学会对西方社会情况的全面译介对晚清社会变革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其中也不乏著书立说的美国传教士起的重要作用；此外还有花华圣经书房和上海美华书馆以及《中国丛报》也都翻译、介绍了大量的西

^① 转引自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293页。

方科学文化知识。

美国传教士在华所办医院，除早期较有影响的伯驾眼科医院外，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最有影响并卓有成效的当是长老会牧师嘉约翰所开办的“博济医院”，他不仅医治病人，也介绍西医知识，编写医学书籍，创办《西医新报》，还倡办医学校，培养西医人才。60年代以后，美国传教士在华医院已与英国传教士并驾齐驱。

应当说，先进的中国人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和学习西方的强烈紧迫感来自西方列强的人侵，而将之纳入实践，付诸于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行动则是传教士起了中介作用。尽管传教士带人的西学并非完整深入，但却是近代中国汲取西方文化的重要渠道之一，它打破了中国人的盲目自大，使中国人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有了一定的了解，从而产生了思想观念上的变化。可以说传教士所输入的西学间接地推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这是与传教士传播西学的最初目的相悖的，也是传教士始料未及的。

2. 输入西学的林乐知

林乐知（1836—1907年）是美国近日来华传教士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他22岁时毕业于家乡佐治亚州的埃默里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860年受美国监理会派遣来华，抵达上海，此后47年一直在华进行传教、教习、著书、译书、办学、办报。在各项活动中由于他坚持世俗性的特点，获得中国民众民族文化心理的接纳，取得了较好的实效，在客观上传播介绍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

林乐知在华期间有着顽强的毅力并付出了极大的热情。他来华不到一年，美国内战爆发，南北一战便是四年，孤悬海外的他与国内监理会音信隔绝，一切经济来源随之断绝。为了生存，他变卖物品，向其他差会借贷，甚至从事煤、米、棉花的中间贸易。1864年初，林乐知由于冯桂芬的介绍被上海广方言馆聘为

教习，这是他在中国第一次从事教育，也是第一次与中国政府打交道，他在中国所进行的与传播西学有关的活动也从此开始了。

19世纪60年代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洋务派急需培养外语人才，迫于无奈，传教士便被聘为外语教师。林乐知对此丝毫不敢懈怠，他要靠清政府支付的可观月薪来维持生活，需要藉此赢得中国上层社会的信任与支持，更有效地进行传教活动，他坚信外语教习这个职位可以扩大教会的影响。

1869年，上海广方言馆移入江南制造局内，林乐知又应聘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员，一干就是10年。在这里，他翻译的多是史志交涉类西书，这在当时以翻译自然科学书籍为主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来说，他所译的内容就更加有意义了。其所译的《西国近事汇编》、《东方交涉记》等书为洋务派提供了很多可供了解和借鉴的资料。1887年，他又到广学会译书直至去世。在译书方面，他所译自然科学书籍不如傅兰雅专业性强，所译社会政治书籍不如李提摩太的影响大，但也算得上成绩斐然。他总共翻译西书20余种，360部之多，有人因此称他为“翻译界第一人”。^①

著书立说，是林乐知与洋务派接触后所做的工作。鸦片战争以后，闭关锁国的清政府，突然面对华夷混杂、外交繁复的局势，除了外语人才匮乏的问题之外，更为困扰他们的是如何得当地处理外交事务，以免由于无知而授人以柄，被列强勒索和遭人耻笑。林乐知对这些问题看得比较清楚，并且很有针对性地写了《中西关系略论》一书。据熊月之先生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一书中的介绍，《中西关系略论》“全书分4卷。卷一是全书的中心，首置地球两半球图，然后节录中国南北通商大臣及有关督抚关于变通陈法、兴办洋务、破格选拔人才、妥善处理中外关系、

^① 肖黎等主编：《影响中国历史的一百个洋人》，第21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向外国派设使臣领事等问题的奏稿，再后是林乐知本人的议论，所论题目有《论节抄各大臣奏稿大略》、《欧洲与中国关系紧要略论》、《申说欧洲人分布天下》、《论欧洲人分布天下之意》、《论欧洲人散布中原而英俄与中原为接壤之国》、《论中外交接其联络维持之法究竟如何办理》、《论谋富之法》和《续论谋富之法》。卷二首论天道之学，即基督教传教问题，所论有传教来历，传教为人质疑，基督教的派别等；末论鸦片烟之害。卷三论回教及西域问题。卷四为附录，有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威妥玛的《新议论略》等”。从书的主要内容看，并不是直接的外交成规介绍或外交事务指南之类，而是从中西异质文化的大背景下，分析了中西社会之间的差异和区别，引起人们对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其看中国问题的角度对当时仍未完全摆脱天朝自大观念的人们起了很好的警示作用。此书发行后，引起世人的关注，销售极快。林乐知也曾将此书赠送给郭嵩焘。

林乐知译书、著书的成绩，在当时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得到世人肯定的评价，也使清政府感到满意。1875年，林乐知的月薪不仅被提高，还在次年赏给五品衔。为此，林乐知欣喜不已，在给女儿的信中他不无自豪地说：“真棒，你爸爸终于成了一名官员并且拥有一枚勋章（按：当为“顶戴”）——多好的奖赏！勋章在中国比在其他国家更有价值，你瞧，这就意味着更大的奖赏……对一名官员来说，它们就是大量特权和重大的权力与影响，而这正是我在该国使自己的工作被尊重和获得成功所需要的。我也许是第一个获得这种高位的新教传教士，我希望能充分利用它。”^①

林乐知不仅做教习、译书、著书，1868年，他还创办了《教会新报》。这是一份自筹经费、自采自编、自己发行的私人报

^① 转引自：胡卫清《美国监理会在华教育事业研究（1848—1911）》，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230页。

纸，它面向在华传教士和已入基督教的中国教民，宗教色彩极其明显，目的在于沟通教民之间的“共见共识”，使之“虽隔万里之远，如在咫尺之间”。这一办报目的局限了报纸所载的内容，自然也就使读者很有局限，报纸的销路也不乐观。对此，林乐知很快就调整了报纸的内容。他适洋务运动之需，增加了中国人所关心的政治、社会问题的内容，刊载对中国政局的各种报道和评论，同时也增加了对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介绍。由于报纸内容的较大变化，读者的范围也由原来的传教士和教民扩大到社会各个阶层。后来《教会新报》改名为《万国公报》，并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本书第三章对此做了详细论述）。

最能体现林乐知从事西学活动世俗性的当是他所创办的中西书院。1881年，林乐知辞去上海广方言馆教习和江南制造局翻译职务，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担任监院（即院长），着手筹建校舍，拟订章程。创办书院初期，条件并非很好，仅是经费来源就不宽裕，除监理会提供一定的资金以外，主要还是靠社会人士捐助，总共才1000元左右。然而，中西书院在次年正式招生开学。林乐知辞去他所从事的教习和翻译职务，重新开辟一个新的活动渠道，最根本的还是为了他所从事的宗教事业，正如他在《振兴中华布道事业》一文中所指出的“最要三端：一为设立教会大学；二为译书撰报；三为创立印书局”。^①这样一种明确的指导思想也使他看到，上海作为中国首先开埠的口岸城市，随着商业的繁荣，人们对于西方的科学文化技术和外语日益表现出渴望学习的热情。这种接纳西方文化的宽松社会文化氛围，正是他施展自己母语长处，网罗学习外语人才，从而扩大教会影响的好机会。另一方面，林乐知曾任教的上海广方言馆，有许多学生后来在政府任职，通过他们施以影响，结交中国社会上层人士，这也

^①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第44页，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是林乐知早已渴求的。

为了扩大影响，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吸引更多上层社会子女入学，林乐知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中西书院尚未开馆，林乐知便在《万国公报》上进行有奖征文，并规定应征的文章要“总言书院缘起，中学固益，西学尤益，不重西语特重西学”，以此宣传中西书院“中西并重”的办学原则。除此之外，1881—1884年，林乐知还在《申报》上发表有关中西书院的启示、消息、评论、考课名单和章程近二十篇。^① 这些宣传由于其世俗性而迎合了那些尽管开明且乐于接受西学，但内心仍以中学为安身立命之本的士大夫的文化心理。

中西书院的课程设置与洋务学堂几乎相近，宗教色彩已不明显，我们将之与京师同文馆所开课程进行比较分析：

中西书院与京师同文馆课程一览

	中西书院课程		京师同文馆课程
第一年	认字写字，浅解辞句，习学琴韵，年年如此。	首年	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第二年	讲解各种浅书，练习文法，习学西语，年年如此。	二年	讲解浅书，联系文法，翻译条子。
第三年	数学启蒙，各国地图，翻译选编，查考文法。	三年	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第四年	代数学，讲求格致，翻译书信等。	四年	数学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第五年	考究天文，勾股法则，平三角，弧三角。	五年	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第六年	化学，重学，微分，积分，讲解性理，翻译诸书。	六年	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第七年	航海测量，万国公法，全体	七年	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

^① 参见胡卫清：《美国监理会在华教育事业研究》（1848—1911）。

功用，翻书作文。

国公法，练习译书。

第八年 富国策，天文测量，地学， 八年 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
金石类考，翻书作文。 国策，练习译书。

将中西书院与京师同文馆的课程表对比，我们不难发现，中西书院的课程与洋务学堂的课程几乎相同，就是进度，也是按照近代教育体系的设置，体现了循序渐进的原则。倒是中西书院作为教会学校，这样的课程设置显示了其特点。首先课程设置已无明显的宗教色彩，学校没有规定宗教的必修课，就是礼拜日的讲经课，也由学生各随自便，参加与否，没有硬性规定。其次是课程设置坚持中西并重，书院院规曾明确规定：本院兼课中西两学，学生中学书籍自备，西学书籍由院部代购。这些特点既打消了人们对教会学校的疑虑，使那些只想学一些西方科学技术和外国语言，以便在商业繁华、洋行林立的上海谋得薪金丰厚的职位却并不想为上帝奉献终身的人们踊跃入学，又可以通过办学，在西学知识的传授中，对学生施以潜移默化的基督教影响，以达到培养的人才虽不是专业传教士，但却是具有基督教信仰的世俗人才的目的。

林乐知在办学中有意采取的做法，因突出了世俗性，更接近当时中国社会士人的文化心理，使中西书院开办以后“遐迩闻之，群相推许，父诏其子，兄免其弟，负笈而至者，分院几莫能容”。据说，入学人数多达400人，因名额所限，未能入学者则有数百人。^① 在入学者中，学生大多来自条件优越的家庭，这些学生的家庭正是林乐知想方设法要接近的社会阶层。他曾这样说：“当人们知道几乎没有一个学生来自普通教会学校所能接触到的那个社会阶层，他们就会懂得我们这种举动是何等重要了。我们曾充分估计到这个阶层中已经入校的许多人物，会为学校所

^① 沈毓桂：《中西书院议》，1882年12月17日《申报》。

带有的宗教色彩而感到畏缩，但在华人的心目中，这项事业所能预期的种种利益是如此之大，以至无论如何，我们没有听到任何人提出反对意见。”^①

中西书院开学以后，学生的中西两学基础参差不齐，年龄各异，更主要的是，学生的学习目的并非林乐知所想的那样，“乐知创立中西书院，栽培中华子弟，本图上达，非敢浅小视之。历有四年，所授生徒或半途辄止，或乐于小就，及今始知诸生来院大半仅欲贸易而已”。^② 尽管如此，林乐知还是调整了学制和课程安排，将学制分为八年学制以培养高等教育人才，四年学制相当于中等教育水平，学生在入学之初，根据自己的志愿选择。林乐知还针对学生基础不一的现状，按照学生知识水平程度，将学生分为四个类级。每级所学内容不同，更便于学生吸收掌握所学知识。应当说林乐知采取的这些措施是积极可行的，虽然与他最初设立教会大学的计划有所违背，但由于他仍然保持了初创书院时的世俗性特点，学校在培养现代技术人才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是客观存在的。

4. 李佳白与尚贤堂

李佳白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传教士，他并不仅仅是为了传教才不得不借助西学，而是对中国文化的价值有着一定的认可，提出“中国宜广新学以辅旧学”说，创立尚贤堂，在晚清西学东渐和中西文化的会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李佳白这位生于纽约的美国传教士，祖先为苏格兰人，在其父亲的影响下，学习华语和儒家经典，并深受中国文化的熏染。大学毕业以后，他矢志传教。1882年，25岁的李佳白受美国长老会派遣来到中国，到了孔子的故乡山东。一到那里，“游乎邹

^① 转引自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619页。

^② 林乐知：《中西书院告白》，1886年2月11日《申报》广告栏。

鲁之乡，登其堂而瞻圣容，巍然在上”，“及入都，见夫宫阙之大，人物之盛，不禁悚然起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淳厚民风使他从内心赞叹中国是“文教之邦，礼貌之区”。

1892年，李佳白返回美国休假，他向美国长老会董事部建议，在中国传教应以士大夫阶级为对象，不要致力于下层。因建议未被采纳，遂与长老会脱离关系，1894年以独立教士身份回到中国，在上层人士中开展活动。甲午战争后，大清王朝败于蕞尔小国的耻辱，使维新志士更加认为，日本的强盛是效法西方的结果，只要学习西方进行变法，中国就能富强。李佳白作为一位来自西方的自由传教士，对中西方文化的互补性提出了比较客观又不同凡响的主张。他说：“中西并立，新旧迭乘，专尚西学而竟弃中学者，非也。然笃守中学，而薄视西学者，实属失之太隘。”因此，要“明西学”，“考泰西史鉴为借鉴之资”，“取彼所长，补我所短，有利必兴，有害必除”。^①李佳白这一汲取外来文化的态度无疑是正确的，特别是国家战败，士人情绪激愤，更需要对中西文化内在的价值有中肯、深入的比较和认识。任何一种民族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都是在自己文化发展的基点之上，而不可能是零的起点，因此就需要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精华发扬光大，对外来文化持正确的择优汲取原则。但是，李佳白最终在坚持这一主张的同时，又走向了它的另一个极端，极力维护中国旧学，逆中国民主革命发展的潮流，从力倡中国变法维新走向完全回归中国旧学，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势力相结合的一种必然结果。

戊戌变法以后，李佳白主要致力于尚贤堂的创办活动。尚贤堂1897年2月在北京成立，英文名为“中国国际学会”（China International Society）。李佳白自任院长，并邀请了在京的清朝官

^① 李佳白：《中国宜广新学以辅旧学说》，载钱钟书主编：《万国公报文选》，三联书店1998年版。

僚和士大夫作为尚贤堂的会员，以便在中国上层人士中扩大影响，开展工作。梁启超曾在《记尚贤堂》中记述当时情形：“西儒李佳白，创尚贤堂于京师……李君游中国十余年矣，昔在强学会，习与余相见，会既辍，李君乃为此堂，思集金二十万，次第举藏书楼、博物院等事，与京师官书局、大学堂相应……李君到上海，为余道此事，且道将归国，求助于海外之好善者，以大就此事……”^①我们也可从李佳白的《尚贤堂文录》中看到他创办尚贤堂的因由：“客有问于余者曰：吾子尚贤堂何为而设也？余曰：将以救时也。客曰：子居中国久，亦知中国治术、学术异于泰西诸国，不能强不同以为同乎？余曰：唯唯，否否。异者自异，同者自同也。客曰：敢问如何？余曰：古今立法，凡以有得于国，有济于民耳。西国然，岂中国独不然？余此堂之设，正欲使风气开于首善。上者行之，下者效之……”至于尚贤堂名称的由来，李佳白也做了一番解释，他说：“余游中国久。闲观中国古昔圣贤载籍极博，志事之赅备，义蕴之覃邃，本与西学异流同源，而谆谆垂教。上至政治，下及德业，靡不精详条贯，著在简编。余独惜夫聪明才智之士，徒资诵读，不复求之实用。徒袭故常，不复进而自新。所谓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者，人人知之，人人略之，人人言之，人人望之。此中学之不幸也。夫中学与西学异流同源。余言之，余信之。中国士大夫之博通淹洽者亦必能徵之。而独怪夫屏斥西学者，混于老生常谈，迂儒浅见，既玩泄中学而不能研究，又鄙夷西学而不肯扩充；震惊西学者，狃于苟安，积习畏难。初心既矫诬中学而不切讲求，又骇诧西学而不敢趋步。遂使中学、西学判若径庭，隔若秦越，渺若河汉，悬若霄壤。此又中学之不能融会西学，而中学之大不幸也。余惟中西虽别，其谆谆垂教，要于勤善则同。中国古昔圣贤之书，余读之余，甚佩服之。中国聪明才智之士，余见之，余亦

^① 梁启超：《记尚贤堂》，见《饮冰室合集》（1），中华书局1989年版。

佩服之于是不辞固陋，不恤非议，将欲因聪明以发愚蒙，借才智以逮庸，众俾习中国古昔圣贤之教者，无不可彼此相同。毋歧视，毋背驰，毋回惑，毋墨守。而中西之学同此心源，同此化理。自时厥后，大同之象可得而睹，则尚贤堂之设余亦何能已乎？或曰：堂名[尚贤]，曷取乎尔？《周易》有之：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有以尚贤也。是以自大佑之吉，无不利也。兹堂之设，既协于天理人情，又本乎履信思顺。庶几谆谆垂教、要于勤善之意。当无悖乎中国古昔圣贤，而亦将共谅于中国聪明才智之士也与！”^① 尚贤堂设在北京，按李佳白的认识，是因“京师为首善之区，尤不可迁延时日，遂拟创设尚贤堂，期与志士仁人相观而善”。^②

1900年，李佳白一手创办的尚贤堂在如火如荼的义和团运动中焚毁。从欧美各国募捐而归的李佳白到了上海，于1903年重建尚贤堂，继续他的活动。

尚贤堂初创时，其章程规定：“拟设一学馆。凡中国俊髦之士，有愿来习某种西学者，数月之间可得大概。如欲兼习各种西学，则须数年方可……”“拟设洋文学馆，俾贵家子弟习学洋文。若中国日后广设洋文学馆，本学馆随时裁撤。”“拟设格致书院，存西学所用各种器具式样，逐件试验，查究理数，讲求一切强盛之法。”“拟设一大厅，荟萃中西各国乐器，择日歌诗奏乐，即于此厅。招集中西善士，凡道德高深，学问渊博者，相与辩论切磋，并讲一切济世人之法。”^③ 除此之外，尚贤堂还附设了教务、商务、教育、妇女等联合会，并举办了大量演讲活动，请中西人士“讲一切济世救人之法”，通过各联合会的周例会，邀请“儒、佛、回、道各大教中的名人”演讲，以“恢拓学者之志量”，“研

① 《尚贤堂文录》，见钱钟书：《万国公报文选》，第592页。

② 同①，第586页。

③ 同①，第589页。

炼儒者之才能”，达到基督教与儒学思想“互相和合，互相敬爱，互相劝勉，互相辅助”。

辛亥革命后，李佳白竭力维护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认为：“中国数千年来安于帝制，乐于尊皇……今虽该皇帝为总统，易君主为民主，然人民安于习惯，其心理上仍望有天与人归，秉权出治之一人。”“治理中国永久之政策，舍专制必无适宜之体……〔中国〕未识共和之精神，……多缺乏自由之经验。”^① 尽管李佳白的说教得到袁世凯的嘉奖，但他也已是穷途末路，迫不得已于1917年11月回国“休假”。四年后，当他重返中国时，以五四运动为开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使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在惊叹“中国之乱，无时蔑有，而尤以近十余年来为更甚”的同时，把尚贤堂活动的重心转移到北京，并组织了“中外睦友会”、“中外教务联合会”等，以图扩大声势，继续坚持宣传“孔子加耶稣”。随后，他又南迁上海，却并无进展。1927年9月，李佳白在无奈之中死去，尚贤堂的大门也随即关闭。

3. 教会学校的兴起和发展

美国传教士在华创办的第一所教会学校是1830年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的贝满学校（Bridgman School）。19世纪20年代，美国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同时也希望以宗教作为其向外殖民扩张的途径，国内相继设立了基督教差会，最早于1810年设立了美部会（后改为公理会），1814年设立了浸礼会差会，1820年设立了圣公会、美以美差会等。正是应美国殖民扩张和基督教向外拓展的需要，1829年10月美部会派裨治文来华进行传教事业，在给裨治文的信件中，美部会称：“你为美国教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在中国人中间推广福音，感到这是他们指定你去担任具有巨大利益的责任的

^① 《尚贤堂纪事》，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273页。

一项事业……终有一天，福音将在中华帝国获得胜利，它那众多的人民将归向基督。你要以此自勉，让那神圣的热情在你心中燃烧，竭尽所能和坚韧不拔。作为基督的一个战士，你要抱着希望，在这个成就中高兴地有你的…份……

“本委员会料定你的注意力将有数年时间放在掌握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上……希望广州或澳门能作为你常住或永久居住的地方。

“本委员会要你做的另一项工作，就是希望你利用一部分时间去散发传单和书籍，特别是《圣经》，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公开传教，介绍福音知识的最好手段，乃是印好的传单和书籍……

“除了别的工作外，要牢记你的首要任务是在中国人中间推广福音……当前拦住去路的障碍必须扫除，准备工作必须完成。我们仍然认为，不一定需要很长的时间，福音的影响就将在中国察觉到，虽则我们并不企求奇迹的出现，可是上帝的旨意会迅速打开一个宽敞而有效的门户……其影响将扩充到那些建立得最长久最安全的政府中去。因此要抱着希望而工作……

“由于你要去的地方范围大，利益广，你将比几乎所有的兄弟们有更多的便利，为此，在你工作和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要求你把有关中国人民的特征、状况、风俗、习惯，等等，特别要对这些情况受他们的宗教影响，向公理会差会部做出完整的报告……”^①

带着双重任务的裨治文于1830年抵达中国的广州，在先他而来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指点下，很快就办起了教会学校。然而，这时传教士所办的学校，无一例外的只是为了吸引听其传播福音的信徒以培养其传教的助手，学校只是传教士传教的一种手段而已。传教士们所期望的中国人对基督教的那种虔诚和信仰并

^① Eliza Bridgman edited: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aloman Bridgman*, 第20—27页，转引自谭双泉：《教会大学在近现代中国》，第19—20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没有出现，相反，他们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执着和中国人特有的那种理智、现实对基督教表现出一种冷漠。我们可以从一位传教士的报告中看到，时至19世纪50年代，中国人对传教士传播福音的态度仍是大致如此：“中国人似乎是我所见到过的和了解到的最漠不关心、最冷淡、最无情、最不要宗教的民族。他们全神贯注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将吃什么？我们将喝什么？或是我们拿什么来蔽体？他们留心听道，听了以后说，很好。但只是到此为止。”^①有些时候，街头传教士布道会吸引众多的听者，但他们大多是对外国人的长相和平仄不定的口音感到新奇，与观赏街头艺人的表演几乎无异。更使传教士大失所望的是，他们认为深受中国百姓欢迎的宗教宣传品和书籍，最终并没实现它应有的精神价值，而是被现实的中国百姓当做废纸去卖，或用来包东西和做鞋底。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传教士便借助学的方式，吸收那些穷困潦倒的幼童，施以基本的衣食住宿，教他们识字读经，使之受教会教育的熏染，通过驯化，培养传教士所需要的人才。当时由美国传教士创办的这类教会学校主要有：^②

创办年代	创办人或差会	教会学校名称	其他
1845年	长老会	崇信义塾	1867年迁至杭州，称育英义塾
1847年	长老会哈巴牧师	基督教寄宿学校	1853年又办第一所女子寄宿学校
1850年	长老会	上海清心书院	

① R. W. Thompson; Griffith John, *The Story of Fifty Years in China*, 第57页，转引自谭双泉：《教会大学在近现代中国》，第28页。

② 参见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第1—38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1850年	圣公会裨治文夫人	裨文女塾	1914年设中学部称裨文女子中学
1850年	美以美会麦利及夫人	福州女塾	
1851年	圣公会琼司教士女士	上海文纪女塾	圣玛利亚女校前身
1853年	公理会传教士卢公明	福州格致书院	次年卢公明夫人创办福州女书院
1859年	美以美会	福州育英女书院	
1860年	长老会教士范约翰等	上海男塾	次年范约翰夫人创办上海女塾
1864年	长老会狄考文与夫人	登州蒙养学堂	1876年改称文会馆
1864年	公理会传教士柏亨利	北京育英堂	
1864年	圣公会裨治文夫人	北京贝满女学堂	裨治文夫人为纪念裨治文而创办
1865年		北京崇实馆	
1866年		上海培雅学堂	1879年与度恩学堂合并为圣约翰书院,后
1867年		上海度恩书院	形成圣约翰大学
1868年		北京潞河书院	
1871年	圣公会主教惠廉	武昌文氏学堂	1891年改文华书院
1871年	监理会	苏州存养书院	1879年博习书院为东吴大学前身

1877年,在华基督教(新教)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传教

士大会以前，欧美新教各差会在华开办的学校共 347 所，招收学生 5917 人，其中美国占 202 所，学生 3117 人。^① 这时学校的生源是那些衣衫褴褛的穷孩子和乞丐；教学内容是宗教读本，传教士所讲的是教义、教规；学生的活动就是参加宗教集会和各种仪式；学生的作业就是背诵教理、教规；西学的内容只是极少的英语和史地知识，因此这些学校大都属于小学的水平，并且不为广大的中国社会人士所接受，可以说对中国传统教育没有构成一定的冲击，但是它却打破了沿袭几千年的传统教育的一统天下，成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种外在因素。

1877 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对教会学校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为首的部分传教士批评了当时教会学校只强调传播福音而实际效果却束缚了传教事业的扩展，主张今后“各教会学校应明确目的，联合办学，通过教会学校来培养具有文化科学知识的中国青年和教会干部，以便按教会的意图向中国其他人介绍、传播现代科学”。^② 为此，要增加学校课程中西学的比重，编写世俗教科书；提高现有教会学校的办学水平，建立一些高水平的学校；改变各个差会或传教士个人分别办学的现状，进行分工合作办学。他的演讲《基督教教会与教育之关系》得到与会传教士和大会的认可，并作为在华基督教各教派对教会学校办学目的和联合办学的正式文件发表，也成为教会学校发展的重要指导原则。此后教会学校在继续发展的基础上，开始联合办学，出现了中国第一批由传教士所创办的高等学府。由于美国教会在强有力的财力支持下，对办高等教育水平的学校积极实施，并且将重点放在最早被迫开放的沿海通商口岸城市和发达地区，因此在为数不多的教会大学中，美国差会几乎全

① 转引自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 211 页。

② 参见：《在华基督教传教士 1877 年大会记录》，第 171—180 页，1878 年上海本。

部包办，英国传教士对此曾直言“差不多中国的全部大学都是由美国人创办与美国人支持的”。当时比较主要的教会大学有：

1878年	山东潍县广文书院后为齐鲁大学	由登州文会馆与英国浸礼会广德书院合并而成
1879年	上海圣约翰书院后为圣约翰大学	由培雅书院和度恩书院合并而成
1882年	上海中西书院	迁至苏州后改称东吴大学
1888年	广州格致书院	1900年迁至澳门，1904年迁回广州后为岭南大学
1888年	北京汇文书院	后与潞河书院合并，1919年改称燕京大学
1888年	南京汇文书院	此为1910年成立的金陵大学前身

这些教会大学与五六十年代的教会学校相比，具有规模扩大、生源增加、经费增多、政府关注的特点。学校联合后，办学规模扩大这是以往所不可比的，更主要的是学校在教学管理、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上日益接近欧美国家世俗大学的体系建制和模式。高层次的文化知识和正规化的学校教育，吸引了更多的学生到校学习，特别是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较早接触西学的社会士人，尤其是那些富家子弟，即使在高额学费下，也乐于进这样的大学，学习那些非常实用而在传统的中国学校中难以学到的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生源的增加，也带来了学费的收入，与以往单纯依赖差会经费支持相比，这些大学更趋于经济上的自立。与此同时，美英政府对这些大学也显示出一定的关注，在吸收留学生时，教会学校的学生也享有其他学校学生的同等机会。这些特点也正是教会大学发展的优势，使得它在20世纪初年至20年代进入发展的鼎盛时期。

教会大学的发展，虽然没有和中国政府建立什么官方的联

系，但它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教育制度的影响并非一定要通过政府机构才会产生。事实上，教会大学的教育在逐步走向世俗化和正规化，并取得一定成效，得到社会一定程度的认可，对中国传统教育的近代化起到了推进作用。

五、译书和报刊

1. 《中国丛报》与中国文化的西传

《中国丛报》或译为《中国文库》，由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于1832年5月创办，至1851年12月停刊，每月1期，每年编为1卷，共20卷。这是一份鸦片战争前后由外国传教士在华创办，出刊时间长、内容丰富和较有影响的报刊。它的创办与鸦片战争前西方列强对华殖民扩张政策密切相关。

19世纪初，西方列强在对华进行罪恶的鸦片贸易的同时，也注重精神鸦片的作用，实施文化扩张。“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收获的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从19世纪40到90年代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由传教士在华创办的中外文报刊就有170种，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中文报刊主要是面向中国读者，与早期拓展基督教传教事业相适应，报刊以宣传基督教教义为主要内容，为了使更多的中国人能够接受宣传，报刊也介绍西方各国的历史、地理、政治、文化、社会风俗、自然科学等。外文报刊则是以在华外籍人为阅读对象，主要介绍有关中国的历史、地理、社会文化、经济物产以及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内容。

《中国丛报》正是在这样一种大的背景之下由裨治文负责创办的。裨治文1801年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1826年大学毕业后到安多弗神学院进修，1829年毕业，随后作为美国基督教新教

公理会传教士被派赴中国。裨治文得到美国洋商奥立芬的资助，免费乘坐商船从纽约起程，于1830年到达广州，住在奥立芬设在广州的商行里。为了尽快了解中国，进行传教事业，裨治文首先师从英国基督教牧师马礼逊学习汉语。两年后，在马礼逊的倡议下，裨治文负责编辑，奥立芬提供经费和一所供编辑、印刷用的楼房，借用公理会运来的印刷机和英文活字，《中国丛报》正式创办出刊。不久，受基督教新教差会派遣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也来到广州，参与了《中国丛报》的印刷和发行以及编辑工作。

裨治文在《中国丛报》创刊号就言明创办此刊的目的，是为所有在华的外国人服务，为了满足西方的经济扩张和掠夺，主要报道有关中国及毗邻国家最可靠、最有经济价值的消息。该刊内容广泛：有中国政府的动态及其研究分析；有中国的天文、地理、江河流域、自然资源；中国商业的发展状况；中国的风俗民情、人际关系；语言文字以及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情况和重大事件。为此，《中国丛报》开辟了宗教消息、书评、文艺杂谈、时事日志、近代中国介绍、中美关系、英国对华政策等繁多的栏目。

《中国丛报》由于其创办宗旨和任务所决定，刊载的内容成为西方各国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渠道，因而也成为西方各国根据本国利益制定对华扩张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裨治文从美国利益出发，也搜集了大量有关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外交方面的资料，对美国政府制定对华外交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在 美国对华扩张初期，这种作用是不能否定的。不少研究人员都认为，中美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中的许多内容，是根据裨治文等创办的《中国丛报》所提供的情况拟定的，而条约中有关准许美国人在东南沿海被迫开放的五口地区建立教堂、美国人可以购买中国书籍和聘用中文教师等，也都是裨治文等人直接影响和作用的结果。

裨治文在任《中国丛报》编辑期间，曾被邀请参观林则徐率领地方官员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缴获的全部鸦片。虎门销烟是维

护中华民族尊严，打击西方殖民掠夺的壮举，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振奋了民族精神。裨治文作为身披宗教外衣的传教士，不仅是本国利益的维护者，当然也积极地充当殖民掠夺的舆论先锋。在鸦片战争爆发以前，裨治文就以西方具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来劝阻林则徐，不要抵抗英国的侵略，遭到严正拒绝。鸦片战争爆发以后，裨治文又鼓动美国政府应不失时机地加入对华战争，当美国海军派军舰为英国侵略助威时，裨治文又充当了美国舰队司令的翻译和助手。

1844年，美国政府派代表团来华，对清政府施加压力签订不平等条约，裨治文应聘成为代表团的翻译和秘书，直接参与了中美《望厦条约》的拟订。1853年，席卷中国半壁河山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建都南京，西方各国在“中立”的幌子下纷纷到访，以图搜集太平军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情报。美国政府也派出了以公使麦莲率领的“色士奎因那”号军舰到达南京，裨治文也陪同前往，并将几天“访问”中的资料整理，写出长篇报告，指出：太平天国一旦成为全中国的统治者，可以断言，必定不会承认中国与欧美各国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裨治文的这个论断与美国公使麦莲给美国国会的报告如出一辙，观点和文字都是一样的。麦莲的报告最终成为美国政府确定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外交政策的根据。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裨治文再次充当美国公使列威廉的翻译和谋士，为美国政府与清政府交涉、签订中美《天津条约》出谋划策、代译重要文件等，他的表现得到美国公使的赏识。为此，公使这样评价说：“1844年帮助顾盛处理公务的译员和助手几乎全都是这些教士，曾在1853年及1854年担任过马礼逊和麦莲主要助手的裨治文，现在仍旧极有贡献。”^① 裨治文在华活动

^① 参见拓晓堂：《裨治文》，见肖黎等主编：《影响中国历史的一百个洋人》，第105页。

直至 1861 年于上海去世。

裨治文作为基督教传教士在华活动一方面依附于本国政府，另一方面又为美国在华殖民扩张掠夺积极服务，这正是基督教对外拓展传教事业和美国资产阶级向外殖民扩张相结合的必然。裨治文本人在华活动经历和由他任编辑的《中国丛报》，为美国制定对华外交政策所起的作用，从民族感情出发，都是对中国人民的伤害。但是，历史也是多角度、多侧面的，我们应当客观、历史地分析认识，从中得出有利于历史发展的积极因素。如果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去认识和分析裨治文与《中国丛报》，可以说它是自明末清初传教士将中国文化西传的继续，其客观作用是将中国文化向西方介绍传播，促进了近代以来西方各国对中国的了解和文化往来。

鸦片战争以后，五口洞开，西学被西方列强的炮火裹挟着再次传到中国，而在此之前即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当是这次西学东渐的源头，担任西学传播主角的是耶稣会传教士。从 1552 年第一位来华耶稣会传教士沙勿略到达广东台山县的上川岛起，耶稣会传教士为了传教，对中国文化进行潜心研究，著书立说，将中国典籍介绍到西方。这次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有如潺缓的细流历经 200 年最终被阻断。当鸦片战争的炮火打破了中国的与世隔绝，西学再次涌来，中国文化也同样以传教士作为媒介被介绍到西方。尽管这只是极其微弱的回应，但它毕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继续。

《中国丛报》就其内容而言，比较客观地记录了鸦片战争前后 20 年间处在激烈动荡和急剧变化中的中国社会状况，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的皇帝谕旨、大臣奏折以及清廷各种对外事件都做了记载。由于它要为西方各国了解中国提供资料，因此该报也曾以大量篇幅翻译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学和科技。例如妇女缠足是中国几朝相沿的陋俗，贻害闺门，“其在富贵之家，居绣阁，弄娇姿，有挛腕蹙之苦，面无奔走劳瘁之忧。若其为庄户

贫困者流，或劳力于田园，或佣身于衣食，或怀抱子女而不得已，或时值妊育而不得安，甚至病体残躯，失目跛足，乞丐为生，皆不得步履如常，一体缠裹”。^①《中国丛报》对中国妇女缠足陋习的起源、程度以及影响都做了介绍。对中国四大古典名作之一的《红楼梦》也做过介绍，但极为肤浅，如《中国丛报》第11期上曾载有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撰写的《红楼梦或梦在红楼》一文，就阴差阳错地把贾宝玉说成是“一个性情暴躁的女子”，还妄加评论说这部小说全是“琐碎无聊之谈”、“毫无趣味”。^②报刊还登载过关于汉字拉丁化表音法的讨论文章，有的文章提出各种不同的汉字拉丁化方案。所有这些对西方国家了解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化的西传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2. 华花圣经书房与美华书馆

华花圣经书房由美国长老会1844年2月初创于澳门。1845年7月在传教士柯理的提议下，迁至宁波，其原因是同澳门相比，在宁波书房所需的费用要少。除此之外，鸦片战争后，五口被迫通商，传教士们长期渴望深入沿海大城市传教的阻力消除了，在港澳活动的教会纷纷迁往内地，美国长老会活动的中心也随之转移到宁波。

1845年9月华花圣经书房正式启用。“华”即中国，“花”即花旗国，也就是美国。华花圣经书房迁至宁波后，组成了出版委员会决定出版方面的一切事宜，从选定书目，到编辑、印刷、校对以及出版数目、发行管理等。1860年以前，出版委员会主任分别由柯理（1845—1847年8月）、罗密士（1847年8月—1850年）、歌德（1850—1853年12月）、伟理哲（1854—1858年9月）、姜别利（1858年10月—1860年底）担任。

^① 《万国公报》1877年2月10日，第6册，第422页。

^② 参见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第17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柯理，美国长老会传教士。1843年被派到中国，先后在港澳传教，因他精通印刷业务而负责华花圣经书房，直至1847年辞职赴沪。

罗密士，美国长老会传教士。1844年被派来华，先是在舟山进行传教活动，后到宁波。因身体原因于1849年回国，在加州华人中进行传教活动。

歌德，美国长老会传教士。1848年从印第安纳州一所大学毕业后被派到中国，在宁波传教，负责华花圣经书房直到病逝。

伟理哲，美国长老会传教士。1844年被派来华至宁波，参与华花圣经书房和长老会在宁波所设的男童寄宿学校。1859年回国后在家乡仍负责一所学校。

姜别利，美国长老会传教士。17岁时从爱尔兰移居美国。曾在费城做过印刷学徒，后在纽约从事《圣经》出版工作。1858年奉派来华，负责华花圣经书房。1871年回国。^①

五口被迫开放以后，传教士在这些地区积极活动，文字出版和教会学校尤为活跃，熊月之先生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一书中所列举的有关数据表明，宁波仅居上海之后，成为出版和教育较为集中的地区。1860年以前五口地区文字出版情况详见如下：

五口通商地区文字出版情况（1860年以前）

地区	出版总数	宗教类	介绍西学类
广州	42	37 占 69%	13 占 31%
福州	42	26 占 61.9%	16 占 38.1%
厦门	13	13 占 100%	

^① 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169—170页。

宁波	106	86 占 81%	20 占 19%
上海	171	138 占 80.7%	33 占 19.3%

华花圣经书房迁至宁波以后，由于其采用比较先进的印刷技术，出版质量明显提高，数量大大增加。王立新教授在其所著《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中对此做了详实的研究统计：

华花圣经书房印书情况表（1844—1859）

年份	1844	1845	1846	1847	1848	1849	1850	1851
册数	39500	7000	不详	52734	164893	75850	66400	不详
页数	不详	不详	635400	1819092	3994350	1724700	3000000	不详

年份	1852	1853	1854	1855	1856	1857	1858	1859
册数	不详	82000	84700	112018	不详	110800	不详	不详
页数	不详	2800000	4012800	4602018	不详	4505600	6175460	7398560

1860年以前，华花圣经书房的出版物除具有数量大的特点以外，内容多是另一个特点。在大量的宗教出版物之外，也还有天文、地理、历史、经济、语言、道德、风俗等内容的读物。如天文、地理方面的书籍主要有《日食图说》、《航海金针》、《指南针》、《平安通书》、《地球图说》和《天文问答》；历史方面的书籍主要有《古今万国纲鉴》、《万国纲鉴》；经济方面的书籍主要有《生意公平聚益法》；语言学方面的书籍主要有《宁波土话初学》；道德、风俗方面的书籍主要有《赌博明论略讲》、《鸦片六戒》、《清明祭扫坟墓论》等。此外还有综合性科学书籍《博物通书》。

这些读物的内容，一是多为鸦片战争以后，最早向中国人介

绍的地理学、天文学方面的知识，不仅对中国知识界，就是对整个中国社会都有着积极的启蒙作用。二是所介绍的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具有很大的实用性，如《航海金针》、《平安通书》，从天文、地理学的角度阐述分析了海上台风、潮汐规律、四季节气，沿海渔民很容易接受有关的科学知识。

华花圣经书房出版的有关西学书籍，深刻地影响了鸦片战争以后人们的思想，这是其又一特点。如魏源在他最具影响的著作《海国图志》中，较多地引用了该书有关的资料，其中收有地图76幅，分地球全图、各洲图、各国图、沿革图等。徐继畲在《瀛寰志略》中将大地的形状形象地描述为“大地之土，环北冰海而生，披高下垂，如肺叶凹凸，参差不齐”。这种认识是对传统的世界舆地观的彻底否定，“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观点受到极大的动摇，人们已经承认，世界不再是只有中国，外国也不再仅仅是那海面上的几座小岛，四大洲、五大洋、南北极以及地球的经纬度和全貌都如实地展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虽然只是了解西方的开始，但意义是深远的，天朝上国的观念一经打破，就使中国从封闭式的传统文化向现代开放式文化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19世纪60年代起，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大量引进。为适应有关书籍和译著的出版，由政府官办和民间商办的出版机构不断增加，出版机构由教会独占鳌头的局面不复存在。为了华花圣经书房的发展，当姜别利做出版委员会主任时，在他的建议下，经长老会同意，1860年12月将书房迁至更有发展前景的上海，易名美华书馆。随后，美华书馆有了较快的发展：

一是印刷技术不断改进，设备精良、技术先进、工效提高、成本低廉。书馆早在宁波时所用印刷机器就是长老会从美国运来的比较先进的活字铅印。姜别利在上海负责书馆事务时，又进行了重大的印刷技术改革，发明了电镀中文字模。与过去手工雕刻

字母相比较，不仅笔锋清晰，字型完美，而且省时省钱，经久耐用。因此，姜别利的发明，被认为是印刷史上的一次革命。与此同时，姜别利对印刷的检字、排字方法进行了革新，将数以万计的汉字，按使用频率排列为常用、备用、罕用三大类，将其置放在他所创造的形似元宝的木架中，使排字工取字的速度大大加快。

二是出版的西学书籍大为增加。较为知名的有《格物质学》、《代形合参》、《八线备旨》、《地理全志》、《造洋饭书》以及《地理略说》、《五大洲图说》、《眼科证治》、《心算启蒙》等。美华书馆对西学书籍出版的增加，除洋务运动发展的需要外，也是教会出版机构在发展中适时地调整出版发行方向，不断扩大世俗读物出版的结果。

美华书馆的发展，很快就成为基督教在华最重要的出版机构和规模最大的印刷厂，在业务方面取代了一直领先的墨海书馆，基督教会重要的报刊和书籍以及《万国公报》均在此印刷，美华书馆前后50年间，共发行图书40万册，至1897年商务印书馆成立后，其垄断地位才被打破。1913年美华书馆与华美书馆合并为协和书局。

3.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第一批中文藏书

19世纪60年代，文字出版物作为不同国家间文化交流的形式已为人们熟知。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作为国家政府间正式交换出版物，第一次是在1867—1869年间。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的数百万册“东方语类”图书中，有一批近1000卷、130套的中文藏书，每一套书都题着：“赠美国政府——中国皇帝，1869年6月。”准确地说，这批书是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所赠图书的回赠，但它却是中国图书首次在美国出现，也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先例。这次出版物的交换历时两年，其意义远远超出中美文化交流本身。

交换出版物首先是由美国方面提出的。1867年，美国史密森博物馆最先提出以美国官方文件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进行交换；1868年下半年，美国农业部又提出希望通过交换方式得到中国的书籍和植物种子；随后美国政府土地局也提出希望得到中国人口和税收的数字。美国国会应这些政府部门的要求，早在史密森博物馆提出要求后，就于当年3月2日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向史密森博物馆提供美国政府印制的50份文件，用于同其他国家交换官方出版物。根据这一法令，美国国务院将史密森博物馆关于执行国际交流法的通知，转发到驻北京的美国公使馆。

美国政府部门提出对中国出版物的要求及国会及时地通过了有关法令的时间正值美国南北战争刚刚结束，国内矛盾相对缓和，战争使北部工业资本集团控制了联邦政府，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日益广阔的市场、原料以及劳动力就成为资本主义发展最亟需的。美国资产阶级正是为了寻求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对东方大国——中国的一切产生浓厚的兴趣，急于得到它的有关资料。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政府向史密森博物馆提供了官方的若干文件，并将其中有关农事、机器及旧金山地理的部分馈赠给中国政府，以换取美国政府部门所需要的中国方面的资料。可见，美国政府提出交换出版物的要求，同样是为了本国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需要，只是这种要求以“文明”和“友善”的方式进行，并在客观上具有文化交流的积极意义。

史密森博物馆的要求在转年的3月27日，由负责美国驻中国公使馆事务的塞缪尔·韦尔斯·威廉斯向总理衙门提出。为了促成这次出版物的交换，威廉斯以极大的热情向总理衙门负责此事的官员董恂解释此次交换的目的、好处和预期的结果。然而，中国有中国的办事程序，两国互换出版物，不仅事关洋务，还牵扯到前朝有无成例可循。因此互换之事还需要理藩院来决定，并非轻而易举就可以做的。显然，中国政府并没有立即做出积极的回

应。为此，威廉斯在给史密森博物馆的回信中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即根据中国的情况可以实行渐进的方式。他在信中写道：“中国政府不断地出版或扶助有价值的著作，但它既不像我们那样发行政府部门报告，也不出版任何官方报刊，以便让人们了解政府的工作、法令或任免情况……这三朝皇帝对文学的爱护资助不如先朝，假如由国会下令印制的那一批适宜交换的书籍，今后能用于交换先朝的某些统计资料和政治性书籍，其结果无疑对彼此都有利……眼下，我想，在全中国，能够完全读懂美国政府所赠送的这些书籍的中国人不会超过二十个，而在美国能查阅中国政府可能通过交换送给你的那些著作的人恐怕连十个也不到（不包括华人）。所以，目前可能以暂不强调这一问题为宜。”^①

半年之后，由于约翰·罗斯·布朗受任为驻中国公使，两国互换出版物之事又重新提到日程上来。在这期间，由于美国农业部特别渴望得到有关中国农业的资料，在中国政府还未做明确答复的情况下，就任命查尔斯·D·波斯顿上校为特使前往中国，并带给中国政府一批美国的各种谷物、蔬菜以及豆类的种子，一些有关农业、机械和矿业的书籍，还有太平洋铁路的勘测图和报告。不言而喻，美国政府当然是想以此来使中国政府做出相应的回赠。布朗公使对此解释说：“我们预期的目标是建立一种互换制度，使美国政府能为中国提供特别服务，同时也能更多地了解贵国的文学、教育和财政制度，并能更直接地了解贵国的农业体制和产品。”

波斯顿上校到达北京的时间是1868年9月29日。这时，洋务运动已使中国官员对与外国人打交道并不再觉得新奇和发怵，但对波斯顿上校的到来还是谨慎从事。总理衙门不失礼节地向布朗致谢：“美国政府所赠书籍与种子均已收悉，不胜感谢。我们

^① 转引自李明欢译：〔美〕钱存训《中美第一次交换出版物》，中美关系史译丛，第2辑。

拟以同类物品相交换。此举表明贵国政府极为重视发展农业，并怀有促进和加强两国现有友好关系的愿望。”^① 在原则同意互换出版物后，总理衙门的官员也在仔细地查找着有关记载，希冀有先朝的成例可供引用，以免有失当之处。

经过一番查询后，1868年11月17日，恭亲王向皇帝呈上奏折称：“本年九月（即1868年10月19日），美国使臣劳文罗斯（即约翰·罗斯·布朗）致臣等信函，称其政府已派薄上敦（即查尔斯·波斯顿上校）带来有关农事、机器、旧金山地理等书籍，并五谷若干呈上，更望以中国书籍谷种互换。臣等溯查道光二十五年间（1845年），俄罗斯国曾经呈进书籍，由理藩院奏明，钦奉谕旨在于案。臣等当即行查理藩院，旋准抄录道光年间俄国进书原奏。

“臣查原奏内称：据俄罗斯文称，‘因前蒙赏给伊等住京人书籍，令由该国萨那忒衙门备送俄罗斯书籍呈进’等因。复经臣等行查内务府，转查道光年间颁赏俄罗斯住京人系何项书卷，现尚未覆到。臣等查道光年间俄国因颁赏后始进书籍。此次美国系先以书籍谷种备进，与俄国案虽相同，惟先后各异。

“臣等检阅美国使臣来函，意重农人蒔种，深望中国换给书籍。词颇恪恭向化，未便拒绝不受。当将书籍谷种，暂在臣衙门收存。一俟内务府覆到，臣等查酌情形。应如何颁赏美国书籍谷种之处，再当请旨遵行。兹将书籍四本、谷种五十二包，封送军机处。余仍存臣衙门。谨抄录美国使臣原函，恭呈御览。”

御批：“知道了。谷种交军机处。书籍留总理衙门收存。”^②

正当总理衙门等待朝廷答复时，美国驻中国公使再次提出交换出版物的要求。这一次，总理衙门援引与俄国互换书籍的成

^① 转引自李明欢译：〔美〕钱存训《中美第一次交换出版物》，中美关系史译丛，第2辑。

^② 《筹办夷务始末》第62卷，第17—18页。

例，提出了具体办法。恭亲王在第二次给皇帝的奏折中写道：“窃查上年九月间（1868年10月19日），美国使臣劳文罗斯（即约翰·罗斯·布朗）以书籍谷种备进。当经臣等行查理藩院、内务府道光年间颁赏俄罗斯国系何项书籍，查明声覆，以凭酌办。并将该国所进书籍谷种，封送军机处备查。旋据理藩院咨覆：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据住京俄罗斯达喇吗佟正笏，呈恳请领唐古忒干珠尔经、丹珠尔经各一部，曾经奏明颁给只领等因。兹于本年二月间（1869年3月25日），复据美国使臣呈递臣衙门照会，称本国书籍业已披览，尚未得觐中华之书，并议检查中国民数册籍。臣等当即备文照复，告以：‘中国民数，每年各省咨报，户部并无成书。’惟查道光二十四年颁给俄罗斯经卷，该国即备书籍呈送。此次既已收受美国书籍谷种，未便不答。臣等共同商酌：由臣衙门购买中国书籍共十种，装成一百三十套，并中国五谷菜子共十六种，装成五十六匣，花子五十种，装成五十匣，一并发交该使臣只领，以示酬答。”

御批：“知道了。”^①

总理衙门在得到皇帝的钦准后，于1869年6月7日将书籍、五谷菜子和花子回赠给美国公使。非常有趣的是，总理衙门并没有按照美国政府的要求提供所需的资料，而是一批雕版印刷考究的中国典籍和科学著作，主要有儒家经典、礼仪、医药、农业、语言、针灸、数学和玄学。现将钱存训先生研究所得这批书籍目录及校注引用如下：

十部出版物书目表

1. 《皇清经解》：钦定十三经，共366卷（实际360卷），分成50函，由总督阮元监修，于1829年在广州印行。十三经包括《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孝经》、《论语》、《孟子》以及公元前150年

^① 《筹办夷务始末》，第66卷，第1—2页。

汉代的词书。该版本汇集了公认的有关《十三经》的最有价值的注，以及其他专家的疏。

2. 《五礼通考》：共 120 卷分成 12 函。1754 年印行于江苏扬州。这五部古代著作的内容为有关婚、丧、军、宾、嘉时应注意的礼仪。

3. 《钦定三礼》：“三礼”即“周礼”、“仪礼”和“礼记”。本书有部分包括在前书中。1749 年在北京印行，共 144（136）卷，分为 18 函。

4. 《医宗金鉴》：1740 年印行于北京，共 91（90）卷或 12 函。此书部分包括公元 50 年左右在世的一位医生的著作，其余 58 卷是治疗各类疾病的大量要则。

5. 《本草纲目》：1655 年印行于北京，共 40 卷或 8 函。

6. 《农政全书》：1837 年印行于贵州省，共 24 卷或 4 函。

7. 《骈字类编》：1727 年由政府印行于北京，共 120 卷或 20 函。此书包括数万条中文词目，从名家作品中摘举例证对这些词汇的用法和意思加以注明。按类编次。

8. 《针灸大成》：1839 年印行于江西，共 10 卷或 2 函。书中有一幅人体图标明针灸穴位。

9. 《梅氏丛书》：康熙朝一位学者梅氏所著数学丛书。1707 年印行于北京，共 10 卷或 2 函。主要论述高等数学、二次曲线和天文问题。

10. 《性理大全》：根据永乐皇帝的敕令于 1416 年在北京印行，共 16 卷或 2 函。本书选录了中国历史上不同时代的 116 位学者有关政治、道德、玄学的见解及著作摘要。

十部书的校注：

1. 《皇清经解》：清代训释儒家经典书籍的汇刻。阮元主编。搜集清初至乾隆、嘉庆年间的经学著作 74 家，共 180 余种，1400 余卷（赠美国 366 卷）。此书包括许多清代学者考订训释的成果，可以参见清代经学的演变，并可供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语言文学等参考。

2. 《五礼通考》：清秦蕙田编。共 262 卷（赠美国 120 卷）。继清初徐乾学《读礼通考》而作。汇编吉、凶、军、宾、嘉五礼的史料，补充了徐书只讲丧礼（凶礼的一部分）之不足。是研究中国古代礼制的重要参考书。

3. 《钦定三礼》：查《中国丛书综录》，无此丛书目录。

4. 《医宗金鉴》：清官修医书，由吴谦等编著。书成于清乾隆七年，即

1742年（威廉斯的注释误为1740年印行于北京），共90卷（赠美国90卷）。此书论述各科疾病的诊断、辨证、治法，方剂等内容，简明扼要，切合实用，并将各科诊治，编成歌诀，便于记忆。是一部临床重要参考书。

5.《本草纲目》：明李时珍著。共52卷（赠美国48卷）。此书系统地总结了我国16世纪以前药物学的经验，是我国药物学、植物学等的宝贵遗产。书成于万历六年（1578年），刊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

6.《农政全书》：明徐光启著。光启逝世后六年，由陈子龙等整理修改后，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刊行。全书60卷（赠美国24卷）。此书是明末一部重要的农业科学巨著。

7.《骈字类编》：这是一部分类编排的辞书。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张廷玉等奉敕编。共240卷（赠美国120卷）。雍正四年（1726年）成书。以单字为字头，不列音训。专收二字合成的词和语，首字与字头一致。分天地、时令等13门，按类编次。引用材料以经、史、子、集为次，引书注篇名，引诗文注题目，体例较完善。可供检查词藻、典故之用。

8.《针灸大成》：明杨继洲编著。共10卷（赠美国10卷）。书成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本书总结了明以前针灸学的成就。其书广泛流传，是研究针灸学的重要文献。

9.《梅氏丛书》：又名《兼济堂篆刻梅勿庵先生历算全书》。清梅文鼎撰。共67卷（赠美国10卷）。梅文鼎是清时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他在天文学上主要介绍《崇祯历书》部分内容和解释《大统历》，在数学上大多介绍当时流传的中国古代数学和西方算法，并有所补充和发展。

10.《性理大全》：这是一部宣扬理学的书。明胡广等奉成祖命编撰。共70卷（赠美国16卷）。所采宋儒之说凡120家（威廉斯注释误为选录了中国历史上不同时代的116位学者……的见解及著作摘要）。分门编纂为理气、鬼神、性理、道统、圣贤、诸儒、学、诸子、历代、君道、治道、诗、文等13类。

除了书籍之外，所赠花籽有：马里金、飞燕草、向日葵、雏菊、剪秋罗属植物、蜀葵、鸡冠花、菊花、紫菀、凤仙竹、含羞草、秋海棠、紫茉莉、木兰花、玉兰、石蚕、罌粟、羽状繆属植物等。谷物种子有：小麦、粟、玉米、棉花、芝麻等。菜籽有：

萝卜、芜菁、芹菜、菠菜、莴苣、卷心菜、葱、芥菜、黄蒿、南瓜、甜瓜、黄瓜、胡椒、茄子、洋葱等。另外还有一些蚕豆、豌豆等豆类种子。

1969年6月10日，布朗先生受到回赠的书籍和谷物种子后，致函恭亲王：“各项物品均已收到，我将选择适当机会将之送交政府图书馆。在所赠谷种花籽中，可能会发现一些迄今仍不为美国所知的新品种。一俟发现，当即送交农业部，并由精通此行的专家进行检验和恰当地使用。

“这批书籍一旦运抵美国，将得到仔细的安排和处理，以便使熟悉中国文字的人们能十分方便地查阅，方不负你们赠书的美意。为此，谨向阁下深表谢意……”

这批回赠的书籍、谷物种子当年的下半年全部运抵美国。这与中国与欧洲各国的文化交流相比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件，中国古籍早于明末清初就在欧洲各国广泛流传，但对始于18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与美国的文化交往来说，其意义是深远的。布朗先生曾说过：“如果那些书籍美国人读不懂的话，那么，那些谷种、花种和其他种子无疑能够自我表现，并一定会在那儿得到高度评价……希望不久以后两国都有更多的人能读懂对方国家的书籍，因为当今美国能读懂这些书籍的人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么多，而能读懂英文书的中国人倒是多得多。倘若能进一步熟悉对方的文字，那么，很可能有益于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这无疑表达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愿望和中美文化交流的必然趋势。

第七章 中欧文化交流

一、中英文化交流

1. 英国的教会学校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伦敦布道会即决定把其在东方的传教基地从马六甲迁往香港，该会传教士米怜于1818年在马六甲创办的英华书院也于1843年迁往香港继续开办，校长为理雅各，收中国学童，也收西人。这是近代第一所基督教传教士在华开办的学校。

1844年，英国东方妇女教育促进会在浙江宁波开办了一所女子学校，该校实行免费教育，并供给衣食，设有识字、数学、地理、基督故事等课程，并教授缝纫和刺绣，是近代外国人在华最早设立的教会女学。同年，英国伦敦会还在厦门开设了一所男塾。

英国传教士还在广州、香港、福州等地开设了一些学校。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获得了到我国北方和内地传教的权利，教会学校也随之向我国北方和内地扩展。同时，外国在华所办企业不断增多，急需人才；中国人对西方的科学技术也越来越感兴趣，特别是洋务运动兴起后，中国人希望进教会学校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愈来愈多，教会学校数目随之迅速增加，出现了许多高等学校，招生对象也不仅限于贫苦子弟。到1877年，英国传教士在华所办学校已达120多所。其中重要的有以下

几所：

上海英华书院，1865年由英国圣公会（Church of England Mission）和中国绅商共同创办，院址设在上海英租界石路（今福建中路），首任校长为著名的英国传教士傅兰雅，招生对象主要是商界有钱子弟，年龄在10至13岁左右。学校主要教授英语和汉语，也教授其他西学课程。

培真书院，1885年由英国浸礼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在山东青州（今益都）创办的一所宗教教育机构，由英国传教士怀恩光（Whitewright, John Sutherland）主持，专门培训牧师、布道员和教会学校的教师，该校分正馆（神科）和预备馆（师范科），后更名郭罗培真书院。

北京协和医学堂，1906年由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和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美国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创办于北京东单北大街。后英国圣公会和伦敦教会医学会、美以美会亦加入。该校成为第一所由英美医务人员在中国合办的医科学校，英国伦敦会拥有该校产权，负责人都是英国人。学堂设有护士学校和附属医院。1908年学堂正式开学，用汉语教学，学制5年，前2年进行医学基本知识和技能的训练，后3年进行各专门科目的训练。该校曾由清政府赞助经费，其学生也由清政府学部颁发特殊文凭，因而在当时教会学校中享有特殊地位。

英国传教士在华创办的学校比较重要的还有1887年由伦敦布道会资助成立的香港西医书院、1900年英国伦敦会在天津设立的新学大书院等。

英国等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是“以科学之矢，射宗教之的”，是为其宗教侵略服务的。但他们在学校里进行宗教宣传的同时，也把自然科学实用知识和社会科学传入中国，客观上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使中国进一步了解了西方，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也推动了中西文

化交流。同时，英国等在华开办的教会学校，还引进了近代西方的学校教育模式，它们为中国的教育树立了榜样，为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2. 墨海书馆

墨海书馆是我国第一个近代印刷所，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恩创办。

麦都恩是最早来华的传教士之一，也是著述最丰、名气最大的人物之一。他于1796年4月生于英国伦敦，青年时曾做印刷业生徒，后在伦敦加入教会，并申请赴马六甲米怜负责的印刷所工作，获批准后，1817年6月经印度抵马六甲，成为米怜的得力助手。

麦都恩在马六甲刻苦学习中文，努力钻研印刷业务，成为出版行家。他在巴达维亚建立了一所印刷所，与马六甲印刷所、新加坡印刷所三足鼎立，成为鸦片战争前传教士在南洋的三大出版基地之一。

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上海被辟为通商五口之一。麦都恩决定把其活动重点移往上海。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麦都恩即于年底到达上海，并将其在巴达维亚的印刷所迁往上海，定名墨海书馆。“墨海”一词是我国对于砚台的别称，书馆取名墨海，其意义是希望墨流如海，书出如林。麦都恩也自号墨海老人。

墨海书馆初设于上海县城北门外的大境杰阁（现在南市区大境路一带），1845年迁到洋泾滨北的山东路。

墨海书馆的印刷设备，是由麦都恩从南洋运来，使用中文活字，以机械印刷，是上海有铅字设备和新式印刷机的第一家，但其开始时也用中国老法木版雕印书籍，后改用西法活字印书。其所出铅印书刊，外形上仍仿雕版书籍，版面与线装无异，现在上海所能见到的最早铅字印本《六合丛谈》即是由墨海书馆于

1857年出版。墨海书馆的铁制印书车床“长一丈数尺，广三尺”，由牛力牵引转动，在此之前上海还未曾有过，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和好奇。时人有诗写道：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字内传，忙煞老牛深未解，不耕禾陇耕书田。

麦都恩创办墨海书馆后，自任首任监督，也是主要撰稿人，最初几年中出版的十几种书籍主要都由麦都恩编写。此后不断有伦敦会传教士到达上海，许多人都到过墨海书馆，参与了译书工作。如伟烈亚力、慕维廉、艾约瑟等都成为麦都恩的有力助手。墨海书馆也吸引了一些中国学者到馆工作，如王韬、李善兰、管嗣复等都曾任翻译人员。他们的工作，是与传教士合译西书，西人口述，讲出大意，他们笔录，并加工、润色。

墨海书馆直到19世纪70年代还在开办，翻译、印刷了一些西方宗教和文化书籍。“从1844年到1860年，墨海书馆共出版各种书刊171种，属于宗教教义、教史、教诗、教礼等宗教内容的138种，占总数的80.7%；属于数学、物理、天文、地理、历史等科学知识方面的33种，占总数的19.3%”。^① 墨海书馆以出版西方宗教书籍为主，但其在中国产生的重要影响，却是因为其翻译、出版的自然科学书籍。

1852年夏天，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作，开始翻译希腊古代著名学者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的后九卷，因它的前六卷在明末由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作译出，故此书称《续几何原本》。李善兰与伟烈亚力日译一题，由于战乱等原因，历时四年始完成翻译工作。1858年，《几何原本》后九卷由墨海书馆刊行。1865年，李善兰将此书与徐光启译的前六卷并为一体刻版印行，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终于完整地传入中国。

1859年，墨海书馆出版了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的《代数

^①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188页。

学》、《代微积拾级》。《代数学》原名《代数初步》，为英国数学家棣公甘所著，书中内容涉及一元一次方程、一元二次方程、指数函数、对数函数等初等代数问题，并直接引用了西方一些数学运算符号。《代微积拾级》原名《解析几何与微积分初步》，美国数学家罗密士著。该书由浅入深地介绍了代数、几何、微分、积分等问题，是近代输入中国的第一部高等数学著作。

墨海书馆出版的天文学方面的著作最重要的是《谈天》。1859年，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合译的英国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John Frederick William Herschel)的《天文学纲要》出版，名为《谈天》。全书18卷，详细介绍了太阳系的结构，以及当时人们对太阳、月亮等天体的观察和认识；介绍了地球的运动、构造；介绍了天文测量和天体测量学知识、各种测量仪器及其使用方法；介绍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以及行星摄动理论等。李善兰在《谈天·序言》中还驳斥了中国士大夫对日心说的攻击，指出日心说已是“定论如山，不可移矣”。《谈天》是一部自成系统的天文学著作，在晚清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在物理学方面，墨海书馆翻译、出版了《重学浅说》和《重学》。《重学浅说》由伟烈亚力口述，王韬笔录，于1858年出版，其原本为英国一普通力学著作。书中介绍了力学的由来，力学的分类以及重学的原理和应用，并介绍了西方力学史上最重要的科学家及其学说，是近代中国翻译的第一部关于西方力学的专书。1853年，李善兰在翻译《几何原本》的同时，又与艾约瑟合译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威廉·胡威立所著的《初等力学》，定名《重学》出版。全书23卷，内容包括牛顿运动三定律及静力学、动力学、流体力学及为力学服务的数学方法，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经典力学理论体系。

1859年，墨海书馆翻译、刊行了一部西方植物学专著，原书主要是英国人林德来的《植物学纲要》，中译名为《植物学》，

共8卷，前7卷由韦廉臣与李善兰合译，第8卷由艾约瑟与李善兰合译。该书介绍了西方的细胞学说、有关植物体各器官的生理功能的理论以及近代以植物形态构造特点为依据的植物分类学说。其中有许多内容是首次介绍到中国，其分类方法完全摆脱了中国古代按植物用途进行分类的方式，建立了新的植物类别名称，对中国近代植物学的产生和发展起了奠基作用。

1853年，墨海书馆刊行了艾约瑟与张福僖合译的《光论》。《光论》是我国第一本光学译著，介绍了光的行进、照度、球面镜及其特征、棱镜和色散、眼睛的结构与视觉原理、太阳光谱等内容，其中太阳光谱学说、对海市蜃楼的科学解释、光速及其测定方法等都是中国人前所未闻的。

墨海书馆出版的地理、历史方面的书籍主要是1853年出版的《地理全志》和1856年出版的《大英国志》。《地理全志》介绍了各种地貌地理和历史地理的知识，还介绍了所述各地的风土人情。《大英国志》介绍了英国的历史和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制度以及在当时中国还鲜为人知的世界各国的政体情况，成为中国了解世界大势的一个窗口。

墨海书馆出版的科学书籍还有1857、1858年出版的英国人合信著的《妇婴新说》、《西医新论》、《内科新论》三本医学著作，1855年重印的合信在广州出版的《全体新论》与《博物新编》，以及综合性科学期刊《中西通书》、《科学手册》、《六合丛谈》等。

墨海书馆共开办三十多年，以出版宗教书籍为主，也刊行自然科学书籍和科技期刊，是当时上海著名的西书出版中心。在墨海书馆工作的麦都恩、艾约瑟、伟烈亚力等西方传教士都熟悉汉语，自然科学知识渊博，又喜好交结中国学者士人，因此墨海书馆又是一所吸引、联络爱好西学的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文化机构和西学传播的中心。墨海书馆出版的西书，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时人了解西方的重要渠道，直接影响了鸦片

战争后中国的一批启蒙思想家和科学家。有些西书，特别是自然科学书籍，不仅在中国广为传播，还被译介到日本，成为日本了解西学的一个窗口。

3. 留英学生的派遣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由中国沿海向中国内地步步深入。面对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清政府洋务派官僚开始学习西方的经验和技術，着手筹建近代海军。率先用炮舰打开中国国门的海上强国英国成为洋务派学习的榜样。

19世纪70年代初，留美幼童杨帆赴美，开了中国近代派遣留学生的先河。1875年，郭嵩焘使英，中英外交关系正式建立。这些为中国赴英留学生的派遣铺平了道路。1875年，福州船政学堂首次派学生赴英参观、学习，成为中国近代向欧洲派遣留学生的先声。

福州船政学堂原名求是堂艺局，1866年由洋务派代表人物左宗棠创办，是我国第一所学习自然科学为主的学校。该校为培养海军人才及为福州船政局培养技术骨干而设，分前堂和后堂两部分。前堂学生主要学习制造技术和法语，后堂学生主要学习管轮和轮船驾驶及英语。学堂重视外语教学，聘有外国教师任教。该校开办数年，成绩显著，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但仍不能满足洋务运动的需要。

1874年，按合同规定，一批外国教师和技术人员期满回国，船政学堂的教学受到一定的影响。有鉴于此，时任福州船政大臣的沈葆楨提出派遣学生赴英、法学习造船和驾驶的建议，并请法国人日意格（Giguel, Prosper Marie）参与拟定留学章程数条。章程规定派驾驶学生赴英国学习轮船驾驶，学生先在英国学堂学习天文、航海图学、汽学、水师战法、英国语言等课程共9个月，之后到炮船上学习炮船驾驶及各种枪炮使用方法，约6个月，再

学3个月画海图学，然后赴英国海军各兵营，在兵船上实习4个月。学期共约2年。沈葆楨的建议得到左宗棠和李鸿章的支持。1875年，经清政府同意，沈葆楨乘法国人日意格回国之机，派船政学堂驾驶学生刘步蟾、林泰曾随行到英国学习，派魏瀚、陈兆翱、陈季同随行赴法国学习。之后，由于日本人侵台湾，派遣留学生之事一度停顿。

1876年，沈葆楨、李鸿章等向光绪皇帝上《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1877年初，又上《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获朝廷批准。1877年4月，由监督李凤苞和洋人日意格率领，福州船政学堂学制造的学生14名、艺徒4名启程赴法学习制造，学驾驶学生12名赴英国学习轮船驾驶，同行的还有随员马建忠、文案陈季同、翻译罗丰禄。这批留英学生的学习基本上是按沈葆楨、日意格所订的计划和《章程》进行的。在监督的严格管理下，留学生们刻苦学习，皆学有所成。其中除严宗光（严复）因船政学堂急需教习提前调回国和何心川因病提前回国外，其余均于光绪六年（1880年）回国。1881年，李鸿章又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和福州船政学堂挑选黄庭、陈兆艺、李鼎新等10人分赴英、法、德留学，学习制造、枪炮、鱼雷和驾驶。学制3年。其中陈兆艺、李鼎新赴英国学习驾驶，并于光绪十年（1884）11月回国。1886年，李鸿章又从北洋水师学堂挑选学生10名，从福州船政学堂挑选制造学生14名、驾驶学生10名，分赴英、法学习制造、测绘、兵船驾驶等，驾驶学制仍为3年，制造学制为6年。

这三批学生出国之时，正是洋务事业蓬勃发展、北洋海军兴建急需人才之际，因此，洋务派从其办洋务御辱的实际需要出发，派遣学生目的明确，针对性强。这批留学生出国时都经过严格挑选，具有一定的语言和科学基础知识。清政府对其留学期间所入学校、所修课程以及实习都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定，使其所学知识与实际运用相结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批学生回国后成

为推动洋务运动，特别是海军建设和船政事业的重要力量。在这一时期官费赴英的留学生中，对中国社会影响较大、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做出重大贡献的首推严复。

在清政府派遣官费生赴英留学的同时，也有一些人在教会资助下或自费到英国留学，涌现了一批专门人才。如1847年在教会资助下赴美国、1850年转赴英国学医的黄宽，是我国第一位西医学博士，为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的医学事业做出了贡献。1872年赴英学习法律的伍廷芳，是我国第一个法学博士，后长期活跃于中国外交界。

甲午战争后，特别是20世纪初，清政府采取了鼓励自费出洋留学的政策，同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留学的法规，加强了对留学生的管理。1899年，清政府拟定了派遣学生出洋分入各国农、工、商等校专门肄业以便回国教授的章程，规定延长留学期限为6年，回国后量材委用，以资鼓励。1901年，清政府令各省选派学生出洋，张之洞即于同年从江南水师学堂选8人去英国学习海军。此后，各省纷纷派人出洋留学，留英学生日渐增多。所修科目也不仅限于海军。据清政府驻英监督高逸呈留英官费生履历清册统计，1910年，留英官费生人数达120多人，其中学部10人，邮传部12人，商部1人，奉天4人，直隶6人，山东4人，山西22人，河南1人，江宁14人，江苏3人，江南制造局5人，安徽13人，福建3人，浙江8人，湖北3人，四川3人，湖南2人，广东8人，广西2人。^①

4. 格致书院

上海格致书院(The Chinese Scientific Book Depot)是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型科技学校，它由英国人麦华佗倡议，傅兰雅、徐寿等

^① 王焕琛、刘真主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丛刊·留学教育》第2册，第611—625页。

人具体创办。

麦华佗 (Walter Henry Medhurst, 1823—1885 年), 著名英国传教士麦都恩之子。1839 年来华, 1843 年任英国驻沪领事馆翻译, 1868 年任英国驻沪领事, 1876 年回国。

麦华佗对上海的文化事业具有浓厚的兴趣。1873 年 3 月, 他倡议在上海设立一所专供中国人使用的科技学校。一年后, 即 1874 年 3 月, 《申报》刊出格致书院章程共 15 条, 对书院的宗旨、名称等各项内容作了具体规定。其中体现书院宗旨和特色的条款有:

一、书院名格致书院。

二、立此书院, 原意是欲中国士商深悉西国人事, 彼此更敦和好。

七、此院均系中国士商所用, 西人不在其列, 惟昌首出捐者, 自可随意前来观看。

八、经理书院各务, 须立董事, 少则五人, 多则七人, 首先一年, 可邀出捐者西人一二位帮办。

九、院内备有各省现时及续增所刊新报, 并有西人所译西国经史子集各种书卷汉文著作, 至中国各种经史子集, 听凭各董增列入院内。又设天球、地球, 并各项机器奇巧图式, 俾众备览。

十二、随时请有西人来院讲解机器各法, 并西国各论。

1874 年 3 月 24 日, 麦华佗召集西人在上海开会, 商讨设立格致书院一事, 选出麦华佗、福弼士 (Forbes, F. B.)、伟烈亚力、傅兰雅四人为西人董事, 唐廷枢为中国董事, 并开始捐款。之后, 董事会陆续召开几次会议, 增补徐建寅为董事, 着手择地造屋、购置图书仪器, 同时发函到英国, 呼吁各界捐助科学仪器和机械。经过中西人士的共同努力, 1875 年 9 月, 格致书院建

成，1876年6月22日开院。

格致书院位于公共租界内的北海路，设有讲堂、藏书楼、博物院等。讲堂设于大厅楼，是讨论理法、演示西方科学仪器的地方。藏书楼中专设中外各种新旧书刊，分经史子集诸类，其中大多数为江南制造局译出的科技新书。博物院则是最能反映格致书院特色的地方。

博物院是陈设西方格致仪器的场所，初称“知新堂”。初期的博物院里只藏有天球仪、地球仪、电报、电线、天文器、新式沙漏、铅锅等化学仪器以及汽机等少数科学仪器。后来由于从英国募集的科学仪器和英国科学博物馆的旧有藏品陆续运到，藏品渐为丰富。各种展品计分十类：“其一，生长之物，即地产动物、植物各料。其二，工艺之物，或食物内所用之生料或熟料。其三，织成之物与打成之物，并衣饰各种之物。其四，造屋所用之各物各件，并房屋内各种器具。其五，手中可持之器，并各种机器，与汽机、水机、热机等项。其六，工程之物，或水路、旱路各法运动之物。又开矿、起水、起泥、电报、造桥等工程内之机器。其七，做人物照像并各种绘画之物。其八，各种炮与各种弹，并一切战守之器。其九，绘画、照像、地图等类。其十，零星各物不在以上九类内者。”^① 这些陈列品反映了西方各国在工农业、军事和其他方面的科技成就及水平，是西方科学技术优胜于中国的标志，它对于当时渴望了解西方和西学的中国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吸引力。博物院平日院门大开，任人进出参观。这些陈列品除供学生参观外，还起了科学启蒙和转变世风的作用。

格致书院建成后于1879年开始招生，但由于当时中国风气未开，士人皆不愿入此学校，再加上格致书院每年收取学生40两银的学费，另有300两银的押金，学成时退回，中途辍学则分文不退，这些费用不是当时中国一般家庭所能承担的，所以来学

^① 王尔敏：《上海格致书院志略》，第17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者少，教学未能有效开展。

格致书院虽招生未有成效，却在举行考课、实施西方科技教育课程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885年，徐寿去世后，王韬出任格致书院院长，因招生未成，便采用傅兰雅的建议，用考课的办法来激发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学的热情。1886年，格致书院开始命题课士，其形式与其他书院无甚差别，但内容却是引导士人关心时局和西学中关于新知识的讨论与理解以及时务局势的分析等题目。初一年分四季进行，所有考课题目均由院外名流命题，并由其评阅。1889年，由于参加者踊跃，社会反响强烈，又增加春秋二季特课，由南北洋大臣出题评阅。王韬总揽全部考课的评阅。每次考课，格致书院都选拔优秀者三至五六名不等，给予一定奖励。同时，王韬又将优秀的课卷全部刻印出版，题名《格致书院课艺》，其中详细记载了命题大员、题目、作者及选拔等第、课卷主文以及评语等。

格致书院考课的形式与其他书院差别不大，但内容却相差甚远。据统计，从光绪十二至十九年（1886—1893年），格致书院共考课命题77道，其中格致类系即科学知识方面有22道，约占1/3；富强治术类有25道，占1/3；其他人才、国防、教育等约占1/3。^①而考课获奖的86人中，“有举人5人，贡生54人，监生3人，共计62人，占全部得奖人数的72%”。^②格致书院以格致和时务来考课学生，引导他们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富国之策，使一部分已经获得科甲出身的知识分子，离开科举仕途，聚集在格致书院周围，接受新知识的启迪，思索祖国的命运。

格致书院在筹备招生的同时，又以演讲的形式传播西学。1878年，格致书院请到美国传教士狄考文讲解电学原理并做实

^① 王尔敏：《上海格致书院志略》，第69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② 霍益萍：《上海格致书院述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1984年第4期。

验，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广泛兴趣，听讲者有五十多人。以后，讲演不断，甲午战争后，傅兰雅每星期六到书院对青年学生讲演矿山和采矿、动物学、植物学、人体生理学等方面的知识。这种演讲活动持续了近30年，通过这种活动，格致书院传播了近代西方科技知识，做了宣传、普及自然科学的启蒙工作。

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加深，国内学习西学的热情高涨。这时，王韬因病离院，傅兰雅主持馆务。他根据当时时局和经费紧张等情况，决定就当时现有的西学教材，改日课为夜课，由住院课读改为每周只在周六晚间上课、其余时间由学生在家自修的形式招生传播西学。傅兰雅制订了《格致书院会讲西学章程》，开辟科目六种，即矿务、电学、测绘、工程、汽机、制造六科。每科设几门至几十门课程，学生任选一种，由傅兰雅、徐寿、华衡芳等讲授。每修完一科，即考试，合格者发给凭证。这种授课方式颇适合当时的形势，创办之初，即有三十多人入学，来学者收益较大，而且负担较轻，这种利用学生自修进行科技教育的方法开了中国近代科技教育的先河。

格致书院还开办有格致书室，代卖科技书籍，并发行科普杂志《格致汇编》。

格致书院集博物馆与科技学校于一体，展览科学仪器，举办科学讲座，开设西学课程，开办格致书室，发行科普杂志，是当时中国展示西方科学技术的一个窗口，是西学在中国传播和中外人士研讨西学的中心，推动了我国近代科技普及和科技教育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国士风的转变。

5. 科普杂志《格致汇编》

1876年，傅兰雅在筹办格致书院的同时，又创办了科普杂志——《格致汇编》(The 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

傅兰雅在中国传播西学的实际工作中，认识到中国在科学技术上落后于西方，西方科学技术对中国实在重要，而中国士大夫

大多只知之乎者也，忙于仕途，懂得科学的人实在太少，迫切需要科学知识的启蒙。同时鉴于“西国有专论格致与工艺之新报，数十年来，上下各等人得其大益”的现实经验，希望中国也能如此，因而萌发创办科普杂志的想法，“欲将西国格致之学与工艺之法，择其要者译成华文，便于中国各处之人得其益处，即足不出户，能知天下所有强国利民之事理”。^①

1875年8月，适值丁韪良与艾约瑟在北京编辑出版的《中西闻见录》(The Peking Magazine)停办，傅兰雅即于当年11月刊登启示，决定创办科普杂志《格致汇编》，以接续《中西闻见录》。

1876年2月(光绪二年正月)，《格致汇编》在上海问世，为月刊。第一期主要有天文、日星、地球、算器、图说、汽锤略论、治韧性玻璃法、印布机器、有益之树、轮锯图说、西国造糖法、格物杂说等生产、生活方面的科技内容，并有算学奇题、互相问答等栏目。以后每月一本，栏目略有变动。1878年4月，因傅兰雅携妻子回国探亲，《格致汇编》暂时停刊，1880年4月续刊，1882年再度停刊，1890年第二次复刊时改为季刊。到1892年冬季终刊。出版地点在上海三马路(今汉口路)，初在格致书院发售，格致书室^②开办后，移往格致书室发售。

《格致汇编》由傅兰雅一手创办和经营。经费主要由傅兰雅自己筹集，发行也要他自己负责；其中的绝大多数稿件也都是由傅兰雅在为江南制造局译书和经营格致书院的业余时间里翻译、编写，部分稿件由江南制造局的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学者徐寿、徐建寅等提供。

① 《格致汇编》，第1年第6卷，告白。

② 格致书室：1885年，傅兰雅创办于上海，专门销售和邮购具有实用知识的科技图书和期刊，由于销量日增，后在天津、汉口、北京、香港、沈阳、烟台等地设分销处，被誉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渴求新知识的圣地。

《格致汇编》最有特色的是它的“读者问答”栏目。“读者问答”栏目专门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傅兰雅在第一卷中说：“或有欲问格致之事，或欲问西国物件，或有矿藏物色，欲知其为何物何用，均可寄信下问。”对读者提出的问题，傅兰雅都认真给予答复，“如有所知，则必于后卷详细覆明，不取刻资”。对于自己不明白的问题，他便亲自研究，或请别人代为答复。并且“倘有华士已有阐明格致者，自能作论，亦可寄来，以便刊印”。^①鼓励中国人研习格致之学。在第一年第六卷中，傅兰雅再次声明：“远处诸君，如有疑问格致或工艺之事，则可致书本馆。如所问之事果有益于众人，则当依次奉答，列入《汇编》。”傅兰雅也欢迎西人致书《格致汇编》了解中国的事情，“又如西人欲问中华之物理，则先将所问之语印入《汇编》。阅者如有论答，可寄至本馆，代为列入答之”。^②“互相问答”栏目受到了中国人的热烈欢迎，致信提问的人很多。《格致汇编》前后发行7年，共60册，登载读者来信提问320条，平均每册（期）有5条之多。读者所提问题内容相当广泛，大多属于科学知识的范围，应用科学、实用技术方面的最多，如“互相问答”第170条广东某君问：强水滴于木上，其木变黑，何故？第233条上海有人问：近闻美国爱第森设新法电光灯，其灯形式如何，制法如何，何处可购？这类问题占40%多。自然常识方面的问题也较多，如第167条厦门有人问：海滨之处，日风与夜风相反，何故？第181条问潮汐形成原因等，约占20%左右。另有基础科学和其他方面的问题约占35%。

《格致汇编》是晚清一份极为重要的科普期刊，语言浅近，图文并茂，介绍西方科技成就，登载科技新闻，评价或摘译西方新出版的科技书籍，内容涉及西方科学技术的方方面面，自然科

① 《格致汇编》第1年第1卷，启示

② 同①。

学方面介绍了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水力学、医学、药理学以及生理解剖学等科学知识和浅显的科学理论、科学方法等。工艺技术方面涉及照相机、幻灯机、电灯、电报、电话、制糖、打米、生产啤酒、汽水机、纺织机、制陶、制砖、造玻璃、造水泥、炼钢铁、造桥梁、榨油、造火柴、制皮革、制冰机、打字机、印刷机、弹棉机以及开矿技术、农业机械和渔猎养殖等生产、生活技术。另外，《格致汇编》还登载了中外科学家、探险家等名人的生平事迹和科学成就，也刊登了一些西方工业产品的广告。

《格致汇编》不仅传播科技知识，起着科学启蒙的作用，还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科学实验指导的作用。如“互相问答”栏目第132条有人问：照《格致汇编》介绍的一些方法进行实验，很多不灵，何故？第165条问：自作发电器，在玻璃罐内置锌皮、铜皮，以铜丝依西书所载之法连之，使通电气，加黄强水后，其器不灵，不能镀金，不能通信，也不能发电光，何故？《格致汇编》指导人们进行科学实验，帮助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难题，激发了中国人学习科学知识的兴趣和欲望。

《格致汇编》起初每卷印3000册，问世后受到读者欢迎，到第二年反响更热烈。“印至八九卷时，书出数日，即已售完。可知中国之人于格致之学，已日新其耳目，深信而爱慕之，详阅而考究之矣，于是傅君又扩充其卷幅，增加条目，益臻美盛，而阅者更觉争先快睹”。^①到戊戌变法时，《格致汇编》已是人们学习西学非常理想的人门教材。当时主持时务学堂的梁启超认为，《格致汇编》“前后七年，中经作辍，皆言西人格致新理，洪纤并载，多有出于所翻各书之外者，读之可增益智慧……今中国欲为推广民智起见，必宜重兴此举矣”。^②高度评价了其对中国传播、

① 《申报》，光绪三年（1877）五月二十日。

② 梁启超：《读西学书法》，上海时务报石印本（光绪二十二年）。

普及科学知识所做的贡献，并将其列入学生学习西学的必读书中。

6. 西医在中国的传播

西方医学是在古希腊、罗马医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在明末清初西医就已传入中国，但当时传入的只是粗浅的生理解剖知识，在临床上并不优于中国传统医学，故影响不大。西医真正对中国产生影响并广泛传播开始于鸦片战争前后，其中英国传教士医生起了重要作用。

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传教医生皮尔逊（Pearson, A.）到广州施行牛痘接种术，并编印了《牛痘奇方详悉》一书，推广其种痘法。由于中国人是人痘的发明者和传播者，对种痘法比较熟悉，很快就接受了这一方法。

英国传教士在华行医较有影响的还有马礼逊和李文斯敦在澳门开设的一所中西医兼备的诊所；英国东印度公司外科医生郭雷枢在澳门开设的眼科医院。这些在本书第二章已作详述。

鸦片战争前，由于清政府实行教禁政策，外国传教士的活动仅限于香港、澳门、广州等地，这一时期，西医的传播也主要限于广州和澳门等地。但由于西医在外科尤其是临床治疗上可以较快治愈中医难以治疗的病症，因此很快为中国人接受。

鸦片战争后，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可以在五口自由活动，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不仅可以在沿海，还可以深入北方和内地活动，西医也随着他们的活动向内地传播，传播者不再主要是英国人，传播的途经也更加广泛。

1844年，英国传教士医生洛克哈特（Lockhart, William）到达上海，在南市开设诊所，是上海最早的西医医院。因医疗业务蒸蒸日上，后扩建，定名为仁济医院。

1861年，洛克哈特到北京英国公使馆任职，即在北京开设诊所，来就医的人很多，第一年就接待病人2万多人次。1864

年，洛克哈特回国，由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的医学博士德贞（Dudgeon, John）接任。1865年，德贞在哈德门大街另建医院，称为京都施医院，因门前有两支旗杆，又称双旗杆医院。

鸦片战争后创办比较早且著名的医院还有1848年英国伦敦教会传教士、著名的传教医生合信在广州创办的惠爱医院等。

19世纪下半期，教会医院迅速发展，到1905年时，全国教会医院已达160多所，诊所240余处，遍及全国10多个省。这些教会医院的广泛设立，为西医在中国的普及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人学习西医并在医院工作，促进了西医在中国的传播。教会医院在中国的普遍设立，要求有大量的医生和医护人员，许多教会医院感到人手不足，便招收中国生徒，训练他们担任护理工作和传教。1806年，在广州种牛痘的皮尔逊开始招收华人学习种牛痘技术，随其学习的邱熺等人便成为中国第一批学习西医技术的人。1837年，美国传教医生伯驾在广州眼科医局招收3名中国学生，伯驾不仅教他们临床技术和经验，还用英语教他们基础理论。1843年，玛高温在宁波传教施医，教中国医生学习解剖和生理。此后，各教会医院陆续招收中国生徒，但这些医院多是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教授，招生不多，成效不高，难以满足需要，到19世纪60年代，有些医院开始设医学校教授医学。1866年，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学堂（又称博济医学校）开始招生，是我国最早的西医教会医学校。1879年，该校开始招收女生。此后，类似学校不断建立，到19世纪末，在香港、南京、上海、济南、苏州、杭州等地都出现了规模不等的医学校。1908年，广州还出现了我国第一家自办的西医学校——广东光华医学专门学校。这些教会和外国人所办医学校，将西方较先进的医学理论、医疗技术以及医学教育思想和方法传入中国，培养了一批近现代中国著名的西医师，为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做了开拓性的贡献。

一些西方传教医师出于行医、传教和开办医学校的需要，在

中国学者的帮助下，翻译、编写了一些西方医学著作。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如下几种：

1847年，英国人戴汶（Deven, T. T.）编写了《初学者入门》，介绍解剖学名词、疾病、药物名表和医学用语等。

从1851年开始，英国传教医生合信翻译出版了《主体新论》、《西医略论》、《内科新论》、《妇婴新说》、《博物新编》等。《主体新论》是较系统地介绍西方医学的专著，附图200多幅，主要介绍解剖学和生理学。《西医略论》附图400多幅，专述内科学，是病理学和医疗学专著。合信的医书从理论到实践系统地介绍了近代西方医学知识。

英国传教医生德贞在华期间不仅在《中西闻见录》上撰文介绍西医知识，还编译了《全体通考》、《医理杂说》、《解剖图谱》等10多本医学书籍。

美国医生嘉约翰（Kerr, John Glasgow）曾两度来华，在华40多年，著有医书20多种，较著名的有《西药略释》、《皮肤新篇》、《内科阐微》、《花柳指要》等。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译介和传播西医的期刊，如上海的《海关医报》（1871年）、广州博济医院的《西医新报》以及中国人自编的《医学报》（1886年）等。

书籍是知识的载体。这些西医药书刊对当时介绍西方医学起过一定的作用，使西医学知识在中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理解。

在西方传教士开设医院、开办医学校教授中国人西医时，也有中国人走出国门学习并回国推广西医。1847年，广东香山人黄宽随美国人布朗（Brown, Samuel Robbins）夫妇赴美国，1849年，高中毕业后赴英国，次年考入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7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857年回国。先在伦敦传教会开设的广州金利埠仁济医局行医，后到博济医院任医师，并担任博济医院附设医学校——南华医学堂的教学工作，教授解剖学、生理学和外科学等课程。1885年，我国女子留洋学医的第一人金韵梅以第一

名的成绩毕业于美国纽约女子医学校，获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厦门、成都等地行医，后受聘于天津医科学学校，培养医护人才。20世纪初，我国留学日本、欧美学医的人不断增多，回国后他们大多成为医学院校的教学骨干，一边教学，一边行医，成为以后传播西医的主要力量。

西方医学从鸦片战争开始，经过半个世纪的传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广为中国人接受，并对中国传统医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出现了以西医解释中医的现象，并产生了中西医结合行医的医师。

7. 西学传播大师傅兰雅

傅兰雅是英国传教士，他以翻译西书、创办科技期刊向中国传播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而著名。

傅兰雅，1839年8月生于英国海德镇。其父为一穷牧师，对中国典籍颇为熟悉，曾一度希望来中国。生长于这种家庭环境中的傅兰雅，少年时即对中国相当神往，尽其所能地阅读有关中国的书籍，考试时也常以中国事物作为其作文的题材，因此，他的同学送予他“傅亲中”的绰号。

1861年，傅兰雅接受了香港圣保罗书院的邀请，受英国圣公会的派遣来华，于1861年7月到达香港，任圣保罗书院院长。1863年，为学习、提高中文，他辞去圣保罗书院教职，赴北京任同文馆教习。1865年，傅兰雅又辞同文馆教职，转赴上海任英华书院校长，同时兼任上海《教会新报》（The Church News）编辑。在上海，傅兰雅上午教英文，下午又随班学习汉语，中文进步很快，为其以后的译书打下了文字基础。但由于傅兰雅在教学中没有按英国圣公会的要求突出宗教宣传，与教会发生了矛盾。

1868年5月，傅兰雅在英华书院的聘用期满，英国圣公会诬指他“太世俗化”，决定不再聘用他。这时摆在傅兰雅面前的

有四种选择：一是听从圣公会的摆布，做一名名副其实的传教士；二是可到上海广方言馆当教习；三是到上海租界工部局当翻译；四是可接受江南制造局的聘请任翻译。

江南制造局是清政府创办的新式军工企业，成立于1865年。被曾国藩任命在江南制造局任职的徐寿、华衡芳与当时上海的传教士素有来往，也结识了傅兰雅。1867年冬，徐寿、华衡芳向曾国藩建议在局内设立翻译馆，徐、华二人被委派主持馆务，傅兰雅也参与了筹建工作。翻译馆建成后，徐寿即推荐傅兰雅到翻译馆任专职翻译，获曾国藩批准。1868年5月，傅兰雅到职。

傅兰雅对于翻译工作，极为热心，也极为认真负责。译书本是件枯燥的工作，但傅兰雅“私念翻译西书，报效中国政府，实属光荣快乐”。“地位超然，受人尊敬，实属名利双收”。^①而且译书可以与中国士大夫为伍，又同时兼译几本书，避免了单调，虽然日夜译书，非常辛苦，傅兰雅却乐此不疲。对于科学，傅兰雅本不精通，为不负所托，他日夜从事科技学习。到馆之初，他着手翻译煤矿、化学和声学的书籍，为此，他每日上午研究有关煤和煤矿的各种知识，下午钻研化学，晚上又修习声学。凭着这种热情和负责精神，他成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最出色的翻译家。

傅兰雅在翻译馆译书的方法与过去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采用的译书方法基本相同，即先由傅兰雅根据原著逐句用汉语说出，由中国人逐字记录。若译出的汉语字句难以理解，双方当即加以推究，尽量使用词准确，语义明白，使读者易于理解，然后由中国译者对译书的措辞用字进行加工润色，使之合乎中国文法。刊行前，对于重要的书，要由傅兰雅与中国译者核对，一般的书由中国译者加以校改，认为不失原书大意，即定稿出版印行。

傅兰雅在翻译馆等处工作了二十余年，在英籍译家中，他是

^① 姚崧龄：《影响我国维新的几个外国人》，第47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在中国供职最久、译著最多的人。据统计，傅兰雅一生共译书 129 种，^① 大部分由江南制造局出版，涉及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军事科学、历史、社会科学等方面。其中自然科学 57 种，包括物理学 17 种，数学 15 种，化学 9 种，天文、地质、气象学 7 种，动物、植物学 3 种，生理 1 种，其他 5 种；应用科学 48 种，含创造 18 种，工程测量 10 种，医药卫生 8 种，航海工程 5 种，农业 2 种，其他杂著 5 种；军事科学 14 种，有炮术 3 种，防御 3 种，列强海军和陆军 4 种，其他操演、战术及铁路共 4 种；社会科学 10 种，包括法学 4 种，政治经济学 4 种，历史 1 种，其他 1 种。“如此巨大的数字，如此广泛的领域，出自他一人之手，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与他同时代的任何其他翻译人员，无论中外，包括人们常常提到的林乐知、丁韪良、徐寿、华衡芳，都不能望其项背。”^② 傅兰雅与合作者翻译的比较重要的西书有：

数学方面，《代数术》、《微积溯源》、《代数须知》、《运规约指》、《三角数理》、《算式解法》等。

化学方面，《化学鉴原》、《化学考质》、《化学须知》等。

物理方面，《声学》、《电学》、《重学须知》、《力学须知》、《声学须知》等。

军工方面，《水师操练》、《轮船布阵》、《防海新论》等。

矿物学方面，《矿石图说》、《开煤要法》、《矿学须知》等。

冶金学方面，《宝藏兴焉》、《造铁金法》等。

医学方面，《西药大成》、《法律医学》、《通物天光》、《化学卫生论》等。

另外还有科技工具书，《金石中西名表》、《汽机中西名表》等。

^① 据顾长声：《影响我国维新的几个外国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出版所载傅氏译书 135 种。

^②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 575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傅兰雅译书注意知识内容的系统性，这使他在译书的选材上与清政府的要求不一致。清政府要求先译紧要之书，即与军工生产直接有关的书，而傅兰雅则认为应比较系统地翻译“更大更新”的科技知识。虽然傅兰雅不得不屈就清政府的要求，但还是设法将西方科学知识系统地传入中国。如化学方面，他与化学家徐寿合作，先后翻译刊行了《化学鉴原》（1871年），首次列出化学元素表，并为64种化学元素制订了中文名称；《化学鉴原续编》、《化学鉴原补编》介绍了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方面的知识；《化学考质》和《化学求数》（1883年），最早介绍了化学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知识；《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1885年）是我国第一部英汉对照的化学名词汇编；《物体遇热改易记》是我国最早的物理化学方面的译著；以及《化学须知》、《化学易知》等西方化学方面的译著，将近代化学知识系统地传入中国，不仅有利于对中国人进行化学科学知识的启蒙，也为我国近代化学科学的建立和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

傅兰雅在译书过程中还非常注意科学名词的统一性问题。他认为，科学名词必须统一，一经制定，则不可更改，否则会造成译名混乱。为此，傅兰雅编纂了《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金石中西名目表》、《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汽机中西名目表》等中英文对照的科技工具书，以统一科学名词。中国近代的科技词汇大量是傅兰雅在翻译西书的过程中与中国译员共同确定的，对后世影响深远，有的沿用至今。

傅兰雅在翻译馆所作译书工作，赢得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尊敬，也获得了中国政府的褒奖。1876年4月13日，在两江总督沈葆楨、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奏请下，清政府授傅兰雅三品官衔；1899年5月20日，清政府又因其所译格致、工艺等书传播最广，裨益良多，授予他“三等第一宝星”。

傅兰雅在华三十多年，致力于西学传播的工作。他翻译了大量当时中国近代化急需的科学书籍；1876年，在上海主编并出

版了近代中国第一种专门性的科普杂志——《格致汇编》；同年，开办了我国近代第一所科普学校——格致书院；1877年，参加益智书会，参与编写教科书；1885年，又创办了格致书室，专售西方科技书籍和期刊。傅兰雅的科学普及工作，为当时中国实行“船坚炮利”政策，提供了科学知识，对我国19世纪末科学技术的发展乃至社会的改革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中法文化交流

1. 中法在教育事业上的合作

在晚清西方各国在华创办学校的活动中，法国远远落后于英国和美国。法国天主教在华所办学校大多数是小学，“主要教育中国天主教徒的子弟。他们的目的是教儿童们读和写，以便使他们能理解教义的内容，并接受一套坚实的宗教教育。课程设置中也用了一些取诸中国经典的教材，还有些简单的数学，但并不教授外语，而且几乎没有任何表明企图介绍“近代”知识的迹象”。^①另外还有一些师范学校、专科学校和公学，他们都不注重启发中国人理解西方科学和西方政治与社会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国传教士在中国兴起了创办高等学校的热潮，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士创办了震旦大学院。

1903年3月1日，中国爱国的天主教徒马相伯捐出家产，在天主教耶稣会的支持下，在上海土山湾北旧天文台原址开办了震旦大学院，马相伯任总教习，各科教师由教会委派教士担任。学校分设4科：文学、格致（即哲学）、象数、形性。通西文者2年毕业，不通西文者3年毕业。学校开办时只有24人，开办一年后增加10倍。由于马相伯在学校中重视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

^① 卫道治：《中外教育交流史》，第248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育，受到教会排挤，耶稣会派传教士南从周到校任教务长，全面干预学校行政。1905年，马相伯辞职，学生二十多人也相继离校，震旦大学院暂时停办，马相伯等在吴淞另办新校，名为复旦公学（后来发展为复旦大学）。这时震旦大学院名声已著，在各界的要求和呼吁下，同年8月，震旦重新开学，由传教士李问渔任校长，南从周任教务长，天主教会遂全面控制校政，改肄业期为4年，第一年以中文教授；第二年以法文教授；至第三年称本科，教授法文、英文、文学、中外历史、地理、哲学、经济学、法学、算学、物理学、博物学等；至第四年分文、理两科。1908年，学校迁入法租界卢家湾吕班路，重订学制为6年，预科3年，本科3年，教师主要为耶稣会传教士。学校规模不大，1908年，学生数为240多名。

在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进行教育输出的同时，晚清一批头脑清醒的先进中国人，开始刻苦研究西方赖以强盛的科学技术和欧美史地，主张学习西方一些有用的知识，达到强国御侮的目的。到六七十年代，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一边效法西方，设厂聘请西人自制轮船和枪炮，一边派人出洋，赴法国学习轮船制造等。

1875年，福州船政学堂派陈季同、魏瀚等5人随法国人日意格赴英、法参观学习，其中魏瀚、陈季同、陈兆翱3人赴法国船厂学习制造，1876年，陈季同与赴英参观、学习的刘步蟾、林泰曾随日意格返回中国，魏瀚、陈兆翱则仍留在法国继续学习。1877年，按沈葆楨和日意格拟定的出洋留学章程，福州船政学堂挑选学习制造的学生14名，艺徒4名，与赴英的学生同时启程，由李凤苞、日意格率领，赴法国学习制造和矿务；1881年，李鸿章从北洋水师学堂和福州船政学堂派遣黄庭等10人赴欧学习，其中有6人赴法国学习制造、枪炮、营造、硝药等。1886年，清政府派赴英、法学习的34（一人未成行，实为33）名学生中又有近一半是赴法国学习制造、测绘和万国公法的。

这一时期，清政府致力于设厂造船，筹建海军，缺乏制造人

才，而法国工业发达，长于制造，因此，派往法国的留学生多以学习轮船制造和海图绘制为主，他们回国后被派往各造船厂，起了技术骨干和技术核心作用。

甲午战争后，洋务运动受到打击，留学教育也受到影响。1897年，福州船政局又派出6名学生赴法学习制造，但因经费问题，这批学生提前回国，此后数年，清政府再未派遣留学生。

1900年，清政府制定了鼓励出国留学的政策，并重新向欧洲派遣留学生。1904年前后，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派几十名青年到法国留学，随后，湖北、广东、天津等地也派人赴法留学。^①但在清末，由于当时中国留学教育的大权掌握在封建统治者手中，派出去的多是达官贵胄子弟，探求救国真理，参加革命活动的青年反而受到压制，再加上清政府国库空虚，留学经费紧张，在留日、留美学生中出现了俭学和半工半读的现象。在法国也兴起了“俭学风”，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创办了“留法俭学会”。

1901年，清政府驻法公使孙宝琦赴巴黎上任，李石曾、张静江以随员的的名义随同到法国公费留学。行前，李石曾在上海会晤了吴稚晖，当时吴稚晖即告诫李石曾注意苦学，并希望他介绍更多的中国人到法国留学。1903年，吴稚晖因支持《苏报》宣传反清，被迫流亡英国，一面做工，一面求学，1906年到巴黎。1909年，李石曾因研究大豆成功，在法国巴黎西郊创办了一家“巴黎中国豆腐公司”，并从他的家乡招募三十多名工人。为了提高这些工人的文化知识和工艺技能，李石曾在豆腐公司开办了一所学校，工人白天做工，晚上学习法文、中文和基础科学知识。豆腐公司学校的开办，使工人们既学了文化，又做了工作。许多人感到通过做工在法国求学是个可行的办法，勤俭求学的留学之风在法国中国留学生中逐渐发展起来。

^① 参考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第39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中法在教育事业上的合作，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人才，他们不仅懂得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并且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在留法期间便投身革命，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 王韬的欧洲之行及对法国大革命的介绍

王韬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论家，曾出游欧洲，回国后著有《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是中国最早系统地介绍法国大革命的人。

王韬（1828—1890年），原名暭，字利宾，号兰卿，江苏甫里（今吴县）人。后因上书太平军被追捕，始改名韬，字子潜（紫诠）。王韬幼年多病，家境清贫，但他十分聪明，9岁便遍读群经，兼涉诸史。1845年，年方17岁的王韬以第一名考入县学，成为秀才。1846年，赴金陵应闈试不第，遂放弃八股，一边致力于研究学问，一边继续过着“酒色征逐”的生活。

1848年，王韬去上海省亲，结识了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恩，并参观了麦都恩创办的上海墨海书馆，墨海书馆是当时上海最大的西书出版机构，也是当时上海热心西学人士荟萃的场所。1849年，王韬应麦都恩之邀进墨海书馆工作，这为他提供了接触、研究西学，交游上海“名流硕彦”的机会，也为他以后避居香港、西游欧洲创造了条件。

王韬在墨海书馆从事翻译工作前后达13年，1862年，因曾致书太平军，被清政府指为“通贼”，要受追捕，在英国驻上海领事的帮助下，乘船逃往香港，在香港协助理雅各译书。1867年，理雅各回国，邀王韬同行。此后，王韬开始了其在欧洲近3年的旅居生活。

王韬在欧洲主要居于英国和法国，这时的英国和法国是资本主义发展最迅速的国家。他在法国的所见所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韬对巴黎的繁华与富庶赞叹不已：“法京巴黎，为欧洲

一大都会。其人物之殷闾，宫室之壮丽，居处之繁华，园林之美胜，甲于一时，殆无与俦。”王韬没有亲身经历法国大革命，但他游览法国大革命发生地巴黎时，参观了大革命的历史遗迹：“法京中多前王拿破仑遗迹，至今游人观览者，犹想见其功烈之崇隆，势位之煊赫焉。”^①历史遗迹使王韬感受到法国大革命的轰轰烈烈和对后世的影响。

王韬游欧后，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羡慕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良和科学技术的先进，希望“中外辑和，西国之学术技艺大兴于中土”。^②1870年，王韬回到香港，名声日著，后来，李鸿章、曾国藩都曾想招用他，但都未能实现。王韬在香港一面协助理雅各译书，一面翻译《法志》、《美志》、《俄志》等西方著作，同时编译了《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他对法国大革命的介绍就主要集中在《法国志略》一书中。

王韬从欧洲返回香港后，即开始搜集资料写作《法国志略》，以后又多次修订，现通行的是1890年出版的24卷本《重订法国志略》。王韬以志书体裁介绍了法国历史变革、现行政治制度、国事民情、外交关系、宗教派别、文化艺术、学校教育等，内容极为广泛，其中以法国历史的介绍比重最大，占一半以上，从古代的“开国纪原”，一直写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基本上勾勒出了法国历史的来龙去脉。

王韬用了大量篇幅叙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他用大半卷的篇幅交待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背景，揭示了波旁王朝统治下的法国社会危机状况及法王与平民之间的尖锐矛盾。对法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经过，则重点叙述了路易十六嗣立、三级会议、废除贵族特权、颁布1791年宪法、抗击反法联盟进攻、平王党、拿破仑镇压王党叛乱等。

① 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第82—8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 同①，第170页。

王韬对法国大革命的介绍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突出主要矛盾及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王韬在书中认为法国大革命爆发主要是以国王为首的封建统治者与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如路易十五重用宠臣铁列（泰雷）残酷压迫人民、千方百计剥削人民，再加上国王穷奢极欲，造成国库空虚，加倍征税而致怨声载道，到路易十六时，各种矛盾激化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第二，讲清了革命的形势。王韬在书中既讲出了法国人民生活不下去了，也讲出了统治者难以再统治下去的种种危机，王韬以“开议会”为题，指出了统治者对他们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已逐渐失去控制，想借助三级会议缓和矛盾，博取人民支持，结果适得其反，三级会议成了大革命的导火线，会后，统治者的统治土崩瓦解，革命烈火越烧越旺。第三，重视启蒙思想家的作用。王韬列举了法国近代几位著名的思想家，并把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同促进革命发展的因素联系起来。他说，当法王和诸侯们肆意压迫剥削人民时，“有孟的士求（孟德斯鸠）、屋尔体（伏尔泰）、卢骚等大儒，各立说著书，排击政法，主张自主之说，欲以抑君威，伸民权，读其书者无不激昂奋励，以生一变旧政之心。法人乘机煽诱，一唱百和，躁动尤甚”。^① 暗示了法国和欧洲的民主思想对法国大革命的推动作用。第四，按照革命进程，以时间为顺序，以革命中的一系列大事为题，井然有序地叙述了法国大革命的经过。王韬通过三级会议、八月法令、废除贵族特权、颁布1791年宪法和人权宣言、路易十六上断头台、击败反法联盟、镇压王党叛乱等一系列事件，再现了法国大革命的整个过程。第五，赞扬了法国人民的英雄行为。王韬深情地叙述了当反法大军和王党分子叛乱时，法国人民毫无惧色，纷纷应征入伍的英雄气概，还详细描述了瓦尔密战役中法军英勇战斗的场面，对法国人

^①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21。转引自单素玉：《王韬及其对法国大革命的述评》，《辽宁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民的英勇行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王韬对法国大革命的介绍反映了他的革新历史观，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虽然王韬从 20 岁开始，“曾经沧海，遍览西学”，思想不断发生变化，但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幼年饱读诗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虽饱览西书，也没有完全摆脱封建思想的遗毒。他在叙述法国大革命时，虽歌颂人民的力量，却又对人民的革命行为进行诬蔑，尤其认为人民处死暴君是违反天理的，他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却又不要求废除君主，只要求限制国君的权力，实行君主立宪；他把法国的繁荣富强同先进的民主制度割裂开来，希望中国繁荣富强，却不希望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制度，这都是由他的阶级局限性所决定的。

王韬的《法国志略》对法国大革命的叙述反映了王韬的改良主义思想，该书问世后，在当时民族危机四伏、人人思变的中国曾广为流传，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3. 张德彝的法国《述奇》

1871 年是法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由于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引起了平民起义，第二帝国垮台，建立了共和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在巴黎革命刚刚爆发时，中国同文馆毕业的年轻翻译张德彝随中国外交使团第四次到法国，亲眼目睹了巴黎人民起义、建立巴黎公社的历史场面，并以一个目击者的身份，以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

张德彝祖籍福建，后到辽东，入关后世居北京。

张德彝生于 1847 年。1862 年，在张德彝 15 岁那年，由于办洋务的需要，奕訢、李鸿章等奏设的外语学校即北京同文馆成立，少年家贫，读书靠别人接济的张德彝即入选同文馆，成为同文馆的首批 10 多名学生之一。1865 年，张德彝在同文馆学习三年期满，经总署大考，被奏保八品官。

1866年，张德彝随清廷大员斌椿和英国人赫德（Hart, Sir Robert）第一次出国游历欧洲，以后，他又先后七次出国，每次都留下一部日记体裁的闻见录，并学习古人编纂，与时俱增的方式，以《述奇》、《再述》、《三述》……命名。张德彝前后8次出洋，记述闻见录8种共70余卷，200余万言。其中第三种即《三述奇》是1871年张德彝随崇厚使法时留下的。

1870年五六月间，“天津教案”发生后，法国侵略者即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联合英美等国派军舰到天津海口进行威胁。清政府急忙派曾国藩去天津查办，结果地方官有二人被革职，爱国民众有20人被判死刑，25人被流放，并赔款497000多两。一心避战求和的清政府对此还不满足，又派出以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为首的外交使团亲到法国道歉。张德彝随行，得以再到法国。

张德彝是一个关心外界事物、随时注意留下记录的有心人。在《三述奇》中他不仅记下了沿途的所见所闻，更可贵的是记下了他亲闻亲见的法国投降、巴黎起义和凡尔赛反动军队对革命者进行大规模镇压的历史场面。

张德彝一到法国（马赛），就呼吸到了紧张的空气。“初五日丙寅……，忽闻楼外乐声一阵。出而视之，共兵百余名，乱步而行……行人皆击掌而贺。盖当时法郎西与德意志两国鏖兵数月……。”^①接着他追述了从1870年6月以来普鲁士和法国之间的重大战役，其中包括色当之战、法王被俘等重大历史事件。

1871年3月17日，张德彝奉命先至巴黎为中国使者租借住处，这时巴黎人民起义已是箭在弦上。第二天，巴黎人民起义就正式爆发了。张德彝身在巴黎，亲眼目睹了巴黎人民起义的过程，并当即作了客观的描述。

张德彝对巴黎人民起义建立巴黎公社的描述是相当详细的。

^① 张德彝：《随使法国记》（《三述奇》），第8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如他记述巴黎人民起义的当天和次日时写道：

二十八日戊午，晴。……租寓已定，并告以如何安排修饰。……矣初回寓。闻是日会堂公议，出示逐散巴里各乡民勇；又各营派兵四万，携带火器，前往北卫^①、比迷梦、苇茺暨纳马山下^② 四路，拟取回大炮四百余门，因此四处皆系乡勇看守。官兵到时，乡勇阻其前进。将军出令施放火器，众兵抗而不遵，倒戈相向。将军无法，暂令收兵，叛勇^③ 犹追逐不已，枪毙官兵数十人。武官被擒二员，一名腊公塔^④，一名雷猛多^⑤，亦皆以枪毙之。戌正，叛勇下山，欲来巴里。一路民勇争斗，经夜喧阗。

二十九日己未，晴，凉。闻昨夜叛勇已入巴里，至王宫左万洞坊^⑥ 之铜柱下，约千万人，哗然鼓噪，声言将吏、兵二部大僚，并民勇叛军、巴里提督、按察司皆改用其党。各官畏惧，皆避往卫洒^⑦ 等处，巴里遂无主矣。叛勇行令，官兵皆倒举火枪，以示无与战意。^⑧

巴黎公社的参加者、法国历史学家普·利沙加勒著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被马克思誉为“第一部真实可信的公社史”，其德译本附的《大事年表》中3月18日历史事件的记述却很简单：

① 北卫：佰利维尔。

② 纳马山下：蒙马特尔高地。

③ 叛勇：指巴黎人民的革命武装国民自卫队。

④ 腊公塔：勒康特。

⑤ 雷猛多：克烈芒·托马。

⑥ 万洞坊：旺多姆广场。

⑦ 卫洒：凡尔赛。

⑧ 张德彝：《随使法国记》（《三述奇》），第131、13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维努亚企图在拂晓的时候夺取蒙马特尔的大炮，军事占领巴黎。巴黎人民起义。士兵们拒绝射击，同人民联欢。克烈芒·托马和勒康特两将军被他们的士兵枪杀了。

晚上，梯也尔命令政府的一切机关撤出巴黎。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掌握政权。东布罗夫斯基从里昂回到巴黎。^①

张德彝对法国人民起义和建立巴黎公社的记述，不仅全面，且与信史完全相符，更可贵的是补充了很多只有亲历者才能知道的细节。

张德彝是一个中国人，无意中碰上了法国人民起义和建立巴黎公社。他与斗争双方既无矛盾冲突，又无利益相连，能够以旁观者的身份客观地描述所见所闻，虽然其对巴黎人民革命斗争的记述中有些词句流露出其阶级的局限，但其对法国人民斗争的描述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为巴黎公社在中国留下了一部信史。

4. 法国文学的汉译

18、19世纪是法国文学的繁荣时期，小说名家辈出，戏剧、诗歌流派纷呈，涌现了大仲马、小仲马、雨果、巴尔扎克、莫泊桑、莫里哀、福楼拜、法朗士等著名作家以及伏尔泰、卢梭、泰纳等文学理论家，他们留下了一批闻名全世界的文学作品。

19世纪后期，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一些中国人逐渐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不仅在于科技的失人之先，还在于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良。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人在大量翻译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和教育书籍的同时，也陆续翻译西方文学，中国出现了一批具有新的文学观念、以译介外国文学为专

^① 钟叔河：《巴黎公社的目击者》，见张德彝：《随使法国记》（《三述奇》），第1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长、为己任的文学翻译家和作家，法国文学以其雄厚的实力、辉煌的成就和崭新的社会思想意识脱颖而出，成为他们译介的主要对象，许多法国著名作家的作品被译介到中国来。法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在当时中国翻译文学中占有重要而独特的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近代翻译文学始自法国文学作品的翻译。”^① 1871年王韬在《普法战纪》中翻译了《马赛曲》（后定为法国国歌）和德国的《祖国歌》，是我国最早面世而又有影响的翻译诗歌。《马赛曲》原名《莱茵军战歌》，表达了法国人民与封建势力誓死战斗、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的革命热情和革命精神。王韬的译文在当时倍受侵略之苦的中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来传入日本。

甲午战争前，中国翻译的法国文学较少，从事的人也不多。甲午战争后，特别是20世纪初，许多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和作家都投入到译介法国文学的热潮中，涌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文学翻译家和作家，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是林纾（已在第四章专述）、伍光建和曾朴。

伍光建（1867—1943年），号昭展，笔名君朔，广东新会人，幼时聪慧，15岁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赴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海军，后转入伦敦大学。伍光建热爱中外文学，除学习专业外，他又兼攻欧美文学，回国后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教。

“戊戌变法”前后，伍光建开始从事寓言故事的翻译，之后便尝试翻译欧洲古典名著。其中他最初几年翻译的法国作家大仲马的《侠隐记》（*Les Trois Mousquetaires*，今译《三个火枪手》）、《续侠隐记》（*Vingt ans apres*，今译《二十年后》）和《法官秘史》（*Le Vicomte de Bragelome*）较为著名，之后他又翻译了莫泊桑、雨果、法朗士等法国著名作家以及狄更斯、菲尔丁等英国作家的作品多部。

^① 陈宗宝：“法国文学在我国的翻译”，载《法国研究》，1984年第2期。

伍光建不懂法语，他翻译的法国小说都是由英文本转译而来的。由于他精通英文，又有较高的中文素养，且使用简洁明快、通俗易懂的白话文，较准确地反映了原著的精神和完整的情节，所以《侠隐记》等书出版后，受到中国读者的热烈欢迎。

曾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小说家、出版家、法国文学翻译家，生于1872年，字孟朴，又字小木，笔名东亚病夫，江苏常熟人。曾朴自幼笃好文学，著有小说《孽海花》等。

曾朴具有爱国思想，认为做外交官是救国的唯一途径，决心学习西方语言。1895年，他人北京同文馆法文班，学习法文8个月，具有一定的法语基础。

1897年，曾朴到上海，结识了曾居留法国多年、精通法语的陈季同。在他的指点下，曾朴得以精通法语，并阅读了大量的法译欧洲文学名著，接触了法国各文学流派主要作家的作品，对法国文学有了较全面而深入的了解。

曾朴由对法国文学的喜爱，逐渐萌生了译介法国文学的愿望。1908年，他最早翻译的大仲马的《马哥王后佚史》(La reine Margot)刊于其创办的《小说林》杂志上，之后，他又翻译了雨果的著名长篇历史小说《九三年》(曾朴译为《九十三年》，连载于1912年上海《时报》上)，和剧本《吕克兰斯鲍夏》(Lucrece Borgia, 曾朴译为《泉坎》，现译《吕克莱斯·波基亚》)、《欧那尼》(Hernani, 现译《艾那尼》)等以及莫里哀的《夫人学堂》、福楼拜的《马笃法谷》等法国著名作家的著名作品。

曾朴是现代系统译介法国文学的翻译文学家，他不仅翻译了法国古典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等各流派作家的作品，还撰文介绍一些法国的作家及其作品，晚年写了若干研究法国文学的论著，如《论法兰西悲剧源流》等，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曾朴精通法文，对欧洲文学又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从选择译本到文字表述都不受别人限制，因此，他的翻译比较忠实于原

著，便于读者了解法国文学的真面目。他的译本在本世纪初法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中是较好的译本。

在这一时期，翻译法国文学作品较多的中国作家还有洪观涛、包天笑、周瘦鹃等。我国新小说运动的发起人梁启超也翻译了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小说《十五小豪杰》和《海底旅行》、佛琳玛利安的《世界末日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于1903年翻译了雨果的小说《哀尘》，1903年和1906年分别翻译了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两部小说。

晚清时期是法国小说在我国翻译和传播的初始阶段，经过新一代作家的努力，法国文学被全面译介到中国，并得以广泛传播。它不仅纠正了中国文人过去认为外国无文学的陈腐观点，而且首先影响了我国这一代的文学翻译家和作家，他们在自己的翻译和创作实践中不同程度地吸收了法国优秀文化的精髓，接受了法国文学大师的影响，造就出中国第一批法国文学翻译家和受法国文学影响的作家，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

5. “达盖尔银版摄影法”的传入

“达盖尔银版摄影法”是法国人路易·达盖尔发明的利用银盐感光成像的方法。

路易·达盖尔（Louis Daguerre）生于1787年，初学舞台设计，后学绘画，是巴黎著名的艺术家和风景画家。

达盖尔初以创办“西洋镜”而闻名。在展示“西洋镜”的过程中，他对用银化合物的化学方法来记录摄影发生了兴趣。他用银盐做实验，到1837年他已掌握了一套完整的操作方法，对大部分明亮光线下的景象，拍摄下来的效果是细致的灰白色的影像。其方法是在铜板上镀上一层白银，放在装有碘溶液的小箱子里，使铜板上的银与溶液化合成可以感光的碘化银。然后，将其放在暗箱中进行曝光，再把已曝光的铜板放在加热的水银上进行

熏蒸，影像便显现出来。然后用加热的食盐水（后改用海波溶液）将未曝光的碘化银洗去，影像便得以固定。

达盖尔的发明受到了法国政府的奖励，为报答政府，达盖尔将他的全部技术公之于众。1839年8月，法国政府正式向世界宣布了他的发明，定名为“达盖尔式摄影法”（Daguerreotype process），并通告各国不实行专利，各国人民可以自由使用，“达盖尔式摄影法”迅速传播。

达盖尔摄影法公之于世的第二年，爆发了英国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42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条约规定开放广州、福州、宁波、上海、厦门五个通商口岸，优惠的商贸条件和特权吸引了外国商人和传教士接踵而来，他们在外交和经济贸易活动中，把达盖尔摄影术传入了中国。

1844年，法国摄影师勒·埃尔（Jules Itier）以法国海关总检察长的身份来中国参加中法《黄埔条约》的谈判，他不仅在广州、香港、澳门拍摄了许多风景照片，还为参加谈判的两广总督、五口通商大臣耆英拍了照片，这是摄影术首次传入中国。之后，与他同行的法国传教士南格禄（Gottelancleau）则携带照相器材去了上海。

摄影术传入中国后，在中国的沿海城市迅速出现了一些照相馆和以照相为业的人。1846年湖南人周寿昌到广东游历，对所见摄影场面作了记述：“坐人平台上，面东置一镜，术人自日光中取影。和药少许涂四周，用镜嵌之，不令泄气。有顷，须眉衣服毕见，神情酷肖，善画者不如。镜不破，影可长留也。取影必辰巳时，必天晴有日。”^①香港也很早有了照相馆，1846年香港报纸出现了一家摄影公司的广告，这个公司后被麦凯接管，并开有摄影室。咸丰年间，周森峰、张千秋、谢芬三人在香港经营画业，并跟西人学习湿法照相，后周森峰留在香港，谢芬去了福

^① 周寿昌：《思益堂日礼》卷9，《广东杂述·画小照法》。

州，而张千秋则回了广州，在广州河南经营照相业达数十年。^①这一时期，上海的照相业也发展很快，据王韬记载：“西人照相之法盖即光学之一端，而系参以化学……法人如李阁朗、华人如罗元祐，皆在沪最先著名者。”^②另据回忆，上海最早的照相馆有公泰、苏三新、苏之兴、丽珠、宝记等数家。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照相业出现了“四大天王”，即施德之开设的耀华照相馆、广东人欧阳石芝开设的宝记照相馆、张桂生开设的保镳照相馆和致真照相馆。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为了牟取暴利，有些外国人在中国的广州、上海等沿海城市开设了照相馆。如19世纪50年代，上海已有法国人李阁朗开设的照相馆，专为当地人拍摄肖像照片，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职业摄影师。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摄影术在中国的传播、应用还只限于南方沿海数省，北方还非常少见，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人可以到我国北方自由活动，摄影术也随之传到北方，1892年北京出现第一家照相馆。

在达盖尔摄影法传入中国的同时，世界流行的摄影方法已有明显改进，出现了卡罗法^③、安布罗法^④、锡版法^⑤和湿版法^⑥等多种方法，不久都传入中国。

在洋务运动时期，随着摄影技术在中国的传播，摄影理论也

① 参考邓肇基：《广东摄影界的开山祖》，《摄影杂志》，1922年第6期。

② 王韬：《瀛海杂志》卷6，《西人照相之法》，光绪十年。

③ 卡罗法：英国人塔尔·博特发明，其先用纸质感光片取得负像，再转印于相纸上，得到正像，又称“负—正法”。

④ 安布罗法：1854年美国安布罗斯·卡丁改进的方法，即用火棉胶玻璃感光板摄取负像后，在背面涂上黑漆获得正像。

⑤ 锡版法：类似安布罗法，区别在于把感光层直接涂到黑金属片上。

⑥ 湿版法：1851年，由英国人发明。即把碘化物溶解于火棉胶中，涂于玻璃片上，再浸入硝酸银溶液中，形成碘化银感光层。因这种方法必须趁湿拍照冲洗，故名湿版法。

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1873年，英国传教医生在北京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摄影术专著《脱影奇观》，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分理学、艺术、法则三部分，该书用明白晓畅的语言介绍了摄影术的源流及理论，介绍了当时世界上并行的早期摄影方法：银版法、湿版法、卡罗法等。随后，中国近代化学家徐寿与英国人傅兰雅合作编译了《色相留真》，1880年该书以《照相略法》为题在当时傅兰雅主编的科普杂志《格致汇编》上刊出。该书分划玻璃、洗玻璃、敷蛋白、合制哥路第恩、银养淡养、直光平光、镜箱、暗房内显影、显影药、护影药、印像纸、干照、透明像、瓷片照像、黑衬像、印箱、印像印边、游戏显像、旧银水分取银质和山水等部分，介绍了摄影的各个环节和用品用具。另外，还有丁韪良1868年完成的《格致入门》一书，傅兰雅的《光学须知》、《光学图说》以及后来徐寿编辑出版的《照相器》、《照相干版法》等摄影理论专著。

在摄影法传入中国的初期，中国的摄影者大多是从西方传教士或商人那里学习照相技术以作谋生之计，基本上是只知其术，未明其理，摄影理论书籍出版后，揭开了摄影术的奥秘，使中国人能够通过自学掌握摄影技术，促进了摄影术在中国的推广和普及。到19世纪末，在中国的各大城市和旅游点都出现了照相馆或摄影师。

三、中德文化交流

1. 李希霍芬的中国之行和文化介绍

李希霍芬是德国著名地质兼地理学家，是较早对中国地质、地理和经济资源进行亲身考察的西方人。

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Richtofen, Ferdinand Paul Wilhelm, Baron Von, 1833—1905年），生于德国西里西亚省，1856年毕业于

于柏林大学。由于对地质学的强烈兴趣，曾到阿尔卑斯山区进行研究，后又到喀尔巴阡山进行考察，又曾专门从事过花岗岩、火山岩以及白云岩成因与珊瑚关系的研究。1860—1862年，李希霍芬以科学特派员的身份随普鲁士远征探险队到亚洲东南部进行考察，并首次到达中国。之后，李希霍芬赴美国、匈牙利，考察、研究了美国和匈牙利的金矿与火山岩的关系。

1868年，李希霍芬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银行的资助，专程从美国来华考察中国的地质、矿产资源等，后来又受到上海欧美商会的资助。从1868年起，李希霍芬精心设计了七条考察路线，开始对中国进行考察。其考察的时间和路线安排如下：^①

1868年9月4日，李希霍芬由美国旧金山经日本到上海，9月17日乘船经芝罘于30日到北京，十月中旬离京到芝罘，拟定调查计划。

1868年11月1日至13日由上海至宁波，在宁波附近勾留至月底，12月初至舟山群岛，此行目的在作溯江西上调查长江下游煤田的准备。然后返宁波至镇江，由此至南京。

1869年1月8日由南京乘船西上，自称目的在研究南京、汉口间之江岸。1月12日到汉口，然后于15日东行，22日到九江。调查鄱阳湖后于2月10日东返南京，21日返上海。

1869年3月13日由上海乘船经镇江，17日起由镇江沿大运河北上至山东济南，然后东行于5月10日到芝罘。8日后登船北上往牛庄，登岸后沿辽东半岛西岸及东南岸而行。又北行至沈阳，然后又西行经山海关、滦州、丰润等地，于7月至北京。在北京附近逗留至8月中旬，然后由天津乘船经芝罘返上海。

1869年9月24日复由上海乘船沿江西上，在鄱阳湖周围逗留后，东进经安徽南端至浙江西部，顺富春江而下至杭州。

^① 张炳燧、李文达：《帝国主义的先遣特务李希霍芬》，《光明日报》1950年12月24日。

10月底返上海。年底至香港，准备下次旅行。

1870年1月1日离广州，乘船溯北江北上。至湖南境后即乘船下耒水、湘江，经洞庭湖于2月26日到汉口。在汉口停留两周后，先乘船溯汉水北上至襄阳，然后取陆路经河南省西部至洛阳。渡黄河后经清化镇入山西。经晋城（泽叶）至临汾（平阳）。然后先沿汾河谷北上，复东折至平定。出山西境经保定至北京，时在1870年5月底。据李氏自称，此行本拟由广东经广西至云南，但因当时云南境内回民起义，旅途不安而改走此线。在北京停留至8月底，然后由海路返回上海。由上海再往日本，在日本停留至次年5月，又重返上海。

1871年7月中旬至8月上旬，李氏又由上海出发，到浙江、安徽及江苏三省调查，路线与前数次均不重复，完结后返上海。

1871年10月中旬又由上海取海路经芝罘、天津而至北京，开始其最后一次的长途旅行。此次由北京出发，经京西斋堂，溯运河至察省南部，再由张家口登蒙古高原，然后由大同之北返入长城之内，纵贯山西全省，再由潼关入陕西至西安。至西安时在1872年1月初。由西安过秦岭至成都。由成都西南行，然后由叙州（宜宾）沿江而下。于1872年5月下旬返抵上海。后于同年10月18日离上海，12月1日回到德国。

李希霍芬在中国调查四年，考察了中国十数省，几乎每天都记有日记，对考察区的地质、地理、矿产资源的分布都作了详细的记录，并记述了考察区的土特产、交通运输情况和民俗民风等，对各种资源开发利用的价值和可能性作了分析和推断。

李希霍芬的考察报告和研究成果除寄给德国和加利福尼亚银行的老板外，还以书信的形式将其旅行报告寄给了资助其考察的上海欧美商会。这些书信于1903年用英文在上海出版，书名为《李希霍芬男爵书简》（*Letters from Richthofen, Shanghai, 1870—1872*年），全书记录了他1870至1872年的考察结果，其内容分

11 部分：^①

- (1) 关于湖南省的报告
- (2) 关于湖北樊城附近汉水的报告
- (3) 关于河南山西省的报告
- (4) 关于浙江安徽两省的报告
- (5) 关于南京镇江间的报告
- (6) 关于甘肃“回乱”的报告
- (7) 四川旅行的中断
- (8) 关于直隶蒙古和山西的报告
- (9) 关于陕北的报告
- (10) 关于西安成都间的报告
- (11) 关于四川省的报告

在这份报告里面，李希霍芬细致地记录了中国各地的土产，如煤、铁、手工艺品、粮食、鸦片、药材等；记录了各地的交通状况，包括运输脚价、水陆路线等，特别讨论了南方河流的深浅和行驶汽船的可能性等。他还特别关注各地的商业情形，包括各地特产的市场价格、行销范围以及运输情况对市场价格的影晌。李希霍芬的这份报告向欧美商会提供了中国各地的资源情况，并分析了其开发的可能性与潜力，对外国资本来说，无异是一本地道的并十分有价值的生意经。

李希霍芬关于中国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其回国后发表的巨著。1872年，李希霍芬结束中国之行，回到柏林，开始著述工作。他的工作受到德国政府的重视，“1875年，普鲁士政府想请他去柏林大学工作，又立即准许他暂不到任继续写他的书”。^② 李希

^① 张炳燊、李文达：《帝国主义的先遣特务李希霍芬》，《光明日报》1950年12月24日。

^② 罗伯特·迪金森著，葛以德译：《近代地理学创建人》，第92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霍芬受到德国政府的嘉奖和赏识，因而获得了政府足够的资助，得以整理发表其在华所做的地质、地理考察研究成果：《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iindeter studien）。此书共5卷，李希霍芬只完成了前2卷，余3卷由别人根据他考察所得的资料整理而成。李希霍芬在第一卷中探讨中亚及中国地质、地理、地貌等自然条件及其对居民移动的影响，提出了中国华北黄土风成的假说；第二卷记述了李希霍芬在中国东北、华北等地所做考察的地质、地理资料；第三卷李希霍芬没有完稿，后由埃尔恩斯特·蒂森（Ernst Tiessen）根据李希霍芬的资料整理完成，另外还有一本地图集，也由别人补充完成。^①

此外，李希霍芬还著有《山东及其门户——胶州》（Schantung und seine Eingangspforte kiautschou）（1898），在德国侵占中国青岛的次年出版，主要介绍中国山东的形势。

李希霍芬是“一个自觉的、有目的的代表外国资本，特别是代表德国在华资本利益的人”。^②他通过自己亲自考察所得的资料，研究中国的地质、地理情况，并把中国的经济特别是矿产资源分布情况介绍给西方，使西方对中国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虽然他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出谋划策，也为帝国主义国家掠夺中国资源提供商业情报，但他在地理、地质学上的贡献都是巨大的，被誉为创建近代地理学的“第一代大师”。^③在中国地质和地理学界也有着广泛的影响，他的地层学方面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中国华北黄土风成的假说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① 罗伯特·迪金森著，葛以德译：《近代地理学创建人》，第91页。

② 丁建弘：“‘视线窥，永是东方’——中德文化关系”，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第12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③ 同①，第90页。

2. 旅德的中国留学生

在1872年赴美幼童扬帆出海、1875年赴英法参观的学生赴欧之后，1876年，李鸿章乘德国克虏伯炮厂驻华代表李励协回国之便，派天津武弁7人，即卞长胜、宋跃彩、王得胜、杨德明、查连标、袁雨春、刘芳圃等赴德国学习军事技术，学习科目有战略、军火制造、制图学、炮兵等，学期3年。7人当中，卞、宋二人因学习太差，一年后召回国；杨德明患病，学业不佳；王得胜成绩一般；查、刘、袁3人于1879年回国，也未显露才华。这次赴德的留学生，情况很不理想，但为往欧洲派遣留学生提供了经验。之后，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便决定从福州船政学堂和北洋水师学堂选拔基础较优的青年赴欧留学。^①

1877年，经过充分准备和精心组织与挑选，福州船政学堂派出首批二十余名制造、驾驶学生和艺徒赴英法学习；1881年，李鸿章又从北洋水师学堂和福州船政学堂派陈才瑞等10人赴英、法、德留学，其中陈才瑞、陈伯璋二人赴德国学习鱼雷技术。另外，不少留学英法的学生，如1877年赴法在巴黎学习矿务的林庆升、林日章、张金生、罗臻禄以及随员马建忠等都曾在学之余或专程赴德国参观、游历、考察。这一时期，洋务派办洋务的重点在于筹办近代海军，加强海防，因此清政府派赴德国的留学生并不多。此后，直到戊戌变法时期，清政府再未有赴德留学生的派遣。

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重新派遣留学生出洋，并采取了一些鼓励自费出国留学的政策。1902年，清政府令各省选派学生出洋。这时期，由于清政府组建新式陆军的需要，官费派赴德国学习陆军的学生有所增加。1903年，张之洞从江南水师学堂选派毕业生8人去英国学习驾驶的同时，也由陆师学堂选派毕业生8人赴德国学习步骑炮工各科。同年，湖北总督端方在各

^① 参考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第82—83页。

学堂中选派 8 人赴德留学。此后，留学德国的人不断增多，学习科目也不再限于军事。1909 年，清廷出使德国大臣荫昌所呈报的留德学生为 77 名，其中河北 6 名，广东 16 名，湖北 11 名，湖南 3 名，浙江 8 名，江苏 13 名，安徽 5 名，福建 4 名，山东 6 名，山西、陕西、江西、广西、蒙古各一。所派人数与各地文化程度高低基本吻合。这些学生多为官费生，也有 21 名自费生，所攻科目以军事和理工为主，但也有学艺术和美学的，进柏林文科大学的有 7 名。^①

随着留欧学生的增加，清政府加强了对留学生的监督。1907 年，清政府设置留欧学生监督，制订了管理章程 31 条。但由于留欧学生分散于各国，一个监督无法顾及各国学生，1909 年清政府撤销留欧学生监督，而在各国分设监督，隶属于各国公使管辖。派往德国的监督为江国珍。辛亥革命后，这种管理略有变动，但仍有专门官员负责管理留欧学生。

在晚清政府加强对留学生管理的同时，留德学生也加强了自我管理，成立了留德学生会。1906 年，出洋考察的戴鸿慈在德国考察时曾到留德学生会看望旅德留学生。“下午四时，赴留德学生会，是日，学生到者五十余人，请余及午帅（即端方，笔者注）演说。因勉励数语，并以保存国粹、力求实用为嘱”。^②1909 年，《华商联合报》也对中国的留德学生会作了介绍：“柏林已设留学生会，由津浦铁路会办孙宝琦为会长，该会宗旨，专为保护德国各处之中国留学生，会员中已有德人四十名，华人五十名。”^③旅德的中国留学生已用留学生会互相团结，共同排忧解难。

旅德的中国留学生同留欧的其他留学生一样，具有高尚的爱国思想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留德学生马君武曾有一首诗写道：

① 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第 112 页。

② 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第 127 页，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③ 《华商联合报》，1909 年第 2 期，“柏林添设中国留学生会”篇。

“故乡吾负汝、岁岁远别离。万里生还日，六州别战时。疾声唤狮梦，含泪拜龙旗。吾岁今方壮，服劳或有期。”^① 这首诗代表了广大留学生立志成才、报效祖国的共同心声。他们经过苦读，学有专长，回国后大多成为晚清海军和军事企业的技术骨干，如1884年，陈才瑞从德国留学回来后，被派往福州船政局协助制造鱼雷。他在德国留学时专攻鱼雷制造，“深窥机健，究其精微”，经他从各方面进行技术指导后，原来鱼雷制造技术不过关的问题得以解决，鱼雷和水雷都制造出来了，并在福州船政局建立了鱼雷车间。陈兆翱在英国、法国、德国留学时，对蒸汽机的制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刻苦攻读，握其要领。回国后，到福州船政局工程处任蒸汽机制造的总工程师，指导全厂的工艺流程，成绩显著。同时他勇于革新，有所创造，把轮船车叶“化平为侧”，博得国外同行的赞赏。他还发明了抽水机器，“为西人所崇”，有人甚至“以陈兆翱名其器”。^② 有的留德学生成为政治活动家、科学家、教育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蔡元培。蔡元培以他卓越的才识，最终成为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教育改革家，这与他留德期间刻苦学习，注重研究德国的教育理论，考察德国教育制度密不可分。

3. 德国在华世俗教育

1861年，德意志诸邦国中最强大的普鲁士同中国签订了《天津条约》，这是中国在政治上承认德意志国家的开始，也是近代中德文化交流的起点。1871年，德国在普法战争中获胜，赢得了它的大国地位，这时中国才在法律上承认德国是一个政治上、经济上、特别是军事上的强国。1871年，北京同文馆增设了德文馆。此后，德国便借助其军事上的大国威望对中国进行包

^① 转引自吴霓：《中国人留学史话》，第44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 参考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第104、105页。

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渗透。

德国是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当它走向世界抢占殖民地时，亚、非、拉的大部分地区已被其他列强瓜分完毕，为了同其他列强争夺殖民地，扩大德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德国非常重视文化出口在其侵略中的作用，认为“扩散帝国文化上的影响，为它的经济发展充当开路先锋，应是现代化的对外政策的方案”。^①

1897年，德国强占中国山东半岛，获得了一个向中国内地进行文化渗透的极有利的出发地，此后便开始在中国各地开办学校。

青岛是德国殖民统治的基地。德占青岛期间，不仅德国教会建立了十余所教会学校，德国殖民当局也建立了26所蒙养学堂。

蒙养学堂是青岛德国殖民当局为中国设立的初等学校，共26所，“多就原有私塾改设教授修身、读经、国文、算学、历史、地理、格致、德语，五年毕业”。^②这些学校对中国儿童施行德国式教育。^③后二年尤其重视德文，以为德国殖民统治培养所需的各种人才做准备。

从1907年开始，德国在中国天津、上海、青岛、汉口、广州、成都、济南等地创办了一系列的中德中学堂，这些学校是特意为适应中国的教育而设立的，具有不同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所办学校的特点：（1）这些学校实行德国学校制度，也保留了中国学校教育的特点。学校用德语进行中等级别的学科教学，学制一般为四至五年，提供两套课程设置，兼有中德两方面的内容，一套类似于德国的六年制学校，注重近代语言、数学和自然科学，一套是由中国教师教授的中国课程，其设置尽可能同标准的中国中学堂一致。这种课程设置，一方面德国式课程为中国学生将来

① 转引自李工真：“德国对华文化政策的开端”，见刘善章、周荃主编：《中德关系史文丛》，第216页，青岛出版社1992年版。

② 《胶澳志》卷7，“教育志”，第4页。

③ 《东方杂志》第14卷10号，“宣战前德国在华势力”篇。

择业或求职提供了一定的实用知识保证，另一方面又可使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熏陶。^①（2）这些学校大多为德国政府所办，具有世俗教育的特征，并能遵守中国的法律。在华的德办学校里边，大多未设置宗教课，有些学校甚至规定，在学校周围地区的一定范围内，禁止一切宗教宣传，从而消除了因宗教原因而引起的中国民众的反感。德办学校大多还能够尊重中国文化传统，尽力避免文化冲突。同时德办学校又能够较好地遵守中国政府的教育法令和课程设置规定，其文凭得到中国官方的承认，具有同中国中学堂同样的效力。（3）德国在中国办学，注意发挥其技术教育的优势。德国是19世纪西方教育发达的国家，有一套完整的技术和工程教育体系，其职业和科技教育是世界各国学习的典范。近代中国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在西方侵略面前束手无策，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逐渐意识到自己科技的落后，对西方的技术和科学教育产生了兴趣。德国则把技术教育作为扩大对外侵略的手段带到中国，不仅建立了一些技术学校，在高等学校里设机械、建筑等工科专业，在中国各地的中德中学堂中也注重技术教育。德办学校的这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德国学校在中国的地位，为德办学校在中国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些学校创办后都获得了稳定的发展。其发展如图表所示：^②

中德中学堂人数（1910—1917年）

	1910	1914	1917
广州	40	80	140
成都	20	50	70

① 参考弗朗柯伊斯·克莱斯勒：《作为文化合作关键的技术教育：中德的经验》，见许美德：《中外比较教育史》，第1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同①，第130页。

汉口	30	50	60
济南	20	60	70
天津	70	100	190
总计	180	340	530

资料来源：施密特《德国在华教育工作的目标》，中国档案，
3(11)，1918年11月24日，第466页。

20世纪初，德国还在中国创办了两所高等学校，一所是上海的同济医工学堂，一所是青岛高等专科学校。

1906年，德国东亚舰队医师、著名外科医生宝隆（Pau lun）开始筹备在上海建立医学堂。1907年，在柏林中德文化促进委员会的帮助下，筹集了价值700万马克的书刊和医疗器械。同年6月3日，学堂租赁上海白克路几幢楼房作为校舍，宣布成立，校名为德文医学堂，宝隆任校董会董事长兼任学堂总理，学堂还设有基金会，由德国驻上海领事克纳佩（Knappe, W.）任基金会监督。学校设有德语和医学二科，德文科是医学科附设的预备学校，学制3年；医科又分预科和正科，预科学制2年，正科3年。全学制为8—9年。1907年6月4日，学堂开学试行招生，初有20多人，但不久有半数退学。于是由克纳佩出面请清朝各省选派生员，得学生20余人，同年10月1日正式开学。到1908年，学堂有教师3人，学生33人，其中25人人德文科，8人人医学预科，并在多宝路南购地建新校舍，校名改为同济德文医学堂。1909年新校舍建成，德国医学博士福沙伯（Schab Oskar Von）任学堂总理。

1910年，德国工商科技界开始筹备在上海建立工学堂，1912年工学堂落成，并随即并入同济德文医学堂，校名也改为同济医工学堂（Deutsche Medizin und Lugen School）。合并后，学堂设有德文预备学校和医工两科，医科学制5年，工科初为3年，1913

年改为4年。1914年日军侵占青岛，青岛高等专门学堂停办，大部分师生转入同济医工学堂，为此，学堂增设土木系，1915年又添设机师科。学校发展很快，到1916年，学校已有教师35人，学生500多人。

青岛高等专门学堂又称黑兰大学，成立于1909年。1907年，为了同英、美竞争，德国决定在中国青岛创办一所以工科为主的大学，并正式向清政府提出。1908年7月，中德商定青岛高等专门学堂章程，1909年奏请朝廷，获准立案，1909年10月25日，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下称黑兰大学）正式开学。

黑兰大学由中德合办，经费主要由德国政府负担。学校设有预备科和高等科，课程均按德国统治者的需要而设。高等科分为法政科、医学科、工艺科和农林科，学制为3—5年。法政科设有国际公法、普通国家法、管理学、预算法、铁路法、矿山法、航海法、刑法、民事诉讼法等课程；医学科除了学习解剖、生理学等基础课程外，各科还有临床课及卫生学；工艺科分为建筑学、机械电气工学和采矿冶金学等专业。农林科设有土壤学、植物学、动物学、养牲学、森林学、森林利用学等课程。学校重视工科，开办时即招收了两班工科学生，课程设有数理化、地质学、金石学、力学等公共课和有关机械制造、房屋建筑、铁路建筑、电气技术和矿山建设方面的专业课。学校还特别注重实践，各科学生都要参加实习。

学校的所有专业课程，都使用德文课本，由德国人担任教员；学校拥有较先进的仪器设备，设立了多处实验室，图书馆有藏书1.3万余册。该校还创办、出版了一些书刊，如《德文进修》、《中德法报》、《德华物理专门名词》、《德英华三文科学词典》、《中德法律汇览》、《中国法政集要》、《宪法全纂》、《重量化学分析入门》和《农学报》等。该校是当时中国比较先进的学校，创办后声望日高，来求学者日增，到1912年学校已有学生

340人。^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对德宣战，与德国成为敌对国，对德国在华从事的各项事业，北京政府规定了三项处理原则，其中规定：德国人在华之财团，如学校、医院等，皆由中国接收。到1919年底，德国在华所办中小学大部分被中国人接收，青岛高等专门学堂则早在1914年日本对德宣战时即被迫关闭，大部分师生转入上海同济医工学堂；上海同济医工学堂则在1917年改为私立，一战后，校产被国联裁为中法共有，后被中国接收，发展为今天的同济大学。

4. 中德文化艺术的相互吸纳

德国是西方科学技术和哲学、文学、艺术发达的国家，但由于中国封建王朝闭关自守，锁国愚民，在中国近代初期，西方输入中国的大多是实用科学，直到19世纪后半期甚至20世纪初，德国的哲学、文学、艺术才相继传入中国。

我国较早介绍德国哲学思想的是康有为、梁启超、马君武、严复等。

康有为是我国近代历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20岁后，康有为曾游历香港，开始接触西学，对德国文化教育非常推崇。1886年，康有为著《诸天讲》，讲述天体的形成与发展，书中介绍了康德的星云学说：“德之韩图（康德）、法之立拉士（拉普拉斯）发星云之说，谓各天体创成之前，是朦胧之瓦斯体，浮游于宇宙之间，其分子互相引集，是谓星云。”^②康有为又结合中国哲学的形气学说，根据康德的星云说，解释自然和宇

^① 有关“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部分参考周东明：“德占青岛时期的教育策略及其实施”，见刘善章、周荃主编：《中德关系史文丛》，第150—152页，青岛出版社1992年版。

^② 康有为：《诸天讲》卷2。

宙的发展，认为太阳有成毁，地球有生灭，星有老少差别，并得出上帝的存在无可验证的观点。康有为对康德星云说的介绍，是中国最早接触到的西方科学的宇宙史观。

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对欧洲的哲学、思想多有研究。他系统地翻译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进化论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学说。在《天演论》里边，他在介绍英国经验科学的方法论时，也引进了康德的不可知论，并加以发挥，认为：“谈理见极时，乃必至不可思议之一境。”^① 1906年，严复又写了《述黑格尔唯心论》一文（后发表于1916年《寰球学生报》上），该文叙述了德国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来龙去脉，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源于康德的哲学，阐明了黑格尔哲学的师承关系。严复还抓住了黑格尔哲学的精华——历史的辩证法，他说：“道常新，故国常新……是故国家进化，于何而极，虽圣者莫能言也。”

1903年，我国几乎同时出现了几篇介绍德国哲学的文章。梁启超在《新民丛报》25、26、28、46—48诸期上发表了《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把康德哲学与佛学糅合在一起，又掺杂以王阳明的心学来理解和传播康德哲学。王国维写成《康德象赞》，用叔本华的哲学来理解康德的哲学，认为康德哲学的精华在于时空因果这些范畴，叔本华哲学远超过康德哲学，二者的区别在于叔本华强调直观（直觉）可以体验物自体。同一年，曾留学德国的马君武在《新民丛报》27期发表了《唯心派巨子黑智几学说》，介绍了黑格尔的生活、学风、绝对唯心论、逻辑学和历史哲学，并对黑格尔作了相对客观的学术评价。

在晚清，中国对于德国哲学的介绍还是少而散的，有些是歪曲甚至是错误的，但毕竟为五四以后中国人了解、吸收西洋哲学，进而融会、自创哲学系统做了筚路蓝缕之功。

^① 严复：《天演论》卷下，论十佛法按语。

晚清时期，德国文学作品也开始被译介进来。1871年，王韬的《法国志略》中译录了德国著名歌曲《祖国歌》，堪称中国最早译介的德国文学作品。19世纪末20世纪初，苏曼殊译了歌德的爱情诗《〈沙达纶〉颂》，马君武翻译了歌德的《朱丽容歌》（后译作《迷娘》）和《阿明临海岸哭女诗》（摘自《少年维特之烦恼》）等著名作家的诗歌。另据统计，从1840至1919年，中国还翻译了德国小说三十多种。这些德国文学翻译作品为中国新文化运动注入了一股新的发展动力。

戊戌变法后，德国音乐也开始传入中国。1898年，康有为在上光绪皇帝的奏折中，曾以德国学制为例，主张学堂开设音乐课，变法失败后，改良派领袖梁启超把音乐作为宣传维新思想的工具，并在《新民丛报》1902年第2期上译录了《日耳曼祖国歌》，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当时许多学堂都开设了音乐课。

1902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时，曾任用德国人高斯组建了第一支有影响的西式军乐队——铜管乐队。这种军乐队很快为其他军队和军事学堂以及普通学堂所效仿。1910年出版的《教育杂志》里就有一幅天津私立第一中学的学生铜管乐队的照片，铜管乐队在中国学堂中已不为少见。乐器和乐队项目也成了学生的课余活动之一。

中国的典籍和文学作品早在17世纪即在德国广泛流传。鸦片战争以后，德国人费兹麦耶尔（August Fitzmaier）于1852年在维也纳出版了屈原的《离骚》和《九歌》的德文本；1880年海德堡又出现了《诗经》的新版本；1899年中国《汉魏六朝诗选》被译成德文；1904年，中国古典名著《水浒》被节译在莱比锡出版。从1910年开始，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用20年左右的时间，把中国的四书五经几乎全部从汉语译成德文。中国文化被大量译介到德国。

中国文化在欧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德国著名诗人席勒和文学巨匠歌德都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德国许多著名哲学家如赫尔

德 (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和谢林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 都对中国的专门论述。这一时期, 中国还成为德国一些著名文学家写作的素材。德国伟大诗人海涅 (Heinrich Heine) 于 1842 年在《巴黎德国报》上发表了一首题为《中国皇帝》的诗, 把中国作为反面素材进行描写, 借以嘲讽普鲁士皇帝及其追随者。德国现实主义小说大师冯塔纳 (Theodor Fontana) 在晚年所著小说《艾菲·布里斯特》(Effi Briest) 中塑造了一个中国人的形象, 这个中国人是作品中冲突的焦点, 但却始终没有露面。

这一时期, 最关注中国的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1853 年, 马克思发表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 谴责了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掠夺的帝国主义行径。1857 年, 恩格斯发表了《波斯与中国》, 赞扬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英勇斗争, 并对中国革命的前途作了乐观的估计。之后, 马克思又发表了《俄国的对华贸易》、《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中国和英国的条约》、《新的对华战争》及《对华贸易》等一系列文章, 抨击英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种种暴行。

四、中俄文化交流

1. 在华的东正教使团

鸦片战争后, 沙俄加紧侵略中国, 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进一步取得了在华自由居住和传教的权利。从 1840 年到新中国成立, 先后有 8 届俄国东正教使团来华, 其驻华时间及团长如下:

第 13 届 (1850—1858 年), 团长为修士大司祭巴拉第·卡法罗夫 (Паладий Кафаров), 另有传教士 6 人, 医生 2 人和画家伊凡·伊凡诺维奇·奇诺托夫 (Чжутов,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第14届(1858—1864年),团长为修士大司祭固星·卡尔波夫(Гурий“Тричорий”Карипов)。

第15届(1864—1878年),团长为修士大司祭巴拉第·卡法罗夫。

第16届(1878—1888年),团长为修士大司祭弗拉维昂·高连茨基(Флавянъ Горецкий)。

第17届(1888—1898年),团长为修士大司祭阿姆菲洛赫·罗托维诺夫(Амфилохий Путовинов)。

第18届(1898—1931年),团长为都主教费古洛夫斯基·英诺肯提乙(Фигоповский Иннокентий),另有修士大司祭1名,修士司祭2名,司祭4名,修士辅祭2名,教职人员13名,还有辅祭5名,诵经士6名,修士、见习修士、修女,见习修女13名。

第19届(1931—1933年),团长为大主教西蒙(Симонъ)。

第20届(1933—1956年),团长为大主教维克托尔(Виктор),1956年后由中国人担任。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名义上是为传教,实质上却是俄国派驻中国北京的间谍,是沙皇俄国对中国进行政治、军事、文化侵略和搜集商业情报的中心。早在1780年,全俄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给前往中国京城的修士大司祭约阿基姆·希什科夫斯基(Иоаким Шишковский)的工作指示中就要求,“尔修士大司祭于驻北京期间,一有机会就应尽量把当地动态认真详细地写成材料上报全俄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①俄国驻华传教团的传教士和随团而来的学生都致力于搜集中国情报,在沙俄历次侵略中国和与中国签订条约的活动中,传教士团都为沙俄提供了大量政治、军事、经济情报,起了重要作用。但传教团的教务却发展缓慢,

^① 尼·伊·维谢洛夫斯基:《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1册,第94—95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1860年前，传教团的活动基本上只限于北京；1860年后，东正教逐渐传播开来，到19世纪末，在中国的哈尔滨、上海、天津、广州、青岛以及新疆等地建立了东正教堂，但受洗的人并不多，从1902年到1917年十几年的时间里，只有约6000人受洗入教。

虽然俄罗斯在华传教团是沙俄侵略中国的工具，但同时也是当时中俄进行文化交流的桥梁。俄国传教士团在中国各地不仅建立了一些教堂，成立神学院，创办学校，宣传东正教和俄国文化，他们还翻译、撰写了许多俄国东正教的神学著作。比较重要的有：第13、15届驻北京传教团修士大司祭卡法罗夫翻译了《赞美诗》，第14届传教团修士大司祭卡尔波夫翻译了《关于圣号和神父的降福仪式》和《新约》，他还编写了《雅克萨战俘到达北京后的信仰和礼拜史》以及《简明旧约圣史》；第16届传教团修士大司祭弗拉里昂·高连茨基编写了《福音义解》和《正教祈祷仪式讲解》，翻译了《升天指南》一书。另外还有雅金夫·比丘林（Иакиѳ Бичурин）编写的《教理问答》，其他传教士翻译、编写的《六大诫戒》、《圣经》、《东教宗鉴》、《论正教的四大仪式：弥撒、斋戒、忏悔和圣体血礼》，传教团还编写了《正教和他的礼仪程序》以及传教书籍《上帝耶稣基督的生活》等。^①这些宗教书籍影响不大，但却让人们们对东正教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俄国在华的传教士还注意研究中国文化，将中国文化介绍到俄国。第9届传教团修士大司祭在华期间翻译了我国古代典籍《资治通鉴纲目》、《大清一统志》、《四书》等，回国后又撰写了《西藏纪事》、《蒙古札记》、《中国国情与民风》、《中华帝国详志》等介绍中国文化、风俗的专著，成为俄国著名的汉学家；第13、15届传教团修士大司祭卡法罗夫在华期间，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后又和俄国地理学家在我国东北进行地形测量，

^① 参考张绥：《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第242、243页，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

撰写了《从北京经满洲到海兰泡旅行记》和《乌苏里地区历史概要》等，并创办了定期的刊物《汇报》，专门研究中国问题。他还翻译和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作品：《长春真人游记》、《中国伊斯兰教文献》、《汉俄大辞典》等书籍，成为有名的中国通。

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是沙俄派驻中国的间谍机构，但传教士的译书、传教活动客观上使他们成为中俄两国文化在对方国家的传播者，成为早期中俄文化交流的桥梁。

2. 中俄互赠书籍^①

1845年，通过俄国驻华东正教会，中俄两国实现了第一次国家间正式的图书交换。

1844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通过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第12届修士大司祭卡法罗夫向清政府索要藏文的《甘珠尔》和《丹珠尔》经书各一部。经道光皇帝批准，清政府将藏于北京雍和宫的《甘珠尔》和《丹珠尔》经书共800余册赠与俄国。几个月后，为答谢清政府，俄国政府回赠10箱357种800余册俄文图书给中国。

《甘珠尔》和《丹珠尔》是举世闻名的佛教经典——藏文大藏经。据研究，俄国沙皇索要这一套藏文佛教经典是为侵略分裂中国做准备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俄国对英法美等国在中国取得的权益十分忌妒，便把目光投向我国的蒙古和西藏，而佛教在蒙藏两地居民的社会生活中居重要的地位，俄国政府欲借助珍贵的佛教经典笼络蒙藏王公贵族。同时，曾旅居俄国的我国土尔扈特部回国后，仍有一部分留居俄国，这些牧民大多信奉佛教，为笼络他们，俄国也需要这类佛教经典。

中国赠与俄国的佛教经典下落如何？据考察，有一部分散落

^① 参考羽离子：“俄罗斯首次对清政府赠书始末”，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4期。

于民间；一部分藏于列乎图书馆，该馆现有大藏经 4500 余卷，《甘珠尔》经较多，《丹珠尔》经较少，《丹珠尔》经中有北京 1742 年版的，这些书的特点与道光年间中国所赠之书相符。另据估计，还有一部分中国赠与俄国的佛教经典藏于前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总分院布里亚特分院布里亚特社会科学研究所以，该所位于贝加尔湖东侧的乌兰乌德。乌兰乌德旧称上乌丁斯克，是当年俄国使节和商队来华途经的重镇，也曾是俄国历史上西藏学、蒙古学和汉学人才聚集的城市之一。俄国携经书归国的人员有可能利用这里的人才优势，将其中一部分留下来进行翻译和研究。布里亚特社会研究所成为前苏联的佛学和西藏学研究中心，可能与此有关。^①

对于俄国政府回赠的书籍，清政府最初有两种意见。一些人认为，其文字为俄文，无人能识，留之无用，建议退回。一些人认为，这些图书是俄国政府回赠中国之礼，不应退回。最后，这些书都被收下，交由理藩院收藏。

为便于皇帝垂询，直属理藩院的俄罗斯馆据俄国提供的俄文目录译出了中文的书名目录，目录共编至 357 号，一般情况是一种图书一个编号，少数情况是一种图书几个编号，实际图书只有 281 种，共 800 余册。按图书内容性质依其编号划分如下：

- 第 1—7 号 政令类
 - 第 8—10 号 自然观类
 - 第 11—14 号 宗教观类
 - 第 15—47 号 历史类
 - 第 48—88 号 军政、军史类
 - 第 89—137 号 地理、行纪、方志类
 - 第 138—142 号 经济、财政类
- } 天理类

^① 参考黄定天：“关于 19 世纪中叶中俄两国互赠国书问题”，载《北方文物》1994 年第 3 期。

- 第 143—160 号 农林业类
- 第 161—168 号 手工业、工业类
- 第 169—178 号 植物、动物学类
- 第 179—182 号 矿物学类
- 第 183—207 号 医药学类
- 第 208—223 号 数学、测量学类
- 第 224—234 号 天文学、气象学类
- 第 235—251 号 军事类
- 第 252—253 号 音乐类
- 第 254—266 号 文字学类
- 第 267—272 号 语言学类
- 第 273—310 号 文学类
- 第 311—326 号 教育类
- 第 327—328 号 综合类
- 第 329—355 号 图幅类
- 第 356—357 号 天文、地理仪器及说明书

由上可知，这 800 余册图书涉及了俄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中国了解俄国的一个窗口。

在俄国回赠中国的书籍里面，有不少是科技最新成果。第 216 号《贴斐叶楞齐数书》（即《微积分》）是法国数学家柯士著，由俄国科学院副院长、数学家尼布雅柯夫斯基译成俄文，并在 1846 至 1859 年间被他当做在彼得堡大学讲授微积分的教材；第 166 号《淘金新法发明》，是曾参与俄、奥、德、比等国采矿工作的具有丰富经验的工程师乌扎蒂斯所著，1843 年刚在彼得堡出版；第 205 号《眼科》，是德国柏林大学医学教授容根所著，德国眼科医学是当时世界第一流的，该书根据 1836 年的德国初版本翻译，1841 年出版于莫斯科；第 187 号的《医法新编》由俄国著名医学家、药学家、“聂氏止血药”等多项医药学成果的发明者聂留宾所著，1840 年方在俄国出版；第 333 号《天下东西地

理图》，1831年版，2幅，各宽97厘米，高90厘米，彩色，详细而精致；这批图书里面还有一些世界名著，如普希金、果戈理等作家的文集等。

这批图书，不论其版本还是其内容，都是十分珍贵的，尤其是书的内容，正是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所急需的。然而昧于世界大势又无意了解世界的清政府却认识不到它的价值，再加上当时无人能通俄语，理藩院收到这批图书后即将它束之高阁，不仅极少人问津，且不断散失。只是在1858年，沙俄侵略我国东北，向清政府提出割让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领土的无理要求时，咸丰皇帝才急忙调出其中舆地图书41册，存于宫内，以便查看，其余移到方略馆保存，1869年又移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书库。此后直到1879年，同文馆俄文馆再次招生时，已移去同文馆的俄罗斯赠书又发挥一些作用，但也只是作为同文馆内习俄语的师生练习翻译的蓝本。后由同文馆洋文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会同同文馆俄文馆教习班铎根据书籍再次翻译书名，计存682本，并根据西方图书分类方法和编目体系，将这些图书重新分类，编制了目录。他们将剩存图书分为18种：①语法书类，②史传类，③律例书类，④名臣列传类，⑤杂志类，⑥游历书类，⑦农书类，⑧兵法书类，⑨天文算术书类，⑩史书类，⑪地理书类，⑫医学类，⑬天产万物各学类，⑭工艺诸学类，⑮拳刀谱类，⑯训幼书类，⑰幼学书类，⑱图画类。这次图书分类与编目标志着西方的图书分类和编目方法传入中国。

1885年，清朝御史赵尔巽曾建议将这批图书交由同文馆翻译并刻版印行，但却因有人认为这批书已过时而加以反对，终未能译成。从此，这批图书再无人过问。

此后半个世纪，中国历经战争和变乱，这批图书损失惨重，到辛亥革命后仅乘80余册，此后又不断散失，现除民间收藏一些外，仅剩图书20余册藏于北京图书馆，地图集10余种和单幅地图7幅藏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3. 托尔斯泰与中国

在中俄两国文化关系的历史上，列夫·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是一位值得研究的人物。

列夫·托尔斯泰生于1828年，逝于1910年11月20日，是俄国历史上伟大的作家，创作了《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等不朽的名著，被称为“天才的艺术家……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①

在托尔斯泰生活的年代，中国的古典文化已传到欧洲和俄国，从法国兴起的中国文化热也波及到了俄国。托尔斯泰重视中国的历史文化，对中国的文化、历史、哲学做过深刻的研究。他对中国古代思想老子学说怀有浓厚的兴趣，1877年，他开始阅读和研究老子的著作、并准备翻译《道德经》；1893年，他与波波夫合作，根据德文译本翻译了《道德经》，1895年校订了日本人小西民翻译的《道德经》，1910年，又出版了《中国贤人老子语录》，另外他还写了《论老子学说的真髓》等文章，发表自己关于老子学说的见解。他特别欣赏老子学说的“道”和“无为”的思想，主张用“无为”来对待一切事物。

从1884年开始，托尔斯泰又开始阅读孔子的著作、研究孔子的学说，并写成《论孔子的著作》、《论〈大学〉》等文章，他认为研究孔子的著作和学说，可以吸取精神方面的力量，并产生了写文章的欲望，以阐述自己对孔子著作《大学》和《中庸》的理解。后来他又编辑了布朗热编写的《孔子·生平及其学说》。

在研究孔子学说的同时，托尔斯泰又开始研究孟子学说，接着又研究墨子。他对墨子的“兼爱”思想很感兴趣，编辑过布朗热编写的另一本书《中国哲学家墨翟，论兼爱的学说》。

^① 《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列宁选集》第2卷，第370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托尔斯泰在“19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思想和生活上发生了一次‘激变’，他同他所属的俄国贵族地主阶级的传统观念决裂，而想在耶稣基督的教义、东方的古代宗教哲学、特别是在中国的老子和孔子等人的哲学思想中寻找生活的真理，他通过英、法、德等国文学，阅读有关中国的著作达三十二种之多，当1891年10月彼得堡的一位出版家询问他，世界上哪些作家和思想家对他的影响最深时，他回答说中国的孔子和孟子‘很大’，老子则是‘巨大’”。^①

由于对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理解，特别是对中国古典哲学的研究，托尔斯泰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产生了深挚的感情和浓厚的兴趣。他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他们不想占有别人的东西，他们也不好战……因此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人夸耀他善于打仗，那么这个人就是大罪人”。^②托尔斯泰曾这样评价中国：“我认为，在我们的时代，在人类的生活中正发生着伟大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中，中国应该在领导东方民族中发挥伟大的作用”。“我想，中国、波斯、土耳其、印度、俄国，可能的话还有日本（如果它还没有完全落入欧洲文明的腐化罗网之中）等东方民族的使命是给各民族指明那条通往自由的真正道路”。^③托尔斯泰在晚年对中国兴趣更浓，产生了到中国去的想法，1910年4月17日他不无遗憾地对他的秘书说：假如我还年轻的话，那我一定要到中国去。

不仅如此，托尔斯泰还对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不幸遭遇表示深切同情，对包括俄国在内的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残暴行径表示了极大的愤慨。1898年3月19日他在日记中写下了对

① 戈宝权：“谈中俄文字之交”，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第552页。

②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5卷·政论，第7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③ 同②，第521页。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不满和抗议：“俄国人、日本人、英国人、德国人都想占据中国；争吵、外交的斗争——还将会有军事上的争夺……”^①在复辜鸿铭的信中，他也谴责了帝国主义的野蛮行为：“伟大而强有力的中国人民的平静和忍耐只是引起了欧洲民族越来越多的蛮横行为。粗野的、自私的，只过着兽性生活的人总是这样，与中国发生关系的欧洲民族正是如此。”^②

托尔斯泰在晚年想到中国来，没有成行，却成功地与两位中国人通了信，其中一位是中国留俄学生张庆桐。

1899年，江苏人张庆桐被北京同文馆派往彼得堡法政大学学习。1905年底，他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信，并将他与人合译的梁启超的著作《李鸿章，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同时寄上，请托尔斯泰校正，托尔斯泰很快复了信。在信中，托尔斯泰除表示了他没有到过中国，没有与中国人见过面，以前也没有与中国人发生过任何联系的遗憾，还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的崇敬和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他写道：“在我整个长久的一生当中，我曾经有好几次同日本人交往，但从没有一次同一个中国人交往，也没有发生过联系，而这正是我一向非常想望的，因为很久以来，我就相当熟悉中国的宗教学说和哲学（虽然，大概是非常不完全的，这对于一个欧洲人来说是有常有的情形）；更不用说关于孔子、孟子、老子和对他们的著作的注疏（被孟子驳斥了的墨翟的学说，更特别使我为之敬佩。我对于中国人民向来怀有深厚的敬意，在极大的程度上，由于可怕的日俄战争的种种事件变得更强烈了）”。^③

与托尔斯泰通信的另一位中国人是著名学者辜鸿铭。1906

① 转引自陈元恺：《“中俄文字之交”的一页——托尔斯泰与中国》，见富成德、金留春主编：《托尔斯泰作品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5卷·政论，“给一个中国人的信”，第5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③ 周圣、单继达等译：《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6卷·书信，“致张庆桐”，第3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年3月，辜鸿铭通过俄国驻上海领事馆将其用英文写的《尊王篇》和《当今，皇上们，请深思！论俄日战争道义上的原因》两本书转送给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先请他的秘书复了信，并托人将自己在国外出版被禁的著作寄给辜鸿铭，半年后，又亲自复了信，他在信中说：“中国人民的生活过去一直是我极感兴趣的，我也曾尽力去了解我所能了解的中国生活中的东西，尤其是中国的宗教智慧——孔子、孟子、老子的著作及其注疏。我也看过中国的佛经和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书。近来，在欧洲人，其中在很大程度上是俄国人对中国施行了那些暴行之后，中国人民的一般情绪当时和现在都引起我特别强烈的兴趣。”^①托尔斯泰再次表示了他对中国人民的关心和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1908年8月，托尔斯泰80诞辰之际，上海的中外人士聚会表示祝贺，并寄送了中、英、法三种文字的贺词。之后，辜鸿铭又将自己翻译的《大学》、《中庸》两本书送给了托尔斯泰。

在托尔斯泰的晚年，他和他的作品开始被介绍到中国，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和热爱。

最早介绍托尔斯泰的是1900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俄国政俗通考》，书中提到了普希金，也介绍了托尔斯泰，文中说托尔斯泰“以著作自娱，平生得意之书，为《战和纪略》（即《战争与和平》）一编，备载一千八百一十二年间拿破仑伐俄之事。俄人传诵之，纸为之贵”。1904年《福建日日新闻》登载了《托尔斯泰略传及其思想》一文，对托尔斯泰的生平和思想作了详细介绍。之后，托尔斯泰渐为人知，他的作品不断被介绍到中国来。1907年，中国出版了《托氏宗教小说》；1908年，佚名翻译了托尔斯泰的《不测之威》；1913年，马君武翻译了托尔斯泰的著名长篇小说《小狱》（即《复活》），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17

^①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5卷·政论，“给一个中国人的信”，第5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年，陈家麟、陈大镗合译了托尔斯泰的另一著名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译名为《婀娜小史》，由中华书局出版；此外，陈家麟、林纾还翻译了托尔斯泰的众多的中短篇小说，如《人鬼关头》、《两个骠骑兵》等。到五四运动时，我国已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三十余种。

托尔斯泰及其著作传入中国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五四运动期间，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郭沫若等都把托尔斯泰当作战斗的作家，把他的作品当作反对旧道德、旧文化的精神武器。

托尔斯泰还是中国作家的良师益友，中国现当代的许多文学家如鲁迅、茅盾、郁达夫、瞿秋白、巴金等不仅翻译过托尔斯泰的作品，在他们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也都从托尔斯泰的文学著作中吸取艺术营养。

托尔斯泰一生关心中国，研究中国，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哺育了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的文学作品传入中国后，被作为战斗的武器，其文学艺术也哺育了中国作家。

4. 普希金与中国

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是俄国伟大诗人，1799年生于莫斯科。从小非常聪明，酷爱书籍，8岁时已开始用法文写作诗歌。1811年考入当时彼得堡的贵族子弟学校——沙皇村中学，毕业后曾到外交部工作。因写作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从1820年起，他一直处在沙皇的流放、迫害和宪兵的监视之下，直到1837年去世。

普希金短暂的一生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著作，他被尊称为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创建者和新俄罗斯文学的奠基人，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

普希金“是对中国最感到兴趣的人。在他的一生当中，远从他在彼得堡沙皇村的皇村学校读书时起，直到他晚年从事撰写历

史著作为止，他对中国的兴趣是不断地在增长”。^①

早在普希金的童年时代，他就听说过中国。普希金的外曾祖父是彼得大帝时的军事工程师，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并被派去测量中国的万里长城。普希金经常听他的母亲讲起这位外曾祖父的故事，也经常听他母亲提起“中国”这个国家。

普希金生活的时代正是俄国尊崇中国文化的时代。当时中国古代文化艺术不仅通过来华的俄国传教士和外交人员传到俄国，在欧洲特别是法国的宫廷和贵族社会中出现的中国热也传到了俄国。不仅通过欧洲传人俄国的中国戏剧《赵氏孤儿》在俄国宫廷和贵族社会中流传，在彼得堡还出现了许多中国式的建筑。1762至1768年间，在彼得堡近郊的奥朗宁邦（现名罗蒙诺索夫城）兴建了中国宫；1740至1750年间，在沙皇村为叶卡特琳娜女皇修建的夏宫中有中国客厅；1775至1779年间，俄国建筑师涅耶洛夫（И. В. Неепов）在夏宫修建了中国剧院、中国式的桥梁和楼台亭阁等；1784至1788年间，夏宫中又修建了中国村。沙皇村的这些中国式建筑是普希金在沙皇村中学读书时非常熟悉的。

这一时期，俄国宫廷和贵族社会中对中国的狂热影响了普希金。普希金在他现存最早的一首诗、中学时代写给农奴女演员的《献给娜塔利亚》（1813）一诗中写出了他心目中的中国人的形象：

——娜塔利亚呀！
请你再倾听我讲，
我不是东方后宫的统治者，
我不是阿拉伯人，也不是土耳其人。
请也不要把我当作

^① 戈宝权：“谈中俄文字之交”，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第55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是一个有礼貌的中国人，
或是一个粗鲁的美国人，
……^①

在普希金的眼里中国人是有礼貌的。

在普希金的第一部以民间故事为素材的叙事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中描写了迷人的中国风光：

在迷人的田野里，
五月的轻风吹来了凉爽，
在飘动的树丛的阴影里，
中国的夜莺在歌唱。^②

这两首诗反映了普希金读书时所熟悉的沙皇村的中国式建筑和园林给他留下的美好回忆。

中学毕业后，普希金到外交部工作，接触了一些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并写了一些革命诗歌。1820年，他因写作《自由颂》和《致恰可达耶夫》等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而遭流放。在流放期间，普希金也没有放弃对中国的兴趣。1825年4月，他突然写信让他弟弟订购全套的《西伯利亚通报》（1825年后改名《亚洲通报》），在这个杂志上发表过俄国最早的使臣伊凡·彼特林和尼古拉·斯帕法利（Николай Сдафарний）等人写的有关中国的著作，从1825年开始，该杂志又以相当多的篇幅介绍中国的情形。

1826年，普希金获得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赦免，并迁居到莫斯科，但仍然受到沙皇的监视和控制。1828年，普希金结识了俄国著名的中国学专家雅金夫·比丘林。

① 转引自戈宝权：“普希金和中国”，载于《文学评论》，1959年第4期。

② 同①。

比丘林在1805年曾任第9届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团修士大司祭，1808年到达北京，在中国居住达14年，专心研习汉语，从事译著，回国后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著作，并经常为一些杂志撰稿，成为俄国著名的汉学家。

在普希金和比丘林相识之后，比丘林曾把自己翻译的俄汉对照的《三字经》和《西藏现状概述》两本书亲笔题名后送给普希金，并常到普希金家里做客。另外，普希金还读过比丘林写的《北京概述》、《西藏和青海史》等书，这使普希金获得了更多有关中国的知识。

随着普希金对中国知识和兴趣的增长，1829年，他产生了访问中国的愿望。1829年12月，在致友人的一首诗中，他表达了这种愿望：

我们走吧，无论上哪儿我都愿意，
朋友们，随便你们想要去什么地方，
为了远离骄傲的人儿，我都愿意奉陪。
不管是到遥远的中国的长城边上，
也不管是去人声鼎沸的巴黎市街。
……^①

1830年1月7日，普希金致信当时朝廷的宪兵长官要求到法国或意大利去旅行，如果得不到同意，就要求随同派往中国的使节访问中国，沙皇当局没有批准他的请求。

尽管普希金未能访问中国，他却一直在研究中国。在他撰写《普加乔夫史》和为彼得大帝编写历史的过程中，他在探讨卡尔梅克人逃亡事件时，研究了不少有关中国的资料。

普希金幼时听过关于中国的故事，青年时接触“法国式”中

^① 《普希金抒情诗选》(下)，第2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国，一生读过不少有关中国的书籍，写过有关中国的诗歌，后来还曾希望访问中国，他对中国的知识和兴趣是不断增长的。

普希金是一个渴望自由的诗人，并不是革命家，但他的作品翻译到中国后，却和中国人民的革命联系在一起。

1903年，戢翼翠从日文翻译了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当时译作《俄国情史，斯密士玛利传》，又名《花心蝶梦录》。

1907年，鲁迅在《河南》月刊上发表了《摩罗诗力说》，介绍了普希金的生平和作品。但这一时期，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并未引起中国读者太多的注意。

1919年五四运动后，包括普希金在内的俄国作家的作品被大量译介过来。1920年，北京中国杂志社出版了《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第一集》，其中收有普希金的《驿站监察史》和《雪煤》（即《暴风雪》）两个短篇；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安寿颐据俄文翻译的《甲必丹之女》（今译作《上尉的女儿》）单行本；1924年，亚东书局又出版了赵诚之翻译的《普希金小说集》。此后，普希金的作品被陆续介绍到中国来。

第八章 中日文化交流

一、中日文化交流与学习西方

1. 《海国图志》对日本的启蒙

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同时受到西方列强的武力冲击。首先是中国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遭到惨败，被迫打开国门。清朝统治者从“万邦来朝”的梦幻中惊醒。受到鸦片战争的刺激，地主阶级中的开明知识分子开始思考对抗西方的办法。他们认识到：要抵御西方列强，必须了解世界形势，加强武装。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出现了第一批介绍和研究世界历史、地理及现状的著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魏源在1842年成书的《海国图志》。这部书后来东传日本，对明治维新前的日本知识分子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魏源是一位处于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型时期的思想家，他曾协助林则徐抵抗英军。《海国图志》是在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基础上编辑的。《四洲志》是根据英人慕雷（Murray）著的《地理全书》编译的，主要概述各国史地政治情况。林则徐被革职后，将此书和有关外国资料交给魏源，托他继续编辑。

魏源以《四洲志》为基础，广泛搜集中外有关著述，按区分国，增补整理，于1842年12月编成《海国图志》五十卷。全书共计57万字，另有地图23幅，洋炮图式8页。以后，魏源又陆续加以修订增补，1847年补充为60卷，1852年又增加到100卷。

百卷本全书约 88 万字，并有各种地图 75 幅，西洋船炮器艺图式 42 页。其内容包括了五大洲几十个国家的历史地理，还有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教训、论述海防战略战术的“筹海篇”四卷，以及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论述十多卷。这是当时一部内容最丰富的有关世界知识和海防的百科全书。

由于鸦片战争的冲击，日本朝野上下感到迫切需要了解世界形势，以避免重蹈清朝惨败的覆辙。当时日本人掌握的国际知识是有限的，翻译西文著作又比较困难。于是，一批中国人编著的关于世界史地的汉文著作传到日本后，便成了日本人了解世界的重要启蒙读物。特别是魏源的《海国图志》一书，在日本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海国图志》最初传入日本是在 1851 年，因为书中有“幕府禁止之文句”，所以全被收藏于幕府，没有流传到民间。1854 年 9 月，又有 15 部《海国图志》传入日本，7 部为幕府专用，剩下 8 部被拍卖。此书传到日本后，深受有识之士的重视和欢迎，被誉为“天下武夫必读之书”。日本很快出现多种《海国图志》的翻刻本（按原文翻印）和适应普通民众阅读需要的日文译本。日本幕末的一代知识分子都深受此书影响。

首先，《海国图志》使日本人扩大了视野，加深了对世界的认识。德川幕府采取锁国的政策，自 1639 年后，除荷兰外，其他欧洲国家全部被禁止通商贸易。即使荷兰人，也只允许留在长崎出岛上从事贸易活动。在德川幕府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只有少数学者和高级官员通过荷兰商人了解到一些西方世界的历史、地理知识。魏源的《海国图志》，对西方各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天文、宗教、科学技术等等均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因而从各个领域帮助日本人扩大了视野，加深了对世界的认识。日本学者尾佐竹猛说：“幕末时期，海外知识多由

译自横行文之汉字书传入日本，其于新文化之介绍，贡献殊大。”^① 杉本达在《海国图志·美理哥总记和解跋》中高度评价道：“本书译于幕末海警告急之时，最为有用之举。其于世界地理茫无所知的幕末人士，此功实不可没也。”^② 美国是迫使日本最先订约通商的国家，因此日本对美国的兴趣特别浓厚。一年之间，《海国图志》中关于美国部分的译本竟达十多种。可以说，《海国图志》在帮助日本人了解世界形势方面，丝毫不逊色于荷兰人多年来传播的西方文化科学知识。

其次，《海国图志》启发日本人加强海防，抵抗侵略。19世纪中叶，日本和中国一样，也面临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机。自1854年起和美、英、荷、俄等国签订第一批通商条约以后，1858年，美国又迫使日本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日本丧失了关税自主权、承认了领事裁判权。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加强海防，抵抗侵略成为最紧迫的问题。《海国图志》总结了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不少加强海防、抵御外敌的建议，对当时的日本人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1855年，日本学者赖醇在《海国图志训译》序中说：清魏默深（即魏源）海国图志六十卷，纂述赅博，择取而用之，其于海卫边备，必有裨益者矣！”他期望全部译出，迅速刊印，“使海内尽得观之，庶乎其为我边备之一助矣！”^③ 日本学者小野元济在译完《海国图志》的英吉利部分后，去拜访自己的老师横山湖山，却遭到斥责。横山批评他违反讲经读史之道，追求新奇。然而，当横山湖山认真阅读了小野的译稿，特别是读到魏源对英国侵略者的分析与所提出的海疆防御之策以后，十分佩服，立刻改变原来的看法，还欣然为小野元

① 转引自萧致治：“魏源的《海国图志》及其对日本的影响”，《中日关系史论丛》第一辑，第94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 转引自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第33页，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

③ 同①，第96页。

济译的《英吉利广序》写了序言。

第三,《海国图志》给幕末维新志士以启迪,从而推动了明治维新。《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前,日本的开国论者和坚持锁国者两派正在进行激烈的争论。《海国图志》传入后,著名的有识之士包括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横井小楠、桥本左内等都争读这本书。开国论者读了这本书,进一步提高了认识,增强了信念。攘夷论者读了这本书,不少人受到启发,思想上向开国论转变。比如横井小楠,原是个攘夷主义者,读了《海国图志》后,思想发生转变,倾向于开国论。他认为美国的华盛顿,可以与中国的尧舜比美。横井小楠成为与佐久间象山齐名的洋学者。洋学者在民族危机的强烈刺激下,受到《海国图志》的启发,并从中国鸦片战争失败中吸取教训,认识到锁国政策不能挽救危亡,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变法维新,抵制西方侵略,有力地推动了倒幕维新运动的开展。

2. 罗森的《日本游记》

1840年以后,第一个正式访日并进行中日文化交流活动的中国人,是1854年随美国培理舰队赴日的广东文人罗森,他的《日本游记》是近代中国人写的第一部日本游记。

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海军准将培理(M. C. Perry)率领4艘美国军舰组成的远征舰队,驶进了日本德川幕府所在地江户(现东京)附近的江户湾浦贺港。培理带来了美国总统要求日本开港通商的国书。德川幕府被迫接受了美国的国书。1854年2月,培理率领的美国舰队再次出现在江户湾,幕府只得派出4名全权代表,从3月8日起在横滨与培理谈判。

在谈判中,日本人发现从“黑船”上下来的美方人员中还夹有一个中国人。当时日本画师曾为美方代表一一画像,其中也有这位中国人的肖像。《大日本古文书》所收幕末津山藩著名画工锹形赤子所画《米利加入应接之图》中,就有一个圆脸,拖着长

辫，戴着瓜皮帽，矮矮胖胖的中国人，旁边写着“清朝人罗森”。

罗森，字向乔，广东海南人。他在香港曾与英美传教士有来往，会说一点英语，应友人美国传教士卫澂之邀，担任培理舰队的汉文翻译。卫澂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1853年他在担任培理舰队首航日本的翻译官期间，感到与日本人打交道、订协议都离不开汉文。因此1854年培理舰队再次从香港出发去日本前，便邀请自己的朋友罗森充任舰队的汉文翻译。罗森觉得这是一个开阔眼界、施展抱负的机会，欣然同意。这样，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经历了《日美和亲条约》（又称《神奈川条约》）的谈判和正式签订过程。

罗森在日本期间广交日本各界人士，除了负责接待日本官员外，还与许多日本文人、学者、僧人接触。不少日本人士也主动与罗森交往、笔谈，并向他打听中国的情况，表达邂逅相遇，“景仰中国文物之邦之意。”^①他发现日本人士酷爱中国文学诗词，很多人与他唱和汉诗，互赠书画，更多人请他题字、写扇面。据罗森《日本游记》所载，在横滨，“一月之间，从其所请，不下五百余柄”，而在下田，“一月之间，所写其扇不下千余柄矣”。^②这恐怕是近代中日之间最早的书法交流了。

许多日本官员、文人竞相与罗森唱和或互赠诗篇，这是处于同一文化圈的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特色。如一位日本官员向罗森赠诗曰：

君产广东我沽津，相逢萍水亦天缘。

火船直擘惊涛至，看破五湖无限边。

罗森也曾为黑川嘉兵卫等赋诗一首并写于扇面：

^① 转引自王晓秋、大庭修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历史卷》，第25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② 同^①。

避乱夷船亦一奇，吴中鼙鼓不闻知。
翻将万里东来色，快睹芙蓉绝世姿。

罗森回到香港后，就把自己在赴日期间所写的《日本游记》交给香港中文月刊《遐迩贯珍》（英文名 Chinese Serial），在 1854 年 11 月号、12 月号和 1855 年 1 月号上，分 3 期连载。

罗森在《日本游记》中，用非常生动的文笔，描述了琉球（今冲绳）、横滨、下田、箱馆（今北海道函馆）等地的风土人情。对当时的日本社会和人民亦颇有好感和溢美之词，这与培理等美国官员在《日本远征记》等书中对日本人的轻视、责难态度大为不同。罗森在《日本游记》中赞扬当时日本的社会治安：“夫一方斯有一方之善政，日本虽国小于中华，然而抢掠暴劫之风，亦未尝见。彼其屋门虽以纸糊，亦无有鼠窃狗偷之弊。此见致治之略，各有其能矣。”对于日本的取士制度，罗森也表赞赏，认为中国仅以八股文章取士，而日本则“文、武、艺、身、言皆取”。他看到日本“所谓读书而称士者，皆佩双剑”，不由赞叹：“殆尚文而兼尚武欤！”

在横滨，罗森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日本的相扑表演，见到日本的大力士们，一人竟能一次搬运两三包 200 余斤重的大米包，不禁赞不绝口：“足见日本之多勇力人也！”在下田，他还看到一位日本侍童名叫桂正敏，“年纪虽小，身佩双剑，志气昂昂，善于应答。复能于公堂之上，描绘亚国各官之像，聪明俊秀，人多悦之”。

在《日本游记》中，罗森描绘了日本各地的山川风景，街道寺庙，物产货币和风土人情。如写北海道箱馆：“其港垣局宽旷、海阔山朝。时当五月，尚有白雪于山巅。房屋较下田而壮丽，衣冠人物似富盛于下田。妇女羞见外方人，深闺屋内，而不出头露而。风俗尚正，人民鲜说淫辞。”

作为美国培理舰队的汉文翻译，罗森亲身参与了美日谈判、

签约的活动，因此在他的《日本游记》中也反映了日本历史上这一重大事件的一些史实。例如罗森记录了订约以后，培理将军在美舰上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日本官员的场面，舰上奏乐歌舞，“日暮方终”。

《神奈川条约》签订之后，美国方面把带来的一批近代化器械赠予日本政府，并在横滨郊外举行公开展览。这些西方机械不仅吸引了大量日本观众，也引起了罗森的极大兴趣。他在《日本游记》中以赞美的语气一一加以介绍。如“火轮车（即火车）旋转极快，人多称奇”；“电理机（即电报机）以铜线通于远处，能以此之音信成像，毋庸笔描，历久不变”；“浮浪艇”（汽艇），内有风箱，或风坏船，即以此能浮生保命”；“耕农具（农业机械）是亚国奇巧耕具，未劳而获者”。罗森对这些欧美新发明的近代化器械的描述，恐怕是中国人对它们的最早记载之一。

《日本游记》记录了罗森在访日期间进行的各种中日文化交流活动，如与日本各界人士的交往、笔谈、题字、赠诗以及介绍中国太平天国的真相等。此外还收录了罗森与日本友人唱和的诗篇。凡此种种，都是研究近代初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宝贵资料。

罗森以前虽也有一些中国人到过日本，其中大部分是商人、船员，偶然也有少数文人、和尚等，却很少有人写出游记。清初以来，只有乾隆年间多次随商船赴日的画家汪鹏写的《袖海编》，可算是一篇日本游记。但汪鹏的活动被限制于长崎中国商馆，因此观察见闻很有限。而罗森则周游了日本的横滨、下田、箱馆等地，并接触了许多日本官员、文人、百姓，再加上他到日本之时，正处在日本开国的历史转折关头，因此，他的《日本游记》无论从观察日本的广度、深度以及文学、史学价值来说，都是《袖海编》所不能比拟的。罗森的《日本游记》可以算是中国第一部有价值的日本游记。

3. 太平天国与明治维新

1851年，中国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这场巨大的革命风暴不仅震撼了中华大地，而且卷起了东海的波涛，在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也激起了强烈的反响。

太平天国运动之时，日本正处于明治维新的前夕。清代的中日贸易被严格限制在长崎一地进行。鸦片战争后，开往长崎的中国商船大大减少。因此，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日本人要了解有关中国事态变化的具体情况是比较困难的。

1854年7月以前，幕府和各藩无论是通过中国商人还是从朝鲜、琉球（今日本冲绳县）以及西方船上得到的情报，大多是反映起义军发展进程的。多数情报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明代后裔的“复明运动”，几乎没有提到过洪秀全和拜上帝会；还有的日本人认为太平军就是上海的“小刀会”。随着太平军攻克南京和进行北伐、西征，不少日本人预料太平军将获胜利，清朝已如“车前之灯”，清帝甚至可能“蒙尘朝鲜”。罗森在日本期间曾与不少日本人接触，通过笔谈等形式向他们介绍了太平天国的情况，纠正了一些关于太平天国的误传，比如指出洪秀全是太平王而不是小刀会，清帝并未逃往朝鲜等。

由于太平军胜利进军江南，中国商船赴日航行曾一度停顿，直到1854年7月才有中国船“丰利”号和“源丰”号到长崎。这两艘船提供的情报说：太平天国“系广西、广东无赖贼党无端乌合，唤洪秀全、杨秀清两名为谋主。若辈俱留发，以红布裹头，故官兵叫做红巾贼，又叫长发贼”。还报告说：“今虽各处贼匪未能剿灭，幸自入春以来，打仗略有胜仗，贼势稍减。”^① 这些报告虽然是站在清政府的立场上攻击太平军，却也反映了洪、杨是首领，太平军北伐受挫等事实。

幕末时代的日本人尤其是日本下层民众对太平天国的认识，

^① 转引自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第53页，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

大多反映在民间以太平天国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之中。仅仅在太平天国起义后几年之内，日本就出现了好几种描写太平军的小说，反映出广大日本民众对太平天国的极大关注。这些小说采取民间流行的写战争主题的“军谈”体裁，有的卷首印有地图和主人公的画像，类似中国的绣像小说。这些小说多数以朱氏后裔复明为主题，并寄予希望和同情，反映了日本民众对幕府腐败无能的不满，支持除暴安民，期望天皇重新掌权的心情。这些小说通过虚构杜撰的各种生动有趣的情节，有的直截了当，有的隐晦曲折地站到了太平天国运动的一边。

这里还应提到日本武士阶层特别是幕末维新志士对太平天国的看法。1854年7月以后，随着中国官方消息、书刊的传入，日本的舆论从总体上逐渐转向对清政府有利的一面。由于正统的忠孝思想和害怕人民革命的心理，幕末维新志士如吉田松阴、高杉晋作等都对太平天国非常反感，并断言其必然失败。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这主要表现为太平天国对日本政治思想界的影响。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消息通过各种途径传到日本，在日本社会各阶层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幕末维新志士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结合日本社会的现实，分析并吸取了中国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得出了日本必须加紧实行变革维新的结论。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增加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危机感。他们担心中国的“内乱”会波及日本，转化成本国的“外祸”和“内乱”。1862年，德川幕府为了打开中日贸易，派出“千岁丸”航行中国上海港，各藩派了一些藩士参加。这是锁国以来，日本第一次派遣官方的船只来中国。“千岁丸”上的藩士们在上海亲眼看到了西方侵略者横行霸道的现状和基督教势力在中国的扩张，又听说太平天国也信奉基督教，因此认为：“清国的衰世是由于基督教的流行，而基督教的流行则是由于开港，

应该引为殷鉴。”^①他们叹惜清政府“外有洋夷猖獗，内有贼匪煽乱”的可悲处境，感到“近在一水之外，真是十分令人担忧的”。^②他们得出外患引起内乱，而内乱加深外患的结论，对于处在西方侵略势力冲击下的日本也可能发生大规模人民革命的前景感到非常不安和恐惧。为防止外患和内乱相互结合，维新志士吉田松阴认为：当前必须以“厚民生、正民心、养民生为最大急务”。^③

幕末维新志士通过总结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历史教训，认为中国对外战争失败和发生农民革命，主要是由于清政府政治腐败、实行暴政的缘故，日本必须实行维新变革，振兴内政。“千岁丸”的乘员纳富介次郎说：“现在清朝的衰弱是因暴政所致，如果一旦改为仁政，施于四海，就能调动兵革，扫平贼匪，易如反掌。”^④基于这种认识，他们认为日本为了防御西方侵略和避免发生像太平天国那样全国规模的“内乱”，只有尽快地自上而下进行改革，废除幕府弊政，实行维新，才能控制住人民并加强抵御外敌的力量。这种认识推动了明治维新的发展。著名的维新志士高杉晋作于1862年随“千岁丸”到过上海，看到了西方列强在中国为所欲为的现实，也亲身感受到太平军的威力，这对于他的思想从尊王攘夷发展到倒幕维新，起了促进作用。与高杉晋作同到上海的学者峰源藏，亲眼目睹清政府依赖英、法两国军队把守上海城门，十分感慨，认识到日本必须改革才能避免重蹈清朝的覆辙。

太平天国革命震动了日本，同时也为明治维新创造了好的国际条件。这主要表现在太平天国革命牵制了西方列强的力量，减

① 转引自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第64页。

② 同①。

③ 吉田松阴：《吉田松阴全集》第2卷，第209页。

④ 同①，第65页。

轻了对日本的压力，有利于日本通过维新改革摆脱民族危机，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19世纪中叶，日本正处于同中国一样将要沦为半殖民地的严重关头。地大物博的中国是西方列强在远东侵略的主要目标，他们宁可暂时收缩别处的力量也不能丢掉中国。尤其太平军在长江流域的胜利发展以及向上海的进军有力地牵制了西方列强，迫使他们不得不暂时放松对日本的侵略，并改变对日政策。其中英国就转而采取支持维新派的政策。当时远东的形势和列强的态度，使日本在进行倒幕维新的过程中减少了外部干涉的压力，获得了通过改革摆脱民族危机的好时机。

4.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

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大大加深了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和认识，是近代中国人研究日本的集大成的代表作。

黄遵宪，字公度，广东省嘉应州（今梅州）人，1848年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早在青年时代，黄遵宪就非常关心时务，思考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到过广州、香港、烟台、天津等地，见识很广，眼界开阔。1876年，黄遵宪中了举人。恰好同一年，他的同乡翰林院侍讲何如璋被任命为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知道黄遵宪善谈时务，便竭力邀他同行。黄遵宪毅然抛弃了科举仕途，于1877年11月随何如璋来到日本，出任驻日使馆参赞。

黄遵宪作为一个友好的使者，与很多日本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写了大量反映日本政治、文化、风俗、景色等方面的诗歌，并和日本诗人唱和相赠，这些诗主要收在他的《日本杂事诗》和《入境庐诗草》第三卷中。

黄遵宪刚到日本，便开始进行比较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并准备撰写一部日本通志。他认为这是一个外交官的责任，也是加强中日友好和开展对日外交的需要。同时，他对当时中国的日本

研究状况很不满意，认为中日两国“只一衣带水，便隔十重雾”，^①决心提供日本真实详细的情况，以改变中国人对日本的模糊认识。他认为中国的士大夫大多未到过日本，又无充分的史书记载可凭藉，对日本不了解也不足为怪。自己身为驻日参赞，承担这个任务是责无旁贷的。黄遵宪到日本已是明治维新9年之后，他编写以介绍制度为主的《日本国志》，大力宣传日本的明治维新，其重要目的是为“质之当世士夫之留心时务者”，^②以推动中国的变法自强。

《日本国志》的写作，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黄遵宪到日本的第二年，即1878年就开始收集资料，1879年正式起草。编写中遇到了资料、翻译、校刊等重重困难，但他用顽强的毅力和辛勤的劳动克服了这些困难。1882年，他经过几年努力刚完成初稿，却又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1885年黄遵宪从美国请假回国，在故乡嘉应州又闭门埋头著述了两年，终于在1887年夏季完成了此书。他把书稿抄写了四份，除自存一份外，其余分送总理衙门和李鸿章、张之洞。1890年书稿付刊于广州富文斋，直到1895年，《日本国志》才刻成正式出版。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是一部40卷50万字的巨著，内容十分丰富。它包括卷首的年表和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等12种志。全书从各个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明治维新后所实行的各项制度。同时也从各方面阐述了应效法日本，学习西方，在中国实行变法维新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黄遵宪摒弃了以往中国文人写史书时那种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妄自尊大的态度，采取实事求是、尊重日本民族、两国平等相待的态度来写作。他还重视实地调查研究和收

① 黄遵宪：“近世爱国志士歌”，《入境庐诗草》卷3。

② 黄遵宪：《日本国志·自序》。

集第一手原始材料，在书中大量引用了日本政府各机关、各地方发布的各种公报、法令和统计数字。他在书中不仅详细叙述日本的历史和现实，而且常常联系中国的实际加以对比、分析和评论，发表自己的见解而给读者以启示。黄遵宪在《日本国志》邻交志和学术志中，追溯和叙述了中日关系和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和现状，认为“艺术以相摩而善，武备以相竞而强，物产以有无相通，得以尽地利而夺人巧”，^①大力提倡各国之间的交流。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不愧是近代中国研究日本的集大成之作，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被当时的有识之士奉为瑰宝。它大大加深了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和认识。狄葆贤认为：“由是诵说之士，抵掌而道域外之观，不致如堕五里雾中，厥功洵伟矣哉！”^②这部书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成为中国人了解日本的必读之书，并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日本研究，常为各种著作所引用。

《日本国志》还是中国近代维新改革思想的重要著作之一。它鼓吹学习西方、效法日本，成为中国戊戌维新运动的一部启蒙读物。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深受其影响。康有为关于变法措施的奏议，有的就是参考《日本国志》甚至直接从其原文抄录过来的。梁启超还亲自为《日本国志》写后序，指出“其志深，其旨远”。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时也命令大臣立刻进呈《日本国志》，以备参考。1901年，新加坡林文庆博士在一篇文章中曾把它称做是“关于日本的维新运动历史的经典性文献”，就像伏尔泰的史论对于法国一样，为维新党人“开启道路”。^③

① 黄遵宪：《日本国志·邻交志》。

② 转引自王晓秋、大庭修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历史卷》，第27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③ 吴天任：《黄公度先生传稿》，第371页，香港中文大学1972年。

二、留学日本与清末新学大潮

1. 留日洪流

派遣留学生是各国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在隋唐乃至宋元明时期，曾有一批批日本学生和僧侣，不畏艰难险阻，来中国学习。他们带回中国先进的文化，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进步，也向中国输入了日本文化。他们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到了近代，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中日之间的文化关系发生了逆转，中国从留学生的接受国变成了派出国。

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即1896年，驻日公使裕庚出于使馆工作的需要，从国内选拔了唐宝锷、戢翼翠、朱光忠等13名学生赴日本留学。这是清政府派遣的第一批赴日留学生，他们所走路线的方向正好和1000多年前遣唐使所走的路线相反。裕庚通过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委托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负责培养。嘉纳治五郎特地在东京神田租了一所房子作为这批中国留学生的校舍兼宿舍，并派教师为他们讲授日语。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清政府下令各省督抚选派学生赴日留学。在地方上首先是湖广总督张之洞派遣官费留日学生20多人赴日本学习陆军。接着北洋大臣、南洋大臣等也纷纷派出留日学生。至1899年，中国留日学生已有100多人，其中在成城学校学习军事的最多。

20世纪初，出现了大批中国学生赴日本留学的热潮。当时一位日本学者青柳笃美曾生动地描述了这股留日洪流的盛况：“学子互相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每遇赴日便船，必制先机搭船，船船满座……总之分秒必争，务求早日抵达

东京，此乃热衷留学之实情也。”^① 在前往日本留学的中国人中多数是青年学生，也有在职官员、贵族子弟，甚至还有缠足的妇女和白发老翁。他们来自中国各地，既有沿海省市，也有偏僻的内地。这构成了一幅中国历史上盛极一时的“留日热”奇观。

清末的中国出现这样一股声势浩大的留日洪流，最根本的原因是处在严重民族危机下的中国知识分子，要求向日本学习，以挽救民族危亡。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中国知识分子如梦方醒，他们看到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是非常有成效的，因此纷纷主张以效法日本作为中国学习西方的一条捷径。统治阶级中的开明人物也有类似的主张，张之洞认为日本富强的原因和赴日留学的好处是：“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②

亲自到日本留学，直接了解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并吸收经过日本引进消化了的西方文化，自然成了许多中国爱国青年的向往之路。中国留日学生自己编的《留学生鉴》中阐明了他们留日的动机：“吾人不远千里，乘长风，破巨浪，离家去国，易苦以甘，津津然来留学于日本者，果何为也哉？留学者数千人，问其志，莫不曰：‘朝政之不振也，学问之不修也，社会之腐败也，土地之日狭也，强邻之日薄也，吾之所大惧也。吾宁牺牲目前之

①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37页，三联书店1983年版。

②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第116、11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逸乐，兢兢业业，以求将来永远无暨之幸福。”^① 这样的肺腑之言体现出赴日留学生强烈的危机感和责任感。

1898年戊戌维新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被迫亡命日本。20世纪初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在发动武装起义遭到失败后，多次去日本避难。当时的日本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在国外进行活动和宣传的主要基地，同时也成为20世纪初中国各种新思潮流派的发源地。

清政府提倡、鼓励赴日留学的政策，对留日热潮的形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湖广总督张之洞大力倡导留学日本，他的《劝学篇》被有的日本学者称为“留学日本的宣言书”。^② 20世纪初，清政府为了维护统治而实行“新政”，其中心是仿效西方和日本，练新军、改官制、兴学堂。为了培养新政人才，便大力提倡留学日本。1903年，清政府正式颁发了由张之洞拟定的《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留日学生如果能在日本的中学堂、大学堂毕业，并得有优秀文凭者，分别授以拔贡、举人、进士出身，这给向往做官的青年学子在科举之外开辟了一条新路径。1904年又制定《考验出洋毕业生章程》，次年举行了第一次留学毕业生考试，应试的唐宝锷、曹汝霖等14名留日学生，通过考试，全部给予举人、进士出身并授予官职。

1905年，清政府正式停止科举考试，更加促使不少知识分子以出国留学为重要出路，竞相东渡。清政府由于国库空虚，完全由官费派遣留学生有困难，于是大力鼓励自费留学。1903年，清政府下令自费留学生只要家长报名，通过省学务处考试，就可以领取咨文出国。后来又补充规定自费生能考入日本大学者也可转为官费培养，还鼓励在职官员与贵族子弟出国留学。这种官费、自费留学并举的办法，也推动了留日热潮的发展。

^① 《留学生鉴》，第13页，东京启智书社。

^②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3页。

日本政府主动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和日本朝野欢迎中国留学生的态度，也是出现留日热潮的一个重要原因。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日本政府把俄国作为争夺远东霸权的主要对手，而对中国采取“保全清国”的政策。其中的手段之一就是劝说中国派学生去日本留学，这样既可以密切中日关系，又可以增加日本的外汇收入，更重要的是可以在中国培养亲日派。早在1898年，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就致函清政府总理衙门，表示欢迎中国留学生赴日本学习。日本朝野人士甚至亲自来华游说中国当权人物派遣学生留日。其中日本东亚同文会曾派长冈护美游说南北各省。参谋本部的福岛安正和宇都宫太郎，走访了张之洞、刘坤一、岑春煊和袁世凯，力劝他们派遣留学生到日本学习陆军。当时日本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界十分重视接受中国留学生的的工作，特别为接纳中国留学生开设了一批学校，如1898年创设的日华学堂、成城学校清国留学生部、1902年创设的弘文学院（后改名为宏文学院）、同文书院，1903年开设的振武学校、东斌学堂，1904年成立的经纬学堂，1905年创设的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

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人数激增。1902年，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的统计为573人。1904年的留日人数，根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的统计是2406人。1905年至1906年，中国人留学日本达到最高峰。由于科举制度废除及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等因素，留日学生人数猛增到8000多人。^①有的资料 and 文章上甚至认为1906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已有一二万人之多。实际上，由于中国留学生流动性非常大，有的一人兼报几个学校，因此很难得到精确的统计。

1906年留日热潮达到高峰，以后出现下降趋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日本政府颁布了《取缔留学生规则》，对中国留学

^① 转引自王晓秋、大庭修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历史卷》，第321页。

生加以各种限制和歧视的措施，引起了留日学生的愤慨，不少人愤然回国，国内不少学生因此取消了留日计划。1906年清政府又颁布留学规定，限制留学生的资格，规定必须具有中学以上学历学过日语才允许留学，而且停止派遣速成科学生。同时国内兴办了许多新式学堂，因此一般普通教育不必出国留学。另外，日本教育经费削减而欧美各国特别是美国却开始积极招收中国留学生。因此，1908年至1909年留日学生降到五千多人。

清末的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进行了大量文化交流活动，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经过日本消化和改造的“西学”。留日学生的专业非常广泛，从政治、文史、外语、师范、军事到理工、农医以至音乐、美术、体育，应有尽有，而且以学文科的占多数，其中又以学习政法和陆军为最多。这不仅反映留日学生的兴趣广泛、思想活跃，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当时的时代潮流，中国的有志青年渴求学习外国社会政治和文化教育制度，以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中国留日学生通过创办报纸杂志、编译出版书籍等方式，把来自西方和日本的资产阶级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向国内广泛传播，掀起了新学的大潮。

在留日学生中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教育家。政治家如国民党元老居正、宋教仁、张继、廖仲恺、胡汉民，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曾在法政大学速成科学习）。清末大批的资产阶级革命志士曾留学日本，如革命派领袖黄兴，女革命家秋瑾，还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林觉民、方声洞、俞培伦等。民国时期爱国将领蔡锷也曾留学日本。文学家如鲁迅、郭沫若（毕业于九州帝国大学）等。清末留日学生中涌现出的重要人物不胜枚举，他们对近现代中国的革命运动和新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2. 留日学生之前的日书中译

近代日书中译，始于甲午战争前后。1896年留学生监督孙

家鼐提出《官书局奏开办章程》，官书局事务包括筹设下列设施：1. 图书馆；2. 出版社；3. 博物馆；4. 学校。关于出版社，该《章程》说：“拟设刊书处，译刻各国书籍，举凡律例、公法、商务、农务、制造、测算之学，及武备、工程诸事，凡有益于国计民生与交涉事件者，皆译成中国文字，广为流布。”^① 甲午战争之后，清朝统治阶级已经进一步认识到翻译的重要性，派遣留学生的目的之一就是培养翻译人才。

1896年7月，梁启超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新式杂志《时务报》。从编例上看，该杂志分为论说、上谕、奏折、资料、外国报章杂志翻译及文艺各种专栏。由于缺乏翻译人才，外国报章杂志翻译专栏中日文部分是由日本人古城贞吉负责的。1897年，梁启超起草了《大同译书局叙例》。他认为变法之先，须有介绍新法的书籍问世。如果先学习西方语文然后从事翻译，便不能应当务之急。京师同文馆、天津水师学堂、上海制造局之类的机构，在几十年间，译书不过百种，恐怕再过几十年，亦只不过共得二百种，“是以愤懑，联合同志，创为此局，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② 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广译篇》中指出依靠西洋人翻译洋书有两大弊端。第一，国人精通西洋语文者甚少，故多误译；第二，西洋人故意拖延教学，费时甚多，不能应急。又指出：“若学东洋文，译东洋书，则速而又速者也。是故从洋师不如通洋文，译西书不如译东书。”^③ 可见，从洋务派到维新变法派都已经认识到将日本书译成中文的迫切性。

中国第一部汉译日文书是姚文栋译《琉球地理志》，1883年在东京出版。姚文栋，字子梁，上海人，曾在上海龙门书院学

①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48页。

②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类编》（上），第741页。

③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第128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习，钻研西学和地理学，关心时务与边防。1882年，姚文栋随第二任驻日公使黎庶昌赴日本，在东京中国公使馆担任随员。1884年第三任驻日公使徐承祖继任后，仍被留任，直到1887年调任驻俄公使随员后，才离开日本。姚文栋在日本期间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编译了《琉球地理志》一书。该书主要是辑译日本官方及民间有关琉球问题的著述而成。其中包括日本海军省的《实测图说》、文部省刊印的小学教科书以及中根淑等学者对琉球的一些论述。该书反映了当时日本朝野对琉球问题的看法，以供中国政府研究与交涉琉球问题时参考。林廷玉翻译的《欧美各国政教日记》，于1889年在上海出版，原著者为井上园了，该书被认为是中国第二部汉译日文书。

1898年，罗振玉在上海设立东文学社，教授日语，教学工作由藤田丰八担任。上海东文学社培养出了一批翻译日本书籍的人。樊炳清译的《东洋史要》（四册），于1899年由东文学社出版，书的原著者为桑原鹭藏。其后，该书由屠长春增补，文学图书公司出版。东文学社的学生吴尔昌、陈贻范、沈絃、胡濬康等人从1898年起，翻译了大量日文农业书籍，内容涉及农业用具的使用、害虫的驱除、家禽疾病治疗、金鱼饲养等，和农业有关的可谓应有尽有。东文学社的这批翻译者都是在国内学习日语的，与姚文栋、林廷玉等成为近代翻译日文书籍的先驱。

3. 留日学生的译书活动

大量翻译日文书籍是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对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大贡献。他们出于把新思想、新知识介绍给国内人士的真诚愿望，组成了众多的翻译团体，主要有译书汇编社、教科书译辑社、湖南编译社、普通百科全书、闽学会等，从而掀起译日文书的热潮。

1900年冬在日本东京成立的译书汇编社，是留日学生的第一个翻译团体，社长戢翼攀是1896年赴日的首批留日学生之一。

其余社员如金邦平、富士英等都是日华学堂毕业生，而当时仍在东京专门学校攻读。

译书汇编社的主要工作是出版《译书汇编》月刊。译文多分期连载，没有通卷页码。编辑法好像编教学讲义一样，每一编刊完之后，便出版一单行本。该刊最初以译载 18 和 19 世纪欧美和日本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著述为主，西方著述大多是根据日文译本进行汉译的。在 1900 年 12 月出版的《译书汇编》创刊号上，刊登的译文就有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等西方政治学名著和日本学者有贺长雄的《近时外交史》、《近世政治史》以及鸟谷部铎太郎的《政治学提纲》等著作。《译书汇编》自 1902 年 12 月第 9 期起改变体例，分为政治、法律、经济、历史、哲学等栏，也刊登留日学生自己写的评论。许多西方和日本资产阶级政治社会学名著都是在《译书汇编》上第一次被译成中文的。

除了翻译和出版工作之外，译书汇编社还照顾新到留日学生，而且代理日本书籍在中国内地销售事宜。在一定意义上，它像个留日学生的中心。1902 年，以该社社员为骨干的清国留学生会馆建立。

译书汇编社在成立之初就遇到了财政困难。由于中国当时的定期刊物非常少，读者不免担心该刊会停刊，不愿长期订阅。最先每期印 1000 份以上，而销售量仅为十分之一二。但由于该刊内容包含着新学说、新思想，读者逐渐增多，有时甚至需要重印。

译书汇编社还出版了许多译著的单行本，以政治、法律、经济、历史等类书为主。1901 年刊行的单行本大多是日本人著作的中译本，如高田早苗的《国家学原理》、井上毅的《各国国民公私权考》、涩江保的《波兰衰亡战史》等。1902 年出版的有加藤弘之的《物竞论》、永江正直的《女子教育论》等。梁启超在 1901 年曾经高度评价译书汇编社：“客冬今春以来，日本留学生

有《译书汇编》、《国民报》、《开智录》等之作。《译书汇编》至今尚存，能输入文明思想，为吾国放一大光明，良好珍诵。”^①

译书汇编社的成员陆世芬等还另外创设了一个教科书译辑社。其发行所与译书汇编社相同，又在《译书汇编》刊登广告，可见教科书译辑社是译书汇编社的分社。两社业务有所差别，译书汇编社以翻译大学教材为主，教科书译辑社则专译中学教科书，以适应国内各省新式学堂对中学教科书的需求。先后刊行的有日本学者所著的《中学物理教科书》、《中学化学教科书》、《中学代数教科书》等，据《译书汇编》刊登的广告，该社的译书计划还包括日本学者所著的《伦理学》、《东洋史》、《西洋史》、《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体操教范》、《图画书》等教科书，几乎涉及中学的各门课程。译者大多是正在日本各大学学习中国留学生。他们利用自己学到的日语和专业知识，翻译中学教材，为发展祖国的教育事业和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1902年湖南留日学生组织成立湖南编译社，其重要成员有杨度、黄兴等人。他们发行的刊物叫《游学译编》，也主要刊登译述，译者有时以“译者识”或“译后”的方式，发表自己的看法。后来该刊也登载一些通讯和论文。湖南编译社还出版了一批日本著作的中译单行本，如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有贺长雄的《国家学》、家永丰吉的《文明史》、井上哲次郎的《支那哲学史》等书。该社还在《游学译编》上刊登广告，宣布准备编译出版大批中小学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同纯学术性的译书汇编社相比，湖南译编社略带政治倾向。与此同时，《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以各省份为单位的杂志也相继出现，这些杂志的政治气味比《游学译编》更浓。

1903年，留日学生翻译团体文学社出版了由范迪吉等人选译的《普通百科全书》100册，石印旧装。这套书主要是选译当

^①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类编》（上），第794页。

时日本大中学校的教科书和参考书，内容广泛，在当时颇有影响。同一年，江浙留学生的翻译团体国学社，也编译了一批中小学教科书。1904年，福建留日学生团体闽学会发行《闽学会丛书》。据该会第一部书《西力东侵史》（原著者为斋藤阿具）所刊广告，该会的出版计划包括有贺长雄的《国际公法精义》、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鸟居龙藏的《人种志》、高田早苗的《货币论》等书的中译本。

1906年，在早稻田大学学习的一批中国留学生，翻译了早稻田大学出版的法律、政治、经济等学科的教材12种，合称为《早稻田大学法、政、理财科讲义》。这套讲义的中译本由早稻田大学出版社出版，上海商务印书馆在中国经销，发行量很大，不少中国学校也用它作为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当时许多国内出版社、书店也出版中国留日学生翻译的日文书中译本，如上海的广智书局、作新书局、文明编译印书局等。国内不少刊物上译文的译者，也多数是正在日本或已归国的中国留日学生。如杭州出版的《译林》、苏州出版的《励学译编》等杂志上，都刊登了大量的留日学生的译作。

在留日学生的积极倡导和努力之下，20世纪初中国人翻译日本书的数量非常可观，在当时中国人翻译的各种外文书中占很高的比例。留日学生的译书活动有力地推动了中日文化交流。据统计，从1850年至1899年的半个世纪里，中国所译外文书约567种，其中译自西文的410种，占72.4%，而译自日文的仅有86种，占总数的15.1%。^①20世纪初，大批留日学生掀起译日文书高潮以后，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1902年至1904年间，全国共译外文书约533种，其中译自英、美、法、德等国西文书的只有130种，仅占24.5%，而译自日文书的却达321种，占全部译

^① 转引自：王晓秋、大庭修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历史卷》，第327页。

书总数的60.2%。^①另据香港学者谭汝谦的统计,1896年至1911年,中译日文书共有958种,^②实际上恐怕还远不止于此。

从译书的内容和种类上看,1850年至1899年是以译西文书为主的时期,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方面的译书占了大多数。1902年至1904年是以译日文书为主的时期,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法、教育、历史、地理等类的译书占了大多数。20世纪初,随着戊戌变法后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和清政府开始实行新政、兴办学堂,翻译包括文史哲政经法等类的人文社会科学书籍以及各级学校的教科书、参考书,成为当务之急。而且这时中国留日学生的专业以政法和师范为最多,译这类书最能发挥他们的长处,有些书就是他们正在学习的教材、讲义。因而大量政法、教育类译书的出现,成为20世纪初日书中译的一大特色。据《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统计,在1896年至1911年中国译日文书958种之中,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译书达778种,占81.2%,而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加起来仅172种,占17.9%。在社会科学译书中,法律类最多,有98种,其次政治类96种,教育类76种。^③

4. 新词汇的植根

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大量翻译日文书籍,不仅介绍了日本和西方的新知识、新文化、新思想,推动了中国的文化教育和印刷出版事业的发展;同时还促进了中日语言词汇的交流融合,一批日语词汇融入汉语中。

近代以前,中日两国文化关系非常密切。中国文化在各方面对日本的影响都很大,尤其汉语对日语的影响较深。由于日语借用大量汉语词汇构成自己的单词,因而使汉语与日语不是在文法

①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40页。

② 谭汝谦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1983年版,第46页。

③ 同②。

结构上，而是在单词与全句的意义上，为互相了解提供方便条件。近代以后，日语所以能对汉语增强影响，也正是基于汉语和日语间所存在的内在联系。在江户时代，汉译西书是日本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重要途径，汉语是他们学习西方的文字工具之一。日本知识界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最早书籍，是徐光启和利玛窦所译的《几何原本》。由于有这种历史渊源，在幕府末期及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在翻译西方书籍，输入新文化时，往往借用已有的汉语词汇来翻译。对于那些没有现成的汉语词汇可以借用的西文单词，日本的译者是先按汉语意义创造出一个汉语单词，然后把该词以“字音语”^①形式化为日语单词。例如，日本学者箕作麟祥在翻译英文 right（权利）和 duty（义务）时，借用中国译本《万国公法》的现成词汇，译为权利和义务。对于那些没有现成汉语词汇可借用的西文，便按汉语词汇进行再创造，构成一个新的汉语词汇。例如，对英语 literature（文学）一词，借用汉语中“文章博学”的成语，进行再创造，译成“文学”一词；对 revolution（革命）一词，借用汉语中“革天命”的成语，译成“革命”一词，以表示人民进行斗争推翻旧政权的概念。

由此可见，日本人在翻译时创造的新词汇，是按汉语词法结构进行创造，然后再把这些汉语词汇用字音语读成日语。其构词法有下面几种：

(1) (修饰词) + (被修饰语)

A (形容词) + (名词) 例：哲学、美学

B (副词) + (动词) 例：互惠、独占、交流

(2) 复合同义语 例：解放、供给、说明

(3) (动词) + (宾语) 例：断交、脱党、动员

^① 字音语：日本现代词汇一般可分日本固有语、字音语、外来语，以及上述三种的复合语与派生语。字音语，主要是指汉字和单词的日语读音，是音读。这类词占日语单词中的多数。

(4) 上述各项的复合语

例：治外法权、最后通牒、消火器

总之，这些新词汇，都是按传统汉语的构词法进行创造的。特别是第3种构词法，正好和动词在宾语之后的日语语法相反，但日本人仍然乐于使用这种方法，因为可以缩短音节。这些新词汇虽是日语，却是按照汉语词汇创造的，因而在该词的意义，增加了中日两国人民互相易于理解的成份。所创造出的单词不论作为日语还是汉语的单词，都易于被接受。这样，在中国人开始向日本学习和翻译日文书籍的时候，日本人所创造的原来汉语中所没有的汉语单词，因易于理解，便被中国译者直接引进，作为汉语词汇来使用。这使汉语和日语之间的历史联系，增加了新的成份。

汉语新词汇的出现，推动了汉语的发展。自古以来，汉语即以单音词汇为主。例如，《论语》中的语言“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是典型的单音语。随着时间的推移，汉语中的复音词有所增加，但基本上没有改变汉语单音词这一特征。甲午战争后，留日学生大批赴日，翻译日文书籍不是循序渐进，而是一下子大规模地展开，原有的单音语的汉语词汇难以适应这一新形势的要求，于是大量的日本创造的汉语词汇就被借用或引进了。比如：经济、生产力、生产关系、哲学、物理、服务、唯心、唯物、现役、现金、理想、进步、教授、细胞、支部、干部、劳动者、电流、新闻记者、银行、选举、讲义、总理、警察、斗争、体育、取缔等，都是引进的日本人创造的汉语词汇。现据我国语言学家的统计，日本创造的汉语词汇，被引进借用到汉语中，现已与汉语融合，作为汉语词汇的组成部分者，约有844个。^①

在翻译过程中，引进新词汇的同时，连带着把日语的叙述文体也接受过来，使汉语带有了日文风味。留学生是这一文体的推

^①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327—335页。

进者，梁启超在汉语这一文体的发展中起过突出作用，人称其文章为“启超体”。翻开《饮冰室文集》，便可看到带有日文风格的“启超体”文章跃然纸上。引进众多的复合词汇加入汉语词汇队伍，活跃了汉语单音词的结构，形成汉语的复音词汇，加上日本式文体的融入，终于使汉语文体发生变化，基本上适应了吸收近代科学和技术的需求。近代汉语由此而产生。鲁迅在他的文章中曾提到过，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讲授科学课的名称，如“格致、地学、金石学”^① 这些带有古代汉语风格的名词，今天已为新词汇所取代。格致学是当时中国对自然科学、物理学、博物学、理科等的统称，在引进新词汇之后，上述各词汇的概念才从格致学中逐一分离出来，并最终淘汰了“格致”这一词汇。同样的情况，地学不是研究舆地的含义而是表示地质学概念，金石学也不是研究钟鼎碑版的含义而是表示矿物学的概念。这些概念含混的词汇，现在已经全部被新词汇代替，虽然有些词汇尚存在，如“金石学”，但已固定到只表示“钟鼎碑版”意义的位置上。从这些事例说明，引进或借用新词汇，丰富和活跃了汉语的表述能力。

但是，骤然而大量地引进新词汇，对于刚接触新词汇而不理解其意义的人来说，有些难以适应。因而在引进新词汇的同时，就产生对这种大量引进的批评意见，认为只引进而不加以改造是不对的。以被引进的“经济”一词为例，中国在近代以前，这两个汉字是以“经世济民”或“经国济民”的概念使用的。日本学者用“经济”二字来译英文 *economy* 一词。这种情况下的“经济”与“经世济民”的概念完全不同，具有“理财”、“节俭”、“合算”等含义。有的人对用“经济”二字表达后一种概念提出批评，留学生在译书时也曾以“富国学”、“计算”、“资生学”、“平准学”等词汇来代替“经济学”一词，但未能推广，“经济”一词终于成为地道的汉语词汇被人们广泛使用着，现在似乎无人

^① 鲁迅：《琐记》，《鲁迅全集》第2卷，第2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怀疑这曾是一个被引进而产生过争议的外来词汇。如果说“经济”一词从字面上还能被认为是汉语词汇的话，那么“取缔”一词则完全是典型的日本式汉语词汇了。“取缔”一词的日文含义，有“约束”、“禁止”、“管束”、“管理”、“监督”等。但是，当时的翻译者宁愿使用“取缔”一词而不加以翻译，因而被批评为具有“日语臭”的词汇。现在，“取缔”一词虽还有“外来的”味道，但已经在汉语词典中占有一席之地了。这样，在清末的新学大潮中，伴随着中国留日学生的译书活动，大量的新词汇被引入且植根于中国。

5. 留日学生创办的杂志

创办杂志也是清末中国留日学生传播新文化、新知识的重要方式。由于留日学生人数多，能量大，所办刊物种类多、内容新、形式灵活，对于当时启迪民智、制造革命舆论等方面效果卓著，影响极大，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

留日学生创办杂志最明显的原因是，面对中国的贫弱，他们深切地感到，如不立刻输入现代知识以启发国人，则中国便永无富强之日。同时，他们认为旧思想必须剔除，否则国人将无法接受新事物。例如《云南》杂志的发刊词说：“居今日面曰救亡，而曰偿罪，其惟改良思想之一法而已……吾以为思想者，万事之根本也，于此而不加之意，以剔垢去污，舍短从长，痛行改革焉，则政治也、法律也、学校等等也，改之弗能良，兴之弗可成也。何则，徒法不足自行，成功根于起信，使以旧思想行新事业，事与志违，心冷力息。”^①《湖北学生界》的发刊词也说：“同人为是学报也，以为今日言兵战，言商战，而不归之于学战，

^① 转引自：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编：《日本的中国移民》，第245页，三联书店1987年版。

是谓导水不知来源，必终处于不胜之势。且吾侪学生也，输入文明，与有责焉，与其学成归国，濡滞时日，而后转述于国人，何如旋得旋输，使游学者，不游学者，日征月迈，同为平等之进步。”^①

此外，他们更强调用日本成功的经验来论证中国兼取东西所长的必要：“夫取他人之学，能食而化之，则学即为其人所自有。日本集各国之长，以成一国之学，水乳交融，亦熟能辨何者取诸美、何者取诸欧哉。吾国诚取东西而熔为一冶，发挥之、光大之，青出于蓝、冰寒于水，岂非由新旧二者调和而生耶？今日介绍之劳，是奚可以已也。”^②从上述的发刊词可见留日学生都希望通过办杂志而引进新知识，改变旧思想、旧习惯。他们显然相信思想改革才是最根本的工作，假使思想没有改变，则虽易以新的政治制度，依然是新瓶装旧酒，无补于事。这种以思想改革为先的理论，与后来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新知识分子的主张是一致的。可见思想改革一直是追求中国现代化的知识分子的行动纲领，并且具有输入新文化以促进中国富强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湖北学生界》的编辑们认为待他们学成归国后才教导和启迪国人，便不免“濡滞时日”，因而采取“旋得旋输”的方式。就好处而言，固然可以令国人早日耳目一新，但却免不了“梁启超式输入”的毛病：“无组织、无标准、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③这是当时中国留学生从日本输入新文化的一般风气。

第二个原因是他们希望通过介绍新知识而改变故乡本土的落后面貌，这与各杂志都是由同乡的留日学生所办有关，因此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例如《浙江潮》的发刊词说：“岁十月，浙江

① 转引自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编：《日本的中国移民》，第265页。

② 同①。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于《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三联书店（香港）1980年版，第262页。

人之留学于东京者，百有一人，组织一同乡。既成，眷念故国，其心恻以动，乃谋集众出一杂志，题曰《浙江潮》。”^①《云南》杂志的编辑更高呼创办杂志为云南所未有的创举，并力言这是他们苦心孤诣，爱乡血泪之作：“呜呼《云南》杂志！《云南》杂志！！是云南前此未有之创举，而今日救亡策也；是故乡父老引领翘足，朝夕期待者也；是留东同人枯脑焦心，日夜经营者也。凡为云南谋者，喜当何如；凡我父老，凡我同人，其愉快又当何如。虽然是编也，非仅商榷学术，启发智识之作，实为同人爱乡血泪之代表；非激越过情之谈，实不偏不颇，具有正当不易之宗旨；非草率无责任之文，实苦心孤诣，抱有伟大希望者也。”^②留日学生的组织，都是以同乡社团为基础，反映在留日学生办的杂志上，非常具有乡土色彩。编辑们都以改善故乡的落后为己任，他们热爱故乡的感情，溢于言表。这些留日学生是现代知识的获得者，但不以自己获得知识而满足，认为有责任教导国人，充分反映出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他们东渡留学的目的，便是想从日本找寻可以迅速富国强兵的方法，着意于全民知识水平的提高。

中国留日学生创办刊物，始于1900年冬天创刊的《开智录》和《译书汇编》。《译书汇编》前已详述。《开智录》是广东人冯自由、郑贯之、冯斯栾等主持创办的，在横滨出版，以宣传自由平等的新思想为主要宗旨。1903年以后各省赴日的学生越来越多，纷纷组织本省留学生的同乡会、同学会，创办具有地区特点的刊物。有的从刊名上就可以反映出来，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云南》、《四川》、《秦陇报》等。1906年以后留日学生办报刊达到高潮，除了宣传革命的政论性杂志外，还出现了一些专业刊物，如《音乐小杂志》、《医药学报》、《农桑杂

① 转引自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编：《日本的中国移民》，第266页。

② 同①，第267页。

志》等。20世纪初（1900年至1911年）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所办的刊物，如雨后春笋，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七八十种之多。

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办的这些刊物，反映了当时的形势和时代潮流，表现了留日学生的思想、感情，也体现了中日文化思想的交流与融合。大体说来，它们有如下特点。首先是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几乎所有的留学生刊物字里行间都洋溢着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深厚感情。他们身在异国他乡，却时刻都在怀念灾难深重的神州大地和父老兄弟，为祖国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宰割而沉痛呼号，努力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其次是把介绍新文化、新思想作为自己的神圣责任，大量传播日本的新文化以及经过日文翻译的西方文化。第三是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不少刊物是以省名、地名命名的，大多由各省留日学生同乡会主办，编辑、发行、撰稿人多数是本省或邻省的留日同学，经费大部分募自国内外的同乡人士，刊物出版后相当部分运回国内本地区发行。而且刊物的内容也常常涉及本地区的政治、社会问题。

从这些刊物的政治态度来看，除了少数主张改良立宪外，多数具有革命倾向，成了广大留日学生参加革命活动和进行革命宣传鼓动工作的主要舆论阵地。有的直接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及其各省分会的机关刊物或活动据点。比如影响最大的《民报》，共发行了26期。主要编辑人张继、陶成章、汪精卫等都是留日学生。撰稿的胡汉民、陈天华、朱执信等十余人也都是留学生。他们在该报发表重要文章和专著30余篇。留日学生的刊物，大多是政治性或综合性的，但也出现了一些文学、医学、科技、音乐等方面的专业杂志。这些刊物都以介绍传播近代新文化、新思想、新科学、新知识为己任，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启蒙运动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留日学生本身的特点，许多刊物往往寿命不长，印数不多，编辑撰稿的人员变动也比较大。

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创办的大批刊物上刊登了大量日本学者和作家的论著和作品，包括小说、散文、戏剧和诗歌

等，并经常报道日本的社会动态、文坛新闻和风土人情，对于帮助中国人了解日本文化，促进中日文化交流起了很大作用。另一方面，留日学生在刊物上刊载的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状况各方面的文章、报道以及各类中国文学作品，也有助于日本读者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

6. 留日学生与中日科技交流

留日学生在20世纪初翻译的日文书籍以政法类和教育类为主，其所创办的杂志，十之八九也是介绍政法知识为主。但留日学生对中日科技交流的贡献也是不可忽视的。

翻开留日学生所办的杂志，在有限的科学文章中，所介绍的重点是数学、物理、化学及生物学四门。就实际的内容而言，虽然大部分是人门初级的介绍，但也有不少在当时是最新的科学发现。例如鲁迅以“自树”为笔名所写的《说铂》，便是对新元素镭（铂）的最新介绍。镭于1898年为居里夫人所发现，六年后鲁迅便写了这篇介绍文章，可见他对科学新知的关注，也反映出留日学生那种“旋得旋输”的快速传递新知识的方式。

有些科学知识，在今天固然已经过时，但在当时却是惊天动地的理论。例如在《十九世纪学术史》一文中，作者指出火星有高等生物存在。当然这个理论在今天已为科学家所否定，但在19世纪末，有火星人之说甚嚣尘上。留日学生译载这类作品，亦可见流行程之广。

这些科学文章，翻译与著述各占一半，但不论是何种形式，几乎全是从日本转手过来的。有些作品在卷首明言译自日文书籍，也有的在文末交待该文是根据某教授在课堂上的讲授。例如《十九世纪学术史》译自《太阳报》；《论宇宙间人类之位置》是重译自《国民新闻》；《动物分科一览》是以平泽金之助的《博物学教科书》及大森千藏的《动物学教科书》为稿本；《说脑》则取材自小林义直所译的《生理论》。而《湖北学生界》的编辑，

更在该杂志简章的第五点内，特别用这些取自日本的知识来作为宣传的重点。他们说：“本报为吾国一大杂志，搜罗宏富，各种兼备。或考诸泰西哲人著述，或本于日东名家讲授，精义明言，弥漫磅礴，渊雅壮快，宏阔万里，读者虽未游学海外，恍如遍履东西，幸获讲学之妙，非若专事直译，损人脑筋可比。”^①由此可见留日学生的知识取材，大都不出日本的范围。

由于科技知识多从日本译介过来，许多科技名词也传到中国。如《植物学》一文的作者说：“篇中名词，中国书中多未经见，以其理自西人发明，更之恐失原意，姑就日人所译者仍用之，阅者谅焉。”^②他在文中用“⊙”的符号来表出这样的名词，总计30多个，如：石灰纪、细胞、细胞膜、细胞核、核仁、中心球、叶绿体、无色体、淀粉粒、贮藏淀粉等。

留日学生所撰写的科学文章，其目的除介绍该科的知识外，还经常加入自己的评论，颇值得我们重视，因为从中可以探讨留日学生的思想。首先，所有的科学文章都阐述科学的重要性，希望借此振兴中国实业，以改变贫穷落后的局面，使中国富裕起来。留日学生认为如不讲求科学，中国将有亡国的危险。他们指出某些科学知识，在外国已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但中国人却还全然不知，所以认为是我们的耻辱，遂致力于新科学的介绍。例如，有的作者认为由于人与动物之关系非常密切，故动物学应是人人所应有的知识，他说：“欧美列强十余龄之童子，无不知其概要。而吾国民若聋瞽然，置动物于前能一一举其名者，即博物君子亦戛戛乎难之。若夫考动物之种类，而确知其属何门何纲何目何类者，更无论矣，可耻熟甚！”^③

中国的旧学根深蒂固，留日学生想通过介绍正确的科学知识

① 转引自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编：《日本的中国移民》，第288页。

② 同①。

③ 《江苏》，第5期，东京1903年。

而揭露旧学的错误。例如《说脑》的作者指出人体内司知觉的器官是“脑”而不是“心”，因此他从生理学的角度批评子思、孟子、朱子等学说的错误。批评之后，作者有一小段附言，认为这些批评并非攻击古人，而是纯粹从科学上讨论。他认为如果仍保守旧说，则不能改良中国人的智慧，他说：“今欲使知觉运动优胜，而未知司此知觉运动之器作何状焉，不亦大可笑乎？南辕北辙，却行而求前者，皆决不能收效者也。今欲使知觉运动优胜，而误以心为司知觉运动之官，不愈益悲乎？……呜呼！吾岂欲假新说以攻古人哉？海内之士，有以增智之实告我者乎？治我以反古之罪所不辞矣！”^①新学术的输入，的确有助于固有学术的改良，上述即为一例。中国人向以为心是思考的重心，数千年来深信不疑，然而经作者的介绍，遂能一扫以往的谬误。但从上例也可发现旧有势力的顽固，作者在文中一再声明这并非向传统势力挑战，而只是为了要说明新知识，与国人共同进步。

借科学而做政治宣传也是这些科学文章的一个特色。留日学生不仅在介绍法政及社会科学知识时进行政治宣传，希望国人奋发自强，改造中国；即使在科学文章中，也有类似的宣传。例如在一篇讨论算术问题的文章中，作者用日本学堂的数目，与中国烟馆的数目作比较，以解释计算比例的方法。示例完毕后，作者加上一段附言，慨叹中国的积弱在于烟馆太多，指出中国如要富强，应将所有的烟馆变为学堂。

中国不仅从日本学习科学知识，即使是科学普及的工作，也有借助日本的地方，例如科幻小说在中国的出现，便大部分是从日译本中转译过来的。最先被介绍到中国的外国科幻小说作家是法国人儒勒·凡尔纳。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坛上享有极高的声誉，被誉为“科学幻想之父”，一生中写了近百篇科幻小说，并且被译成54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可见中国人选择凡尔纳的作品

^① 《江苏》，第2期，东京1903年。

来翻译，是颇具慧眼的。

最早从日文转译成中文的科幻小说是1903年由梁启超及罗孝高合译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全书皆用章回体译述，最初发表于梁启超在日本创刊的《新民丛报》，其后于1903年由日本横滨新民社出版部出版。全书的科学幻想情节并不多，梁启超也没有将这本书作科幻小说看待，而是借15个少年在大洋中的经历来赞扬冒险尚武的精神，鼓吹立宪自由思想。

在梁启超以后，正式将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介绍到中国的是鲁迅。当他在日本东京弘文书院留学的时候，便根据日本作家井上勤的日译本，翻译了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在1903年10月出版。此外，又于1905年出版凡尔纳的另一部科幻名著《地底旅行》的译本，并且曾在留日学生杂志《浙江潮》上发表第一回及第二回，他当时署名“之江索子”。不过鲁迅在翻译这两本小说时，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将原著者的国籍弄错了。凡尔纳是法国人，但在《月界旅行》内，鲁迅将作者译为美国查理士·培伦；而在《地底旅行》内，鲁迅称作者为英国威男。唐弢认为造成这个错误的原因是由于日译本也是根据美国出版的英文译本重译过来的缘故。

《月界旅行》的内容是讲述美国有一间在独立战争期间建造起来的炮厂，在战后不需要再生产军械，经理就想出了一个用大炮来发射人上月球的计划。整个故事就是围绕着如何设计这座大炮及解决发射时遇到的技术难题，最后以发射成功作结。《地底旅行》则是讲一对叔侄及一名冒险家深入地球内部的探险故事。凡尔纳在这里运用了他那异常丰富的想象力，将地心描写成一幅幅惊心动魄的壮丽场而，包括地下大海、海兽搏斗、地下的狂风暴雨等，令读者赞叹不已。如果从普及科学知识的角度来衡量，《月界旅行》也是比较成功的，这本小说讨论天文学的问题非常多，例如炮厂厂长曾写信给天文台长，询问一些发射炮弹的技术问题。在回信中，天文台长详细阐述了炮弹要达到何种速度才可

以到达月球；月球与地球的精确距离；炮弹要置于何点才可以准确到达等。

鲁迅翻译这两本小说，采用的是章回体，而且是用类似改写的形式来翻译。他是想借科幻小说来增进国民的科学知识。由于这两本小说是从日译本翻译过来，所以带有浓厚的日语的味道。最明显的是应用了大量日语词汇，如果该书是从原文（法文）翻译过来的，或者翻译者不是留日学生，这些日语词汇大概不会出现。例如《月界旅行》中曾出现过“会社”、“社长”等日语词，另外，鲁迅将“planet”译为“惑星”，这是日本的译名，中国人后来将它正式改为“行星”，是民国以后的事了。

鲁迅和梁启超是中国翻译科幻小说的先驱，从此，科幻小说这种新的文学体裁从日本引入中国，这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不可忽视的一点。

三、日本近代教育对晚清社会的影响

1. 教育方式的改变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把发展和普及教育作为使国家富强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来推行，因此全国上下一致为树立新教育制度而努力。日本自1872年颁布学制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和建立从小学到大学的近代化学校制度，使日本的教育完全从旧式私塾制度中脱离出来。根据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日本政府对1872年学制作了一次又一次的修改。1886年《学校令》的颁发标志着日本的近代学校制度正式确立。教育的普及和发达，对于日本国家的富强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只有教育才能造就一批又一批推行近代化的人才。

同日本相比，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程显得缓慢滞后。中国的旧式教育，是以培养统治人才为目的的，所以只教授一些脱离现

实的以《四书》、《五经》为主的知识。中国的科举取士制度到封建社会后期也日益失去其合理性。鸦片战争后，少数比较开明、觉醒的上层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中国的积弱，主要由于人才的缺乏。人才之所以不足，是由于教育和考试制度的不合理所致。到19世纪晚期，要求改革考试制度、设立学校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例如，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说：“不修学校，则人才不出；不废帖括，则学校虽立，亦徒有虚名而无实效。”^① 1862年，洋务派建立了京师同文馆，而甲午战争的惨败表明这样的孤立的表面化的西式学堂没有造就出能使中国富强的人才，必须从根本上改革中国的旧式教育。1896年李瑞棻上疏，要求推广学校，具体提出：在京师设立京师大学堂，各省、府、州、县，则遍立学堂，以为培养人才之本。

甲午战争后，中国一些有识之士认为：日本的强大，其基础就在于教育。中国也应在教育方面效法日本。康有为在呈给光绪帝的《请开学校折》中提出：“今各国之学，莫精于德；国民之义，亦倡于德。日本同文比邻，亦可采择。请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② 清末维新派和洋务派在政见上有很多分歧，但都主张学习日本，设定学制。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初的中国出现了发展新式教育的热潮。

张百熙在1902年奏准公布《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这是中国最早的学制。由于统治阶级内部新旧思想的冲突，此项《钦定学堂章程》颁布之后，由张之洞、荣庆两人会同修改，并没有实施。1904年12月，张百熙、张之洞、荣庆三人联名奏准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明确规定了从蒙养院到通儒院的各级学校的学制，采用新的教育内容和方式。《奏定学堂章程》可以说是完全模仿当时日本通行的学制拟订的，它的实

^① 转引自：汪向荣：《日本教育》，第142页，三联书店1988年版。

^② 同①，第144页。

行对 20 世纪中国学校教育制度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为中国近代教育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在晚清“新政”的过程中，中国的传统教育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日本教育模式的影响下，新式学堂纷纷建立。1901 年，各地纷纷改书院为学堂。省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设中学堂，州县设小学堂，设立蒙养学堂（幼稚园）的也不少。1902 年，张百熙奏准京师大学堂办法。同一年，张之洞奏请在南京设立三江师范学堂，专门培养新式学堂的师资。以后，各地纷纷设立师范学堂。1904 年，湖北省招聘日本籍女教师三名到武昌筹设幼稚园。中国各地纷纷向日本招聘教员，担任各级学堂新式教学任务，包括体操、音乐、图画、手工等各课教员。中国的教育从此不再是《四书》、《五经》的一统天下了。1905 年，清政府设立学部，统辖全国学堂，以推进新式教育。1907 年，学部奏请批准女子师范学堂、女子小学及各级师范学堂章程。各地设立女子师范学堂，奉天省女子师范学堂派遣 21 名学生到日本实践女学校学习师范科。中国的教育从此不再是男子的一统天下。

在兴办新式教育的热潮中，一些注重人才的有识之士还私人出资兴学。清末著名立宪派张謇先后在南通倡办了通州师范、女子师范、幼稚园、小学、中学等普通学堂，还创办了纺织、农学、医学等技术学堂。经营建筑业的杨斯盛创办了广明小学、广明师范讲习所和浦东中学。到了 1909 年，各类新式学堂达 59117 所，学生数逾 160 万。^①新式学堂建立的范围遍及全国，这表明中国的教育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 教科书新貌

在兴办新式教育的热潮中，中国的教科书也以新的面貌呈现

^①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第 249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出来。中国原有的书院，所用教材只有《四书》、《五经》，以后虽增设一些洋学学科，但所用的教材，也只是19世纪或更早一些西洋传教士所写、所译的一些启蒙书籍，既没有统一的体制，在内容上也十分粗浅，甚至有错误。新式学堂的广泛建立，迫切需要新式的教科书。可是清末的中国不但没有一本能用作教材的教科书，甚至连能编写教科书的人也找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向日本学习，模仿日本。最初的教科书，几乎都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小学教科书中有些是直接翻印日本的小学教科书，而只在日文假名旁边，注上相应的汉字而已。至于中学、大学用的教材，大概除了国文以外，几乎都是翻译日本的，因此，不论是用语，还是文章格调方面有不少是日本式的。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编《教育年鉴》所载《教科书之发刊概况（1868年—1918年）》一文，记述了1903年的情况：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京师大学堂刊有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一本，内分十六门目，修身伦理门，称修身重私德，伦理重公德，列入《弟子职》、《曲礼》、《朱子小学》、《近思录》、《人谱类记》，及教育改良会编商务印书馆本之《高等修身教科书》、广智书局本日本元良勇次郎之《中等教育伦理学》，江楚编译局本日本井上哲次郎著、樊炳清译之《伦理教科书》等数种。

字课作文门，列入蜚英馆本张维新《初级普通启蒙图课》、王筠《文字蒙求》、苗夔《说文建首字读》，文明书局本之无锡三等学堂《蒙学课本》、戴懋哉《汉文教授法》及马建忠《马氏文通》等书。

经学门，列入《四书集注》，《明监本五经》、《古注十三经》、《经典释文》、洪亮吉《传经表》、《通经表》、《皇清经解》等书。

词章门，列入梅曾亮《古文词略》、姚鼐《古文辞类纂》、《今体诗抄》、王士禛《古诗选》等书。

中外史学门，列入鲍里东《史鉴节要便读》、潘世恩《读史镜古编》，普通学书室本之日译《普通新历史》，广智书局本日本

市村瓊治郎著、陈毅译之《支那史要》，东文学社本日本那珂通世著之《支那通史》，振东室本日本河野通之辑之《最近支那史》，作新社译本之《世界近世史》，东文学社本日本桑原著、樊炳清译之《东洋史要》，金粟斋本日本小川银次郎著、樊炳清译之《西洋史要》，东亚译书会本日本箕作元八等著、胡景伊等译之《欧罗巴通史》等书。

中外輿地门，列入作新社编之《世界地理》，丸善本日本矢津昌永著、吴启孙译之《世界地理学》，輿地学会译印之《大地平方图》、《皇朝一统总图》、《五大洲总图》等书。

算学门，列入商务印书馆之《普通珠算课本》，益智书局本美狄考文著、邹立文译之《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形学备旨》，美华书馆本美罗密士著、潘慎文译之《代形合参》，利玛窦、伟烈亚力译、徐光启、李善曾笔受之《几何原本》等书。

名学门，列入西学启蒙本英哲分斯著、艾约瑟译《辨学启蒙》，金粟斋本英穆勒著、严复译之《名学》等书。

理财学门，列入作新社本杨廷栋著《理财学教科书》，文明书局本日本天野为之著《理财学纲要》等书。

博物学门，列入英傅兰雅著、格致须知本《动物须知》、《植物须知》、《全球须知》，英约瑟著西学启蒙本《植物学启蒙》，作新社译《植物学教科书》、《中等植物学教科书》、《动物启蒙》，科学丛书本日本藤井健次郎著、樊炳清译之《近世博物教科书》，五岛清太朗著、樊炳清译之《普通动物学教科书》，译辑社本美斯起尔原本、何燠时译补之《中学生理教科书》等书。

物理化学门，列入格致须知本英傅兰雅著之《重》、《力》、《电》、《声》、《光》、《气》、《水》、《热》等八种，科学丛书本、日本木村骏吉著、樊炳清译之《小物理学》，开明书店售教科书译辑社本日本水岛久太郎编、陈槐译补之《物理学》，会文学社本美那尔德著、范震亚译《化学探原》，科学丛书本樊炳清译《理化示教》等书。

地质矿产学门，列入益智书会本英教士著、李庆轩译《地学指路》，英傅兰雅著《金石略辨》等书。

新学制下的教科书的面貌可谓焕然一新，内容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其中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教科书为数很少，而西方人和日本人写的却相当多。其实当时的中国凡以“教科书”为名的书籍，都可看做“从日文翻译过来的东西”，就连“教科书”这个词汇，也是从日本输入的。

1955年12月8日郭沫若在早稻田大学以“中日文化交流”为题演讲，他说：“中国为了向日本学习，在派遣大批留学生去日本的同时，又从日本招聘了很多教师到中国来。我们当时又翻译了大量的日本中学用的教科书。我个人来日本前，在中国的中学所学的几何学，就是菊地大麓先生所编纂的。此外，物理学的教科书则是本多光太郎先生所编的。”^①可见清末新式学堂的教科书，大部分是留日学生的译著。

3. 晚清的日本教习

在晚清兴办新式教育的热潮中，一批日本教师来中国任教，充实了新式学堂的师资，他们被称为“日本教习”。所谓日本教习，指的是到中国执教的日本籍教育工作者，主要是由日本国内派往中国的，也包括一部分已经在中国的日本侨民，包括他们在中国所办，以中国人为对象的一些学校中执教的日本籍教师。日本教习的来华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有很大影响。

日本人在中国开设的最初一批学校，有1898年福州的东文学社，1899年泉州的彰化学堂、天津的东文学堂，1900年厦门的东亚书院、南京的同文书院和1901年北京的东文学社等。这些学校主要是由日本教习向中国学生讲授日语。

更多的日本教习直接受聘在中国学校任教。1902年，保定

^① 转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33页。

莲池书院的著名学者吴汝纶赴日本考察教育。吴汝纶是李鸿章的重要幕僚，他在日期间，一再与日本教育界人士商谈聘请日本教习来华一事，并委托他们代为选拔和招聘。1903年起，日本教习陆续来华，到1905至1906年已有五六百人之多，成为聘请日本教习的高潮时期。这股热潮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清政府教育制度和留学政策的变化。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兴办新式教育的热潮，各省纷纷开办新式学堂。新式学堂需要大批新式的师资，很多新设的课程如物理、化学、音乐、体操、图画等，国内师资非常缺乏。虽然各省派出不少留日师范速成生，但去日本仅学习数月，一部分人仍难以胜任。而且留日学生深受民主思想的影响，清政府十分担心派出去的留学生都成为“革命党”，就开始采取各种限制留日的措施。为此，清政府认为聘请日本教习来华，更为有利和“安全”：既可以通过日本教习引进新知识，满足新式学堂师资的需要；又可以有效地控制学校和学生，以免革命思想的传播；还能节省派遣官费留学生的开支。而日本政府从控制中国的文化教育，培养亲日势力，对中国进行实地调查等目的出发，也鼓励和支持日本教习赴中国任教，并指定由帝国教育会负责此事。

日本教习原则上是从日本的师范毕业生及现任中学、师范教员中选拔，由帝国教育会负责，经过短期训练后送到中国。至于比较高级学校的师资，则由已经从事中国留学生教育的一些学校，如东京帝国大学，东京专科学校（后来的早稻田大学）和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等，招聘志愿到中国工作的教习。东京高等师范是最早接收中国留学生预备教育的学校，选拔出的教习也比较多。所谓的短期训练，是指让将要到中国工作的教习在半年左右时间内学习中国历史、地理、风俗人情。当时在日本，曾由帝国教育会设立专为训练派遣到中国教员用的“清国派遣教员养成所”这样的机构。有些民间团体，也有举办类似训练班的。如东洋妇人会在1903年于东京成立“清国派遣女教员养成所”，可以

想象，在当时到中国去当教习之风一定相当盛行。

来华的日本教习水平和素质参差不齐。日本教习中确有不少具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他们真心帮助中国进步，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如回国后出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の服部宇之吉、吉野作造，出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の矢野仁一、藤田丰八，出任早稻田大学教授の中岛半次郎等。还有后来任司法大臣の島田俊雄、任帝国博物馆長の杉荣三郎、任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校長的松本龟次郎，著名作家二叶亭四迷也是其中的佼佼者。然而，在日本教习中也有一些水平不高、素质較低的。有的傲慢无礼，品质恶劣，有的滥竽充数，不负责任。由于多数日本教习不会汉语，而中国学生又不会日语，因此往往采取“双重讲授”，即由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充当翻译再讲一遍的方法，影响了教学的进度和质量。

20世纪初大批日本教习来华任教，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如当时中国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就先后有20多位日本教习工作过。其中师范馆总教习服部宇之吉从1902年到1909年在京师大学堂任教7年。他出生于日本福岛县，1890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曾在文部省任职后留学中国、德国。来中国前担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1902年服部宇之吉受聘于京师大学堂，讲授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课程。他还担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总教习，参与了师范馆的管理，帮助制订了师范馆章程以及指导教室、实验室、宿舍、图书仪器等方面的建设。为了表彰服部宇之吉的贡献，1907年京师大学堂总监奏请清廷，破例赏给他二等第二宝星。获得此项殊荣的，还有京师大学堂法政学堂总教习严谷孙藏和教习冈田朝太郎，获得三等第一宝星的有京师大学堂日本教习杉荣三郎。

有一些日本教习还在清末中国地方的教育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江苏师范学堂总教习藤田丰八贡献尤为突出。藤田丰八1869年生于日本德岛县，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来华后先任上海

《农学报》的日文翻译，翻译了大量日本农业科技资料，后又担任中国最早的教育杂志《教育世界》的编辑顾问，翻译介绍了许多日本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明治维新后日本教育改革的经验措施、教育法规条例和日本的教育学著作、教科书，为清末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借鉴。他还任过上海东文学社和南洋公学东文学堂的日文教习。1904年藤田丰八受聘出任江苏学务处教育顾问，参与制订江苏教育改革方案和各种学校的章程制度，1906年还倡导建立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劝学所，有益于江苏初等教育的迅速发展。1904年他出任江苏师范学堂总教习，并聘用了一批日本教习，完全按照日本师范学校的模式进行教学和管理。藤田丰八为江苏省教育的近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来华的日本教习中，像他这样对中国友好的日本人士不在少数。

有的日本教习还为中国女子教育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做出了贡献。如毓正女学堂总教习河原操子，出生在日本信州，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先是到长野高等女子学校任教，1900年由下田歌子推荐到横滨华侨办的大同学校女子部任教，1902年又由下田歌子介绍，来到中国上海务本女学堂任教。由于她教学有方，很快得到校方和学生们的的好评。1903年12月，蒙古族历史上第一所近代女子学校在喀喇沁王府成立，命名为毓正女学堂，由喀喇沁郡王夫人任校长，河原操子受聘为总教习，招收蒙古族女学生入学。在河原操子的主持下，毓正女学堂的规章制度、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都是按照日本女子小学校的模式建立的。学校共设13门课程，其中日语、算术、体育、音乐、图画、家政、编织等均由河原操子一人承担。毓正女学堂还每年举办游园会，邀请家长和当地居民参观学生的作业和手工等，扩大了学校在内蒙地区的影响，推动了蒙古族女子教育的发展。

招聘日本教习来中国学校任教，以1905年至1906年为最高潮，以后逐年下降。其原因从中国方面看，由于大批留日学生陆续学成回国，很多人致力于教育事业，缓和了师资不足的困难，

有些原来只能依靠日本教习承担的课程，都可由归国留学生接替。另外辛亥革命前后中国人民掀起收回利权运动，某些被日本教习把持的学校教育权也在收回之列。加上为减少经费开支和鉴于有些日本教习水平不高或品行不端，在聘约期满后，中国校方便不再续聘。从日本方面看，由于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从“保全清国”转向明目张胆侵略的“大陆政策”，因此对派遣日本教习兴趣下降。再加上此时西方国家在中国广泛设立教会学校，欧美籍教师大量来华，很快就排挤了日本教习的地位。

4. 东文学社的创建

提到晚清的日本教习，不能不提到中岛裁之和他创建的北京东文学社的情况。

中岛裁之 1869 年生于日本九州熊本县，1891 年从京都西本愿寺的大学林学校毕业后就来到中国。1892 年，他考取了日本外务省的第二期留学生，为了了解中国情况，开始到中国各地作实地考察，他的足迹遍及中国的 16 省。

1897 年，中岛裁之以个人身份来到中国，赴保定投人吴汝纶主持的莲池书院，从吴学习理学，同时担任教授吴汝纶子弟英语及日语的工作。他从此开始了和中国官场的交往。吴汝纶不仅是当时著名的学者，主持着直隶省保定府的莲池书院，而且还是李鸿章的幕僚，深得其信赖。吴汝纶虽然是一个桐城派学者，但在思想上并不保守，属于洋务派中比较开明的。尽管莲池书院是一个旧式的教育机构，吴汝纶却有设立新式学堂的计划。中岛裁之入其门下，受其熏陶，并教授其子弟外语，很快得到器重，参与了这种兴办新式学堂的计划。

1901 年，吴汝纶和中岛裁之的计划得到李鸿章的赞同，李鸿章表示希望中岛能为学校的开办而尽力。以后又得到吴汝纶的侄婿户部郎中廉泉的支持，开始筹备设立一所新式学堂；在廉泉的斡旋、介绍下，又取得了皇族中比较开明的肃亲王和镇国将军

毓朗的支持；在经济方面，也得到了当时正从事“庚子事变”后收容难民、埋葬死者的慈善会总董刘铁云（《老残游记》的作者）的资助银 1000 元。同年 3 月 2 日，由吴汝纶出面向李鸿章和庆亲王提出了设立学校的申请，并很快得到了许可。3 月 20 日，在由廉泉借到的北京外城前孙公园的锡金会馆，挂出了“北京东文学社”的校牌，东文学社正式宣告成立。

东文学社成立后，以廉泉为总理，负责除教务以外的一切内外事务；教务则由中岛裁之负责；王仪郑担任监督，处理日常事务。全校就这三个人，教员只有中岛裁之一人。校舍是借用锡金会馆的房子，桌椅、教科书之类也是临时借用的。但是在遭受八国联军破坏后的北京，能有这样一所学校供人学习，已经实属不易了。

关于北京东文学社创办的宗旨，中岛裁之在《创立东文学社章程》中指出：“欲求振刷中国，非整顿学校不可。今与同志之士议定，创设东文学社……以定维新之基。”就是说，创立东文学社的宗旨是整顿学校（中国旧式的私塾、书院），以振兴中国，为中国的维新变革奠定基础。中岛裁之所说的“整顿学校”，是有具体内容的，他在《将来的希望》一文中，有这样几句话：“养成具有学识、资格之人才，以当十八省各府州县等复兴之任之教师。养成能为各省开设师范学校所期之教师人物。”^①也就是说，在中岛看来，创立东文学社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培养一批中国兴办新式学堂所需的教师。在东文学社存在的六年时间里，中岛为了维持和发展这所学校面耗尽了心血。我们应该对这位真心帮助中国促进教育近代化的日本教习给予积极的评价，但是从东文学社曾接受日本外务省“机密经费”以及东文学社曾作为训练浪人的据点等史实来看，这所学校也有追随日本对华政策，为侵略中国服务的一面。

^① 转引自汪向荣：《日本教习》，第 246 页—247 页。

东文学社最初预定招收学生 30 名，但开学时却有 60 人申请入学；开学的第二天，增至 90 名，一星期后增至 180 名。于是分成两班，有汉学修养的老年及壮年人编入“专门学班”，主要是培养其翻译日文的能力，少年人则入“普通学班”，教授日语及普通学科（其后又分“中学科”和“师范科”两种）。起初由中岛自己一人担任所有课程，上午教专门学班，下午教普通学班，课程分配及上课时间如下表：

星期	专门科（上午）			普通科（下午）	
	9—10	10—11	11—12	1—2	2—3
1	读法	亚细亚地理	东亚形势	言语	万国史略
2	读法	万国史	俄清关系	言语	物理阶梯
3	读法	东邦近世史	议事院谈	言语	清史揽要
4	读法	亚细亚地理	东亚形势	言语	百工新书
5	读法	清国近世丛志	俄清关系	言语	物理阶梯
6	读法	政治	支那教学史（日语）	言语	万国史略

不久，学生人数增至 280 余名，由一人讲授已经非常困难。恰好有一些日本人希望边当教员边学习中国语，东文学社就增聘原口新吉等六名日本教习。

东文学社的人学资格没有年龄限制，只规定“能理解文义者”和“不吸食鸦片者”两个人学条件，也不收取学费。学社的维持费用，全部由中岛一人奔走筹集。在人事俸给方面，除监督王仪郑月支银 50 元外，其他各人一律义务工作，连中岛本人的生活费用也由其自行设法解决，不由学校支付。其他一面学习中国语一面授课的教员，每月也只领取 10 元至 15 元的零用钱。

由于对学生没有年龄和学历的限制，所以入学的学生不但在

年龄上有老有少，而且在学历上也相差甚多，有翰林，也有进士、举人和秀才，更多的则是白丁和小学生；至于职业和地位，更是形形色色。东文学社把这些程度参差不齐的学生分成专门和普通两科授业，困难是很大的，但当时无论是教育当局方面、社会各界，还是学生方面对学校的要求都不高，更何况东文学社所授的课程，在当时都属于新学，所以并没有因为人多，程度不齐面发生什么问题。

由于中岛为人严谨，对学校的教育工作非常热忱，所以学生逐渐增多，校舍也三次迁移。1902年教员人数增加至18人，教室增至17间，在东文学社执教的日本人前后共有56人。这群教师中有的素质不高，可谓是鱼龙混杂。教师的流动性也非常大，因为他们大都是为了学习中国语而来执教的，所以学会后，自然就各奔前程。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转到各地的学堂当教习，可以说“东文学社是日本教习的摇篮”。^①

东文学社的毕业生（包括已经具备翻译能力而中途退学的学生），有一些为中国兴办新式教育做出了贡献。例如翰林御史蒋式理当上京师大学堂提调，翰林侍讲连甲成为山西大学总办，举人王金绶受聘为京师大学堂教师。

六年之间，中岛为东文学社付出了很多心血，健康状况恶化，加上经费不足和学校的内部矛盾，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请求直隶总督袁世凯将学社收归直隶学务处管辖。学部侍郎严修指派留日归国的张瑛绪接手办理，1906年7月10日，在该校第六年度第一学期结业典礼上，同时举行了转让仪式。1907年虽然又恢复了东文学社的校名，但规模上已不如旧日隆盛。

^①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68页。

四、王韬与中日文化交流

1. 《普法战记》在日本的反响

逍遥海外作鹏游，东极扶桑西欧洲。
意气凌风行万里，文章经国业千秋。^①

这是日本友人对中国近代著名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的赠诗。一个漫游世界的文人才子形象跃然纸上，诗中钦敬和赞扬之意溢于言表。

在晚清时期，像王韬那样的士人实不多见。他身上有着中国旧文人的性格：向往闲云野鹤、采菊东篱的生活；又有着旧文人所不具备的时代气息：不是仅仅如林则徐、魏源那样，隔着太平洋重重水雾看彼岸世界，而是走出“天朝大国”，遍游英、法、意大利、土耳其、埃及、新加坡、锡兰（斯里兰卡）等许多国家，考察了各国的政治制度、山川地理、风土人情，对比腐朽的清廷，从而形成了变法改良的思想。

王韬对中日文化交流做出过杰出贡献，他的改良主义思想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日本学术界、思想界的影响，他的改良主义思想形成后，又对日本产生很大影响。他的《蘅华馆诗录》、《普法战记》、《扶桑游记》等诗集、诗书、文集，都在日本人士中引起过轰动。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最终以普鲁士的胜利而告终。王韬在1871年编撰了《普法战记》一书，探寻法国失败的根源。该书和《法国志略》可以说是王韬史学的代表作。《普法战记》一书的显著特点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前章已

^① 王韬：《扶桑游记》（下），第27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经做了详细的介绍。在此处，笔者简要谈一下《普法战记》东传日本的情况，以及该书在日本的反响。

《普法战记》“大抵取资于日报者十之三”，^①最初在香港《华字日报》上连载，战争结束后，才汇集成纪事本末体的14卷本。1886年又增补为20卷。该书虽未马上刊印，却不胫而走，抄本流传很广，中国的洋务派和维新派都很赞赏此书。日本一家主要报纸《报知新闻》的编辑栗本锄云在上海得到一部《普法战记》，书中对战争过程的真实描述和作者充满新意的评论，给他很深的印象。栗本锄云非常推崇中国宋代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读了《普法战记》后，他竟认为这是自《新五代史》以后一部罕见的杰作。^②明治初年，日本除大规模直接吸收西洋文化外，继续从汉文书籍中吸收营养。在栗本锄云的推动下，日本陆军文库在明治11年（1878年）翻刻了《普法战记》。明治20年（1887年），大阪修道馆又重新翻刻该书，被认为是“日本翻刻汉文书籍，以输入西欧文明的最后一本”，从此，“中日两国的文化关系发生了逆转”。^③

开国之初的日本，苦于不知西方世界之情状，曾奉魏源的《海国图志》为瑰宝，而《普法战记》比四五十年代的《海国图志》所提供的世界新知识更为准确，更为丰富，故日本人士将它同魏源的《海国图志》相提并论。如果说《海国图志》是近代中国最早开启人们眼帘以窥看化外世界的启蒙著作，那么，《普法战记》则是启迪人们深入观察西方政治、经济、军事，启迪人们思考、探索国家命运和激励振兴民族热情的著作。正是因为这一点，日本学界、军界反响很大。王韬的好友冈千仞说道：“《普法战记》传于我邦，读之者始知有王紫诠先生，以卓识伟论，鼓舞

① 王韬：《法国志略》原序，第1页，1882年香港版。

② [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第9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③ 汪向荣：《日本教习》，第29页。

一世风痹。实为当世伟人矣。”^① 鲁迅的好友、日本著名学者增田涉写道：“王韬之名所以在日本如此盛传，以至被邀请访日，是因为明治初年渐渐开始倾向注意海外情势的日本先觉们，看了精通世界大势的他的《普法战记》后，把他作为时务俊材来敬畏的缘故。”^② 日本文学家龟谷省轩在为《扶桑游记》所写的跋中回忆道：“戊寅之春（1878年），余与粟本匏庵、佐田白茅探梅于龟井户，归途饮于柳岛。匏庵曰：‘吾闻有弢园王先生者，今寓粤，学博而材伟，足迹殆遍海外。曾读其《普法战记》，行文雄奇，其人可想。’”^③ 当然，其记述不尽全面，观点也有片面性，但史料是可靠的，文笔十分流畅，体例有创新，其为改良维新提供借鉴的指导思想和用意，也是十分可贵的。

2. 王韬与《扶桑游记》

1879年4月28日，王韬应日本友人的邀请，从上海启程赴日本。一路上，天风浩荡，舟行颇速，途经长崎、下关、神户、大阪、横滨，然后到达东京。沿途每至一地，王韬必遍谒当地名士，拜访中国驻当地领事，游览名胜古迹，领略异国风光，受到当地人民和中国领事、华侨的热烈欢迎。王韬将百余日东瀛之游，所见所闻，逐日记下，是为著名的《扶桑游记》。

日本是一个文明古国，文化深厚，山川秀丽，风光宜人。素有游癖的王韬周游各地，考察山川、地理、风俗、人情、文化与社会，于长崎观博览会，神户游千鸟瀑；在大阪访造币局，东京忍冈赏樱花，柳桥侑酒；“后乐园”瞻朱舜水墨宝，观伶剧于“新富剧场”，墨江凭栏看烟火；谒德川氏家庙，吊故将军源赖政之墓。王韬用优美的文笔，以较多的篇幅记叙了这一切：“屋宇

① 《扶桑游记》：《冈千仞跋》，第314页。

② 转引自忻平：《王韬评传》，第17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③ 同②。

虽小，入其内，纸窗明净，茵席洁软。庭前必有方池蓄鱼，荇藻缤纷，令人有濠濮间想。池旁杂花小草，藉作点缀。屋皆覆木片，有西秦板屋之风。薄壁短垣，盗贼易入，而从未闻有宵小。犹足见风俗之厚也。”^① 这是以生活环境的描写衬托出日本人民优秀的精神品格及风俗的淳厚。

再看一百年前东京两国桥的烟火：“须臾，暮色昏黄，万灯齐焰，密于天上繁星，照耀波间，有如白昼。忽有流萤万点，从天下注，则烟火放也。东船西舫，彼此争奇角胜，五花八门，殊令目眩。最奇者红绿两光，能使大地空明，星月异色。”^② 王韬用诗一样的语言进行了描述，他没有异邦的生疏，没有游子的怅惘，与日本人民一起，陶醉在这良宵美景之中了。

《扶桑游记》不仅仅是游记类的文学作品，或记述异国他乡风土人情的笔记，也是一部考察日本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的历史书籍，其中体现了王韬进步的历史观。

王韬到日本前十年，日本发生了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历史上一大转折点。考察明治维新对日本的影响，并对明治维新得出自己的结论以为中国之借鉴，是王韬游日的主要目的之一，这也在《扶桑游记》中得到了反映。

明治维新前，统治日本的是德川幕府。全国为二百六十几个封建藩侯大名分别控制，天皇已成为没有实权的傀儡。幕府将军统治着全国大小大名诸侯，占有一切，包括名山胜水，如王韬曾游览过的日光山即是。日光山，又名晃山，“松柏葱郁，宫殿峥嵘，即德川氏诸庙也。向者幕府盛时，四方诣山住宿者，侯伯有二十六院，幕府诸宫有八十坊，连甍对宇，栉比蝉联，结构之雄，世所罕俦”。^③ 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封建统治者豪奢之甚。明

① 《扶桑游记》（上），第189页。

② 同①，第201页。

③ 《扶桑游记》（下），第270页。

治维新实行了“书籍奉还”和“废藩置县”的政策，废除了各封建大名对土地和人民的领有权，取缔了他们的种种封建特权。为了扫除改革的障碍，他们都被迁往京城，仅仅保留了一个“华族”的头衔。各地宫阙也不再为他们所有。面对这一巨大的社会变化，王韬不禁慨叹道：“呜呼！仅十许年耳，而沧桑更易，人事变迁，可胜叹哉！”^①

从日本华族的衰落，王韬悟出了真理：历史发展是任何人阻挡不住的，封建统治阶级反对改革，固守陈法，只能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中。日本如是，中国亦当作如是观。王韬通过《扶桑游记》发挥了这一思想，意在警诫封建清廷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否则将自取灭亡。

随着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引进，日本的工业也逐渐从旧式的封建手工作坊向新式的资本主义大企业发展。1879年7月21日，王韬随友人藤田鸣鹤参观“新燧社”。所谓“新燧社”即新式火柴制造厂。王韬在参观考察中，发现不少异于旧式手工作坊的特点：其一是旧式手工劳动尽被淘汰，“熬煮硫磺炉灶，悉用西法”。运售于香港、上海，“年中不知凡几”。^②充分显示了近代工业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和较强的竞争力。第二，企业主为扩大生产能力，不断引入西方先进的工艺技术。“新燧灶”老板“清水诚曾赴法国博览会，往游瑞士，购新法器其而归”。^③还定期实行企业设备更新换代，发掘工厂生产潜力，扩大生产规模，这些都是旧式手工作坊无法具备的和难以做到的。

王韬在《扶桑游记》中，多次写到了西乡隆盛这个在日本历史上功过皆显的有戏剧性的人物。西乡隆盛为日本明治维新著名领导人之一。他曾是武力倒幕的主将，位至明治政府的参议、陆

① 《扶桑游记》（上），第210页。

② 同①，第299页。

③ 同①，第178页。

军大将、元帅，与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一起，并称“明治维新三杰”。1873年，明治政府内部分裂，西乡辞官回到故乡萨摩藩鹿儿岛。1877年，在主要是与政府政见不同者及其旧藩士支持下，掀起了叛乱。这次叛乱，“西乡隆盛实为倡者，势甚披猖。日廷兴师伐之，血战八月，死于是役者，前后万余人”。^①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西南战争”。王韬以自己的见闻作了真实的纪录。

历史上任何个别人物都是在顺应历史规律的条件下建功立业的。如果不顾人心之向背，违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就必然以悲剧告终。王韬在日本详细考察了西乡隆盛的一生，对西乡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他在批评西乡违背历史潮流的“倒行逆施”的同时，也对其“维新之建，多资指臂”的贡献给予首肯。以后日本人民在东京建“招魂社”，内供西乡之像，以为岁时之祭，还在鹿儿岛及其他地方建西乡铜像，就是用以表彰他的维新倒幕之功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前车之辙，足为中国日后之鉴。王韬在实地考察后认为：日本的经验值得中国参考，中国欲谋富强，应走日本式的道路。这就是王韬考察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得出的结论。王韬的《扶桑游记》是一本中国文人第一次应邀赴日以实地观察所得而写的关于日本社会生活的著作，其中含有大量明治时代日本文人的详情，作为外国人的记载，具有特殊的价值，故至今为日本文化界所重视。王韬回国后，应日本文人的请求，对游记加以整理，加上一篇序文，寄给日本朋友，由栗本锄云在东京“报知社”印局以最快速度标点付印。1879年底上卷出版，翌年出版中卷和下卷，这就是《扶桑游记》的最初版本。

^① 《扶桑游记》（中），第250页。

3. 王韬与日本学者的情谊

王韬是在一批日本学者的盛情邀请之下东渡扶桑的。这些人除《报知新闻》的编辑栗本锄云外，还有：佐田白茅（1832—1907），其人性情暴烈，是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征韩论”的主要鼓吹者；重野安绎（1827—1910），有影响的考证学派历史学家，其人治学严谨，对日本历史的许多“事实”都表示怀疑，有一个“抹杀博士”的绰号；冈千仞（1832—1913），浪漫的倾心中国的学者，而且对国际关系颇有兴趣，80年代曾任东京一家私人学院的负责人，讲授儒学经典；中村正直（1832—1891），明治初期的一位多产作家和教育家，他译的穆勒的《论自由》等书为日本学界所熟知。他们中有的人是从由香港回国的日本人那里了解到王韬的，有的是在读了王韬的书后出于敬仰邀他赴日的，比如，重野安绎写道：“余观先生所著书，羨其文藻，爱慕其襟度通倏，不规规乎绳墨，欲一相见请教。”^①

王韬在日本游历期间，与日本学者朝夕相处，宴游酬唱，情敦谊厚，不分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初至东京，即大会日本众多的第一流学者于东京上野东台长舵亭中，联诗斗酒，交流学问。王韬出口成章，文史皆通，兼及西方格致新知，并比较东西方文化之异同点，侃侃而谈，不知疲倦。日本学者对他大为折服。王韬曾多次与日本学者切磋学术，自己也说，东游之“始愿，则在访东国诸文人而就正之也”。^②日本人士则把王韬比作今日之“魏默深”（即魏源），而“魏默深未足以比先生也”。当时许多日本诗人文士，恳请王韬为自己的诗文作序、题跋，王韬欣然同意，前后达几十篇。仅从《弢园文录外编》所收的74篇序跋来看，其中为日本友人所题的序跋就占五分之一，达17篇

① 《扶桑游记》：《重野安绎序》。

② 同①：《自序》。

之多，此外还有不少未收入书内的。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历史现象。

与王韬交情很深的日本文人很多，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冈千仞。冈千仞，字振衣，号鹿门，生于1834年，原为仙台藩士，精通汉学与西学，曾因主张尊王维新，被凡主下狱，几至于死。明治维新后任修史馆编修官、东京府书籍馆干事（馆长）等职。后因对藩阀专制不满而辞官办塾，以教导学生与著述、吟诗自娱。其前后有弟子3000人，著述达300余卷。王韬在《扶桑游记》中对其极为推崇，曾详细介绍其生平，并称他为东京“不凡之士”中的佼佼者。王韬对冈千仞的勇气、胆识和文采十分钦佩，两人志趣相投，遂成莫逆之交。冈千仞著有《美利坚志》、《法兰西志》等，“于泰西情形，了然若指诸掌”。^①王韬的《法国志略》就是以冈千仞的《法兰西志》为材料，又综合另外几部西洋史写成的。冈千仞反对放弃民族特色，全盘西化的“脱亚入欧论”，主张根据国情有选择地吸收西学，王韬曾为《冈鹿门文集》作跋。

王韬访日时曾劝冈千仞漫游中国，到1884年，冈千仞终于实现了访华夙愿。由于他此次来华，随身携带了自己的著作《尊攘纪事》、《法兰西志》、《美利坚志》各50部，以及《纪事补遗》、《藏名山房杂著》各100部，以准备分赠所拜访之中国官员、名士，故《申报》上有“携著书千卷”之说。

曾在明治政府中任外务省“外务权大录”的佐田白茅，辞官为文，创设“大来文社”，招贤纳俊，深悉中华文化，撰有《花竹堂集》，请王韬为之校勘。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内孕育了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日本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提出了“征韩论”，并进而吞并琉球，侵扰我台湾。佐田白茅就是一个“征韩论”的鼓吹者，因政见不一，而辞去外务省的职务。王韬批评了他，在

^① 《扶桑游记》（上），第186页。

临回国前，写诗婉劝和提请他多为中日友好出力。

枫叶已黄，秋风飒飒，王韬倦游思归了。1879年8月22日，王韬结束了在日本的访问，启程回国，重野安绎、诚卿岩谷修等众多日本友人在东京酒家中村海楼设宴为王韬饯行。参加者有中国驻日大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等以及日本著名文士中村正直、森春涛、冈鹿门等，“至者不下百余人”。^①席间，中日学者公推王韬“执牛耳”坐上席，位列何如璋、张斯桂等人之上。王韬蒙此殊荣，心情非常激动，回顾在日本的一百多个日日夜夜，他提笔作长诗一首，以志留别：

我之来兮春光非，我之去兮秋风起。
 秋风起兮游子归，万重山兮千重水。
 子酌我兮金叵罗，我赠子兮玉版纸。
 上写今日离别辞，中有泪痕流不止。
 两国相通三千年，文士来游自我始。^②

在座的日本友人都都诗篇唱和，木下真宏诗云：

骊歌高唱遽相离，难系佳宾万里思。
 经世原因唇齿势，论心宁问新旧知。^③

诗中表示了“唇齿势”、“新旧知”的中日两国，应互相联合，共振亚洲的良好愿望，充分体现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和肝胆相照的关系。

翌日，王韬乘火车到横滨换船回国。何如璋派车送行，黄遵

① 《扶桑游记》（下），第261页。

② 同①，第298页。

③ 同①，第304页。

宪及日本友人几十人送到东京火车站。佐田白茅、冈鹿门、重野安绎等七位日本友人一路护送到横滨登轮船返国。临别之际，互道珍重。王韬面对如此真挚的友情，不禁老泪纵横，心中充满依依之情。

王韬的访日活动，在日本人民中传为佳话，至今日本友人在许多诗文中还常常以尊敬的语气提到他。布施知足在《于游记中所见明治时代的日中往来》，实藤惠秀在《王韬的来游与日本文人》等文中均对此作了详细的记载和介绍。实藤惠秀高度评价说：“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王韬是最令人难以忘怀之人。”^①此语可见王韬在日本影响之大。

五、李叔同与中日艺术交流

1. 对引进西洋绘画艺术的贡献

在中国近现代文化艺术史上，李叔同的名字颇有些神秘的传奇色彩。他是一位全才——集诗歌、美术、音乐、书法、篆刻等创作成果于一身，并且开创了现代艺术教育、戏剧表演、艺术广告的先河。他曾经留学日本，学业虽不专一，但是在其涉猎的所有方面都非常投入，因此能够为近代中日艺术交流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叔同，原籍浙江省嘉兴县，1880年10月23日出生于天津。幼年时期他接受的是传统儒学教育，同时又学习英语，曾经在1897年和1898年两次参加天津的童生考试，但没有获得功名。1901年，上海的南洋公学开设特殊班，招收“能为古文辞者”20余人。李叔同以李广平之名考人，同近代名人黄炎培、邵力子等成为同学，而授课教师则是大教育家蔡元培。

^① 转引自忻平：《王韬评传》，第191页。

据黄炎培回忆，蔡元培的授课方式是半日读书，半日学习英语及数学，同时鼓励大家学习日语，这对李叔同日后决心去日本，大概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1905年8月，李叔同东渡日本留学，并于临行前写作了一首《金缕曲·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他感慨道：“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①他已经不满足自己在国内的生活，要去日本寻找新的道路。一到日本，李叔同不是马上寻找学校，而是立即投入了工作，他首先为留日学生高天梅主编的杂志《醒狮》撰写了《图画修得法》和《水彩画法说略》两文。从已有的文字材料看，在此之前，李叔同并未专习过绘画方面的美术理论，虽然精于金石篆刻，也曾握过画笔，但这与美术理论毕竟是两码事。他之所以能立刻写出这两篇文章，是在南洋公学期间学得的日语知识帮了他的忙。据他自己讲，《图画修得法》是“掇拾日儒柿山、松田两先生之言，间以己意，述为是编”。^②《水彩画法说略》介绍西洋画，文章开篇说：“西洋画凡十数种，与吾国旧画法稍近者，惟水彩画。爰编纂其画法大略，凡十章，以浅近切实为的，或可为吾国自修者之一助焉。”^③这使他写出的文章显得颇有些内行。以今日的标准来衡量，这两篇文章自然显得相当浅显，但若历史地看，却应当说是为中国开了传播西洋美术理论的先河。

1906年秋，李叔同报考了东京美术学校，到那里学习西洋画油画。袁希濂在回忆李叔同的文章《余与大师之关系》中说，“中国留学生之得人日本美术学校者，以师（李叔同）为第一人”。^④而美术学校在当时，则是日本美术界的最高学府。由此

① 王荣多编著：《释演音》，第5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

② 中国佛教协会编：《弘一法师》，第66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③ 同②，第71页。

④ 转引自王荣多：《释演音》，第15页。

可做推测，大概是因为“日本艺术之最高学府”以及中国“第一人”这两个因素，才使日本的新闻记者把“清人志于洋画”当作新闻，专门去采访他的。

东京美术学校创立于1888年，但西洋油画这一科目，却是日本著名油画家黑田清辉在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895年发起创立的。李叔同随黑田清辉学习油画，在艺术与技术上都收益不少。但他不是那种“专一”的人，因此在学习油画的同时，又于校外跟随真行勇学习音乐和戏剧。

在日本期间，李叔同与一位日本少女恋爱并同居了。这位日本少女究竟叫什么名字，她的职业是什么，从现在的历史材料中难以找到足以证实的依据。李叔同师从于黑田清辉，而黑田从法国学习到的观念，就是强调油画的基础是人体写生。黑田认为“人的身体能够传达各种各样的感情”，真正的美就应该像大自然一样，而“大自然没有给自然界的万物披上任何罩衣”。在他的影响下，李叔同学习绘画时，便于课外雇用了私人模特儿。李叔同与那位日本少女的关系，可能首先是通过模特儿与雇主的关系建立起来的，在日后经常的接触中，两人渐渐产生了感情，变成了情侣关系。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中国最先使用人体作写生模特的是李叔同。民国初年，李叔同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上美术写生课，采用了裸体的人体模特教学，这在当时的中国更是一个空前的重大创举。

2. 《音乐小杂志》与西洋音乐的介绍

李叔同还是中国音乐杂志的创始人。1905年10月，李叔同与朋友们商议出版《美术杂志》，发表包括音乐在内的艺术方面的文字。可是，创办工作刚具规模，同人们便如风吹云散，只剩下李叔同一人在东京了。正如他自己所说：“乙巳十月，同人议创《美术杂志》，音乐隶焉。乃规模粗具，风潮突起。同人星散，

瓦解势成。”^① 在这种情况下，李叔同把心一横，以个人之力所及，创办了一份《音乐小杂志》。他在《音乐小杂志·序》中说，这份刊物准备每年出两期，春秋季各刊行一本。但最终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它只在东京出版了这一本，寄回国内发行，其创刊号便成为终刊号。

这期杂志上，大部分是李叔同本人的文章。他在《呜呼！词章》一文中感叹：“予到东瀛后，稍涉猎日本唱歌，其词意袭用我古诗者，约十之九五”，原因在于“日本作歌大家皆善汉诗”，“学者通《史记》、《汉书》”，可是中国的留日学生，却不重视汉学，“昔有日本人举《史》、《汉》事迹，质诸我国留学生，而留学生茫然不解所谓，且不知《史记》、《汉书》为何物，致使日本人传为笑柄”。令他尤为气愤的是，有些中国人对“词章之笑，金蔑视之”，却“迨见日本唱歌，反啧啧称其理想之奇迹”。^② 于是，他呼吁中国的音乐作曲作词者，要继承自己祖国的文化遗产，不要反从日本人那里学习中国的文化。

在这份仅有 26 个页码的杂志上，李叔同还发表了自己创作的三首歌词——《我的国》、《春郊赛跑》和《隋堤柳》。《我的国》后来成为在国内流传相当广泛的爱国歌曲，歌词非常有气势：“昆仑峰，缥缈千寻耸。明月天心，众星环拱，五洲惟我中央中。二十世纪谁称雄？请看赫赫神明种。我的国，我的国，我的国万岁，万岁万万岁！”^③ 日本的音乐教育家铃木次郎，也在为中国留学生讲授音乐课时，采用这首歌作为教材。《春郊赛跑》的歌词简洁明快，表现了新文化熏陶下的青年人朝气蓬勃的生活：“跑！跑！跑！看是谁先到。杨柳青青，桃花带笑。万物皆春，男

① 王荣多编著：《释演音》，第 75 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8 年版。

② 王荣多编著：《释演音》，第 14 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8 年版。

③ 同①，第 69 页。

儿年少。跑！跑！跑！锦标夺得了。”^①李叔同还在《音乐小杂志·序》中对音乐的积极作用谈了自己的看法：“盖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效用之力，宁有极矣。”^②

《音乐小杂志》虽然只办了一期，但它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份音乐杂志。这一开创性的价值，是与李叔同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李叔同还是向中国介绍西洋音乐的第一人，他在中国新音乐史上起到了启蒙的作用。李叔同在《西洋乐器种类概说》中介绍说：“西洋乐器之分类有种种方法，兹依最普通之分类法，分为弦乐器、管乐器、击乐器及金制乐器四种。”^③接下来，他在此文中介绍了一些西洋乐器的特点、演奏手法等，并全部附有插图。李叔同音乐成就虽然不高，但他回国后担当了浙江第一师范的音乐教学工作，著名音乐家刘质平就是他的学生。丰子恺在《李叔同先生的教育精神》一文中谈到：“在我所进的杭州师范里，有一时情形几乎相反：图画、音乐两科最被看重，校内有特殊设备的图画教室，和独立专用的音乐教室，置备大小五六十架风琴和两架钢琴。课程表里的图画、音乐钟点虽然照当时规定，并不增多，然而课外图画、音乐学习的时间比任何功课都勤：下午四时以后，满校都是琴声……就因为我们学校里的图画音乐教师是学生所最崇敬的李叔同先生。”^④可见，李叔同确实为新音乐的介绍和在中国的推广做出了很大贡献。

3. 创办春柳社和推广现代戏剧

话剧是19世纪末日本戏剧界从欧美引进的。李叔同等留日

① 同①，第69页。

② 中国佛教协会编：《弘一法师》，第65页。

③ 同①，第78页。

④ 王荣多编著：《释演音》，第29页。

学生接触到这种戏剧形式后很感兴趣，认为它简明生动，易于排演，能配合现实又容易为观众理解。1906年冬天，李叔同和一些爱好戏剧的留日学生，组织了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而春柳社的名字，首先是以其“演艺部”的出现而而世的。李叔同作为发起人之一，起草了《春柳社演艺部专章》，公开发表，以示从事新戏剧活动的意愿：“每演说之事迹，有声无形；图画之事迹，有彩无声；兼兹二者，声应形成，社会靡然而向风，其惟演戏欤？……吾辈不揣樗味，创立演艺部，以研究学理，练习技能为的。”^①

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春柳社的名字十分醒目，它的历史地位非常重要。从《春柳社演艺部专章》可以看出，春柳社虽以研究各种文艺为目的，然而由于“创办伊始，骤难完备”，所以先成立的只是其演艺部，“以研究新派（即话剧）为主，以旧派（即传统戏剧）为附属科”，^②并进行排演。春柳社后来的发展变化表明，它并没有在其他方面做出什么贡献，真正体现春柳社历史意义的，就是这么一个演艺部。演艺部的几次舞台演出标志着中国现代戏剧，即话剧历史新阶段的开始。

李叔同一边学习油画，一边学习音乐，忽然间又对戏剧发生了兴趣，对此他当时的友人也说不清原因，只是觉得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非常认真，做得非常出色。现在看来，大概一方面因为他在艺术上才华横溢，样样都行；另一方面，他不管学画还是学乐，都与振兴祖国的艺术事业联系起来，只要能对祖国、对民族有益处，他便会全身心地投入进去。

在春柳社演艺部成立的第二年，即1907年2月，中国大陆徐淮一带发生了严重水灾。为了能够帮助祖国的民众，春柳社在东京举行了多次集资赈灾义演活动，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首次演出

^① 转引自王荣多编著：《释演音》，第16页。

^② 转引自王晓秋、大庭修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历史卷》，第329页。

了译成汉语的法国戏剧《巴黎茶花女遗事》。如果没有这次公开演出，春柳社在中国戏剧史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就难有现在的历史位置。这次演出成为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开中国话剧之先声。李叔同在这次演出中男扮女装饰演女主人公“茶花女”玛格丽特。剧本是根据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翻译改编而成的，但这次东京义演的只是原剧中阿芒之父访问玛格丽特的那一场（共两幕）。李叔同在剧中的表演相当引人注目。据孟忆菊后来在《东洋人对李叔同的印象》一文中所说，日本的戏剧专家松居松曾经表示：“中国的俳優，使我佩服的，便是李叔同君。当他在日本时，虽然仅仅是一位留学生，但他所组织的春柳剧团，在乐座上演‘春姬’（即茶花女的日语译文）一剧，实在非常好。不，与其说这个剧团好，不如说这位饰茶花女的李叔同君演得非常好。这个剧本的翻译非常纯粹。化妆虽然简单一些，却完全是根据西洋风俗……尤其是李君的优美婉丽，绝非日本的俳優所能比拟。我当时看过以后，顿时又回想到玛德小剧场所见裘菲列所演的春姬，不觉感到十分兴奋，竟跑到后台去和李君握手为礼。”^①

当然，对于李叔同扮演的茶花女究竟是否成功，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后来成为著名戏剧创作家的欧阳予倩，就认为茶花女是粉红色的西装，扮相并不好，她的声音也不甚美，表情动作也难免有些生硬。在对表演的评价上形成分歧，应当说是正常的现象。无论如何，正是由于有了这一场演出，春柳社的名气开始大了起来。李叔同在中国的留日学生中间也开始引人注目，他在春柳社里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溯自乙巳丙午（1905年至1906年）间，曾孝谷、李叔同、谢杭白、李涛痕等，留学扶桑，慨叹文艺之坠落，亟思有以振之。顾数人之精力有限，而文艺之类别綦繁，兼营并失，不如一志而冀有功。于是‘春柳社’遂出现于

^① 转引自王荣多编著：《释演音》，第18页。

日本之东京，是为我国人研究新戏之始，前此未尝有也。未几，徐淮告灾，消息传至海外，同人演‘巴黎茶花女遗事’，集资赈之。日人惊为创举，啧啧称道，新闻纸亦多谀词。是年夏，休业多暇，推李叔同、曾存吴（即曾孝谷）主社事，得欧阳予倩等为社员。”^① 就这样，李叔同虽然不是有责任感的将帅之才，但《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成功演出却把他送到了“春柳社”的主事之位。

1907年6月，春柳社借演出《巴黎茶花女遗事》之余兴，再上演一出由曾孝谷改编的五幕剧《黑奴吁天录》（原是美国作家斯陀夫人的著名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以求使春柳社真正成为“吾国艺界改良之先导”。角色的分配如下：

庄云石（法科学生）饰乔治·谢尔比（白人），是黑奴汤姆叔的老主人。

曾孝谷（上野学生）饰乔治的妻子，兼演莱葛立（白人），汤姆最后的主人。

黄二难（上野学生）饰海雷。乔治的债主（白人，黑奴贩子）。

李涛痕（国文教员）饰一个黑奴贩子，白人。

李叔同（上野学生）饰爱米玲，莱葛立家的女奴，兼演圣克莱尔（白人），汤姆第二位主人。

这出戏的主旨是反抗民族压迫，当时演出这个戏自有其现实的用意，其谢幕词引用了林肯总统的名言“只要有人类的地方，就绝不允许有一半自由、一半奴役并存于世界”。它所引起的强烈反响是不言而喻的，台下的掌声如同潮水一般，竟把演员朗诵谢幕词的声音淹没了。

在这样一个颇受好评的戏剧里，李叔同同时扮演了两个角色：爱米玲和男角圣克莱尔。李叔同的艺术见解高出时人一筹，而且他在实践方面也非常用功。据欧阳予倩回忆，李叔同自己有

^① 转引自陈慧剑：《弘一大师传》，第78页，中国建设出版社1989年版。

许多头套和衣服，经常一个人在房里打扮起来照镜子练习台词，深入思考人物性格。然而，在《黑奴吁天录》演出结束后，人们评价最高的却是曾孝谷，而不是李叔同。他接受不了这个结论，于是在1907年冬的另一次演出中，他再次扮演女角，还特别“参考西洋古画，制了一个连蜷而长的头套，一套白缎子衣裙……谁知台下看不懂——息霜（即李叔同的别号）本来瘦，就有人评量他的扮相，说了些应肥、应什么的话，他便很不高兴”。^①

第二年，春柳社的社员人数大大增加，在许多问题上不容易取得一致的意见，李叔同在当年退出了春柳社。以后，春柳社的一些成员回到国内，排练一些生动活泼的中外话剧，在上海等地演出，话剧艺术从此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

^① 转引自王荣多编著：《释演音》，第20页。

第九章 中国与亚、非、拉各国的文化交流

一、中国与朝鲜的文化交流

1. 共同反抗侵略斗争中的友好文化交流

近代以后，中国和朝鲜都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和掠夺。此时，中国的清王朝和朝鲜的李朝都发展到了其封建统治的末期，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都呈现出衰落腐败的景象，封建政权岌岌可危。在帝国主义大炮的轰击下，清朝和李朝的封建政府均分别被迫与列强签订了《南京条约》、《江华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满清政府和李氏朝鲜政府在中日战争之前存有矛盾，两国政府的统治者对于它的人民都作了种种方式的限制，以控制他们的接近和来往。但鸭绿江和图们江不是铜墙铁壁，隔不断两国的人们，特别是农民和商人的交往。他们之间的自由往来和贸易交往，必然会促进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和传播。另外，两国政府的官员和一些知识分子也作为使节互相访问、接触，从而成为中朝两国文化交流的又一重要媒介。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一向唇齿相依、患难与共的中朝两国面临着同样的亡国灭种的厄运。这时，两国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淡化了，增多了同仇敌忾的共同情感。两国人民和革命者更是互相

支援、共同斗争。光复国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是他们的共同任务。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就曾多次发表声明，严正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支持朝鲜人民的独立斗争。

在抵抗日本侵略者、保家卫国的斗争中，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两国的文人学者也互表同情、广为交往、彼此声援、互相支持。特别是朝鲜被日本吞并以后，中朝两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并肩作战，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同时，他们也为中朝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883年，清朝末期的著名学者、爱国官员黄遵宪，针对虎视眈眈的沙俄写了一篇《朝鲜叹》：“有北有北鄂罗斯，展翼巨鸞张牙狮，欲囊六合鞭四陲，梦中伸脚直东下，谅尔无过土耳其，吁嗟乎朝鲜，吾为朝鲜危。”^①这首诗，充分的表达了中国诗人和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又如，原朝鲜李朝末年官吏金泽荣（1850—1927）是朝鲜近代的一位爱国诗人，因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的日益侵略深为愤恨和不满，于1905年辞官携眷来到中国定居，并在江苏省的南通翰墨林印书局任编校。在中国，他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如他和当时著名的官员学者张謇、严复、梁启超、屠敬山等都有很密切、深厚的交往。金泽荣的汉语功底很深，尤其善于写汉语诗。他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并对中国的革命形势发展极为关注。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异常激动和振奋地作了《感中国义兵事五首》。其中一首这样写到：“武昌城里一声雷，倏忽层阴荡人还，三百年间天帝醉，可怜今日始醒来。”^②金泽荣不仅是朝鲜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爱国诗人，他也为中朝两国的文学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样，中朝两国的文学交流，就在这个新的、反帝反封建的基础上

① 转引自杨昭全：《中朝关系史论文集》，第481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② 同①。

建立了新的关系，并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2. 中朝两国文人的艺术交流

明清时期，中朝两国的使者大多是文人。他们之间的互相访问和结交，对促进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和传统友谊起了很大的作用。

到了近代，中朝两国的知名学者、文人仍有广泛的交往。如朝鲜的朴来谦于 1892 年来到沈阳，著有《沈槎录》一书，并与中国学者缪公恩有密切的交往。咸丰年间，朝鲜文人金永爵来到北京。与中国文人叶名沔、冯志沂等广为交往，常常在一起讨论学问，切磋诗文。在叶名沔和冯志沂的诗集中均收有与金永爵唱和酌对的诗篇，而金永爵的《存春轩诗抄》中也收有叶名沔、冯志沂二人酌对的诗篇。

近代中国的书法艺术也影响到朝鲜。李朝时期的书法是以赵子昂体为主导，并在整个李朝一直贯彻始终，而赵子昂书体原来流行于中国明代初期文人学者之间，即翰林书院。赵体在中国版本方面也广为采用。中国和朝鲜两国文化关系密切，这一趋向自然也会影响到朝鲜的书法界。甲午中日战争以前，晚清和朝鲜的交往异常频繁密切。翁同龢、吴大澂等书法家均曾在这一时期出访朝鲜，并在朝鲜社会各界引起极大的影响。翁同龢等在世书法家的很多作品也在朝鲜流行一时，受到朝鲜人民的欢迎和喜爱。

二、中国和西亚地区的文化交流

进入 20 世纪，越来越多的中国伊斯兰教学者前往麦加朝觐。作为伊斯兰各国宗教和政治的中心，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为中国伊斯兰学者和穆斯林所敬仰，并成为他们朝觐和出国巡礼的终点。而且，中国的穆斯林还派出留学生赴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学习，交流学术文化。这些承担或体现新阶段文化交流的学

者翻译出了大量代表阿拉伯世界最高成就的文献和经史典籍。

1. 王浩然伊斯兰各国之行与回教师范学堂的创立

王宽（1848—1919年），字浩然，回族，北京人。王浩然排行第五，经名哈志·阿布拉·拉哈曼，新疆维吾尔族称其为“白十阿訇”（“白十”即为维吾尔语“五”的意思），内地的穆斯林则称他为“王五阿訇”。王浩然出身于伊斯兰教经学世家，祖先大多饱学通经，闻名遐迩，其家族世代为牛街礼拜寺“冠带住持”，号称“北京王”，为世人所推崇。王宽主张革新伊斯兰教，是中国伊斯兰教新式教育的倡导者之一，在20世纪以来，培养中阿文化交流人才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伊斯兰教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王浩然是20世纪中国伊斯兰新式学校的兴办者。他“博学善教，果毅任重，以故名满华夏。近代中国回教文化之倡兴，教势之复振，阿訇（指王浩然）领导之力也。基于此，故叙近代中国回教文化教育变迁史迹，必须自王氏兴学始”。^①王浩然聪颖好学，自幼跟随其叔祖、有“北方经师泰斗”之称的王守谦学习伊斯兰教义。后来，王浩然投师于沧州名士刘辑五门下，专门研习伊斯兰教哲理，博览伊斯兰教经籍。王浩然青年时期就才华初露，学成之后，各地的清真寺都争相聘他为阿訇、教长。他曾先后在外地和北京牛街寺讲学。他的说教深入浅出，受到听者的极高赞誉。任教期间，他除了进行宗教活动以外，尤其重视研究、剖析穆斯林教育。他的门生，如达浦生、景长荣、马善亭等人后来均成为著名的经师和学者。

为拯救积弱已久的中国回民，改革中国伊斯兰教育，王浩然于1906年（清德宗光绪三十二年）出国朝觐，前往亚非各伊斯兰国家考察教育。其弟子马善亭陪同。1906年秋天，他们从上

^① 赵振武：《三十年来之中国回教文化概况》，《禹贡》第5卷，第11期。

海乘船出发。在朝觐的途中，王浩然实地考察了埃及、土耳其、沙特等伊斯兰国家。在土耳其期间，曾在伊斯坦布尔受到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拉·哈密德二世（1876—1908年）的亲切接见。哈密德赠与他千余部当时中国伊斯兰教所缺少的珍贵伊斯兰教经书。1907年，在土耳其经师哈甫苏·哈桑及阿里·雷塔的陪同下东渡回国。这两位经师来中国主要是为了传授《古兰经》的读法，并在华讲学。

王浩然回国时，土耳其已经从布鲁萨修起了通往巴格达和麦加的铁路，青年土耳其党人根据他们和苏丹缔结的协议，于1908年7月公布了新宪法。王浩然受到土耳其复兴运动的鼓舞，认为培养新型知识人才是头等大事。他认为，回族的信仰和习俗与中国的其他民族有很多不同，因而要解决回族子弟的求学问题，提高回族的教育水平，必须自己兴办专门的学堂，开办回族的新式教育。为此他提出了“提倡教育，宣传教育，心智精神安静；振兴工业，改良风俗，国家社会富强”的主张。他深明不重视教育就不足以图存的世界大势，“鉴于西方各回教国，多受制于欧罗巴人，与中国之病同，心焉痛之，以为居今之世，非智能超越不足与欧人抗衡，乃锐意兴学”。^① 1907年（清德宗光绪三十三年），王浩然于北京牛街寺创立回教师范学堂，由达浦生主持教务，改革教法，在宗教经学课程以外，还增设了汉文、科学等各门知识。北京回教师范学堂存在的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意义却异常重大。它开创了在中国穆斯林举办新式宗教学校之先风，从此之后，办学、留学之风大盛。

为了普及教育，王浩然又于1908年在北京牛街礼拜寺后院创办了京师公立清真第一所小学堂，由马邻翼任该校监督，孙芝山、冯余轩、马少衡、古亮臣、安镜泉、马瑞川、马少轩、王永

^① 转引自李兴华等：《中国伊斯兰教史》，第72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茂为学董，王浩然自任堂长（即校长）。学堂所聘任的教员也皆为当时的名士，如米有山、王仲坚等人。两等小学堂为七年一贯制小学，设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几何及阿拉伯语等课程。1912年（民国元年），清真第一两等小学由京师学务局接收，改为官办，称“京师公立第三十一两等国民小学”；1918年改称“第二十一小学”；“七七事变”后，改为“牛街小学”。^①

新式学校的建立改变了过去由清真寺附设经堂、只教授教内经典以培养阿訇为主要目的的私塾式传统教育体制，掀开了中国伊斯兰教内教育崭新的一页。从此以后，中国伊斯兰教内之教育，就冲破了清真寺的藩篱，由经堂教育向社会化教育过渡。在这一过程中，王浩然所创办的具有新式学校雏形的回教学校的桥梁作用功不可没。

王浩然是一个追求进步的伊斯兰教学者。他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赞成共和。1918年，他漫游蒙古各地归京后，因劳顿染病，于1919年3月病逝于北京，享年71岁。

2. 阿拉伯文献的翻译

阿拉伯文典籍的翻译可以追溯到康熙年间刘智（约1664—1730）所编的《纂译天方性理》（简称《天方性理》）。“这是一部编译有经有传的伊斯兰教典籍”，其出版“开阿拉伯典籍汉译之风”。^②

在阿拉伯文献中，《古兰经》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基本经典，是穆斯林宗教生活、精神生活和伦理道德的最高依据。《古兰经》被全世界的穆斯林尊奉为“安拉的语言”、“造物主的启示”。它“把一盘散沙似的阿拉伯人锻炼

^① 李兴华等：《中国伊斯兰教史》，第72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 《中国与西亚非洲文化交流志》，第4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成一个坚强的民族”，并“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①，在《古兰经》的维系之下，全世界属于阿拉伯语系的人民得以在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相互了解、相互沟通和相互交流。伊斯兰教的信奉者严格遵守《古兰经》中教义原则，修身养性，甚至在阿拉伯地区和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里，就连立法原则也不得与《古兰经》相违背。马克思认为《古兰经》是伊斯兰教“信仰和法律的源泉”。可见《古兰经》的汉译不仅对中国的穆斯林本身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就是对于其他广大中国人认识和了解阿拉伯民族及其文化也有很大的作用。而且，《古兰经》优美而带有韵律的散文体是阿拉伯文体的楷模和典范，1300多年来，深为世人推崇和赞誉。

在中国，《古兰经》有汉文译本和维吾尔文译本。《古兰经》的汉文翻译，经历了抽译、选译、通译三个阶段。

零星的抽译多出现于明清之际。穆斯林学者的汉文撰述中，大多只是摘选片断或短句，转述其中的大概意思作为引文。此时汉文著述颇丰的伊斯兰教学者有王岱舆、马注、刘智等人。

18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是《古兰经》的选译阶段。所谓选译，就是中国的穆斯林从实用的目的出发，对《古兰经》进行一种有选择的翻译。选译分为音译本和注释本两类。音译本是将节选的经文进行音译，用汉文拼写阿拉伯经文，形成汉文与阿拉伯文的对音形式。这类选译本主要适用于懂汉文的穆斯林直接诵习经文，有光绪八年（1882年）余海亭译的《汉学赫厅》等。注释本是在汉文阿拉伯文对音本中附加汉文注释和音译。光绪十三年（1887年）马玉书译的《经汉注讲黑听》以及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马联元译的《孩听译解》均属此类译法。

最早致力于《古兰经》通译工作的是清代末期的回族学者马复初（名德新，1794—1879）。他的汉文著述很多，而且也善用

^① 马坚：《古兰经》译本卷首《古兰简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阿拉伯文著书立说。他曾在19世纪后半叶用汉语按顺序翻译了《古兰经》20卷（全经的2/3），题为《宝命真经直解》，是当时翻译《古兰经》最多的人。这一译本后来大多毁于火灾，仅存5卷。

《古兰经》全译本的出现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情。那时，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及相应的新式教育事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中国的穆斯林群体的文化素质也有了很大的提高。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的教内外人士相继提供了六种中文译本，这对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交流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六种译本是：

李铁铮，《可兰经》，北京中华印书局，1927年。是为中国最早的汉译本。

姬觉弥等，《汉译古兰经》，上海爱俪园广仓学窘出版，1931年。

（以上两种译本均为教外人士所译，失误较多，读者范围较小，在穆斯林中不受重视。）

王静斋（文清），《古兰经详解》，先后有三版，即北京中国回教促进会本，1932年；宁夏石印本，1942年；上海永祥印书馆修订本，1946年。

刘锦标，《可兰经汉译附传》，北平新启印书局，1943年。

杨仲明，《古兰经大义》，北平伊斯兰教出版公司，1947年。

马坚，《古兰经》，北京大学（解放前仅刊行上册，全译本刊行于1981年），1949年。

阿拉伯文学的翻译从《天方诗经》开始，而阿拉伯文学中的瑰宝《一千零一夜》也始终受到中国学者的青睐。《一千零一夜》是阿拉伯文学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它集中了波斯、埃及、阿拉伯及印度的许多传说和故事，是中世纪伊斯兰各国的一部家喻户晓的知识宝库。《一千零一夜》中有许多与中国有关的传说和故事，如“阿拉丁和神灯的故事”、“辛伯达航海故事”等。在这些故事中有许多关于阿拉伯商人所到之处的中国古迹和风土人情的描述，令人回味无穷。

中国最早开始翻译介绍《一千零一夜》是1900年周桂笙从英文中转述了其中的部分故事。1903年，钱楷重选译的《辛伯达航海故事》来自于英国史谷德的英译本，书名改为《海上述奇》。1904年，周作人用文言文从英文中转译了《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改题为《侠女奴》，刊于苏州《女子世界》。19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奚若由英文转译的《天方夜谭》四册。此后，虽然有很多种译本出现，但大多仍是从英文、日文转译而来，且一般为节译或选译。从阿拉伯文直接翻译《一千零一夜》的是纳训先生。他于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在埃及留学时开始翻译这部著作，1947年回国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以《天方夜谭》的书名出版五册。

进入20世纪之前，中国出版了中世纪阿拉伯诗人蒲绥里的长诗《盖绥迪·布尔德》（即《先知的斗篷》）。这部赞颂穆罕默德生平的杰作是在阿拉伯世界被广为传诵的诗篇，深受阿拉伯世界人民的喜爱，甚至在民间被人们尊奉为可以逢凶化吉的圣诗。云南经师马复初（德新）在1848年归国时带回了这部诗集和注文。后来，马复初在讲课之余开始口译，由弟子马安礼笔录，并加以润色。马复初死后，马安礼与马学海合作，完成译本。这一译本仿照《诗经》的风韵，以四言、六言、八言诗句，拍合“雅”、“颂”正声，又名《袞衣颂》，并于1896年在成都刻成木版问世，为中阿对照形式，从而开始了把阿拉伯诗文翻译成中文的历程。

阿拉伯经学典籍和文学作品的翻译，将源远流长的中阿文化交流事业推向了一个崭新而辉煌的阶段。这对于沟通中国和西亚的文化、加强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相互了解和友好交往，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

东南亚是我国的近邻，是与我国有悠久交往历史的友好地

区。我国不仅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地域相连，且与他们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关系。自唐朝以来，就有日益增多的华人移居东南亚定居。鸦片战争以后，形成了华人移居海外的浪潮，其中移居东南亚的华人每年有10万人左右。华人移民不仅带去了中国传统的生产技艺和劳动经验，为当地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也带去了祖国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成为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建立友好关系、开展物质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这种彼此的文化交流，大大地促进了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文化发展，中国人民和东南亚各国人民也在相互交往、相互沟通、相互学习的过程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

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主要是经过南方陆上的丝绸之路和南海海上的丝绸之路，进行物质、精神、制度文化等各个层面的交流，而当时处于世界文明高势位的中国古代文化不论在哪个方面，都明显高于科技、文化都较为落后的东南亚各国。所以，中国与周边东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主要是单向的，即中国的传统文化较多地影响东南亚各国的文化发展，而相对较少逆向影响。当然，在日益频繁紧密的交往中，东南亚各国的一些先进文化因素，也必然会影响到中国文化，并发生渗透、融合，从而补充和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

1. 中国与印尼的语言、文学交流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移居印度尼西亚人数增多。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同印尼人民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为印尼的开发和建设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同时也把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带到了印尼。随着华侨在当地定居人数的增多及其活动范围的扩大，他们所带去的中华文化对印尼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在历史上，中国的语言文字对印度尼西亚的影响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印度尼西亚语是以马来语为

基础发展起来的。在形成统一的民族语言——印度尼西亚语之前，马来语有中华—马来语、廖内马来语、巴东马来语、棉兰马来语等的分别。中华—马来语是印度尼西亚语的一个重要分支。“十九世纪中期，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一带的土生华人创造了‘中华—马来语’”。^①“中华—马来语”的基本语法属于马来语（印度尼西亚语），其中包括很多闽南语借词。本来，印度尼西亚语中已有丰富的人称代词，但雅加达的劳动人民仍喜欢用闽南语中的“gua”和“lu”作为第一人称“我”和第二人称“你”的代词。印尼语中有相当大数量的汉语借词，从 8 本主要的印尼语、马来西亚语词典中核查，至少有 500 多个汉语借词。如果扩大到报刊、杂志、小说及日常会话中，则估计汉语借词已超过 1300 个。这些汉语借词中，绝大部分是闽南语词汇，如“茶碗（cawan）”、“福气（hokki）”、“荔枝（licí）”、“楼顶（loteng）”、“清明（cembeng）”^②等。“中华—马来语”的形成和丰富为统一印度尼西亚语起了重要的作用，也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45 年，印度尼西亚独立以后，借用了大量的中国闽南方言词汇的中华—马来语被融入印度尼西亚语中。

19 世纪中期以后，印尼华侨开始创办报刊，但数量较小。印尼华侨报纸的大量出现，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随着华侨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华侨革命团体的建立而产生的。华侨报纸可分为当地出生的华裔主办的印尼文报刊和以新客华侨为主出版的华文报刊两种。最早由华人担任主编的印尼文报纸是 1885 年三宝瓏出版的《马来鼓声》。这可以说是第一份读者主要为华裔的印尼文报纸。此后，印尼华侨又陆续创办和经营了多种印尼文报

^① 王介南：《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志》，第 271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② 温广益等：《印度尼西亚华侨史》，第 137 页，海洋出版社 1985 年版。

刊。如 1901 年创办的《理报》、1902 年创办的《泗水新闻》、1903 年创办的《商业新闻》(1907 年改名为《商报》)、1904 年创办的《译报》(中文、印尼文混合版)以及 1910 年创办的影响整个荷属东印度的《新报》等。这些报刊是近代华人主编和创办的第一批印尼文报刊。它们的出版对宣传和普及中国的历史、语言、文化,开阔华人的视野并增加他们的爱国情感,有着重要的作用。新客华侨创办的华文报纸,主要是为了满足不断增多的新客移民的需要,因为他们大多不懂印尼语。印尼的华文报纸的创办,还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1908 年,为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在爪哇泗水发行了《泗滨日报》。次年,又由巴达维亚华侨书报社创办了《华铎报》,积极宣传民族主义和中国文化,成为广大华侨的喉舌。除此之外,在辛亥革命前后华侨创办的报刊还有:1909 年创办的《爪哇公报》、1914 年创办的《苏门答腊民报》等。这些华文报纸不仅唤醒了华侨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同时也有力地支持了印尼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

印尼土生华人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到印度尼西亚,是中国和印尼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及整个亚洲都兴起了民族主义运动,这就促使土生华人更加渴望了解祖国、了解祖国的文化。但由于他们中的大部分已不懂汉语,因而用马来语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便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而且,土生华人拥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得以创办许多报纸杂志、出版社、印刷厂等,这就成为他们进行文学活动的重要载体和阵地。他们把中国的各种宗教典籍、古典小说、历史小说、爱情小说、武侠小说等翻译成中华—马来语、爪哇语、望加锡语等多种方言,介绍给印尼的土生华人读者。他们的译作不仅数量非常多,在东南亚首屈一指,而且内容极为丰富。在翻译的作品中,有宗教典籍和修身典籍,如:《大圣末劫真经》、《三字经》、《道德经》、《易经》等。历史小说有:《西周列国传》、《三国演

义》、《精忠岳传》等。武侠小说有：《昆仑七侠》、《火烧红莲寺》等。爱情小说有：《山伯英台》、《西厢记》、《琵琶记》等。神怪小说有：《聊斋志异》、《封神演义》等。这些译作，不仅受到土生华人的喜爱，也受到印尼当地人民的欢迎。例如《三国演义》中的一部分曾被《马来号角》报连载。《西游记》中的“李世民游地府”一段就至少有六种译本。爱情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更是家喻户晓，有多种译本和版本，20世纪30年代还被搬上了银幕。中国的武侠小说经过印尼土生华人作家的翻译，逐步发展成为独具印尼特色的武侠小说系列，深受印尼人民的欢迎，并深深地影响到了印尼文学的发展。土生华人通过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丰富了印尼华侨的文化生活，促进了印尼人民对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的了解，从而也影响和推动了印尼土著文学的发展，加快了中国和印尼的文化交流。

2. 中国文化对泰国文化的影响

泰国位于东南亚大陆中央，是中西交通要冲。泰国原名暹罗，是一个由泰族为主体民族组成的国家。尽管中国和泰国并不接壤，但地理位置的邻近为中泰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中泰两国的友好接触和贸易往来有上千年的历史，中国古老的文化对泰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直至近代，中国和泰国仍保持着良好的文化交流关系，互相融合，共同提高，极大地推动了两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鸦片战争之后，曼谷王朝曾四次向清政府朝贡。到1853年以前，中国仍是泰国的主要贸易对象。后来，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和扩大，中泰关系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1882年暹罗正式放弃对华的朝贡义务，宣布西方制度中的国际关系”。^①从此，中泰之间的官方贸易中断了一个世纪之久。但是民间贸易仍在继

^① 葛治伦：《1949年以前的中泰文化交流》。

续发展。华侨商人在泰国的商业活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他们与泰国人民长期居住在一起，和睦相处，互相通婚，促进了两国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中泰两国在农业技术上有着广泛的交流，中国人民的劳动经验也在泰国得到推广和普及。泰国的农业生产由于国家长期实行封闭政策及国内斗争和对外战争没有得到正常的发展，而日趋衰落。曼谷王朝刚刚建立时，大批中国潮州的移民来到泰国。他们带来了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使泰国的种植农业不断扩大。潮州人主要从事胡椒的培植，其产量占全国总量的90%。到1910年，又有大量华人加入到胡椒培植业中，使胡椒成为泰国出口的重要项目。另外，中国潮州移民还把中国的农业技术应用于甘蔗的种植，并迅速使甘蔗成为泰国重要的出口商品，中国便是泰国的主要销售市场。1910年以前，中国的潮州移民和泰国人民共同为泰国的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促进了中泰两国的贸易往来。在泰国的广大农村，到处都有从事各种农业生产的中国移民。他们同泰国人民共同生活、共同生产，在生产劳动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世纪末期，随着泰国改革的深入，其国内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我国因遭受侵略，东南沿海的居民迫于生计而大量流入泰国。他们大多在碾米业、建筑业、运输业、采矿业等部门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和他们所带去的中国先进的生产经验，为泰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国的建筑艺术在泰国流传很广，受到泰国王室和人民的欢迎和喜爱。随着中国移民的大量迁入，中国的建筑艺术也随之在泰国流行起来。泰国的很多宫殿、庙宇、城墙及其他一些大的建筑物等，大部分是由中国工匠负责建造的，其样式、图案及所用材料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建筑的影响。受中国建筑影响最大的是泰国大城府挽巴茵御苑。拉马五世在位时，将原有的御苑行宫扩建，其构造、样式完全仿照中国北京故宫的式样建造。其主体宫殿是红墙绿瓦、雕龙画栋的中国式建筑。宫殿的“屋脊镶嵌

着丹凤朝阳和双龙戏珠的模型，陪衬着琉璃瓦的飞檐，宫门口有一面凤翔龙舞的大照壁”。宫内的“门窗屏风全是金漆木雕”，并绘有“古典人物和山水风景”。所有这些，无不显示出中国建筑的独特风范。而且，宫殿内部陈设也仿照中国的故宫：在正殿设有“龙椅”，在天明殿放着“龙床”等等。就连正殿两侧厢房的陈列摆设也大都是出自中国的书画、瓷器、镜台等。^①拉马五世于1899年建造的曼谷最新佛寺之一——云石寺也深受中国寺院的影响，其类似中国寺院的屋顶镶着琉璃瓦，玉宇飞檐，很有中国建筑的气魄。

中国瓷器对泰国的陶瓷烧制技术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8至19世纪，泰国王室和民间所用的瓷器大多数都是向中国定制的。一直到20世纪初期，泰国仍是中国陶瓷出口的最大顾客之一。泰国人民日常使用的瓷器，虽然图案样式设计多为暹罗艺术式，但都是用中国技术制造的，出自中国工匠之手。^②

泰国是以佛教为国教的国家，全国95%以上的人民信奉佛教。泰国的具有中南半岛特色的小乘佛教对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有极其深刻的影响。而中国则是一个很早就信奉大乘佛教的国家。早在13世纪以前，中国的大乘佛教就与泰国的小乘佛教发生联系。到了近代，中国的一些著名僧人仍纷纷南渡，作为交流使者 and 媒介促进了中泰两国的宗教交流。清代同治年间，续行和尚南渡泰国，受到泰国人民的欢迎和尊敬。他在曼谷创建并主持了永福寺、龙莲寺等著名的中国寺院，并开创了华僧宗派——华宗。从20世纪30年代起，大乘佛教在泰国有了较大的发展，很多佛教组织相继成立。

作为中泰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对泰国的文学、戏剧发展也有很深的影响。特别是18世纪后半期

① 中山大学：《泰国简史》，第59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② 参见：朱杰勤：《中外关系论文集》，第22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以来，随着中泰两国经济贸易交往的日益紧密，中国的文学成果也受到泰国人民的关注和喜爱。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金瓶梅》、《聊斋志异》、《封神演义》等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相继被翻译到泰国，并广为流传，家喻户晓。尤其是《三国演义》的泰文译本曾于1914年获得泰国文学学会优秀译作奖。泰国王室把《三国演义》视为一部不可多得的研究治国用兵之术的珍品，被列为泰国将领学习战略战术的必读书和学生的历史教科书及作文范本。拉马三世（1825—1851年）在位时，泰国首次出现了印刷所，为文学作品的出版和流传创造了条件。拉马五世（1868—1910年）执政时期，泰国出现了专门出版中国古典历史小说的印刷所。这样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得以更加广泛地流传，并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可以说，从拉马三世到拉马六世的百余年间，是泰国翻译中国传奇小说的鼎盛年代。

中国的古典小说在流传的百余年中不仅深受泰国人民的喜爱，同时也给予泰国文学以深刻、巨大的影响。无论是从文笔、修辞还是从情节、内容来看，泰国文学中都有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子。如《三国演义》的文笔常被泰国作家模仿，从而丰富了泰国文学的创作技巧。中国古典小说中的成语也常常出现在泰国的文学作品甚至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如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吉人天相等。而中国古典小说内容中的精彩部分也常常被泰国文学借用。另外，由于中国古典小说情节生动，引人入胜，许多泰国作家将它们改变成歌剧、舞剧，在泰国表演。如帕耶玛吉特列塞所编的舞剧取材于《三国演义》中的“废汉地陈留践位”至“灵帝建造毕圭苑”，“周瑜决策取荆州”以及“玄德智激孙夫人”等。1918年出版的笔名帖功编写的歌剧“刘皇叔洞房续佳偶”至“柴桑口卧龙吊丧”，也取材于《三国演义》。

总之，中国的古典文学以其独特的魅力，深入泰国人民的生
活，并给泰国文坛注入了新鲜的气息。中国的古典文学及随后传人的中国散文小说，促进了中泰两国的相互了解和交流，增进了

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1875年，中国的潮剧团首次到泰国演出。从此以后，潮剧团纷纷在泰国成立。20世纪初，泰国的潮剧达到鼎盛时期，仅曼谷一地就有很多家潮剧团。他们每天昼夜演出，气氛极为热烈。而且，各潮剧团还经常到各城镇参加演出，受到泰国人民的欢迎和喜爱。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医药技术也在泰国得到发展。泰国王室对中国的医术和草药十分推崇。1906年，泰国华人在曼谷创办天华医院和广肇医院，泰国国王亲临天华医院为其主持开诊仪式，并赠送名贵礼物。此后，中医在泰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3. 华侨与马来西亚文化

马来西亚位于中国通往印度的海上要冲，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和印度交通的中枢。马来西亚与中国交往的最早记录可追溯到汉代。《汉书·地理志》中有关汉使行程的记载中写道：“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据考证，都元国位于马来西亚丁加奴州的龙运。《梁书》中所记载的狼牙修国，也在马来半岛上。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与马来西亚人民有了密切的交往。特别是华人的移人及他们在马来西亚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对马来西亚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华人大量移居马来西亚，始于19世纪初，而且多以“卖猪仔”的方式进行。鸦片战争以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政治混乱，经济动荡，人民过着贫困的生活。而在临近的东南亚各国，帝国主义大量开采锡矿，种植橡胶，因而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样，中国沿海各地的劳力迫于生计，背井离乡如潮水一般地涌入东南亚，其中很多人来到马来西亚。他们人数众多，规模庞大，而且持续时间非常久。此外，还有很多穷苦农民被殖民者当作“猪仔”卖给矿场和橡胶园的老板作苦力。19世纪三四十年代，仅卖到檳城一地的“猪仔”每年就有大约二三千人。“到二十世

纪初，移居到马来亚及北〔婆罗湾〕的华人已达近百万之多”，^①契约华工作为苦力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并受当地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他们在马来西亚种胶开矿、修路筑桥，与当地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因他们拥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劳动经验，并能吃苦耐劳，契约期满后取得自由且留在东南亚的华工生活状况和经济地位才渐有改善。他们在马来西亚几乎从事所有的行业，并与当地人共同生活，互相学习，逐步成为当地的少数民族。

锡和橡胶是马来西亚两大物产，而其发展和种植也主要归功于华侨的辛勤劳动。马来西亚的矿业以锡矿为主，其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1/3以上。1848年，马来人在太坪附近发现丰富的锡矿，很多华人迅速前来开采。到1870年仅太坪一地就有4万多华人。当时，华人是马来西亚锡矿开采的主要投资者。1900年，在马来西亚的锡矿总产量中，华人锡产量占95%。马来西亚的农作物包括橡胶、椰子、油棕、胡椒、丁香、蔗糖等，其中橡胶的比重最大。在橡胶的试种和种植过程中，华工起了非常大的作用。1904年，北婆罗洲的10万英亩橡胶园，大多掌握在华人中小园主的手中。华侨陈齐贤和陈嘉庚便是马来西亚橡胶业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他们为马来西亚的橡胶业发展乃至整个经济的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此可见，“英属马来亚的繁荣是建筑在中国劳工上面的，这种说法毫不过分”。^②

随着华人的大量移入，中国传统的医药和医学技术也传到了马来西亚，受到华人和当地各民族人民的信赖和喜爱。在马来西亚的中药药方中，常常引用中国的中草药，如良姜、甘草、米酒、灵香草、桂皮、茄根等作为配药。同时，在马来西亚的中药店，也常常出售马来西亚的草药，如马齿苋、丹草、伤寒草、蛇

^① 钱文宝、林伍光：《马来西亚简史》，第67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② L·A·米尔斯：《英属马来亚，1824—1867》。

百子等。在马来西亚民间，人们还有把中草药和马来西亚草药混合服用的习惯。可见，在医药文化方面，中国与马来西亚也有着极其有意义的学习和交流。

在19世纪末以前，移居马来西亚的华侨大多为男性。开始时因其地位低下且生活困苦，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与巴塔克和巴厘女奴通婚。随着他们在马来西亚生活状况的改善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渐渐与当地的马来妇女通婚，并逐渐形成了土生华人社会，即巴巴和因社会文化群。这种紧密的血缘联系使中马人民的友谊纽带更加牢固了。为了谋生和进入当地社会，土生华人创造了巴巴马来语（或称华裔马来语）。巴巴马来语中包括大量的汉语借词，其中主要为闽南方言。20世纪初以前，大部分马来西亚土生华人，特别是妇女只懂巴巴马来语。开始时，巴巴马来语仅限于日常口语，19世纪后期，采用拉丁字母，才将其发展成为文字，从而逐渐形成中国和马来文化相糅合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马来西亚土生华人文学。

马来西亚的华人占全国总人口的40%以上，华文教育也有近百年的历史。19世纪后期，清政府逐渐改变了以往视海外侨民为弃民的态度，推行保护华侨的政策，华文教育由此兴起。有史料记载的第一所华文私塾是1819年在檳城创办的五福书院。1854年闽侨陈金声创办了萃英书院。到1884年，海峡殖民地共有华侨学校115所。1888年，闽粤华侨共同创办的南华义学是马来西亚最早设立的华文学校。这些学校大多以中国各地的方言为教学用语，以中国的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主要教学内容来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20世纪初，清政府废科举办新学的思潮也影响到东南亚各国的华侨，他们也纷纷开始兴办新学。1904年，马来西亚的第一所新式学校——中华学堂诞生。此后，各地新式学校大量涌现，迅速代替了旧式私塾。1907年，陆弼臣等人创办了吉隆坡尊孔学校，1908年，成立了吉隆坡坤成女校。1912年，亚庇设立乐育小学，这是沙巴最早的华文小

学。在小学之上设立中学始于1916年吉隆坡的尊孔学校。因当时英属马来西亚政府对华文学校采取不干涉政策，所以华文学校发展很快，1911—1920年间马来西亚华校共有181所，海峡殖民地有华校313所。这些华文学校的教学模式、学制、课程设置、教材选用等，均仿照中国。课本、仪器以及教师也大多来自中国，这些华文学校的办学经费也都由华侨捐赠。华人华文教育的创办和兴起，是华侨在马来西亚生活和经营的需要。不仅有助于华侨知识视野的开阔，自身素质的提高，而且有助于加强华侨对民族文化的了解，增强华侨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和马来西亚的文化交流。

马来西亚是华文报刊的最早发源地。马来半岛最早出版的华文报刊是1815年创刊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1828年又出版了《天下新闻》。到了19世纪晚期才出现了由华侨创办的报纸。1896年林华谦等维新派华商创办了以宣传变法的政治主张及登载当地经济新闻为主要内容的《檳城新报》，这是当时新加坡以外的马来亚地区惟一的一份华文报纸。辛亥革命以后，为适应形势的需要，马来亚的华文报纸迅速兴起，如：1894年的《东星报》、1896年的《南洋时报》、1909年的《吉隆坡日报》、1910年的《光华日报》、1917年的《南洋华侨杂志》等。这些华文报刊不仅有力地宣传了新思想、新观念，配合了革命的发展，也丰富了华人的文化生活，为他们进行文学活动提供了阵地。与此同时，由土生华人创办的出版社也纷纷出现，如古友轩、金石斋等，这就为马来西亚的华文报刊和华文文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和华文报刊的兴起与发展，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学事业也开始兴起。华人是马来西亚的第二大民族，在华人社会里仍保持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大多喜爱中国的古典小说。从19世纪末开始，一些土生华人翻译家开始将中国的一些著名的历史、神怪、武侠等古典小说翻

译成马来文。据可查史料，曾锦文（1851—1920）是第一个将中国古典小说翻译成马来文的华人作家。他翻译的古典小说主要有《三国演义》、《聊斋志异》、《水浒传》、《西游记》、《今古奇观》等。其他作家也翻译了如《包公案》、《二度梅》、《精忠说岳》、《反唐演义》、《七侠五义》等。这些小说，不仅受到华人的喜爱，也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受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也掀起了华文新文学运动。一些华文作家开始用华文白话文创作一些反映当时社会状况的小说、诗歌和散文作品。其中陈桂芳的小说《人间地狱》和李西浪的中篇小说《蛮花惨果》最为典型。

另外，中国的移民移居马来西亚的同时，也从他们的故乡带去了各种风俗习惯和社会风尚，如舞狮、闹元宵、清明节扫墓等。这些中国的传统文化给马来西亚社会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同时也促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学习和交流。

可见，在中国和马来西亚的文化交流过程中，华侨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他们用辛勤的劳动和过人的智慧，在中马两国之间架起了一道绚丽的友谊之桥。

四、中非文化交流

中国地处亚洲东部，与非洲远隔万里。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与非洲有着广泛的交往和联系。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以惊人的毅力和卓越的智慧维系着他们之间的友谊。

1. 近代中非关系的历史背景和特点

近代中非关系是在殖民主义者入侵亚洲、非洲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以后，便残暴、疯狂地掠夺、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国家。很多亚非国家在西方殖民者的铁蹄下丧失了独立自主发展的权利，自然，这些

国家之间的自由平等的经济、文化交流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中国和非洲的交往也难于幸免。

近代中非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中国和非洲各国均丧失了独立，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独立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和一些殖民地国家之间的交往。它们都没有真正独立自主的权利来自由地考虑双方的友好交往。1840年开始，中国逐步陷入了以英国为先的西方殖民者的控制之下，并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时，非洲各国也处于同中国一样的境遇，或者更加悲惨。阿扎尼亚人、莫桑比克人和刚果人无权参与自己的国事，而由英、美、葡、德等国家操纵。同时，中国和非洲各国远隔重洋，新航路和交通要道又都被紧紧地控制在殖民者手中，中国和非洲的人民要想互相往来只有乘坐殖民者的船只。这样，不仅中非人民的友好交往受到极大的限制，它们之间有着悠久历史的贸易往来也由于受到殖民者的掠夺和剥削而受到破坏。有人曾经说过：“一个积弱不振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和受殖民主义统治的非洲是不可能建立真正友好合作关系的。”^①

近代中国和非洲各国的交往之路在殖民者的统治和侵略下变得荆棘丛生，充满着艰辛险阻，但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冲破了重重障碍，建立了比古代更加深层次的联系。在地域上，突破了原来的仅限于与北非和东非交往的限制，与西非、中非、南非等地区也有了直接的交往。在深度上，也不仅仅限于双方的民间交往或者官方的使者往来，而是开始签约建交，这样不仅为双方贸易的发展创造了便利条件，而且也使双方的人民互相迁徙、定居、通婚成为可能和普遍现象。更重要的是，中国和非洲人民均遭受殖民主义者的压迫和奴役，他们在共同的反抗和斗争中结成了真诚的革命友谊。这是中非人民友好关系的最本质的特征。他们荣辱与共，互相支持，互相声援，共同抗击殖民者的统治。中非人

^① 转引自艾周昌等：《中非关系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民之间的这种可贵的战斗精神和崇高的战斗情谊是近代中非友好交往史中光辉灿烂的一幕。

2. 晚清中国人对非洲的了解和认识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了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历程，中国的社会结构及人们的心理状态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而思考和探索。他们认识到，要想抵御外侮、富国强兵，必须放眼世界，魏源根据林则徐的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又搜集了一些其他资料、著作，于1842年编纂而成的巨著《海国图志》，就是一部影响深远的世界历史地理百科全书。《海国图志》从第三十三卷到第三十六卷，专门介绍了非洲各国的历史地理和风土人情。它将非洲分成东非、北非、南非、西非和中非五个部分详加叙述。《海国图志》征引编译的图书资料有历代史志、岛志，外国的地理、地图等，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根据近代中国人的国外游历见闻编辑而成，其中就有谢清高（1765—1821年）的《海录》。谢清高曾航海到达过非洲，对非洲有实际的了解和认识。^①1848年，徐继畲又刊行了另一部巨著《瀛环志略》。这部手册详细地记述了波斯、土耳其、非洲各国的概况，比《海国图志》内容更加翔实。这本书在1849年初正式刻印出版，是中国和非洲关系研究的开始。此后，李光廷的《亚刺伯沿革考》、郑昌棫的《摩洛哥政要》等都是有关西亚、非洲的历史、文化、现状的专论。

近代中国还有许多学者和官方使者多次访问非洲各国，亲眼目睹了非洲的文化和现状。自18世纪末年开，北非开始引起中国人的关注。中国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马德新曾在阿里统治时

^① 沈福伟：《中国与非洲——中非关系二千年》，第499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

期两次访问埃及。他在《朝觐途记》中详细地记述了在埃及的见闻，特别是阿里改革后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和成功经验。湖北天主教徒郭连城也于1859—1860年两度访问埃及，著有《西游笔略》。他记述了在埃及乘坐轮船、火车的感受以及机制面粉的生产过程。在此书中，他还向中国人民介绍了埃及金字塔及其他古迹。王芝也曾详细地介绍过苏伊士运河开凿的经过和其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而自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后，中国的官员、学者、商人等纷纷取道埃及赴欧，他们在途经埃及时，常常写见闻、抒感想、写议论，而这些精辟之见，多针对中国时事。

在近代，中国人除了游历、了解非洲沿海各国以外，还曾经进入过非洲的内陆地区访问和考察。1877年3月，丁廉和巴仲和乘船离开桑给巴尔，向非洲内陆进发。到丁廉一行（途中巴仲和死于疫症）返回桑给巴尔时，已经经过了一年零八个月。他们途经坦桑尼亚、乌干达等国，沿途考察了东非内陆的地理生物、风土人情，并由丁廉回国后根据日记整理编成《三洲游记》一书。这部书详尽地记录了非洲内陆的有关资料，同时也使中国人对非洲的认识和了解从沿海扩大到了内陆，从表面现象扩大到了社会本质。

所有这些有关非洲的著述，都不仅加深了中国和非洲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认可，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和非洲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特别是一些有关非洲发展和变革的成功经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改革。

3. 华工进入非洲及中非文化交流

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在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下，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非洲也同样遭受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疯狂掠夺。帝国主义发展种植业和采矿业需要有足够的廉价劳动力，但当地的劳动力不能满足他们的掠夺需要。因而，他们就从中国大量地引进华工，用中国的农业工人来代替黑

奴进行艰苦劳动。1860年，英法两国在与清政府签订的北京“续增条约”中，增加了有关招工出洋的条款，这就使罪恶的苦力贸易合法化。从此以后，到达非洲的华工迅速增多，几乎遍及了整个非洲。华工除了从事种植园的劳动以外，还大量地从事开矿、修路的工作。他们参加了很多非洲国家的重要工程建设，为非洲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外有一部分华工在期满后，留在非洲定居，并与当地妇女通婚，为活跃所在国的经济继续努力工作。

尽管中非两地路途遥远，中国和非洲各国又均忙于应付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掠夺，但近代中非之间的官方、民间的人员往来并没有中断。特别是随着19世纪中叶以后，大批华商和华工进入非洲各国，中国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等也传入了非洲，中非之间的文化交流自然会存在。

侨居在非洲的华工、华商和其他华人所到之处，常常会感受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氛围。他们保留了中国的传统风俗习惯和娱乐方式。例如，在德兰士瓦金矿工作的华工，在中国的传统节日期间常常有盛会以示庆祝。特别是在春节期间尤其热闹，通常是张灯结彩，并且搭戏台表演京剧、高跷，举办各种其他的赛会等。还有很多矿区，工人们自己组建了戏剧团，在劳动之余演出传统戏剧，自娱自乐。在非洲的边远旷野里，中国的传统戏剧得到了异国人民的欢迎和赞赏。

近代，中国的饮茶习俗随华工和其他华侨传入了非洲各国，随之茶叶的种植也在非洲得到了推广和普及。移居非洲的华工和华侨中有很多是我国东南沿海各地的农民，他们有精湛的种茶技术和丰富的劳动经验，因而在非洲茶叶的种植和推广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非洲的咖啡饮料也传入了中国，并随后在中国的云南、广东一带栽培。另外，华工和华侨还把中国的一些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的做法和先进的劳动技术传入了非洲各地，而非洲的一些用品、工具也在此时通过商人传到了中国。

由此可见，尽管中非之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因近代殖民者的侵略而受到重重阻碍，但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中华民族和生活在尼罗河流域的非洲人民之间的深厚感情是不能摧毁的。他们之间互相支持、休戚与共的美好情感，永远是中非关系中的宝贵财富。

五、中国与拉美的文化交流

中国与拉丁美洲虽然远隔重洋，又有着不同的文化结构和文化传统，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两地人民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他们冲破了太平洋的阻隔，实现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和拉美的关系有了较大的发展。

19世纪初期，中国已经有少量的华工进入拉美各国。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成千上万的华工开始大量地移民拉丁美洲。移居拉丁美洲的华工、华商和其他华人，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拉美的载体和媒介，他们在移居国的经济、文化活动，不仅繁荣了侨居国的经济发展，也为一些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他们在与当地土著居民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的过程中，传播了中国古老的文化，推动了彼此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增进了中拉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

移居拉丁美洲的华侨，因长期在移居国生产和生活，已在那里发展了自己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圈子，因而他们都把移居所在地看做是自己的“第二故乡”，对那里的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与当地土著居民共同生活、共同劳动，相互了解、相互学习，结成了良好的关系，并且与当地人民荣辱与共，融为一体。他们“无论与哪一个阶层的人相处，关系总是搞得极其融洽”。^①

^① 雷蒙德·特·史密斯：《英属圭亚那》，第179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在 1868 年 8 月秘鲁的一次强烈地震中，居住在利马的华侨尽管生活并不宽裕，但他们还是纷纷向秘鲁全国福利协会捐款，总计达 205.3 万元，表达了真挚的感情。特别是在古巴的独立革命时期，华人更是与古巴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们同古巴革命者一起并肩作战，为摆脱殖民枷锁，争取做人的尊严而英勇斗争，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古巴的独立战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纪念在古巴独立战争中英勇牺牲的中国人，古巴政府于 1931 年在首都哈瓦那的街头建造了一座“旅古华侨协助古巴独立纪功碑”。它的碑座上刻着：“在古巴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逃兵，没有一个是叛徒。”^①中国人的这种崇高品德深受拉丁美洲人民的敬佩与景仰，这也是他们之间团结协作、友好交往的基本形式。

由于旅居拉丁美洲的华侨大多数都是成年单身男子，妇女人数非常少，所以，80% 以上的华人男子都与当地人民包括黑人、印第安人和白人通婚，生育子女，繁衍后代。这样，华人就和当地人民结成了最亲密的血缘关系，而且范围逐渐扩大。到 20 世纪初期的两三代华裔中，绝大多数是混血儿。通过血缘纽带的联系，华裔与拉丁美洲人民有了更加紧密的交往。从 19 世纪后期起，拉丁美洲华裔的生活方式，如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都逐渐与当地人民同化，他们在保持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地吸收当地文化，最终演变成为当地的少数民族。他们在与拉丁美洲人民长期共同的生活里，促进了中拉两地人民的友谊，加快了两地文化的融合和发展。

因长期在异国他乡与其他民族的人民一起生活，很多华人特别是第二三代的华裔逐渐地远离了自己的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失落。教育是传承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重视教育也是华人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为保持和发

^① 《中国与拉丁美洲大洋洲文化交流志》，第 205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一些热爱祖国的拉丁美洲华侨相继创办了一些华侨学校，讲授中国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对华人子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同时开办华文课程，讲授一些自然科学知识。拉丁美洲国家的华侨，相对其他地区数量较少，因而华侨学校也相对较少。1886年华侨在古巴的哈瓦那开办了美洲最早的华校——“中西学堂”，学习中文和西文，开设武备、制造、算学、律例等课程。从此以后，美洲各地的华文学校纷纷兴起。这些华侨学校基本上属于补习性质，除了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历史、地理以外，还要学习当地国家的语言文化。尽管拉丁美洲的华侨教育并不是很繁荣，但华侨学校的建立一方面加强了对华裔的传统教育，同时也加速了中国文化在拉丁美洲的传播。

华侨除兴办华校以外，还在拉丁美洲创办了一些华文报纸。尽管报纸的数量很少，规模也不大，但仍是中华文化在拉丁美洲传播的一个主要阵地。如古巴的《华文日报》（1902）、《民声日报》（1922），巴拿马的《共和报》（中华民国初年），秘鲁的《民醒日报》（1911），墨西哥的《国民日报》（1918）等。这些报纸大多以刊登世界各地特别是中国的新闻为主要内容，同时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当地华侨社团的活动等。这些报纸成为旅居拉丁美洲的华人的精神食粮和华人团体的喉舌，是华人社会交流信息的工具，为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华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随着华工进入拉丁美洲，中国的传统医术也随之传入。中国医术的精湛和中医救死扶伤的优良品质受到了拉丁美洲人民的欢迎和爱戴。在1847年进入古巴的第一批华工中就有一位中医，他医术高明，哈瓦那的居民常常找他看病。根据他的口述整理成的《中国医生——天朝医学概论》在古巴也公开出版发行，流传甚广。1910年，古巴华侨在哈瓦那开设了当地第一家中药店。早在19世纪，一些精通中国医术的中国人，就已经开始在秘鲁开业行医，“华医之术，颇行于彼”。但开始时，华医在秘鲁很受歧视，没有正当的地位。后来，一位中医大夫用中草药治好了秘

鲁医生没有治好的病人，中医才逐渐得到当地人民的信任和尊重，中国的医术也在秘鲁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总之，中国精湛的技术和治病救人的传统品格，为中国与拉丁美洲的世代友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随着华人经济生活的好转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中华民族的民俗文化也在拉丁美洲生根发芽。中国的语言文字、传统节日、民间习俗、宗教信仰等逐渐传入了拉美各国，丰富了当地人民的生括，也促进了中国和拉丁美洲的文化交流。如 20 世纪初，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省的墨西卡市由于居民中华侨占多数，因而汉语——“唐文”成为当地的通用语言。几乎在拉美的每一个有华人居住的城市里，都有一条繁华的、充分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唐人街。在街上，随处可见具有中国风格的建筑和店铺，处处显示着东方风情和中华文化氛围。中国传统的戏剧表演、舞龙灯、饮食等也使众多的拉丁美洲人民领略到了中华文化的独有魅力。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威廉斯在 1974 年访问我国时曾经说过，华工及其后裔“对我们加勒比海地区人口的组成做过贡献”，并“积极地 and 具体地促进了我们的发展：在法律、医学、工商业、教育、体育、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

第十章 海外的汉学研究

一、美国的汉学研究

美国的汉学研究较之欧洲国家起步要晚得多，据史家们考证，最早也只能追溯到 19 世纪中叶，主要原因是美国商业资本和海外传教活动起步比欧洲晚。从 19 世纪上半叶开始，伴随着殖民主义的发展，美国的成批船队驶到了大洋彼岸，商业资本大量向中国渗透。据载，当时“对纽约人和波士顿人的整整一代人来说，到广州或上海比到丹佛或盐湖城去更容易，更加赚钱。19 世纪头 50 年，中国边疆比起美国边疆常常更加吸引人去做生意，就和英国人在 18 世纪遇到的情形一样”。^①正是在这种商业资本不断向中国扩张的背景下，美国的传教士接踵而至。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与外交官合作进行业余学术研究，成为美国早期汉学研究的重要方式之一。1842 年美国第一个研究东方国家的机构美国东方学会成立，先后编辑出版了《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美国东方学会丛刊》和《美国东方学翻译丛刊》，以报道中国的历史、风俗、时事和传教士活动为宗旨，并且创办了东方文献图书馆。所有这些，拉开了美国汉学研究的帷幕。

这一时期，美国的汉学研究机构主要有：

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842 年成立，会址设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由东方学家和业余东方学者组成，会

^① 费正清：“七十年代的任务”，《美国历史评论》，1969 年第 3 期。

长爱德华·谢菲尔 (Edward H. Sheffield)。主要从事东方语言、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设有一个图书馆, 收藏有关东方文化的期刊和专著 2 万余册, 并授予中国艺术研究奖学金。创办的出版物有《美国东方学会杂志》(季刊)、《美国东方丛书》(专著, 不定期)、《美国东方论文集》(不定期)。联系的机构有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国际东方学家联合会等。一般每年春季召开年会三天。

科罗拉多妇女学院 (Colorado Women's College), 1850 年成立, 院址设在科罗拉多州丹佛, 会长为宗教学教授俞检身 (David C. Yu)。主要研究范围是中国宗教、中国政治, 出版俞检身的《世界宗教》, 丹尼尔·洛夫莱斯的《人民战争: 泰国和中国的关系》等。

卡尔顿学院亚洲研究中心 (Asian Studies, Carleton College), 1866 年成立, 地址在明尼苏达州诺思菲尔德, 负责人为巴德韦尔·史密斯 (Bardwell L. Smith) 博士。该院亚洲研究中心为私人经营, 主要用于教学服务。

威尔逊学院宗教研究系亚洲研究协作机构 (Department of Religion Studies, Coordinator of Asian Studies, Wilson College), 1869 年成立, 地址在宾夕法尼亚州钱泊思堡, 负责人为哈里·巴克 (Harry M. Buck), 是一所私立机构。

华人慈善联合会 (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 1880 年成立, 会址在纽约, 会长为钟平·汤姆 (Chung ping Tom), 主要通过教育、慈善、社会和娱乐活动增进文化了解。

美国历史学会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884 年成立。会址在华盛顿, 执行会长为麦克·汤普森 (Mack Thompson)。该协会主要由致力于促进历史研究和收集保存历史原稿的专业历史学家、教育家和其他人士组成。下设委员会有: 美国—东亚关系委员会、历史计量研究委员会、美国历史协会联合会、保护历史学家权利联合委员会、历史学家和档案联合委员会、利特尔顿—格里斯沃尔德基金联合委员会、妇女历史学家委员会等。创

办的出版物有：《通讯》（一年九期）、《美国历史评论》（一年五期）、《会议录》（年刊）等，还出版多种有关历史问题的小册子，并入机构有亚洲历史研究会。一般在每年年末召开一次会议。

国外传教联谊会（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1888年成立，会址在罗伯逊尼亚，会长为欧内斯特·海姆巴赫（Ernest E. Heimbach）。泛联谊会由新教徒传教士组成，最初于1865年成立于英国，是向中国传教的国际教士协会的美国办事处。创办的出版物主要有：《东亚百万民众》（一年六期）、《指南》（年刊），同时也出版传记、教会研究、祈祷书、儿童故事和书籍以及小册子等。

雅礼协会（Yale—China Association），1901年成立，会址在纽黑文，执行会长为B·普雷斯頓·斯考耶尔（B. Preston Schoyer）。该协会由致力于协助中国青年获得高等教育的耶鲁大学校友、基金会长以及其他有关人员组成，由新亚学院（属香港中文大学）提供财政援助，每年授予65名中国学生新亚学院奖学金，并提供4名研究生奖学金给中国学生到美国学习。同时实行雅礼学士计划，从刚毕业的耶鲁大学生中挑选叙述成就或个人造诣卓著的毕业生到新亚学院任教两年。此项计划于1909年在湖南省实行，1950年终止。创办的出版物主要有：《雅礼通讯》（半年刊）、《年度报告》、《雅礼—大陆，1901—1950》，一般半年召开一次理事会议。

康涅狄格学院（College of Saint Benedict），1911年成立，院址在康涅狄格州新伦敦，负责人为布罗德金（E. I. Brodtkin），是一所私立机构。主要研究范围为中国、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

此外，美国还陆续建立了美国现代语言学会（1883年）、美国历史协会（1884年）、国外传教联谊会（1888年）、美国亚洲协会（1898年）等。这些团体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美国汉学研究的发展。

伴随着汉学在美国的兴起，出现了一批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除本书前面有关章节提到的裨治文、丁韪良等人外，比较著名的还有：

卫三畏，早年作为美国基督教传教士来华，1833年至1851年在贵州参加编辑《中国丛报》。1855年至1876年任职于美国驻华公使馆，前后驻留中国40年之久。归国后从事汉学研究，在主持耶鲁大学中文讲座期间，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汉语教研室和东方图书馆。主要著作有《中国总论》、《我们同中华帝国的关系》和《中国历史》，此外还编有一部《汉英拼音字典》等。这些是当时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必备之书。

柔克义 (Rockhill, William. Woodville)，早年就学于法国陆军学校，1884年来华任职于美国驻北京公使馆。1905年任美国驻华公使。1888年至1892年曾两次到中国西藏、蒙古等地进行考察。主要著作有《诸蕃志》，其原作者是南宋赵汝适。原作已佚，今本是从《永乐大典》辑出，近人冯承钧有《诸蕃志注》。此书主要记载了东自日本，西至北非摩洛哥等有关各国风土物产和贸易的情况，是研究宋代经济和交通的重要文献。

恒慕义 (Hummel, Arthur William)，美国莱登大学中国史博士。曾任中国汾州铭义中学英文教员、北京华语学校中国史讲师、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美国学术团体历史会中国研究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远东研究班主任、加利福尼亚大学远东研究班主任。美国东方学会会员、亚洲研究协会会员、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员。主要著作有《清代名人传(1644—1912)》等。

赖德烈 (Latoourette, Kenneth Scott)，美国耶鲁大学博士。曾任学生国外布道自愿运动旅行秘书、中国雅礼书院教员、耶鲁大学传道和东方史教授、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中国研究促进委员会委员、中国雅礼会和湘雅医学院理事。美国历史协会、东方学会、亚洲研究协会会员。主要著作有《早期中美关系史》、《中国的发展》、《中国人的历史与文化》等。

美国的大学是汉学研究的主要力量。最早开设汉语课程的是耶鲁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时间皆在1876年。耶鲁大学还在卫三畏的主持下，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汉语教研室和东方学图书馆。稍后，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也都开设了汉语课程和中文讲座，时间分别是1877年和1901年。美国大学的中文课程，除本国人士任教外，还经常聘请国外知名汉学家前来主持教授，如德国著名汉学家发德（Hirth, Friedrich）于1902年受聘到哥伦比亚大学任中文教授，从教多年，并在美国写作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德国另一位著名汉学家佛尔克（Forke, Alfred）也曾被伯克利加州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并在美讲学多年。他们都是具有很高水平的汉学家，并且成果颇丰。这些学者的加盟，对于推动美国的汉学研究，无疑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图书馆是美国汉学研究的重要依托。因此，中国藏书的发展与汉学研究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1869年，美国政府以种子向清政府换得我国古典经籍《皇清经解》等10种130函，是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第一批中文资料。此外，美国公私各界以各种方式收集中国书籍，如1878年，耶鲁大学得到容闳所藏图书的全部捐赠。1879年，美国国会图书馆从外交官顾顺那里获得在广州盗买的2500册汉、满文书籍。1896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得到傅兰雅的赠书，这批书主要是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时的译书百余种约2500册，内容主要为西方科技著作、武器制造说明书的中译本。1901年，国会图书馆获得柔克义所藏汉、满、藏文书籍。

美国的图书馆收藏有许多汉学书籍的珍本，且各有特色。国会图书馆始建于1800年，是美国最大的图书馆，收藏的汉学书籍中以方志、清史资料为最富。在近4000种方志中，罕见本有80种。中文善本书约2000种，包括宋版11种、金刻本1种、元刻本14种、明刻本1518种、清刻本70种、手抄本140种、其他93种。另有中文文集、别集（以清为主）4700种。哈佛大学从

1879年开始收藏汉学书籍，所藏珍贵书籍有公元975年印行的佛教著作。善本书中有宋版27种，66卷；元版36种，653卷；明版1219种，18013卷；清版1065种，11739卷；手抄地方政府出版物及音乐书籍1103卷；14至19世纪手抄本1128种，41074卷；1580年至1644年闵、凌两家印本、套色版72种，约220卷；拓片300种，400页；方志入藏较多，大都为康、雍、乾三朝印本，计3525种，约35000卷。齐如山所藏中国戏剧和小说近100种，约3000册，26000卷，其中包括1726年用铜活字印的图书集成；丛书别集1400种，60000卷，包括98册《丛书集成》原刻板。此外还有《四库全书》中的两卷原抄本，其中一卷为文渊阁藏书，另一卷属北京翰林院草本，刻于1837年的开成石经等。^①

总之，19世纪的美国汉学，属于草创阶段，还远远落后于法德俄英。其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广泛吸收外国人，特别是欧洲人来从事汉学研究。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汉学才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并建立起自己的专家队伍。^②

二、英国的汉学研究

19世纪下半叶，随着英国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国门，来华的传教士和知名学者近百人，外交官兼学者四十余人。其中涌现出一批汉学家，赫赫有名的理雅各、德庇时和翟理斯就被称为是英国汉学的三大星座。^③

理雅各（Legge, James, 1815—1897年）学习汉语始于其服

^①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所编：《美国中国手册》，第616—6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第15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③ 同^②，第10页。

务于大不列颠博物馆期间，此后来中国，在东方滞留时间很长，曾任澳门英华书院院长。归国后就教于英国的牛津大学，出任第一位汉学讲座教授，并在此执教终生。理雅各倾其精力从事汉学研究，完成了题名为《中国经典》的译作，即《四书》、《五经》的英译本。全书编为28卷，于1861—1886年间出版。理雅各还先后完成了《诗经》、《春秋》、《左传》的英译本。其在牛津大学任教期间还译有法显的《佛国记》、《秦始皇帝》、《离骚》。理雅各的汉文经典成果颇丰，对英国和西方的汉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哲学宗教的研究方面，有一部很重要的译著，就是德国出生的英国哲学家和梵文学家马克思·缪勒（Müller, Friedrich Max, 1823—1900年）于1875—1900年间编辑出版的《东方圣书》。这部译著不仅包括了许多佛教经典，还包括了许多中国哲学宗教经典著作，其译文严谨、词句流畅，虽然亦有不准确之处，但至今仍被汉学学者所重视。

在汉语言的研究和推广方面，翟理斯（Giles, Allen Herbert, 1845—1934年）做出过突出贡献。翟理斯于1867—1893年期间，任职于英国驻华各通商港埠领事馆。1897年接替威妥玛继任剑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其著作有《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宗教》、《中国文明》等，译著有《老子》、《庄子》等。然而翟理斯最重要的贡献是其编纂的、于1892年在上海出版的《汉英字典》，这部字典倾注了翟理斯毕生精力，其晚年曾三次对此书进行修订。翟理斯还提出了一套汉语拼音法，时至今日，翟理斯的汉语拼音法在西方学者中仍有使用的。

英国汉学研究的主要阵地是高等学府，英国最早设立汉学讲座及汉学研究的大学，当属成立于1836年的伦敦大学皇家学院（King's College）。著名学者毕尔（Beal, Samuel, 1825—1889年）于1852年来华学习汉语，1877年任该大学汉学教授。主要著作有《法显、宋云游记》、《佛教经典之连锁》，主要译著有《大唐

西域记》等。伦敦大学带动和促进了英国对中国佛教文献的研究，后伦敦大学成立东方学院，使其汉学研究更具规模，时至今日，仍是英国汉学研究人数最多、范围最广、发展最快的学术阵地。

此后，牛津大学于1876年开设中国语文讲座，前述理雅各为首任教授，他与法国的顾赛芬、德国的卫礼贤被当时欧洲誉称为汉籍欧译的三大师。

剑桥大学也于1888年创设汉学讲座，首任教授是威妥玛(Wade, Thomas Francis, 1818—1895年)，其曾于1871—1883年任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著有《华语入门》等书数种，并自创“威妥玛拼音法”。威妥玛的继任者为前述的翟理斯，他主持剑桥大学汉学讲座30余年。

在英国也有一些非大学汉学教师而从事汉学研究的人，且研究成果颇具水平。如：伦敦会教士伟烈亚力，在华驻留30余年，主要著作有《汉籍解显》(1857年)、《前汉书西域传注释》(1880年)；曾任驻华翻译官、领事的爱尔兰人瓦特斯(Watters, Thomas, 1840—1901年)，主要著作有《老子——中国哲学之一研究》(1870年)、《大唐西域记考释》(1904年)；亨利·玉尔(Yule, Henry, 1820—1889年)，苏格兰人，是英国著名的东方学者，主要著作《中国与到中国之路》，还校译了《马可波罗游记》(1871年)；大不列颠博物馆馆员道格拉斯(Douglas, Robert, 1838—1913年)，主要著作有《成吉思汗》(1877年)，《欧洲与远东》(1904年)等。

总地看，英国的汉学发展起步较慢，中间脱节，后劲不足。在研究途径方面，英国与法、德两国有所不同，它更多的是借鉴已有的汉学研究成果。即使在今天，英国的汉学研究在总体上也称不上是世界最发达的。^①

^① 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第11页。

三、法国的汉学研究

法国虽不是最早与中国开展文化交流的国家，但在19世纪，法国却是汉学大师辈出，使它后来成为欧洲汉学研究的中心。19世纪中叶，著名的汉学家斯达尼拉斯·儒莲（Julien, Stanislas, 1797—1873年），是19世纪初著名汉学家雷缪萨的得意门生，攻读中国语言文字，主持汉学讲座40余年，其汉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译著《大唐西域记》、《桑蚕辑要》、《老子道德经》等内容简明扼要，条理清晰流畅。他还翻译了中国文学作品《白蛇传》、《平山冷燕》、《玉娇梨》等，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儒莲的弟子德理文（Denys, De Saiut, 1823—1918年）翻译了屈原的《离骚》和一部《唐诗》。儒莲的另一位弟子毕瓯（Biot, Edouard Constant, 1803—1850年），著有《中国教育史论》，并成功地翻译了《周礼》。

法国另一位著名的汉学大师沙畹（Chavannes, Emmanuel Édouard, 1865—1918年）曾任法国驻华领事馆翻译官，后接德理文任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他的译著《司马迁史记》五册，约占原著的1/3强，发表于1895—1905年间，为汉学研究的名作。他的著作有《泰山志》、《两汉时代的石画像》、《北华访古录》，这些著作都具有相当的汉学研究水平，并配有精良的图画，引起了许多欧洲读者对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极大兴趣。

正是由于法国汉学研究的发展与影响，这一时期，法国文艺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以中国为题材的或涉及到中国的小说和诗歌。如泰奥菲尔·戈蒂耶（Gauthier, 1811—1872年）于1835年完成的《中国风》一诗，即得到了中国艺术品和法国汉学家译作的启示。他于1846年发表的以中国为题材的故事《水上亭》明显受到《玉娇梨》的影响。他的女儿朱笛特（Judith）1867年以散文诗的形式翻译发表了一本中国古今诗选《玉书》，次年朱笛特

又出版了完全以中国人为角色的小说《皇龙》。这两本书当时都受到了名家的好评。

在汉学研究的影响下，许多法国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对中国文学艺术产生了兴趣，其中包括著名的文学大师雨果、福楼拜。雨果十分喜爱中国的瓷器和漆器，在1851年曾写诗极赞中国的瓷器。1860年英法联军纵火焚烧圆明园，大肆掠夺中国的艺术珍宝，雨果对此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和严正的谴责。在汉学研究的影响下，来华观光或任职的法国作家也逐渐增多，如皮埃尔·洛蒂（Loti, Pierre, 1850—1923年），保尔·克洛代尔（C Claudel, 1868—1955年），维克多·瑟加兰（Segalan, 1878—1919年）等。

法国的汉学研究自19世纪上半期起，由过去的分散状态逐渐过渡到有组织的研究。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了第一个中国与鞑靼满洲语言文学讲座，开汉语教学之先河，也成为法国汉学确立的象征。把对中国的研究列为大学学科，这在西方世界还是第一次。^①该讲座的历任主持教授，均为法国乃至欧洲著名的汉学专家，他们的汉籍译著和汉学著作对推动法国和欧洲的汉学研究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除法兰西学院外，1843年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增设了近代汉语讲座，1884年又设立了远东史讲座。随着中法交流规模的不断扩大，到中国经商、传教和研究中国文学艺术的人才需求不断增加。因此，东方语言学院一直以实用作为自己的教学特点，以教授中文白话文为主、文言文为辅，为法国和其他国家培养了大批实际工作人员和汉学研究人才。

这个时期法国著名汉学家，除上述提到的儒莲、德理文、沙畹以外，还有：

昂都安·巴赞（Bazin, 1799—1863年），巴黎东方语言学院近代汉语讲座的首任教授，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和中国元代戏曲研究家，曾翻译元曲《窦娥冤》、《琵琶记》，编著《官话语法》等。

^① 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第8页。

考狄 (Cordier, Henri, 1849—1925 年), 曾于 1869—1876 年在中国游历和学习, 1890 年与荷兰汉学家施古德共同创办英法德文合刊的汉学杂志《通报》。他熟悉中国的经济、外交、史地, 遂于 1878—1885 年编纂了《汉学书目》, 于 1901—1902 年完成了《1860—1900 年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 晚年完成了《中国通史》四卷。

顾赛芬 (Couvreur, Seraphin, 1835—1919 年), 1884 年编著《法华词典》, 1890 年编著《汉法大字典》。他还编译了《四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仪礼》的法汉对照本。顾赛芬在欧洲汉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戴遂良 (Wieger, Léon, 1856—1933 年), 著有《中国近代风俗志》(1894—1908 年)、《中国之宗教信仰及哲学思潮史》(1917 年), 译有《庄子》、《淮南子》等书。戴遂良与顾赛芬均为传教士, 以河北献县天主堂为中心, 开展宗教活动和汉学研究。

四、俄国的汉学研究

自鸦片战争后, 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而沙皇俄国则踏上了资本主义发展之路, 并与西方列强一道加紧对中国的疯狂掠夺, 这时俄国的汉学研究不免带有与沙皇俄国侵略中国野心相配合的色彩。但在客观上带动了两国经济文化的交流, 推动了俄国汉学研究的发展, 造就了一大批汉学研究人才。

由于俄中两国有着漫长的共同边界, 因此, 俄国的汉学研究有着明显的地域性, 是以西伯利亚为起点, 沿中国东北部地区至新疆一线展开, 特别重视对这些地区自然、地理、历史的研究, 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 居民的风俗习惯进行深入调查。19 世纪前半期以后, 俄国多次派遣东方探险队、旅行团队到中国的边疆和内地进行探险、旅行、考察。如 1854 年天文学家胥瓦尔茨 (Schwartz) 带领探险队, 首先从西伯利亚开始进行天文观测, 进

而深入中国边境地区，大量搜集山川河流等地理研究资料。同时，大批俄国人到中国边境地区和内地旅行考察，记录和掌握了大量的极有价值的材料，写下了一批关于中国情况的研究文章，其中较著名的有：《1864年二次旅行满洲记》（P·A·克罗波特金）；《东亚，主要是满洲及日本的植物概况》（马克西英维奇，1883）；《新疆地质调查》、《辽东半岛南端地质志》（K·I·博格达诺维奇，分别于1892年和1900年完成）；《中国的唐古特·西藏地区》（G·N·坡塔宁，1893年）；《喀什噶尔及昆仑山旅行记》（M·V·彼甫佐夫，1895年）；《中国西部旅行记》（格鲁姆·格尔济达格，1896—1907年）；《中华帝国地理志》（Z·A·马屠索夫斯基，1898年）等。

俄国汉学研究机构主要有：喀山大学的蒙古语讲座，该大学于1837年增设汉语讲座，后移至彼得堡；1899年在海参崴设立东方语学校，后于1902年增设东方学院；俄国在中国东北境内的中东铁路局侧重对北满的研究；其他还有远东研究所、黑龙江地方研究会等机构。

这个时期俄国著名的汉学家主要有：

帕雷底阿斯（Palladius, Kafarov, 1817—1878年），鸦片战争期间，作为俄国第十二届宗教使团团团员首次来华，留华六年，后又作为第十三届和第十五届宗教使团团团长两度来华，1878年死于归国途中。他的译著主要有《元朝秘史》、《长春真人西游记》、《圣武记》、《塞北纪行》等。他的最大功绩是编纂了两卷本的《汉俄大辞典》，收12000余汉字。

扎哈罗夫（Zakharov, Ivan Il, ich, 1814—1885年），1839—1850年作为宗教使团成员留驻北京，1851—1864年任俄国驻伊犁领事。主要著作有：1852年完成的《中国土地所有制》、《中国人口史论》；1875年和1876年分别编纂完成《满汉大辞典》、《满语语法》等。

华西里耶夫（Vasil, ev, Pavlovich, 1818—1900年），1840—

1850年作为第十二届宗教使团团员留驻北京11年。归国先后任喀山大学汉满语教授和彼得堡大学东方学部部长。主要译著有《论语》、《蒙鞑备录》等。主要著作有《中亚东部之历史及遗址》、《中国文学史概论》、《汉字分析》等。

布莱胥奈德 (Breschneider, Emile, 1833—1901年), 作为俄国驻华使馆医师, 自1866年至1888年留华22年之久, 以研究中国植物和中亚历史地理见长。主要著作有: 《中国中古西行旅行家》(1875)、《中世纪中亚与西亚地理与历史》(1876)、《马可波罗北游记疏解》(1876)、《东亚中古史料》(1910)、《中国的植物》(1892)、《欧人在华的植物学发现史》(1898)等。

乔治耶夫斯基, 汉字文字学的专家, 对汉字的音、形、义有深入的研究, 首创以汉字分析为材料研究历史的方法。主要著作: 《中国史初期》(1885年)、《论汉语的基本词汇》(1888年)、《分析汉人的象形文字, 以反映古代中国人民的生活史》(1889年)等。

伊凡诺夫斯基 (Ivanovsky, Aleksei Iosifovich 1863—1903年), 1889—1891年曾到中国东北等地区进行广泛深入的考察研究。主要著作有: 《斯帕法里使节一行》(1888年)、《西南中国的少数民族》(1889年)、《满洲研究》(1894年)等。

波波夫 (Popov, Pavel Stepanovich, 1842—1913年), 随俄国宗教使团来华留驻北京, 后任俄国驻北京总领事。1879年编纂出版《俄华词典》, 后又增订和续完帕雷底阿斯的《汉俄大辞典》, 也曾译注一些儒家经典。

介绍俄国的汉学研究, 还应提及伟大诗人普希金和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普希金自读书起, 就对中国产生了兴趣, 而这兴趣伴随他一生, 从未间断。他的藏书中有关中国的书籍近百种之多, 在他的诗作及文稿中多次提及中国。19世纪30年代他曾给当局写信, 请求随宗教使团到中国访问, 但终因沙皇的拒绝, 他到中国访问的夙愿未能实现。列夫·托尔斯泰不仅对中国感兴

趣，而且对中国的文化、历史、哲学作过深入的研究，这在当时俄国著名作家中是不多的。他阅读了大量的英、法、德文版的有关中国的书籍著作，非常推崇中国的老子和孔子等人，并试图从他们的哲学思想中寻找生活的真理。他欣赏老子的“无为”思想，亲自翻译了老子的《道德经》。他研究孔子，写成了《论孔子的著作》和《论〈大学〉》等。

俄国的汉学研究中，较有成就的是对中国道教文化的研究，19世纪时已有一些著名的代表人物和研究成果，华西里耶夫便是其中一位。他曾在喀山大学语文系东方班学习，1840年到中国，在北京苦学十载，汉语、梵语、蒙语、藏语、满语无一不通，并收集了大量图书资料，侧重研究儒、道、释三教。1850年回国，先后在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任教，后为科学院通讯院士，1866年为院士。其研究成果的代表作是1873年发表的《东方的宗教：儒教、佛教、道教》。瓦西里耶夫不仅个人研究成果卓著，而且还创办了俄国第一所中国学校，培养了不少汉语人才，成为俄国汉学研究的奠基者。

这一时期研究道教文化的代表人物多是传教士，研究的目的或许是为宗教扩张服务，但在客观上推进了俄国的汉学研究。19世纪中叶后传教士有目的地研究中国问题或从事大学汉语教学的现象已很明显。

五、德国的汉学研究

19世纪上半叶前，德国人学习汉文多选择巴黎或靠自学。进入19世纪六七十年代后，随着两国官方交往的开始，直接接触逐渐增多，特别是基于其殖民扩张的需要，在德国掀起了了解和研究中国的热潮，研究中国文化的机构相继建立，汉学书籍和汉学刊物不断增加，也涌现了一批著名的汉学学者，德国的汉学研究，不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水平上，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德国的汉学研究同法、英等国一样，大学居于重要的地位。柏林腓特烈·威廉帝国大学 1816 年开始设立亚洲语言与文学讲座，但那时汉学仅附其中。克拉普洛特（Klaproth, Julius Heinrich）、威廉·硕特、加贝伦茨曾先后任教授主持讲座。至 1893 年因缺继任教授而陷于停滞状态，直到 1913 年正式成立汉学研究所，才恢复了其在德国汉学研究领域应有的地位。汉学研究所首任教授兼所长为荷兰著名汉学家、莱顿大学教授哥罗特（Groot, Jan Jakob Maria de, 1854—1921 年），其继任为福兰格。

柏林大学于 1887 年正式成立东方语言研究所，该研究所以教授语言为主要内容，以培养语言应用人才为目的，分设汉语部和日语部，在此学习的毕业生多任职于外交部。作为著名的高等学府，仅仅限于语言教授和训练，这与当时欧洲蓬勃发展的汉学研究局面极不协调。为了使德国的汉学研究与汉语教学相区别，使汉学与东方学相分离，成为独立学科，许多德国的汉学学者做了不懈的努力，终于 1912 年在柏林大学正式设汉学讲座，首任教授为荷兰汉学家哥罗特。

莱比锡大学于 1878 年开始设普通语言和东亚语言课程，加贝伦茨任教授。莱比锡大学的教学与研究颇具特色，经过多年的努力，最终形成在德国汉学界有一定影响的“莱比锡学派”。

1909 年汉堡殖民学院创办东亚语言与历史研究所，著名汉学家福兰格任教授兼所长。

德国的汉学研究机构，除上述大学外，还应提及成立于 1846 年的专门学术团体“德国东方学会”，虽然汉学在当时并非是该学会研究的主要内容，但对于德国学者由学习研究东方学始，进而涉猎和研究汉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该学会学术期刊《德国东方学会杂志》，自 1847 年正式出版以来，陆续发表了许多汉学研究方面的文章，为德国汉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这一时期，德国著名汉学家主要有：

威廉·硕特 (Schott, Wilhelm, 1807—1889 年), 1832 年任柏林大学教授, 主要讲授阿尔泰语、荷兰语和满语。但硕特一直对汉学充满极大兴趣, 花费大量精力从事汉学研究。1840 年他翻译出版了《御书房满汉书广录》。1849 他的著作《哈拉契丹——西辽出版》。1854 年完成并出版了《中国文学述稿》。硕特的著作和译著对德国的汉学研究颇具影响, 被称为“德国学术性汉学的奠基人”。

加贝伦茨 (Gadelentz, Geory von der, 1840—1893 年), 18 岁开始自学汉语, 1876 年翻译了《太极图说》, 1878 年就任莱比锡大学东亚语言教授, 他的主要贡献是出版于 1881 年的《中国文言语法》, 在这部著作中, 他首次对古汉语语法作了规律性的分析和阐述, 推翻了原西方人认为汉语没有语法规则的断言, 从而奠定了西方人研究汉语语法的基础。

格鲁贝 (Grube, Wilhelm, 1855—1908 年) 本为俄罗斯人, 但长期在德国工作。他是加贝伦茨的得意门生。1883 年开始服务于柏林民俗博物馆, 任东亚部主任, 后兼柏林大学东方语言学院教授。他是德国第一个研究女真文字者, 1896 年发表《女真的语言与文字》。格鲁贝曾于 1897 年至 1899 年在北京居留两年, 完成了《北京民俗学》, 他还翻译过《封神演义》, 编著了《中国文学史》。这几部著作成为格鲁贝在中国文化和文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作, 反映了当时德国汉学研究的水平, 备受西方学者重视。根据其 1903 年至 1904 年在柏林大学讲稿整理出版的《中国的宗教礼俗》成为其留给德国汉学界的遗著。

福兰格 (Franke, Otto, 1863—1946 年), 1888 年作为外交译员来华, 先后任职于北京、天津、上海的德国驻华公使馆, 在华驻留 13 年。1903 年至 1907 年任清政府驻柏林公使馆秘书, 取得柏林大学教授资格, 1909 年汉堡殖民学院创立东亚语言与历史研究所, 福兰格为首任教授兼所长。主要著作: 《中国土地制度论》(1903 年), 《中国史料所见之中亚突厥及西羌民族》(1904

年),《东亚新貌》(1911年)。最使福兰格声名卓著的是五卷本的《中国通史》。

六、日本的汉学研究

日本汉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的,与欧洲的汉学属于同一体系。其创始人井上哲次郎(1855—1944年)、白鸟库吉(1865—1942年)、内藤湖南(1866—1934年)、服部宇之吉(1867—1939年)和狩野直喜(1868—1947年),无一不是从欧洲留学归来。

在日本的汉学界,史学和文学都是经学的奴婢。当“日本汉学”的主体——儒学,向“中国哲学”逐渐“蜕变”时,原来依附于儒教经学的史学和文学,也都开始追求其学术的独立性。但是,日本中国学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成为一门近代科学,并不是直接从传统汉学中承袭的,而是在近代学术发展中,在欧洲史学直接启蒙下形成的。

1887年至1902年,德国兰克(Leopold Von Ranke)学派的主要学者L·里斯(Riess, Ludwig)执教于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为日本传入了欧洲近代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并造就了日本第一批具有近代文化观念的史学家。当时,东京帝国大学的文科,在史学方而有“国史学科”以教授日本史,有“史学科”以教授欧洲史,也包括若干中国史。中学的历史教学,也分为“国史”和“万国史”(即世界历史)。从近代人文科学的角度来说,虽然没有独立形态的“中国史”,但是,这样的学科配置已经意味着与传统的汉学和国学分道扬镳了。稍后建立起来的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正是从世界史的研究中分化出来的。

日本中国学界是把中国历史研究归属于“东洋史学”的。在日本人心目中,所谓“东洋”,指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国家与地区。日本最早用“东洋史学”概念来替代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是

在中等学校中发展起来的。1894年，根据那珂通世、三宅米吉等教授的建议，在日本中学中设置了“东洋史”，实际上这是一个以中国历史为主要内容的极为宽泛的范畴。日本帝国大学内设立“东洋史学”是由京都大学开始的。1907年，京都帝国大学创立“史学科”，从中设立“东洋史学第一讲座”，由内藤湖南主持，1908年，又设立“东洋史学第二讲座”，由刚从中国回国的桑原隲藏博士主持。

东京帝国大学曾于1904年进行学科改制，文科从九年科制改为哲学、史学、文学三学科制，在史学科中分设国史学、支那（中国）史学、西洋史学，但这是不定期的讲座。翌年，即把以前的“汉学支那语学讲座”分解为“支那哲学、史学、文学”第一、第二、第三讲座，由星野恒、市村瓊次郎、白鸟库吉、那珂通世等教授担任“支那史学”课程。这是一个新老派学者的混合阵容。星野恒把孔子视为神圣，把“孔子研究”视为亵渎；而白鸟库吉则以充满疑惑的眼光观察孔子，认为孔子膜拜的所谓“尧舜”是根本不存在的。要使“中国史学”成为近代科学，就必须从观念和方法论上摆脱传统史学的羁绊。因此，在这一领域内，资产阶级性质的怀疑主义史学的出现无疑是不可避免的，它为近代的中国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白鸟库吉是怀疑主义史学的杰出创始者，他的“中国史观”便是近代日本中国学界在中国历史研究方面所获得的第一个体系性成果。白鸟库吉是日本中国学界批判主义的先驱。

1909年8月，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兼任教授、44岁的白鸟库吉，在东洋协会评议委员会上发表了题为《支那（中国）古传说之研究》的极为著名的演讲，对儒学经典特别是孔子本人极为赞赏的尧舜禹三代的真实性，提出了强烈的怀疑。这就是日本中国史学史上著名的“尧舜禹抹煞论”。自1909年这个理论被提出后，几经论驳，更趋完整。1915年，他在题为《儒教在日本的顺应性》的论文中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结论：中国古史

上的尧舜禹是中国人理想中的人物，是一种偶像崇拜心态的表现。由此，白鸟库吉强烈否认上古三代的存在，从而动摇了儒学的基础，在中国学研究中树起了怀疑主义的旗帜。在“中国历史”近代性研究确立的过程中，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煞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附录一：晚清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大事年表

-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 林则徐在广东主持禁烟，为了解西方，组织人将英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译出，名为《四洲志》。此书介绍了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情况，是了解“夷情”的一部比较系统的书籍。
- 郭实腊编辑的《贸易通志》出版，此书是鸦片战争前中国人见到的较为详细地介绍西方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的著作。
- 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 中英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清政府被迫割让香港，开放五口。此对鸦片战争以后西学的传播产生重大影响。
- 马礼逊学堂由澳门迁至香港，容因为六学生之一。
- 魏源编成《海国图志》一书50卷，1847年扩大为60卷，1852年扩大为100卷。
- 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 英华书院由马六甲迁至香港，印刷所随之迁移，翌年更名为英华神学院，1856年停办。
- 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在上海成立墨海书馆，麦都思主持，1860年以前对出版西学书籍有着重大影响。
- 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 清政府允许在五口通商地区建教堂、医院、学校。英国女传教士爱尔得赛在宁波创办女塾，是为近代外国人在华设立最早的教会学校。
- 英国传教士魏林在上海设立仁济医院，

- 是为上海第一家西医院。
- 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 美国长老会在澳门设立的印刷所是年迁至宁波，传教士柯理负责，名为华花圣经书房，出版宗教读物和西学书籍。1860年迁至上海，发展较快，对西学书籍的出版有着较大的作用。
- 美国长老会在宁波设立崇信义塾，1867年迁至杭州，易名育英书院，此为之江大学的前身。
- 1847年（清道光二十七年） 容闳等三名在马礼逊学堂求学的学生，随校长布朗赴美国留学，容闳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
- 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哈巴安德将其在澳门所办的寄宿学校迁至广州，是为广州第一所基督教寄宿和走读学校。
- 1848年（清道光二十八年） 裨理哲编写的《地球图说》在宁波出版，介绍各国风土人情。
- 徐继畲写成《瀛寰志略》，刊行问世。
- 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 林鍼的《西海纪游草》刊行问世，这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本中国人游历西方的笔记。
- 英国传教士合信著《天文略论》在广州出版，美国传教士哈巴安德著《天文问答》在宁波出版，是为近代中国最早介绍西方天文学的入门著作。
- 1850年（清道光三十年） 外国人在华创办的最有影响的英文报《字林西报》在上海创刊，初名《北华捷报》。
- 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夫人在上海创办裨文女塾，后称裨文女子中学。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麦利和夫人在福州创办女塾。
- 1851年（清咸丰元年） 合信著《全体新论》在广州出版，此为近代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的著

- 作。美国传教士玛高温著《博物通书》在宁波出版，此书为最早向中国介绍电报知识的书籍。
- 1852年（清咸丰二年） 外国人创办的较有影响的中文报刊《遐迩贯珍》在香港创刊。
- 1857年（清咸丰七年） 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在上海创刊《六合丛谈》，介绍宗教、科学、文学与新闻，是近代上海第一份综合性杂志。
- 1858年（清咸丰八年） 由伟烈亚力口译、王韬笔述的，近代第一部译介西方力学的书籍《重学浅说》出版。合信的《妇婴新说》、《内科新说》在上海出版，是为近代中国关于妇科、儿科的最早的西医书籍。伍廷芳在香港创办近代中国人的第一份报纸《中国新闻》。
- 1859年（清咸丰九年） 翰林院编修郭嵩焘奏请咸丰皇帝设立外语学校。
李善兰与西人合译的《代数学》、《代微积拾级》、《重学》、《谈天》以及《植物学》出版，它们都是近代中国翻译介绍该学科知识的第一部书籍。
- 1860年（清咸丰十年） 美国长老会主持的华花圣经书房由宁波迁至上海，易名美华书馆。
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来华，后长期在沪从事文字出版和教育，为晚清传播西学的最著名人物之一。
- 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 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咸丰皇帝谕准挑选八旗子弟中聪颖者学习外语。
冯桂芬写成《校宾庐抗议》一书，在《采西学议》中提出学习西学的主张。
上海徐家汇法国天主堂创设震旦博物院，陈列动植物珍异标本和贵重书籍。
英国传教士傅兰雅来华，长期在上海翻译

- 西书，为晚清传播西学最著名人物之一。
- 1862年（清同治元年） 京师同文馆正式开学，此为清政府开办的第一所近代外语学堂。
- 1863年（清同治二年） 上海添设广方言馆。
美国传教士狄考文来华，其为山东登州文会馆的创始人。
- 1864年（清同治三年） 广州同文馆成立，设有西文、汉文、算学等课程。
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充任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其所译《万国公法》刊行，这是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国际法译作，也是京师同文馆出版的第一部译著。
美国圣公会传教士裨治文夫人在北京设立贝满女学堂，后为贝满女中。
德国传教士花之安来华，为东西方文化互介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 1865年（清同治四年） 英华书院在上海创办，傅兰雅为第一任校长，这是晚清上海著名的外语进修学校。
英国传教士湛约翰在广州创办中文新闻周刊《中外新闻七日录》，以报道中外新闻和介绍西方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
江南制造局在上海开办。
- 1866年（清同治五年） 总税务司赫德告假回国，知县斌春和同文馆学生风仪等三人随同赴欧洲考察，这是同文馆学生游历外国之始。
福州船政学堂创办，此为培养海军人才的新式学堂。
总理衙门奏请扩大京师同文馆规模，拟增设天文、算学两馆，招收满汉科举正途出身人员，遭京师士大夫的强烈反对。
- 1867年（清同治六年） 上海江南制造局设翻译馆，聘西人口译，华人笔述，翻译格致化学、制造等西学

- 1868年（清同治七年）
书籍。
傅兰雅受江南制造局委托，向英国订购英文书籍两批 150 种。随后受聘于翻译馆，在此译书 28 年，为翻译西书最多之人。
由林乐知任主笔的《教会新报》在上海创刊，自 301 期（1874 年）起改名为《万国公报》。
容闳上说帖于江苏巡抚丁日昌，条陈清政府宜派幼童赴美留学。
- 1870年（清同治九年）
容宏向曾国藩建议派遣幼童赴美留学。
傅兰雅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订购第三批书籍 40 种。
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来华，在山西、上海传教、办学、办报，为晚清传播西学最有影响人物之一。
- 1871年（清同治十年）
容闳在上海设留美学生预备学堂，赴美幼童出国前在此学习中西文化。
- 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
第一批官费留学生 30 人赴美留学。
花之安出版《德国学校论略》、《西国学校》，是为较早介绍西方教育制度的书籍。
玛高温译、华蘅芳述《地学浅释》出版，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西方近代地质学知识。
- 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
第二批官费留学生 30 人赴美留学。
韦廉臣著《格物探原》在《教会新报》和《万国公报》上连载，这是一部介绍西方科学、影响较大的书籍。
- 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
由徐寿、傅兰雅发起，在上海公共租界内创设格致书院，延聘西人教化学、矿学，并请中西名人学士演讲格致学。
第三批官费留学生 30 人赴美留学。
王韬主办的《循环日报》在香港创刊。
- 1875年（清光绪元年）
福州船政学堂五名学生随教习日意格赴英、

法等国参观。

上海清心书院创刊《小孩月报》，内容有诗歌、故事、名人传记、博物、科学等。这是中国最早的儿童画报。

第四批官费留学生 30 人赴美留学。

1876 年（清光绪二年）

傅兰雅主编的《格致汇编》在上海发行，是晚清最早一份介绍自然科学的专门杂志。

丁日昌在福州设立电气学塾，学习电气、电信及制造电线、电报各种机器等。这是中国人设立最早的技术学校之一。

晚清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等一行，自上海起程。

清政府为表彰西人在翻译西书方面所做的贡献，授予傅兰雅三品衔、金楷理四品衔、林乐知五品衔。

林乐知著《中西关系略论》出版，评论中国内政、外交，在中国政界反响较大。

1877 年（清光绪三年）

马尾船政学堂派出学生、艺徒 28 名赴英法学习，此为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批出国留学学生。

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大会，成立基督教学校教科书编纂委员会，1890 年改组为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中文即益智书会。是为中国 19 世纪出版新式教科书最重要的机构。

1879 年（清光绪五年）

是年始，花之安在《万国公报》上连载《自西徂东》，这是晚清影响最大的西书之一。

1880 年（清光绪六年）

李鸿章奏请设立北洋水师学堂，次年落成，开设多种西学课程，以吴赞诚为总办，严复为总教习。

- 天津电报学堂开办，聘请丹麦工程师教习电报知识。
- 至是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已刊译西书 98 部，235 本。
- 1881 年（清光绪七年） 狄考文发表《学校振兴论》，向清政府提出改革教育的建议。
- 林乐知在上海设中西书院。
- 1882 年（清光绪八年） 嘉约翰译、孔庆高述《西医内科全书》出版，是为重要的内科著作，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 美国传教士李佳白来华，后长期在山东、北京活动，创办尚贤堂，是晚清传播西学的重要人物之一。
- 1883 年（清光绪九年） 中国驻日使馆官员姚文栋翻译日本修史馆编写的《琉球地理志》，这是近代中国翻译的第一部日文书籍。
- 1885 年（清光绪十一年） 清政府授予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三品衔、化学教习毕利干、法文教习华必乐四品衔，以表彰他们教授西学的贡献。
- 李鸿章办理天津武备学堂，这是清末第一个新式陆军学堂。
- 1886 年（清光绪十二年） 美国传教士卜舛济来华，后长期担任圣约翰大学校长，为来华传教士中著名的教育家。
- 1887 年（清光绪十三年） 韦廉臣等在上海设立同文书会，1894 年易名为广学会，是为西人在晚清最具影响的西书出版机构。
- 1888 年（清光绪十四年） 美以美会于北京设立汇文书院，后与公理会在通州设立的潞河书院合并，1919 年改名为燕京大学。
- 李提摩太写成《七国新学备要》，对欧洲及日本等国教育情况进行介绍。

- 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 广学会举办有奖征文活动，并在科举考试地分送西学读物。
美国心理学家海文著、颜永京译《心灵学》出版，这是近代中国翻译的第一部西方心理学著作。
- 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 林乐知与监理会传教士海淑德筹设中西学塾于上海，次年落成，此为中西女子中学前身。
- 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 美国传教士在广州茅村设立明心学堂，招收盲童，此为外国人在华设立较早的正式盲人学校。
-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 广学会出版毕拉必著、李提摩太译的《百年一觉》，是近代宣传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著作。
-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 康有为等发起公车上书，提出变法主张，其中多为讲求西学的内容。并组织强学会、创办《万国公报》，鼓吹学习西方，变法自强。
广学会派李提摩太进京，向清政府上《新政策》，提出改革的四项措施。
英国麦肯西著、李提摩太译，蔡尔康述《泰西新史揽要》出版，全书以进化论的观点介绍了欧美各国的发展史，为晚清最有影响的西史。
-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 清政府首次向日本派遣留学生13名。
林乐知译编、蔡尔康笔述《中东战纪本末》出版，记述了甲午中日战争始末及各种评论，戊戌前后影响很大。
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出版，这是中国第一份比较完整的西学书目，系统梳理了西学在华传播情况。
-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 李佳白在北京创办尚贤堂，吸收中外人士

- 参加，以讲求西学为要务。
- 南洋公学由盛宣怀在上海创办，此为中国人民在沪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后为交通大学。
- 梁启超所辑《西政丛书》出版，是当时讨论西洋政事的切要之书。
-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 南学会在长沙成立，此为戊戌时期研究西学最著名的学会之一。
- 光绪皇帝下诏变法。京师大学堂设立，丁韪良为总教习。
-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正式出版，为影响最大的西书之一。
- 李提摩太编译的《论生利分利之别》、《续论生利分利之别》发表，此为近代较早的经济学译作。
-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 清政府颁给已定居美国的傅兰雅三等第一宝星，表彰他在翻译西书方面的贡献。
- 王寿昌口译、林纾笔述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是为晚清翻译西洋文学之始。
-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 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出版《译书汇编》杂志，以翻译介绍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为主。是为留日学生第一个译书机构。
- 日本东亚同文会在南京创办同文书院，翌年迁至上海，改称东亚同文书院。招收日本学生以培养精通中国经济和语言的专门人才。
-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 清政府令各省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北洋大学9名学生随返美的傅兰雅到伯克利大学留学。
-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 京师同文馆归并于京师大学堂。
- 严复翻译的《原富》出版，这是近代中国译介的第一部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

-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 福井准造原著、赵必振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出版，是为近代中国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译著。
-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 严复的《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出版。严复的《社会通论》出版。《法意》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
-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 严复游历欧洲诸国。其译著《穆勒名学》出版，是为晚清输入西方逻辑学名著。清政府下令从次年起，停止一切科举，推广学校，颁发教科书。
-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美国公理会牧师明恩溥人觐美国总统罗斯福，请美政府“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以此作为派中国学生留学美国之费用。
-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合决议，同意“退还”赔款。清政府外务部奏，以美国“退还”赔款，自1909年起每年派遣赴美留学生100名（第五年起，改为50名）。
- 1910年（清宣统二年） 美国在南京设立金陵大学。北京图书馆成立。
- 1911年（清宣统三年） 游美学务处于清华园建成清华学堂。

附录二：主要参考文献

一、中文部分：

- 《饮冰室合集》，梁启超著，中华书局，1989年版。
- 《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张岱年、程宜山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 《中国文化史》，柳诒徵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
-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熊月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 《中国近代文化概论》，龚书铎著，中华书局1997年版。
- 《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龚书铎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中外文化交流史》，周一良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季羨林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 《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刘志琴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 《先觉者的悲剧》，李长莉著，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
-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 《中国近代报刊史》，方汉奇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方汉奇著，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 《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李志刚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 《剑桥中国晚清史》，费正清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顾长声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李喜所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 《容闳——中国留学生之父》，李喜所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高瑞泉著，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
- 《翻译家严复传论》，高惠群、乌传袞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朱有琳著，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版。
-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张静庐著，群联出版社1953年版。
- 《中国文学家列传·林纾》，杨荫条著，中华书局1939年版。

- 《林纾评传》，郑朝宗著，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 《林纾研究资料》，郑朝宗著，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 《中国文化名人画名家》，赵白生著，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 年版。
- 《文人画像》，陈引驰等著，上海三联书店 1996 年版。
- 《严复学术思想研究》，张志建著，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
- 《闲话辜鸿铭》，黄兴涛著，海南出版社 1997 年版。
- 《辜鸿铭传》，严光辉著，海南出版社 1996 年版。
- 《辜鸿铭文集》，黄兴涛等译，海南出版社 1996 年版。
- 《文化怪杰辜鸿铭》，黄兴涛著，中华书局 1995 年版。
- 《万国公报文选》，钱钟书著，三联书店 1998 年版。
- 《十九世纪的香港》，余绳武、刘存宽著，中华书局 1994 年版。
- 《历代名人入粤诗选》，余绳武、刘存宽著，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 《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顾长声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 《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李楚材著，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 《中西文化交流先驱》，许明龙著，东方出版社 1993 年版。
- 《宗教与文化》，卓新民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 《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卓新民著，新华出版社 1986 年版。
- 《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卓新民著，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
-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陈旭麓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 《汉籍外译史》，马祖毅、任荣珍著，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 《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王立新著，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 《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钟叔河著，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 《晚清政治与文化》，桑成之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 《西学东渐》，容闳著，岳麓书社 1985 年版。
- 中国近代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容闳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
-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陈学恂、田正平著，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 《近代中国留学史》，舒新城著，中华书局 1929 年版。
-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顾卫民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 《影响中国历史的一百个洋人》，肖黎等著，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 《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陈学恂著，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 年版。
- 《教会大学在近现代中国》，谭双泉著，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 《中国教会文学史论丛》，顾学稼著，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 《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章开沅、林蔚著，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 《晚清海外笔记选》，章开沅、林蔚编，海洋出版社 1983 年版。
- 《中国出版史》，史原放、李白坚著，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1 年版。
- 《中美关系史论丛》，汪熙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 《中美关系史论文集》，汪熙主编，重庆出版社 1985 年版。
- 《筹办夷务始末》，汪熙主编，中华书局 1964 年版。
- 《中外教育交流史》，卫道治著，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 《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丛刊·留学教育》，王焕琰、刘真著，台湾书店 1980 年版。
- 《上海格致书院志略》，王尔敏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 《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王韬著，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 《随使法国记》（三述奇），张德彝著，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 《出使九国日记》，戴鸿慈著，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 《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
- 《近代中日启示录》，王晓秋著，北京出版社 1987 年版。
- 《中日关系史论丛》，王晓秋著，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实藤惠秀著，三联书店 1983 年版。
- 《劝学篇·外篇》，张之洞著，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
-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历史卷》，王晓秋、大庭修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 《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谭汝谦著，香港中文大学版 1983 年。
- 《日本的中国移民》，谭汝谦著，三联书店 1987 年版。
- 《日本教习》，汪向荣著，三联书店 1988 年版。
- 《释演音》，王荣多著，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8 年版。
- 《弘一法师》，王荣多著，文物出版社 1980 年版。
- 《弘一大师传》，陈慧剑著，中国建设出版社 1989 年版。
- 《中朝关系史论文集》，杨昭全著，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8 年版。
- 《中国伊斯兰教史》，李兴华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 《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志》，王介南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 《印度尼西亚华侨史》，温广益等著，海洋出版社 1985 年版。
- 《中国与非洲——中非关系二千年》，沈福伟著，中华书局 1990 年版。
- 《中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简史》，沙丁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 《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张政琅等著，开明书店 1951 年版。
- 《东南亚华侨史》，朱杰勤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
- 《中外宗教交流史》，楼宇烈、张志刚著，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 《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杨怀中、余振贵著，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 《郭嵩焘传记资料》，天一出版社 1980 年版。
- 《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 《中欧文化交流史略》，马肇椿著，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
- 《德国的汉学研究》，张国刚著，中华书局 1994 年版。
-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于涪和、庾良辰著，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 《历史研究》、《申报》、《近代史研究》、《东方杂志》、《出版史料》。

二、外文部分：

1. Barnett, Wilson, *Practical evangelism: Protestant Mission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into China, 1820—1850*, Harvard University PHD thesis, 1973.
2. Bennett, Adrian, *John Fry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3. Cohen, Paul,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HUP, 1974.
4. Latourette, Kenneth Scott,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London, 1929.
5. Lutz, Jessie,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6. John L. Stuart, *Fifty Years in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4.
7. Richard Wilhelm, *Confucius and Confucianism*, 1931.
8. Bennett, Adrian A., Joh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19th Century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9. Biggerstaff, Knight, *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1.
10. Liu, Kwang—chin,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n Center, 1966.

11. Richard, Timothy, *Forty—five Years of in China Reminiscences*, London, T. Fisher Urwin Ltd., 1916.
12. Soothill, W. E., *Timothy Richard of China*, London, Seeley, Service&Co. Ltd., 1926.

后 记

参加李喜所先生主编的这套丛书十分高兴，但更多的感受却是压力。且不说对“文化”的界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是在一种较为科学的定义下，确定本书的内容，避免有失偏颇和重复，已使我颇费苦想。最终采取了先概括、后具体的方法，在晚清中外文化交流的宏观框架之下，对具体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阐释。第一、第二章将西学东渐的大势、特点以及发展脉络做了论述和梳理。第三章起，便分为专题或国别、地区进行论述和研究。最后一章为海外几个国家汉学研究的概况。如此纵横捭阖，便于读者把握重点，但又难免出现某些交叉和重复。在这里应特别交代的是，第五章“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和第八章“中日文化交流”按地区或国别的划分，应当归在第九章内，但因香港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便将其独立出来。日本与中国的文化来往在亚洲可谓密切，因此也单独作为一章。

本人自知学识浅薄，书中诸多不足有待学界前辈和同仁斧正。书稿写作中，适逢攻读博士学位，为如期履约，特邀几位同仁相助。他们是：王先明、郝锦花（第一章、第二章作者）；王金峰（第七章作者）；钟放（第八章、第十章第六节作者）；苏芸莹（第九章作者）。此外，在写作中还得到张新、杨令侠、江晓敏、靳洁、吴玉凤等诸位学友的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张 静

2000年1月

作者简介



张静，1955年生，河北保定人。198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1991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9年获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开大学思想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的教学与研究，先后在核心期刊发表《广学会与晚清中外文化交流》、《美国庚子“赔款”和在华“兴学”论析》、《论湘军集团及其与郭嵩焘的关系》等论文十余篇，并参与《宋教仁与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等书的撰写工作。